

第一期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发刊词　　焦国标

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类时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已经结束 20 多年了，可是，它在话语上迄今未被充分记载和言说，在实际中虽然特定的黑五类不存在了，而黑五类性质的政治贱民并未在中国绝迹，因而我们有必要打捞黑五类这个现象和话题。

十三亿中国人里，起码有一半人到死都不会忘记什么是黑五类，无论其本人是不是黑五类。为另一半人口计，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1949 年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大陆社会产生了四类政治贱民——四类分子，即五类分子中的前四类。1957 年反右之后，右派分子晋升为政治贱民中的“新秀”，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贱民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又新增四类，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和特务四类，合为黑九类。文革中后期，新增的黑四类逐渐淡出，“经典性的”政治贱民仍然是黑五类。至 1979 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 98 人未获改正，以表示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政治贱民回复到原先的四类。1984 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泽东中

国此前几十年制造的所有政治贱民都在政治上获得同等国民待遇。

这只是理论上的黑五类。实际上，黑五类的子女也被称为黑五类。官方资料称，中国曾有 2000 多万名四类分子，有 50 多万名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测，黑五类的子辈和孙辈是黑五类的 5-6 倍，因而受黑五类牵连的人数超过 1 亿，占当时总人口的 15%。

其实受黑五类牵连的不止是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近亲也是受牵连者。比如，我的家乡（河南开封）那时有“四大亲属”之说，具体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个人，如果他的这四大亲属成分高（是黑五类），那么他在升学、招工、招干、寻（xin）媒、当兵、当乡村教师和村干部等等方面，都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受黑五类牵连的绝不止超过 1 亿，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干净”。

我们现在随便拉出一个 40 岁以上中国人“盘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不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的亲戚。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父亲属于坏分子，以至于父亲去世时，他从遥远的青海回家奔丧，在县城请客吃饭都请不到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父亲属于反革命，他本人曾连写十次入党申请书都不被批准。前总理朱镕基是右派，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是右派，著名画家陈丹青是黑五类子女。刘少奇一家和邓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类。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精英和学术大师，几乎个个都是右派黑五类。

绝大部分黑五类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地主富农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识精英，坏分子里固然有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也有许多人是具有特立独行人格、拒绝溜须谄上的人。1949 年以后几十年中国社会之所以全面沉沦堕落，与各界精英的全军覆没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后劲，某种意义上说，也直接来自这批人的反弹和发功。黑五类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黑五类二代（如家电业巨头张大中、地产大亨潘石屹和艺术家艾未未等）从苦难中奋起拼搏、改变人生命运的不竭动力。

《黑五类忆旧》是一个期刊性的故事汇。当你阅读其中一个个故事的时候，请不要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时走进故事主人公

（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内心：在那样一个荒诞的时代，在那一个个罪恶的时刻，他们的心灵何其荒芜，何其野蛮，何其凄惨，何其无助！邓小平曾说，中国近几十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我们不妨接着假设：黑五类现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现吗？不信上帝的族类，内心像西红柿一样多汁。不过这丰沛的汁液不是别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虽然黑五类走进了历史，可决不意味着政治贱民现象在中国彻底消失。1984 年四类分子摘帽以来的二十几年里，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的黑五类？让我们记住黑五类，让我们记住政治贱民！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我们的灾难曾经如此深重，我们的人性曾经如此不堪，我们的堕落曾经如此可恨！然而，我们更要反省、检讨源源不断制造政治贱民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黑五类是全中国的替罪羊，是中华民族长大成人的阶段性祭品，他为全体中国人背了十字架。

感谢你，黑五类！

黑五类，对不起！

2010-7-30

目　录

表姨爹　　敖顺康

那是 1970 年的春天，表姨爹从一个贫下中农走进了黑五类的行列，成了大队小队开批斗会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队长的指示，

找来 3 个社员，把谷种从仓里撮到搭斗里，挑来几挑水，先进行浸泡，挠出悬浮在水面上的秕粒，进行一番清洗筛选，再加点石灰水，给谷种消毒杀菌。消毒完毕，又去烧些温水再浸泡。待水流尽，再盖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毕了。

此后每天都要淋几次水，待谷种长出浅浅的新芽新脚，就拿到秧地均匀地撒在田地里。

不知是怎么回事，谷种竟长不出脚芽来。是天气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没注意天气变化？还是温度过高谷堆发热烧坏了？往年也是这样操作的，是谷种本身有问题？表姨爹还在思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几个革命者已带着黑牌闯进他家，上面写着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

只几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坏分子。说他故意把谷种泡坏，诚心扰乱社会主义，企图搞垮集体的事业，是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要把他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斗中，革命者们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来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么也交不出来。真是泼天的冤枉！从此，表姨爹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去接受批斗。一家老小提心吊胆，在家门口目送亲人离家去挨斗。

“把坏分子揪上台来！”主持会议的人叫道。两个彪形大汉押着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压 90 度。“打倒坏分子！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远不能翻身！”口号连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独自仰天长叹：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贫下中农，世世代代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呢？一次工作失误就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这坏分子的帽子也来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干活干得筋疲力尽，晚上还要挨斗，身体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两年时间，因积劳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带着冤屈，留下遗憾，永远地走了。

一个坏分子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灭亡了……

补白：那次填写《中学生登记表》的经历我永生难忘。放学前，班主任们拿着这张破纸，拉下驴脸，对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声吓唬："为了保卫伟大领袖，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密切注意阶级敌人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许错填，不许漏填，不许隐瞒。

我们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个个都吓坏了，凑在一起，愁眉苦脸地商量：民族出身这一栏最好填，照实写。可是个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栏该怎么填呢？我们大眼对小眼，个个都傻眼了。有的说：个人出身干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证万无一失。可立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这样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师看了可能会觉得好笑，可我们可能从此就永别校园了。

什么事都难不倒狗崽子们。最后我们终于做出集体决定：个人出身统一填"小学生"，家庭出身栏各填各的，因为太乱七八糟了，有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伪满官僚、外蒙特务、民族分裂分子，无法统一。闹了半天，小事一桩，顺利解决。狗崽子们脸上阴云散去，又玩起摔跤、驮马架的游戏。直到天黑，狗崽子们玩饿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铁勇

父亲的骨灰在哪里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刚满六岁。天气很好，中午的太阳在天上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边的树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饭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

盒，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宝蓝色，总是一边走一边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脱，无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当经理，离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是外婆带我去，后来我就争着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闻，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好香！"然后再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道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张望，他总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今天却有点不对头，跟我很熟，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好像都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一排用毛笔书写的大字（后来知道这叫大字报）。虽然还没上学，可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认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划了大叉。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捡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一下子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他脸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我，便停止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抱得我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含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此后我和兄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经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许多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爸爸书柜里大部份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的，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蔑视他们：谅你们

也看不懂这些书！

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里有几棵树，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树。四五月间柚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满院的落叶，一地的碎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我家是父亲随和，母亲严厉。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家再也听不到父亲快乐的哼唱京戏的声音，变得死气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带我出门。她拿个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最后到了“宁夏街”。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的一个街名。妈妈没告诉我，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只是怕妈妈不高兴，没敢显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高的门口停下。门前有人站岗，手里拿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条小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

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和每次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与爸爸的“问题”有关。在学校和邻里，我们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被压垮。但我和弟兄们也从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种默契，谁都不敢去触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内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像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越轻，这样才对得起他的爱。

爸爸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那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装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这离婚是无

奈之举，别人岂能相信？妈妈几十年单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我们 4 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捡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补漏，下河捞鱼。上小学时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学会了勤劳简朴的品行，希望用我们的努力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间。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依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该党汉口区分部书记和特党委员，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又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 10 元困难补助，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他们原打算把我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调查的结果竟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的时候已告别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们只好单独揪斗我妈，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之后，没什么新东西，就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车间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两年后妈妈才脱离“牛棚”。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的路上，我们家没一个人动过这个念头。1986 年，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某天下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让我赶快回家一趟。原来，法院来了两个人，带了一份 200 多字的文件，声称当年把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我很不客气地问：“他人呢？”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

“那么把骨灰交出来，我要看。”

“这个，恐怕找不到了。再说那是监狱方面的事，不归我们法院管。”

我冷笑一声：“一条人命和我全家几十年的苦难，给张巴掌大纸片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显然见惯不惊，神态自若地说：“纠正通知书交给你们，一方面可以给你们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还要什么政治

前途！我将继续背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谓经济补偿，更不值一提。当初一个妇女带着 4 个孩子濒临冻饿死亡的边缘，仅靠健康的基因和顽强的性格熬过来，谁考虑过什么补偿？莫说叫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得点恩赐，就算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我会恶心，觉得我在喝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存积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泛滥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扫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我想为他筑个衣冠冢，却连照片也没有。我只能在静静的夜里，独自重温那永恒的瞬间……

侯振亚的儿子　　海　宽

1966 年，我在福建师大附中念初一。当时发生一件很令学校长脸的事儿：一位高中同学被选送进空军航校。他的父亲是当时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侯振亚。侯同学在附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大家都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们班里有两位认识他的女同学，那几天都把头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们的亲哥哥当上了飞行员也不过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学敲锣打鼓把他送到校门口。不知多少爱慕的眼光伴随着他上了军车，也不知多少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绿军装。

文革一来，省委领导们也被打倒了。有时在报纸或者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侯振亚的名字时，我心里会想到我的这个校友，不知他还能不能上天。

大约是 1974 年，我跟姑父到他厂（在闽北山区）里的澡堂洗澡。他告诉我，隔壁搬来个新邻居，让我猜是谁。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我谅你也猜不出来。告诉你吧，侯振亚的儿子。"我当时有点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军吗？他跑到这山沟沟里干吗来了？

原来，侯振亚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牵连，文革后不久即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当时侯大哥已在长春航校学习一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被迫离开航校，自己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1974 年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他被当做复员或转业军人处理，安排到闽北山区这个三线工厂。

后来在姑妈家我见到了侯大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当年离开学校时的意气风发，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跟他说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兴地请我到他家坐。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小俩口的小窝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

当时的我颇有些阴暗心理，对侯大哥的景况很有点幸灾乐祸。当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许多革干、革军子弟一样，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学面前很有点趾高气扬。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每次重新洗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经过这样的家庭变故后，侯大哥们应该会长大许多。中国何时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才算是从这方面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影响。

一篇网友跟贴：

我们公社后来还来了一批福建知青，他们都是福建省的干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帮，当地老乡不敢接收他们插队。在福建境内无法分配，他们便跑到内蒙，在锡林浩特静坐绝食，要求到牧区插队。他们的行动打动了盟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们一部分人被分到西乌旗，另一部分被分到东乌旗。分到东乌旗的最终到了我们乌拉盖公社哈达吐大队。

来我们队的福建知青，有一个是已经在长春航校学习了一年的飞行员。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亚。他人很开朗，会拉小提琴，我们经常听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跳伞时的情景，讲他从国家的骄子飞行员，一时间成为无人理睬的黑帮子弟时的心情。他想过自杀，他说他没有想到草原会接纳他！

他还带来他在山东支左时结识的女朋友，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很可爱的山东姑娘。后来他们结婚了。这个山东姑娘是个心地善良而朴实的农村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当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远离家乡和亲人，追随着当时已经是黑帮子女的侯，来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干。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热情款待我们，给我们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丝。正是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安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草原给了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一个栖身之所，让他们从此远离白眼和冷漠，过上了普通人应该过的日子。后来他们双双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学俄语的林芳　　金　梅

林芳 1936 年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先抗日，后内战，从未回过家。1948 年随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再无音讯。林芳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

林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为人贤惠，勤奋能干，以拾废品、帮人带小孩、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并送林芳上学读书。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决不让林芳辍学。林芳知道母亲辛苦，自己读书不易，因此学习十分勤奋，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十分优异。高中毕业后，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专修俄语。

在大学里，林芳仍和过去一样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受到同学的钦佩和老师们的青睐。再加上她人长得也漂亮，很多同学甚至个别老

师都对她产生爱慕之情。虽然正当豆蔻年华，但她克制自己，拒绝诱惑，始终以学习为重，把爱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 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小张，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高中时期，他们二人的成绩都很好，经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携，相处甚好。小张又是班长，品学兼优，加上出身好，社会关系好，没到高中毕业就被防空部队招去，加入空军，并晋升为军官。小张回重庆探亲时得知林芳在北京读书，便专程前来看望。几年不见，二人更加亲昵。此后时有书信往来，由友情发展成为恋情。

小张是一名军人，恋爱婚姻必须得到上级允许。小张把同林芳的恋爱关系向首长做了汇报，并要求允准登记结婚。军方经过对女方家庭的政审调查，发现女方的父亲是反动军官，母亲是反动家属，女方本人是当然的黑五类子女。小张的结婚申请被拒绝，并受到严厉批评。小张十分痛苦，写信向林芳表示，打算离开部队，宁可不做官，回家当老百姓种地，也要娶她为妻。

小张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林芳的痛苦！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决定放弃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类，不能把小张也拉进黑五类。为了小张的前途，林芳含泪写了一封绝交信："小张，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不愿看到你也成为黑五类。为了你的事业、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请原谅我，从今以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希望你永远把我忘记，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我。假如人生真有来生，就让我们来生再做伴侣吧，请永远忘记我……"

毕业后，林芳悄然离开学校，孤身一人到黑龙江省最北边和苏联接壤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她先在这个县卫生局当统计员，后又被分配到一个医院搞药剂。林芳既聪慧又勤奋好学，并且虚心求教，很快精通了业务，常常得到同事们的夸奖。

正当一切都还顺利的时候，不幸的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先是中苏关系恶化，祸及林芳。林芳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又恰好在中苏边境的县城工作，故在内部开展全面政治审查时，她被认定是特务嫌疑。原来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单位边劳动边交待问题。白天打扫卫生、倒痰盂、洗尿盆、冲厕所，晚上写检查交待问题。在得知她的黑五类

身份之后，对她的管制更加严厉，日夜都有人监视。林芳有一个远方表哥，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转业到北大荒。因为相距不太远，二人见过几次面。因而在批斗时，除了强加她是特务、黑五类之外，还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乱搞两性关系。

面对无情的批斗、毒打和羞辱，林芳绝望至极，曾一度想自杀，离开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世。几个平时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里劝慰她，生活上暗中帮助她。这些善良人的关爱给了林芳顽强活下来的勇气。

1966 年文革开始，黑五类子女林芳的处境比以前更加险恶。她日夜被揪斗，遭毒打，渐渐变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赶出县城，到乡下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农民很纯朴善良，不会苛待这孤女寡母。一位老乡把自己的草房腾出了一间，让她们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林芳到了这里，像是获得解救一样，没有了批斗毒打，没有了那没完没了的交待反省。林芳虽是大学毕业，但并不孤傲，什么脏活重活都抢着干。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尽量照顾她，不安排她干重活。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没有半点强迫。

同一个村里还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劳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个是林业局的干部，原在部队当游泳教练。此人出生于上海，资本家家庭，属于黑五类，又是知识份子臭老九，已经 40 出头了，还是单身汉。那时林芳也 37 岁了，于是一些好心人开始撮合。这对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类老男大女，如今终于成为眷属，在那里成家落户。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一个小女儿。加上林芳的母亲，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文革结束后，平反落实政策，他们都回了各自的原单位。1982 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学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林芳也随丈夫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补白：教我们语文课的孙秀山老师被打成右派，起于一张大字报。据说有一次吃饭时，老师们正夸赞苏联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孙老师却在那里自言自语："苏联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吗？和我们的灰菜差不多！"结果被人说成是攻击苏联老大哥，大字报贴到教室外的山墙上。我看过后，随口说："就是和灰菜长得一模一样嘛！未必好吃。"学校菜园里种着这种菜，从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长得有半人高，人们说是苏联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没吃过，只是推断而已。我从小就不喜欢吃灰菜。结果，有积极分子把我随口一说的话汇报给团支部。团支部请示校团委，组织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硬说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要我做检讨。我不肯，最后不了了之。

吕　维

重重罪　　季晔峰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圣经·诗篇》

我祖父是苏北淮安的一个大地主，拥有一座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大宅子。土改时，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来到上海，在虹口区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层或四层的楼房。

我的生母 1950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我的生父 17 岁从上海随大军南下，在厦门市计划委员会任秘书助理。1958 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年 26 岁），遣回原籍监督劳动，妻子与他离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关系，是叔嫂关系。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 1947 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国民政府的税务部门任职。1958 年大年三十，因其南开同学中有两个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服役，他们班留在大陆的 25 个同学悉数被捕，判刑 20 年。当时他们已生了 4 个孩子。为

了活下去，夫妇离了婚，并将孩子改随母姓（吴）。就在父亲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伯父被判 20 年徒刑杳无音信期间，叔嫂二人发生私情，并生下了我。

我大概是 1964 年被生于上海，但迄今为止我不确知我的生日具体是哪一月的哪一天。当时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这个苦命的婴孩，约一岁半时我被送回淮安祖籍。这个被当时的主流社会完全抛弃，在社会最底层勉强挣扎活命的家族，为了让这个男婴活下去，并抱着将来有朝一日能给这个家族带来重新出人头地机会的愿望，把我送给县城一个最显赫的家庭去“压子”（养父当时刚结婚不久）。

一个根本无力主宰自己人生命运的男婴，承载着这个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会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样，开始了在“埃及长老”家的养子生涯。

我养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时任中共江苏淮安县委书记。他为人正直，反对浮夸，很受当地人敬重，后来升至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时我听他讲过故事，还与他下过象棋，并且赢了他。

养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区复兴乡季庄四队，与原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季剑虹的家同在一个村子。他们也是同一个辈份，相距不过七八户人家。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这是一个信奉阶级斗争哲学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质利益的多少为标准，每年春节都会因送年礼的事大吵大闹一场。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后来为了躲避这种争吵，也由于无法忍受一直弥漫在这个家庭里许多年的那种虚伪和压抑的氛围，我选择了逃避。宁愿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过年。

我虽然是一个男孩，又是家里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犹如一个童养媳。我至今不会用汉语拚音，而我的养母当年正是公社里教汉语拼音的示范老师。每当她带着亲生儿女去教学时，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门、做家务。小时候我爱画画。有一次我画的一幅画在公社里得了奖，我的养母却把我的名字换成她儿子的名字。从记事起，家里总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后来当兵退伍回乡，我的养母还要我为她洗她那肮脏的内裤。那时农村里流行一种喝生鸡蛋长身体的说法，我也曾从鸡窝里

拿起刚下的鸡蛋喝过。有一次，养母叫我从鸡窝里检来鸡蛋，敲开一个小口子，递到她亲生儿子手里，却不允许我再喝家里的鸡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她儿子当着我的面把一个鸡蛋喝下。从此我再没有喝过一个生鸡蛋。多少年后，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态，几乎天天晚上要给自己炒一碗蛋炒饭。

我的小学是在季庄读完的。那时我经常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活动，每次上台演出都是借别人的红领巾。戏演完了，又把红领巾还给别人。小学毕业时，成绩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红领巾，惟独我没有。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到那种因被群体排斥而产生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1976 年是当代中国历史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在离家十几里外另一个公社工作的养父，在这一年突然得到升迁，从共青团书记升为公社副主任。我随养母一家从季庄搬到这个公社大院里居住，从纯农业户口变成“定销”户口，即和城郊莱农的户口性质差不多的一种户口。

这年的元旦后，在上学的路上我听到了周恩来的死讯。不久是朱德的。9 月份的一个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条石子路旁，一个瘦高个子的公社干部对我说毛死了，并且还流了泪。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几天后全公社在电影院举行追悼会，开始时我与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龄差不多大的儿子扎着武装带，各持一杆半自动步枪，在电影院入场处的两边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换掉了，而那个副主任的儿子仍然持枪站在那里。我不明白为什么。

在这个公社大院大约只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养父又得到一次升迁，到与涟水县相交界的一个公社任副书记。于是我们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时候，养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医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县里为他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追悼会。这一年，淮安县城与全国其他县城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先后召开了四次大型群众追悼会。

两年后的 1978 年，官方开始了“拔乱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复了厦门市的工作，带着他后来又结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

里。右派们重新粉墨登场，进入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伤痕文学”出现于文坛，右派一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

这几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在悄然发生变化。公社更名为乡时，我的记忆就是公社大院的门口重新换了一副招牌。我的养父再一次得到升迁，转任淮安县席桥乡党委书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乡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乡政府大院与我的祖宅仅相距几百米！我养父在这里做了 8 年乡党委书记，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与我有着怎样浓厚的血脉关连！那时我原以为只不过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驿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这 8 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么重要的时光！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锦归乡。搬到这个乡政府后不久，我就陆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他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乡，他带着司机开着一辆皇冠车回到封闭落后的苏北农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个悲惨年代里出于无奈忍痛送出去的儿子——接走。然而这一切我当时却浑然不知。我与很多看热闹的人一样，围在他的皇冠车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从乡政府办公室里快步走出，径直走到我身边，向我伸出双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双手。一个右派，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我所景仰的人，一个文学作品中常写的主角，刹那间变成一个具体实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这一切就象梦境。他把我的双手紧紧抓在他温暖的手掌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激动！没有人为我们俩做介绍，而他却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谁！我们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然而，这很可能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记不清双手是怎么松开的。我带着一种幸福的颠颤，自豪地对乡党委秘书张某说我刚才和某某某握了个手。没想到，我却遭到他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他说他不过是一个臭右派，有什么好神气的！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不知道这位张秘书现在何处，也不知道当年他那般理直气壮、铿锵有力的教训我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我不会与这个右派有什么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个像他这般荣耀的人！

记得当时我的养父曾以一种很随意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跟这个人

走。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我与和这个人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怎么可以不明不白跟一个陌生人走呢？真是问得莫名其妙！到 80 年代中期，我养父母一家的户口全部都转为城市户口了，我的户口却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环城村九组。户口本上没有父母，户主和家庭成员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右派走了，没有想到，我们这一别到再相见，竟然整整相隔了 23 年之久！

1982 年有两个军区（北京和上海）来淮安征兵，分到席桥乡来接兵的是上海军区的部队。我至今不明白当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还是有人从中作为。

当满载新兵的轮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我和第一次出远门的其他新兵一样，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好奇心。惟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对漂白粉味儿很大的自来水一点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时差点吐了出来。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外滩福州路时，面对一幢旧式楼房，一种非常强烈地似曾相识感清晰地冲击着我的心……

我很快厌倦了军队生活，大量时间花在阅读文学作品上。在一次文学讲习班里，我结识了爱写诗的上海人盛国钧。盛家距我们的营房只有几分钟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国钧带我去看望他的一个刚刚病愈的朋友吴立寅。我原以为只是朋友间的普通来往，而实际上吴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儿子）。这一切当时我被蒙在鼓里。从他们含糊其词、欲言又止的谈话中，我隐约感到某些事情与我有牵连，可又没有发现实实在在的破绽。但是自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自已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满，既然我不喜欢军队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苏。但是在离开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发生了。

我的养父来到部队，把我带到上海某电扇厂一位副厂长家。那时我只知道这位副厂长与在厦门市工作的那个席桥右派有亲戚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快进门时我的养父特意关照我说:“这家人因我以前曾帮助过他们，现在他们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你

不要答应他们。”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个留在上海的机会，对于一个来自苏北的乡下人来说，纯粹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进屋后，那个副厂长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养父此前的“叮嘱”，我还是找了个借口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副厂长原来是我的三姐夫。当时屋里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儿子，现在已经读研究生了。

过了两天，我养父又告诉我，席桥那个右派家里的另一位亲戚要见我，叫我退伍时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并住在她家，辅导我考大学。这一次我养父没有陪我去，至于行前养父“叮嘱”我见面时怎样称呼她，已经记不清。现在还能想起，在拥挤的四川路口那个破旧的电影院门外，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与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见。她站在路边等我，我走过去叫她一声“阿姨”。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把我又领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带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当时中间的楼层还被外人住着。母亲住楼上，她说我的房间安排在一楼。中午，母亲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条我爱吃的鱼，那条鱼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两年多前，我请门头沟一位道士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是谁”的问题，口中竟奇迹般涌起那条鱼的味道……

我的养父最终还是把我骗回了苏北。生母曾打算回故乡办高考补习班，让我到她的班上复习，再考大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政府没有同意。母亲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来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如今 20 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母亲已变得模糊不清，听说她的头发从那时就渐渐全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养父一次次阻挠我与生父母的相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不是因为爱我或舍不得我才这么做，更不是为我的前途考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生父母一次次听任我养父的这种阻挠成功。我相信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难以启齿的罪恶计划。早些年我隐约听到过一些有关我的“卖身契”的信息。虽然我至今没有亲见过这个契约，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着，并且至今仍

然控制着我的命运。这是一张与魔鬼签订的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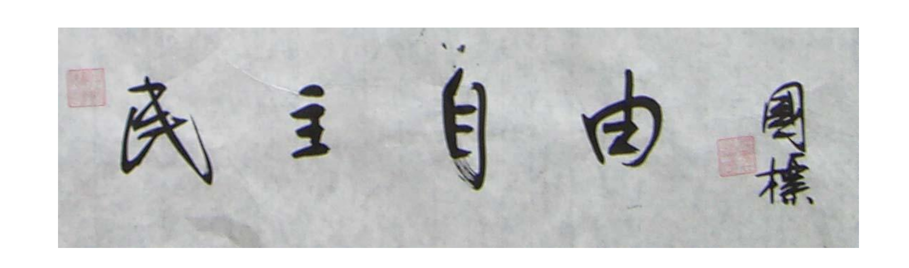
2004 年 5 月，我第一次与四叔家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张霆见面。他说，似乎确有一份他们当年双方订立的如何处置我的协议。我完全被这个事实惊呆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个奴仆的身份活着，至今仍然是一个活在 21 世纪的现代“农奴”！父亲，你这个曾经备受政治凌辱的人，为什么在许多年之后又与这些人同流为伍？你为什么要与魔鬼订约，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难道权力与政治永远如此让你无可奈何吗？

2004 年 5 月，我第一次去厦门市寻找生父。虽遭遇种种周折，仍未能见上一面。半年后再赴厦门，终于见到生父，却没有第二次握手。临别时我用指尖轻轻地拍了几下他的手背，那双当年曾经那般温暖的手，此时竟然变得如此畏缩、冰冷，我明显感到我手上的热量远远超出他的手温……

离开厦门，我决定去上海见一下母亲，让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再变得真实、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问：“你现在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了吗？”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准备去看看你。”母亲说：“好吧，一天 24 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给母亲打电话，她却推说住在女儿家，不方便见面，回避了我……

放下电话，一首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耳边唱起，那是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的插曲《草帽歌》：“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岙，耶哎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间狂风呼啸，夺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卷走了草帽啊，飘向那天外云霄……妈妈只有那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至今为止，我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是 2005 年的母亲节。拔通电话后，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我捂着电话没吱一声，直到她把电话挂断——我只想再一次听听母亲的声音！



革委主任贾作仁　　老村夫

贾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革委会里所有的造反派都听他指挥。群众专政一开始，贾作仁就让赵士杰当群众专政的头头，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分子都关了起来。对于那些不肯老实改造的各类分子，可以当场打死。一夜之间，全公社有十四个大队的专政队各打死一名四类分子。在县武装部主持召开群众专政现场会议那天，贾作仁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粪和污泥里浸泡长达一天，并在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被牛粪污泥浸泡的四类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肤病。一名知青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气愤，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结果被群众专政队打折一条腿，落得终身残疾。专政队动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挂在房梁上悠，针刺手指，钉子钉太阳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见的。一名女知识青年觉得群众专政做得太过分，说他们好像法西斯，便被定为现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众专政的头头赵士杰和贾作仁还对这名女知青进行长期强奸。

群众专政结束之后，这名女知青投书县革委会，举报赵士杰和贾作仁的兽行，而后服安眠药自杀。

举报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她十六岁那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会干农活，时常想家，在劳动中说过城市孩子不应该下乡的话。群

众专政一开始，她认为群众专政的做法太残酷，更不应该把四类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类分子是人不是牛。当年法西斯也不这么做，真比法西斯还坏。不经过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里整人，真是无法无天。群众专政负责人就说她是对抗最高指示，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头发被抓掉，脸被打得又红又肿，眼睛也肿成一条缝，被关进公社的一个仓库里。窗户很小，四周上着铁栏护。他们不给她铺盖，地上连草都没有，让她在水泥地上睡觉。她受不了，就边哭边喊。看管她的民兵给他弄了几捆稻草，一床旧被，就这样被囚禁在仓库里。

过了两天，原来看管她的人不见了，由公社专政指挥部的赵士杰看管。赵士杰假装关心她，给她送水送饭。一天晚上，赵士杰和她说，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斗她。那天晚上，赵士杰像野兽一样强奸了她。从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赵士杰经常来强奸她。她远离父母，受不了这样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觉得这样不明不白死了，让作恶多端的赵士杰逍遥法外，她个人的冤屈将永远石沉大海。她要活下来，要控告群众专政对她的迫害，还自己一个公道。

赵士杰的兽行实在让她忍无可忍，她就把情况回报给了贾作仁。贾告诉她，不许和任何人讲，这是关系个人荣誉的大事。当天贾作仁就把赵士杰调走了，再不许任何人接触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监管。贾作仁告诉她，这个案子没结案之前，不能和别人讲，她要暂时在这里继续接受审查。贾作仁给他弄来两条带靠背的长椅子，合在一起给她当床。没想到贾作仁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里他打开屋门，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强奸了。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干部下乡，贾作仁就趁机对她进行奸污。有时一天两次，把她折腾得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样受折磨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痛苦日子里，她记下两个畜生对他施暴的日期。屋子里没有笔没有纸，她就检一根树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划在墙上。凡是墙上划有叉号，下边写上日期的，就是赵士杰对他施暴的时间。凡在墙上划 V 符号的就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贾作仁对她施暴的记号，每个记号下边都记录了日期。一个 V 符号下记着两个时

间，这就是贾作仁一天两次对她暴。

贾作仁、赵士杰的胡作非为使这名女知识青年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肉体上遭受践踏和蹂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多次想自杀。

根据这名女知青提供的举报线索，人们发现公社那间关押女知青的仓库墙上确有叉号和 V 符号。比如叉号下边有 7，3，8，30，就意味着是七月三日八点半。

贾作仁夺权之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觉得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结合的工农干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拥护他，因而变得有恃无恐。贾作仁奸污女知青的消息传出，真有点石破天惊出人意外。经公安局对赵士杰和贾作仁突击审查，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贾作仁脸色铁青，往日的骄横没有了，低着头走进了警车。

补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败的地主家庭。六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上学，那时报名上学的条件是能数一百个数，能完整写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一百个数倒是背下来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却没能完整写下来。被学校拒绝了。我是开学半年后入学的。入学要带户口本，同学们相互传看着各自家庭的户口本，主要是看户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贫农、雇农的同学格外骄傲自豪，是中农的也挺胸昂头。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就惨了，先是犹犹豫豫不肯拿出户口本，而后就直接被同学抢了去。自然我们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无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后我们几个地富后代总是受贫下中农后代的欺负，老师也坚决站在了他们一边。日子很难熬，地主富农的后代们陆续转学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被革命的对象。读小学时我的书包经常被同学们扔出去很远，每次我都等同学们走远了再偷偷捡回散落一地的书。记得下雨天家里的玻璃窗上时常被同学摔上稀泥，有时家门

口还被挖几个陷坑。我实在无法忍受地主成分给我带来的种种屈辱，在一次学校要学生带户口去上学时，我悄悄把户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举给父亲带来了巨大麻烦，先被派出所抓去关了起来反省，后来经常被批斗。在阶级斗争还十分严峻的年代里，改成分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佚　名

四类分子有多少　　李若建

四类分子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人口超过 1 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 1949 年到 1984 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 35 年的特殊社会阶层。

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这两类人的界定相对比较明确。但是由于土改从土地革命战争到 20 世纪 50 年代持续了 20 多年，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标准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笔者只见两份权威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 1952 年土改前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地主占总人口 4.75%，富农占 4.66%，两者合计占 9.41%。另一个是根据 1954 年 23 个省、自治区 1.5 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 2.6%，富农阶级占 5.3%，两者合计占 7.9%。

中国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相差比较大，一些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因此地主富农也不多。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约为总土地量的 4-5％，富农占有的土地约为 10％，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地方后来被认为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又人为制造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四清运动中硬套“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 8%”的框框，补定了一大批“漏网地主、富农”。四清的重点地区陕西省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 1.2 倍。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有些还是中农。

反革命分为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如下：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

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坏、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列举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其他应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内含。

关于坏分子的界定，虽然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规定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可能更多是归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个很难认定的标准。还有一种半官方的定义，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称为坏分子。

有的犯罪者的家属也被当成四类分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引发一场骚乱。政法部门捕判了39名“闹事”群众，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判处管制2人，另有1人自杀。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此案于1962年平反）。

许多地区对四类分子的划定相当随意，一些人莫明其妙地成为四类分子。河北省三河县1979年全县1194名四类分子中，无合法手续宣布无效的473人，占当年四类分子总数的41.17%。1959年淄博市一公社被错划为五类分子的竟超过实际五类分子人数的3倍多。被错划的多数是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为和爱发牢骚、讲怪话、顶撞基层干部的人划成坏分子，有的把一般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划分县管制、区管制、村管制，70%以上的四类分子是属于村管制。由此可见，划定四类分子的权力相当大一部分在基层干部手中。

从一些地方志中公布的资料来看，当年的公安部门是有四类分子

数量统计的。不过这些数据很不理想，一是只统计被管制的，没有统计那些没有被管制的，二是当年的统计是在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数量波动很大。不同时期四类分子的数量大不相同。大跃进与文革期间的数量就比较大。

官方资料称，中国曾经存在过 2000 多万名四类分子，但是没有说明这一数据是否包括所有曾经被冤枉成四类分子的人。据统计，1977 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 279.7 万人，富农分子 189.5 万人，合计 469.2 万人。由此推断，1500 万以上的四类分子在 1979 年以前已经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过从局部地区的资料来推算，曾经存在过的形形色色四类分子很可能不止 2000 多万。以山东省聊城地区为例，1956 年有四类分子 102772 人，1978 年被评审的四类分子只剩下 14923 人，1978 年的人数只相当于 1956 年的 14.52%。

实际上无法真正搞清楚四类分子的数量。1958-1961 年间，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宁夏 5 个省市自治区错划四类分子 1.48 万人，漏划 1.03 万人。以此推算，全国错漏的四类分子应当有数十万人。这还是根据当年的标准发现的错漏，如果按后来的标准，错漏的数量可能更大。在文革中期的 1972-1973 年，福建省纠正错管四类分子 5587 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 4%。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错管的比例如此之高，不难推测四类分子当中有相当多是冤枉的。即使在 1983 年全国最后的 79504 名四类分子中，仍有 982 人被搞错。1979 年 3 月 24 日，廊坊地区共有四类分子 14250 名，经群众评审，摘帽的有 5984 人，因无法律手续，宣布无效的有 7247 人，纠正错定、错戴帽子的有 904 人，继续戴帽的 115 人。云南省中甸县 1958 年全县五类分子 2565 人，占总人口 3.99%，1959 年查实后为 1396 人。一年之间，数量相差近一倍。

四类分子牵连的人数有多少更加难以估算。根据局部资料推算，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天津市武清县原有四类分子 5221 人，1979 年时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 18942 人，地富子女的子女 10204 人，后两种人相当于四类分子的 5.58 倍。云南省中甸县 1979 年给 542 名地主富农摘帽，同时把地主富农子女 2079 人和地主富农子女的子女 1715

人改变成分为社员。子辈和孙辈是地主富农人数的 7 倍。如果考虑到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农出身，这部分人的子女实际上也受到歧视牵连的话，估计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 5-6 倍之间。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 4-5 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 3-4 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是四类分子总数的 5-6 倍。以有 2000 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 1 亿，占总人口的 15%。

四类分子的构成可以从两方面讨论：一是四类分子的内部构成，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各占多少；二是不同地区四类分子占的比重，有城乡的差别，也有不同行政区的差别。关于四类分子的内部构成比例，缺乏全国性的数据，无法准确得知。1983 年全国剩余的 79504 名四类分子当中，地主占 35.50%，富农占 18.04%，反革命占 20.45%，坏分子占 26.00%。1983 年时，四类分子中剩下的地主、富农比重可能相对低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比重会相对高一些。

笔者根据各地一些零星资料估计，四类分子的内部结构大体上是地主占 35-45%，富农占 30-40%，反革命占 10-15%，坏分子占 5-10%。这一比重有待今后国家档案资料公布才可能核实。城乡之间的四类分子构成也有所不同，农村地主富农占的比重高，城市则是反革命与坏分子占的比重高。

红、黑五类和中间类　　李　氏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五类子女，也有数量相对多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还有中间类（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城市贫民等）子女。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初，严格审查参加者，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子女政治态度和表现有问题的也不能参加。支持某派红卫兵组织的黑五类子女可以在该组织认可下成立外围组织。哪个红卫兵组织接纳了黑五类子女，那就是授人以柄。中间类子女是否能参加某派红卫兵组织，主要看本人的态度和人缘，有的教师子女也能成为基层红卫兵组织首领并被结合进革委会。

文革中除了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保守派之外，还有逍遥派。逍遥派起初是指所有群众组织都不参而游离在运动之外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受到打击迫害，但会受到冲击。有时他们需要对某事表态，表态不合人意就可能被批评教育，但一般不会被武斗。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逍遥派变为对文革运动不再如初期那样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所有人的统称。

不少黑五类子女和中间类子女始终都自觉不做或不得不做逍遥派，因而他们直接因文革出事的也相对较少。绝大多数红五类子女文革之初都要义不容辞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并非全都出自本心），所以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他们。

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作战部，有作战部部长及常备的总部武装保卫人员等少量武装骨干。这些人必要时是直接上“战场”的。黑五类子女绝对不能直接上武斗战场，否则，就要出阶级报复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大多数武斗战场上双方阵亡者都不会是黑五类子女。

文革前，无论哪一类子弟，家中条件差的都能享受助学金。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一个身为团支部书记的革命干部子弟率先造班级辅导员老师的反。该老师被关进牛棚后，这位干部子弟贴出大字报，勒令本班黑五类子女不得与红五类子女享受同样的经济补助，不多久却传来他本人的家长就是走资派，已被关进牛棚的消息。

文革中一度时兴改掉自己带有四旧色彩的名字，校园里常见“改名声明”的大字报：今郑重声明，将本人带有某某色彩的名字“某某

贵”改为“某卫东”，“某某富”改为“某卫彪”，诸如此类。一位本不姓毛的黑五类同学，郑重申明自己改名毛为民，结果招来一阵痛骂，说你黑五类子女怎配与伟大领袖同姓，不许改姓。这位黑五类也挺有骨气，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写大字报全用毛为民署名。他的大字报紧跟形势，没什么大错，反对他改姓的红五类气得跳脚，可也拿他没办法（只是常在他的署名下加批注泄愤）。不过，这些改名的同学，到分配工作时还都是用父母亲所赐的名字，“毛为民”同学也一样。

在我校，有红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也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红五类子女政的，还有黑五类子女代表无产阶级来专黑五类子女政的。这种群众专政时间都不算很长。疾风暴雨之后，我们班上黑五类、红五类和中间类同学们都还是相安无事，而且还增加了几分客气。所以，至少在我们那里，不能说文革中红五类子女都怎样怎样造孽，黑五类子女又都如何如何遭殃。除了有名的学生领袖和直接的杀人凶手，那些有各种问题的绝大多数学生后来并未受到刑事惩处，而是做过思想检查后各奔前程。在武斗中十足展现个人人性恶的个别学生，如将彭德怀揪到学校坐车游街示众，打老人耳光，又用脚将其从卡车上踹下来，致使老人摔倒在地的某红五类同学，此后是很难再融入自己的同学群体中了，也羞于再回母校。

被遗忘的族群　　林贤治

几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

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并被遗忘的族群，借以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 1949 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 1979 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作为一个偶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今天看来，其实只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这种状况，大约只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成长的。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

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大多数则形成内倾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包括自己在内，多抱一种不信任感。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

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

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组织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补白：对于不少黑五类子女来说，与家庭脱离关系是当年摆脱政治歧视的唯一途径。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多年之后渐渐露出血痕。著名文学批评家孙郁曾说道：“我不愿意回忆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是一种折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我改了姓名。我还记得老师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知青与书记　　木华榭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鸡的同学。他虽然和我们一起来农村，却并不算插队。他算回原籍，即通过自己联系，回原籍农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们插队的这个村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农民，而高大同却是回到自己的亲人中间。他几乎与全村的人都沾亲带故。

那时村里要经常开黑五类的批斗会，但黑五类与贫下中农多年通婚杂交，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很难划清界限。因此每开批斗会，村里谁也不愿去得罪人，上台押黑五类的事就全推给我们知青。当时押黑五类有一定之规，要用喷气式，因此被批斗也叫坐飞机。

我们知青也有自己的顾虑。比如柳大瞎子，据说很会占卜测字，号称柳半仙，他的成分虽是坏分子，却与大队柳书记是亲叔伯兄弟。尽管柳书记嘴上说对柳大瞎子这种宣扬封建迷信的人决不能手软，可从他的眼神里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亲情。柳书记手上握有我们选调的生杀大权，当然得罪不得。因此，我们每次上台只是做做样子，并不真用力去撅柳大瞎子。然而李木鸡的态度却极为认真，有一次在台上他竟然险些将柳大瞎子的胳膊撅断，疼得柳大瞎子当场昏死过去。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木鸡出手会如此狠毒。李木鸡的英勇表现立刻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但柳书记的脸色却很难看。

批斗会之后，高大同冲李木鸡大发其火："你以为发一杆枪你就是基干民兵了吗？那不过是让你临时背一背！"我知道，高大同发火是做给柳书记看的。高大同对柳书记和柳大瞎子的亲缘关系更清楚：柳书记与柳大瞎子两人的父亲不仅是同胞兄弟，他们的母亲还是同胞姐妹。也就是说，书记和瞎子二人不仅是亲叔伯兄弟，还是亲姨表兄弟。

这时柳书记走过来，笑笑，问李木鸡："听说，你想上大学？"李木鸡没有说话，但眼球微微动了一下。柳书记说："我听说了，你偷偷跑去公社问过。"柳书记微微一笑，又朝周围的人看一眼说："你

这个愿望当然很好，当大学生嘛，学习科学知识嘛。”然后又点点头：“但我告诉你，你就是再使劲表现也没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轮不到你。”最后柳书记心平气和地说：“你就在这里扎根吧。”

李木鸡看着柳书记，忽然眨眨眼。柳书记又故作和蔼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没用。”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李木鸡眨眼似乎另有含义。

我至今仍然没搞清楚李木鸡跟柳大丫是否真有关系。柳大丫是柳书记的独生女儿，一个俊俏泼辣的农村女孩儿。那时村里的女孩儿下田都爱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鸡，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儿喜欢。

当时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节。除草要两人一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里除草，女的用箩筐背出去。那段时间，每到分派农活，我就发现柳大丫总是先向李木鸡挤一挤眼，轻轻说一声“斩草”，然后，两人就一起钻进玉米地的深处。

柳大丫为什么不像当地人一样说除草，而偏偏说成是斩草？我曾和高大同一起琢磨过这个事。可以肯定，这个说法一定是她从李木鸡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在李木鸡与柳大丫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只有他两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年的秋后。事后据村里有经验的妇女议论，柳大丫的妊娠反应之所以不明显，很可能是她身体强壮的缘故。总之，直到她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才引起柳书记的注意。柳书记极为生气，甚至怒不可遏，可仍然只是不动声色地展开调查。柳书记从高大同那里得知“斩草”的疑点时，极感意外。

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竟然会牵扯到李木鸡，再想又觉得确实不是没有可能。李木鸡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镜，白静斯文。柳书记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自己女儿喜欢的。如此一来，柳书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柳书记的心里很清楚女儿的性格。如果去直接问她肚子究竟是谁搞大的，女儿一定誓死不肯说出来。但作为一个大队书记，自己女儿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还找不到罪魁祸首，面子又实在说不过去。于

是高大同不失时机地为柳书记献了一计。这时高大同已被推荐去上大学，刚通过政审，正在填写各种表格。

一天晚上，柳书记把李木鸡叫到自己家里说："有一些话要问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带到我这里。"然后又特意叮嘱："这件事，不要让村里任何人知道。"

关于柳大瞎子占卜测字，村里有很多传闻。据说曾经有一次，生产队里的猪倌突然丢了一头小猪。柳大瞎子就让这猪倌写一个字。猪倌不会写字，只在地上画一个圈，又在中间点了一个点。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说："不用找了，这头猪已经被你吃掉了。"猪倌愣了愣，当然不肯承认。柳大瞎子说："你画的这是一口锅，那锅里还煮着肉呢。"猪倌挺一挺脖子，说你怎么就认定这是一口锅？柳大瞎子说："即使不是一口锅，也是一张嘴，那肉在你嘴里叼着还没咽呢。"

猪倌仍然不服气。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说："你也不用不服气，就算不是锅，也不是嘴，至少应该是一个屁眼儿。你吃的猪肉已经变成屎，眼看就要屙出来咧。"

猪倌一听这才无言以对。事后在这猪倌家的房后，果然挖出一堆猪毛，中间还裹着白花花的骨头。

李木鸡将柳大瞎子带来，柳书记沉着脸说："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讲了，为什么叫你来，我也不想细说，只让你测两个字。"柳大瞎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柳书记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因"和"青"两个字。这两个字是高大同事先告诉柳书记的，仅从字面看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并不动声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摇摇头说："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静字缺争，你家是不清不静——大概是遇上了烦心的事。"

柳书记一愣，连忙说："你具体说。"柳大瞎子却摇摇头，又摇了摇头。柳书记看看他，问怎么回事。柳大瞎子叹口气说："不敢说。"柳书记说没关系，你只管说。柳大瞎子这才又小心翼翼地说："再看这个青字，上边是生少一撇，下边是育有一月。这就是说，家里应该是谁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算到这一步，就算已经挑明了。柳书记的女人已将近六十，要生

育也只能是独生女儿柳大丫。柳书记的脸色立刻难看下来，看着柳大瞎子说：“你接着算。”柳大瞎子看看柳书记：“算谁？”柳书记说：“你应该知道。”柳大瞎子瞥一眼身边的李木鸡，“嗯”了两声。柳书记摆一摆手说：“你只管说。”

柳大瞎子这才又指了指那张纸上的字，说：“其实不用算，只要看一看这个因字也就清楚了。外边的方框是一间屋，里面的大字是一和人。如此看来，应该是这屋里的一个人啊，可这屋里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还能是谁呢？”

柳书记慢慢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李木鸡。李木鸡似乎没听见，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我一直不相信柳书记会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这些话。

没过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他上大学的档案被上面退了回来。公社考虑到他在村里一向表现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矿。公社领导告诉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矿，连绵起伏几百里都是矿山。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将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鸡。据说村里将李木鸡的材料报去公社时，还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贫下中农名义写的鉴定信，信上说：李木鸡同志在村里一贯表现突出，各方面素质也很好，经贫下中农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送去上大学。当时正提倡“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强调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因此，李木鸡就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学。

爷爷的身份　　潘石屹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

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六十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

我上小学之后，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 3 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大伯偷偷把它们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

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

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

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燊字读对了。

本家叔叔的来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材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 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是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马上就到清明节了，我们怀念那些故去的亲人们。感谢亲人们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纪念父亲齐尊周　　齐家贞

1998 年 3 月 23 日上午，父亲齐尊周在洛杉矶长堤自己的旅馆里与世长辞，享年 86 岁。

父亲 86 岁生日时，信心十足地向我们拍胸膛："别担心，30 年内死不了。"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好像上帝给他打了包票，否则他怎么会看上去才 60 出头？

显然，这一次，父亲没有遵从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做人准则。

父亲正在等待女儿家贞从澳洲到美国陪他回中国重庆。家贞赶到，他却先走了。走时，5 个儿女没有一个在他身旁。

他准备好的大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和他 14 年前出国时带的大同小异：换洗衣物，日常用品，还有一把掉了 5 根齿的发黄的塑料梳子，那是 1946 年他从美国回上海时带给妈妈的礼物。不同的是，现在的箱子里多了一个大纸包，那是父亲在六四期间和之后，陆续捐给民运团体和个人的寄款单、收据等，其中有 200 美元是寄给林希翎的，她在美国出车祸住院。

大概所有的收款人都不会想到，给他们捐款的竟是一个 80 上下的老人，出国时已经 72 岁，囊中羞涩，一穷二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个什么人？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呢？

父亲生于 1912 年 11 月，海南岛文昌县人，12 岁背井离乡只身去上海求学。13 岁父母双亡，单枪匹马闯天下。高中毕业后，进入杭江（西）铁路工作，追随德高望重的铁路界老前辈谢文龙先生，决心以铁路运输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父亲以充沛的精力，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的品德，以及勤奋好学顽强进取的精神，在短短 10 年里，从月薪 30 元的实习生、列车员，晋升为月薪 460 元的专员兼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出生入死，到最危险的地方为抗日出力。特别是保山抢料，他临危请命，冒死去保山抢运抗日物资。其时也，所有车辆均从保山往外奔逃，唯独父亲的那辆卡车风驰电掣由内地朝保山飞奔。他带领的部下员工在枪林弹雨中胜利完成了抢运任务，因功勋卓著受交通部通电嘉奖，获奖金一万元。

1945 年 5 月，中国为培养战后建设人才，由美国“租借法案”拨款，考试选拔各部门优秀人才赴美深造。仅高中毕业的父亲，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榜上有名，实现了他去美国求学深造的梦想。踏上美国土地，父亲代表 500 名实习生用英文作了词情并茂的演讲。一年实习结束，他成为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会员。这是一个世界性学术团

体，中国只有两名会员。父亲怀着把自己的国家也建设得像美国一样繁荣富强的赤子之心学成归国。

回国后，父亲曾任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南京市铁路管理处处长兼首都公共汽车总经理等职务。上任伊始，他大刀阔斧清除积弊，整治贪污，修订规章制度，梳理当时国共内战混乱不堪的交通秩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为所有职工安排了住宿，自己则睡办公室的行军床，家属从上海搬去南京后住在玄武湖庙里。父亲在当时贪污腐化的污泥浊水里洁身自好，保持住自身的一片干净，受到全体员工真诚的爱戴与拥护。

父亲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曾受邀去总统府参加蒋介石总统宣誓典礼，与蒋总统面对面三鞠躬，是铁路界最有希望的少壮派。他的理想是当中国铁道部部长。

1949 年 2 月，父亲放弃谢文龙先生提供的去广州住洋房配小车发港币待遇优厚的职位，接受重庆铁路局邓益光局长之邀去重庆就任运输处处长。

1949 年 11 月，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去台湾升官、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发财的邀请，坚留大陆。他对共产党宣传的“八项诺言”深信不疑，他被“量才录用”的许诺深深吸引，他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满怀希望。父亲要为生他养他的土地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一技之长。

共党建政后，父亲曾任西南铁路局运输科长兼重庆大学铁道运输系正教授。两件事上，他触犯了上司。一件，他当众站起来反驳驻铁路局的军代表：“你讲的（国民党的官吏没有一个不贪污的）不是事实，我齐尊周就一分钱没有贪污过！”另一件，所有铁路局官员，就父亲一个人拒绝领公费发的呢制服。他说国家百废待举，这是在集体贪污。

1951 年 1 月的一个清晨，父亲去上班之后再也没有回家。在被铁路局软禁 1 年零 7 个月之后，1952 年 8 月他被开除，未经审理宣判，直接送到二塘公益砖瓦厂劳动改造。之后，他一直在就业队、集改队里开山放炮、修铁路公路、建桥梁隧道等。

1961 年 9 月，父亲被公安局逮捕，从头肿到脚无法站立的他爬着去受审。尽管对女儿齐家贞“反革命叛国集团”一无所知，仍被裁定为幕后指挥教唆犯，判刑 15 年。

父亲“解放”前顺利通过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两个人生大关，现在，他要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第三关。

高级知识分子齐尊周的第三关闯得很出色。他的思想不接受改造，从不写字，只在每年年终借笔在半张草纸上写个人总结。他拒不“靠拢政府”，只有一次，请求政府释放他年轻的女儿，剩下的刑期由他来坐满。他赢得了全监皆知的反改造美名——花岗石脑袋。

在监狱的 13 年里，父亲每天洗冷水澡，寒冬腊月从不间断。他利用一切时间锻炼身体。清晨，围着球场发疯地跑步。中午，哪怕是酷暑炎夏别人在休息，他赤脚在滚烫的场坝上奔跑，脚底烫出一层厚茧。50 岁出头的他同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打篮球，重重的摔下去，蹦起来再追打。狱吏说，看看齐尊周，他在想什么，他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到底。

齐尊周要把身体练成铁，把意志铸成钢，他要跟迫害者比命长，要活下去伸冤。

1974 年 11 月，释放留队已 63 岁的父亲从省二监请假回家。跨进家门，床上没有“病中”的孩子们的母亲，墙上挂着黑镜框的照片，父亲恍悟，他的爱妻已经不在人间。母亲患胃癌，逝世两年了。父亲老泪纵横：“妈咪，你不守信用，说好的你比我坚强，让我先走！”

过去，飞机轮船请不动的齐尊周，现在，正千方百计寻找出国门路。

1984 年秋，父亲去了巴黎。次年春，他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参加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年会。大会上，他用闲置了 36 年的英文作了 3 分钟发言，然后，当了美国黑民。

出国前，父亲对送他去广州的大儿子兴国说：“等着吧，你的爸爸 72 岁第二次出国打天下。”他真的打出了一片天下。父亲染发冒充 50 岁找工，体力活累得尿血，额头被黑人用棍棒打裂口，肋骨被撞断

两根……用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他帮助了一批亲人包括女儿齐家贞先后出国定居。

1992 年 4 月，80 岁的父亲买了旅馆。有了自己的产业，他才可以为所有子女儿孙出国搞经济担保。一位移民局官员在父亲的定居面试时说："80 岁了还有勇气买生意做，我为能见到你这样的人深感荣幸。"

父亲一生中以他无与伦比的勇气、智慧和超凡的毅力决心，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奇迹。这一次，奇迹没有出现，疯狂的癌细胞从胃部转移到肝脏，经过一年顽强殊死的搏斗，父亲终于倒下。

1949 年"解放"后飞来横祸，监狱、准监狱里度过了 23 年，父亲身心长期横遭摧残。1984 年出国前，他甚至没有真正吃过一餐饱饭。在他 72 到 86 岁生命的最后 14 年里，为了后代的出路，父亲超负荷运转，不顾一切地燃烧消耗着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燃料，他已经用到灯尽油干；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寿延，他已经提前支取使用！

父亲啊，你走得太年轻，除去被糟蹋掉的 50 个春秋，你是才 37 岁的年轻人！父亲啊，你走得太委屈，你是一只高飞的雄鹰，突然被折断翅膀，鸡一样屈辱地苟且偷生！父亲啊，你走得太匆忙，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来不及开始，哪有空闲来面对死亡！父亲啊，你走得太不是时候，正当苦尽甘来，打算回国接受中医治疗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你却撒手西去！

但是，父亲，你死得那么平和安详，像在无忧无虑地静睡，因为你死得无愧。你无愧于那块赐予你生命的土地，你无愧于培养你一片忠诚的同胞，你无愧于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的妻子、儿女、你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你捐赠给他们总数近万美元的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们。你对别人慷慨解囊，却单单不这样对待你自己；你一生中只亏待了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你掏出你滚烫透亮的心，泼洒你沸腾殷红的血，都是为的别人。你的不同凡响之处，天地昭然，人神共知。你用你的血肉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意义是给予。

一个伤痕累累，但是不屈不挠的灵魂升天了。我们怀着无尽的哀痛、无穷的思念向父亲告别，向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一位光芒耀眼的悲剧英雄，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告别！

父亲，安息！

补白：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手里，市里的干部就查到镇上。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对该青年进行吼斗。此人吓得魂飞魄丧，后来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　　　　　　　　　　杨银波

淮安席桥记事　　秦九凤

1966 年文革爆发时，农村最早的响应行动是除四旧。笔者当年 25 岁，也参加过一次除四旧行动。在大队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共青团支部书记颜庆洲发言说：“人家外地到处都在扫除四旧，搞得轰轰烈烈，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四旧？我们为什么不去除？我们还要不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这么一说，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会上 20 几个青年人一哄而起，会也不开了，就去除四旧。

走出大队部没多远，有人问：“我们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有人说，五队程鹤松家有海外关系，他家肯定会有四旧。于是 20 几个人到程家翻箱倒柜，把人家旧时用的捎马子、锡烫壶、铜火

炉、小脚女人穿的钉鞋等统统翻了出来，特别是程家每年端午节都拿出来供奉的判官老爷画像（当地人称“老判”）和放在寿材里的两个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几个男青年一边喊着“你们几个女的脸掉过去”，一边扯下裤子就往老判脸上撒尿，嘴里还说着“给您洗洗脸，送您上西天”。那几件值钱的铜锡器，作为废铜烂锡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并当场从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套锣鼓，交大队文艺宣传队使用。

文革一开始，我还是真心拥护的，后来造反派们打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幅标语，作为祖辈种田出身的我这时才在心底悄悄产生动摇。1967 年春节前借一次送信的机会，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认错、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达理，原谅了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自己跟别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虽然我不是主谋）。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几十年了，我还感到对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错的事。他们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当我踯躅到他们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顾以往，只能说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淮安县席桥镇秦庄村社员陈友成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因家穷，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 多岁了才与一寡妇同居生活。他不识字，辈分也不高，50 多岁了，人们见他还是叫他小名“小成儿”。与人谈话中，他也常以“成儿”自称。

1968 年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最厉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比比皆是，一时人心惶惶。

1945 年淮安从日伪手中解放之后，成立了共产党苏皖边区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946 年 9 月，国民党军队又打回苏皖边区，勒令在边区政府当过一官半职的人统统要到国民党区公所集结自首。陈友成在边区民主政权期间曾做过几个月的农民互助组组长，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则就得去坐大牢。农民互助组本是由政府基层干部组织起来的农民

互助组织，比如有牛的帮没有牛的，有劳动力的帮没劳动力的，还可以以人工换牛工，互相取长补短，根本不是政治组织。但是保长告诉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约合 75 公斤）粮食到区公所画个押，然后就没事了。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一次刮地皮行为。陈友成是一个穷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粮，托了熟人，用小毛驴驮五斗玉米到国民党淮安县十一区区公所所在地（蒋家大楼），交了粮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 年，共产党再次解放淮安，此后的几次肃反、镇反都没有牵扯到陈友成。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陈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档案中被发现。那天下午，生产队布置在萝卜地里拔草，做到 3 点多钟工休时，陈友成一边闷头吸旱烟，一边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成儿一辈子没丢过人，这回不得了了。”别人不知底细，就说他：“你怕什么？你又没做过坏事。”“你没干过国民党，也没干过共产党，投敌自首更靠不上边！”不说还可，一说他更加胆战心惊，乘人不备，悄然回家。

工休结束之后，记工员发现陈友成不在，便大声呼喊，可是左喊不应，右喊还不应。他家就在萝卜田边，记工员就去他家找，发现他已上吊自杀。有人忙跑到大队部报告。当时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立即用大队的手摇电话通知席桥医院，请派医生抢救。随后我骑车赶到现场，一摸陈友成，身体仍然温热。上吊的现场，那拴绳子的横梁只及我的肩头高。陈友成个子虽比我小一些，但那个高度也无法使他悬空致死。他完全是仓皇之间寻死，自己收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气绝身亡的。这一年他 56 岁。

刘从明医生赶来用听诊器一听，心跳已无，陈友成的脸色也完全变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农民中有人会一点急救的技巧，或许还能把他抢救过来呢！

有一年春节，几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队的张洪枢也拖着一把铁锹随着人流来劳动。张出身地主家庭，1949 年在上海读高中时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到厦门，先后任厦门市共青团市委秘

书、市工业局代理局长等职， 1957 年因在整风会上提意见被错划右派，遣回原籍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作为右派分子的张洪枢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将们看见张洪枢就纷纷议论：“戴着眼镜挑河工，净出洋相！”“可不是，贫下中农哪个戴眼镜？”“狗改不了吃屎！”“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将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个箭步跨到张洪枢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把眼镜拿下来！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张洪枢稍一迟延，小将一棍子把眼镜敲了下来，险些把张的眼睛打瞎。

张洪枢的二哥叫张洪涛，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 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我们大队派来了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公开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有逮捕几个人方便些！”真是无法无天。果不其然，笔者仅因向工作组提出“请你们多搞些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言”的建议，就被指为矛头胆敢对准工作组，勒令我交出大队公章，被挂到一边。

转眼就到了 1976 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给我们大队的第五生产队。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之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3 个人无法赶它走，于是经生产队长陈友高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3 人轮流拉车去配种。

到了配种处时，老母猪不知是因为捆绑难受，还是因为见到种猪使性子，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它在离圈时吃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结果肠子被摔断，外部虽没伤，可是经不住体内流血，不一会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组的刘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

下材料，把他抓起来！”

能搞专案材料的人不多，于是我这个被挂起来的干部就又用上了。他们让我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居正兴调查张洪涛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我发现这头老母猪从出圈直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怎么也不能说这头老母猪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兴如实汇报，那位工作队队长竟冲着我拍桌子发脾气：“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然后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当即知趣地起身离去，但身后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冲我说的。

张洪涛后来虽未被抓进监，但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了一顿恶斗，被一些革命小将狠狠踢打了一顿。

探父亲　　孙雅臣

1967 年我 7 岁，正是文革浩劫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之后，我们举家迁往距省城 200 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刚到那座小城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当地资格老、级别高的缘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静的小院居住。我记得那座小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青紫相间的葡萄，几棵桃树、梨树也都结满了果实。春天来时，院子里落满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这座小院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此外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童年生活了），尽管它非常短暂。在当时暴风骤雨的环境中，这座小院子也显得格外宁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的问题也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特务、叛徒”案，被押到洛阳龙门山上劳动改造。我们全家也被赶出了那座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童年回忆的小院（造反派新贵霸占了小院，我以后

再也没有回去过），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大杂院。

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几年间，单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两次。吃水靠两口混浊的水井，厕所是用土坯墙围起来的大粪坑。住在这座大杂院里的大都是右派、走资派，还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大杂院里生活着一大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一百多个。与我常在一起玩耍，关系最要好的有两个。一个叫小强，8 岁。一个叫小宝，比我小两个月。

小强父亲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强的母亲 3 年前因病去世，小强与 13 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小强的父亲在 50 岁上才有小强，而且是三代单传，所以小强很得父亲的宠爱。在父亲未到龙门山劳改前，小强的父亲经常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杂院里玩耍、走动。小宝的父亲同样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宝家里的人多，有母亲、姥姥和几个哥哥姐姐，小宝是家里最小的宝贝儿。

小强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孩子，是大杂院里同龄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强胸前总是挂着用两只小竹筒捆扎成的“望远镜”，腰里插着用小竹板做成的“战刀”，头上戴着他父亲当年在军队时戴过的一顶大盖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举起“望远镜”瞭望一番，再挥舞着“战刀”，带领一班小武士们东冲西杀，好不威风。那时文革正在火头上，学校瘫痪，长期不开学。我和小强、小宝天天在一起疯玩，无忧无虑。小强是我们的头儿，我和小宝都很崇拜小强，因为他不但比我们长一岁，更重要的是他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我们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垒城墙的游戏，到河滩里游泳、打水仗，开心极了。我们 3 人共有一只价值 3 分钱的乒乓球，那可是我们的宝贝。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是别想摸到的。

当时流行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兴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们的身上。那些凭借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贵春风得意，他们的孩子们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飞扬跋扈，时常到大杂院来骚扰欺负我们这帮孩子。他们来了之后，把我们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墙踩塌，并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杂院的孩子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那里使坏，却敢怒不敢言。家里大人有交待：“这

些人我们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们欺负，回到家里还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着耳朵到那些新贵家里去赔礼道歉。

每当新贵的孩子们来大杂院骚扰挑衅，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在小强的周围，期待着他的反应。小强总是眼含泪水，紧紧攥着一双小拳头，怒视着这些使坏的孩子们。等他们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破坏殆尽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小强再回身安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总是能找到让小伙伴高兴的话来活跃气氛。有一次，那些坏孩子又来使坏。当他们看到小强手里拿着一只乒乓球时，便一拥而上把小强按倒在地，去抢那只乒乓球。小强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烂了，可硬是没让把乒乓球抢走。他们走后，小强发现乒乓球被压瘪了，我还看到乒乓球上沾着小强手上流出的血。小伙伴们看到乒乓球被压瘪，都心疼极了。小强说：“没关系，走，到我家去，放到开水里煮一下就好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就跑到小强家，打开炉子，烧开了水，然后把乒乓球放了进去。不一会儿，只听“彭”的一声，乒乓球竟炸开了。许多小伙伴都掉了眼泪。为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们难过了好多天。

1968 年夏季的一天，小强把我和小宝拉到水井旁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神秘地对我俩说：“我准备明天到龙门山上去看我爸爸，你们俩去不去？”我俩一听高兴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强说：“今天早点睡觉，明天早晨 6 点钟在大院门口集合。记住，要准备好干粮，不要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 3 个小孩子每人怀里揣着红薯面混合白面做成的窝窝头和花卷馍，准时在大院门口集合后就上路了。我们沿着洛河边的公路向龙门方向进发。从小城到龙门山有 18 公里路程。事先我们都不知道要走多远的路，只知道只要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龙门山。我们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边歇一会儿，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跑到河边喝口水。边走边玩，边走边问，大约在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了父亲劳改的地方。

顺着高大的围墙，我们找到了大门。在门口，门卫挡住了我们。问明情况后，门卫拒绝我们进入。我们向门卫哭诉着软磨硬泡了好久，最后还是被撵到了一边。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小强说：“我有办法，

咱们可以爬到树上往里面看呀！”我们一起互相推拉着，爬上墙外的大树，透过树枝往大墙里面张望。里面是一排排的窑洞，我说这是我爸爸住的窑洞，他说那是他爸爸住的窑洞，越说越兴奋，好像是故意气那个不让我们进大门的门卫。可能大人们都去干活了，我们看了好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小强说：“我们该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们仨恋恋不舍地下了树，离开龙门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来时那样轻松了。3 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天要走 70 多华里的路，又累又饿。早晨带的窝头在来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渴了我们也不敢离开公路到河边去喝水了，因为河边太黑。我们只好忍着饥渴匆忙赶路，再累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下。后来在学校里学到“忍饥挨饿”这个词时，我的体会特别深。

走着走着，看到前面有一辆拉沙石的马车。小强小声跟我俩嘀咕了几句，我们仨就急忙追上去帮助推那辆马车，目的是讨好赶车的把式，让我们能坐会儿他的车。车把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同意我们坐车，但一次只能坐两个人，因为要保持马车的前后平衡。小强提出让我和小宝坐车，他自己走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这一路他总是像一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们。我们也不示弱，一定要让他先坐。3 个小伙伴互相推让一番后决定轮流坐车，俩人坐车，一人走路，依次轮换。小强在车上呆的时间总是最少，他要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弟弟。

马车行了几公里后就拐弯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步行。天色已经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时隐约看到前方路边有灯光，赶到后发现是路边农民办的小饭铺。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两腿发软，个个东倒西歪的。饭铺里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钱一碗的“杂个”（一种近似杂烩菜的汤食），我们 3 个凑来凑去只凑了 7 分钱，用这 7 分钱买了大半碗“杂个”。

“杂个”端来后，小强说他一点都不饿，要我和小宝把它吃完。我和小宝说，如果小强哥哥不吃，我们也不吃。最后，3 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谦让着把那大半碗“杂个”吃得干干净净。当然，小强吃的最少。吃完“杂个”，我们又匆匆上路。大约在晚上十二点

的时候，3 个精疲力竭的小伙伴终于回到了大杂院。这一天，如果没有小强的照顾和鼓励，我和小宝恐怕无论如何也走不了那么多的路。

当我们迈着几乎瘫软的小腿踏进大杂院时，发现很多人都没有睡觉。小强家门口围站了很多人，一只很亮的大灯泡挂在小强家门外。这时人们发现了小强，急忙把他拉了过去。我和小宝也随着跑过去，挤进人群。只见里面摆了一张小竹床，小强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烂的衣服躺在上边，小强的姐姐趴在小竹床边上哭得死去活来。

原来，昨天小强的爸爸在龙门山劳改的地方自杀了。上午尸体已经运了回来，而那时我们还在去龙门山的路上。小强站在爸爸的床前，没有眼泪，只是拉着爸爸冰凉的手反复叫着：“爸！爸爸！…爸爸……！”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留下了眼泪，一片抽泣。

多年后，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发颤的感觉。

父亲平反后，我们全家迁离了那座小城，与小强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官复原职后，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个研究部门做工程师，二姐在一所大学做教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检察院做检察官。多年后，一位来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里做客。当我问及小强的情况时，他说，小强在父亲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与姐姐一起靠收破烂维持生计。后来，姐姐下乡插队因为生活作风不好，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农民，现在大山里做农妇。小强因为盗窃被判了两次刑，刑满释放后又参与抢劫，前年“严打”时被判了死刑，枪毙了。

听了小城来客的话，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补白：黑五类不能转换成红五类，但是红五类或其他人很容易变成黑五类。刘少奇本是国家主席，红到极点，因得罪了毛泽东，一瞬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成为黑五类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间呼口号，将“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

席，保卫刘少奇”，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笔者的一位亲戚，本身是贫农，在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编了一句顺口溜——“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随即被打成坏分子。因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骂各种残酷折磨，他选择自杀，死后被指控为畏罪自杀。寒坡岭

苦涩的怀念　　申　夫

小时候第一次参加大队全体社员大会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大队部的院子里搭起高高的会台，台下全体社员或坐或站，听革委会主任义正词严、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话。在会台的两侧，十多个黑五类分子在台上跪着，低头认罪。他们中间，可能有邻居家的大叔，有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大爷，那样的熟悉，那样地亲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他们全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庆典活动，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就被罚去扫大街，搞卫生，这叫劳动改造。记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三两岁的孩子，听说是替他年迈多病的爷爷来打扫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弯腰弓背扫大街的样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这种惩罚就像挂牌游街一样，对心灵和精神的伤害要远远超过体力付出的百倍。那种羞辱，那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便是成年人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孩子！

这些黑五类分子所受到的歧视，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个年代血统论盛行，这种歧视不仅针对本人，还针对其子孙后代。黑五类的子女也成了黑五类，成了大家鄙视的对象，就连上学都受到限制。小学初中还可以，到考高中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镜头：文革后期（或者是文革刚结束），正上小学的我，有一次到学校办公

室去，正好老师们在看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成绩。有位老师指着一个富农的儿子的名字说：“考得不错，咳，可惜了！”一声“可惜了”包含着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们的后代连婚姻权都被变相剥夺了——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女儿谁愿意嫁给一个地富狗崽子呀？我们邻居有位老太太，那时候人们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等到儿子成年了，却怎么也说不上媳妇，人家一打听他们家的出身就吹灯拜拜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一个儿子才找了个二婚的，另一个儿子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还在打光棍。

父亲有位朋友，叫马家骥，是我们邻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老中医，他本人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教师。虽然他一直为人谨慎低调，业务又好，但最终也难逃文革的厄运。文革结束后，一次他到我们家做客，跟父亲谈起往事，仍感到心有余悸。文革中他不仅被勒令停课靠边站，而且受尽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们这些反动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编自唱所谓“混蛋歌”：“我们都是大混蛋，妄图复辟来变天……”谁要是不唱或态度不好，红卫兵的铁拳甚至皮带就抡上去了。马老师文革后被平反解放，又恢复了教师的身份，而且成为一方名师，后来一直做到我们县级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们村还曾经有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名叫邵中。他本来不是我们本地人，满口普通话非常标准。上小学那会儿还记得他偶尔冒出两句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村里人谁也听不懂，越发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国，或在香港，或在台湾，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们那里。最后他在我们村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平反后被安排在我们县一中任教，后来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

我上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张泽民，河北赵县人，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又曾短期教过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才华横溢的教育精英。1957 年因某些所谓反动言论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蹲过几年大狱，在建筑工地被强制劳动。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荒废

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操旧业。他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80 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调回了原籍，听说后来相继担任赵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90 年代初我在农大读研的时候我们邂逅过一次，后来就断了联系。

虽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有人不断地播种仇恨的种子，而我们也曾跟着别人的调子高喊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批判口号，但内心里对那些“反动派”却根本恨不起来，有时候反而心生一种同情和敬佩感。这些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学问。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老师外，还记得一位右派，在儒法斗争和批《水浒》的时候作为反面教员，被勒令向全体社员讲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讲得非常形象生动，对于我们这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号，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将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上小学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杀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盖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边去了。

补白:2010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举办 120 周年校庆。几位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沈志庸、王书瑶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在主席台上举出“右派冤”的字牌示众，要求为反右运动受害者伸冤昭雪。阎桂勋老校友也在胸前挂着“冤”字牌站在会场大门口。在场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则是冷漠麻木，默不作声，有的甚至说搞不清反右是怎么回事。

当天在场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萨斯英雄钟南山先生。钟曾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该校于 2000 年与北大合并，沾亲带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当仁不让地登台演讲。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除了用大量时间自我表扬外，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如下的宏论:“刚才校友们（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

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 60 年其实就 30 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严家伟

四旧破到宋庆龄　　汤　雄

1966 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先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即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这时，上海传来了令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当做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墓园，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

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暴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请求保护亲人的坟墓。

周恩来获信后拍案而起，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加急电话，命令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缮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重新竖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

1967 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因饮酒过量兼席上谈及文革动了肝火，导致脑中毛细血管破裂，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年仅 38 岁。

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另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该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 40 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称之为 S 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 46 号前，一遍遍地高呼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要 S 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预。谁知 S 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对 S 警秘说。“那，我就去试试吧。”S 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应一句，站了起来。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如今在 S 警秘胁迫下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

轩”等处的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厨房灶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火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也差点被 S 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 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补白：沙溪村有两位姓程的，被划为地主实在很冤！程家有座祠堂。祠堂名下有些田产，收入用于祭祖和家族活动。这些田由程家各户轮流耕种，称为公轮田。解放前一年，公轮田轮到这两位倒霉蛋耕种管理。在山区，拥有 10 多亩土地就够戴上地主帽子了。他们因此被划为地主，而此前轮种公轮田的人均为贫下中农。

这俩地主一个光棍，一个无妻但有一子。那孩子大约 13 岁，大家叫他阿谷董。两家地主日子都过得惨兮兮的。阿谷董没上学，跟着大人在生产队劳动。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几个小孩的起哄下，莫名其妙地把阿谷董吊在梁上抽打。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人敢为他这个地主的儿子讲话。后来阿谷董得着逃跑的机会，跑到几十里外一个村里，莫名其妙地死在那里。生产队派人把他的棺材用板车拉回来，就这么埋了。

还有一位吕某，他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地主经常被叫去接受训话，因为父亲病重，未成年的吕某就代表父亲听训。父亲死后，吕某被递补为地主。吕某有个 10 多岁的儿子，常到清流县山区干木匠活儿，希

望在那里找个合适的人家当上门女婿，他说怕被替补为地主。
佚　名

从平反到下海　　铁　流

我被改正回归报社的时间是 1980 年底，正是中国改革的起步岁月。先做文艺组编辑，后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改行做农村記者，从此与改革纠结在一起。

所谓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写了一篇反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局面的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 1981 年 4 月的《四川文艺》上。有人就此写黑信给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说“被共产党关押了二十三年的晓枫，回归后写出的小说仍诬篾中国是座大监狱，老百姓生活还没有牢里犯人生活好”。时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杜沁源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便对我横加指责，同受指责的还有诗人孙静轩发表在《长安》文艺月刊上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

反精神污染来势汹猛，全国反白桦，四川反我和孙静轩，一时谣诼纷纷：“晓枫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进监狱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吓得整天坐卧不安。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为一篇 8800 字的文章，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别文坛，到农业组当记者，跑郊区县，写眼见为实的新闻报导。

1981 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以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早已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广大农村回到互助合作运动前的单干形式。共产党不再提倡以穷为荣，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天天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政治不再吃香，发展生产，搞好副业，多打粮食多挣钱，成了千家万户的奋斗目标。

当时新闻报导的重点是万元户——那些会种庄稼又会搞副业、最

先发家致富的农民。我瞄准了时代这个新动向，放开手笔大写特写农村涌现出的专业户、万元户。我笔下所写的这些人物立即成为乡里县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银行还找上门为他们贷款。专业户、万元户的再发展就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富起来的人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的发端。为了鼓励农民富裕，1982 年春，成都市召开万元户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人披红着彩坐在汽车上，像新科状元打马游街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光荣极了！

农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号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场，特别提倡无职无业的人去当个体户，以缓解社会压力，不再把经商设摊视为投机倒把。这些个体户多是社会上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像，不少人还是被判过徒刑而没有平反的释放人员。此时，大家不再讲阶级成分，也不谈过去的灾难，只觉得有钱就光荣、就体面，社会思潮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就连省委某书记的儿媳妇，为了钱不惜与权贵的儿子离婚，嫁给号称有百万资产的杨百万的儿子。

为了探索这些人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三次采访杨百万和许多著名的万元户。他们致富的共同特点是：不安于现状，蔑视传统，敢于打破框框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杨百万，过去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五年徒刑，1979 年回到成都没有工作。政府号召两劳（劳改劳教）人员自谋生路，他便从江浙购回尼龙原材料，再分发给当地家庭妇女加工成蚊罩，然后卖给商店。经这番加工，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其他万元户赚钱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过去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视从事商品流通为投机倒把，使得地区差价越来越大，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大。温州生产的小家电产品，只要运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润。那时敢冒此险的人寥寥无几，故谁干谁发财。这种工作，知识分子没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没这个胆量，只乐于生活在传统中，在温饱窝里打盹，让别人大发特发。

在这个大潮中，起先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为我活得挺充实，所写文章全国报刊争着刊发，每月稿费是工资的三四倍。在我们报社的群体中，我家是最早拥有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庭。但

是新闻业的垄断，掌权者的专断，最终迫使我做出了下海争做自由人的决定！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编室的老朋友杨干廷，邀约我和《四川日报》记者艾风，去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采访，写一篇该厂厂长刘恩来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使一个敲敲打打的生产作坊制造出汽车来的报道。刘恩来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委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后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该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被改正后的刘恩来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今天的四川丰田汽车制造厂），闻名全国。杨干廷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刘恩来是难友。为了支持刘恩来，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出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很受一些读者欢迎。

文章重点表现锐意创新、坚持改革的刘厂长与保守势力党委书记之间的斗争，近似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出，并将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何故，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竟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播。许川对文艺创作的肆意干预引起我强烈不满，我在电话中骂他是“党棍”！

在写刘恩来之前，我发现成都老百姓吃饱穿暖后对休闲场所有了新的追求。过去他们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园、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园，而今肚皮填饱了，荷包里有余钱了，便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时我去远郊蒲江县采访。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穷县，长期以来吃粮靠反销，用钱靠贷款，连县委办公室都是几间窄窄的平房。县委钟书记见面第一句话是：“黄记者，你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能不能给我们县出点主意脱贫？”我问蒲江县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他说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还有脐橙。我想了一下又问，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个朝阳湖还不错，有水有山，有杜鹃花，还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子。

蒲江县距成都四十公里，当时需要两个小时车程，来去不算远，

正可做成都的后花园。钟书记当即带上我，坐着一条很破旧的铁皮船，绕朝阳湖游了一周。朝阳湖是个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绿水，古藤飘垂，曲径通幽，野花似火，时有成群的野鸟野鸭起落游荡在碧绿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态说：“这是个好地方，蒲江的金窝窝。”很快，一大帮中央驻川记者和省市各报记者应邀到蒲江采访。那时县级干部没有官架子，书记、县长亲自给记者送水送茶，热情极了，记者也严守职业道德，不伸手要红包。很快，宣传朝阳湖的文章出现在各报上。我写的那篇通讯《朝阳山水四时秀》发表在《成都晚报》上，称此地“景色尤漓江，幽深胜三峡”。《成都晚报》发行量大，是成都企事业单位必订的报纸，也是广大市民喜欢的报纸。不到三个月时间，朝阳湖游客爆满，一时间所有机关学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产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抢购一空，并且出现了“进出困难”（没有食品摊点和厕所）的问题，全县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开始向旅游开发转移。

至此我意识到，报纸不但是党的喉舌，也是发展经济的开路先锋。为了解决成都与蒲江之间的直达客车问题，经刘恩来帮助，我以低于市场价位（一万元）的价格为他们购买了十台锦城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十三座旅游车。

蒲江的经济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纪检部门怀疑我从中得了好处，对我进行调查，害得蒲江县委五大常委不得不为我写证明材料，以还清白。我虽然未受到任何为难，却发现有这个专横体制在，就无法做事，特别不能做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促使我下决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书所在的区教委。一位年轻的秦姓女教师，工作一直得不到妥当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确对待流言蜚语，竟致忧郁成疾，自杀身亡。为此我了写一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这篇仅仅 1500 字的新闻特写竟累及妻子，使她险些不能参予职称评定。这一连串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国的新闻记者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价值，没有法律保护，仅仅是个工具而已。要不想当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离开衣食父母的“组织”，告别追随

多年的共产党——下海！

换亲记　　铁　玉

辛酉大叔是富农，他有个儿子叫蛤蟆，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四类分子除了与大伙一样下地生产，还要扫大街、掏大粪。辛酉大叔是专掏大粪的，天天拉大粪车，村里人称他是开坦克的，蛤蟆哥则被称为坦克司机的儿子。有一个礼拜天，天下着小雨，我们四五个小孩子到离村很远的河边偷青辣椒。四周雾气腾腾，看不到人影，可是我们却瞧见辛酉大叔和蛤蟆哥正在刨一棵大柳树。

两天后，学校操场上举行批判会，一声“把富农分子押上台来”，辛酉大叔被两个民兵架着胳膊展现在小学生们眼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民兵发现河坡上多了一个坑，少了一棵柳树，而辛酉大叔家建房用的一根檩条却是一棵去了皮的湿柳树。民兵排长说：“河边有几棵树，都是什么树，长什么样，我一清二楚，你李辛酉休想抵赖！”辛酉大叔给干部送一条七分钱一盒的青山牌香烟，想以此逃避惩罚的事，也被检举出来，于是又获得另一个罪名——拉拢腐蚀干部。辛酉大叔只有低头认罪。批判会的最后，干部对反革命分子李辛酉进行宣判：“他刨我们一棵树，我们就让他栽一百棵树！”辛酉家房子没盖成，反而把置备的建房木料变卖大半，买了一百棵胳膊粗的柳树，种在村头河边上。

辛酉大叔盖房本来是娶媳妇用的，地主女儿小凤愿意嫁给蛤蟆。由于偷柳树案发，小凤家决定乘人之危，提出要换亲，否则退婚。小凤有个哥哥，小时候玩火枪，有颗铁砂打到脑子里，落下左胳膊不听使唤的残疾。蛤蟆有个妹妹，叫水仙。小凤可以嫁蛤蟆，但前提是蛤蟆的妹妹水仙也要同时嫁给小凤的残疾哥哥。如今蛤蟆家既盖不起房，又背着窃贼的罪名，为了传宗接代，辛酉大叔答应了。

最终媳妇也娶进门来了，可是村里小伙子大约认为在富农家闹洞房可以肆无忌惮，竟把新娘子的裤子给脱了。小凤又羞又恼，挣开手

脚，跑回了娘家。想不到娘家不但不为她抱不平，老爹反而把她大骂一顿，赶出家门。小凤气性大，一赌气吃了老鼠药。可恨那时假老鼠药不多，小凤被毒死了。

小凤娘家不依，来一帮人把蛤蟆家的盆盆罐罐都砸了。嫁过去的水仙不答应了，跑回娘家，死也不跟残疾过了，说："谁再要我回去，我就吃药死给你们看！"话说到这，谁还敢再说和，于是水仙和残疾的婚事也黄了。

我们村子东北有一个废弃的大烟囱，阳面写着"一定要解放台湾"，阴面写着"唐县冶炼一"。很多人不清楚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后来黄鼬姑告诉我，那"一"应该是"厂"字掉了一撇。

黄鼬姑本名黄莺，原是电影演员，在电影《战洪图》里演过一个不小的角色，因划为右派，发配回老家。村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黄鼬"，我们小孩子都叫她黄鼬姑。黄鼬姑一家三口，儿子叫三毛，女儿叫四丫，都讲标准的普通话，住在我们胡同里一家地主的旧宅里。这家人与其他村民不同，天天刷牙，夏日黄昏，黄鼬姑和四丫还穿裙子。有人对这一家三口的京片子看不惯，说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四丫姐生性泼辣，反唇相讥："那全北京城不都成阶级异己分子了？"

村子里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才留短发，四丫却打破常规，剪得一头短发，平常也不避讳说"阶级敌人"、"右派"之类的话，仿佛跟她没有丝毫关系。那时我们小孩子常做一种叫做"天下太平"的游戏，四丫姐说天下太平是不对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有太平"。

辛酉大叔家养一窝猪，猪崽儿常常到地主老宅的碾盘底下拱来拱去。四丫说这些到地主家碾盘底下乱拱的蠢猪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把它们赶下历史舞台。四丫姐是要把猪哄走，我响应她的号召，拿起推碾的棍子竟一棍子打在一只小猪的后腿上。天啊！我可没想弄成这样：那小猪翻了两个滚儿，拖着瘫了的两条后腿嗥嗥叫着落荒而逃。小猪是从黄鼬姑家瘸着跑出来的，辛酉家知道了，两家闹起矛盾。也许是报应吧，不久，黄鼬姑的一头一百多斤的大猪莫名其妙地病死

了。

那时除了过年，平时哪能吃上新鲜肉啊！虽然猪是病死的，也不能扔掉。黄鼬姑把死猪煮熟了，分给街坊四邻，特别是孩子们解解馋。黄鼬姑说："吃吧，没事的！我煮了有仨钟头，什么牛鬼蛇神也都煮得魂飞魄散了。"邻里都吃，怪香的。肠胃也都好，谁也没吃出个好歹来。因了这死猪肉，黄鼬家与辛酉家的矛盾也缓解不少。

有些阶级觉悟高的村民却从中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人家死猪肉吃，等于是给人民群众注入毒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伺机捣乱。于是又是一场批斗会，也少不了高呼"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散会后，黄鼬一家被赶到村北的大队马棚里吃住，并且要喂马，打扫马圈。黄鼬姑常用花椒大料把喂马的黑豆煮熟了让我们吃。三毛哥不爱说话，但人很勤快，把马圈收拾得很干净。

转眼间三毛和四丫也该考虑婚事了。虽然曾经是北京的城里人，可如今虎落平阳，也只好把条件降低，就近把自己"消化"掉。有人提议黄鼬家和辛酉家换亲。蛤蟆和水仙倒是没意见，不论怎么说他们也算是结过婚的二茬儿了，可是水仙并没有办离婚，那门亲事还在那里不清不楚着哩，黄鼬姑家不敢娶。

有媒人给黄鼬提议与唐县山区一个地主家换亲。一听要到深山老林去扎根，四丫姐说什么也不从。于是媒人们提出三家转亲：四丫到蛤蟆家，水仙到唐县山里地主家，唐县地主家的女儿嫁给三毛。虽然蛤蟆结过婚，毕竟没有入洞房，四丫对蛤蟆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有一条：你蛤蟆必须答应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能把人娶过去。水仙没得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能逃出前一桩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就好。见过面后，媒人问三毛满意不满意，三毛说："满意，满意，是个蹲着尿尿的就行。"黄鼬姑姑笑骂："瞧这王八羔子，半点人形没有。"黑五类臭味相投，也同病相连，三家一拍即合，亲事就这么定了。三毛哥艳福不浅，实际上媳妇长得很漂亮，杨柳细腰，皓齿明眸。村里人说，已经有个老黄鼬，又多一个狐妹子，一窝子妖精。

不论怎么说，孩子要成亲了，不能再让人住马棚，生产队决定让黄鼬姑一家又搬回了地主的旧宅里。

那时在我们农村，成分高、儿女多的家庭换亲很常见。要做到换亲的当事人个个都称心是想都甭想的。好在一旦成了家，柴米油盐，要做的事儿，烦心的事儿，多得很，谁还有闲工夫考虑称心不称心。现在大半辈子了，我们胡同里的大哥大姐们过得还不错。

补白：1967 年 10 月，广西全州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民兵骨干 30 余名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摔死。黄要干部们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抓人，抓到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老婆也该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 3 岁，小的 1 岁，跳坑而死。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被依法逮捕，1985 年元月被处决。

会六国语又如何　　王佳佳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 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 2 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属，受尽歧视。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还是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总工程师的职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他们要父亲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散会。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 10 年徒刑。

1958 年 10 月 8 日下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闻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进门一看，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高高大大，是个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滑冰、游泳，好像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六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们在利用他一技之长的 10 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断绝了来往。那时我们 5 个孩子还小，全家 6 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可以帮

助她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我妈妈也是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只因为口粮定量高一点。每天半夜 2 点钟上班扫路，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原来她没有干过体力活，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可她坚持要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可一扫就是 4 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 10 来年扫马路的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60 年代初，可怕的大饥荒来了。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得是皮包骨头，母亲便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来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撸榆钱，撸榆树叶。母亲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钱、榆叶发糕。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有一个场面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只有 3 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攒下的 6 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兴地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革一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说着母亲点着炉子，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古今中外的，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

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书全被扔到火里了。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我们只想哭。整整烧了 3 天 3 夜，最后剩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了进去。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如果叫他们看见了，不知又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最好还是扔在火里烧了。"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啊！"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进家，只见妈妈在伤心地哭。看见我回来了，她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后把我给你们出嫁时准备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们身边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过火，母亲看到我们 5 个孩子，4 个女儿 1 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长。可是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合格了，最后政审被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得好，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还是因为政审给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冰滑得好，想考体院，最后因为成分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个在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是资本家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问题，受株连被分配到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分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在痛苦之下，我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

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家里只剩 60 岁的母亲和不到 15 岁的小弟。

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邻居说他们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得二话没说，冲下去要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我只好忍了，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1973 年我们突然接到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监狱接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着一条腿的苍白衰残的老人。这哪里是 15 年前我的父亲，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姐妹俩抱着他，叫着他，父女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挑着两大筐砖，走到 4 楼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他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 3 天 3 夜，第三天昏倒在水里，但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 6 国语言，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他们告诉他，好好干可以提前释放，可是到头来不仅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 5 年，释放时已被关押了 15 年。父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到 1976 年，会 6 国外语的父亲得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补白：我 3 岁时第一次在监狱里见爸爸巫宁坤。爸爸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爸爸发来一封信，说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 3 年大饥荒，他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 5 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是最后一面。文革时候看大字报，揭露爸爸的“反动历史”，我一算，不对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 6 月 3 号才出世啊，他 4 月 17 号就被抓走了，怎么会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时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红卫兵叫我写我爸的大字报。我那时候才 8 岁呀，小学 2 年级。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把我那个署名的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期间，夜里关起门来偷听美国之音，学英文。1977 年恢复高考，我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由于父亲是右派，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当时人家都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可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

后来我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我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我，说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巫一毛

同学相煎何太急 王友琴

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 年 6 月以后，同学不再一同学习，而是同学相煎的事时有发生。迫害同学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

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的报刊，当时发表了很多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年轻的学生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身边，或紧握红色语录本，眼含热泪朝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东方红》响彻云霄，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煽情、迷狂，透着邪气，有人认为热烈红火，激动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另一种从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红卫兵的许多同学，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禁止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被体罚、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劳改队。另有一些同学被迫自杀，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学稍作抗争即被同学严厉惩罚，甚至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1966 年 8 月，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她的中学里，大门外大门里，教学楼门外门里，教室门外门里，教室前面黑板两侧和后面墙报栏两侧，贴的都是这副对联。整个校园，凡有门的地方都贴上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其他中学的情况与此相仿。这副对联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当时在厦门读中学的受访者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当时官方报纸天天发表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有关这副对联的一切信息（被欢迎程度及其残酷效果）却从未见诸报刊。当时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这副对联，或怕这副对联的人是鬼。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英雄，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是好汉。

该联起源于北大附中（该校也是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 年 6 月，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

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7 月 1 日该校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以前这种会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却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文革前也强调家庭出身，也给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级分明。

与此同时，一些新词也开始流行，如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乱贴。

到 1966 年 7 月底 8 月初，这副对联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推广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谁上台讲话，先报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上台对对联表示异议，在台上就被几个同学围着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认可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没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大会上，红卫兵反复大唱《对联歌》， 歌词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 年 8 月 6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时，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却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实际上，从北京传遍全国、到处流行的还是原来的对联。

后来这副对联成为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1966 年 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刘、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至死，但那时还在台上，是最高权力圈中人。革命干部的定义有变化，起初凡共产党员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变成 1949 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或者 1945 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才算革命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1945 年以前参加中共的 12 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

身。

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被邀上城楼的是极少数。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没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区工人最多，石景山区就没有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1966 年 8 月到 11 月），红卫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这些都是特权，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

在上海复兴中学，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在北大附中，红卫兵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分，窄的部分贴着“狗洞”，属于“混蛋”系列的同学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当时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个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种种特权是客观事实，但是社会舆论对此总是持批评态度的。《水浒传》里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依仗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熟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儿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这个熟语严重变质为：革命干部子

弟不但有承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学和同龄人的特权。这在古代文献中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恶，有些历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比如在这副对联影响下所产生的罪恶。

当时既无电传，又无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用电话，可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另有部分青年对这个说法默然承受，这种趋向值得深思。

1966 年 8 月，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的同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在清华附中读初二的女儿，在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被拉出队伍，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 月 26 日，清华附中高三 631 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班里 4 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这 4 同学被打成重伤，又被罚劳改。有人至今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高二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被同学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还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卧轨自杀，未死，致终身残疾。

在北大附中，这幅对联一出笼，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理都不理。7 月 1 日开会时，出身坏的同学被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动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初一四班女生万红，父亲是右派，该班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门外。这时同学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先挨彭一皮带。万红被拉到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高三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对红卫兵“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于是其他学校也纷纷跟上，展开折磨同学的竞赛。在北京八中，初一实验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阴阳头，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进厕所，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沙子。

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班会上，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大标语，全班 45 名学生，10 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 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坏的其他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要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杨姓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工作，黑板上写着：“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该校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该队长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安眠药量不够大，昏迷了几天。虽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四中，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追打，因据说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解救。在北京矿院附中，

一个富农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头。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学生郑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在北京一中（鼓楼附近），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关人、打人的地方，有 13 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学校周边的地富反坏右资、校长、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和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级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集体关押，强迫劳改。高一三班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塞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很远，可没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资本家出身的学生王一民被斗后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一女生李晓琳被吊打。她的父亲是教授，算是坏出身。1966 年 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规定红卫兵纠察队“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一中，该校红卫兵到北京受毛泽东检阅（1966 年 8 月 18 日）回来后，通知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一位当时是该校学生的被访者称，接近会场时，他听见里面有吼叫声。从门缝里看，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黑五类学生。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家庭问题。此后，他俩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八中（现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交

代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一些当年是大学生的被访者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劳改队，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某班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学燕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同学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此后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 196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的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 32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 80 岁，最小的 38 天，有 22 户被杀绝。

有的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1966 年 8 月 25 日，北师大二附中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学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学习的儿子参加了打父亲。姜被打死后，儿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脱离关系而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甚至被杀害。

在这场同学对同学的大迫害中，理论（那幅对联）尽管粗糙，但指向（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很是明确。一大批学生由于其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切割出去，变成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这种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没有例外。发生这类事，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遭受同学的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为对反抗者的惩罚极为严厉。以下是四个反抗并遭严惩的例子：

例一：直接对抗。1966 年 8 月 25 日，北师大二附中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曹滨海的家。曹的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此时已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发生争吵，并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该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 3 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 天后，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二：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学生，该校离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 年 8 月，六中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老师和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 100 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异议。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不能当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时，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 年 9 月 27 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他抓进校内监狱的小院，一进院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仅 19 岁。

例三：自杀。1966 年 9 月，北京红卫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

近 10 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 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根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10 年后，1979 年，她和全国所有因“恶毒攻击”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四：理论上反对。典型代表是遇罗克。遇父是 1957 年的右派分子，遇罗克 1962 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字样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1967 年 1 月 18 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以此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 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1970 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学的丑行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劳而获高级地位。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一部分人可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即可获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团虽然也强调家庭出身，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

清华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前成立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小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

出身不同。1966 年 8 月，梅花小组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该小组阵线不清。文革前，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线之后才有优先录取权。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废除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前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任负责人。只要把 1966 年 8 月北京各学校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红卫兵追求平等之说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和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 1966 年 8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1966 年 8 月 24 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 12 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竟能动用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卫兵可以用以召开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 1966 年 8-9 月，北京红卫兵抄了 3 万户，上海红卫兵抄了 10 万户，武汉抄了 2 万 1 千家。红卫兵组织还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人类历史上，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1966 年 8-9 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 62 人，游斗折磨致死 32 人，在北京打死 1772 人。从 8 月 26 日到 9 月 1 日的 7 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 3 位数。还有一些人在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

之三：暴力压迫中有快感。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班上一个原本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走路也变得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

声大气。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体验。

之四：虐待同辈可以彰显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为的是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的家，并打死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竞赛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如果出身不好，会因这些长处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期间却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分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同辈虐待。迫害他人可以显示出迫害者的优越性，对同辈人的迫害更能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 1966 年的 8-10 月，然而红卫兵运动导致的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影响中国社会 10 多年。影响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1967 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煤炭部部长张霖被打死，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1968 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数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 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指称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

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 70 年代末才改变。

之三是公道毁坏，私德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可奈何。生活中较为平等、欢乐的同学关系被摧毁。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变得无比冷漠，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整个社会被操纵和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记住吴维尊　　萧若枝

吴维尊 1926 年生于浙江东阳，清末名臣袁昶（庚子事变因主和被慈禧太后处死）的外孙，出生时母亲为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与公元一世纪的圣保罗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 年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一生留下 100 多万字的牧灵著述。

中共建政后吴维尊为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是一派胡言。当时上海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谈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作为该区一名中学老师的吴维尊，经过祷告，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

科学的！”吴维尊回答说：“老师啊，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基督徒饭前必谢恩。1957 年反右运动中，吴维尊仍然坚持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守安息日。不久，吴维尊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小组学习，要把干部改造成具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吴维尊却公开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

1964 年四清运动时，吴维尊写信给一位年轻人：“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

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举动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吴维尊“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的问题。1964 年 7 月 30 日，他被捕了。从世人的角度看，吴的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不识时务。吴维尊则心中确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欢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带领。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做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来听从主的旨意。因此，一进监狱，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的争战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第五个问题是“你对全国基督教界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

识的”，他写道：“圣灵突然拦阻我，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了。要说明的是，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第八次审讯时，审问人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

1967 年 2 月，吴维尊被判无期徒刑。收到判决书后，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吴维尊饭前照常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监狱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吴维尊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他们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吴维尊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

半年后，吴维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铐，他仍然坚持不让谢饭就不吃饭。狱吏组织七八个犯人教训他，其中一个犯人一拳打在吴维尊下巴上，致其满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开弓，狠打他的脸颊。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萦绕在吴维尊的耳中：“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主的话成了吴维尊争战时手中的得力武器。反复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宣布批斗会结束。看守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改造，你觉得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道：“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做什么，或是犯人对我做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

意。”

有一次，吴维尊坚持禁食七天之后，狱方数人强行给他进食。他们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吴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检察院对吴维尊的起诉书中有这样的记录：“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吴维尊被转至宁夏服刑当劳改。那时正是文革高潮期，吴维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对改造。他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有一个队长还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吴维尊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仍然是“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吴维尊决不吃不经谢恩的饭。不吃饭到了第五天，他已极度虚弱，还被迫受罚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个人殴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后是灌食，呕吐。劳改队长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秽物舔干淨，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呕出物舔干净。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被打的创伤一年多后才痊愈。

中国史书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吴维尊虽然忍受酷刑，没有屈服，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不恨我们”，吴维尊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呢。”

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允

许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吴维尊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

1970 年 9 月，吴维尊被调到管制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组长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饭前不祷告谢恩；二，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明确告诉组长，这两个要求，任何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吃饭谢恩。吴维尊在主面前思考这个问题：《圣经》教导要“敬畏神，尊敬君王”，还教导“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想清楚之后，他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儿，有门儿！”也有几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另有人说：“慢慢来，有希望！”那天他们对吴维尊好得不得了，三顿饭都给他吃得饱饱的。

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吴维尊还是不肯改口。他们气极了，不给吴维尊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呢？”吴维尊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厌恶，不喜悦。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一百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靠着主的恩典，吴维尊守住了。此后，劳改队的干部不再干涉他

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算是违规。在狱中，吴维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说“不”，坚持反改造，监狱里那些种种规矩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到 1979 年，一同转至宁夏的 200 多个无期徒刑犯人只剩吴维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陆续获得减刑释放。许多人劝吴维尊也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申诉。

1981 年春季，狱方宣布对他实行减刑，再过 6 年，他将被释放。宁夏高级法院的裁定书上说，吴维尊劳动积极，遵守监规纪律，证明他“确已悔改”，因此予以减刑。

吴维尊决不认同这个说法。6 年后的 1987 年 5 月 28 日，吴维尊被迫出狱。当天他写了致宁夏高院的《出监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没有悔改，从来不曾悔改。“我自从 1964 年 7 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无悔改的行动表现。”

他说他 1964 年 7 月 30 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自第一次预审起，除了确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谓“罪行”的询问，他“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 20 多年至今，凡与“认罪”或“改造”有关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 20 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我）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我）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监狱对

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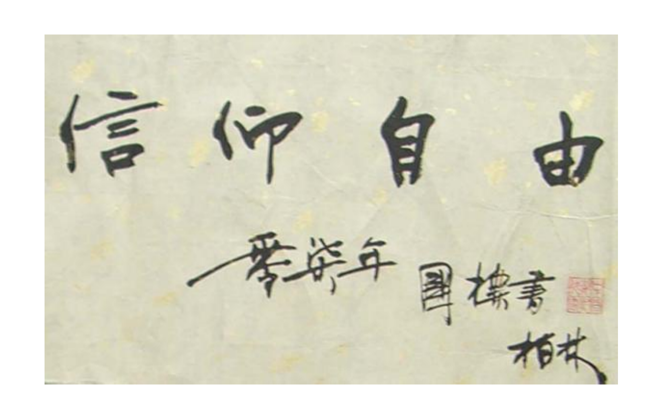
吴维尊说，服刑期间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语、一个举动，“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对我“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顶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我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1981 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被迫出狱之后，吴维尊拒绝离开监狱。狱方“被逼”无奈，最后只得在大墙外为他收拾一间 14.6 平方米的陋室中，让他在监狱外“服”无期徒刑。他的逻辑很简单：他没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强加给他的因悔改而获得的释放。

2002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他写下最后一封给自己的亲人的信：我之所以坚持做一个“大墙外的无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顺服和接受监狱（政府机关）的执法（与我悔改与否无关），出到大墙之外，又要我坚决拒绝和抵制法院的弄虚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说成是‘确实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各家各人都不要来银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来，谢谢，千万不要来）。我始终是监狱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窑，都是最正常的事。什么都挡不住我在末日与众圣徒一同复活。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长住又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必朽坏的肉体只能仍归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与主同进不朽坏之神永远的国。（出狱）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待我好，照顾我；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谢政府，特别是感谢监狱单位。”“主若许可，我每年写一封简信给你们各家；何时死了，我请多年经常与我交往密切的刘万新老弟兄，打电话告诉三哥家，并请三哥转告你们各家。愿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与你们各家同在。”

20 天之后的 200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一对年轻夫妇前往探望吴维尊。敲门，无人应声，翻矮墙入内，吴维尊服装整齐，带着眼镜，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经被爱他的主接去了。



我写过十次入党申请　　习近平

我 1969 年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 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另一点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 年 7、8、9 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 20 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 WTO 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 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

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圣女王佩英　　杨银波

今年清明节前，500 余人在北京举行王佩英就义 40 周年纪念会。会后，部分与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 5 月 23 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词条。6 月中旬，我在网刊上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制作人胡杰在此发文公告，称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书籍，欢迎索取。

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以 80 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 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

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 17 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拷打，张以成才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

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尊售价不匪的毛泽东白瓷像。

1961 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丈夫张以成去世后，她一人要养活 7 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 1961 年说，全国总体的缺点和成绩是 3 比 7，有的地区超过 3 比 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说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61 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从 1963 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 1970 年被杀害，王佩英经历了 7 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

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

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判决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于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

1980 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的逻辑是：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罪恶是谁带来的？

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

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 7 个孩子没有人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7 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苟合，永照千秋，实乃我中华之第一流人。

从 1970 年 1 月 27 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年仅 55 岁），直到 2010 年，长达 40 个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 6 子 1 女也隐忍整整 40 年！

以制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一手策划的。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 1000 元抚恤金。张大中就是凭借这笔 1000 元的抚恤金开始创业，终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动京城。这既让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

寻访王佩英的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王佩英的子女们曾试图搞清楚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是在寻访后才知晓的。他们想不到母亲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当年懵懂不知的他们，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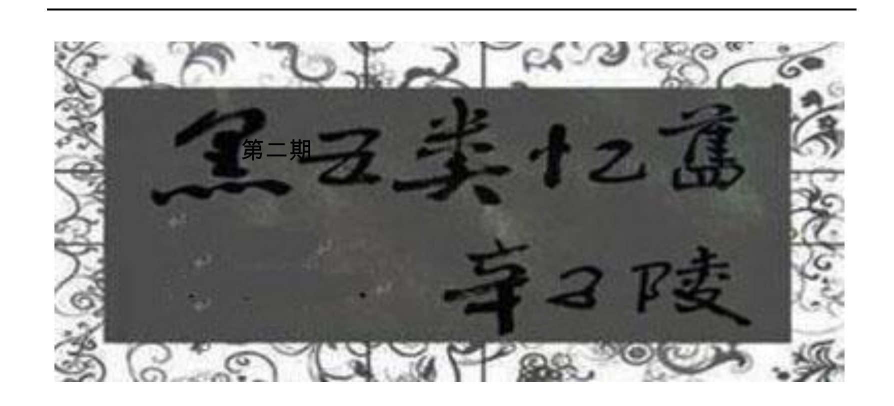
在王佩英就义 40 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上台发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 1945 年在延安窑洞所讲周期律的问题，原来黄炎培

当年的警告确实是警告对了，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

文革悲剧看似远去，其实至今仍在发生。其中之差异，无非是反革命变成了颠覆罪。多少据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监狱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处境悲哀，惶惶度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地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自责。

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正义的呐喊。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我的夙愿　　焦国标

其实早在 1997 年前后我就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过，那时不是编黑五类忆旧，而是为饿殍立传——编纂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者的大型故事集。当时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借助工作平台，我向我的作者和读者约稿，请他们把自己见闻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写下来，寄给我。一两年间，我收到几百篇来稿，然而最终我未能把它们编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绝大部分来稿写得不成形，而我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一一处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吓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78 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字数才 1.26 亿字。于是我想，三千多万饿殍，光名字就是一亿多字，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字数相当，这辈子我什么事都不干，光他们的名字我到死都写不完！

那几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饿死人的地面儿真是广啊！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江南鱼米之乡，全国各地哪儿的来稿都有。中国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难怪毛泽东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战，也不在乎几千万人饿死。为饿殍立传的宏愿虽未实现，那两三年我却集中写作和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这是大陆大众媒体上最早的一批为农民权益呼吁的言论文章。某种意义上说，近十几年来海量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个人写作、媒体报道（成为热门的公共话题）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改变（废除农业税等），都滥觞于我写的这一批视角独特、尖辛悲怆的文章。

发愿为饿殍立传的时候，互联网还未流行，其功能也还很有限。那时所有稿件都经邮寄而来，或是电脑打印稿，或是手写稿，没有一篇是通过 Email 发来的，也没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编《黑五类忆旧》

与为饿殍立传一样，也是一项有限对无涯的事功，可毕竟至少技术上方便多了。现在我不再作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记下每个黑五类的名字，只求怀着一份敬虔之心，竭尽所能，把《忆旧》编成一部记录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生态状况的历史文献。虽或无补于黑五类同胞曾经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难，但求有助于我们所归属的这个族群未来的成长、进步和文明。

银行家康心如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公告

原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定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重庆市重庆历史名人馆举行。热诚欢迎海内外尚健在的美丰银行同仁、美丰同仁的后人、对相关问题有兴趣和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报名参加。联系人：詹康（手机电话 0086-13012367126）。通信地址：重庆渝北区龙溪街道金龙路 92 号 3-16-2。邮编：401147。电子信箱：kgx290920@sina.com。特此公告。

康国雄（康心如之子）

2010 年 8 月 14 日于北京

目　　录

爱在风雨夕　　海　鸥

1966 年春节过后，我刚从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是他的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刚工作，想过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我吃惊于他的消息灵通。“是

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过几年再考虑。”“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别错过良机。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拉倒，省得我总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安排我在一个周一的早晨，与乘早班火车回郊区学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车站候车厅见了面。

这样我就算处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将我在学校写的一本诗集给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然后又把我的诗集还给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令我感佩，那从字迹中散发出的人品的贤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恋。不久她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并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虑与她的交往。那时我在这方面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不以为然。

这年五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开始了。我很为她的家庭出身担心，一再叮嘱她要处处谨慎。她告诉我，由于出身政治贱民，从 1957 年 14 岁起她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我每个周六晚到车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我俩认识不久。一次我们遛马路，突然窜出一条小黄狗向她身上扑。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可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抱起它说：“这是我家的小狗黄黄，可厉害呢。”“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的两位老夫人身边。后来她告诉我，两位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验收我。再后来我到她家时，黄黄见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特别亲热。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说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我分手，今后作为好朋友相处。我很吃惊。最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强扭

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觉得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不然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方知单位文革小组已勒令她的父亲“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十几天前，看到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她就有了预感，觉得我俩的爱情没有未来。为了不影响我，她痛下决心，才提出与我分手。

第二天，我请代休假赶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有成群的黑五类被红卫兵从小巷里打骂驱赶出来，押解遣送。红色恐怖已从传单标语上走进现实。

一进大院，我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的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走上来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全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来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件物品（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分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叫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过它一脚，骂它“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她家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曾任国民党军队连长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贫民，因而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剃了阴阳头，当晚上吊自尽。三天后，两个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 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经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家被遣送的，时间是 1966 年 9 月 16 日。

他们父母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课不上了，又不让参加红卫兵，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黄黄的眼已瞎了一只，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弟弟讲，他十岁那年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软软的舌头舔我的脸颊，好像是对我款款深情地说话。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说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女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声称要办街道托儿所。当时黄黄已染病在身，被刘大娘留下，说以后再来取。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要她一定划清阶级界限，分清敌我。她也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刮起出身论的狂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车汽车，进商店医院，都要报出身。

那时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见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

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全国各大、中、小学掀起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后来就没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见到这份文件后，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以串连的名义去北京。那天他们赶到火车站时，车站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宿舍后窗，直接送进站台，并帮助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进车内。

北京清华园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铅印文本，即刻买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将文件寄给乡下的父母。母亲接到后，连夜骑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这封信就已交到父亲的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他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郭一见这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牛皮信封，顿时肃然。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农村那头则没这么顺利，那里的文革头头不同意返回。无奈之下，她父亲把新买下的房子送给他，才获得签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事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等到这一天。自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再好起来，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坏了的那只眼不断淌出血水，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等等，在

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当年肆虐中华大地的血统论与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统优秀论有何区别？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补白：乡人柳普，少年时放荡不羁，青年时外出闯荡，辗转多地，终无所成，后被抓壮丁，在国民党 21 军充当伙夫。在伙房曾经人介绍，填表一张，说是加入什么互助组织，后来有没有什么活动，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后经查，那是一张加入军统的表格。经公安部门审查数月，因无确切证据从事过特务活动，被逐回乡，发证一张，结论栏中写明“作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为牛鬼蛇神的一员。在向领袖请罪时，总是自报家门“‘作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请罪”。民兵营长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是作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说完，掏出派司，白纸黑字写着。众皆笑，营长无可奈何。后柳普终经不起折磨，投河而亡。　　　海　安

美国好公民关惠群　　林宝庆

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几岁都不清楚的移民关惠群，每天默默为数百位无家可归者送饭菜，20 余年如一日。8 月 4 日，欧巴马总统在白宫为这个关惠群颁发了 2010 年国家公民奖。

关惠群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医生，但在文革期间成为批斗对象。六七岁的关惠群，脖子上挂着铁丝木牌，受批斗，跪玻璃。她亲眼看见哥哥和嫂嫂被枪决，还亲见其他家人饿死或受虐死在街上。关惠群独自一人，流浪街头，睡马路，睡垃圾箱，挨饿受冻，在垃圾箱中捡东西吃，度过 4 年无家可归的生活。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被禁止跟别人说话，饱受孤立与贫穷之苦。

11 岁那年，关惠群与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后，她一度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她无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绝睡床。不久，她父亲因病在香港去世。14 岁上，她辗转来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离家上班后，她就在家看公共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这两个节目就是她的学堂，她就这样学会了英语。也由于 Mr. Rogers，她至今都坚持穿要绑鞋带的鞋子。

38 年前，经人介绍，关惠群嫁给物理学博士陈伯良，并随夫搬到加州 Eureka 镇。大儿子陈溢俊上小学一年级时，关惠群怕儿子如她幼时那样被人欺负，就每天在教室外观望。老师知道她不会说英文，后来也请她进教室一同学习。当时班上有一个小女孩，每天向关惠群讨食物吃。后来她发现这个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车上，便开始接济这家人。

关惠群行善不欲人知，连老公都瞒了 10 年。因为无照派发食物，她还被当地警方取缔。三年多前，经当地记者报导，关惠群的善行才公诸于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饭，还捐了三间浴室。

现在关惠群每天清晨 2 时起床，为加州 Humboldt 郡四五百名无家可归者打点当天的食物，并且送无家的小朋友上学。她照顾的无家可归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济条件的弱势者，大多数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军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几十名不满 20 岁的青少年。一些美国家庭，子女一满 18 岁，就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了。

关惠群说她只是在回报社会。她不愿再见到与她当年那样睡垃圾箱的情况。关惠群至今仍有梦魇，只要听到华人男子说中文，就会不寒而栗。不过她说她活过来了，她认为是神让她活下来，她是有使命的。不过，她说，她的哥哥、姐姐以及 103 岁的母亲吴德璀，则从来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

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这可急坏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但该人是个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还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
海　安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顾延龄

本人顾延龄，江苏南通人，1957 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为人诚恳正直。当年同学们推选我为班级整风代表，我却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早在 1955 年反胡风时，女同学吴××曾遭班级批判。在班里仅有的一次放鸣会上，有人旧事重提，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风分子，批她干什么。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应该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随着整风迅速变为反右，我和无数人一样也落入了毛泽东早已设计好的阳谋陷阱。

从 7 月 24 日起，班级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 月 31 日半夜，批判会结束后，我一个人从都克堂出来，黑暗中沿着下山的石阶，经健身房，无目的地走到钱塘江边。一路上，没有一个同学理睬我，那怕说一句话，点一下头。

接着，团支部会上，支书宣布我已堕落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时年 22 岁！我嚎啕大哭，在同学面前表态说：“三年后，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团!”那时我是多么天真、幼稚、无知！右派已经沦为阶级敌人，

怎么可能让你重新加入共青团？

毕业分配名单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单中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给浙江省教育厅写信，表示“愿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已，希望能分配我一个工作”。省教育厅很快答复，叫我去宁波专署教育科报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装，没有向任何同学告别，无声无息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对于我已经丝毫不值得留恋。这一天是 1957 年 8 月 21 日。

省教育厅通知我去宁波报到时，给我一封密件交宁波专署教育科，宁波又给我一封密件交嵊县教育局人事科。至今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1957 年 8 月 22 日，我到嵊县中学报到，任数学教师，直至 1995 年在该校退休。

1957 年 8 月至 1963 年春，学校不发给我工资，每月只给 25 元生活费，而工作量却是一般教师的两倍。1962 年春，俞忠荣副校长在师生大会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费。我写了申请报告，到 1963 年春才拿到每月 51 元的工资。

1979 年右派摘帽改正时，嵊县教育局张文槐副局长和人事科吴文兔两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中只有 1962 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开除团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处分及延长察看一年处分的文件，却没有看见右派戴帽的文件。他们问我：“1957 年杭州大学有没有戴帽的公文让你看？有没有在戴帽公文上让你签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右派外，没有人单独同我讲你是右派，更没有书面文件给我看，我没有签过名字。”他们又问：“你怎么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开除我团籍的会上说顾延龄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到嵊中，每月只给我 25 元生活费，拿了整整 6 年，凭此我就认为自己是右派分子。至于对我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的处分，我同样不知道。老师们也不知道，没有人同我讲过。”

我在杭大的档案中只有二年察看处分，没有戴帽批文，这说明杭大并未给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处分。可是当初杭大并没有向我宣布这个二年察看处分。那么嵊县是谁把察看二年处分当右派分子

处理的呢？肯定是校领导。那么延长察看一年又是谁做出的呢？肯定是诸丹忱。当时嵊中书记、校长是一个人，就是诸丹忱。诸肯定知道内幕。只有书记、校长有权有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干害人的勾当！我曾问过诸校长：“教育局领导说我的档案中没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处分文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诸尴尬地、毫无底气地说“不知道”后，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事情总要有个结果。我写信到杭大询问，同时到杭大数学系盛淑云教授（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党员、班团支书）处问当年对我是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批判你以后，我们把材料上报了。以后如何批复，我们不知道。”

不久，1979 年 3 月 6 日，中共杭州大学委员会发文《关于顾延龄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正文如下：“顾延龄，男，四十四岁，江苏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师院数学系一九五七届学生，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嵊县中学任教。根据中中共中央〔1978〕55 号文件精神，对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经复查，顾延龄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原划该同志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决定给予改正。撤销原右派处理决定和开除团籍的处分。恢复名誉。关于工作和工资等有关问题，建议所在地区和单位按规定办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与张凤图老师谈起我档案中的怪事。张老师说：文革时，他曾与另一位老师到杭大调查某某某的历史。查完后，好奇心促使他们顺便去看我的档案，结果档案中却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资料。由此可见，我在杭大的档案中确实没有戴帽批文！那么杭大党委发出的改正我错划右派的文件又是凭什么发出的呢？难道是不管你有没有档案，只要事实上你已做了 22 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吗？这一将错就错，究竟是谁的责任？

因当权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当了 22 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问：

一、既然我档案中没有戴帽文件，那么当初是谁把我当作右派分

子对待的？

二、既然没有戴帽文件，那么 1962 年摘帽时就应发现这个问题。既已发现问题，就应立即纠正，恢复名誉，补发工资。那么又是谁继续隐瞒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变成真右派？由于这些人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我过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胆、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们手中，随时可以给你戴上，而且祸害父母、弟妹、妻儿一大片！试问这些人是否犯了渎职罪、故意伤害罪？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的档案中有察看二年处分和延长一年察看处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处分，为什么不让我本人知道？连老师们也不知道我有察看处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分子。那么谁在一手遮天？谁在瞒天过海？对这种人难道不应该追究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四、1957 年至 1962 年初的戴帽期间，我每月只有 25 元的生活费，却每周要上 24 节课。摘帽之后，为什么工作量和工资仍然还是右派标准，没有一点改善？直到 1963 年，经本人申请，才拿到转正工资每月 51 元。摘帽后一年（1962 年初至 1963 年初）的工资也未予补发，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 年教师加工资，学校加工资的指标用不完，而学校那些当权者竟一手遮天，又剥夺了我增加工资的权利。直到 1977 年，已工作了 20 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资（每月加 7 元）。试问，这 22 年的经济损失、精神创伤是谁给我造成的？嵊县中学的领导、嵊县教委乃至国家，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1979 年，杭大发文说我是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经济上却未补发一分钱。

五、嵊州崇仁中学梁丽英老师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1979 年收到改正文件时，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分子。可是我无右派材料，却当了右派——如此玩忽职守、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干部该不该处理？

反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 年宪法第 97 条明文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57 年反右完全是对 1954 年宪法的公然践踏，中

共必须彻底否定反右，必须彻底追究那些伤天害理的具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按照 1954 年宪法，我们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国家索赔，发还二十余年所欠的工资，赔偿精神损失。现在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有人建议财政部应该发行专门的右派赔偿债券，打白条子也可以嘛！

受教育权被夺记　　李荫国

我 1948 年出生在洞庭湖滨，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母亲刘学熙和姨祖李祥琳（汉寿县资深老教师）抚养我在摸爬滚打中长大。1957 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连，一次次被小学、中学拒之门外。

1959 年 7 月，我初小毕业。参加了升高小考试之后，我便无故心生不祥的预感。张榜后，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头脑嗡嗡作响。我红着脸，逃也似地悄悄离开，欲哭无泪。当时我虽未满 11 岁，却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关系。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这么低的门坎，学校该不会以家庭出身为栏杆将我拒之门外吧？可是落榜的现实(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无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时初小升高小，考试只是过场，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饱受惊吓的我，这时更觉得惧怕，不知自己家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十岁孩的童竟几乎被这个社会公开宣布为敌人，我被自卑感和负罪感完全吞噬了。

从 11 岁到 13 岁半，我荒废了整整两年半时间。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度日如年的两年半。失学后，我偶尔跟随姨祖住县直机关幼儿园。园长余某，极端仇视我这个右派的儿子。1960 年春，她把 11

岁的我强拉去围堤湖和幼师们一起割草支农。汉寿围堤湖是血吸虫疫区。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四十多度。在极度贫困中，母亲和姨祖设法筹钱为我治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不免费），住院一个多月，差点丢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废学业，十分痛惜，又无可奈何。她要我习碑帖，练毛笔字，看书自学。

1962 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亲也在其列。母亲命运的转机，也给我带来上高小的机会。我上的高小是本乡有名的邹家坪完小。班主任邹宪章老师很有才华，又诲人不倦。令我兴奋而又紧张害怕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到了。1963 年 7 月，升初中的考试在太子庙中心校举行。我夺得全县第一名。

然而汉寿县教育局最后却做出这样的结论：李荫国父亲是畏罪逃往台湾的反革命，母亲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虽过继给李家，李家也是县内头号资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绩再好也不予录取！

全县第一名却不被录取。这是我第二次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凉秋九月，眼看着许多同学带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进入汉寿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沦为无业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中国人的人籍。我对自己的前景彻底绝望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奇迹般地很快平静下来。我已经 15 岁，完全懂事了。当时干什么都有一道政审关卡。升学、参军、参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认命了。

怀着满腹心酸，我从母亲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边。上街我总是走边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贼，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就远远避开。姨祖鼓励我切莫悲观，要坚持自学，继续练毛笔字。她让我读《古文观止》，给我讲韩柳欧苏，讲《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李陵答苏武书》中苍凉的描绘把我带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当时我的荒凉与无奈的心境。我的泪水往心里流淌！

姨祖觉得我困在家里看书写字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1963 年底，姨祖专程去长沙，找到汉寿籍湖南师范

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郑英铸（也因右派问题被困），请他帮我找个中学就读。郑先生是汉寿名士，1949 年之前县孤儿院院长郑启涛之子，与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郑先生十分同情我的处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师（汉寿人）相商。几经辗转，终于寻到一所愿收“梁山好汉”的民办中学。这所学校叫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地址在小吴门下的清水塘，校长贺邦鸿。

别看这个中学招牌大得惊人，却是一所极为简陋，刚刚开办不久的学校。三个教室，两个年级。学生大多为进不了公办中学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问题少年。湖南日报社等好几个单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们班。老师的水平还不错，他们都没有公职，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会失意者。

经过清华民办中学一个学期的努力，1964 年暑假过后，我怀着新的希望插班到长沙读初中二年级。很快，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师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1964 年 12 月，一封汉寿县教育局并加盖中共汉寿县委大印的公函追寄踪学校。该公函介绍了李荫国是何许人（家庭背景和汉寿县不予录取的事实），称该生不甘心现状，隐瞒家庭出身来长沙读书。按照党的政策，应辞退出校。请予配合。

据母亲回忆，当时株木山联校教师彭某曾几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联校骨干刘某为主谋，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读书”当做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图复辟变天的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汉寿当局高度重视，像追踪逃犯一样穷追不舍。

清华民办中学贺校长找到肖沛老师告知了真相。肖老师和郑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顺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师找我谈话，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一套由周朋寿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回去自学。我第三次失学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回到汉寿，我再也无心自学，再也不奢望读书考什么大学。我的学校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升学梦彻底破灭。算起来，我读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个月，共六年多。正当求学上进的花样年

华，我却连续三次被学校坚拒于门外，这无异于将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少年反革命　　胡　健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北岛诗《走吧》

当时吴续久和我是实验小学 5 年级的同学，我俩的父亲又都是被批斗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常在一起。我家有一台红灯收音机，吴续久来时我们会乱拨电台挑选节目。一次，我们无意中拨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可是敌台！我们十分惊异，十分恐惧。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境外的华语或英语等语种的广播电台，特指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 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声音调到最小，故曰偷听敌台。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判刑。在思想禁锢的文革岁月，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一次，我和吴续久从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到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那么欢快，那么喜庆，那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听极了！文革后，中央台哪年春节不播放它呢？可是当年我们却是在心惊肉跳中收听的它。还有一次，我们听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一唱三叹，好呀！我后来才知道，马思聪当年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国外。莫斯科电台播音的声音不同于国内

电台，内容则大都是对中国当时被禁的文艺名作的介绍。至于说我们当时偷听莫斯科电台有什么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们两个小孩子了。

不久，复课闹革命了，我们也上中学了。我在淮中，吴续久在一中。有一天，是个星期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吴续久被抓了。因为写反动标语，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惊呆了。如果吴续久成反革命，那么我怎么办？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晚上睡觉时人在床上就好像飘起来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学校上学。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后你去办公楼政工组一下。"完了！彻底完了!! 无边的恐惧笼罩着我。我胡里胡涂做完早操，随着班级的队伍从环城路向校园跑去。我整个人好像在队伍中飘，心中说着："同学们，再见了！白云蓝天，再见了!"到了政工组，两个中年模样的人询问我关于吴续久的情况。我如实相告。最后，他们两个好像非常友善地说："你没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传来了吴续久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批斗劳改的消息。

吴续久后来回忆说：那天早上进教室时，他发现教室窗户都被用纸糊了起来（神秘），桌凳也变动了。吴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两名壮实高大的同学就夹在着他坐下，市文教卫系统革委会的头头和一中革委会的头头也走过来了，当众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续久押起来!"吴续久就这样收押了。当时他不到 14 岁。

所谓的反动标语根本不是吴续久写的。"当时我父亲、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资派，我怎么敢写反动标语呢？我怎么也不承认，并提出可以通过验笔迹等方法查出写标语的人。"革委会的头儿们先是来硬的："你父亲、你舅舅都被批斗，你不可能没有阶级仇恨的，反动标语不可能不是你写的!"后来他们又玩软的："你承认了吧，你很小，可以宽大处理，不会影响你的上学、你的前程。"一个不足 14 岁的小孩子，哪里经得起那些横高竖大的大人们一天一夜的折磨，吴续久终于在审他的人事先写好的纸上签了字。（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无后乎！——编者）就这样，吴续久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学，不断

地被批斗，并在学校里劳动改造。

那些革委会的头头在审问吴续久时还特别提到我：“你成天与叛徒、走资派胡某某的儿子在一起玩，你们干了些什么？偷没偷听过敌台？”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蒙这些大人们如此看重，真是受宠若惊！

1971 年，吴续久被当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办厂，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体的工厂。我比吴续久要高一等。之后不久，吴续久的父亲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干部，吴续久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证据不足而从有变无了。吴续久现在生活得还不错，他说他对当年的事已经不愿多想了。

补白：奉节县城小商贩傅吉华夫妇，年近半百，无儿无女。因为朱衣供销社像机关一样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开门晚关门早，还午休，农民买点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华在供销社门前租了一间农房，通过关系从供销社批发食盐、卷烟、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销。供销社不开门时，社员可在此购买，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红卫兵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几个革命小将将傅吉华揪上台批斗，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令其低头弯腰。傅吉华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项罪过，莫名其妙，不太驯服。几个小将上前揪臂按头，傅吉华向前一蹿，一只脚踢到了揪他的红卫兵邓昌友的下身!刚满 13 岁的邓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资产阶级分子傅吉华毒打红卫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区公安特派员立即派民兵将傅吉华绑送县公安局。傅吉华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狱，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属，当然不能再开代销店了，生活无着，长期抑郁生病，又无钱医治，死在租住的农房里。傅吉华在文革后才出狱。陈宗培

坏人时代　　甲　乙

坏人曾经是中国社会强行分出的一类人。那时我们是祖国大花园中的花朵，我们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因而要睁大眼睛辨认，以免被坏人污染。我们队就有一个坏人，是右派分子，四十多岁，是从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坏人。他老朽、掉牙、秃顶，见人卑躬屈膝，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在人们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思想和肉体批判时，我仿佛享受到自己是个好人的快乐。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坏人了。大队革委会头头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反革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坏人，要与他划清阶级界线，不能包庇同情。他还动员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站出来对父亲进行揭发斗争。我那发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脑，实在无法参透这个复杂的问题。我非常紧张，觉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机关口。我固然很向往革命队伍，不愿被革命大潮抛弃，但我并不了解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坏人。他经常说政府好，从不说反动话，怎么会是坏人呢？他唯一的问题是几十年前当过国民党军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会自首投诚了啊。

我不了解父亲，因而无法批判父亲。大队头头很失望，把我从“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中划去。后来我偶然得知父亲竟是区里政工部门内部监控的对象，感到非常恐惧。如今四十年过去了，父亲已逝，不知他这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是不是还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 20 岁那年竟差点儿也成了坏人。公社搞围湖造田，青壮劳力冬天到湖滩挑堤，从早到晚干十四个小时，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担土上了堤坝，倒土，喘气，不知怎么想的，竟突然对平时要好的哥们小张冒出这么一句：“我们挑长城啊。”学毛选小组成员阚某听到了，马上质问我：“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他说：“没什

么意思？你这是把我们的党比作秦始皇！”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就凭这一句话，我也可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地现场批斗，然后逮捕坐牢。于是我和小张紧急商议：假如阚某真去告密了，我决不承认，而作为证人，他要坚持一问三不知。此后几天我一直担心大队会把我突然揪出来批斗。可不知为什么，这事竟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我算亲身体验到差点儿成为坏人的滋味了。

最后彻底动摇了我的坏人观的人还是父亲。父亲正派、廉洁、坚强、守信、敬业，做人做事一丝不苟，一生虽苦，却以苦为乐。即使生活穷困不堪，但绝不会有小偷小摸之心。他从不撒谎，不贪他人或公家一点便宜，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青年人总是告诫要学好。他曾当过生产队保管员，人家想伙同他私下多分一点集体的东西，他却义正辞严拒绝。父亲一生坚持做他自己，不管头顶的压力多大，日子多难，他都依然如故。乡人因此称父亲为周朝人。据说周朝人最守规矩，对王法说一不二，朝廷可以画地为牢。如果我们的社会更多一些父亲这样的人，肯定就是一个好社会，好国家。

今夜，在这里，我在自己内心给父亲彻底平反——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写的至诚之人。我虽是父亲的儿子，在人格尊严上实不及父亲的十之一二。由父亲推去，我青少年时代看到的许多坏人，看来其实并不坏，甚至其中不乏极好的人。本来我应该多多感受他们的人生光华和智慧，却错过了走近他们的机会。在那个弯曲悖谬的年代，人们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封闭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备，很难坦诚待人，很难轻松共事共存。

现在我常反问自己：你是一个坏人吗？似乎不是。你是一个好人吗？也说不清。起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好人，缺少正义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悯情怀，很多时候蜷缩着躯体，过着甲壳虫一般生活着。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好人是不该这么窝囊地活在世上的！

托派子女的梦魇　　张曼青

1952 年 12 月 22 日，是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屋里灯光明亮，还有人说着话。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为了向独裁者斯大林献礼，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荡托派行动，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郑超麟先生）都在当夜被捕。

父亲被捕后，母亲一个人带着 5 个子女确实困难，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带到上海，由大舅抚养，留下大姐曼妮、我、曼云留在重庆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 10 多年。1966 年 5 月底，曼平哥结束了从北大派往四川峨边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请假到重庆探亲，我们才见了离别后第一面。见曼琳则是 1966 年末大串连时，我去她就读的北京轻工学院找她，经相互自我介绍才相认。如果路上偶遇，我们这对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见不相识。

父亲被捕后关押在松山劳改队（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时，每隔一二周或一个月，母亲就会带着我和曼云乘车去探视父亲。那时母亲实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车都会打盹。这是我记忆特深的情景。到了劳改队，母亲与工作人员交待之后，就站在露天里等着父亲出来。他们站在一处谈话，我和曼云则在离他们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已玩耍。每次母亲总要给父亲带一些香烟或食品。有几次父亲是穿着工装出来见我们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帽子后面拖一块大布，遮住整个肩膀。

不知从何年起，母亲就再不带我们去探视父亲了，后来得知父亲已转押到西昌。好像是在 1959 年，国家实行一次大赦，提前释放了很多罪犯。当时我们也特别期待父亲能获释，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消息，最后等来一纸通知，说父亲早在转押至西昌时就生病去世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黯然泪下，我们心里也十分悲痛。母亲对父亲被捕前的政治活动浑然不知，只知道父亲经营印刷厂时常常印刷鲁迅的书籍及一些进步书刊。家里常有进步人士来往，陈望道等著名学者就来过我家。

父亲被捕，我们成了托派子女。读小学时，一次因调皮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训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么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为！”这次训斥使我刻骨铭心，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自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再召来同样的训斥。不过，“因祸得福”，我变得学习刻苦，任劳任怨，参加工作后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儿园，小学读的私立达育小学（后改为公办中华路小学），小学毕业升不了公办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庆4所民办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炼油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招去。1967年分配进该厂，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干了最差的工种。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读于重庆市九中，是该校的高材生。高考后比她成绩差的同学都被各高校录取，她却榜上无名。好不容易分到重庆空压机厂（军工企业），没干多久，厂里下放人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后来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压机厂工人，因与托派子女恋爱、结婚，被调离该厂，到重庆东风机器厂工作。大姐后来以家属工身份也进了该厂。长年精神压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 年服安眠药自杀。时年 40 岁，留下一双女儿。当时已退休的母亲在北京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带孙女张薇，得此噩耗，悲痛难抑，可也只能是眼泪往肚里流。

妹妹曼云1965初中毕业，成绩优异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当临时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辞退，长期未分配工作，干了十几年临时工，直到母亲退休才顶替成为正式职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积郁多年，母亲于1995年过世。曼云失去精神依托，于7月26日留下遗书，投嘉陵江自尽，时年47岁。妹夫符比奇千辛万苦，花几千元雇人打捞，7 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转弯处找到其遗体。此时是重庆最炎热的时候，遗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那时没有DNA鉴定技术，仅从足部一颗痣的位置确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亲的遭遇一言难尽。公私合营后没收了所有的资产，被划为资本家，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入国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

不必说，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属，常被揪斗、游街及下放劳动。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时间、报酬。由于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脸常常浮肿，也查不出什么病因。

母亲为人真诚。父亲被捕后，她一人经营印刷厂。当时厂里有一名职工，外号聋子（因耳聋得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大，母亲却对聋子十分关心。那时我们住民生路76号（印刷厂对面）二楼，他住三楼。我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都让我和曼云给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来风言风语，甚至传到我们小孩子耳朵里。但母亲全然不顾，始终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后来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号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住在这里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当时我已离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结婚住在厂里，母亲和妹妹曼云只得投亲靠友暂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户籍警竟以我们是托派家属为由，不准回迁，硬让我们搬到渝中区打铜街4号三楼一间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据说赶走我们后，那位户籍警得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套回迁新房。

那个年代还有一件令我常感头痛的事：无论升学和工作，经常要填履历表，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常使我犯难。思考再三，要么填上小商、商人，要么填资本家，总之不愿填反革命、托派。但无论你怎样填，在档案里我们总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是不敢写的，知道写了也白写。我搞不明白什么是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不同政见者就必然是敌人吗？难道政治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期颁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东山谷文昌　　霍　达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东经 117° 25′，北纬 23° 42′，蔚蓝的海水托着一个不规则的多角形小岛，像翩翩欲飞的一只蝴蝶，它就是东山岛。这里距香港 210 海里，距高雄 110 海里，距澎湖 98 海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东山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岛上至今留存着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施琅先后挥师收复台湾的遗迹。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孤悬海上的东山岛仍然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50 年 5 月 12 日凌晨，解放军乘木帆船强渡八尺门海峡，国民党军队溃退，共产党接管东山岛。在斗争会上，翻身农民、渔民纷纷上台诉苦伸冤，涕泪横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扑向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声：“同志啊，你们为什么不早一天来，救救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谷文昌，在老家河南林县当过区长、区委书记，最懂得农民的苦，赶紧扶住她：“老人家，别难过，你慢慢说，你儿子他怎么了？”

这时，一名当地干部急忙把谷文昌拉开，低声说：“老谷，不要理她！这是个反革命家属。她儿子被国民党抓走当兵，去台湾了！”

“啊，反革命家属？”谷文昌猛地被触动，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属，那么，在东山岛，这样的反革命家属太多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前夕，对东山进行了最后的劫掠，大搜粮、大派款、大抓兵，全县有 4792 名青壮男子被强行抓走，仅一个铜钵村就抓了 147 人。现在除了老弱病残，几乎见不到男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礁头村的黄阿婆，四个儿子被抓走了两个，黄阿婆像疯了似地朝着大海痛哭号啕，直到哭瞎了双眼，也没见到儿子回来！

按照以往的常规惯例，黄阿婆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当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属。可是，她家的阶级成分却是贫农，大儿子还是村农会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儿媳是村妇联主任，斗霸、土改中的骨干。那么，这家到底算什么？革命和反革命交错扭结，难分难解。要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东山并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当时东山全县不过 12597 户，而被抓的壮丁多达 4792 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妇、白发爹娘、无依孤儿！再加上儿女姻亲、姑表

旧眷，盘根错节，蛛网纵横，涉及人员几乎遍布全岛，难道能把他们都推到敌人一边去吗？

谷文昌的心像铅一样沉重。海滩上，月朦朦，独守空房的渔家妇女哭声凄厉，呼唤着被抓去台湾的丈夫早日归来。油灯下，意绵绵，年迈爹娘用颤抖的手在年夜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难道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母亲都有罪吗？经过深思熟虑，谷文昌向县委提出：那些壮丁决非心甘情愿地为国民党卖命，而是被强行抓走的。他们的亲属都是穷苦百姓，本应成为我们团结、依靠的对象。翻身解放，他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和别人一样得到本来应该享有的团圆和幸福。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已经遭受了双倍甚至于数倍于常人的浩劫，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难道我们还能忍心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吗？国民党抓兵制造了一场灾难，我们应该去救灾啊！

中共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称这些在台国民党士兵的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准歧视，除了不享受只给予军烈属“代耕”的优待之外，与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难户还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供养。这些政策，在阶级斗争如急风暴雨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简直是石破天惊！

归侨生在一九五七　　黄达维

1957 年抵达北京后，我们归侨学生逐渐感觉到中国大陆政治气氛过分浓厚，深感不惯。据说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指示，不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搞反右斗争。但是学校的低层干部对抗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改造思想，反对右倾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其中一位老师，姓王，是个共产党干部，要求每一个侨生必须发言反右。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有以下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逛夜市买小吃，支持小商小

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不在饭厅用餐，到校外吃豆浆烧饼；贪图享受，前往王府井购买义利面包；逛东安市场（因为当时东安市场被定为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出入的地方）；吃馒头夹芝麻酱；吃炒鸡蛋放辣椒；服装讲究，等等。

我们归侨学生前往王府井东安市场购物，到合作社购买食品，到饭店用餐，请裁缝定做丝棉袄，等等，当时都被批判。我们家族最重要的长辈，原华侨总会理事长张念遗，为了团结华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60 年代印尼排华浪潮中，身份显露，面临险境，抛弃祖祖辈辈百年建立的事业，匆忙逃离印尼，回归中国。张念遗为中国献出一切。作为他的长孙，回顾在中国十九年的经历，我深感中国部分基层干部以怨报德，严重违反并对抗周恩来 1957 年制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八字方针。

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的低层干部，还无理没收中国驻印尼领事馆发给我们归侨学生的纯属个人身份证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没收他们认为“反动”而我们认为伟大的苏东中学毕业证书，没收他们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而我们认为是高级的苏东中学英文课本《English Essays》。

我们还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如此说来，那么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世世代代，以别国为家乡，岂不是更加叛国？叛国到底何意？难道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都必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从外交上来看，这种荒谬言论与指责，已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这些低层干部，不学无术，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领导，至高无上，胡作非为，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信誉，伤害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绝大部分各国华人都永远不会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请记住：他们是别国公民，他们为别国奋斗，他们决心世世代代忠于他们自己所属的国家。完全或部分带有汉族血统的各国华人(在东南亚称为华族)，只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

属历史传下的一个民族，只此而已。我们，1957 年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刚刚从海外到达中国的侨生，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是对我们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权利的侮辱与攻击，是无理剥夺外国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权，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亲情伦理、家庭团圆的破坏与践踏。

此外，有一些归侨学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恋爱，被跟踪监督，严厉批判，罪名是与反革命家属来往。在当时毫无法制的情况下，这些同学根本没有根据事实申辩的余地。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属？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属？我们海外华人热爱华夏大地，珍惜中华民族情感，怀念祖辈的家乡和祖先长眠之地。但是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心中的民族细胞被那些蛮横无理的中国干部敲打成亿万碎片。

梅桑榆先生来信：近日有朋友转来国标编的《黑五类忆旧》电子版第一期，甚好！我也是黑五类子女，希望以后能直接发来此刊的电子版或邮寄印刷版。

蛇湾血案　　张介山

邓保民，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邓保民爱读书，特别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文革一来，三家村挨批，邓保民成为县粮食局的小邓拓，被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当农民。

1968 年夏末，从东安县刮来黑杀风，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邓家突然冲进来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干部们认定他具备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

——出身地主，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又被政府开除回来。民兵用棕箩索拧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绑的邓保民。当时正是 7 月底，邓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认，民兵便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还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坠，重量加大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只好违心承认参加了黑杀队。

1968 年 8 月 4 日，蛇湾大队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那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马刀。他把马刀斜靠在监房墙壁上，双手去开邓保民的镣铐。邓料定此次批斗有去无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丢到蛇湾水库喂鱼。与其如此，不如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决心下定，等民兵打开镣铐的一刹那，邓立即跨前一步，抢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的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

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溪水太浅，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很快乱刀砍死。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不要散伙，到邓保民家里算帐。

此时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经得到丈夫杀人的消息。她决定与四个儿女在家坐等追杀的人来。唐桂姣听到叫喊，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

母亲被刺死，孩子们被吓懵。大女儿邓爱华年长几岁，流着热泪，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

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面对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还有人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有人举起马刀，咔嚓一声，砍下这个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殷红的血柱喷出几尺远。

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得像筛糠。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眼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间禾场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尸体，45岁

大女儿邓爱华的尸体，18岁

小女儿邓立华的尸体，9岁

大儿子邓超雄的尸体，17岁

小儿子邓少雄的尸体，7岁

邓保民一家被杀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个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尸体怎么办？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家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过不了两天就会臭气熏天，再说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提议丢到那边山上的岩洞里，既不用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这是一个好主意。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很快被打扫一光。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

求采取紧急措施。虽然有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该队仍然又追杀一人，另有一人自杀。

县支左办负责人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于是杀人风席卷全县，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县区周边邻近各县，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是 47 军某部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寺检查国防线路时发现问题严重，挺身而出，与该区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等磋商，立即召开区、社、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喝止杀人风，不知邵阳县及其邻近各地会乱杀成什么样子，又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

探母记　　从维熙

尽管我的父亲死在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妻子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波及到母亲和儿子是必然的。

终于盼到一个休息日，我决定从团河农场回城探个虚实。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抄家了吗？”“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 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 1966 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 7 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呆呆地望着苦命

的母亲，泪水立刻盈满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我继续宽慰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给她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总不会送我回乡吧？"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地对她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我说："在茶淀有个带着儿女进来的，还是个北大的助教。""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直到凌晨 3 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儿子小众的去向问题。其间，母亲不断打开手电筒看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四邻。

大约到了 4 点钟，母亲催我立刻回场。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

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

补白：邻人崔某，妻齐氏，真正贫农。崔某早逝，齐氏与五子相依为命。解放前，五个儿子从没穿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饱饭。大儿子崔元福，自幼讨饭，后经人介绍，到上海拉黄包车，勉强生活。同事阿毛，盐城人氏，二人相处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车，小有积蓄，娶妻阚氏，颇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钱一百，说是急用，元福许之。不多日，公安上门，将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潜伏特务，所借元福之钱，用于购买纸张，张贴反革

命标语。元福资助特务，罪大恶极，本应逮捕，因其出身贫苦，定为反革命分子，驱逐出沪，回乡务农，接受监督。其妻不堪凌辱，抛夫弃子，远嫁他乡。三儿子元寿，四七年参军，四八年参加苏中战役，作战勇敢，光荣牺牲，乡人集会祭奠。齐氏为烈属，每年享受抚恤。元福回乡后，齐氏又为反革命家属。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上午召开烈军属会议，齐氏要参加；下午召开五类分子家属会议，齐氏也要参加。若同一时间开会，齐氏则无所适从，乡人戏称她为“双料家属”。

海　安

乱世恩仇　　胡喜盈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在当地也算是条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来，浊浪滔滔，宽达数里，真有点“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模样。平时水并不深，只有村南庙山嘴湾常年水深数丈，黑幽幽的。

1947 年下半年，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自训斥下，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胶东区党委，为了立功赎罪，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斗地主恶霸。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打击面逐步扩大，开始乱打乱杀。许多村子的批斗会台子两侧都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着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达指标，杀不够数要受罚。

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也属于右倾一类，只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家中男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之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妇孺倦缩在家，不敢出门。

来点火的工作组进村后，先组织起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

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弹孔），就比毛主席小不点儿”，趁势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的老婆。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婆，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

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被反绑双手）。这时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一团团血晕。她们终于不再打转，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这一顿杀，我们的村子终于不再右倾，阶级斗争也终于带上血腥味。从此以后，拉锯式的冤冤相报、互相复仇开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国军支持下组织还乡团，疯狂报复。很快解放军又收复了我村。除了逃到台湾的，其余的全部被捉拿回乡，就地正法，连拉铁锨的（当初跟着还乡团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也没放过。唯有一个还乡团老古被饶了一命，是个例外。

老古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里。他的老婆自然难逃一劫，也被杀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妻子被杀，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一看不是对手，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说也凑巧，此时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只知道跪炕上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怒吼：“拉出去！”在旁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生下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愣住了。过了许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出去。

解放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只是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后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而且老婆居然还是个老党员。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老古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党员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后，两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家庭参加。可是对于这样一名具有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的老婆，连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参加。

村子里的一位老雇农说："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全让那帮整天找穷根、拔穷根的人（工作队）给弄乱了——拔出人命来了，能不乱吗？"

上海邵纯先生来信：邮箱中见到《黑五类忆旧》，正在一篇篇细读。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黑五类并不能包括毛时代所有的贱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也都是贱民。

四清运动前，就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四清运动中，许多单位都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本人 1949 年那一年只有 9 岁。原籍老家是贫农，父亲因病死于 1952 年，母亲是个小学教师，长兄 1944 年参加新四军。本人 15 岁当童工，16 岁入团，20 岁提干、入党，26 岁从天津市支边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个小老左，对毛和党绝无二心。我离开天津市建筑仪器厂两三个月之后，该厂四清开始。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工作队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将大量的所谓揭发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学院实习工厂被揪出，时年 27 岁。从 1966 年 10 月到 1971 年 4 月，我被批斗、抄家、游街、刑讯、请罪了 220 多次，关押 7 个月，4 次从死亡的边缘上侥幸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实在太荒唐，比如说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苏修。

1971 年 4 月我被军宣队解放，当工人。我曾把这段经历写成《乌

鲁木齐往事》一文，不久前电传给辛子陵先生了。我是从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三中全会后官运亨通至正厅级，又因查处基建中的腐败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法院受贿，我以惨败被调到另一个单位任闲职。当我看出这个社会的病根时，已到退休之年了。

四类分子的命运与挣扎　　李若建

四类分子的命运之一：被歧视与被改造。

从土改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个乡村，土改时制定 10 条管制地主的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圳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9、不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

让四类分子佩带某种侮辱性的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

1965 年规定，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在农村中，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实做的工分要被扣去 3%，上缴大队。1957 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分子，只准

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因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 300 余人。

一般情况下，四类分子要做公益性的无偿劳动，比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1964 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也执行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 7-10 元，近郊区、镇为 6-9 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 5-7 元，近郊区、镇每人为 4-5 元。

四类分子言谈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 年 1 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结果此人被吊打逼供，制造出一个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 36 个，成员 1359 人，涉及两省 5 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 32 人，预谋杀害未遂的 18 人。

据保守的估计，在 70 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 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歧视。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70 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 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 年对贵州省 18 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 19.1%，台江县由原来的 27%上升到 43% 。延吉县 1976 年 4 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 31%。

文革后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四类分子的命运之二：被驱逐。

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的现象。文革前，局部地区也有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

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的普遍做法。

1958 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被赶出上海，造成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 年 10 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 1789 人被迁于粤北山区。1960 年 11 月，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的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 273 户，1541 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 年仍在那里的 131 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 142 户，810 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1963 年新疆发生过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

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 8.5 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市 1969 年 7 月统计全市有 4.2 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 1.6 万人，随遣家属 2.6 万人。据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命运之三：肉体上被消灭。

在早期的土改过程中，东北、华北和华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整个土改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 348 人中，地主 247 人，富农 42 人。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 7337 户，其中地主富农 424 户，土改后有 8214 户，其中地主富农 272 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 152 户，相当于土改前的 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说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 103 人，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即使在 1949 年后比较温和的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类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

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 950 人，其中地主 570 人(有的一家 7 口全部自杀)，富农 108 人。

在文革当中，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杀。这种屠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江西、陕西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杀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类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有的四类分子被残杀后，尸体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斗会。

文革期间，湖南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 3576 人，占 39．33％；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占 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 人，占 11．54％；其他成分者 411 人，占 24．20％。被杀者中，未成年人 826 人，最大年龄的 78 岁，最小的仅 10 天，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有的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报复，因此在屠杀中采取令人发指的株连，连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革中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株连只是一种历史的延续。1948 年密云县镇压反革命，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杀死的事情。

挣扎之一：与成分好的人家通婚。

在血统论的阴影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改变命运，一些四类分子家庭采取与成分好的人家联姻的方式，期望借此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连累配偶，同时对方也未必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四类分子家庭通婚。有调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愿意娶成分高的人为妻，肯定是对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如貌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他们还是优先选择与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当的人。

一些与四类分子联姻的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与四类分子通婚

的问题引起中共高层注意，曾经下文件指导如何应对。1964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中规定：“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文革前有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位富农的前妻结婚，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支部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并且要在党籍与妻子之间做选择。这位书记选择要妻子，结果失去党籍。四川某县法院院长，因其岳父 1957 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说成认敌作父，认敌为友，终被判刑，并被迫与妻子离婚。其妻被定为拉垮共产党干部的坏分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与四类分子通婚的人惨遭杀戮。1967 年 10 月，广西全州县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 76 人。地主出身的刘某，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不被允许，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 3 岁，小的 1 岁)跳山洞而死。

挣扎之二：外流或外逃。

四类分子离开居住地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早在 1951 年中共中央就规定：地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不得改名换姓，不得改变成分籍贯。虽然有风险，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类分子选择逃跑。1979 年各地在给四类分子摘帽时，发现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还很大。江苏邳县四类分子 9603 人，外流 501 人。山东省安丘县给 4863 名四类分子摘帽，给错划错戴 502 人纠正，另有 487 人因长期外流，无法处理。山东省诸城县，20.79%的四类分子外流与外逃。黑龙江省嫩江县经过历次运动，全县共有受管制分子 4016 人，外流的 796 名，占 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临被捉的危险，因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时均要

审查政治面貌。一般情况下，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抓捕后会受到惩罚。福建省由于经济生活困难，一部分四类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厅部署各地公安机将其追回。1960 年追回 4816 人，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批评教育、管制或逮捕处理。

编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类分子家庭还有另一个摆脱命运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爷（父亲的舅舅）家是地主，三个表叔个个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伙，可就是找不上媳妇。最后，二表叔被送人，娶了媳妇，三表叔转亲转个媳妇，大表叔在摘帽之后三四十岁才找上媳妇。

补白：1976 年春，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没想到，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打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鸽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区和朱衣公社机关就设在五湘大队，无需传播，领导就知道了。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敢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昌国的言行当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批判的对象由老邓变成了小邓。

邓昌国的话虽然反动，但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再没有人发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军工厂。邓昌国刚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区公安特派员不知为什么发善心，只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没将他逮捕法办。但是，他永远失去了进厂当工人的机会。　　　　　　　陈宗培

土地阴谋　　李　肃

据官方文件，土改从 1950 年冬开始到 1953 年结束，将近 3 亿的无地农民获得了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粮食。

1950 年土改时，中共本已控制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和平土改。但是毛泽东们坚决反对这种方式，主张通过组织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夺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们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比例，1948 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 8%，农民总人口的 10%”，然后要各地按这个比例制造敌人。以当时 3 亿农民参加土改计，制造出的阶级敌人有 900 万人。

土改工作队普遍鼓励农民打地主，甚至亲自上阵打人。苏南 2742 个乡，有 200 多个乡发生乱斗乱打，218 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剥光衣服。新华社记者穆青写于 1950 年 6 月 2 日的《内部参考》中记载，河南土改，一个多月发生逼死人命案 40 余起，兰封县瓜营区 20 天里逼死 7 人。1953 年春，广东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杀。当时广东流行一个口号：“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据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杀死了 200 万地主分子，另有估计可能多达 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这样农民就只能跟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让农民有一种感恩思想，觉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毛泽东曾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通过杀地主、富农，基层老百姓都处在恐惧和紧张之中，就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对立面，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如此一来，它的基

层政权就巩固了。杀人立威，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

除了杀人，还有重组阶级队伍。他要制造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翻到上层，把原来处于上层的人压到下层。这也是它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后为什么又搞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出于政治权谋。当初毛泽东说，将来我们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个承诺，对农民，特别是对贫苦农民，非常有号召力。如果他当初说，将来他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收归国有，恐怕农民谁也不跟他闹革命了。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划分阶级，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地主和富农。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土改时，中国农民欢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直到今天，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征地、拆迁，随便制定土地价格和补偿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政府予取予与，农民无话可讲，无可奈何。

我家的地主分子　　吕　维

祖父的大名叫吕吉，从小没念过一天书，属于彻头彻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从小体格健壮，很有蛮力，又不怕吃苦，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放牛、拉动轱辘、打坷垃、割草，甚至锄地，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样样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岁以后，祖父便开始参加大田里的锄地和收割等劳作。我家祖上属于世代农耕人家，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祖父的十几个同辈兄弟，个个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虽然识几个字，也仅仅是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简单地记些账目。

十五岁时，爷爷已经长得成年人那么高，粗胳膊壮腿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岁那年，和奶奶结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亲。随后兄弟俩分家，他分得一头牛和三十多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世世代代小农的梦想。可是爷爷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发家。

他的发家本领主要就是吃苦耐劳。自我记事起，爷爷从来没有午休过，吃饭很少坐着，总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饭扒拉完就走。锄谷子，在当地，连锄带间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锄一亩多一点，爷爷却要锄到二亩半。这个效率靠什么？靠早出晚归！每年早早锄完自己地里的庄稼，就出去揽工，给别人家锄，挣几个现钱，然后攒起来。到了冬天，大多数人呆在家里不出门，他却天天一早起来，挎着箩筐，提着粪叉，急匆匆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忙着拾粪。

节俭是爷爷发家的另一个主要手段。爷爷节俭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小时候，每逢奶奶和我讲起爷爷的事，总是把他称为抠心鬼。他很少穿过像样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如果奶奶主动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会大发脾气，久久不穿。家里吃的也大多是粗粮，常年不见腥荤。种的香瓜、西瓜之类，从来不让孩子们随便到地里去摘。他给家里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数拉到城里去卖，然后把卖掉的钱交给奶奶积攒起来，到一定数目，再买几亩地。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时，他拥有的土地居然已过百亩。农忙时，开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长工，常住我家，和爷爷、父亲一起干活。

土改时，上级给我们村下达了八个地主富农指标，爷爷荣幸地跨入前八强，被划成富农。不久又将他关起来，要他交出积蓄的银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块。工作组不信，几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个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里的一位亲戚家中。不久被人发现，村里派民兵将他抓回。为防备再次逃跑，每晚将他仰面朝天绑在一张八仙桌上，继续向他索要银元。后来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说他力气大，自己挣脱了，也有人怀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为这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短工，关系甚好。再次逃跑后，爷爷一直躲在阳方口一带，曾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秘密潜回家中，巧妙避开看守人员，刨走一小罐银元作为盘缠。那时，他根本不打算远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风头过去，靠手头这点积蓄，再重振家业。他离不开土地啊！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组甚为震怒，将成分再次提升一级。于是，尔后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栏，便永远被定格在“地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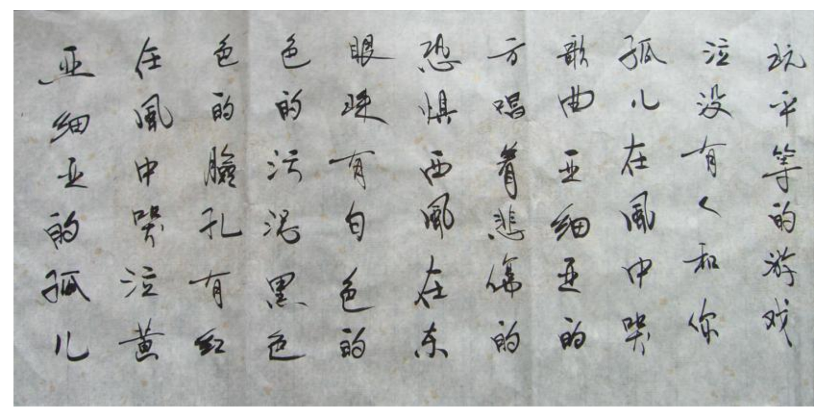
土改后，爷爷失去了房屋、土地、粮食，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被迫无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谋生。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进入我村前八强，给全家带来的那个恶魔般的称号——地主。从此以后，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缠住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且越缠越紧。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爷爷小三岁。嫁给爷爷的时候，身体甚为虚弱，经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只有带病劳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时节，丈夫在地里忙着，场面上的活儿大都落在她身上。我们家乡，家家户户以谷子和高粱为主。拉回场面上的庄稼，都是一捆一捆连秸杆带穗子的。她凭着一把短镰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来，然后和丈夫一起用连枷打下颗粒。未打净的，她要放簸箕

里揉下来。带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满身尘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还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弟兄四人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于清朝后半期迁到这个村子。他们搬来的时候，当时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拥有五千多亩土地，离村较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父子几个终于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时，曾对两个儿子说：“我给你们打好了根基，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了。千万不要抽洋烟，不要赌博，要正正经经过日子”。

爷爷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劳遗风，夫妻俩同心协力做起了发财致富的美梦。做官为宦的，发财致富往往数年，甚至数月。中国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却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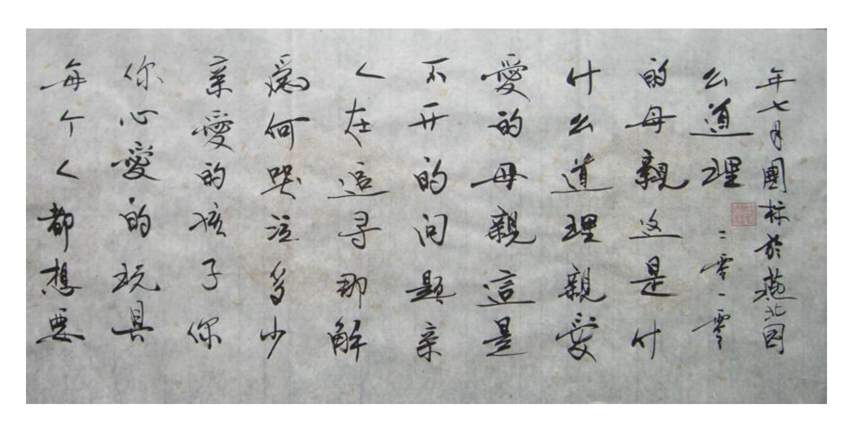


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据说，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受苦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奶奶对爷爷基本是满意的，曾多次对我说起，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未沾染过任何恶习，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是那节俭到吝啬程度的行为，常常令奶奶不满。奶

奶天生好心眼，乐善好施，恰好弥补了丈夫的不足。爷爷固然把钱看得很重，但其诚信度极高，从未拖欠过雇工的工钱，因此村上的人都乐于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这样一年好似一年过着。奶奶进入中年以后，因为有我母亲分担了大量家务，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操劳了，身体竟逐渐健康起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订婚还未出嫁的女儿（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击倒，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有一段时间，奶奶精神错乱，整天说胡话。母亲曾对我讲过，姑姑死去的那两年，奶奶时常一个人坐到村边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风刮过，她便对着喊叫姑姑的名字，声音凄惨。常常母亲费尽周折，多方劝说，几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里。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叫着姑姑的名字，饭菜不思。到土改时，奶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奶奶和爷爷不一样，她对钱财看得很轻，土改被关初期便交代



了所有积蓄。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工作组派人来找我母亲，说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么地方埋着银元。母亲按人家说的地点挖出两小罐银元，工作组随即拿走了。工作组总认为我家还埋着银元，奶奶因此被捆绑吊打过。有一次还烧红了烙铁，动员群众去烙，然而却始终无

人下手，只好作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好人缘。据村里老人们讲，那些年谁家有困难，向她借钱借粮，从未碰过钉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吕成功，曾在村里当过闾长。任职期间，一个姓白的人因偷盗被抓，被送进城里看守所。此人本来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从此，死者的弟弟白汉成，便把所有仇恨都归结在吕成功名下。土改时，白汉成成了积极分子，坚决要求把吕成功处决，并准备将其十六岁的儿子同时置于死地，以便斩草除根。有人将消息透露给吕成功的儿子，这个少年在夜深人静后越狱逃走。处决吕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个名叫白宽的年轻人被一起押出，戴着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几个年轻后生早用绳子将吕成功的双脚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着绕村转了一圈。起初吕成功还不断发出呻吟，拉出村外时，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达二里外的沟边，大家停了下来，将吕脚上的绳子解开，随即把奶奶和白宽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简直吓傻了，吕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条，背上、臀部和后脑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气息。工作组的人厉声喝令奶奶和白宽将吕成功推下沟去。一个女人家多咱见过这样的场面！奶奶双手颤抖着，一点也不听使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工作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们推下！”幸亏有那姓白的年轻人，奶奶帮着总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躯体推了下去。随即，民兵们搬起预先准备好的两车石头，纷纷向下砸去……

当天夜里，奶奶发起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第二天，工作组通知母亲去领人，母亲央求隔壁两位大伯将奶奶抬了回来。几十年后奶奶对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还不住地发抖，说在尔后的几年里，她时常做噩梦，梦见当时的情景，梦醒后浑身发冷，害怕得再也睡不着。

父亲只活了四十岁，死在饥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亲的死，对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卧病在床将近两年。她把父亲的死一股脑儿地怪在爷爷身上。原来，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承担起爷爷交给他的重任。耕地、播种、赶车、送粪、拉炭、应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于青少年时便累下毛病。

微驼的背，瘦小，黑干，从体质上看，明显属于缺乏力气的角色。父亲小时候上了三年私塾，认得一些字。本想继续念下去，怎奈那时爷爷正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强行让他辍学，跟着大人干农活。

爷爷年轻时属于有蛮力的人，庄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统统归他干，却不善犁、耧、耙、耱等与牲畜协同完成的技术性工作。于是，他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一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头，每天收工回来，父亲还得铡草，半夜起来给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纪蛮辛苦的。为此，奶奶常常抱怨爷爷，而爷爷从不理会。他年轻时就是这么辛苦，有啥大惊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吗？再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饭吃！爷爷按照自己的逻辑，严格训练着他的儿子。到十五岁那年，父亲便真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个全面手。

那时，爷爷养着两头牛一辆车。这车和牛给父亲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应差。那时城里住着日伪军，西山上又有游击队，我们村正位于县城和山脉的中间地带。两面都来要粮，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来顺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谁派来的差事敢不办？在这种情形下，父亲便常常赶着车，任由别人指挥着到处奔波。有一次被日伪军征去，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奶奶吓得整日茶饭不进。日本投降后，又开始抓兵，父亲只好躲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为此，爷爷还被民兵痛打一顿。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顶替。那时二叔年仅十五岁。后来从军营逃回，我父亲便带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个工地上给人家背石头。在那里，只给吃饭，不给工钱，还不时被斥骂。终于无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宁。

哥儿俩在集宁先是做工，后来父亲托一位老乡，把二叔送到军营给伙房拉大风箱，他自己则找了个卖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后，父亲回老家接母亲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离家。母亲种的几亩地维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亲就挑起担子做货郎，每天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早出晚归，只吃两顿饭。劳累和饮食不均匀，父亲患上胃疼病。公私合营后，经商被取缔，再回村里当社员时，父亲已经是满身疾病，一脸皱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由于不断看病吃药，到三年灾荒前夕，

所有积蓄花光，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亲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人，土改时年龄都超过十八周岁，同属于地主分子。我们一家三个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么可恶，那么没人性，虐待、打骂、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把许多善良的人逼上绝路。可是另一方面，从小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是那么勤劳，那么节俭，又那么乐善好施。在农村管制那些年，接触到我爷爷的同龄人，也接触到父亲的同龄人，我有时故意把话题引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为人。大家一致公认，爷爷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恳的人，在劳动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奶奶和父亲的口碑更好，谁不说他们是顶好的人！我的年轻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走过来的。

待我成年后，也就是在沈阳读书的那些年，曾经力图和他们划清界线，按照当时的要求，努力读一些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使自己紧跟时代。然而，当我一想到年老的爷爷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刚刚去世的父亲，总是很心酸，对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他们的一生，辛勤劳作，只想把日子过好，该交公粮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少交，该纳税的时候按规定付钱，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们并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对现行政府的勾当。有一次我问爷爷：“土改时，没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吗？”老人很平静地说：“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没收咱一家。”同样，公私合营后，父亲被取缔了小商贩，回村种地时也显得若无其事，说：“人家城里的买卖人都公私合营了，又不是光不让咱干！”他们只知道，公家允许干啥就干啥，不允许干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办法。他们苦苦挣扎着，要活下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从来胆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干部。像这样的顺民，怎么能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呢？

在农村被管制的那几年，我也接触过村里其他的四类分子。被批斗的那一阵，我甚至还接触过其他村里的四类分子。我敢说，这些人都是属于逆来顺受的角色。后来，我被人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

正儿八经地成了“阶级敌人”，并且被称为是他们忠实的孝子贤孙。至此我才明白所谓“阶级敌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个瘸子，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为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　　海　安

愧对宋尔仁　　马　波

文革前同学们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道德律令失灵了。只要他是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检举揭发，不仅不是恶行，反而受到鼓励。告密成为政治觉悟高的表现。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他从不说

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恶名。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我们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说自己的经历，也很少谈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这些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

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 1966 年 7 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一看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等等。好反动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的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浪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 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

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不在人世。据同学说他大约 1968 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 1974 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 年因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特写出此故事，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茅于轼先生来信鼓励：我非常钦佩你的这项工作。我建议不光是黑五类，还有杀关管。如大中电器的王佩英。

巫宁坤的炼狱　　三　妹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燕大刚六个星期，三十岁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了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回到学校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紧下来是三反五反运动。燕大自己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在这里变成反亲

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靠边站，成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无休无止地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交代问题。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许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满嘴党八股，上台批判校长。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做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完校长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反动小集团——十人团。被批的教授、讲师，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究竟有什么错，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都痛心检讨，他也不敢自居另类，便如法炮制，在批判会上痛骂自己，深挖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诸如此类，都引为罪。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英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跳出来，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面，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国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该书封面上画着一只手，指甲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那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从巫教授处借去的。

接下来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必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各自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态度的倨傲无礼令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只见翦嘴里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

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巫宁坤回忆说：“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苦。

紧接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宁坤被发往天津南开大学。

南开将巫宁坤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学习材料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宁坤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此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发言，揭发批判，把巫宁坤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会后，以前经常交往的许多同事都疏远了他。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朴实，天真无邪，使巫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

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好景不长，几个月后，肃反开始了。全校召开动员大会，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一百多名教职员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开暗藏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仪皇帝俄语翻译官的俞姓讲师，被吓得当场昏倒。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了进来。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穷凶极恶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又开了几天批斗巫宁坤的大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巫宁坤在各种场合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都被指控为对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攻击。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宁坤的唯一权利是承认加给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图解释或

澄清事实的努力，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是坚持右派反动立场死不改悔。南开的一位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地揭发巫宁坤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她质问巫：“有没有这回事？”巫答曰：“有过。”她立即怒吼：“用美国的反动口号进行煽动！”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还指控他曾说过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群众吼道：“这是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

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巫宁坤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宁坤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关进半步桥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一个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此后的三年劳动教养，赶上三年大饥荒，苦难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边沿走过。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会死在劳改营。

三年劳改出来后，巫宁坤作为临时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学教书。他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好景总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来了。巫宁坤首当其冲，又被揪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单独下放，妻子带着孩子被下放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家人的苦难才大体画上句话。

巫家苦难的的结束并不等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巫宁坤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回城之后，中共又制造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整肃法轮功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灾难。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法轮功百姓的运动，就像当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宁坤和众多右派一样，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被押走。他

们只因信仰法轮功，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审判，就被非法押送劳改和抓进监狱。而且许多家庭中父母是被双双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学，流浪街头。电刑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也在整肃法轮功运动中普遍出现和使用。无以数计的法轮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

香港北大校友岑超南先生来信鼓励：為民請命，功德無量。

周扒皮的后人　　孟令骞

我在 1990 年 9 月 8 日的《大连日报》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还是当今的时代好》，开头第一段是：“我今年 54 岁。我爷爷周春富是小说《高玉宝》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艺术原型，土改时被镇压。我父亲周长义是周春富的三子。我 1952 年小学毕业考入初中，1957 年到瓦房店水泥厂当工人，1961 年响应党的号召还乡务农，一直到现在。”此文是该报搞的“我爱社会主义征文”中的一篇，由阎店乡一个叫王贵新的宣传干事采访整理。

多年后我辗转找到王贵新，他对十多年前那次采访记忆犹新。阎店乡是《高玉宝》作者高玉宝的家乡。王干事先是找到高玉宝的弟弟高某某，发现这一家人懒地荒，家里又穷又脏，简直无法下脚。王觉得这种人家有悖于征文的主旨，不适合报道。失望之际，他灵机一动：何不写写“周扒皮”的后人？就这样，大舅这个地富子弟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被报道出来。那年，我把这篇文章带回家，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你大舅就能白话。”看得出，她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文中的大舅并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爷家族里最懂政治的人。集体批斗地富反坏右的

时候，大舅举着拳头率先大声喊“打倒阶级敌人”，背后却去找给爷爷家扛过活的一位公社干部，问:“我爷爷真的是那样(半夜学鸡叫)吗？”生产队扒庙时，他鼓捣着堂弟装肚疼，不去扒。可是为公社修水库时，他却挑着大号筐，一遍遍从公社指挥点干部的眼皮子底下热情万丈地走过。大队通知地富分子自带干粮，参加公社不记工分的修桥劳动，他却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要跑去给老爹送饼子咸菜，好趁机换换累得摇摇晃晃的父亲。

富农子弟嫁娶难，可大舅 20 岁就结婚了，而且媳妇很漂亮很能干。大舅在县水泥厂干两年后，私自将自己的名字周有学改成周明绪，寓意紧跟形势明事达理。姥爷非常气氛，爷俩大吵一架。大舅趁热打铁，将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妇所在的大队。迁户的理由响当当——同地富家庭决裂的。公社干部大为肯定。

大舅的大女儿十七八岁时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毕业不久就有媒婆登门。大舅倾向于一位公社干部的跛腿儿子，可是女儿却和村里一个地富后代偷偷好上了。劝说不从，摔杯打碗无效。大舅通过嫁女改变政治命运的交易破产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儿。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儿自杀的遗书。这件事对大舅打击甚大，阴雨天或者晚上更愿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觉，吸烟，喝几口闷酒，没完没了翻看那几本旧书。天长日久，他背后倚靠的土墙被脑袋磕出一个瓢形的浅坑。后来，那个浅坑被一张报纸裱糊上了。那张报纸有张邓小平的照片，大舅说他感谢邓小平。

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大舅这个外来户在那个屯子很快当上生产队长。两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舅更是如鱼得水。他是先知先觉的农民，先是圈地垦荒，和儿子起早贪黑开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凑钱买三轮车搞运输。当年他哈腰流汉种的经济果树，如今儿子已经受益。他的小女儿回忆，那时大舅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晚些，突然听到街上院里哞哞的牛叫声，原来两天没回家的爹从外地赶着一群牛犊子回家了。他要养牛了。

在大连日报刊登《还是当今的时代好》的第二年，刚刚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掳获走了。他一定没活够。

姥爷周长义原来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两个在大饥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母亲在世时每提起这些陈年旧事都忍不住眼圈发红，不知是为他们那命运多舛的爹妈，还是为那两个可怜的早亡弟妹。活下来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岁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骂和白眼中度过的。

关于小舅，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让我和弟弟坐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我们走二十里路去姥爷家。母亲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几岁时小舅去姑姑家，回来时姑妈给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别人给了他一条小狗，他觉得过意不去，竟随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还常常吃不饱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书，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个高贵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层褥子上，最底层下面掖藏个豌豆也能让她感觉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对象难，老舅快到三十岁才找上媳妇。媳妇一只眼睛藏着玻璃花，娶亲那天，村里的许多孩子围着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亲，胆子小，自尊心强，做事瞻前顾后，与姥爷有些相似。我三岁时家里盖房子，垫地基的黄泥都是她在孩子刚满月时一筐筐挑回家夯实的。山上地里农活累的时候，她会回家撕下日历牌上的半页纸，卷上一只旱烟抽几口。有一次她跟我说，在家当闺女时，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姥爷常常让她谈谈白天上山干活或者晚上下田抢工的事情。无非是队长又训了哪些人，工分能评几分，或者政治学习点没点咱家的名，诸如此类。姥爷之所以打听这些，无非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队里表现不好。母亲那时候是十六七岁的小丫头，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讲着讲着就打起了瞌睡。姥爷这时候就把烟袋递过来，让她吸几口提神。她就这样学会了抽烟。

后来我家里生活好些，当村小学教师的父亲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烟时，抽时也会给母亲一支。母亲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干活累了，才把

攒的几根烟卷拿出来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回家时会给她买几条烟，可母亲却说她已经戒掉了，坚决不让花这个钱。只有当时还在上学的三弟，参加工作后依然给母亲买烟，他知道母亲其实还在抽。

大姨年轻时像辣椒一样厉害。村里一位当权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劳动时破天荒地给她这个地主后代派了个轻快活。收工时，四处无人，那人突然淫亵地抱住了她。年轻的大姨身子一挣，嗷地一嗓子，抡起镰刀就向那人砍杀过去。那人吓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后面追，集体的一棵棵庄稼唰唰倒在愤怒的镰刀下。这动人心魄的骇人一幕，秋后竟为姥爷家多赢来半袋子好粮食。我十几岁时，听说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阴阳两界的能力。几年后，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个东西又突然离去，从此她的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

大舅的几个子女大部分在农村务农。我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三女儿。听母亲说，我这个三表姐在大连打工，并嫁在那里。2003 年，在报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电话。

她在大连城郊一个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沟，有山有水有果园，雇几个人在那里养鸡照看果树。她说她想开个鸡汤馆，问我叫“半夜鸡叫”行不行。她觉得，周扒皮的曾孙女开这样一个鸡汤店一定是个不错的卖点。我告诉她工商局不会批，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厉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园转转。

从市中心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一百来亩的沟地藏在山坳里，一派田园乡野风光。各种果树在四周高高低低围合，中间迎面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坡上，依着地势张起三四米高的渔绳网，里面圈养着柴鸡。突然一声哨子响，只见坡上坡下数不清的鸡，欢叫着飞跑过来啄米叨菜，场景煞是壮观。几个雇工在这里忙活，工头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们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开玩笑，先是叫她东家，后来叫她老板，现在叫她领导。这里有一座二层小楼，但三表姐大部分时间住在市里，那里还有个小营生。

三表姐多年来养成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的习惯，对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和绿色生态都有着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为这个山庄的出路着急，因为近几年大连周边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庄，生意一个比一个火。看了电视剧《刘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动脑筋。搞旅游这里还不成熟，开饭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讨能否搞点绿色生态农业。这里养了很多鸡，全是散养，吃虫吃蚂蚱，在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母鸡下的的蛋个个是环保绿色的，能不能也让城里人像热衷到樱桃园采樱桃一样上山来捡鸡蛋？还有，可不可以给所养的不喂激素的猪打耳环做标记，让人来认养。城里的一家人到山沟里认养一头猪，定期来看看，年底来杀绿色年猪岂不快哉？或者在电脑网络上发照片拍购，何如？

三表姐就这样“城乡结合地”生活着。我在她那里获知很多周家后人的信息，她还帮我找到了过去太姥爷家的几张老照片。那年我到沈阳出差，下了火车，突然想起三表姐说过五姥爷周长武的儿子周侠在南站做生意，并告诉我，随意打听一个商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个摊亭询问。那人连说知道知道，并很快在一个本子里翻出周侠的电话。周侠干的是杂货批发，生意有多大无从知晓，但人缘极好是肯定的。他仪表堂堂，为人精明爽快。说起爷爷的往事，他说：“我们不记恨，也不提这个。过去我们家可以说是为特殊教育做贡献了，现在就让我们做自己吧。”

60 多年过去了，阶级斗争已经随着历史的烟尘渐渐模糊。周家的后人们，有的已经远走他乡，有的还生活在原籍。他们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来，今天仍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传说中太姥爷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渐渐被人淡忘，相反，他的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忆起来。2008 年 7 月，《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的一位记者来到黄店村寻访周扒皮。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他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几年的长工：“一年挣 8 石粮食，养活全家。”周家的

老街坊，83 岁的阎振明说："周春富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就知道勤俭、勤俭，然后买地。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会使锄、能扛粮就行。"黄店屯 93 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的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话："不是恶人，不霸道。"

桃曲旧事　　许崇平

我插队的陕北桃曲村，有两户人家，是兄弟俩。弟弟贺廷贵，贫农，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着似笑非笑的脸，家中零乱龌龊。哥哥贺廷云，富农，清瘦精干，透着一股灵气，普普通通的窑洞收拾得窗明几亮。这贺廷云还是村里第一把种地高手，队里仅有的几块可以条播麦子的好地，都是他摇耧播种，长出的麦苗垄又直又匀。弟弟贺廷贵好吃懒做一辈子，哪样农活也提不起来。土改来了，贺廷云因勤劳致富挣了几亩地，被划为富农。弟弟贺廷贵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落个贫农的美名。

贺廷贵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养老送终。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无奈之下，从十里外的丁塬村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当时陕北的习俗，娶媳妇男方必须向女方付彩礼。彩礼大约是四百元左右，听说其中一部分还必须以银元（袁大头）支付。这就是陕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里的姑娘不对外，乡下的姑娘高价卖。付不起彩礼的贫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儿子只好做上门女婿。

贺廷贵的女婿属于后者，家里是富农。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韩。当地风俗，做上门女婿的人要"卖掉"半个姓。比如更令子入赘到贺家后，要改姓贺，后面再保留自己原来的韩姓。这是很丢面子的事。让更令子更伤心的是，结婚后虽然有了两个儿子，但是据说在贺廷贵的调唆下，婆姨和他的关系始终不好，动不动就威胁要离婚。有一次吵闹之后，更令子为了表示对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对家庭的责任，竟然

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这桩婚姻。1974 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陆续离开桃曲村之后，更令子带着婆姨离开了贺廷贵的小院子，住进我们知青曾经住过的窑洞。可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又是一场吵闹之后，丧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挥动了手中的菜刀。他这次不是自残，而是结束了这个让他又恨又爱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从书本、报纸、电影、戏剧中得知贫下中农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会主义。到了农村才知道，其实只有农民这个群体概念才是真实的，哪里有什么贫下中农？哪里有什么地主富农？这些人为划分的农村阶级成分都是无稽之谈。村里一个姓张的贫农老汉，从河南逃荒而来，60 多岁，满口牙掉光后又重新长出一口新牙，刚死了第二任婆姨。村里人都说这老家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边等着上工，说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实，一时兴起，龇着满口参差不齐的新牙，扯着喉咙说："还是单干好呀，现在谁要是能让我单干，我磕一个响头，马上就走！"

更为浪漫离奇的是一个叫史志平的外来户，本是延川县的穷苦人，当年随土改工作队来到桃曲。他一边忙着给桃曲村的人划成分，斗地主富农闹革命，一边忙里偷闲看上一个富农的女儿。富农开始不愿意女儿下嫁，史志平硬是用驳壳枪成就了这门亲事。不过这个人倒也是个情种，不爱革命爱美人，就此解甲归田，在桃曲村落地生根，成年累月守着婆姨，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介绍他的成分了，只记得窑洞里挤满了他和婆姨生养的漂亮后代。

桃曲村人杰地灵，颇有"儒村"风范。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凑出一个戏班子（宣传队），吹拉弹唱，一应俱全。村里有个戏台，晚上在明亮的汽灯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剧《红色娘子军》，周围十几里的村民都来看戏。苦大仇深的吴琼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贺文郁的女儿虎妞。

贺文郁 60 多岁，留着胡子，脑袋总是不停的摆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两个大儿子曾经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双双

被举家遣返回乡务农。兄弟俩虽然平日里低眉顺眼地劳动生活，但言谈举止间还是不同于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戏班里演奏器乐的大腕。虎妞是戏班的台柱子。贺文郁最小的儿子小名俚太，是村里唯一在县城上中学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后不久，生产队在我们借宿的村小学院子里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是贺文郁和他的婆姨。批斗会一开始，先由大队书记马云池郑重其事地传达公社的要求：早请示、晚汇报时拿《毛主席语录》的姿势要像林副主席那样。马云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红书，恭恭敬敬地放在干瘪的肚皮上做示范，看上去还真有几分相像。接着副队长辛全喜就从全国山河一片红讲到农业学大寨，又从农业学大寨讲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听来听去好像贺文郁也做了什么贡献似的。村里人在太阳底下都听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贺文郁在中间摇头晃脑帕金森地站着。他的婆姨则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满了一圈孙儿孙女。大约一个小时后，辛全喜的车轱辘话不知转了多少圈，总算累了，于是队长贺振国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来，拍拍满身的黄土，在孙子孙女簇拥下回家。

贺文郁没走，掏出旱烟袋，朝别人借个火，坐到刚才队长的位子上，悠闲地抽上一袋。村民走过来，走过去，对贺文郁该叫叔的叫叔，该叫爷的叫爷。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战胜了阶级斗争观念。我在桃曲插队三年，印象中只开过这么一次批斗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怀疑就这一次还是为了做样子给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 52 户人家，除了马史范辛兰张各姓各有一户人家外，其余都姓贺，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村落。地处偏远，古风依旧，贺氏家族严格按照辈分取名字，次序井然。当地习俗，隔辈就可以开玩笑，孙子辈可以拿爷爷辈开涮。村里辈分最大的是贺永福兄弟五个的老爹，当时大约 70 多岁，罗圈腿，双手各柱着一个拐杖，走起路来像一条划桨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儿子儿媳）都拿他开玩笑。外姓人可以随便和任何辈分的贺姓人取闹，“问候”他们的亲人，但绝对不可对姓

贺的人说“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们姓贺的公共祖坟。我们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后才知道贺姓的先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暴力土改及其原因　　杨奎松

据 1950 年春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颇为极端，搞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子）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干部权力无边，为所欲为，动辄打骂，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 30 余条。兰封县瓜营区 20 天内接连逼死 7 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一区干部看到有位中农在家装麦子，便怀疑是地主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也动手乱打。有的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农会主任的母亲。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妮，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宋之子回家后愤而自杀。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 10 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陶铸后来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动静弄得太大）。10 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反。11 月，毛又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于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 872 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 17 人。奉贤县

5 个区被斗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打的 13 人，被捆绑的 18 人，被剥光衣服的 80 人，每个人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裤兜里，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 16841 次，乡以上斗争会 13609 次，斗争人数达 28234 人。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几十人，并造成 293 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 1947 年土改过火的教训，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这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 40 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据渭南县九区一市统计，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地主 7 人，普通农民 15 人，富农、小商贩、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 81 人。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 7 个乡斗了 43 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 58 个乡，半数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杀了 96 人。安康县惩治地主 661 人，管制 357 人，自杀 82 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湖北潜

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 413 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 64 户地主，69 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 32.2%。他们还将这几十家所谓的地主（其中多户实为富农）扫地出门，迫使其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财产，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 3 个多月有 37 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 31 人，且多为女性。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 1951 年初的两个月就枪毙了 497 人，141 人（73 男，68 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选择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 562 人，222 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双流县自杀的 141 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 63 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 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全县被划地主多达 3760 户，其中自杀了 261 人（总共自杀 301 人）。荣昌县七区 4 个乡，54 个村，共划地主 663 户，3376 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 村共划中小地主 15 户，打死 15 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怕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当场以头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 96 人（男 39，女 57），当场斗死 16 人（男 9，女 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 66 人（男

42，女 24），加上关押致死的 12 人（男 8，女 4），总共死了 190 人（男 98，女 92）。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 20 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6 天中，打死 6 人，逼死 13 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 5 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 199 人。仅 5—8 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 614 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 755 人自杀。兴梅专区仅 5 月 20 日至 6 月 7 日就逼死 202 人。全省 5—8 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 4000 人左右。东江地区在 1951 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 5698 人，其中地主成分者 2567 人，富农成份者 1047 人，镇压了其中的 3642 人，另有 2690 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生命。

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土改太和平了。经中共中央同意，陶铸等被调到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 1000 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 1952 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 100 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东莞 290 人自杀，230 人是地主成分。仅恩平一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 1039 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 1173 户，2179 人，错捕了 486 户，553 人，被吊打 138 户，278 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 122 户，236 人，错戴帽子 213 户，401 人，并导致 830 人自杀，其中地主达 570 人，富农 108 人，有的全家 7 口全部自杀。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 2 月 3 日至 3 月 6 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 805 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 1165 人。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 17000 人之多。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暴力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与一般人一样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又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縻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那些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的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

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 5 年、富农不剥削满 3 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

中共土改对地主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927 年中共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改变了，因为要发动农民跟随共产党，必须给农民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就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因此，当 1946 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强调其区别的问题。《五四指示》中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947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

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 1947 年 4 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从 1947 年 10 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 1950 年 6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补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笔字，常有大、小队干部请其写标语。老先生来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荣地受到了冲击，在交代了曾传授过孔孟之道，打过学生手心后，也就罢了。不过老先生从此更加小心翼翼，谨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头目要老先生为一改造低产田工地写一标语牌，内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产变高产”。先生欣然为之，小头目在一旁看着。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大意，先生竟写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产变低产”。老先生惊出一身冷汗。小头目说：“没事，我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你重写。”老先生千谢万谢，重写一幅。以后，每逢该小头目想要打牙祭，就对老先生说：“你别怕，那东西我藏着呢。”老先生即称肉打酒，招待一番。

海　安

斗尸记　　尹曙生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影响到四清工作的进行。

当时我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的电话通知，说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要到西宁来了解湟中县批斗尸体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用三天两晚，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

新庄大队共有 1900 多人。大跃进期间，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 500 多人，有 6 户人家死绝（5 户地富，1 户中农），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四清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 7 人。组长仲××，是湟原县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 6 人，其中 3 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 3 位，一位是该公社的路姓秘书，一位是姓方的农林厅干部，一位是驻军部队的沈排长。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唯有支部书记马××被批斗了十几次，始终不认罪。为了锻炼 3 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如果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

可是这 3 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马××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马××被叫来。马辩解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的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

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 年我们大队有 3 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可是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说着狠狠抽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组长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 5 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3 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仲组长想，看来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

1964 年 11 月 19 日，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另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

工作组事先确定了 6 个诉苦社员。已有 3 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 1948 年他才 15 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 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出现这个场面，工作组员一时不知如何办，怕她诉错了苦。他们都看着仲组长，等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吧。"

李秀英说："1960 年 2 月，我家 5 口人饿死 3 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 3 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 2 月 29 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隔着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 20 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离开伙房，去给大队干部上菜，就赶紧溜进去。我看见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

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屄。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哟”一声，终于跪下了。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后来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又故意提告嗓门对马×× 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

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会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批斗马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 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但是尸体该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小路，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仲组长知道那3 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而是找借口拒绝："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 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两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 1 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却找借口不来。工作组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也都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了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一分钟时间将

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尸体。

尸体批斗会原计划开一个小时，4 人发言，每人 15 分钟。可前面两个发言人，每人只用了 5 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尸体，而是对着群众讲话。第三个人上去批判时，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人都摔倒了，尸体还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一声惨叫"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整个会场立即像炸了锅一样，社员群众都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没办法，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极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从当天夜晚起，再没有人敢从批斗尸体的场地经过。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闭户，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 43 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 15 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 年被马步

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解放后，马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 年入党（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他没有历史问题，是当时共产党农村工作的依靠对象。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恶势力。许多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这帮人是中共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群众非常愤恨，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老百姓斗这些农村干部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

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工作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同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可是他们一走上前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是如何打他们的，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许多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该县在四清运动中有 349 名干部自杀，包括 16 名脱产干部。到 1966 年上半年，青海省 13 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 1700 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 45 人。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 1963 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 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虽

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 200 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粑。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刀都没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

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队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在 300 多名工作队员中，有 7 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还有一位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导致胃扩张，又未得及时治疗，被撑死。

补白：1969 年冬和平公社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彭学良发表演说：“我们不但要抓面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县就藏有国民党的特务。昨晚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台湾播出的消息，我们奉节两派武斗的事台湾就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我们这里有国民党特务在给他们提供情报……”

彭学良的演说还没发表完，下面就响起了呼喊声：“彭学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动员会立即变成了斗争会。

文革初，奉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喊的口号是“保卫革委会”，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号是“砸烂伪革委”，称“砸派”。两派势不两立。彭学良系砸派头目，被整下台的保派当然不甘心。这次抓到了彭学良的尾巴，自然不会松手，对其狠批狠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区公安特派员原属保派，听到报告后说，彭学良不仅偷听敌台，更严重的是当众扩散敌人宣传内容，实属现行反革命罪犯，主张扭送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但彭学良得到县里掌权的砸派朋友保护，只给以撤职交群众批斗了事。但他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　　陈宗培

五字勾魂　　杨　杰

王绪祥是我的同学。小学时我们同在保山县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学时我们同在保山一中，他 86 班，我 87 班。绪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号，劳动课上一个顶仨。他还一直是学习标兵，成绩优异。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打着灯笼也难找。老师们都很器重他，同学们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绪祥的父亲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资本家。1966 年夏，血统论的狂风迅速从北京吹到边地保山。王绪祥的入团理想破灭了，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身份也没他的份，红五类同学还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仅连见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资本家”爷爷，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好处，凭什么要为爷爷背黑锅还债？他想向尊敬的老师诉说委曲，可这时老师们也都面临着被批斗的局面，个个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们校园里有个储水池。那几天工人在水池边堆了一堆石灰，准备粉刷墙壁。心情极为苦闷的王绪祥吃完饭之后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围没人，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边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个字，然后离去。

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标，并迅速报告了校领导。公安机关来人侦破，让每个师生、工友都书写了“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关进监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劳改。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说王绪祥病死狱中。

倪柝声的绝笔　　颂　恩

倪柝声牧师，福州人，1903 年 11 月 4 日生。倪柝声与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和宋尚节博士同属对现代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倪师母张品惠姊妹是我的姨婆，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师的贤内助。公公倪柝声牧师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非人折辱。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定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昼夜拷打审问。我们在外面只听到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 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

那期间，她的几副眼镜被打碎，多次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

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站立数小时之久。红卫兵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怒不可遏，分别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决地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们的身上头上，说："带着你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

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时，老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家中所有的《圣经》、赞美诗都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藏起来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一次被定罪。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柜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这本小小的《圣经》对我实在太珍贵了。

婆婆被勒令每天早晚两次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更甚。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祷，始终靠主站立，没有羞辱主的名。

1970 年当我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婆婆每天都为我祈祷。临别上海前，婆婆流著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在插队期间，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

公公倪柝声牧师 1952 年被捕前，曾去香港为教会办事。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坚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
1967 年，15 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人间的自由，在

狱中 15 年之后，甘心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声明自己从未放弃信仰，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当中。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风去世。自发病至去世，仅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自己长时间受苦。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们不敢马上告诉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公公。婆婆的去世使公公万分痛心，他的同房间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身体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入狱前公公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 20 年，他们夫妇俩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恶名，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对他最了解，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 年 6 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们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到 40 里外的农场医院。这 40 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最忌震动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

临去世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的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喜欢迎接。”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殉道者一样。他们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激励我们更加忠心向主。

在青草地上　　梁惠珍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 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 22 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实的经历。

在试炼开始的时候，我心中满是疑虑烦躁，一直和神讲理：“主啊！我丈夫为着你而被捕，这八口人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我担不起啊！”我越觉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担子就越重，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前途一片漆黑。感谢主！他竟对我这刚硬的人说话了，我听见主微小的声音：“这事是出于我。”这句话一直进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着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说：“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既出于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个人不羞辱你的名。”从此，我的心紧贴着主，主的手紧拉着我，那些重担却

彷佛已不在我身上了。在 22 年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各样患难和严峻考验，更经历了主奇妙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

丈夫被逮走以后，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怕受牵连，主内弟兄姊妹也回避我，不敢和我来往。我带着六个孩子，大的 17 岁，小的只有 6 岁，和年老的婆婆一同迁到别处住。那时我没有工作，生活没有来源，家里的粮食如基立溪的水一样，过了些日子就干了。有一天晚上，米面都没有了，婆婆准备第二天去女儿家躲避饥荒，我呢，就默默祷告说："主啊！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若赐给我们，我们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里的热水吧！"我刚一出口，主的话就立刻临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听了主的话，我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并有说不出的喜乐，安然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钟六点，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太太。她问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说"正是"。她说："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处才知道你们搬家了。"说着，她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我问她贵姓，她回说："不告诉你，这是圣灵叫我做的，感谢神就行了。"

她走后，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钱。我的眼泪立刻流了出来：主啊！感谢你。你知道我的难处，你背负我的重担，你不误事。在那时候，五十元钱是一笔大数目。婆婆不用上女儿家去了，我买了玉米面、煤球等生活用品，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了。我亲身体验到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难使我与主越来越亲密了。人虽远离我，主却亲近我。每次祷告，都觉得是与主面对面交通。我把需要对主说，主为我成就的超过我所求所想。后来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赚八角钱，可就是出满勤，一个月不过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饭穿衣，还要供应孩子们学习，这点钱怎么够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种奇妙的方法使我一无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将尽的时候，主供应了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

起头。我不能一一细说，在这里只提几件事。

小四念高中，后来转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计算尺。这件东西孩子念书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挣八角钱，一家人吃饭尚且不够，哪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我就祷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发生了，家门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二十元钱。天气转冷了，小六没有棉鞋，我又为这事祷告，下班回来又看见门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爱何等奇妙！主恩何等丰富！在我急需的时候，感动不知姓名的肢体，补足我的缺乏。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代号寄钱给我。我接到了钱按原地址回信道谢，结果信都加上“无此人”的字样退了回来。这是主叫他们做的，使我不感谢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谢仰望独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即将释放的数月前，有个女孩子拿着包袱来到我家，问明我的姓名就说：“我妈叫我把这包东西给你,大包是寄给你先生的，中包给需要的人，小包是为你生活预备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我妈不让我告诉你。”在我认识的人中，张、赵两家有这么大的女孩，就问她：“你姓张？”“不是。”“姓赵？”回答也不是。她转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来了。打开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奶粉，中包是二十本圣经，小包有二十元钱。当时，正在我家干活的木匠亲眼看见这事,也听见了我跟女孩子的对话,深受感动地说：“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真诚友好，送了这么多东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稣行吗？”我说：“行，行。”于是就传福音给他听，教他认罪悔改，又送给他一本圣经。

我的工作在建筑部门，按说我这个弱女子真无法胜任。我一找到这份工作就祷告主，求主帮助。开始，领导们还是友善的，我只干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选到办公室做财物和仓库工作。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我样样干得好，领导和群众都满意。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开始，满屋满墙的大字报写着：“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在

办公室担任主要工作，应当下放她到第一线劳动改造。”我就迫切祷告，紧紧靠主，求主加给我力量，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过了不几日，政工组找我谈话了：“办公室不需要这么多人，要你下去充实第一线，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领导分派我干什么都乐意。”工地是流动的，一个地方干十天半月或两个月，就要转移到别处去干。我先是用小车推砖，自装自卸有定额。每趟推一百五十块，每块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钟推一趟。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干过的。继而筛沙子，也有定额。遇上湿沙子就困难了，筛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里不出活。又推石子，这种活更难，我的汗水淌下来就象洗淋浴一般，围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拧就出水。感谢加给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胜任，而且在各项工作上都超额完成任务。最艰难的一次是在严冬腊月，修建游泳池的围墙。我们需在冰上作业，勾抹墙缝，定额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冻得直哭，有的人脚冻得站立不住，坐在冰上流眼泪，无法完成任务。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着祷告，虽然寒冷却能忍受得住，不但完成任务而且超额，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体会到：“主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种压力不只限于肉体，而是身、心、灵一起绞榨的痛苦。单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属，就冷眼看我，甚至白眼向我。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远离我，甚至走个面对面，竟以脊背朝着我，正如圣经所说：“他们不拿我当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许多活动不准我参加，会议不许我发言，连我劳动得来的奖品也不发给我。有一次，全组被评为区先进单位并发了奖。领奖之日，全组十九人排着队上台领奖，及至发到我跟前却越而不发。人总是人，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热，心中便祷告：“主啊！赐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要，只要我的名字记在你那里就够了。”

不但我的权利被剥夺，就连孩子们也受连累。小三毕业分配在城里，他的同学都从居委会得到通知，去各自的单位报到，惟独我家小

三没有接到通知。我带孩子到学校查问，答案是："他父亲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结果被分配去西北。

除了我和孩子们受的一般压力之外，我个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压力。我遭围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个人的小组，扬言不把我扳过来誓不罢休。每次围攻，他们都是气势汹汹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摇头说："你这老迷信，坐在反动板凳上跟无产阶级对抗。"又问我："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天上能给你掉馅饼吗？"他们软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吸收你入党。"我回答说："信耶稣是我心里的需要，并不与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们一听，火气就冒上来了，一齐起来朝着我嚷，真如同许多公牛围绕我，好象吼叫的狮子向我张口。我就闭眼祷告，再也不开口讲话。

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强迫我与丈夫离婚，天天轮班来逼我，要我表明与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始终不说话，只以摇头作答。后来他们说："信仰是你心里的事，离婚不离婚是你自己决定，可是你亲手所做的事是无法推脱的。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我们掌握了你贪污的确实材料，你要明白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争取人民宽大处理。"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啊！当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圣经》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主给了我力量，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贪污过。"

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跺着脚气急败坏地说："你每个月挣这么点工资养活八口人，若不贪污，从哪里来的钱？"我仍旧低头闭眼不作答。他们又说："你是死鱼不张嘴，休想蒙混过关"，"你脸皮真厚，不交代问题却闭眼睡觉"。感谢主，他赐我意外的平安，任凭他们争闹吼叫，谋算虚妄的事，一齐起来攻击我，我的心却紧贴在主怀里，蒙主保守。他们如此折磨我半年多，并没有从我身上找着什么把柄，就以"问题没有完，先挂起来搞别人"作台阶下了台。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见过一张笑脸，都是横眉竖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个比我年轻的领导喜眉笑脸地叫我说："你没

有问题了，还要继续革命，检举揭发别人啊！”我说：“我自己没有贪污我知道，别人有没有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乱说。”

运动过去之后，顶头上司要我复职，对我说：“我们经过屡次多方的内查外调，正如你自己所说，你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上决定仍叫你管理原来的事务。”我说：“还是请别人吧，我不管经济的事了。”他说：“运动中的事件你不必记念，你看，某某某真的贪污了，某某某被下放了，我们请你复职是相信你的。”我满心赞美，满口欢呼称颂我们永活的主，公义的神，他为我伸冤辨屈。

丈夫被判无期徒刑时，我才三十多岁。单位上有人为我介绍对象，说：“他既不能回来，你还背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干什么！”还有不少男人想方设法对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来到我家。他们所用的方法无非是撒但引诱夏娃用过的伎俩，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名利地位。有的送给贵重的衣料、华丽的头巾，有的送钱，还有人替我写好离婚证，应许我用一间小破房换一单元楼，并说和他结婚，我挣的工资全归我养育孩子，等等。弟兄姊妹们！这种考验是严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恶毒的。一个带着六个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虽有父亲却如孤儿，妻子虽有丈夫却象寡妇，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脚下任意蹂躏，充满了苦难。只要在引诱下一点头，离婚书上一签字，马上就能改变地位，抬高身价，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又能满足肉体的欲望。但是爱我的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他的灵在我心中加给我力量，使我不背叛与亚当的约。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主面前立了约，许了愿：“无论是福是苦，我都跟从他到底。”对于这些试探诱惑，靠着主我都一一拒绝、一一得胜了。

有一天晚上，我给孩子缝补完衣服，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刚躺下睡觉就有人来敲门，又喊我的名字，声音像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姓王的男人。这么晚来叫门，绝没有正经事。我默默祷告主，不理睬他。他连敲带叫约三十分钟之久，终因我不应声而作罢。第二天在办公室里，他一直看着我却不说话，我也装着没那么回事。不久，他病了，打发

一个工人来找我替他统计账目，我又拒绝。以后这人死了。

1979年我退休了，回顾过来的岁月，我深深经历了主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许多像我这样遭遇的人，由于心中没有主，连惊带怕，加上冤屈艰难，有的成了疯子，迄今仍住疯人院，有的病瘫在床，还有的自杀。至于我，“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我丈夫被捕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才6岁，到他1979年回来时，我们的六个孩子都已结婚了，并且各自有了孩子。现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们也因着主的恩典，工作学习都很好。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会主任动员我再出来工作，我都拒绝了。我要将余年完全献给主，为主而活。我既蒙主这么大的恩，受弟兄姊妹那么多的爱，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传扬主的大救恩呢！

补白：老师蒋某，为人坦荡，记忆超强，知天文，晓地理，热心公益。文革前，带领学生在校园劳动，把南瓜田里蓖麻拔去数株。当时谁也没在意，只有一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年某默记在心。文革中，蒋某曾去信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索要邮票，被定为里通外国，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开批判会时，已是某公社文教助理的年某慷慨激昂，说蒋妄图毁我长城，破坏人民军队。罪名何来？众人不解。年某阐述得有理有据，演绎得天衣无缝。蓖麻可以榨油，蓖麻油是飞机上用的润滑油，拔去了蓖麻，就没有了蓖麻籽，没有了蓖麻子，就没有了蓖麻油，我们空军的飞机就飞不上天或在中途停机，这不是妄图毁我长城又是什么？众皆愕然。　　　　海　安

胡锦涛请客　　佚　名

50 元，两桌酒席，江苏泰县饭店，1978 年，这算得上是很大的排场了。这是当年在青海任副处级干部的胡锦涛，返回故乡安葬父亲时，特意摆下的宴席，希望该县领导高抬贵手，为亡父平反。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祖籍安徽绩溪。清朝末年，祖上迁到江苏泰县上坝，以卖茶叶为生。胡静之继承祖业。胡锦涛的母亲李文瑞，泰县白米镇胡家店村人。公私合营时，胡记茶叶店难逃厄运，胡静之本人成为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文革中，胡得罪了当地的造反派，被扣上贪污盗窃、坏分子的罪名，惨遭迫害，先后被批斗关押，身体垮了下来。文革结束后，年仅 50 多岁的胡静之，含恨离世。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胡锦涛从几千里外的青海赶回故乡泰县奔丧。他们父子情深。锦涛 7 岁丧母，父亲一直没有再娶，而将 3 个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处抚养成人。父亲下葬前，胡锦涛找到当时泰县县长陆某及供销社领导，请求为亡父平反。当时有人劝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两桌酒，请请县里的领导。

然而，宴席从中午摆到下午 3 点，都没有一个领导露面。3 点多之后，才有一名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来，说县里和供销社的领导今天一直在开会，只能派他一人前来，算是跟胡锦涛涛打个招呼。胡和亲友坐在饭桌旁，面对两大桌酒席，无可奈何。最后，胡将该饭店所有人员，包括厨房师傅、跑堂的、洗碗的，叫到一起，请他们帮忙，把这两桌高档酒菜消费掉。父亲新丧，遭此冷遇，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故乡泰州从此成为胡锦涛的伤心地。至今三十多年，他再也没有踏过泰州的土地。胡锦涛本生于泰州，但他今天甚至不认泰州是自己的故乡。政治因素导致的世态炎凉，令人不堪回首。

编者曰：这是网上一篇佚名文章，姑且就此空议几句。如果怕回乡扰民，三十多年不回乡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于对乡人的记恨，则大可不必。耶稣说，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你连自己的乡人都不饶恕，如何可望藏人饶恕当年头戴钢盔提兵上街（拉萨

街头）的你？耶稣还说，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若无饶恕，谁能走出恩怨轮回？若不走出恩怨轮回，谁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故乡是一个客观现实，不是一个凭个人意志或负气可以改变的东西。中国官媒每年报道诺贝尔奖，介绍和平奖时总要漏掉达赖喇嘛，介绍文学奖时必定回避高行健，想来与胡不认泰州故乡属于同一性质。世态炎凉是极权的伴生物，只有埋葬这个制度，才可能结束世态炎凉。过去我每次回老家，乡亲就到我家闲聊。可自从因讨伐中宣部惹事之后，乡人知道我"倒霉"了，我再回家，几乎不再有乡亲登门。胡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炎"得烫手，可是只要不趁着一朝权在手去结束这个丑陋的制度，你或你的后人迟早必有再尝那份彻骨之"凉"之日。莫恨乡人，但恨制度。"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如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愿上帝感动胡主席！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你是篱上一根条　　焦国标

编了三期《黑五类忆旧》，过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当比例的故

事是运动一来，儿女与父亲划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离婚。界限划了，婚离了，而倒霉依旧。所谓文明礼仪之邦，人伦在哪里？亲情在哪里？真个如圣经《传道书》所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妇一家，却是这虚空中难得一见的实在。

袁相忱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北京家庭教会最有影响力的牧者和主的仆人。因与王明道等教会带领人拒绝加入三自会，1958 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袁有 6 个孩子，其时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 6 岁。系狱 21 年又 8 个月，1979 年底获假释时，已是儿孙满堂。

父亲被抓，正读中学的长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会没有任何理由乱抓人。他含着眼泪，看遍全城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一个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无助。一周之后，老师告诉他，他的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起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一家八口，全凭袁相忱服侍教会获得生活来源。父亲一走，家里生活来源断绝，福音安慰母亲：“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次子袁福声 1965 年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想见父亲一面。因不是接见时间，监狱（右安门北京第一监狱）领导不同意，但福声不肯走，反复申说：“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袁相忱走进接见室时，看见儿子，很是意外。半个小时的会见中，父子手握着手交谈。父亲问儿子：“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儿子说：“有。”父亲又问：“还会不会唱诗？”儿子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父子这一别，再见已是 14 年以后。

袁相忱近 22 年的牢狱人生，有 14 年是在东北度过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的四子袁福乐，1973 年冬有一次到东北出差的机会。他冒着零下 30 度的严寒，拎着大包小包，多次辗转，到黑龙江呼兰革志监狱去探望已 11 年未曾见面的父亲。父亲被抓走时他才 11 岁。

不仅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如此顺服，嫁得的女婿和娶来的儿媳也都很孝敬这个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 年，袁相忱已在狱中 6 年，大女儿袁安湖结婚了。女婿对梁惠珍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带着丈夫到北京监狱探望父亲，令父亲大为安慰。在袁相忱获释前夕，老二福声的媳妇甚至有一天晚上梦见公爹从监狱回来了。

袁相忱获释从东北乘火车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强大的接站阵容，计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声、长女袁安湖夫妇。晚上 10 点的火车，8 点他们就去守候了，可最终竟没接着。午夜过后，4 人还没回家，袁相忱已照着信中的地址先于接站的摸回位于白塔寺的新家。当 4 人失望地（以为又出了什么变故）回到家时，袁相忱正在用福声媳妇端来的热水洗脚呢。

当初袁相忱被捕时，梁惠珍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娘家人。他们很多人还不信主，她怕他们因此更加远离神。丈夫被捕将满一年的时候，弟弟来京出差，顺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没见回来。弟弟感觉不对。“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绕开话题，弟弟问了三次，才说：“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别告诉妈妈，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弟弟边说边掏出钱，交给姐姐：“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亲外甥，我不怕受连累。姐夫不在，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此后，弟弟按月都给姐姐寄钱来。每年从年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带着孩子在娘家过年，直到 1974 年母亲去世。

中国谚语云：“篱笆不扎紧，野狗钻得进。”篱笆是由一根根枝条编成的，在政治变成咬人

世界人权宣言金句

焦国标书

————————

的野狗时，人人都应该当好自己那根枝条。然而无数人在该做枝条抵御政治野狗的时候，却如鬼撵着似的从篱上飞逃，放弃了枝条的职责。结果，家庭和个人都门户洞开，失去藩篱，野狗如入无人之境。更有甚者，自愿化为野狗，反身扑向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为枝条的职分，抵挡住了野狗的攻击，一如圣保罗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那公义的冠冕必为我存留。”

目　　录

达夫不达　　周　舵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

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

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

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

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补白：兰州有位女士，两岁时父亲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死在戈壁荒漠。母亲与父亲离婚改嫁。她多次打电话给我，想通过夹边沟幸存者了解生父的情况，好去给父亲磕个头烧个纸。每当清明时节，家家户户祭扫先人墓地，她的这种思念更为强烈。在电话里听她声泪俱下的诉说，我心痛欲裂。毛泽东时代的罪恶，至今仍然遗祸无数家庭。她说她的继父虽是工人，可由于生父的关系，当年她仍然被看成狗崽子。如今夹边沟的真相还被保密，无处可查，我无法告知这位女士她父亲到底死在何方，埋在哪里，只能仰望苍天，面对戈壁，祈求夹边沟那些游魂野鬼：给你们的家人托个梦吧！

赵　旭

补白：我父亲是黄埔军校 17 期，因爷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怀着国难家仇而投笔从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对日战役中，父亲负伤。解放后，父亲因参加国军而无数次挨整，接受劳动改造，至今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现在二老爹娘都年届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谢上帝给我家的恩典。抗战六十

周年时，父亲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们这一代国民党将士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给他们颁发一枚抗日勋章。我曾到当地民政和新闻机构联络此事，均无结果，甚至联系新华社也无下文。看到欧美国家对他们阵亡将士和老兵的供奉和体恤，我真的无语。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
网　友

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沈云彪

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是抗战期间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系。抗战结束后，父亲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著名的东北劳动模范王崇伦、孟泰等，就是经他报道走红的。母亲一直是新华社记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几年前，新华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母亲的名字被列入该社五十年来的优秀女记者群。

1953 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了一年监狱。不久平反，还补发了工资。父亲颇念党的好，补发的工资也不要了，全交成党费，以与党妈妈的好匹配。1957 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这次党与他就没有那么缠绵悱恻了。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个孩子（夫妻离婚，孩子跟母亲，还改了姓，现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于此），也把 41 岁的年轻生命赔了进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才十岁多，现在仍然记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这很是不祥。1958 年，离了婚的母亲从新华社东北分社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不久孩子们也随她到了北京。独自留在东北的父亲祸不单行，害了绝症，病危时（1961 年）向他的组

织请求：一、念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不要让他带着右派帽子死去，请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见家属一面。组织把话传到北京，母亲与我商量："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学，学习这么紧张，你妹妹年纪小，我又跟他离了婚，离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属了，再说我去可能政治影响也不太好。"母亲说了半天，我听出来了，只能我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一，在清华附中，坐火车从北京到了东北沈阳。父亲详细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心情很压抑很郁闷，妈经常发脾气，训这个训那个，对我的训斥最厉害，甚至比他在家里时的脾气更大。父亲说："你妈一直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一个月后，父亲离世。父亲走时我送的终，至今想起来很惭愧。父亲临终前，我对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除了个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对右派的阶级仇恨。父亲当时卧床，有癌肿和褥疮，屁股底下垫了一个气垫子。气垫子经常被压扁，父亲让我给他吹起来，而我觉得恶心，不愿做。有时让我帮他翻身，我也假装听不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残忍！

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一趟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并把骨灰盒连同个人物品带回北京。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单元房里。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张，母亲和两个妹妹睡一张。我家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三口，因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母亲和妹妹们睡觉的大床下。

父亲是 5 月 1 号去世的。大约是 6、7 月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找我说，父亲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我说这事好办，扔了不就行了嘛。当时我说得干脆利落，连想都没想。母亲说这合适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个反革命的骨灰！这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处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块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铲子，来到了玉渊潭。我家住在离玉渊潭不远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那时玉渊潭还属于荒郊野外，没什么人影。可那天很怪，总不时有人路过。可能是做贼心虚，我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

所以越怕见人越嫌人多，在那里转悠了一圈也没找到下手挖坑的机会。当天就没埋成。

第二天决定换个地方。坐 37 路公交车（现在的 337 路），往北京西边走。当时 37 路是京西最远的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觉得已经很荒凉了，又沿着一条油漆路继续往里走一阵。四处静寂无声，满山都是蝈蝈叫。我窥探一圈儿，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然后就用小铲子挖坑。记得是在一个卧牛石旁边。觉得挖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把骨灰盒埋进去，就听见远处有卡车驶来的声音。我很紧张，便惊慌失措地把盒子放进去，胡乱埋了。这时卡车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

当时我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也许有一天可能来寻父亲的骨灰盒。往回走时，路过一片又是坟地又是葡萄园的地方。走到那里，我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一开始是小声哭，后来越哭声越大，反正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那么惨。现在想来，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亲，而是传统孝道与党文化教育的大义灭亲之间的冲突，让只有十来岁的我无法承受。今天自己就这么把亲生父亲的遗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坏事。

父亲的骨灰盒是处理掉了，可它并没有走出我这个亲手将父亲骨灰盒丢弃的儿子的心。父亲的骨灰盒犹如一片永远停泊在我心头的阴云，又如一块永生不死的酵母，长久地在我心中发酵。它影响着我对母亲的看法和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以后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婚姻观和政治观。

哥哥和妹妹们从来也没提起过父亲骨灰盒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漠然。后来我想过去寻找，但已记不清在哪里了，现在更是早就是高楼大厦了。有一次与母亲谈起父亲，母亲说，如果还有来世，她还愿意做王坪的妻子。我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妈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亲争论时事。每当我发政治牢骚时，她总是很

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亲（被政治抛弃）的老路。她说右派与非右派之间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母亲晚年时，每次我去看望她，她会时不时挑一些话题来引蛇出洞，比如说六四不镇压不行之类的话。通常刚开始时我总是隐忍着，但她说到一定程度，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就绷不住了，甚至会骂骂咧咧地朝母亲吼："共产党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现在你还护着它！"

有时我也能对母亲当初的种种做法表示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也就 30 多岁，还是一个少妇，对前夫的骨灰盒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何况与丈夫离婚本来就是政治强加给她的痛苦选择，相当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动气的时候，我多半知道退让一步，忙说："妈，到点了，我该回去了。"然后扬长而去，战火就这样戛然而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收场的。多年来我一直都这么维持着与母亲的关系。哥哥和妹妹们从来跟母亲没有这种冲突。我和母亲之间建立的这种行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话说是"这俩人都有病！"

亲手扔掉父亲骨灰盒的我，此时已经把吞噬了父亲生命的政治制度视为自己家庭不幸遭际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我不愿自己的母亲到晚年还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我希望母亲以孔子的向往为自己的向往，终生追求真理，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因而我与母亲争论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老人家有个觉醒的晚年，认识到是几十年的罪恶政治把无数中国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决心要转变母亲。母亲原来与李锐并不一个交往圈子。为了改变她，我把她带进了李老的交际圈。有一次给李锐过生日，方实（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曾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在宴会上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还有更多人不知不觉。李老就属于先知先觉，我们属于后知后觉。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听了特过瘾，觉得这话就好像冲我妈说的。我母亲就属于不知不觉那一类。

我虽然时常跟母亲争执，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亲说体己话的孩子。我们可以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我甚至曾帮母亲出主意结交异性朋友。

那时母亲每次与某个叔叔或伯伯约会之后，总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我就告诉母亲，现在是两头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们老一辈也需要。你们都是成人，无论什么关系，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向我们解释纯洁不纯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母亲的性启蒙老师。母亲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还有许多追慕者。六四枪杀学生，夏衍绝食抗议，家人劝说无效，他的儿女曾找我妈去劝说他恢复进食。母亲与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属于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识。

父母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母亲与上海市民主党派副市长金仲华的关系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华社食堂，有人问我这是谁的孩子，另有人就说，是沈平的老二，并说沈平就要跟金仲华结婚了。此时民主人士对当初跟共产党合作反蒋已大呼上当，可是母亲在政治上实际是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层，还要催金仲华入党。姨妈后来说，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本来就不稀罕入党，再加当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处于紧张状态，二人的关系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广东省政协主席左洪涛与母亲是地下党时期的老相识、老领导。我们称他左伯伯。母亲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时她才十几岁，左三十来岁，至今记得当年左洪涛的胡子扎她的感受。我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嫁给他呗。左洪涛和母亲商量结婚，当时除了我，哥哥和妹妹们都反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母亲陪左洪涛到我自己的家门口敲门。他这次到北京，是参加十几大或中顾委的什么会，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夸我说只有我是个好孩子。

母亲最终没有辜负我拯救她的苦心。母亲晚年时，我经常拿些资料给她看，我俩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了。母亲在临死前两个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当时家里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声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妈今天要口出惊人之语，她要退出共产党。”记得当时母亲还加了一句，说还没想好是信佛还是信基督。这说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经崩溃了。

不久，母亲在医院里正式归主。告别母亲遗体时，我到得比较晚，看见她身上已盖上党旗，我非常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来。母亲已经

宣告退党了，盖党旗是对母亲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许多人在场，也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当时哥哥是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两个妹妹，一个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一个在农业部系统工作。

离婚后虽然不乏惦记者和追求者，但母亲五十年来一直未再婚。辞世前，她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四个儿女遵嘱执行。她也没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许这样才与丈夫的人生结局相匹配；或者，也许这样才对得起被自己抛弃的丈夫；或者，独身半个世纪的她，不愿身后的墓碑继续独身；或者，借此向儿女们表达当初与他们慈爱的父亲离婚的歉意；或者，也许是早年接受的无私无我政治说教的最后一次呈现。

我虽然对母亲当初提出与父亲离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对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提出离婚的做法是坚决否定的。我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婚姻。这影响了我对配偶的要求。当初我与妻子恋爱时是女追男，当我答应接受她的爱时，她激动得宣告："这个世界，我第一忠于党，第二忠于你！"我不答应。我要她必须把顺序颠倒过来。她遵从了这个在那时看来完全反动的胆大妄为的要求，对我发誓：第一忠于我，第二忠于党。

我甚至与一位同样有着父亲尸骨无存经历的女士保持过几年的婚外恋。在大学读书期间，有一天收到哥哥的来信，说组织上要给父亲平反，问家人是否需要经济补偿。家里说不用，只要给平反就可以了。问是否需要开追悼会，也说不用，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说，母亲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我。当时我在教室，呜咽着，不敢放声大哭。多年后，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此事，我仍然无法平静。凭什么要平反！为什么不要补偿！为什么不让开追悼会！本来我活得好好的，现在告诉我那一切都搞错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还了一辈子债，结果却发现那项链是假的。

我说得很激动，泪流满面，旁边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来。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亲因

持守信仰被投入监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腿都累弯了。听着她的述说，我心中生出怜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揽在怀里抱了起来。那些年，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每到清明，就结伴去八宝山附近的老山上，找个僻静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亲。我们假定自己的父亲就在那里。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年，因为当时彼此都有家庭，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虽被打成右派，可我并不认为父亲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种先知先觉的右派。至今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跟匣子（收音机）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歌曲的情形，情绪无比激昂。父亲反右挨整，说是因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看过他的档案，并没有具体的攻击言行记录。很多右派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心是比较清晰的，可是父亲好像对反右斗争到死也不明白。从他写给母亲的信来看，好像他觉得自己还是有错的。信中写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紧改造，尽快回到革命队伍，我们还要成为夫妻之类的话。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了然。父亲当年的老朋友们说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整。后来听人说，幕后人物可能是他的领导、《东北日报》主编殷山。殷是从延安来的，资格最老，惟独党龄没有我父亲长，便借反右整他。现在想来，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对待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父亲大约就是毛所谓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的对象。

早年的家庭经历影响了我和我哥哥的择偶观。那时候，干部家庭两代人之间缺乏普通工人农民家里的那种温情。当学生时，每年春游，工人家庭的孩子带的都是自家烙的馅饼、葱花饼之类，干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带的都是面包、汽水之类。我们似乎觉得他们的馅饼更好吃，而他们觉得我们的面包更好吃。我们就换着吃，彼此都很开心。工人家庭的同学到我们家，往往就是到食堂买几个菜，他们觉得香极了，而我们到他们家时，往往是他们的妈妈在蜂窝煤炉子上炒两个菜，也

觉得特别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那种家庭气氛。孩子大人们围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母亲工作特别忙，基本就没给我们做过饭，也没做过什么家务，我家的家务都落在我们四个孩子身上。做家务我们都有一套，特别是我哥哥，做饭、针线活之类，都会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将来找什么样的老婆，哥哥说一定找个会做饭做家务的，老老实实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干部子弟、大家闺秀或我妈这样的。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愿。我们哥儿俩基本如愿吧，我的嫂子没多少文化，贤妻良母型的。我妻子虽有文化，也是很老实的那种女人，我就喜欢她那个老实劲儿。

丢弃父亲骨灰盒时我 10 岁多一点，今年我已经 64 岁了。年轻时就一心只当一颗螺丝钉，如今更不指望个人能成就什么了，只希望能为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自由，尽一份绵薄之力。凡批毛、讲述中共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热心购买，收罗，阅读，拷贝，送人，常常自己贴钱散发。解体独裁专制实际上已成为曾被这个制度洗脑涮肠灌狼奶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和自觉的责任。

补白：文革期间，父亲作为黑五类子女在劫难逃。挂牌子批斗，光牌子就几十斤重，再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罚跪、绳吊、挨打是家常便饭。后来我们问父亲挨过多少次批斗，他说太多了，记不清了。我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晚上被红卫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换衣服时，我们看见父亲身上被打、被叮咬得体无完肤。妈妈哭了，我们小孩子也扑进妈妈怀里哭，哭得那样伤心。可是爸爸却没有哭，换上衣服，拿起农具，又去上工了。从此，只要有红卫兵来叫爸爸，我们就心惊肉跳。只要他夜不归来，我们就彻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无罪无错，您是一个知书达礼，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阳

父亲贺子祯　　贺承业

父亲贺汉祥，字子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生，阆中县崇实中学首届毕业生，土改时被划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抄写的人认为这个成分太长了，索性简写成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分就铁下来了。父亲一生善于经商，处事中庸，清贫廉洁，和气待人，热心公益，好管闲事，乐于助人。早年参加过四川省公民训练班，先后兼任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1956 年公私合营后，在阆中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

1953 年我考进西南师大数学系。大约 1955 年，从家信中得知，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我往家写信，宣告与父亲断决关系，划清界线。关押不久，父亲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营业员，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管制，过着另册的生活，直到 1970 年病逝。他在副食店从无假日，难得回家。实际上也没家，子女们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有时抽空回来看一眼，多半是给母亲带回他省下的舍不得吃的凉面之类，吃口冷饭就走。家里大事小事，没他开口的份儿。子女见他也从不理他，比路人还不如。他的三儿子结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讲政治，这是咱中国人祖传的传统。

1967 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工商业兼地主”的户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户口本，去组建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什么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上“工商业兼地主”。我多次写信询问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的做法，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这封信转给了当地派出所，片警蒲光华把我叫

去，所长马洪青回应说：“都是这样填写的。在没有新办法出来之前，只好按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分了。”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家庭成分一栏印成‘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长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老家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了我追究这个问题，对我大为不满。原来此前他们早已瞒着我，偷偷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复为原来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继承着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的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1971 年秋，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那时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坚持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母亲无法，只好去请来有表亲关系的中医肖忠辅。肖医生诊脉后，叫准备后事，父亲就这样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彻底解脱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和丧葬礼仪，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哭出声来。我和四弟到烟酒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装棺入殓，抬到蚕种场后面的无主公地上埋了。

父亲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亲亲眼看见父亲在副食店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脸上带着带酱的指印，继续无怨无言地抬着甜面酱。除了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

受了这一切。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

补白：哥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文革初就以小学生的身份混入 只有中学生才能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在他的倡导下，红卫兵总部居然成立了小学分部，并同意他自荐当部长。我因字写得工整，虽读小学四五年纪，也被他拉进去当上了分部的宣传部长。我们白天上街抢传单，黑夜回来刻蜡版、推油印机，第二天到繁华街区撒传单。虽然上面写的狗屁内容根本不懂，但我们好歹也算轰轰烈烈风光过。不久父亲倒台，我们都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一下子成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崽子。哥哥岂能甘心？在他带领下，我和弟弟开始硬干蛮干，用不断的斗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喊我们黑崽子并且嘴硬，兄弟便大打出手。虽然有时打不过人家，鼻青脸肿衣服稀烂地回来，或者被人家告到家中还要挨父亲的打，可我们还是屡败屡战，愈战愈勇。慢慢的，我们用拳头赢得了尊重，欺负我们的人渐渐少了，过去的一些对头也向我们示好。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又成了首批玩刀棍之类冷兵器的人，随时带着刀子准备打架。有一次从墙上跳下来落地时，弟弟别在腰带上的刀子插入腹中，肚皮翻开的口子像一张红红的嘴。我们既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到医疗所去包扎缝针，还要坚持每天上学，最后居然也没有感染，自然长好了，真是奇迹。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父亲被打翻在地的情况下，依靠好勇斗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我看来千真万确，入心入脑。老 文

破产地主　　凤　子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又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因而我深深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骄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县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种单间式的，厕所公用，厨房在走廊。当时我们家住两间房，几个小孩和外婆住一间，父母住另外一间，并且两间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带几个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间玩，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抄写纸时，发现一张父亲填写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栏竟赫然填着“破产地主”四字。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翻看那张表格，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要佯装镇定，尽量不让小朋友发现我心中的波动。我再也没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样。

此后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恍惚，眼前一直晃动着“破产地主”几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学校每次填表，我怎么会要你填‘职工’呢！”“那爸爸还有奶奶是不是剥削了贫下中农？”“没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破产了，要不怎么叫破产地主呢！你爸爸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岁就被送去当学徒，冬天连鞋都没有穿的，他的脚上至今还有小时候冻伤时留下的疤痕哩！”“是吗？”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说啊，人家问你家庭出身你就说是职工，记住啊！”家庭出身从此变成了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长们在一起谈起爸爸的出身时，一致认为这事很荒唐。既然破产了，怎么还能算地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据说那时我奶奶在他们那个村子里特别引人注目，在给他们家划成分时，那些负责划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划成破产地主。结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响，奶奶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贫下中农却不许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须呆在农村老家！

补白：我父亲（黄万里，黄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华附小的一个同学就立即给我起外号叫小右派。对于一个 10 多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1958 年的六一，我们班要选两个小朋友到景山公园参加全市少先队员优秀代表会议，我被选上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我二哥 1960 年考上大学不被录取，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一年大饥荒，共产党让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们谈谈心里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错误，无论受什么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时已经饿死很多人，共产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软了一点。1961 年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1961 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等到我 1965 年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把我考大学的事告诉共产党派来的那个专门做我父亲的工作的人。结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录取。黄肖路

北京金虹先生来信：

這是沉重的歷史，也是我們經歷過的時代。我們中的那些幸運者虽未嘗狗崽子之苦，也至少目睹了一些同學朋友們是如何變成狗崽子的。記下這些往事，我希望不是仇恨入心要發芽，而是我們要反省，杜絶這樣的歷史重演。

岳父的家世　　骆　驼

这次国庆去女朋友的家乡贵阳，某天晚上与未来的岳父一起看电视，老人聊起了他家的历史。颇有意思，故记录之。

1949 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溃败，岳父的父亲（黄埔军校出身）在湖南带领一个团开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阳的大地主，家中有 75 公顷田地。岳父的祖父寻思，共产党来了，很可能要遭殃，于是与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儿媳（岳父的母亲）和孙子、孙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条细软，一起去贵阳投奔岳父的父亲。那时还没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后出生的。

他们在贵阳约定，一旦大陆失势，大家就分头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顺利到了香港。两人在香港逗留数月，还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亲一家。实在没有反馈消息，他们就去了台湾。实际上岳父的父亲的部队在广西被共产党俘虏，压根儿就没有逃到香港的机会。共产党问他是愿意加入解放军，还是要回家，他说要去贵阳与家人相聚。他赶到贵阳，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后就定居贵阳。

岳父的父亲有文化，进贵阳市商业局工作，任科长。三反五反时，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为地主典型弄回去枪毙。幸亏岳父的父亲当时已在贵阳市颇有关系，找到公安局的人说：“我乃带领队伍起义投诚的团长，怎可将我父亲枪毙！”经多方走动，终于没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当地农民或村干部的迫害或杀害。整个家族在河南已经凋零，土地也收归国有。

岳父的父亲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辈三人，皆是共产党员。他的大姐、大哥，靠着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机关或工厂当着不小的干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参军加入特工部队，政审时，情报部门的人对他说：“你有两个亲戚在台湾，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亲，特别开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台湾同胞探亲潮，岳父的伯父与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寻亲，循着老家提供的线索又找到贵阳。40 年睽违，一开始岳父的母亲都不敢相认，害怕是特务，问了很多家里的情况后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骂共产党几个小时。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儿，文革时村干部想侮辱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他的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口号喊得不对，被枪毙了。此后，岳父的大伯没再回过大陆。倒是其舅舅，每隔几年都回来一次。

补白：父亲成了黑五类，我们就成了黑崽子，所受歧视和侮辱是那个年龄难以承受的。原来整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开始回避我们，在学校也总是被同学指指点点。孩子们之间有了矛盾难免争吵，现在不管谁对谁错，只须人家关键时刻骂一声黑崽子，我们立刻就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以免人家骂出更难以招架的话来。

黑崽子成了握在人家手里的“短儿”，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觉得低人一等，根本没有资格和人家较真儿。有时，那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专门挑衅地问：“我们斗争你爸，你难道不生气吗？”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屈辱，但知道这是套儿，为了不惹事，也只得按父亲教的话乖乖回答：“谁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斗争他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老实，我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好转，父亲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每次政治运动揪斗各类坏人时，父亲都作为新形势下的坏人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挨整。　　老　文

父亲的一次粗疏　　刘斌夫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

有一次把 150 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嘉许。

1953 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 150 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 60 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一个单身汉，而且政府实行供给制，有钱也没处花，账目究竟错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问题，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回罗江乡下老家务农。至今父亲臀部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

父亲的父亲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薄田和十余间瓦房，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祖父母，无缘见到他们的模样。土改之后，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好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好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有一卷票据，清点一遍，150 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的工作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响甚好。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 36 岁的大龄青年，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成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补白：父亲读中专时，文革来了，学校停办，学生返乡。两年后学校恢复，通知学生回校办理手续，统一安排工作。此时父亲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全身好几个关节错位，无法安排工作。父亲的那批同学全都安排了工作。现如今，父亲虽然已经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农村，自食其力。　　　网　友

补白：文革时期，一天中午，姐姐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踉踉跄跄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就冲进里屋，反扣上门，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门外哭喊着她。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哭声，哽咽着打开门。

原来，他们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勒令他们低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脚，一边大声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把墨水泼在他们狗崽子身上。唱完歌，红五类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被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疯的狮子，扑上来揪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搡轰出教室。　　　　　　　赵　旭

苦命父亲　　小　雨

今天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样涌来。想写点东西，聊以寄托一个女儿的哀思，刚开了个头，泪水就控制不住，满面流淌。父亲啊！女儿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男的肩挑着担子，手牵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讨，步履艰难。即将临产的妻子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在镇外一个破草棚里住了下来。当天晚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那就是我的父亲。

　　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身体异常虚弱，全靠丈夫讨饭活命，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为了给孩子留条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给镇上一户没有儿子的黄姓人家。黄家已有三个姑娘，刚生下第四胎，又是一个女儿。黄家狠心害了女婴，抱养了我父亲。不料养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养父家的姐姐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满镇里寻奶给他吃。后来，每当姑姑向我们提起往事时总是说："你父亲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长大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十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离家，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那时候部队里识字的人不多，父亲很快升为军需上士。抗战爆发，父亲随部队奉命守卫黄河大桥，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同所在部队集体投诚解放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一块炮弹皮飞来，切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拦腰打折了他的枪，却保住了他的命。

全国解放后，正当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着还家美梦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几十万解放军战士换上志愿军服装，跨过鸭绿江，开到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在一次敌后潜伏侦察中，父亲和他的一个战友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用厚厚的积雪把身子整个埋了起来。任务完成后，他们的两条腿和脚严重冻伤，不能行走，爬回营地，受到上级嘉奖，荣立三等功，并送回国内疗伤。由于是重度冻伤，功能不能完全恢复，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并批准复员。

我看过父亲的双腿，那皮肤是乌青色的，上面拧结着疙疙瘩瘩的黑色动脉血管，看上去狰狞可怖。父亲说，他的腿本来是要截掉的，后来把牺牲的战友的皮肤剥下来植上才保住。儿时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每到冬天，气温稍有下降，父亲就要用火烤腿。一边烤一边揉，不然就痛得难受。父亲很少和别人说起他的事，但我却知道父亲有一个盒子，里边装着各种样式的勋章。小时侯只觉得好玩，长大后才知

道那都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

在父亲的履历表中，当初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原因，填的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被抓去的。父亲曾悄悄告诉我，其实他是自愿的。然而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父亲却告诉我，他其实是很不志愿的。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内地正在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当了 17 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参加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很庆幸自己没死在战场上。他和很多战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盼着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讨媳妇，过好日子。

1953 年父亲退伍返乡后，政府安排他在商业部门工作，并享受政府的抚血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57 年反右开始，上级要求人人向党交心提意见。会议开了 20 多天，领导们再三鼓动，说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党负责，谁就是积极分子，而且对错不追纠。每天还张榜评比，谁提的多，名字上插红旗；谁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亲是久经磨难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开会时常常闷不做声坐在角落里。会议的最后一天，领导点名让他说话："你是老革命了，你还没提一条呢。"父亲仍没做声。恰巧这时有人写了一条厉害的："刀枪剑戟一片明，一炮轰到北京城，千刀当剐***。"领导说："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条意见，别让你当了落后分子。"就因为这一条，父亲成了右派，公职被开除，市民户口被取消，抚血金被停发，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秉性耿直，说话没遮挡。家乡这个乡村小镇上流传着父亲的两句名言。一句是"谁说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守卫黄河大桥八年，硬是挡着小日本过不来"。另一句是"现在的布料算啥，我们那时发的将军呢，洋油泼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亲这两句话被抖落出来，又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每天下地干活，父亲总是抗着一个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在前边，高大瘦弱的身体弯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里流泪，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辱，回到家里我也不理睬他，从未认真去体会父亲内心的感受，从未尽到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体贴和安慰。其实父亲比我们更难受啊！而今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感到难言的刺

疼。

1979 年父亲被平反了，抚恤金补发了，工作也恢复了，全家都很高兴。但此时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听到消息后，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僵硬着，竟没有一丝笑容。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临走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两顶帽子总算没有带到坟坑里去。”

父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苦难就伴随着他。青年从军，20 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却又当了 26 年的反革命，忍气吞声，受尽欺辱。他曾为人民流过血，到头来却受到“人民”几十年的专政。他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补白：一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制造假象，说他畏罪自杀，并在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该走资派的家人不仅不哭，他的儿子还当场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父亲的尸体，用实际行动划清了与父亲的界限。当年这个走资派与他的儿子一样毫无人性，曾扑到右派分子身上进行撕咬，制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惨剧。　　赵　旭

父亲永远活着　　杨大忠

1923 年 10 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 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 年，17 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 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 50 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 70 公斤木柴，走 10 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 0.5 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

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 10 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 16 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 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 4 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 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 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袄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

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 21 名学生，有 16 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 14 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 年 10 月，74 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 20 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 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 6 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 75 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 54 个月的快乐生命。

2003 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 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我的倡议书　　康国雄

我的父亲康心如是原美丰银行的总经理。抗战时期，重庆成立临时参议会，蒋公介石钦定他为陪都参议会议长。连任两届共八年。1949 年他留在大陆。1950 年 4 月美丰银行被迫停业。1956 年美丰银行投资的 90 多家单位全部公私合营。1957 年父亲被划为右派。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起始于清末，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家、发展直到灭亡，民族资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泪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伟大贡献的一生。可是 1949 年以后，他们却逐渐被变成一个敌对阶级。五十年代，大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谓的“赎买

政策”，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当时全国所有的私有资产被假定为共 22 亿人民币，国家每年按 5%付给他们“定息”，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政府。据说 22 亿这个数字还不到全国实际资产的十分之一。这个“定息”他们仅领了十年（从 1956 年到 1966 年）就被政府废止了。也就是说，他们仅领了这 22 亿的一半。

当年的资本家，现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后，他们在低人一等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或余生。我们这些子孙也在低人一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们父辈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如今淹没无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了，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议我们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应该弘扬父辈或祖辈为这个民族发展所做的贡献，还历史一个公道，也应该为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讨回一个公道。现在我们虽然也老了，但我们仍然有义务让父辈、祖辈的事迹流芳千古！让他们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张！

牛歌王　　许文舟

父亲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后面唱牛歌。父亲十三岁差六个月就学犁田种地了。那时候，爷爷病多，小小年纪的父亲看到别家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而自己家还没有把种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没用，父亲把念了三课的国文课本交给老先生，回家学做起农活儿。

我家的两头大黄牛力大无比，村子里最强悍的男人也拿它们没有办法。第一次下田，两头不听话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会儿钻进别人的玉米林，一会儿在树丛中撒野。十三岁的父亲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里还牵着比他小五岁的妹妹，又要追赶牛，又要照顾妹妹，难为得要死。上犁时，牛不拢扛，村里的人都来围，还是围不过那两头牛。有人建议父亲狠狠抽打它们，用牛鞭迫使它们就

范。可是越打越犟，根本无法让他们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没有犁成地，父亲累成个泥人。晚上喂牛时，父亲发现两头牛的身上伤痕累累，心软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划伤的脚，又摸摸牛身上的伤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头偏过来，看看蹲在他们身后大颗大颗掉泪的父亲，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细细的泪水。第二天，两头让村子里的壮汉们都伤透脑筋的牛，好像改变了。父亲叫它们上扛，它们就乖乖上扛。拉起犁来，不仅舍得出力，而且还顺着犁沟走。父亲高兴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稳了。一天下来，别人犁出三分地，父亲却能犁出半亩。

父亲把犟牛教得服服贴贴的消息传开了，父亲会唱牛歌而且唱得牛与人都流眼泪的消息也传开了。父亲的牛歌其实都是一个调，里面填充的唱词却千变万化。他唱牛的辛苦，唱农事的艰辛，唱家里揭不开锅的苦日子，唱地里的庄稼与山上的爱情。父亲的歌不仅教乖了一头头犟牛，还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贫穷的小屋。父亲的牛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牛歌反映出来。爷爷唱过地方戏，也许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天份吧。父亲吃苦荞，吃野菜，喉咙磁性十足，随便一哼就是歌。

无词的小曲连接着牛和父亲，他们相互依存，生活在澜沧江边那个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唱牛歌也得让生产队长审定内容，否则可能成为反革命。有一次，生产队让父亲到山上看苦荞。到了山上，喉咙痒痒的，父亲想，反正只自己一个人，就随便唱了两首。不料有人听到了，报告给生产队长。这下惨了！队干部上线上岗，说父亲唱黄色歌曲破坏生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里，父亲沉默着，不让在喉咙里发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里家人睡下时，他才在火塘边哼哼，声音极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缝补的母亲能听见。

有一天，住村工作队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父亲牛歌唱得好，找

上门来。父亲急得直跺脚："他妈的！谁到公社告我了？"父亲木呐地坐在工作队长面前，小心听着队长的形势报告。父亲最终听明白了，原来工作队长是想让父亲上省城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献歌。父亲一下放松了许多，毕竟还是顾虑重重。公社派专人来修改歌词，又在曲调上作了一些润色加工。

临出发前总要彩排一下，可是父亲一听到乐器响就慌手脚，一个词儿也唱不出来。他心怀歉意地对公社领导说："我只会自己哼哼，一有乐器吵闹就乱了方寸，还是让我一个人唱吧。"是啊，父亲的听众一向是那个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园，那一生耕耘着红土地的老牛，那与他同样命运的父老乡亲。公社领导答应了，建议上面考虑取销合乐这一环。起程时，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为父亲激动，为父亲鼓劲，为我们一家人能有父亲的优美歌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的牛歌居然在省城获了大奖，给他的奖品是全钢锄头一把，全钢犁头一个。公社书记亲自来到家中表示祝贺，并把公社宣传队的工作机会给了父亲。然而父亲的听众永远是劳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劳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兴致，找到唱歌的感觉。父亲到公社后，最后还是被辞退回来了，因为他怕乐器声，怕普通话，怕凑热闹的锣鼓，一听到这些就失声，无法在公宣队工作。

父亲的牛歌从十三岁唱到六十三岁，从大集体唱到包产到户，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顶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他还是没有停止歌唱，只不过是在心里唱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唱着牛歌心里好自在。"

可是当父亲足足唱满五十年时，一场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唱却唱不出来，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两粒克感敏，以为就没事了。直到感觉喉咙好像卡着异物时，他才用尽力气对母亲说："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妈帮我看看，我喉嗓子里可能卡着一团东西。"母亲听懂了父亲的话，叫父亲张开嘴。母亲惊呆："真是的，嗓子里

有一个大疮！”父亲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农活，才进城来到我家。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带他到县医院检查，竟是喉癌晚期！尽管没有告诉父亲病情，尽管我装得若无其事，但透过满溢在我脸上的忧伤，父亲还是看到了自己为期不远的人生终点。他还是按部就班买他犁地用的犁头，砍伐用的大刀，还用嘴努力地说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愿。

接到母亲的信，我回到家。父亲表面上看还与扶犁下田时一样精神，只是说话再也不能挤出一点点声音。从父亲艰难的嘴形里，我知道父亲不想就这么离开与他一起劳作的耕牛，不想离开听着他牛歌长大的儿女，不想离开他歌唱了一辈子的土地。但是现代医术没有回天之力，我们一家人没能把父亲拉过六十四岁的门槛。

就在父亲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围绕他的墓地位置争论不已。人们说，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转病情，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谈死谈活，还是没能阻止父亲身上癌细胞的脚步。父亲听说我们在谈他的墓地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用颤动不已的手写了一段话：“你们都不要争扯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埋在我学犁田做活的村子边，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粮食地。只要是在我唱过牛歌的地方，我的灵魂都会找到天堂。”

补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一队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竟是我亲爱的爸爸。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天天挨批，“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没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

15 岁的中学生。由于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就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地主分子牌子，弯着腰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谩骂批判。斗争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的一个同桌，而该同桌那时之所以能上学，还多亏那个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资助。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打光棍，40 岁刚过的人背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 60 多岁，每天低着头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　　　赵　旭

父亲被镇反　　　姚治邦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个月内，南汇县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周浦镇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多达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个叫翁必先的人，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家熟悉的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

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张望。我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我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被枪决前竟然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亲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父亲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

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我们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这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母亲哭着对我们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新政权的红色恐怖之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我的小朋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补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里的批斗，便坐车到烟台投奔子女。殊不知儿子正被单位调查出身，不敢收留富农父亲，赶紧将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单位也在调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亲，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头儿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某村干部大模大样走来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要庆祝。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儿女们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这是什么世道！”也没人制止他。　烟台山

补白：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写一笔好字。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他，人们都说

这个姑娘真傻，老师也轮番给该女生做工作。后来那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复转军人，而那位富农的儿子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身穿一件破烂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赵　旭

这样的右派有多少　　曾　微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 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 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 21 年，从 1928 年到 1949 年，是没有真政府的。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1957 年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 年，4 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父亲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一查发现，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会不牵挂上一点。”父亲问“牵挂上”了什么，他们不告诉他，也不给他认定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么父亲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原来，1956 年审干时，父亲顶撞了学校领导。1957 年反右，领导决定报复他，想把他打为极右，

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多次召开批判会，要父亲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父亲看如果不把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招认了，是过不去关的，于是索性心一横，你们说什么我都认下，于是被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领导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还是开除公职，送了劳教。4 年劳教结束，档案里没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继续加害他。1979 年成都商业学校改正他的问题时，又因没有历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据，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这么荒唐！

4 年劳动教养期间，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那时正“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别人偷食堂的红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劳教后，他没有工作，全家 5 口人只靠母亲的 53 元工资。有时出去“打工”，干点儿重体力劳动，收入微乎其微，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 17 年饭。

我们姊弟妹三个，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对儿女施加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殆尽。母亲作了 21 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 4 年，以微薄的工资养家。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 21 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就业是最差的工作，当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父亲补发了 700 元工资。他给我母亲 200 元，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 100 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 5 元钱，余下的 200 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1998 年 4 月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 20 年的安泰（不劳而获）。”改正之后他享受了 20 年的退休待遇。

父亲的情况不是孤例。与他一起劳教的一个人，4 年劳教结束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话剧团有个姓王的演员，也是这种情形。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右派，1979 年改正时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名正言顺地改正，就又把他现打一次右派！

父亲亡地探访　　张曼青

父亲张维良因托派案于 1952 年 12 月 22 日夜全国统一肃托时在重庆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决书上说：40 年代初他曾经是重庆托派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托派中央临时组委会组委。被捕后他先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松山劳改队，1957 年被转往重庆南岸孙家花园监狱，后一直没有音讯。1960 年母亲写信去孙家花园监狱打听，狱方告知去西昌劳改科查询。后经查询，收到短短数字的答复："查张犯维良已于 58 年 3 月 22 日病亡。西昌劳改科。"

父亲为什么由重庆转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们心中一直是个疑团。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我们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实原因和具体情况。改革开放后，托派问题也一直是个禁区。这样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学术界对陈独秀有了一个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也有所松动，我们才有可能去弄清这个问题。

2006 年 10 月 9 日，我与哥哥张曼平由重庆启程，经成都到西昌，去了解父亲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点多，火车到达西昌。刘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区大门口等我们。1958 年刘叔叔离渝时我见过他一面，虽几十年没见，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十分亲切。刘叔叔四十年代与我父亲在一起工作，后同因托派案于 1952 年 12 月被捕，判刑 5 年，在重庆服刑，1957 年刑满后在西昌劳改科所属的一个监狱工厂就业。

第二天由刘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当时西昌劳改局的领导,他本人从小在劳改局家属区长大)带我们到了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监狱管理局（过去的西昌劳改科），找到他过去的邻居，现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李晓曦女士。李女士已经 50 多岁了，她告诉我们，那里只有当时监狱劳改人员的简略档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何地转来、转来时间、关押地点和备注等栏目），类似花名册，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张维良的资料。

在档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个名册，按姓氏排序。从张姓关押人员中找到了父亲张维良的名字，栏目所记内容与上述西昌劳改科回信所写内容大致相同，即 1958 年 3 月 22 日病死。档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 1957 年 9 月 25 日转押西昌的，关押地为会理县通安铜矿劳改队。

通安铜矿离会理县城 100 多里，距西昌更有 300 多里，交通十分不便，与云南接壤。当地确曾有一个铜矿，至今通安还有个叫铜厂的辖区。1958 年时，那里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无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难逃出。档案上记载，父亲就是在通安铜矿劳改队病逝的。

就名册看来，凡关押在西昌各监狱的人员，不论是政治犯（反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见，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无任何区别，一律监督劳改。父亲当时年已 43 岁，身体不十分好，在那种恶劣气候和劳动强度下，难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命丧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说，文革结束后，常有犯人家属来查找其亲属的下落。“你们为啥不早些来？”如果再晚一二年来，她退了休，这些档案由谁保管就不好说了。她也不是专管这些档案的，只是出于责任心代为保管。我们十分感激她，也庆幸我们来得为时未晚。我们何尝不想早点来查找父亲的档案啊！

我们问李女士现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亲的遗物或安葬地，她说通安铜矿劳改队早已撤消，工作人员都分配到其他地方。当时对犯人死

后的安葬只是挖一个坑，将尸体放进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标记，所以我们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踪迹。我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来我们的寻访也只能到此结束了。此后两天，与刘志超叔叔交谈，他介绍了不少父亲早年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父亲生前不为我们儿女所知的一些事情。这次西昌之行总算没有白来。

补白：父母大约 1961 年结婚。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十分不情愿，因为父亲家是富农。母亲当年 17 岁，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当然可以笑傲父亲家了。但是这桩婚事我外婆做主，母亲一点办法没有。母亲表达反抗的方式就是好几年不跟外婆讲话，甚至有了我姐姐后，也还不搭理外婆。　　　　　　　　　　蛾　子

补白：父亲说，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的理想五花八门，科学家、军人、警察、工人……，应有尽有，就是没有农民。作为富农子弟的父亲，不敢写出自己的真实理想。一旦写出，会被批为痴心妄想，或图谋不轨。村里有个与父亲同龄的黑五类子弟，叫某某龙，被批为妄想登基坐殿，被责令改名为某某改。父亲违心地写下作文，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老师予以表扬，说他不浮躁，不好高骛。

青岛张曼平先生来信：

曼青正是我弟弟。谢谢你把他的那篇文章编入第二期。原名是《生活在托派子女的阴影下》，你尽管修改，只要基本事实是正确的。现在经过俞梅荪兄的不断努力，有了“右二代”的说法。实际上这个右二代是一个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大群体。右派、右倾、中右加起来有 300 余万。托派在册的只有 500 余人，“托二代”群体要小得多。现存的托一代几乎要以个位数计算了。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了几十位托

二代。

父亲替我写作文　　胡　言

我最不怕写作文。然而，有一类作文却让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惧，就是“我的家史”。其实这类题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写作难度。但在文革荒诞的岁月，这类作文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写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 年，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我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种写作模式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那一次寒假作业，老师就布置了命题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结束后，我去学校报到，班主任老师将我拒之门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没有完成。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从我同学口中得知因没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报到。父亲以为我懒惰，要我补写，我没有从命。愤怒的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铁棍向我打来，我只得说我不会写。父亲问我什么题目，我难以启齿，因为这该死的题目将会使我和父亲都陷入一种非常尴尬和耻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亲仍以为我懒惰，继续操起铁棍向我打来。暴力之下，我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题目。父亲听后倒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责骂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父亲铺开纸笔，替我捉刀写了起来。写完后叫我自己誊好，第二天交给老师。

看了父亲写的作文，我心里很不满意，因为文章中只是对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作了流水帐式的介绍，1949 年前的家庭状况则只字不提。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命题作文“政治正确”的要求，可父亲也只能这样写了。我违心地答应了父亲，将文章誊好收进了书包。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将父亲替我写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后，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门外。当时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异常寒冷、孤独。听到从教室里传来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一位中年女老师目睹此景，从我的班主任那里了解情况后，走过来像母亲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对我说："**同学，你就写雷锋叔叔的家史吧！"她还嘱咐我不要耽误了上课，并帮我办了交费和领新课本的手续。办了这些手续，就意谓着报名成功，我终于如释重负地走进了教室。至于那篇该死的作文，我最终还是没写。

当时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实际是那种阴暗年代的阴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学生，故意伤害一个儿童的心灵。那位女老师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举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正义感的。这种勇气和正义感，正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人性的光辉弥足珍贵，令人感动。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位女老师把我搂在怀里的情景，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一阵暖意。

青岛张曼平先生来信

谢谢你把第三期作为父亲专号并收入我们的文章。我们不过是几千万黑五类子弟之一。我能插空在 1962 年这唯一宽松的一年考上北大，在邓小平当政的 1978 年又考回北大，成为第一届硕士、博士，在黑五类里已属万幸。你的《黑五类忆旧》办得不错，刚两期就引起了较大反响。期待办得更好！

夏威夷金俗谦先生来信：

国标兄，谢谢您寄来贵刊第一、二两期。黑五类的遭遇，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应该知道不少。拜读贵刊，还是深感震憾。

父亲章乃器　　章立凡

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章乃器）已经分居了。父亲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揭发他。我那时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并教我一些话，到会上去说。会上，前面有很多人讲话，都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有到场。轮到我讲话，讲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上小学的时候，想进少先队，我好像比别人慢一二年才进去。那时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是绝对接受和服从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既然他错了，那么大家就都可以来批判他。那时社会有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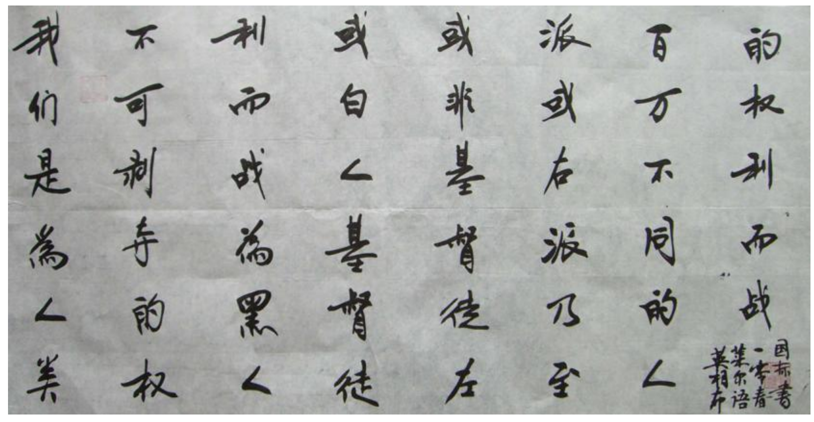
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跟我妈谈家里的情况。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此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喜欢记点日记，爱好古典文学，也作一点诗词。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了，交给老师，然后组织批判会。我不服，跟老师顶撞。后来这个老师跟我透露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为一个样板——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那个老师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老老实实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过后不久就发生

批判我的事。后来我很厌学，成绩下降，还留级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我没前途了，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说得还比较厉害。我提醒他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读了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却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七千人大会前后，统战政策有点松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松动。父亲对 1957 年给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说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要求重新审查。1963 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说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了。我赶紧



英国首相布莱尔金句　　焦国标书

回家。后来父亲特别跟我讲一句："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这话的

意思是“我不会自杀的”。

记得文革抄家那天是 8 月 23 还是 24 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清华二校门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被赶到那儿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不要回来。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被撕了，铺盖也被捣毁了。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完了，马上就来临了。我当时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同学就揭发我，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 13 年。我一共坐了 9 年半，1978 年底放出来。

我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出身不能选择，谁让你投胎到这儿呢。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也是贱民。这个就是一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但是我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杭州王其伟先生来信：

非常惊喜《黑五类忆旧》期刊出版。我是黑五类子女，因为父兄都曾是右派分子，父亲还戴过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们都经历过受尽屈辱的岁月，直到现在还有挥之不去的影响，看来这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烙印了。一言难尽啊！不知《黑五类忆旧》期刊是纸质还是电子版？如果是纸质版的，请邮寄到下列地址；如果是电子版的，请发送到下列邮箱。每期都要！不但自己看，还要给周围的黑五类子女朋友看。今后我也会投稿的。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黑五类子女要感谢你们，那些幸存的黑五类分子和多数已经上了天国的黑五类亡灵都要感谢你们！

父亲是这样死的　　周祖德

1955 年 8 月 22 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派人告诉母亲，父亲凌晨自杀身亡。教授会协理员见到我们孤儿寡母，毫不客气地说："周价在肃反运动中，在'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杀，属于现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仅 15 周岁的我六神无主，去找同住一个大院的南京九中团委副书记周合群谈心。他比我大三周岁。他说："你刚刚于 6 月 22 日通过南京一中团支部审查，现在正值团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要表明与父亲划清界限。"

8 月 23 日，我陪同母亲前往鼓楼万国殡仪馆，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8 月 24 日，父亲殡出，葬南京卡子门外养回红村公墓。过了两天，我专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团委委员、原初三班主任张鸿恺老师，在学校中心花园，向他如实汇报了父亲死亡的事，以及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这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 年 1 月 20 日，南京一中团委批准我入团。后来转学到杭州一中，要求转团员关系时，南京一中团委却拒绝给我转。1958 年在杭州一中读高三时，被迫辍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9 年在海宁许村公社教书时，受到全乡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 年在杭州市民办求是初中当教师时，再次申请入团。尽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区团委否决。

1966 年 6 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险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1969 年杭州城里出现现反标语，当局率先查我当天晚上在哪里。1979 年在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时，全家分居两地的三口人只有 40 元工资，身上无一件衣裤没有补丁。直到 1989 年，我才还清我们所借的外债。

1987 年 4 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个课题经费（100 元），终于在离开南京 31 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到养回红村小山坡上找到父

亲坟地。那里早已没有墓地，坟墓的位置成了人们扫祭的道路。随后我去拜访父亲的老同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同事、南京军区退休干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战争时期工兵监同事、解放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同事、南京市当时的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南京市动力专科学校退休教师黄凤丹叔叔，才知道父亲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父亲事实上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教授会领导也准备要父亲于 8 月 24 日去上课，值班的党员已知道我父亲无事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时，后一名接班的党员看管尚未到来，前一个已提前离开隔离审查室。此时我父亲对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为问题永远说不清了，于是乘此空当，悄悄走出隔离审查室，走向军事学院东门的水池。水深只有 80 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扑下去，硬是把自己闷死了。

北京赵万力先生来信：

国标，您编辑的《黑五类忆旧》创刊号收到了，感谢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支持您。祝您越办越好。

北京季晔峰弟兄来信：

焦老师主内平安！第二期收到了，谢谢你！昨晚我回来看了一些文章。其中一些数据很重要，问题是，准确性有多高？不过，我也理解。在目前情况下，能有权威性的数据也是很难的。这个工作确实很有意义。愿上帝赐福并保佑你、陈姊妹以及全家！以马内利！

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　　曹登贵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 3 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 3 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 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 3 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 3 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 3 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 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

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 5 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 50 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 年 5 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

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 15 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 5 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 14 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 15 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 1982 年，他 71 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长治马纯孝先生来信：

本人是一名退休老干部，年近八旬，很想得此刊物，不知可否赠阅。我虽非黑五类，但也算贱民，曾被打成中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还不算，文革初被机关内定为反革命，吃尽政治运动的苦头。以上函请，望能如愿！

父亲的遗著　　邢诒心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七期，参加过抗战救亡，后在国民政府广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返乡当教师，五二年镇反时被抓。在内蒙古劳改五年，大难不死。那一批北上劳改的有几千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父亲即其中之一。出狱后回原籍乡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监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亲在乡村可谓牛马不如，任人辱骂殴打，几岁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乡村的孩子学着斗争会上大人的口吻，见到我父亲都会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掷粪便、土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至少被批斗几十次，贫下中农或工作队干部殴打他，民兵把他捆绑起来游村游街。有一天，小学校长要我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大队斗争五类分子大会。父亲被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押上斗争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宣读强加于父亲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厉声问我父亲认不认罪？我父亲只叹一声“冤枉”。几名民兵在书记、治保主任指使下冲上斗争台，手持木棍枪托，围着父亲一阵乱打。父亲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们将父亲双手捆绑，用麻绳吊在半空。父亲在斗争台上悬空惨叫，尿屎渗出裤子。革命群众则在台下怒吼打倒父亲的口号。不多久麻绳突然断了，父亲从几米高处跌下，昏迷过去。我回家告诉母亲，说父亲死了。母亲抱着我们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们说，父亲不会丢下我们而去的。夜里，父亲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双腿已不能走路，靠双手爬了几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劳动监督，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这些儿女惨受株连。我十二岁就失学回家务农，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惨绝人寰，绝望人生。

邓上台后，我参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后在广州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后，父亲重新过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将他三十余年的劳改生活经历写成书稿，真实地将中国大陆那段伤心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他要我们将来有机会将书稿出版，或者送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认为这本书稿有如下几点历史价值：一是镇反运动的罪恶记录；二是揭露了当年内蒙古劳改营关押几十万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内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斑斑血泪。

国外沈风雷先生来信：

我身在国外，希望读到你们出版的《黑五类忆旧》，但是不知你们是否有电子版的刊物？如有，是否可以赠阅？此致 Cheers。

北京张小曼女士来信：

看了黑五类的文稿，感慨良多。我的母亲魏希昭 1929 年投身学生运动，1950 年被仇恨父亲张西曼的坏人诬陷成特务，从此蒙冤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机关当作特务嫌疑受尽迫害，至今已六十年。因当事人撒谎掩盖事实真相，直至今天仍未做最后结论。

北京梅桑榆先生来信：

《黑五类忆旧》第二期收到，谢谢！看你的前言，关于饿殍的文章，不妨选出一些结成文集。杨继绳的《墓碑》主要反映宏观上的大饥荒，对具体的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记述不多。

北京叶维佑女士来信：

刚收到《黑五类忆旧》的附件，很感兴趣。因多年眼疾，视力有限，故望得到该刊物的免费邮寄，不胜感盼。

陪父亲二劳改　　鄂一雄

父亲是 1949 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 年我 3 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喝小米稀饭。

1956 年，部队集体转业。随后，反右斗争开始。在我幼小的记忆

中，爸爸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有一天，妈妈带我们到一个农场看爸爸。他在那里劳动，晒得好黑。1958 年，组织上动员我们家属返乡，我们回到湖北天门县的一个小镇。离开河南前，爸爸与我、妈妈、弟、妹在照像馆照了一张照片，并写着“欢送王虾贵（妈妈的名字）同志返乡合影”。前几年这张照片还在，近年几次搬家，把这个珍贵的照片弄丢了。

父亲被定为右派去了劳改农场，我们老家的军属牌子也摘掉了，妈妈不得不从新参加工作。她每月 27 元的工资根本养不活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因无钱治疗，两岁的洛兵夭折了。妈妈吓坏了，忙将洛佳送给乡下的姨妈，将我寄养在乡下的外祖母家。

1961 年挖红薯的时候，父亲来到天门乡下，要将我接到他所在的潜江沙洋二农场二十中队。外婆听说我要走，流泪了。这三年我与外婆是在吃树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过来的。父亲刑满后不愿回乡，要求留下来当农工，俗称二老改。为了不与其他农工一道睡集体宿舍，父亲想出一个良策，将我带在身边，这样就可以分到一间独立的住房。

那个住房其实就是一个看瓜的棚子，有十来平方米，门口种着各种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电筒回家，因为我无数次发现各种蛇躺在路面乘凉。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顶，各种虫子经常光顾我们的床，最让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从上面掉下来。有一次，一只野狗在我们门前捉了一只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将猎物放在地上，守在旁边欣赏。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却猛然向我扑来，前爪抓进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当即鲜血淋漓。现在还留有伤疤，那年我 11 岁。

父亲心情非常不好，脾气很大，常常以酒浇愁，每月工资还不够他喝酒。喝醉了就摔东西，经常无端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给他赚一元钱做酒钱，不然就挨打。

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每天凌晨 4 点钟就起床，守在牛棚门口，等农场放牛出来。牛有个习惯，早晨一出牛棚就会拉粪。鱼塘收牛粪，每斤一分钱。我每天必须完成一百斤牛粪才能赚到一元钱。一次我挨

打后逃跑了，跑到一个由两个劳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们收留了我，在那个窝棚里呆了两天。旁边有个即将干涸的池塘，我帮他们捉了两脚盆泥鳅。还没来得及吃，父亲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时早上捡的牛粪不够，就只得到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去检。一次我在离农场 3 公里的杨家滩检了两大篓子牛粪，由于挑不起，我将其中一篓子埋在路旁沟边。将另一半挑回去再来时，发现竟被别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后来又捡到同样多的牛粪，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 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个小时。到养渔池一过磅，连皮 107 斤。天哪，那时我才 11 岁啊！

在劳改农场的四年中，我似乎没买过鞋。每年从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从早到晚都光着脚丫。有时被钉子、蚌壳刺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划个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会发炎，几天后就好了。过了十一，我就开始打草鞋。草鞋其实并不都是草编的。我平时就注意捡废布片子，洗净晒干，以备编鞋。用布片子编的草鞋是逢市过节穿的，用麻编的草鞋是洗脚后穿的，平时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窝子，没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围着。我是跟一个劳改犯学会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长的竹竿登在脚上就行了。

那时父亲常常出差，将我暂托给一家姓叶的照看。叶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岁，妹妹比我大两岁，我与妹妹同班。我那时身体不好，常常发烧（后来当兵检查身体时才发现肺上有一个很大的钙化团，可能是那时得了结核病，不知不觉钙化了），不能去上学，妹妹常将学习的内容带回，还带回一些找同学讨要的蚕豆、大麦粉之类给我吃。

那年头同学之间经常互相讨要吃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大姐当时正在与沙洋-武汉轮船上的一个船员谈朋友。那个准姐夫来看大姐，总是带一瓶化学酱油来。他们的老妈，一个越剧演员，就用酱油给我们煮饭吃。那种香甜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都流口水……

陕西李长生先生来信：

我叫李长生，一名退休教师，当年曾是一名受尽磨难的黑五类狗崽子。当我在网上看到《黑五类忆旧》的发刊词后，忆旧的思绪又把我带回到 1966 年的文革中。疯狂、荒唐而又饱受打击的一幕幕往事，令人浑身颤栗不已。我殷切地期望能够仔细阅读《黑五类忆旧》的每一期。不久我也将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把电子稿投给贵刊。希望你们能给我赠阅每期《黑五类忆旧》电子稿！

北京丁东先生来信：

国标，你好！电子刊物收到。你的发刊词中提到未改正的右派有章乃器，不确。章乃器原在不改正之列，在文件发出前，章立凡找到陈云，陈云将章乃器从不改正的名单中撤出。所以章乃器是改正右派。以上意见供参考。

小地主父亲　　范向东

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里哆嗦的力量。他很少开口骂人，通常是把干瘦脏黑的手指头在嘴里蘸上唾沫，隔着饭桌探过身子，把米粒沾到指头上，送到你的嘴边。你不能反抗，那样会招来他老拳的热情招待。你得张开嘴，挤出一脸讨好的笑，用舌头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尽。父亲缩回手，再把手指伸进自己嘴里，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声音很响，像吃着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亲指头上的米粒舔进口，我都强忍着，找个借口出去呕吐半天，连肠子都要吐出来。所以吃饭的时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点滴过错被父亲抓住。吃完饭，还要当着父亲的面，把饭碗扣在脸上，用舌头把碗舔得发亮。这时，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还可能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开，放在我的手心里。我会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点一点的散开，直到满嘴的油香。我会闭了眼，把嘴里的舌头转得像飞旋的轮子。那时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亲好苦，家里几十亩的土地，他舍不得雇长短工。从父亲身上抠一分钱，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从不回家，头上百年不变地裹一条油乎乎脏腻腻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随便挂几件能蔽体的短裤长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叫花子。

母亲中午要把饭送到田间地头，父亲吃饭的时候从不挪窝。见母亲送饭过来，锄头一放，席地盘腿而坐。哪怕此时烈日高悬，他也绝不会去寻一处有荫凉的地方。父亲古铜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样排满他的脊梁。母亲看着心疼，就蹲在父亲的旁边，用手绢不停地给他擦汗。父亲一手端着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饭迅疾扒拉到嘴里。他的嘴总塞得满满的，腮帮子总鼓得圆圆的，说话的时候嘴里叽里咕噜，也听不清他嘟囔些什么。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又忙开了他的活计。

人家背地里都叫父亲“活不成”，舍不得吃穿，就舍得出力气。春暖的时候往地里拉灰土粪，父亲怕把骡子累着，常常自己架在车辕里，弯腰弓背累得龟孙子一样，而让骡子在后面悠闲踱步。

家里一年也难得改善一次生活。饭里偶尔放点鸡蛋、猪肉什么的，父亲总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败家子。他气急败坏地用筷子把碗里的饭像犁地一样深翻好几遍，把里面飘着的鸡蛋块块、猪肉渣渣都挑出来，一股脑扔进我们的碗里，边扔嘴里边嘟囔：“吃吧，吃吧，喜欢吃肉，把老子也杀了吃掉算了！”每当这时，我们就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碗，才不在乎他怎么骂呢。

母亲总在父亲下地的时候偷偷给我们改善生活。有一次我们正在家里兴高彩烈地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饺子，突然听见院外有骡子的叫声。母亲也不着慌，随手在盆里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门口用力一撒，满院都滚着白花花的豆子，很是显眼。父亲踏进院门，一眼就瞅见了地上的豆子。他尖着嗓子跳着脚在门口叫骂："哎呀呀，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猪仔子，再有钱也经不住你们这样糟蹋呀，挨千刀的！"他边骂边弯下腰来，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衣袋里。等他捡完进屋，我们都已吃得肠肥肚圆，母亲也把所有的痕迹清理完毕。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母亲就给他从锅里拿出俩个窝头和一棵大葱。父亲一口窝头就一口葱，笑眯眯的，吃得有滋有味。我们都看着父亲偷笑，父亲低下头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么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时候，因为家里地多，粮食也多，父亲被划为地主。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把裤子当了、老婆卖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贫农。他们给父亲糊了一顶尖尖的纸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让父亲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喊："我是地主，我剥削穷人，我罪该万死！"游街回来，父亲连吓带气，卧床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归西。人家叫我父亲"活不成"，他真的没活成。唉，可怜的父亲！可怜的小地主！

杭州王其伟先生来信：

想不到这么快就收到了您的回信和电子版的《黑五类忆旧》第一期。我一口气读完了（用大半天时间），只是通读，还准备细细精读。完全理解书中的一切，几乎用不着琢磨，太真实了，读得我一遍遍地拭泪。我已经把书转发给几个亲戚和同学，相信他们一定也会跟我一样感动。

我希望也能得到纸质版，便于保存收藏。但考虑到你们是做义工免费赠阅，我就不便多增加你们的负担了。如果方便的话请寄 1-3 本吧，至少 1 本。能读到电子版已经不错了。或者收点工本费吧。再一次向您并通过您向编辑出版团队表示感谢和敬意！我一定会投稿的，

容我有一段准备的时间。

北京季远新先生来信：

您好，在冷明的博客上看到您的启示，希望能够得到这本刊物，了解那个时代，谢谢您了。

云南杨银波先生来信：

已看到《黑五类忆旧》（民间交流性半月刊），收录了我的《圣女王佩英》一文节选，很高兴。无论是陈兄，或焦国标兄编辑该刊，我皆授权《黑五类忆旧》可任意转载我的任何文章。

父亲认了　　冯积歧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

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 1 块 4 角 6 分，祖母身上只有 1 块 3 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 40 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

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郑州钱振选先生来信：

昨天，北京的 Kang 先生告知您创办的刊物。今天，在五柳村网站看到首发目录和说明。希望读这一刊物，并向焦国标先生致敬。他的发刊词，好！

父亲到死想不通　　杰弗瑞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间比预产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头老母猪，我还不一定能出来。当时我母亲正在猪圈里扫猪屎，挺着大肚子扫得很累，就撑着猪圈的石板墙想歇一歇。老母猪过来亲她的腿，她提起脚赶猪，没想到老母猪一抬头顶了她一下。老母猪这一顶，把我顶到了臭烘烘的猪屎堆里。母亲说，老母猪从来没这么顶过她，是不是它有意帮你快点出来呢？

我生下来没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据说是吃了我的胎盘，吸了母亲的经血。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好奇地盯着看老母猪，好像我们认识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后退，不敢抬头，过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后来想，我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顶替这头母猪的呢？这头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几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原来其实就是一头猪，或者说我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猪，过去的生活其实跟在猪圈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有一天时间既没哭又没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么。我母亲吓哭了，对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还是不哭，直到半夜父亲回家，我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

哭到大天亮。

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终于活着来到人世而高兴，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儿子就高兴。其实当时母亲的眼里满噙着泪水。她用牙咬断缠在我身上的脐带，抓猪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后坐在猪圈里发呆。老母猪吃完了母亲清理下身的猪草，舔食了猪圈地上的乌血，拱了母亲一下，母亲才回过神来，抱着我回家。

我长大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生我呢？母亲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呀，那时也没实行计划生育。母亲说得非常难过，我听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亲肚子里不出来，要是母亲根本没有怀过我，要是母亲怀上我又把我打掉，总之，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我也不会活得像一头肮脏的猪了。

我现在不恨那头把我顶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了。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一点错。他们不但没有错，还生我养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而且，如果没有以前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哪能奋斗到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是一半对一半，把不幸的日子过完，幸福就来了。

我出生那天，母亲后来说，天热得把衣服脱光都不能解暑，太阳就像被泼了一盆经血，红得让人难受，红得让母亲看哪里都是红圈圈，都是猪圈里的经血，现在想想还要呕吐。母亲那天抱着我冲回家，一股脑儿地喝了五大瓢冷水还是感到热。母亲老来四肢酸痛，处处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时喝冷水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确实不乐意出生，我母亲也不高兴我出生。当时父亲正站在生产队的批斗会，五花大绑着，低着头，曲着腰，接受着别人的教育。汗水在父亲的身上像虫子一样爬着，最初痒得令人想笑。虫子在身上爬多了，痒得久了，又难受得要命。父亲在口水、石子、讨伐声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别人轮番讨伐渴了、累了、饿了，才得以回家。父亲疲惫地走进屋，还没等母亲告诉他家

中又添了一个讨饭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亲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这一压，哇的大叫起来，母亲听到哭声才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来。父亲一惊，望我一眼，面无表情地朝一边一倒，又睡去了。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不愿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猪一样生活，难怪我一出世，我家那头老母猪就死了，它不愿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样，它已预知到我将来的人生……

生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学就不能带红领巾，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现在，我对地主一词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浑身发紧，神经紧张，惶惶不安。按说，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应该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谁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们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处罚的应该是父母，而不应株连他们的子女呀。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犯罪违法。他们只是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自己富得快一点而已。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好一点呢？然而在那种荒谬的时代，想过好一点也是有罪的。

我的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为了买那五十亩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节约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顿咸菜下苞谷稀饭，才终于攒到那么一罐袁大头。我的父亲母亲，甚至我的爷爷奶奶，既不偷也不抢，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连叫花子上门讨饭，自己不吃也要赏一碗，这样的人家在现在说应该评五好家庭呢。他们认为，我们靠劳动吃饭，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当官的怎么换，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荡荡的良民才是。

父亲以前是个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修房造屋，节省得吃碗羊肉汤都舍不得，一心想着买田置地，等结婚生子后让一家人日子过得宽裕一些。我母亲过门后，房修了地买了，日子照样过得紧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节约成习惯了，有了点钱以后照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母亲说，要是那时舍得吃舍得穿，吃了穿了，被判个地主富农，心里

也还踏实些。既没吃成又没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没收，房产被瓜分，时时刻刻被监督劳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甘心呀。爷爷奶奶伤心呀，后悔呀，哭呀，气呀，解放没多久就去世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喃喃自语，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四十年前不让人富，四十年后却鼓励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一些，为什么命运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错的现在却是对的？为什么靠劳动挣钱在那个时候就有罪而现在却是一件光荣的事？父亲至死也没想通。

父亲背着枷锁过了半辈子。在生产队，别人不愿去修公路，让他去修；别人不愿在大雨中去守庄稼，守汽车，让他去守；别人不愿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步行十几公里去缴公粮，让他去挑；别人不愿在大热天挑粪上山，让他去；别人早早睡了，让他每天晚上写思想总结，写交待书；天寒地冻的时候，别人在温暖的家中休息，让他去公社政治学习，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亲曾对母亲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在想，难道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真的是错的？难道大家都没钱、都穷就好吗？有一天，父亲似乎想通了，突然对母亲说了一句：“钱哪，魔鬼。”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可他再没说话，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父亲并没有想通，他还在为他的土地、房产惋惜。我们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读，哭得死去活来也没用，别人骂她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她想不通，一头栽到古井里，再也没爬出来。姐姐死了不要紧，让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事在生产队的祠堂前罚跪两天两夜，当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们家的祖宗也被骂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钱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我的哥哥，一个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孩子，淘气、外向、仗义、不服输，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受的气最多，吃的苦最多，长到该成家的年龄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赘到大山里去，过着食不果腹、衣

不遮体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胆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还是没少挨打受骂。我曾有近二十个绰号，至今还记得一些，如屎斑鸠、苦檀神、地主仔、四类分子、屎弹子、周扒皮、刘文彩等等。

命运把我变成了一头冷漠、自私、孤独、玩世，人见人嫌的肮脏的猪。我已经习惯脏猪一样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认为就是一头猪。在没人的时候，有时我学猪的嘶叫，甚至学着猪的样子拱地上新鲜的泥土，嗅一嗅土里别样的气息。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开心，很痛快。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猪崽。我在睡梦中曾夜游到猪圈，被母亲从猪圈里拉回床上睡觉。这一切我浑然不知，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带着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家，母亲把它当笑话讲给她时，我才知道。

我母亲对我的女友说，我是猪变的，是猪精哟。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后仰。我后来偷偷问我母亲，我真的在猪圈睡过？母亲没说话，眼泪直往外涌。

我大学毕业，做了大学老师后，父亲才得以找池塘钓钓鱼，谦卑地接受乡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经常对我说："人要节欲。还是穷了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知道，父亲话虽然说得通达，实际上他心里仍然没有想通过去一直没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赘到大山里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水果发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可我父亲却怎么也不愿意踏进我哥哥的家门，甚至还当着全家的面，骂我哥哥不从他那里吸取教训。

然而直到父亲去世，我哥哥也没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桑塔纳买了两辆，刚上高中的女儿被送到美国念书。我父亲把我哥哥骂了，打了，哥哥仍然不听，继续发家。父亲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胆做，没有谁把他怎么样。

冷明先生来信：

收到贵杂志电子版很是激动。能出这样好的刊物太可贵了。我当天就在我的博客里刊出了此消息，我把《发刊词》贴上去，被新浪给删了。我打算写一些回忆录给你们，我也是黑五类。希望你们百忙之中能把最新的版本传给我。祝贵刊越办越好。

离右派就差一厘米　　廖文伟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

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丢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满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老师。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 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妹妹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丢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甲乙先生来信：

读过您编辑的《黑五类忆旧》第一期，很受触动。“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这题旨非常好！又看到你们的约稿启事。我自己有一篇类似文章，现寄上，供选用。

印花的童年　　文利桃

父亲成分不好，在城里找不到媳妇，只好到乡下找。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外婆外公反对，闪电般迅速嫁给了父亲。母亲嫁到城里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气，一口结结巴巴的乡下话，受尽婆家和邻居嘲笑。偏偏又连生三个女儿，父亲更有对她拳打脚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视为狗尾巴草的我，两岁就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宝，总能想方设法做出我爱吃的东西。从墙角菜坛里舀来酸酸的浸水，将生红薯切成极薄的片，再拌上鲜红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谗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错，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鸡窝里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几根稻草追得我满村跑，演戏给旁人看，以平民愤。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一晃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接回城。那时她又怀孕了，就在我报名读书的第一天，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父亲一看又是个女孩，当场破口大骂。奶奶指着父亲的脸说：“你这辈子绝种了！”骂骂趔趔地拖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回头看见床上的母亲满眼都是绝望。

叔叔结婚后，爷爷提出分家，把好的东西都分给了叔叔。父亲提出异议，爷爷说：“你要那么多干吗？你儿子都没有，将来还不是落到外姓人手里？”父亲赌气迁出城，在郊外一条僻静的小河边盖了三间房子。那一年，我八岁，二妹五岁，三妹一岁。父亲做了一条小船，到河里捕鱼来维持生计。哪天多卖了几个钱，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

的才回来，见人骂人，见狗也要追着踢几脚。我的左耳就是父亲打聋的。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母亲在厨房做饭，八岁的我，坐在客厅的凉床上，抱着哭个不休的三妹，还要给站在旁边的二妹挠背心的痱子。父亲在隔壁房间喝酒，三妹的哭声闹得他心烦。他厉声骂我："你是头猪吗？不会抱她走动一下？"

我赶紧边哄三妹边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无奈我个子太小，怎么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紧，三妹哭得更厉害了。耳边传来父亲的骂声："吵死啊！小心我出来一脚踹死你！"我终于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门口，二妹又哭着上来揪住我的衣服。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我，没注意脚下的门槛，抱着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过气来。

我吓坏了，刚把三妹从地上抱起，就看见父亲从房间气冲冲地出来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从我怀里夺走了，还没等我来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个人飞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吓得尿了裤子却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没打歪，但左耳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母亲被艰难的生活磨得脾气暴躁，也喜欢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体积大一点，就成了父母理所当然的出气筒。挨了打我也无处诉说，只是朝着外婆住的方向无语凝泣。有一天，我实在无法抑制对外婆的思念，偷偷从家里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给我洗脚的时候，看到我满腿的青紫伤痕和布满血泡的小脚，直掉眼泪，咬牙切齿地说："天杀的！怎么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车上，看着窗外渐渐模糊的外婆，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控制地流下来。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惧的家，心里的绝望无法言表。到了家门口却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在房子后面的杂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往里走。刚走到大门口，正好撞见出来倒垃圾的母亲，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里还很高兴，因为平时只要母亲先惩罚了我，父亲一般就不会再动手。母亲也明白这一点，总是抢在父亲前面动手，其实

她是想让我免挨父亲更残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亲推搡着，眼睛却瞟见父亲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棒出来，直朝我奔来！我朝母亲大叫："还不快松手，爸爸来了！"母亲一回头，也赶紧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健步如飞追来。我沿着河堤狂奔，几次差点被他手里的木棒打到。我边跑边在心里发疯一样的祈祷能出现一个人救我！

天从人愿！村里的支书正好从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一猫腰从救苦救难的支书大叔裤裆里钻了过去，10 岁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动迅速，动作优美。父亲没料到支书会突然冒出来，朝着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惯性。好家伙！那一棒子结结实实砸在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支书腿上。支书喊一声"哎哟"，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效果。支书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强治好，父亲赔了七百多元医药费。

从那以后，父亲要打人就先把门反锁，连母亲都不准进来。无论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脱掉，那样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后来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规定我定期去河边竹林里砍竹子回来做工具。要去掉竹叶，捆紧了，还得用布条把手握的部位一层层缠紧，这样才好使力。他双手握着那一大把竹条朝我裸露的身体肆意挥舞时，动作活像秋收时朝谷筒里用力摔稻谷的农民。竹枝每落下来一次，我的皮肤上就多印出一串红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会冒出一颗红红的血珠，父亲美名其曰"红印花布衣"。

实践出真知，打的次数多了，我发觉嫩竹枝条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断。我在被打的时候默默数了，老得发黄的竹枝要挥打 40 多下才全部断掉，嫩竹枝一般 30 下就光秃秃的了。于是，我再去砍竹子时就专拣嫩枝头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亲的棍棒训练下，我还练出了几项特异功夫。两米多高的窗户，我一个八九小女孩能在几秒钟内爬到最顶端，像一只小猴子那样

抱着窗户顶端的栏杆，脸对着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这个姿势的好处是上半身受伤比较少，不过，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满了重叠的印花，好几天坐不得凳子。还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狼嚎。我发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里叫得最好的领头狼，叫声在深夜传得很遥远。只要在我发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对面很远村子里的妇女，总会到处绘声绘色撒播谣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个惨啊！

身体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满身红印花后去读书。在我们身体没有体现女性特征前的夏天，母亲都不给我们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穿上衣。这样洗起衣服来也简单——五条短裤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钱又省了肥皂。

妹妹们还小，无所谓，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个女生不穿上衣去读书。这给老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认为我是个没开化的野孩子。没花一分钱广告费，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一说起那个打赤膊来读书的女孩，谁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体被印花以后，没有上衣遮盖，就那么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师生的眼里。被打时，出于自然反应，我都是抱着头弓着身子蹲在地上。这样的姿势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个背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印花，而前胸则相对较少，不太触目惊心。

人都有爱美之心，在学校遇见老师，我总是尽量将自认为最美的胸部对着老师。老师一走动，我就像向日葵那样，始终将前胸对着老师移动，尽量不让老师看到我丑陋的背后。

曾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老师，面对我的伤痕落泪，善良的她走访了我的父亲。父亲唾沫横飞，历数我数十条非打不可的罪状。在他的描叙中，九岁的我除了没犯过杀人罪、强奸罪，别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对仍喋喋不休劝解的老师，父亲恼羞成怒地说："我生的孩子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关你屁事！"气得音乐老师拂袖而去。

三年级时，我的胸部开始发育，长出硬币大的小乳房，同学们指指点点令我无地自容。我向母亲提出要穿衣，母亲许诺明年夏天就让我穿衣去上学，我听了绝望得想自杀。一天中午，看见晾衣竹竿上晾

着父亲的一件白背心，我灵机一动，等母亲不注意，把它藏进书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亲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连衣裙。我找根麻绳绑在腰际，自我感觉美不胜收。

放学后我就把背心脱下藏在书包里，脏了也不敢拿出来洗。没几天，白色的背心黄渍渍的，酸臭酸臭。事情还是败露了。母亲路过学校，刚好撞见还没来得及脱下背心的我。她当场给我两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衬衣。我终于结束了打赤膊上学的历史。

父亲素来风流，前村后店都有他的情人。母亲看不开，寻死觅活地吵闹。他们打架，我跟着遭殃。母亲动不动就朝我口不择言地吼："只看见这里死人那里死人，怎么就是不见你去死啊！"受母亲的指点，我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到处打听哪种死法不痛苦。自幼极爱看书的我，最后从琼瑶的书中得到启发。她书里的女主人公都喜欢割脉自杀，说这样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后脸色还会苍白凄美。爱美的我觉得能苍白、秀气的死去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干就干，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们关在房门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开了手脉。没想到血会像箭一样从血管里射了出来，居然喷到蚊帐顶上！我没觉得疼，只是有些惊讶，嘴里不由自主发出了尖叫声。

我没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来了。听到我惊恐的叫声，她一脚就踹开了门，把我的手捆紧后送进医院缝了七针。后来听外婆说起，事情还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刚躺下，就非常清楚地听见我的声音在窗户根下连喊了三声"外婆"。她以为是我夜里偷跑去到她家了，起来打开大门一看，外面却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外婆觉得不对劲，一夜没睡好，一早就坐车赶到了城里，及时挽救了我一条小命。我抱着外婆哭得肝肠寸断！她才是我最亲的人，一次次救我于水火之中。

难得发怒的外婆把父母骂得狗血淋头。她指着父亲骂："教育孩子有你这样的教育方法吗？明明是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却把怨恨都发

泄在孩子身上，还要找出各种罪名来为自己开脱！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和你拼了这条老命不可！”

住了几天，见我伤口快愈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里无数次乞求外婆带我走，却怕让她为难而不敢开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着包扎着绷布的手，依在门口看母亲送外婆走。看着外婆老泪纵横一步一回头地看我，我终于不顾一切，哭喊着追了过去：“外婆，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经过外婆的力争，加上我以死相挟，我如愿以偿地跟外婆下了乡。走的那天，我脚步如飞，头也没回……

伦敦嵇伟女士来信：

《黑五类忆旧》让人想起的是似乎太久远但永远不可能忘的事。因为太忙，我现在几乎不细看任何文章，但你的这本电子杂志却仔细看了。因为一，我是在右派堆里长大的；二，我在安徽淮北插队八年半，所见所闻和文章中的故事一样残酷。保持联系，谢谢寄给我《黑五类忆旧》。祝好！

和田先生来信：

我从友人处读到了您编辑的杂志，读到了“政治贱民”这个熟悉的字眼（我母亲生前常说），很震撼啊。这个身份压了我们太久，这个话题之忌惮也太久太久了。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忆它，但是它还是紧紧地捆绑在我的心灵深处。附上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还有我老父从牛棚回家时的旧照。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1957 年因言获罪。全家变成了政治贱民，但我母亲作为右派老婆是最最痛苦的。可她直到 83 岁辞世，都坚决不肯写一个字。其痛之深，无可言表。我建议，专题研究黑五类的妻子们。在苦难的人生战场上，她们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还英勇。

父亲的眼泪　　杨恒均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在外面玩耍，与一个同龄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占上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冲我家而来，手里还捏着一块砖头。他身后还跟着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的观众。那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通常不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是与我同龄的这个八岁孩子叫骂的内容吸引了大家。他没骂我，而在叫我父亲的名字，每叫一句还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叫骂声："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 X 你 XX！"

父亲当时虽是管制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边叫喊我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侮辱性的形容词。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传进这两个词，父亲紧紧握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气得脸都紫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不知是那孩子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哭了一会，父亲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人家

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别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权利。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当时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无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时会不知不觉间和小朋友闹矛盾。父亲的哭声结束了我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夹着尾巴做孩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泣。后来我再也没有让他在我面前哭过，虽然我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童年和一个正常人的成长环境。

孤帆先生来信：

焦先生，从朋友传来的文中逐渐认识了您。我退休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个东西。因许多当事人还在，我怕麻烦，隐去真实的人名地名。小人物的经历同样能反映大时代，若蒙不嫌，我发来请您审阅。

一张平反证　　　陈　华

尊敬的湘乡市委统战部领导：

我的父亲陈鹤尧，生于民国六年农历六月一十七日，现年 90 岁，住潭市镇西田村 10 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挺身而出，应征抗战入伍，上海淞沪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工兵第一团团长马崇六属下的一个营里任班长，多次参与对抗日寇作战。1941 年，父亲在江西吉安国军军事学校毕业调查处军官总队 13 中队受训毕业。同年加入国民党组织，党证号：军競字 22713。这年 25 岁，入党地点：吉安。军校毕业后，任第 41 补训处(处长唐光乔)第 2 团中尉连副。后调任部队番号为浙江兰嘉师管区(管区司令赵煜)第二团 15 连连长及兰嘉师管区上尉附员。

父亲奉令率连队从浙江撤退至江西时，途中多次与日寇遭遇作战，战斗异常惨烈。日寇前堵后追，父亲率连队与之巧妙周旋，从而基本上保住了这支国防部队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战终于到达集结目的地。民国 36 年，父亲在南岳第 27 军军官总队(总队长蒋伏生)第 5 大队退役，退役证号：除丙字 007552。

退役回家后务农，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镇反运动时，由于民众对父亲口碑极好，才侥幸躲过了杀戮之劫。不久，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接受监督改造，捆绑批斗，劫难中留一条残命，至 1984 年才被摘帽。2007 年 5 月 18 日父亲高血压中风几天后住进了东山医院，弥留之际，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认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中华民族，热血青年时期，与日寇浴血奋战，反而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极不公正的，死也不会瞑目。

弥留之日屈指可数，父亲特向统战部提出 2 点请求：

1、给自己的抗战历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为摘帽只是证明摘帽后不属于阶级敌人了，“摘帽”一词反而认为自己的抗日历史是属于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确的。父亲打的是日寇，没有与共产党放过一枪，何“反”之有？难道去当汉奸反而是革命者吗？2、生命垂危，正在抢救治疗，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医疗救助，哪怕是一分钱，也体现党和政

府对一个抗战老兵的关怀。

1949 年秋，国民党军事机构曾动员父亲随军撤退去台湾，父亲对新政权充满希望，毅然选择留在家乡。幸存的抗战老兵屈指可数，像父新这样的连长级以上的抗战老兵更是寥寥无几了，希望上级领导对父亲这样一个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权要求给予重视解决，再莫让他带着伤痕累累的遗憾进入另一个世界。

此致

敬礼

抗日老兵陈鹤尧的儿子陈华

2007 年 5 月 25 日凌晨

于东山医院父亲病床旁

5 月 25 日，星期五，我揣着这份信件报告早早来到湘乡市委统战部。早 20 年前我就来过这个地方，那是要求为父亲落实政策，同时享受生活补助待遇。当时他们的人答复我：陈鹤尧不是起义投诚军官，故无法得到什么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个副部长看完报告后问:“你父亲的摘帽证呢？”我说根本就没有发下来过什么摘帽证，只是让人转话，对父亲说你以后不要去开斗争大会了，也不管制你们这些人了。我对副部长说：“当时那些极左干部们的心态是极不平衡的。一夜之间突然不能对这些五类分子捆打批斗了，不能当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证也不会发给他的！”副部长默然，隔一会儿突然说：“现在不是没被管制了吗，摘帽与平反不是一个意思吗！”我说：“摘帽与平反绝对不是一个意思。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正在病床上翘首盼望能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就去回复他老人家。”这时进来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长让她看了报告，女主任一锤定音，说：“上面没有明文规定，这事我们不能办！”

父亲 17 岁参军，军旅生涯 12 年，大部分时间从抗战中度过。他在东山医院住了 8 天 7 夜。有一晚他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对日夜守在病床边的我说，抗战开始时，他随部队调到河北，参加了沧州战役。

那一仗打得很惨！正当我想详细询问沧州战役的情况时，他又昏迷了。由于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 月 11 日 19 时 45 分，父亲与世长辞。关于父亲参加沧州战役的经过，我永无向他问明白之日了。

那时我还小，只记得好多时候，睡到半夜，许多拿着步枪和梭标的民兵就闯进我家住的低矮草棚，翻箱倒柜一阵后就喝令父亲跪下，然后拿一根带来的棕绳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在家中唯一的一张方饭桌上扎篾条笼子，圆锥型的，三尺多高。父亲在上面糊上报纸，拿我书包里的毛笔写上“历史反革命陈鹤尧”，还在“陈鹤尧”三字上打个大×。自制的高帽子若不够高，斗争时会受额外的紧索和拶打，游行时还要遭受一些围观者的石击和唾骂。父亲怕人说他不老实，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赶在一旁，给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发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红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台上对着母亲和父亲伤心大哭。父亲无奈地抱住我，无声地抚摸着我的头，只有叹气。又过三年，勒令我回生产队出工，不准读书。

父亲年龄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队里放牛，上午照样出工干活。双抢和晚稻收割时节，就被安排去晒谷。队里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刘树仁，国军少尉排长，抗战时入伍，抗战胜利时退役。两人每天为队里翻晒几千斤稻谷。晒谷坪离保管室仓库有 300 米远，清早担出去翻晒，晚上手摇风车吹掉瘪谷，再担着一箩一箩塞进狭小的仓门里，通常要干到晚上 9 之后才能回家。然而队里给他俩计的工分是成人的 5.5 折。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无休止的肉体揪斗，两人养成逆来顺受的畸型人格。父亲 60 岁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导员请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亲可能认为自己 60 岁生日也不准假，争辩了几句，政治指导员竟伸手去搧他的耳光。我正在不远处的秧田里插秧，冲上前去挡在中间，喝道：“他今天 60 岁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见识颇广，好读史书。从父亲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错杀滥杀的许多真相。土改对地主婆女人的摧残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1942 年，国军军长彭锷将军出资买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湾街口的瓦屋场房地。解放时，彭军长去了台湾，他的亲妹妹彭福来被划为地主。冷天里斗争她时，拿一个大桶盛满水，放入几条泥鳅，然后将她脱光身子，扔进桶里，让她去捉泥鳅。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享受着感官刺激的贫下中农们乐得哈哈大笑。父亲由于是中农成份，那时还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亲避过了那场侮辱和劫难。

发殡父亲那天，礼生在灵堂里读家奠文时，挨着我跪着的妻子小声说膝盖跪得生痛。我说忍忍吧，这么一会儿也说痛，想想父亲在挨批斗时，常常一跪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晚上，而且被捆绑着，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可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痛。我说着，看着棺木前父亲的遗像，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对父亲特别憎恨，每次批斗发言后，总要怂恿骨干积极分子们去打父亲或紧一阵绳索。那时我多次问过父母，这个人为什么对父亲这般狠，是不是有过什么仇隙？父母怎么也不说出来，为的是怕我惹下大祸，真说出去了，父亲的命也难保了。早几年，在我不断追问下，父亲才向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 年底，日寇占领宝庆(邵阳)后，又大规模进犯新化和安化县蓝田镇，国军 73 军官兵奉令开赴蓝田狙击日寇。1945 年 1 月 17 日中午，一路日军来到今西田村九组的瓦曹门刘家。家中的猪牛全被鬼子、汉奸杀吃了。刘家的 6 岁孩童刘才方，戴着一个银项圈。一个鬼子从他项上取下项圈，随手扔给一个汉奸接住。这时刘才方的母亲认出其中一个青年汉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组杜家屋场人，叫张祝轩，小名满伢子。他见被人认了出来，就势说：“二婶子，请你告诉我堂客一声，我和×××还要出去好些时日。”21 日夜，73 军大部队与日伪军爆发潮音阁战斗。之后，汉奸随鬼子撤进县城湘莲

镇。此后，张祝轩失踪了，×××却完好无损地活至今日，还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文革时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父亲 1946 年夏从部队退役回家，家乡当时正在大力抓捕和惩治汉奸。湘乡县国民政府将黄惠臻、龙连斌、陈罗生等汉奸公审枪决。潭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谢笏卿，乡长易坚衷，副乡长成炳南，见父亲退役回家，要求他协助乡政府抓抓惩治汉奸的工作或当当保长什么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自然对汉奸十分憎恶，×××被父亲审问过多次，但他只承认被鬼子掳伕，痛哭流涕地倾诉受尽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乡像他这样的人有 2000 多个。他家有一件鬼子的军衣，他巧妙地躲过了父亲对这件军衣的盘诘。父亲见没抓到什么重要证据，就再没追究下去。

当初这些汉奸无恶不作，跟着鬼子烧杀掳掠，奸淫抢夺。1945 年 5 月 28 日下午，日寇第二次进攻潭市时，18 名鬼子成群地轮奸一个年青女子，有 2 个为日寇带队说湘乡土话的“二鬼子”参与了轮奸。国民政府花大力气缉捕这些人时，他们大都闻风潜逃了。可当解放时，这些人又跟着解放军大摇大摆回来跟着斗地主分田地了。一个穷字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父亲这些抗日军人，此时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跌入人生的谷底。

湘乡还出现过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华、蒋水生枪毙的事件。潘、蒋在抗战时杀过鬼子汉奸。这些被杀的汉奸，其子女亲属成了贫下中农，土改时便大肆报复，说潘、蒋杀他们的汉奸父亲是杀害贫下中农！甚至，大汉奸头子刘汉良被押至娄底被国民政府枪毙的事，也被他的大儿子在土改中提上议事日程，几乎被“昭雪”。父亲经常对我说，土改时，有不少汉奸、流氓地痞和无知积极分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湘乡的抗战历史几乎是被人倒着写的，真正的汉奸们反而大红大紫起来。

6 月 11 日父亲去世。第二天，湘乡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86 岁的叶启福会长，代表湘乡黄埔军校同学会，专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

一组的王国英老人前来吊唁，看到花圈上写的字，问我叶会长是否走了。他是一个投诚起义的少尉军官，说现在政府每月只发给他 83 元的生活费，少了，想问问这方面的政策。我将他请到一个避静处，恳求说："王老，您对张祝轩满伢子和×××的历史相当熟悉，又都是不太远的左邻右舍，请您告诉我，×××究竟是不是汉奸？"我这一问，把王国英老人吓了一跳，他说这人还在，爷老子千万别惹出什么祸来。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去惹他，我也没本事惹他，我只请求您告诉我他是？还是不是！王国英老人这才说："是顺民，他和张家满伢子是真正的顺民！"

顺民即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饭带路，跟着烧杀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发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黄泥村的舒栋材老人赶来为父亲丧事当礼生，我不失时机地问了他关于顺民的事。他说，张祝轩满伢子这些人都是顺民，跟着日本人走，只是具体干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至死时还耿耿于怀，一定要当今政府为他平反才咽得下这口恶气。我多次劝慰父亲想开点，一纸平反证有什么用？还是少去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亲越发执拗了，在东山医院病床上，非让我凌晨写好报告不可。当我写好大声念给他听时，父亲眼里噙着泪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对我们说："是我连累了你们的前程几十年，但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彻底领悟了死不瞑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父亲后面的话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张平反证，在他死后让我们告诉家乡人，他是无辜的。同时他也想告诉那些整他、欺侮过他的人，陈鹤尧不是孬种！

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父亲痛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时期，许多人饿死了，成批成批地饿死，绝户绝代地饿死，潭市人饿到有几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亲差点在那场人祸灾难中饿死。我亲眼

看着我的奶奶饿死。父亲当时正被赶在棋梓桥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晚上他闻噩耗后请假赶回家，伏在奶奶遗体上哭得惊天动地。

第二次是 1972 年 9 月 30 日早上，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为生产队放牛迟迟没回家吃早饭，我只好去找他。在一个山塅边上，父亲坐在那里失声痛哭，我走拢去一问才明白，原来清早在放牛时，远处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联合公报》，里面有中国宣布放弃接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的内容。父亲泪流满面地痛哭一阵后说：“我们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这些年，我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资料给父亲看。中日恢复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外相大平正芳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准备了 40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主动提出要对在中国杀死的 3500 万人进行赔偿。9 月 26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请求接受这笔赔款时，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要甚么战争赔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国，我们早叫蒋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了。”过了两天，在接见时，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进行战争赔偿，毛泽东再三表示：当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国来，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泽东确实说了大实话。当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对方。电视剧《延安颂》显示，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区域时，中共领袖们是异常兴奋的。因此，无论日寇进攻哪一方，中国内部就会有一方幸灾乐祸。窝里斗的劣根性展现无遗，而在世人面前却要装出大义凛然的嘴脸。父亲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他无法去帮衬什么人的伟大战略构想，他只知道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地干，多杀日寇是他们的骄傲，所以父亲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杀鬼子为什么反而成为历史反革命，杀鬼子到底错在哪根神经上了。

在对待父亲这些人的抗战历史问题上，我似乎读懂了某些潜在法则。他们在抗日前线拼命杀敌，从某种意义说，是不是对那种伟大战略构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后来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种端倪。

建国后 30 年来，阶级斗争越抓越严厉，甚至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过。在湖南道县，还对这些人实行全家毁灭屠杀，小到几岁的儿孙，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 7000 多人捆住赶入河中和大水库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干脆就在岸上被杀死。这种大屠杀和抓阶级斗争，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对汉奸们不闻不问，从中央至地方，从没有过要对汉奸实行阶级斗争的一条。在对父亲的无休无止的批斗中，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邻居刘云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如果不是在国民党部队，而是当了顺民，他的前途会好得多，你们这些子女的出路也会好得多！"我反驳他说，父亲虽然站错了队而成了反革命，连累了我们几代人，但总比当无耻汉奸的后代好得多。

父亲知道了邻居这话，十分生气。一天晚上，父亲在地坪边乘凉时对刘云林说："我的这个连队在浙江往江西鹰潭的转移途中与鬼子遭遇拼刺刀，一个贵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肠子也流出来了。卫生兵为他包扎好抬上担架继续转移，鬼子在后面追。这个贵州兵为不给部队添负担，趁人不注意，在担架上拿出步枪顶住下颌，脚趾挑动扳机自杀。部队缺少医药，许多兵在这次转移中患疟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们来不知幸运多少倍。至少，今天我还活着。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还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讲，我到死也要讨个清白。"

父亲认为，日本政府愿意给你赔偿，你却宣布放弃接受，这是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表态放弃者毛泽东如果代表他个人，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应该为人民作主，宣布这种表态无效，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如果毛泽东者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杀死和伤害的人民进行代替赔偿。

父亲的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铭心，将会伴随着走过我的一生。东山医院对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还从湘潭请来胸脑血管专家来会诊。父亲毕竟年迈，非医药所能救。我怕父亲死在医院里，只好将他接回老家潭市。每当从昏迷中醒来，父亲就只嚷这一句："平反呢？给我

平反呢！”到了 6 月 9 日，他的这种叫嚷更加强烈起来。我和哥哥姐姐都一筹莫展。我们拿什么去安慰父亲这颗受伤的心呢！我们十分清楚，父亲将会永远带着这种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

那天我从湘乡市统战部出来赶回医院，父亲就迫切地追问关于平反的事。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他们要研究，我们听候通知。父亲越是迫切盼望，我就越苦恼。傍晚时分，我想找几十年的好友和我的写作老师王柏松谈谈。他看了我的报告后，摇了摇头说：“现在这些人呀，都抱着条条框框，半点自主也不敢作。就是平反，也不是一天二天能做好的。其实，人家都快死了，就是去骗一骗他也是好的。”王柏松这句话突然激发我一个念头：我们做儿女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安慰一下父亲的心呢，骗一骗他也是好的呀。

于是，6 月 10 日下午，父亲病榻前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既然是骗人，就要装得象。我们从 20 公里外的月山镇请来两个演花鼓戏的男演员，其中一个还扛着摄像机。我们承诺，只要演得不露馅，父亲信以为真了，报酬好说。

我使劲摇醒昏迷状态中的父亲：“爹爹，你看啊，统战部的人来看您老人家来了！”父亲终于被我摇醒。这也是一种半昏迷状态的醒，眼睛半睁半开，迷蒙无光。父亲的耳朵有些聋，我只好贴近他的耳朵大声地重述了一遍。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我和哥哥把父亲的上身扶起一点，垫上被子，好让他聆听“统战部”领导说话。“统战部”的人说：“老人家，我是湘乡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代表湘乡市党和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我又贴近父亲耳朵边，大声地把“统战部部长”的话重述一遍。父亲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睛瞳孔里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统战部部长”挨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上，双手握住父亲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说道：“老人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您紧握手中的枪，与日本鬼子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情怀，我们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亲耳朵边大声重述“统战部部长”的话，父亲突然“哇”的一声大哭，眼泪象断了

线的珠子般从他瘦瘪了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父亲这一哭，哥哥和姐姐们都跟着大声哭起来，房间里一片呜呜的哭声。

“统战部长”继续说：“老人家，在极左错误路线时代，我们错误地对您实行监督管制，给您老人家的后半生造成了身心伤害，我们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并决定对您老人家实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亲听完我大声转述的这些话，哇哇哭得更厉害。我也跟着哭起来。哭声震动整个房间。我们的哭声与父亲的哭声是大不相同的。父亲是感动的哭，他将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是一种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们骗了父亲，时局骗了父亲，历史骗了父亲！

我拿一条毛巾不时给父亲擦着眼泪，忽听得他嘴里在说些什么。我贴下耳朵，父亲嘴里在喃喃地说着话。我听懂了，大意是在问“平反证，平反证”。我们一家人和“统战部”的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疏忽了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战部部长”很是机敏，说道：“老人家，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平反，平反证很快就会发放下来，只是程序问题了。”看来，这场戏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轮值守护。第二天早上我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晚上睡得较安稳，脸上绽着一丝笑意。但到下午 6 点多钟，哥哥与姐姐们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火速赶去潭市。

19 时 10 分我赶到父亲身边。父亲在张着嘴喘粗气，已不能言语，眼睛在无神地瞪着，似乎在盼望什么。我贴在父亲耳边大声地呼唤着。他知道我赶回来了，微微地点了两下头，右手拇指和食指对我亮着一个“圆”。我以为是父亲想喝水。姐姐把水端来，他反而把嘴闭紧了。水拿开了，父亲嘴里一个劲地说着什么，姐姐说：“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证？”姐姐的话提醒了我，我知道父亲此刻的心情。此时如果有什么人能弄一个假平反证来，我们会不惜重金相买。没办法，我只好贴近父亲耳边大声说：“爹爹，平反证过几天就会发下来，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说到这，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19 时 45 分，父亲永远地阖上了眼睛。一个抗日老兵就这样走了，永远走了。

父亲走时似乎没有太大的遗憾，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的遗憾和打击实在太大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却是一个命大的人，仅在淞沪抗战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弹击中，留下瘸指小伤，并不影响扣动手枪的扳机。他戏谑自己，因为命苦反而命大。父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举一例，日寇侵占湘乡仅一年零二个月，杀死湘乡人民 15216 人，奸淫妇女 1655 人。当初如果没有像我父亲这样一些人在正面战场拼死御敌，节节抗击，日寇就可能提前几年侵略到湘乡，那么湘乡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杀害 8 万或 10 万。也许，今天那些坐在办公室的人的爷爷、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或奸淫了，根本不会有他们出生和坐在办公室里当官做老爷了。

我曾无数次地想：如果父亲当年参加的是八路军或新四军，今天父亲该是何等灿烂辉煌？我们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又会是怎样的腾达！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吗？为什么到死还要如此残酷对待一个抗日老兵？我要大声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父亲是一个抗战老兵，他是我们儿女永生的骄傲！

父亲的两次婚姻　　陈英贤

父亲陈忠钦，福建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人。1947 年，父亲长汀师范毕业后被县教育局委任为清流县梦溪中心小学校长。这是方圆五六十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

土改时期，我家被划为地主。1951 年春，父亲被集中到永安劳动教养。在此期间，我村的地主分子陆续被枪毙五六个，祖父也差一点

被枪毙。当时枪毙人手续很简单，村公所提议，区公所批准，即可杀人。母亲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带来的各种歧视和强迫劳动，在同村一个贫农未婚青年的离间挑拨下，与正劳教的父亲离了婚。

随后，母亲与那个贫农青年结婚。很快她就后悔离婚太草率了。当时外公外婆坚决不同意母亲和父亲离婚，多方劝阻，甚至提出断绝父女关系。母亲因此好几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后，父亲劳动教养结束。母亲当初没想到父亲能这么快就回来。她亲自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表示若是父亲能重新接纳她，她愿立即离婚，与父亲复婚。父亲拒绝了她的要求。

1954 年，经人介绍，父亲和我现在的继母陈银娥结婚。继母原嫁芹溪村，结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离婚。当时介绍人就对祖母、父亲声明：陈银娥可能不会生育，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后责怪、后悔。

父亲认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况身边已有一个儿子，即便不生育也无所谓。继母是穷苦家庭出身，虽然身材瘦小，但身体结实，吃苦耐劳。她虽没读过书，但精灵贤慧，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处和睦。

祖父是乡里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儿科和妇科。继母到我家后，经过祖父几个月的调治，身体渐渐转入正常，没多久就怀孕了。此后相继生了三女二男。

1955 年，继母的前夫控告父亲挑拨婚姻。厄运再一次降临在父亲身上。那天晚上，我们家正吃晚饭，村道上连连响起敲锣声，通知村民晚上要开斗争大会。

不一会儿，我家门口出现了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通知父亲立即去开大会。父亲请求吃完饭再去，来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两个民兵一前一后押送下前往会场接受斗争。父亲被斗了一夜，关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芫区公所。父亲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实上，继母是与前夫离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绍与父亲结婚的。可是人家是贫农，父亲是地主，一告就赢。

1958 年 5 月，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劳改期间，父亲自学一些医疗知识，当上了劳改场的卫生员。获释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就调他到大队保健站，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后又调往余朋公社卫生院和东坑保健站共工作。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农民百姓格外关爱，深得广大群众的赞誉。

文革开始，阶级斗争的矛头再次指向父亲。1967 年 5 月，父亲被开除公职，回蛟坑种田，接受改造。东坑群众得知父亲要离职，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父亲留职，但无济于事。

1968 年夏，父亲被公社拘捕关押，拟定次日召开大会批斗他。当晚，父亲从关押的房间破窗逃出。1971 年春，隐藏地点被发现，父亲被抓捕，再陷囹圄。父亲只是畏惧残酷批斗才出逃的，出逃期间也未干任何坏事，县执法部门无法定罪，一直无限期拘留他，直到 1974 年才无罪释放回家。

1981 年父亲恢复公职，重回余朋卫生院工作。1984 年 2 月下旬在县城开会时，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辞世，年仅 58 岁。

父亲王药雨　　王誉虎

父亲王药雨，1904 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 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

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 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 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 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仪表，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颇有绅士风度。1957 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向我走来，说道："虎儿，快回家帮我做点事!"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笔墨，吩咐说："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己为什么不写？我有些纳闷儿。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背景。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到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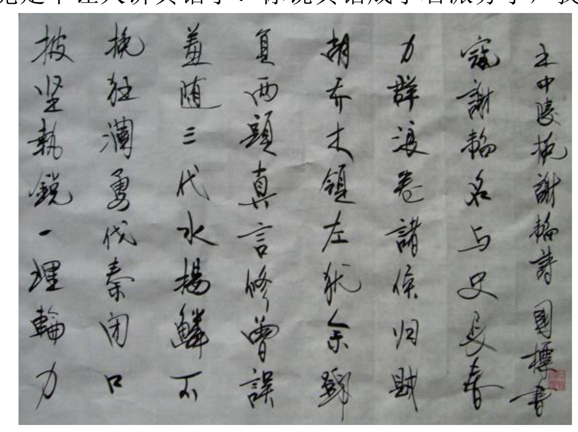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 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 年大饥荒，青海

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 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



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王中陵挽谢韬诗　　焦国标书

编者提示

一、本刊为半月刊，免费赠阅，欢迎来稿。

二、本刊电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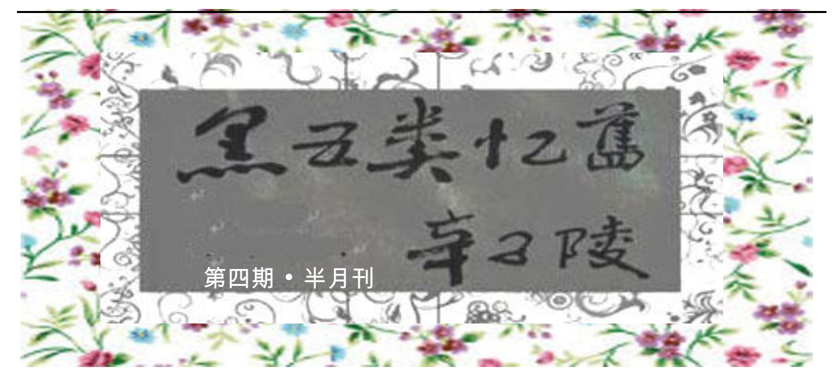
三、本刊联络手机：13240468075。

四、愿意捐赠资助《忆旧》半月刊的朋友，可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款。

五、邮寄地址：北京圆明园西路北大燕北园305甲楼110号陈星宇收，邮编100091。

六、银行卡信息：中国工商银行马连洼支行，账号0200251101028450741，户名陈星宇。

七、期待朋友们的任何意见和建议。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为什么会出现黑五类现象　　焦国标

黑五类贱民现象，在中国不以为非、不以为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

五年（1949-1984）。这一罪恶和苦难涉及的人口超过 1 亿人。编了两个多月的《忆旧》，我不幸地发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文章实在太少了，网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研究初步》，杨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属于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讨四类分子现象的社会成因部分，则更是我所浏览到的绝无仅有的几段探讨前后持续了 35 年、使上亿人蒙受苦难的丑恶现象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的文字。

李教授的这几段论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学术圈子里。今天我做一回学术掮客，把它从学术圈扛到更普罗的读者面前。当然，这里的一些尖锐措辞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这一点是需要告知读者诸君的。

黑五类现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绝非它的唯一根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那里却不曾存在大规模的类似中国黑五类的政治贱民群体。这就说明，黑五类现象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根性和国民性上长出的一个特有的巨型社会政治肿瘤。

首先，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惯于制造贱民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像印度那样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可却从来不缺贱民群体。 中共建国后，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赌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认定为新的贱民阶层，不问现状，不加审查，全都列入特殊户口管理，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部分人被歧视、受欺凌，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黑五类现象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 30 多年的社会传统基础。

其次，毛泽东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制造了黑五类贱民。毛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总体说来是属于工具主义的。说白了就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主义。几十年来，无论中国社会的哪个阶层，毛泽东要用它时就抓来或哄来一用，用过随手就扔，甚至随手就杀。中共立国前，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可是“一阔脸就变”，拿到政

权马上翻脸。建国以后，中共对四类、五类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也是屡随其政治需要而改变。想整就整一阵，想松就松一阵，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完全由着自己的政治感觉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个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陆“61 个阶级兄弟”中毒和抢救事件。61 人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他们当然不是阶级兄弟。可是为了“做文章”的需要，为了突出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兄弟之爱，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可事件过后，他们又全部被恢复了原来的家庭成分。曾经享受一时的阶级兄弟待遇，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来”——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会稳定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从土改起，制造敌人就成为毛控制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单位都制造出一小批敌人，然后让每个村子、每个单位内的大多数人与小少数人彼此为敌，于是中国成为无数个内部自成敌对关系的小国，于是中南海就在这无数小国的内战中享受着惬意的稳定统治。每个村子、每个单位的大多数人都高度戒备，避免自己进入敌对的政治贱民群体。黑五类虽然人口数量很大，但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少数。在黑五类贱民蒙受苦难和屈辱的同时，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幸运的，因此对社会也是相对满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对满意，这个社会能不稳定吗？

第四，寻找替罪羊的倾向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寻找替罪羊倾向是人类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泽东的中国，这种天性发挥到极致。1979 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这表明，四类分子已经成为农村干部以杀鸡吓猴方式统治农村的那只鸡。70 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个村子，某年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在一个集市日去赶集而不到集体田里劳动，驻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大为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

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批斗大会，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们的儿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显著，农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农民不出工去赶集，是对大集体消极怠工的一种表现，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黑五类就是这样的替罪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万事一收拾黑五类就大吉大利。

四类分子摘帽前，地富分子死了，子女要接班改造。一些公社、大队开会时，煮饭、取暖用的烧柴全靠四类分子无偿背来，老子死了，儿子继续背。地富子女成为某些特定领域的生产主力军，离开他们，社会几乎无法运转。某些偏远地区，马帮的驿道维修主要靠四类分子。1979 年四类分子摘帽后，无人负责维修，道路状况迅速恶化，摔死摔伤驮马的事故频繁发生。中国社会已经离不开政治贱民。今天，社会底层贱民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四类分子阶层。当年社会对四类分子的歧视与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象改变了，比如变成对贫困者和对农民工的冷漠。今天的北京，引进的海归或其他人才，孩子可以马上入学，可以参加北京中考、高考，可是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却长期上不了学，现在可以在北京上小学了，却仍然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高考。中国啊中国，你不制造贱民就无法显示你的文明和强大吗？

补白：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在当时的电影里，穿风衣的全是特务，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在我们几个小学生眼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跟踪越觉得他是个特务。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让他把我们甩了。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随时随地准备抓特务、

抓敌人的情绪当中。　　　　　　　　胡发云

玛丽有只小羊羔　　焦国标书

目　　录

平反还是谢罪　　茅于轼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被整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 1958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抄家，扫地出门，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

走上发展之路。

当时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专政机器还专谁的政呢？这种思想至今也还有市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仍然被保留在宪法里即是明证。还有四个坚持之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也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还告密说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上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

平反之于我，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平反前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而且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因而我更关心普通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个人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常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则实在是被正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的主张，还有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应该是毛去见他，而不是他去见毛，诸如此类。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就说明那时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共产党做错了。所以它要给我平反，可是逻辑却不许我领这

个情。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可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就是究竟谁对谁错。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是谁赋予一个政权虐待自己百姓、无端迫害他们的权力。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谢罪的问题。

母亲的自杀　　周　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

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

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

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 56 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

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 40 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

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

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

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

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补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刚好他过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胡发云

补白：远房表哥颜廷勇，三次匿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论给像他这样的地富子弟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枪杀。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宝贵的生命却永远被绞杀了！让我们记住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 柴会群

我的早年　　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

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 1955 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

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1966 年 8 月 3 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 月 4 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 XX 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

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 8 月 4 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 月 4 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 8 月 4 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 8 月 5 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

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补白：六六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斗。只见百十个红卫兵，带红袖标，身穿绿军装，有的举着毛像，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手持橡皮头木枪，中间有敲锣打鼓的，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这是我最早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后边红卫兵押着两个牛鬼蛇神。一个头发被剪得狼牙狗啃，一个头发被推成三道门。正是大热天，却都穿着了死人的寿衣，被五花大绑捆个结实。我以为那人犯了什么罪或是现行反革命，红卫兵揭露其罪行时才知道，两人都是私开镶牙诊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我还以为要把他们送进监狱，末了却是红卫兵分别把他们押送回家了事。中国那时整个是个大监狱，人们在家等于坐牢。另有一个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纺三厂职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几间房，对脸房两排之间距离不过两米。每家垒个放煤球炉子小屋，一个胖子走不过去，每间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后，红卫兵给他松了绑，严厉教训一番。他的家已经被抄，门口贴着一副白对联，上联“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文革发动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住贫民窟的受苦人却还代表着资产阶级。真是荒唐透顶！李建华

十四年的隐私　　海　鸥

1980 年 1 月 11 日，车间党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议表决大会。与

会的三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我和房师傅为预备党员。我俩各自宣读的自己登记表中社会关系一栏的内容，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我岳父和我爱人的姓名在我俩的社会关系中都出现了。这一栏的内容显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这个对外保守了十四年的亲属关系的秘密，此时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文革开始那年，春节刚过，房师傅把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堂妹晓玉介绍给我。正当我俩相处得如胶似漆的时候，晓玉告诉我："不知为啥，我哥想拆散咱俩。他非要再给我介绍一位铁中的老师。"我十分气愤，找到房师傅当面质问。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最近我听厂部议论，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数你最有发展，群众口碑好，根红苗壮，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响你的前途。那时你会恨我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还会做下去吗？"他略作忖度："你家里什么意见？""还没到向家里说的时候。""你要认准了晓玉，那我只有祝福你们了，但有两点你要记住：1、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你们的介绍人；2、任何时候不要说咱俩是亲戚关系。"我答应了。

房师傅和晓玉的爷爷有四个儿子。土改时，晓玉的父亲被划为富农，其余三个儿子皆被划为地主。房师傅三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四叔——晓玉的父亲把他接到家里抚养。

文革期间，我被分到房师傅的车间。为了遵守承诺，我尽力避免与他直接接触。有时走路迎面碰上，他会突然一拐，走向他处。有时实在有事找我，他会拿一张图纸做掩护，比比划划中与我谈私事。不久，他与相处一年多的女友（我厂化验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响下一代。一个星期天，在晓玉家，我俩碰到一起。他说："我要像晓玉那样，非找个红五类出身的对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脉纯度要改变。"晓玉妈妈道："你还想入党提干呀，那么看重成分？小杜哪点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辈子光棍才怪呢。"他说："婶，你不知道现在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么也得设法改变下一代一半的血统吧。"不久，他真的找

到了改变老房家血脉纯度的人，又很快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这个嫂子，人长得很清秀，父亲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妈妈改嫁，与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点抚恤金生活。

1966 年 9 月，房师傅偷偷告诉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赶回农村。我去不方便，请你去帮他们搬家，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叫我转交给他的四叔。晓玉的父亲很不满意，埋怨这个侄子在最需要他的关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钱。78 天之后，晓玉全家又被她父亲的单位接了回来。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老人赶忙将另外两个孩子也圈拢过来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姑父，快叫。"孩子们马上齐声喊道："姑父好。"看着这些长得一个比一个壮实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说："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帮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来："你们可是实在的亲戚，怎么也不串门走动，是不是有啥隔阂？"我笑着作了解释，告诉她这是大哥定的规矩。她听了无奈地说："小心点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时辰选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错了皇历，自古以来年逢丙午都被称为红羊劫，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就是双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们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我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元钱给了他们。在回厂的路上，忧伤不断向我袭击。这下一代孩子，难道也要沦为低种姓的小贱民吗？

林彪之后，邓小平复出，我厂也开始步入正规，妻兄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是我厂唯一的一个出身地主的非党干部。为了表示祝贺，

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谢。“毛主席说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小心为上。”把我搞得很尴尬，好像我在巴结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惯例，一大早高兴地告诉我：“昨天区里的领导一大帮人到我家来看望老太太，还带来礼品。区长与我握手照相，又给了一套精装毛选四卷。”我还没来得及问详情，他已走开了。后来听他邻居说，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区领导下来慰问军烈属。

1978年冬，我到铁道部开会，听说中央马上要发布《关于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回去后我告诉妻兄，他极为兴奋：“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点。”“可以。等我高兴时再说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作为上次的报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妻兄十分激动，主动邀请我晚间去他家小酌。席间我打趣他：“毛主席对华主席可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两报一刊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们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不管这些。既然今天把我这顶帽子摘了，我坚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哈哈，我终于看到我们房家血统改变的日子了。”当晚，我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间，因出身而沦为低种姓、被唾弃的5000多万政治贱民。

乡下的大船哥哥　　童　话

大船哥哥是乡下伯父的儿子。父亲逃出家乡参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渔，兄弟俩好多年断绝音讯。家乡海湾物产丰富，伯父因勤劳能干，置了一点土地，还买下一挂车。土改一来，伯父被划成富农。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故乡人顽强地找到了父亲，伯父的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到北京登门。父亲对登门的侄子们很是严厉。

乡下的堂兄们都沉默寡言，饭量极大。大船哥哥却很有灵气，一来就和我哥哥熟识了，操着乡音聊天，讲水浒谈三国。成年的他，喜欢替哥哥做头疼的算术题和作文。我们瞒着，不让父亲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欢看家里的书，有时看得出神，忘记回避父亲，看见父亲，总是抱歉地把书放回原处。他写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强，爸爸气愤地训哥哥“还不如乡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临摹了一页小人书，是仙女在瑶池沐浴，画得像极了，只是瑶池的入口忘了留门。我提了出来，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妈妈看了这张画感慨地说：“大船没有念书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气，说大船哥哥画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么，哥哥也陪在旁边跟着挨了训。

乡下的哥哥们返乡前要采购些糖果点心。这事通常由哥哥代办。六十年代物资困难，票上的买完只好买高价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采购任务以后，就提议到中山公园去玩。我们欢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记照看东西了，竟把给大船哥哥带的那一大包东西丢了。我们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最后只得回家受罚。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乡的。

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了七年。“解放”以后，在报上看见家乡修油港，思乡心切。七七年秋，我随父亲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乡亲们仍然视他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还戴着富农帽子。父亲问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会儿，终于说刚刚摘了反革命帽子，但还在专制队里。父亲问是什么缘由，大家说是因为写诗。父亲叹口气，气急败坏地说：“他能写出个什么？” 又问大船哥哥的亲事，大家说四十岁的大船哥哥和邻村一个带两个孩子的寡妇刚刚定亲。我们没有去专政队看望大船哥哥。

时间一晃到了 2000 年，父亲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儿子却金榜题名到北京来上大学了。大船哥哥四十二岁得到儿子，精心培养儿子，

让儿子接续他去圆读书梦。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没有去大城市读书，连县中也去不了，就在渔村的中学上学，竟考了出来。家乡已经成为旅游区，不再经营农业或渔业，六十多岁的大船哥哥是市场清洁工，嫂子赶海找些海物卖给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码需要八千元供儿子在京读书。对于他们，这是一大笔钱。

阔别四十年后，在北京我又见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经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脸是海边人特有的古铜色，布满纵横皱纹，正像名画《父亲》中的老人。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的谈话开始进行得很困难，后来还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瑶池的仙女，我妈妈的宽容和我爸爸的严厉，提起在中山公园丢失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

大船哥哥虽然是“富农”子弟，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困苦。少年时背负出身包袱，中断学业，饥荒年月挨饿，为了吃饭在北京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政治上又出了问题，接受专政，娶不上媳妇，晚年又要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负担昂贵的学费。但是大船哥哥一点不埋怨命运，话语间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话中总时不时说“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没有给老叔（我父亲）抹过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吗，我受的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无以名状的难过。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亲回乡的事，大船哥哥也没有怨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们乘坐的汽车背影的情景，让我好不辛酸。

后来大船哥哥从家乡来过几个电话，托付我几件事。“妹子你要劝你侄子读研究生，别怕读不起。”“妹子你要劝你侄子申请入党，入党还是好。”“妹子你要费心帮你侄子在北京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么。今年大船哥哥的儿子最终放弃了考研，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没有入党。一个贫困的乡下孩子，白手起家，独自在北京创业，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又谈何容易？

补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反右时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后总觉得有些别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劳动，他发现地上有一本笔记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捡起来一看，大为光火。那笔记本是党支部书记的，里面记载着哪些人是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这个同学还是共产党员，却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个“中右名单”是绝对保密的，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控。据估计，“中右分子”全国约有 300 万众，比右派分子多五六倍。　　　　　　　　　　　　　　　　王书瑶

补白：文革初起时，北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也如其他同学一样，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那清脆、尖利、威严的声音覆盖了操场，又被不远处的高楼反弹回来，余音不绝，吓退了想上台发言的黑、灰二类，也刻进了不少同学的记忆留声机里。8 月 7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因为没有点名，直到 1966 年 8 月 18 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能他心中已经有数，国人通过电视，看见他神情抑郁。后来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悲惨而死，邓小平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刘、邓和他们的儿女们由红变黑。文革后，他们又重拾“光荣”。真正是大起大落，荒诞诡谲。张　敏

五姨妈　　蔡　楚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民国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训导主任，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1932 年与王新培结婚。

王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在成都学道街建一家书坊，名曰志古堂。由于刻印的书籍选题对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学术界好评。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典籍。

1945 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与婆婆一道艰难维持志古堂。大陆易帜后，一系列残酷运动开幕。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于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好在我家族中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五姨妈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样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当时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若总是戴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当局可能也觉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关门大吉了。抗美援朝时，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版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间，这些书版被作为四旧焚毁，志古堂的匾牌则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亲戚将其反扣在猪圈前，作为粪坑的踏足板，终于得以保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

五姨妈被管制得服服贴贴。改革开放初，有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五姨妈不敢回信，悄悄把来信烧了，怕秋后算帐。1979 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诩为中华文化传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妈从亲戚家的粪坑边把这块文化见证物找了回来，但俨然拒绝出卖。

补白：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胡发云

补白：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一个姓杨的社员，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1972 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姓杨的看到一个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这则笑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姓杨的胆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会组织大会，将姓杨的揪出批斗后，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对姓杨的逮捕法办。　　　陈宗培

谋害伟人案　　晓　寒

这一天，我们兵团里召开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照例要我们宣教科去布置会场。大会在露天开，会场是一个农村小学的操场。正前方靠墙砌一个一米来高的台子，台前左右各树一根木杆，用来悬挂横幅会标。作为背景的墙面斑驳陆离，需要撑起一块蔚蓝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张贴当时能“请”到的幅面最大的毛伟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

魁梧，责任心也最强，贴伟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纸质伟人像四周有一道几指宽的白边，张贴时往往先用图钉把四角钉牢，然后再在四周白边上摁若干个图钉。在室内，通常 8 颗图钉就够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风沙很大，一条边至少就要用五六颗图钉才能压得住。这天开会前，狂风大作，老苟双手压着伟人像，赶紧在四边加钉图钉。左右两侧，容易被风掀起，老苟揿了十来颗图钉还怕不保险。

会后有人发现伟人画像身上有细微的钉眼，便向领导报告，说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苟马上被停职隔离反省。后来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证——分布在白边里边伟人画像上中山装口袋边的三个钉眼。那是什么部位？那是伟人的胸部啊，心脏啊！于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苟××！”“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苟××谋害毛主席罪该万死！”诸如此类的吓人标语，刹那间贴满机关大院。可怜老苟一个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儿，挂着黑牌佝着腰接受了十多场批斗。有一场就是在那个露天大会场召开的，名曰“再来现场消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这个现行反革命家属，也被所在连队贴了许多低级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报，还有几次她胸前挂着破鞋被拉到大会上陪夫君挨斗。

这个老苟，海军转业干部，从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队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党，在部队里混不下去，只好转业到新疆兵团。在兵团里，老苟可算个能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运动场上也是个好手，简直是文武全才，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划边框，拿起画笔，仿宋就是仿宋，楷体就是楷体，隶书就是隶书，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老苟身上学到许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师益友。

老苟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 6 个月后被放回家了。不知是因为老苟一贯表现良好实属一时犯迷糊，还是团里太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了，后来师部决定“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记大过一次。

几个为他担惊受怕大半年的好朋友又相聚在他家里。我这个胆小窝囊的书生只会说：“老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老苟却一脸坦然：“小王，我是罪责难逃啊。我早想通了——要不是我那天多摁几个图钉，画像被风吹落到地上，我不还是这个下场吗！”

补白：1969 年我 14 周岁，第一次去天津国棉三厂学工劳动。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与一个同学一起往家走，在路上看见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两个人都想抢那枚像章，同时跑到，我一伸脚把那枚像章踢出一段距离。这位外号毛驴的同学脑子不快腿脚快，他抢到了那枚像章。学工劳动结束后，老师在班上宣布责令我停课，并给我办学习班，让我坦白交待问题。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行，老师最终把那天抢像章我踢毛主席像的问题说了出来。原来那个同学揭发了我。回家后我向父亲说了此事。第二天，我父亲戴着红袖章去见老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解释，老师终于同意了我父亲的说法：我是由于实在太热爱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我获得无罪释放，得以重回课堂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　李建华

他为何疯了　　海　鸥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

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单位的一些见闻，并问我参加了哪个派别、什么观点。我总是告诫他：“我们是毛主席说的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个派性组织，你知道哪个绝

对正确？千万注意，可以观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铁路局办事，来单位看我，兴奋地悄悄高诉我，他现在正处对象呢。我当胸给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妇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说：“身不由己呀。”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一寸的照片给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个小妞。女孩子是我们铁路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学习很好。若没这场运动，应是大一的学生了，现在只好蜗居在校。这次她们班级到工厂学工，两人认识了。为了运动过后能再考大学，她一直没有丢下功课。在辅导功课的往来中，他们相爱了。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们祝福的份儿了。

1968 年夏的一天，我们铁路各单位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停产，到火车站去接由哈尔滨转来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由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缓缓出了车站。那阵势好似超级国宝，就像今天有时电视里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会后我与庆生又见面了，并请他到我刚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间，他问这芒果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道谈恋爱，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珍贵水果。老人家不舍得吃，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这样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这全国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个玻璃箱子里的是腊制的芒果。”“啊！就为接一个假芒果，全市停工停产停课？真是政治压倒一切呀。”“这算啥，你没看到，隔三差五，晚间八点中央广播电台都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了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大家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庆贺，敲锣打鼓放鞭炮，一折腾就是半夜。这可苦了咱们那些调度和司机，第二天没精神工作，事故层出不穷。昨天南货场一台机车就因司机打瞌睡，将车开进了绝后线翻车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局调度所。据他说，咱局管辖的线路阻塞现象相当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电报。要满足需要，每天至少要发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我们每天

只能装运一千多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还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虽然军管了，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发生的行车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说：“去年我们车站两列火车相撞，不就是因为两个扳道员分属两个派别，当列车快进站时还在那儿辩论争吵造成的！我看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1968 年春节将至，我给庆生去个电话，想约他一同回大连过年。接电话的是他们技术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孟庆生在一个月前就被抓起来了，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放下电话我就懵了，这不是给专政了吗？到底为啥？我决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详细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庆生的女朋友在所难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时给她写了封信，说是不是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若能开出一张有慢性疾病的证明，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结果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说他与知青搞对象，出谋划策伪造假证，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开挂牌子批斗。

通过主任，我见到了庆生，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那张方脸上，颧骨显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狱中方志敏。我劝慰他几句，并问需要我做点什么。他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分别时，我突然听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头的庆生大喊道：“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他的主任对我说：“看来他的精神出问题了。只要张口就喊这句话，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受到这样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来处理一下。”

春节回大连，我去了离我家不远他的哥哥家。他从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带大的。经商定，我们决定初四一同赴齐齐哈尔。几经交涉，单位认可了医院的鉴定（间歇性精神病），并同意回家治疗。这期间，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没露面。

以后我几次公出回大连，均没见到庆生。据他哥哥讲，通过一段

时间治疗，病情已明显见好。平时哥嫂上班，他一个人到处逛，就是不愿意回单位上班。又听我母亲说：有段时间，每到中午他都会来要吃的。那时每人粮食都有定量，他的粮食关系不在大连，全靠单位每月寄来的全国粮票吃饭。有时单位寄得不及时，他就要饿肚子。哥嫂上班，没人照顾他，挺可怜的，但神智清醒。

1971 年我去上海开会，返程时在大连逗留几天，见到了庆生。我告诉他：他们单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齐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抓，革委会成员基本全变了。他听后说："我决定回去上班。"就这样他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

那年刚入秋，庆生手拎一个大油瓶子来到我单位，说："这是我每月余下的油票换成的豆油，送给你们。"我说："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在大连养病时没少麻烦你老母亲，这就算一点回报吧。"我让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说不行，他要赶晚车去北京，又一再叮嘱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当时我就纳闷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单位告诉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 林彪叛逃事件未公开之前，已经在知己小圈子里偷偷传开了。有一次庆生在厕所关着门大便，进来俩人站在便池台阶上小便。他俩以为这里没有第三者，就大胆议论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里面的庆生听到了，从门板缝中一看，竟是军代表，吓了一跳。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并断定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一到北京，马上被相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回来后可难坏了单位领导，是押还是放？经请示，暂时羁留。

是呀，这写入党章铁板一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突然叛变呢？一个正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对于一个精神刚刚复苏的病人确实是如雷轰顶，无法接受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当时中央对林彪叛逃事件严密封锁消息。最初，媒体甚至故意制造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的假相。记得在林彪死后的第 17 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 10 期的目录时，还在该期

画报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后期传达《中共中央 1971 第 57 号文件》时，还采取了内外有别、分步骤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这样一个时间差导致孟庆生的政治误判。所以该案很快也就结案了，但却大大刺激了当事者那刚理顺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经。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连。

1972 年回大连，我又去了庆生的哥哥家。门是锁的，打听邻居，得知庆生就在周围闲逛。我从胡同的东头进来没看到他，所以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就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倒显得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我疾步走过去喊了声："庆生！"他没反应。难道看错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没错，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他这次病得不轻，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

这时走过来一位大婶，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与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这位大婶，问道："你认识他？""我们是邻居。"

补白：1952 年最难忘的是看斗地主。那是个女地主，田地房屋都没收了。工作组怀疑她藏有金饰没交出来。各种毒刑用尽，她还是说没有。一位天才想出一个妙招——从山上采来黑蚁巢，把它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她的手被反绑着，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上吊死了。这一段记忆在我心中总挥之不去。这样斗地主也太无人性了吧？土改夺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房屋；夺人家的房屋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钱财；夺人家的钱财

也就罢了，还夺人家的尊严；夺人家的尊严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性命！农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很多地主既勤且俭，既不偷又不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聚了一点财富，却成了罪恶，并且祸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补白：根据苏联的经验，原计划镇反运动中要杀掉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镇服人心。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1954 年 1 月的报告，总共逮捕了 262 万人，其中判刑劳改 129 万 人，管制 120 万人，处决 71.2 万 人，处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 1.31。有人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在 100 万到 200 万之间，甚至更多。如果按 150 万人计算，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 2.78。

怀念陶懋颀　　胡显中

陶懋颀是我在南昌心远中学时的同班同学。1947 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时间告知的那个人就是我。足见我们友谊之深。1948 年我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奉命发展党员，其中就有陶懋颀。解放后，我继续“革命”，他继续念书，进大学深造。此后几十年，我俩虽生死两茫茫，却不思量，自难忘。

大约是 1979 年，我还在煤矿从事强制劳动。某日一大早，刚下晚班，本应是睡觉时间，一个姓孙的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懋颀的吗？”“认识。”“什么关系？”“中学同学。”“还有什么关系？”迟疑片刻，我说：“还有就是，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入什么党？”“当然是共产党了。”

只见他突然用惊异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来你还是个共产党？”“当然。不过现在谈这些，似乎没什么意义了。”孙干事叫我马上写份材料。他可不管

现在是不是我的睡觉时间。我这才知道陶还活着，正在办理恢复党籍的事，需要我这个劳改就业分子给他作证。

年底，陶寄来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获至宝，一字不拉地读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问题比较复杂，为此我曾问计于陶。他早已平反，并且频繁参加学术会议，非常活跃。他约我定个时间，到北京和他见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等到了参加学术会议刚散会的陶。他建议我写一份材料，由他转交胡启立。

由于交谈机会太少，我们一直没有时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周年，我先后读了北大当年的学生右派陈奉孝的《梦断未名湖》和王书瑶的《燕园风雨铸人生》两书，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来是他看了从国外进口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译了这份重要文件，并加上一篇重要序言，准备在《广场》上发表。可惜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没能实现，陶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今天看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文献，足可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媲美。如果说《人权宣言》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那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自我吹嘘什么“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背后的惊人黑幕，让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惨烈血腥的大屠杀、大阴谋，从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现代封建极权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刑。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相反，惨败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苏联斯大林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近4000万，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7000万。毛泽东最优秀的学生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在一个仅800万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时间里竟杀害了170万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所以全世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必需彻底消灭这种吃人、杀人的制度。只是

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死刑判决推迟了 30 多年，直到 90 年代前后才开始执行，到今天仍然没有执行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和虚伪，给那些被共党洗脑洗得神魂颠倒的人们一帖清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杆信徒毛泽东害怕了，恐惧了，颤栗了。他断然采取行动，通过搞阳谋，大批虐杀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报告的巨大影响，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地位。

陶懋颀看了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热血的体现。他还敢译成中文，传播开来，更表明他是一个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据陶的夫人杨淑敏回忆，陶病危期间，他的学生、中科院学部委员张景中全家特地乘飞机来看望，并给陶老师洗脚。陶过意不去，急忙阻止，说学部委员怎么能给他洗脚。张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多么令人感动啊！这种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像右派这样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几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讲人道和师道的人，而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陶懋颀的胆识、魄力、贡献，感染了无数人，足可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勇敢的难友，安息吧！你虽死犹生。你敢于翻译那份杰出的文献，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点、最耀眼的火花、最杰出的贡献。无论经历几多岁月、几多风雨，你的功绩都将永存而不磨。

补白：土改划地主是有政策指标比例的，比如 5%，8%。没有很富的，就拿较富的凑数。在我家住的一个大屋里，1950 年土改中划出 2 户富农，2 户佃中农，2 户中农。那 2 户富农的生活跟其他 4 家一样。有一家甚至还差一些，之所以被划为富农，只因为这家的老人过去当甲长时抓过偷谷的小偷，这小偷的丈夫后来正是贫协骨干。

补白：我的战友郭东昆在天津北宁公园与学生联欢中，和一名女生有了恋情，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一调查，女方父亲在镇反被镇压，立即驳回。男方坚持要结婚，被立即清除出军队。我另一位战友孙道

明，曾任华北军区文工团舞蹈队队长，近四十岁认识了张家口一位演员，因她的前夫被关押，结婚申请自然被驳回。他为结婚也选择了离开军队，落户在柴沟堡。笔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她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中校军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坝上行医。我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不说明理由，只告诉我：另找吧！我坚持，也准备步郭东昆和孙道明的后尘。后因我的业务部门首长顾炎替我说了话，才没有被迫离开军队。　　　　　　方影竹

好险的棒子根　　林　玉

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恍惚是九十月间，我家一次次被抄，批斗父母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时我们黑帮子女接到学校通知，要安排我们到顺义潮白河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天刚擦黑，我们这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被老师带到村里的场院上排队，立正、向右看齐一顿喊。奇怪，那个时代一切向左，就这条“向右看齐”被忽略了。

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手执红语录，走上前来对我们朗声道：“同学们，我是本村的贫协主席（后来得知，这官可不小，对全村黑五类有生杀大权），可以代表本村全体贫下中农对你们进行阶级教育！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地参加劳动！世界观改造好了，你们还是可以积极参加革命的！下面，我领大家唱个歌儿。”于是大家跟着她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踏着前辈的脚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过来。阶级斗争永不忘，昂首阔步向前迈！”

学唱之后，有人用一支大手电筒照向另一边，高叫着：“同学们，阶级斗争很复杂，下面你们要认清这些坏蛋的丑恶嘴脸！”孩子们在惊恐中齐刷刷地转过身来，随着大号手电筒的强光，猛然发现我们旁边

竟蹲着一群人！他们都是黑五类。电影里的坏蛋面目狰狞，可是这些坏蛋与我们长相差不太多，让我们感到意外和震撼。

这次旨在改造小学生世界观的三秋劳动为期 1 个半月。有一天，我们小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儿。秋收时，先把玉米秆砍掉，下边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儿。满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贫下中农把这时的田地叫做刀山。

为了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下了田。我们负责将刨出来的棒子根儿拉到田头儿。我使劲抱起几个刨出的棒子根儿，可哪里走得动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横卧的玉米杆儿旁，累得我一个屁墩儿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杆上。

没有想到底下藏着一个没有刨出来的棒子根儿，尖朝上，一下子杵进我的内裤里！我哇的一声叫起来，老师同学都向我跑了过来。外裤内裤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内侧鲜血如注，疼得发抖。老师让一位女生帮我扭着外裤，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么出身？你？”一位男赤脚医生一边舞动着药棉棍一边问。我泪眼巴巴地答：“……贫农。”我瞪着眼撒了个谎。“嗯，贫农后代还哭什么，没大问题，过几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脚医生看着流血的大口子说：“幸亏还差那么一点点！我给你上点儿药，很快就好了！”上药时，我疼痛难忍，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躺在地铺上好几天不能动，每天听着同学们唱着“我是贫农好后代”的歌曲出工，回来，又出工。有一次，女贫协主席进来了，老师把她带到我铺边。她问：“不疼了吧？”我点头。她转头对老师说：“要说可够危险的。再偏一点，这孩子这一辈子就惨了。”“怎么就惨啦？”我听见这话就傻问她。“你就……就……”她看着我，一时竟答不上来。老师接上话茬儿说：“你就不能和同学们一块闹革命了！”我一惊。不能革命了，那还真是够危险！

许多年后，我无意中翻出那条被棒子根儿杵破了的旧裤子，当时的情景顿时重现于眼前。我这才意识到那个尖刀似的棒子根儿是多么可怕，它差点就破坏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补白：父亲有一副好心肠。文革期间，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四类分子是不能参加的，他们必须低头站在屋檐下请罪。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非常冷，房前站着的四类分子冻得直哆嗦。父亲出屋门上厕所，看到其中的一个哆嗦得特别厉害，便冒着自己可能被批斗的危险，毅然脱下自己的破皮袄给他披上。　　　　　博　客

同学李大颡　　佚　名

李大颡是我小学时一个同桌的外号。那时他身躯瘦小，却顶着个大脑袋。颡是我们陕西的土话，脑袋的意思，俗曰“颡大心不闷”。 李大颡家是地主，其实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为他爷爷当过国民政府军的营长。李大颡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于 1967 年，因为长期饥饿，母亲没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亲奶上哭闹。不到三个月，妹妹含着母亲的乳头饿死了。邻家大叔用一块破布卷起妹妹，提着一把铁锨，抱出去埋了。

一般贫下中农粮食也不够吃，也有孩子众多的，但是可以申请救济粮。李大颡家不行，因为这项待遇对地主家庭无效。1967 年饿死孩子是例外，对他家却是必然。他家甚至吃过皂角树叶子。二月二龙抬头，农村有吃炒玉米粒的习俗。李大颡放学回家对母亲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么不炒？”母亲什么也没说，搬过一个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这口缸是他家盛粮食的唯一器具，让他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尖往缸里看。里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糁，一粒苞谷也没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 年，我们读三年级，学校排演现代秦腔剧《杜鹃山》，李大颡扮雷刚。在一个水库工地演出结束时，天色已晚。工地慰劳小演员，

每人两大碗面条，外加一个杠子馍（长条状馒头）。两碗面条足以吃饱，杠子馍谁都没有当场吃掉。回家的路有 15 里长，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过村庄，有狗跟着他们乱咬。许多学生掏出杠子馍，一块一块掰着打狗，看狗抢食。李大颡却想着哥哥、妹妹在家挨饿，舍不得逗狗，而是紧紧揣在怀里。到家大概九点多了，屋子里黑着灯。哥哥和两个妹妹已躺在炕上，母亲坐在炕沿儿发愣。李大颡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知道我拿了个啥？"说着把杠子馍递给母亲："这是发的。等明天早晨让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顿白面蒸馍。"谁知哥哥饿得并没有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说："妈，我没有睡着，现在就要吃杠子馍。"

李大颡个子不高，如今也只有 1.66 米。他的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也很有绘画天赋。四年级时，他曾在演草纸上画了两只猪的交配图，很生动，贴教室墙上。女同学看了，脸红心不满，可又无话可说，因为他在画上写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几个字。进入初中，他的画画天赋进一步发展，学校的板报画多出自他手。有老师提醒他说，光画粉笔画是成不了器的，应该用画笔来画。可是他没见过画笔，不知道画笔什么样子。请教清楚后，知道家里没钱买，就寻思着自己制造一支。他把父亲吸旱烟的烟嘴偷走，想着再找些猪毛羊毛什么的栽进去就是一支画笔。可是没等他设计成功，父亲就在他书包里翻出了烟嘴，一口咬定他在偷着吸烟，不容分说胖揍一顿，任他怎么解释也白搭。他画画的兴趣由此断送了。

大约是 1969 年，春节过后，家里面临断饮，十一岁的他和母亲以及一个七岁的妹妹走上逃荒讨饭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泾阳县和三原县。一晚上，无处过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个弃废的窑洞里。窑洞靠里的一半已经完全塌掉，前半边还可挡风避雨，但顶部却有一块裂着长长口子随时可能跌落的大土块。李大颡让母亲和妹妹睡觉，自己则一直盯着窑顶。如果落下面面土（细末土），就马上叫醒母亲抱着妹妹跑。由于担心，他一晚上没睡着。

还有一次，天黑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借宿。那个村子家家都养着狗，每到一户人家门前都引起一阵狂吠。出于对外乡人的警惕，

尽管他们低声哀求，却没有人收留他们。无望中，娘儿仨在村边一个空场地坐下，茫然无措。狗叫的声音消歇了，妹妹由于行走劳累和饥饿，泣哭声显得清晰起来。过了一会，村头一户人家吱咛一声门开了。夜色朦胧中，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向他们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没多久，门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跟前，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这一家偏偏没养狗。那位老妇人给同学一家腾出一个大炕。妹妹不哭了，却开始对着母亲喊饿。老妇人听到后，立即用大碗满满挖了一碗苞谷糁，生火做饭给他们吃。李大颡喝了两大老碗苞谷糁糊糊，喝饱了，倒头便睡。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虽说是铺的苇席子，可总担心第二天早上怎样向主人交代，于是不停挪动身子，直到用体温把尿湿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乡镇。母亲和妹妹坐在镇食堂（当时乡镇级的饭馆都叫食堂）门外的台阶上，大颡进食堂见机行事要饭。一位上身穿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子，进门坐在饭桌前要了一碗红肉泡馍。大颡走到干部面前，胆怯地说："叔，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饭的。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狠，饿得狠。"干部没说话，两眼盯着同学足足审视了两分多钟，也看了看门外的母亲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斗争。估计这碗泡馍对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见他猛然间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说话，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颡愣了愣，端起那碗饭，走到了门外。

要饭的人都必备着一根打狗棍。李大颡说这并不是打狗棍，应该叫防狗棍。到别人门前要饭，本来就是乞求于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饭了。每当有狗围着他娘仨乱叫时，他只抡着棍子虚张声势，以保护妹妹与母亲。碰到实在凶猛的狗扑上来，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让它咬住棍头。近三个月的要饭过程结束，同学提的那根棍子，本来圆圆的棍头已经让狗咬成了扁平状。

中学时期，童年的好友渐渐与他这个地主子弟划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样保持着距离。村干部的子女也日益显现出优越感，趾高气扬，对他不理不睬。他与女生的关系更因其地主成分而变得越发冷漠。同

年级同学中，同班同学之中，唯一与他说话的女同学是一位黄姓的女生。黄同学容貌出众，小时候男同学扯起来找哪个女子当媳妇，我们的首选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邻村一个村干部子弟找到李大颡，问他跟黄同学能不能说上话，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颡问啥事情，回答说是想把黄同学约出来谈一下，和她谈对象。李大颡大约对黄同学也有好感，这种为他人牵线搭桥的事让他止不住悲从中来，心想自己这辈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里老少爷们儿喜欢在麦场上露天过夜。两块砖头垫一张纸就是枕头，铺的是随手带的苇席子。一群人凑在一堆，躺在地上边搧扇子边谝闲传。李大颡也欢喜露天过夜，可从不往人堆里凑，总是一个人在边角处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另类，仿佛不让别人眼里出现自己，这世界会显得清静一些。我们村距秦岭不远，那个时候夜里仍然时常有狼出没。

李大颡就读的那所高中，离我们村有三十里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带粮食，来回都是步行。1976 年，大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立即遭遇冰冷的现实——被编入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一天１２个小时强体力劳动，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他时常寻思，就算我的爷爷有罪,我们这些后代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岁的他，开始过早地关心起政治来，心想毛泽东这个造孽的咋还这么能活呢？四人帮倒台后,闭塞的农村并没有刮进多少新的信息。当时村里放映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是反邓小平的题材。可是两个多月后，这部电影突然不再放映。从这个细微的变化上，大颡似乎看到了一丁点曙光。

恢复高考后，大颡仍然在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上工，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头上的帽子似乎也永远没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学，以改变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对他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拼搏，要么鲤鱼跳龙门，要么把贱民当到死。白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怕别人看见；晚上回到家里，不管多累，他都强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这一切

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怕别人嘲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大颡是 1979 年考上大学的。我相信他的实力，写信鼓励他参加高考，还买过一套高考复习丛书邮递给他。有一天他们院子里一个女孩订婚，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大颡没有地方复习，就爬上一颗高大的桑树，在树上看书。密密的桑叶隐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复习隔断了树下的人声喧嚣。

大颡白天劳动，没工夫到公社邮电所去，他央求父亲去一趟，看没有录取通知书。邮电所离家只有两里路，父亲却劝他别做这白日梦，说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咱这种家庭头上。直到有人转告大颡的父亲，说在邮电所看到了他儿子的录取书，这位父亲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了一趟。在邮电所当场拆开信皮，看到吉林工业大学鲜红的大印章时，他才相信这真的不是梦，自己的儿子真的是被大学录取了。这时离入学报到只剩下五天时间。

消息很快传在村子里传开。这是村里几十年来唯一的考上大学的新鲜事。当晚，大颡家接踵而来很多人。大队干部来了，左邻右舍来了，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来了，平素没什么交往的也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道喜祝贺的，希望也能沾上点喜气的，甚至盘算着嫁闺女的，都有。热闹过去后，大颡还是抱着苇席到麦场上乘凉过夜，但他这次却不是睡在边边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麦场中间，周围再围睡着其他人，说村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可别让狼给叼走了。黑五类劳动小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邻村一个漂亮的中学女同学，大老远就热情地叫李大颡的名字，请他到家里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说起录取后周围人态度的变化，李大颡深感世态炎凉之起伏突兀，与范进穷困潦倒下的中举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的人生历经，李大颡说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学时代，彻底摘掉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与他人交流。在大学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还有他认为只有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参考消息》。李大颡曾将他上大学之前的遭遇写成一篇回忆文章，妻子看

了之后以为是其他人写的小说，儿子说那是荒诞的天书，没有任何可信度。

忆苦思甜全过程　　大　隐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文革期间，生产队每年都举行几次忆苦思甜大会，唱这首忆苦思甜歌，回忆过去的苦难，念叨今天的甜之来之不易。忆苦思甜活动一般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由苦大仇深的老农做报告，讲述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遭遇，同时讲说解放后过上幸福生活的亲身感受；二是吃忆苦饭。有时还召开批斗大会，场面好不壮观。

每次忆苦思甜大会都要搭一个很大的会台，会台中央上方悬挂“忆苦思甜大会”横幅，台两边柱子上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会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个话筒。会台旁边设有席位，村革委会成员就坐在那里。台柱旁站立着荷枪实弹的民兵。大会由村革委会主任主持，通常是挺胸收腹走上主席台，两手在桌子沿儿上撑稳了，便用高亢的声音对着话筒喊：“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

“大会进行第一项，齐唱《东方红》。”主任起头，全体社员高声齐唱。

“大会进行第二项，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上台来。”话音一落，民兵们两人一组，身后背枪，双手抓住已经捆绑好的五类分子，快步揪上台来。民兵的脚步震得台子轰轰响。五类分子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姓名，姓名上打着红叉。革委会主任先是喝令五类分子“向毛主席请罪”。分子们刚转过身，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处狠踢一脚，他们便咕咚跪下，说：“我是某某（地主、富农等）分子，我有罪……”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请完罪，村主任便喝令他们

面向台下的社员跪下。

我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有十几名。如果哪天一早人们走出家门，发现街道被人打扫过了，那么这一天就是有大集了。天不亮就把大街扫好了的那些人，就是村里的黑五类。村里的“义务劳动”都是黑五类的事儿，只要大喇叭一喊，不管他们当时正吃着饭还是正干着别的什么活计，必须立即赶到大队部，一刻都不敢耽搁。

“大会进行第三项，高呼革命口号。”主任喊一句，台下的社员跟着喊一句。有时为了增加气氛，就在社员中安排一位领喊者。口号震天，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发泄半个小时之后，会场才能清净下来。

“大会进行第四项，由贫农老大爷某某为大家忆苦思甜。”于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了，哭诉旧社会所受的压迫。情绪到达高潮时，老贫农会走到台上的地主面前，狠抽两个耳光，猛踢两脚。社员们被激发，会场上有人带头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打倒地富反坏右！”老贫农绘声绘色的表演又一次把会议引向高潮。有的社员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千仇万恨都集中到眼前台上那几个五类分子身上，仿佛旧社会一切罪恶都是他们几个犯下的，他们与他们有算不清的账，解不了的恨。忆苦思甜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很受各级领导重视，于是各村都涌现出一些做忆苦思甜报告的典型、能手。他们述说的遭遇催人泪下，社员深受触动。也有因事先缺乏准备，闹出许多笑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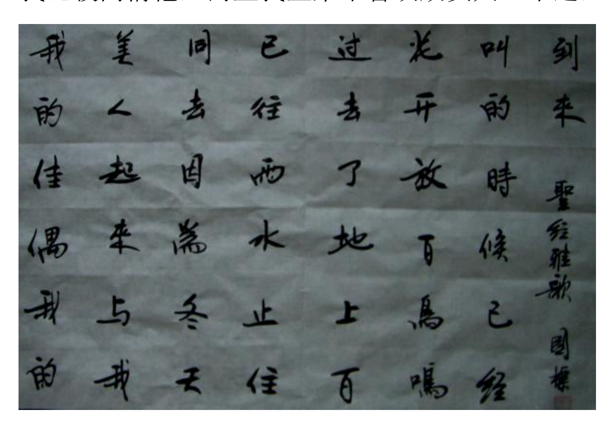
“大会进行第五项，吃忆苦思甜饭。”忆苦思甜饭，一般是用糠皮、麸皮和萝卜叶子掺在一起做成的菜团，是生产队为开忆苦思甜会提前做好的。有时为了增加难吃的效果，还有意识地往里添加一些砂子。革委主任宣布吃忆苦思甜饭，另有人就向每位社员分发菜团，每人一个。我第一次参加忆苦思甜大会时，吃上了这种忆苦思甜菜团，觉得非常好吃，对父亲说：“爸爸，这菜团真好吃，旧社会专吃这个多好呀。”爸爸吓坏了，轻声地喝斥道：“再胡说就撕烂你的嘴！”我吓得再不敢开口乱说，悄悄把爸爸分得的那个也吃了。

“大会进行第六项，游行示威。”全副武装的民兵把五类分子押下台子。分子们都戴上一顶尖尖的纸帽子，排成一队，敲打着脸盆或铁簸箕，脖子挂着牌子，有的脖子上还挂着破鞋，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在最前边，广大社员群众走在后面。游行的队伍高呼革命口号，沿着主要街道走一遍之后，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到此宣告结束。

补白：初，钱伟长在美国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年薪 8 万美元，比美国总统的还高 5000 美元。他还是回国了。五七年反右，被打成右派。1987 年是反右三十周年。八六年底，右派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并征询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钱伟长也在这三四十人之列。看了信，经慎重考虑，钱将此信转辗交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并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是与他们是不同的。”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称：“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邓把许良英误为王若望，于是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被开除出党。邓还批评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并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 20 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邓表扬了钱伟长：“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于是后来钱伟长当上政协副主席，一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诗　云

陈国庆是我小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国庆节那天出生的，父母便给他取了这个名。我班还有一个同学，个子最大，学习最笨，最爱打架。有一次自习课，他乘老师不在，站起来大声说：“从今天开始，大家不许叫陈国庆，都得叫他地主仔。谁敢不这么叫他，就罚谁跪着晒太阳。如果叫他不答应，就罚他当牛骑跑教室五圈。”于是陈国庆的“地主仔”称号就这么开始了。虽然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也不得不接受。

其实平常我们一起玩时，即使他答应了地主仔这个称呼，我们也同样拿他当牛骑。而且他也从不拒绝，好像很乐意似的。如果他不给人当牛骑，同学们就不和他玩。为了能和同学们一起玩，他甘愿当牛。在全班同学中，我是唯一没有骑过他的一个。他原是我的同村兄弟，我比较同情他，而且我生来不喜欢欺负人。不过，我怕被班里的大个子罚晒太阳，所以也跟着大家叫他地主仔。



圣经雅歌金句
焦国标书

地主仔家原来在我们村。有一次，他叔叔与村里的一个人下象棋，不知为何俩人吵了起来。由吵而打，最后引发家族械斗。

据说他家之所以被划为地主，就是因为这件事。对方势力大，土改丈量土地时，有意扩大他家的田地面积，最后把他家定为地主。后来，也是因为这件事，他家便搬到附近的村庄去住了。

尽管搬到了别村，但他家仍然戴着地主帽子。我经常看到他父亲在学校门前参加劳动改造。有一次，他的父亲写信给毛主席，诉他的冤屈。公社扣了他的信。公社革委会领导说他不服改造，在学校操场召开专门批斗他的大会。那天晚上，陈国庆的父亲头上戴着用猪竹笼制成的头盔，我和陈国庆就站在台下。陈国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暗暗地流着泪。

也许是受家庭处境的影响，陈国庆很寡言。即使有时说话，声音也很小，人也不大灵活，学习成绩也不太好。我与他一起读到初中毕业，高中就不在一起了。后来听说他高中毕业后又到琼中从初中开始读，最后终于考上中山医学院预科班。在预科班读 8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任眼科主任，成为眼科专家。

有一天，他突然打手机与我联络，并到家乡万宁找我，表示想义务帮助家乡的老人做白内障复明手术。

我初看到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反复问："你真的是陈国庆吗？你就是过去那个地主仔吗？"当从和他同来找我的村人口中得知确是他时，我极为吃惊。想不到他变化那么大，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不仅模样变了，而且说话出口成章，话多了，人也比以前活跃了。我问他："过去家乡人那样对你，你不见怪吗？"他笑着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把，家乡永远是我的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他真的是变了，变得让我佩服，而我最佩服的是他那坚韧的毅力和宽阔的心胸！

我家是这样当上地主的　　侯德喜

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衣食无忧，但并不是很富裕。父亲侯荣 14 岁那年离家外出学手艺，解放后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则凭借着自己经营，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地，靠地租生活，土地时被划为地主。1959 年，爸爸把妈妈、我、弟弟妹妹接到城里，住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爸爸单位的房子里。

文革开始时，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我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还有我的母亲李淑兰，我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爸爸没有被带走。父亲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妈妈娘家是清河的贫农，妈妈和我们这 5 个孩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后来村里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学艺成了工人，脱离了关系，可妈妈和我们 5 个孩子却没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饭，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没有一亩地，没有一个雇工，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仅仅是因为与大伯没有“分家”，就也成了地主。实际上大伯在我四 岁时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村里还健在的许多村民称，当时评地主、富农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一些人因为学了手艺，多赚了点钱，也被划为富农。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天一亮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贫下中农少。晚上我们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天上的“三星”连成八字的一撇状时，我们就出发去地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凌晨两三点，“三星”变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时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劳动，我们还经常被绑去参加批斗大会。我母亲经常一绑就是一天，然后是街头游行。看到母亲被批斗，我和弟弟总是偷偷地哭。有时想给母亲送点吃的，但最终还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粮食，往往只能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们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树皮充饥。

弟弟侯德富当时 20 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他什么也不想，

唯一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吃饱饭。有一次村里组织去一个工地挖沙，三两的馒头随便吃，他一口气吃下了 13 个。弟弟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肯招他。一听说他家成分高，就挥手让他走开。

戴着地主的高帽子，我们一家吃尽了苦头，一晃就是 13 年。1979 年，听说中央要给地主和富农摘帽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却没有等来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于是去乡里的街道办询问。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诉我们，没有我们的摘帽通知书。第三次去的时候，我们在乡街道的档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把这个通知书拿在手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摘帽之前，我们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我们没有见过选民证，但是我知道这张选民证关乎我们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亲、弟弟、妹妹拿到选民证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心情很激动，一夜没睡着。第一次参加选举之后，弟弟德富说他觉得像是完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转折，浑身飘起来了。

补白：我有一个钢琴老师叫做陆洪恩，文革被枪毙的。陆先生说不是贝多芬要向工农兵学习，而是工农兵要向贝多芬学习。在监狱里，陆先生受尽折磨，最终被杀害，比林昭还早两天。所以林昭、张志新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人。　　　　　　　　王西麟

先行者戴洁天　　温州人

1955 年，33 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他到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农庄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但是，在集体农庄调研了一段时间后，戴洁天困惑地

发现：并社之后，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戴洁天开始思考了。他买来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阅读，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对于集体农庄的优劣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年夏天，他来到永嘉县的燎原社，要在这里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试验——包产到户。1957 年 4 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 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 40%。实验的结果给戴洁天巨大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坚定地写道：“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1956 年 11 月 19 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却刊登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并配发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1957 年 10 月 13 日，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燎原社的尝试走到了终点，年轻的戴洁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劳动三年。这一年的 11 月 10 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 22 年，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 22 年。

1979 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终于团聚。戴洁天被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认识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播下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起初在银行上班。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想下海。父母，尤其是父亲戴洁天，坚决反对陈坚的想法。1985 年，《解放日报》记者张也

平和戴洁天一起到基层调研，文章发表在 5 月 12 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戴洁天一方面深深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1992 年，陈坚和妻子来到葡萄牙摆地摊。不到一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2000 年，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

直到今天，戴洁天也很少谈起陈坚的生意。偶尔的只言片语，还是掩盖不住地流露出一个父亲的忧虑。

补白：我们村只有四五十户，都姓郭。姓郭的都是同一个祖宗，而且没有出十代。可是就这么一个村子，却是等级森严，人人相欺，户户不平等。村里有三户地主，而且都是地主已不在世，只是地主的老婆孩子。文革斗地主，实际斗的是地主的老婆和儿子，即地主婆和地主羔子。

如今我回老家，每与当年的地主羔子们谈起往事，他们都表现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同时他们对 D 给他们摘帽流露出感恩戴德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至今心怀恐惧，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现在农民的民主意识强了，可是他们好像仍然活在过去的阴影中，一切维权抗争活动他们都非常消极，不敢参与。　　网　友

恐惧与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过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更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这些掌了权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富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黑暗的政治，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谄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友谊和关爱。恐惧使我歌唱着奔跑，恐惧使我产生了千方百计地逃离封建落后的乡村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类永远地摆脱恐惧，但恐惧总是难以摆脱。在恐惧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使我们产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补白：那时，所有被残酷斗争的人，有嘴不让申辩，有理无处可讲，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毛主席万岁。革命群众胆子再大，也不敢怒斥你不许呼喊毛主席万岁！所以呼喊毛主席万岁便成了当时的一种喊冤方式了。有个人斗人很积极，每当被斗人试图辩解时，他就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人一连几次申辩都被“不许放狗屁”给拦回去。那被斗人无奈之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听都没听，仍然习惯性地怒骂“不许放狗屁!”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他立刻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并当即被勒令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一秒钟内，河东河西。　　　　朱之泓

刘义元卖妻　　林启山

1971 年秋的一天，邵阳县河伯公社五洞大队第八生产队会计刘义元卖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且说 1968 年秋的一天中午，几个手拿梭标、鸟铳的民兵，突然闯进屋高声大叫：“反革命分子刘义元滚出来!”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血气方刚的刘义元听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气得火冒三丈，厉声质问：“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是贫下中农，是生产队会计，谁是反

革命？拿证据出来！”“陈良柱就是证据。”刘义元立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刘义元的门。打开一看，是陈良柱跪在他面前，边哭边说：“好兄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虽然出身地主，但哪里也没去过，一直在队上搞生产。你当会计最清楚，一年到头我没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懒。有人说我参加黑杀队，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吊半边猪，逼我交代。人总要讲天理良心，没那回事，我拿什么交代？不说又要吊。承认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里去？到处在抓黑杀队，天下老鸦一般黑。你是个好人，请你设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刘义元是个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产队干部，想到利用法律来保护他。陈在刘家躲了两天两夜之后，刘便对他说：“在我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什么办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刘义元分析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除了县公安局，谁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县公安局，就说自己是黑杀队，特来投案自首。他们就会把你关押起来，你就安全了。”陈良柱觉得有道理，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

当晚下半夜，刘义元站岗放哨。在刘的保护下，陈悄悄溜出大队，迅速向县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自报投案。军管小组经查问，知道他是出来逃命的，无法关押，只好把正在县里参加会议的五洞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云松叫来。李马上挂电话让队里快来接人。就这样，陈良柱又被前几天折磨他的凶神恶煞抓回去了，刘义元窝藏陈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刘义元驳斥审问他的人：“谁说他陈良柱是反革命？谁说他是黑杀队？真凭实据在哪里？他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我们一同长大，非常了解。他为人老老实实，劳动勤勤恳恳，没有旷过一天工，没有偷过一回懒。他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有什么权力把他赶走？你们说他是反革命、黑杀队，请证据拿出来，连人一起送到县公安局去，请政府定罪，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何必你们劳神费心？如果你们

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处死人的权力，那么请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里？大印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代替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吗？”主审者理屈词穷，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刘义元即被打晕，耳膜被打破。

刘义元的妻子陈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在伤药严重脱销的情况下买了四颗跌打损伤丸，抱着婴儿往公社去给丈夫送药。丈夫头肿得象个西瓜，两口子抱头痛哭。

几天后，一伙横眉怒目、凶神恶煞的人冲到刘义元屋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寻找刘义元的反革命罪证。刘义元喜欢读书看报，但又缺钱买不起书，订不起报，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纸只字，就当宝贝一样捡回来看，碰到一些带韵味的词句，还爱引吭高歌。日积月累，家里集起一堆废旧字纸。搜查者将这字纸全部抄走，仔细查看，终于在一张格子纸上发现几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东来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遥处且逍遥，骑驴跨鹤过竹桥。”他们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因为这片废纸，刘义元被关进大牢。刘的岳父陈昌顺，原是生产队长，也因陈良柱案被抓，送到县监狱，一年后死于狱中。时年 22 岁的陈冬青，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批斗，被折腾得不像人样，奶水全无，月子里的小女儿饿死在爷爷怀里。

刘义元在牢里一坐就是 22 个月，进来时是个 25 岁的精壮劳动力，如今是一天三两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头，一双膝盖骨一到阴雨天就痛彻骨髓，腰伸不直，腿张不开，头抬不起，身挪不动，比八十岁的老人还差。有关方面怕他死在牢里，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产队接受监督劳动。当他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门口时，家里人都认不出来了，夫妻又是一场大哭。

刘义元在监里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出狱后没钱治疗，拖了一年多，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现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带着孩子，还有个老爸，生活怎么办？再者，我还顶着个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属，孩子也是黑五类，长期受欺，永无出头之日。”冬青问：“你是不是想让我

去做流产？”刘义元解释说：“我是想给你母子找条活路，找一个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坚决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况且我还怀着你的骨肉！”

在参加完一次四类分子会后，刘义元又乘机试图说服妻子：“冬青，我俩离婚吧，我不能老让你背这个反革命家属的臭包袱。你是贫下中农出身，离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摇大摆走路，谁也不敢再对你怎么样。”冬青最终同意离婚，但“离婚后我仍住在家里，不能把我赶出去”。

婚离了，刘义元开始琢磨着劝妻子改嫁。他说：“昨夜我做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在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忽然吵起来了。别人的儿子骂我们的儿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儿子哭哭啼啼跑回来问我：‘你是反革命吗？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我说：‘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骂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双双捆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们未来的孩子着想，你必须忍痛割爱，决心改嫁。”

冬青哭起来，越哭越凶，如生离死别：“你病这么重，爸爸又老了，身边没人照顾，日子怎么过？”刘义元说：“你如果真的关爱我，就向男方提一个条件，要三五百元钱留给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东西都可以挣回来。”这时刘义元已在邻近的新宁县为冬青找到一位大龄青年。这位青年身体健康，长相不错，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穷，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无奈，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向男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来带满周岁后让刘义元接回来；二、因欠账要 500 元还账。男方表示：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只能拿出 200 元，多了拿不出。最后双方达成了交钱结婚的协议。刘义元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大钱包时，以为对方搞错了。区区 200 元，怎么能这么大一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元两元的块票和角票！拿着这 200 元钱，住了 20 天医院，刘义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给送来个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个男孩。刘义元马上向父亲报喜。儿子周岁后的第三天，刘义元去接儿子。见了冬青，

尴尬之余，双手合十，千恩万谢："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欢交集。喜的是他身体比原来好多了，悲的是他还是反革命释放犯。谈到接孩子，冬青说："接回去还是个反革命崽子。再说，儿子尚未断奶，你接回去如何带？"刘义元无以回答。"还是等断奶以后再说吧。"刘义元只好照办，悻悻而归。

刘义元空手回来，老父怀疑冬青变卦了。刘义元心病渐重，旧病复发。这时年关渐近，队里搞年终结算，两父子劳动一年，仅得 80 元钱，还被扣除 60 元的杉树钱，仅余 20 元。父亲从自留山里砍了几蔸杉树回来做棺材，队上却说，反革命家属没有砍树的权力。鉴于砍的是自己栽的树，从宽处理，不批不斗，罚 60 元钱算了。刘义元不服气，砍自家山上的树为什么要罚款？找大队干部评理，大队干部说："你是劳改释放犯,你父亲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享受社员待遇的资格。"

听了这个话，刘义元好比五雷轰顶，差点昏了过去。凭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尽头？以前卖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老婆改嫁了，儿子又抱不回来，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头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决心下定，立即到供销社买了一瓶敌敌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从队上分来的两斤腊肉洗净、煮好、切碎，分成两大碗，一碗给父亲，一碗留给自己，说："爸爸，今天过大年，我娘死得早，父亲又当爹又当娘苦苦把我养大，谁知儿子没有出息，被误裁冤枉当了反革命，坐了几年牢，身体搞垮了，老婆被卖了，孙女饿死了，孙子也接不回来，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实在是对不住。"刘义元泪流满面。

父亲反复安慰他。刘义元则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背着父亲，将敌敌畏倒在自己那碗肉里。老人问："哪来的农药味？"他说着"没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咽呷起来。很久未吃肉了，父亲劝他慢一点，别呷出毛病来。胃开始翻腾了，刘义元对父亲说："爷老子，你要挺住好好过，不要为我伤心。"说着哇的一声，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农药味弥漫一屋子。父亲以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晕，扶他上床休息。

刘义元躺在床上，因疲劳过度，一觉睡到第二天晌午。他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是农药失效了？还是药量太少了？他走下床来，端起药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气把剩余的敌敌畏全部喝光。谁知药到肚子里翻江倒海一阵之后，又全部呕吐出来了。父亲看出儿子是在寻短路，急得全身发战，不住地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又说："傻儿子，新年大节，为什么寻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么办？我知道你心里苦，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还年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洗不白的冤!"刘义元没有死成。

一晃又过了五年，1980 年 10 月，邵阳县公安局发了个 30 号文件——《关于刘义元被拘留一案的复查结论》，称对刘"拘捕不当，予以纠正"。日夜盼望的平反书，盼了 10 年，终于盼来了。刘义元立即拿了这个文件去新宁县接孩子。这时儿子已经七岁了，在读小学一年级。尽管妈妈再三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喊爸爸"，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陌生的爸爸，反而说："我有爸爸，这个老头不认识。"说罢就跑开了。冬青很同情刘义元，让他多住几天，与儿子交流、培养感情。谁知儿子大了，怎么也无法认同。强迫不行，硬带走他也会跑回来的。刘义元满怀希望而来，满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续香火。可是家里太穷，年轻的不肯来，拖儿带女的又养不起，年龄大没有生养能力的又不想要，找来找去，找了个 39 岁的寡妇。生活了三四年，孩子连影儿也未见。刘义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注定。

刘义元仍然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儿子。儿子长得十分健壮，和自己青少年时一模一样，可就是不认他这个生身父亲。他曾反问刘义元："你为什么要把我娘卖了？我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对我又尽了多少做父亲的责任？"刘义元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后来老父也死了，自己身体也一天天地差，人也一天天地老，分了两亩责任田也无力耕种了。带着后讨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龄太大，跑了几个城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回家没有盘费，生活无着，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

补白：上小学时，我写作文不经意流露出长大想驾飞机翱翔祖国蓝天的梦想，少先队辅导员严厉地告诫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异想天开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真正的脱胎换骨，与你的父亲彻底划清界限。"这话像一瓢刺骨的冷水劈头盖脸泼在我头上。那年六一儿童节，我果然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之一。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早早体验到封建王朝株连九族政策的严酷。很多同学故意在我跟前发着怪声唱："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　　赵　旭

我经历的几个右派　　正经人

我父亲就是右派，我家对面住着一个右派，我有一个舅舅是右派，我下放农村时村里也有一个右派。首先我要说父亲回来以后说的一句话："我要感谢当年我成为右派，不然早死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他必定会对自己的遭遇怀恨在心，怎么反而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告诉我，当年他是地主少爷，自幼娇生惯养，但身体不好。后来被划成右派，去了西北某地煤矿挖煤，每天劳动，身体反而渐渐好起来了，现在七十多了，看起来还是六十多的样子。

我问他在煤矿怎么样，他说："不错啊！落实政策，其实我还不想回来呢！因为在那里呆惯了。"我还以为他在那里劳动很苦，他说没有，其实也就是跟随大家一样劳动，好象还让他做一点文字工作，有点受重用的意思。他也不恨毛泽东，还很佩服毛泽东，说自己当年其实也是少爷脾气（他上面三个姐姐，所以自小受宠），跟领导说话太张狂了，正好赶上了，成为右派。

我的那个右派舅舅，曾参加过浙南游击队，解放时就是区委书记，按说划右派是轮不到他的。可惜他在 1955 年左右去大学读书，受右派

教授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个地主少爷，有点书生气，就不幸成为了右派。去了劳改农场，后来自己又逃了回来，在家乡农村呆着，与其他农民一起种田。他对农业技术还做了一些改良，深受当地农民欢迎。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呢！后来好像农场那边来人把他带回去了。带回之后究竟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什么被打得半死之类的事是绝对没有的。他那个牛脾气从来没改过，现在离休了在家呆着，身体也很好。我印象中他的身体就从来没差过，整天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小时候我家对面那户右派也是离了婚的。我们家也是右派，所以我也跟他家的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没有什么顾忌。小伙伴们，有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绝对红五类的子女。那时没有人拿成分说事，大人也从不说起，我也是很偶然从母亲嘴里知道对面那家是右派的。当时感觉心里有点慌，但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们。后来在文革中人家贴我母亲的大字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父也是右派。

我下放农村时村里那个右派可是有点来头的，据说当年是南京政府交通部里的人。当时我们生产队里其他农户都住瓦房，就他一个住在草屋里，所以我印象特深。他整天穿一件黑呢制服，头发花白，昂首向天，一看就与众不同。

我刚下放到那里时，一开始很尊敬地叫他老伯伯，后来一帮小伙伴（当时我才 16 岁）告诉我，他是个右派，我就不这样叫他了。无论多小的孩子，对他都是直呼其名。在农村是很讲辈份的，对长辈，即使没有亲戚关系也要叫叔、伯、爷之类的，唯独对他不是这样。平常也没有人到他家来玩。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他过得都挺潇洒。生产队长对他的劳动从来不做要求。我们这些人出工，都是个顶个的，只有他出工是做个劳动的样子。他体力不行，又无劳动技术，还喜欢聊天，时不时就拄着锄头聊开了，自己仰望天空，似是自言自语，又似讲给其他人听，其他人也似听非听。什么以前怎样吃喝玩乐啦，怎么赌博啦，南京政府里的事情如何啦，等等。当时我一心只想表现好点，争取入团（入党还

不敢想），所以从不理会他。要是换成现在，我一定会去听，然后写一本书出来。其实他挺喜欢我的，想跟我聊，无奈我不理他，后来他也就算了。

回到草屋里他常常光个膀子，点个煤油灯吃饭。我们当时是有电灯的，他不用。有些人家也不用电灯，后来我也不用电灯。没其他原因，只是想省点钱。他有一个儿子，有时来看他，但很少与我们来往。生产队开什么大会时，他会上台陪着。一排地富反坏右站在台旁边，也挺有意思，但从来不打他们，更不用绳子捆。

知青美女乔献华　　周　立

1957 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年仅 3 岁的乔献华永远记住了那场漫天飞舞的大雪。一群人叫喊着“把反革命分子乔俊承揪出来”，冲进家里，将正在干活的爸爸往门外拖。家里没有其他人，小献华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被拖到门口的爸爸突然挣脱出来，跑回屋将女儿紧搂在怀里，把脸紧紧贴在女儿满是泪水的脸上，急切地说:“丫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是打日本鬼子的……”话没说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里，小献华哭喊着一路追赶，一直追到涪陵地区收容所。“我看见他们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妈妈。”当天晚上，爸爸被几个人拖回来扔在地上，浑身血肉模糊，凌乱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没说完就断了气。懂事后，妈妈周维清告诉她，爸爸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国民党的军官，上战场打过日本鬼子。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走到哪里都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死小反革命’，没有娃儿愿和我们玩。开批斗会时，妈妈胸前挂着‘反革命家属’黑牌，站在台上，低着头，台下不时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块，她不敢躲避。我们在台下哭着不敢出声。每次开

会回来，妈妈都要对我说:‘记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们脸上，也不要说什么，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3 岁以后，乔献华开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背着反革命狗崽子的恶名，乔献华在忍耐中度过了屈辱的童年。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在体校上学的乔献华没等人来动员，就主动申请到艰苦的龙潭区。她是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那年我才 15 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机争表现，表明我想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态度是多么鲜明，希望别人会因此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1969 年 2 月 8 日，乔献华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灯光球场集中出发，草绿色的军装扎着皮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军用挂挎包上印有“扎根农村干革命”。人人手持红宝书，高呼口号，向农村进发。乔献华插队落户在龙潭区太平人民公社复兴大队第 6 生产队（现涪陵区青羊镇新元村 6 队）。那里距涪陵城 90 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

到达太平后，当地小学生敲锣打鼓迎接他们，村民们对漂亮的乔献华表现出特别的热情。2006 年 12 月，当地村民李顺珍对 37 年前乔献华的印象依然深刻:“我们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样。当时还有个漂亮女知青，外号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认乔献华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赛太平’。”因为能歌善舞，乔献华很快成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15 岁的她从没享受过这种礼遇，她欣慰极了，感到这条知青路走对了，决心死心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好日子没过一个月，就因为她黑五类身份被揭穿戛然而止。

一天，乔献华参加完劳动，兴致勃勃往回走，路上遇见生产队长。队长说:“我本来以为你是龙是凤，现在才晓得，你竟然是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让贫下中农好好管教你！”乔献华这时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么幼稚，家庭成分这东西就像遗传基因，抹也抹不掉，无论你怎样追求进步，都是白费劲！

乔献华从小梦想当歌舞演员，穿上舞鞋翩翩起舞。她仍然坚持每

天早上 6 点起床，偷偷到屋后山坡上吊嗓子——轻轻的，不敢放开喉咙。

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在山脚的烟敞沟，单程就要走近两个小时，天黑才能回家。她干活特卖力，所谓“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她深怕脸晒得不够黑，手上磨的老茧不够厚，不能显示自己是多么拥护“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乔献华突然感觉左手臂一阵凉意，抬手一看，一条绿蛇缠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声，怕别人骂她是国民党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满蚂蝗。“有的正往肉里钻。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来。蚂蟥一扯就断，弄得满腿是血。我忍住恶心，不敢哭出声。后来，还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蚂蟥松口了再扯。”

辛苦劳作一天，乔献华最多可以挣到 7 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是 8 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粮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别人偶尔还有肉吃，乔献华没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领”。这一切，没人敢公开为她说话，因为她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长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责的原因。一开始乔献华衣着前卫，当别的女孩穿宽松的花棉布上衣时，她却穿着衬衣，还要扎在裤子里，显示动人的身材。这些也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

“别人都把我当劳改犯，谁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这种生活比儿时受歧视更难受。以前毕竟有妈妈在身边，可以倾诉，不会孤独。但我记着妈妈的话，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1970 年冬天，黑龙江军区歌舞团到太平慰问演出。作为宣传队骨干的乔献华，在与他们合作中表现出的歌舞才华折服了歌舞团领导。歌舞团有意召她入团，但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她也没有去争取，她知道，自己这样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去争取的。

1972 年冬天，队里几个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销店一块红糖，有追求进步的社员举报乔献华是同谋。不管她怎么解释，没人相信这个反革命后代说的话。连续一周，她每天下班后都被叫到队里去接受贫下中

农教育。等贫下中农们教育累了，她才能深夜独自返回 10 里外的住处。

回住处的途中要经过一个池塘。这天晚上，乔献华呆呆地坐在泥地上，望着黑暗中的池水，任凭雪雨打在脸上。良久，她找了块废弃的磨盘石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来时，乔献华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简陋的土屋无法遮挡屋外呼啸的寒风，但她感到特别温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闺女啊，我们都是可怜人，以后不要再干傻事了。”田母胥春怀抚摸着乔献华的脸，心疼地认她作干女。想到父亲临终不甘心的话和干妈的关爱，乔献华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

今年 12 月 6 日，乔献华重返太平。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这个呆了 8 年的山乡，乔献华眼泪洒了一路。山还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干妈胥春怀去世 17 年了，当时未能回来为老人家操办葬礼，成为她一生的愧疚。她坚持要到干妈坟上去看看。干妈埋在塘垭口，乔献华哭着跪在坟前，直到香烛燃尽。

补白：那年代，老百姓普遍缺衣少吃，只有掌管粮、油、肉的一些单位及其领导有大米饭吃，有肉吃，有酒喝。元旦节，供销分社出肉和酒，粮店出粮油，食品站出肉，办了几桌酒席，几个单位的职工加上有关领导，共同庆贺新年。三江供销分社经理廖维相喝得不少，话也多起来。他很得意地讲了他昨晚做的一个梦：他接到北京的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他。他兴致勃勃地赶到中南海，但站岗的人不准他进去。讲到此，大发议论：“真是大鬼好见，小鬼难缠；大官好见，又有狗腿子挡路！”一个在场的人，散席后就打电话向区公安特派员报案，说廖维相当众骂毛主席是大鬼，骂毛主席的警卫员是狗腿子。狗腿子的主人不是地主、官僚吗？也就是骂毛主席是地主、官僚！公安特派员立即向上报告。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就派人将廖维相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廖维相本想表示他热爱毛主席，几句酒话却带来了牢狱之灾。廖维相的老婆原是供销分社的临时工，一儿

一女都在上学。他们过去在三江都很光彩，如今一下成了反革命家属。他老婆被赶出供销分社，连住处都没有，年幼的子女也失学了。陈宗培

周立波为何倒霉　　朱忠康

作家周立波生于 1908 年，湖南益阳人，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共党员。抗战期间他到前线做过战地记者，先后曾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解放日报》编辑，还翻译过苏联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抗日胜利后他在东北参加土改运动，写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解放后他担任过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湖南文联要职，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作化运动中，他来到老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十年磨一剑，写出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此期间他的作品大量使用当地农民的方言土语，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开创了当代文学新流派——茶子花派。他还写过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和《万里征尘》等作品，看名字就知道都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的。

想不到这个步步紧跟的作家，因写了一篇只有 4000 字的歌颂毛泽东的散文《韶山的节日》，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的叛徒，遭到了毒打和折磨。

这篇散文写的是毛泽东 1959 年 6 月 25 日重返阔别 32 年的故乡时的情景。这一天傍晚，毛在罗瑞卿陪同下来到老家，并吟成一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第二天去看已被茅草遮掩的双亲坟墓，接着又来到韶山学校，看望了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晚上就到长沙去了。毛在老家只耽了两天一夜时间。

周立波在益阳时曾先后六次来韶山参观采访。1965 年《羊城晚报》复刊时，编辑找周立波约稿，周就把这篇《韶山的节日》寄了去。编辑很满意，副刊作家秦牧更是赞不绝口：“文章写得相当精彩，形象饱满，栩栩传神，在政治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由于涉及领袖活动，编辑部还把打印稿分别给党政领导审看，甚至还打电话询问过中央，在得到了“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答复后，于 1966 年 1 月 21 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出来。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人员读后，对文章中的细节提出了意见，周立波做了修改，又在原来的版面上重新刊登一次（1966 年 4 月 23 日）。

此时文革运动序幕已经拉开，一场大浩劫即将，党内高层斗争已处于白热化。周立波文章开篇写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个曾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后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此时早已被揪出打倒。罗瑞卿曾是毛的贴身保镖，自己被打倒时，不仅自己一无所知，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也不知道。1965 年 12 月 10 日，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被紧急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被隔离软禁起来。1965 年 12 月 8 日到 15 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把罗瑞卿置于死地。后来又揪出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还有一个叫杨尚昆，统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 年初这场党内高层斗争还没有扩散到社会，但《羊城晚报》的编辑们已经风闻于罗瑞卿不利的传言，就把文章中罗瑞卿的名字略去了。当《韶山的节日》第一次在《羊城晚报》发表时，江青正在上海。看了报纸后，她大发雷霆，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打电话给中央宣传部，指责这篇作品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勒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得转载。接电话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

找来文章一看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毛夫人又不敢得罪，只好打电话通知六大区的宣传局，不得转载这篇文章。

阴错阳差的是，主管《羊城晚报》的中南宣传局没有接到电话，那份更正性的文章第二次又在《羊城晚报》刊登了出来。这下惹了大祸。中南局负责人陶铸接到张春桥气势汹汹的质问信：已经通令全国下了禁令，为什么还要刊登这篇文章？想为罗瑞卿翻案吗？

文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后，《韶山的节日》这篇作品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周立波更是罪责难逃。中南局宣传局、羊城晚报社和同意发表此文的人也都被扣上了不同程度的罪名。但是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歌颂毛泽东的文章也要遭到鞭挞封杀，这算哪门子的道理啊?

周立波遭到大会斗小会批，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在益阳体育场接受万人批斗后，再拉到县剧场看演员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话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据说在一次批斗时，造反派的枪走火，子弹从周立波耳边擦过，险些丧了命。

经过几番折腾和批斗，还是秦牧拆穿了这其中的秘密。原来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国的一只大醋缸给踢翻了。文章里曾有一句提到杨开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 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 29 岁。”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泽东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后，又写道：“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江青来说都是特别忌讳的。在一次讲话中，江青曾六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字。

1979 年 9 月 25 日，作家周立波因病在北京逝世。数十年后，他在美国的孙女周仰之为祖父写了一部传记，想在国内出版，托朋友找了许多出版社，开始听到周立波的名字都很感兴趣，但一了解，此周立波非彼周立波（上海清口相声演员），都婉言谢绝了。经过许多周折，总算找到了团结出版社并于年初出版了此书。现在问题是谁肯花“清口”周立波票价的九分之一来买这本书？如今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上输

入演员周立波几个字，有 45 万条结果，而输入作家周立波几个字，17 万条结果，而这 17 万条可能也是借了现代周立波的光才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四类分子的身份意识　　李若建

尽管各类四类分子之间没有太多共性，但是在 30 年的歧视之下，一些人还是萌发了一定程度的群体意识。从当年一些地下组织的成员结构中可以发现，少量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组织起来的倾向。山东茌平县 1957 年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148 名成员中，地、富、反分子 63 人，占成员总数的 43．5%。其中，有正在管制、解除管制和刑释分子 21 人。26 名首要分子中有地、富、反分子 16 名，占首要分子总数的 60％。1959 年云南兰坪县破获的一起地下组织案，成员达 64 人，其中四类分子 51 人。文革初期福建龙岩县形成一个拥护刘少奇的地下组织，在近 200 名成员中，其成员三分之二为贫农、中农，三分之一是有过各种问题的人，包括四类分子。

一些四类分子产生一种反叛意识是难以避免的。文革中有一位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对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街。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压出来的。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因而，报复行为不可避免。特别是地主、富农，因为财产损失，不满的程度更加突出。四类分子被指控的现行罪恶中有几条是常见的，比如记“变天账”，向子女进行报复教育。当时中国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反攻倒算。实际确实存在反攻倒算的情况，也确有一些所谓的反攻倒算是被人为夸大了。山西省定襄县委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地方反攻倒算的若干行为，其中包括低价收买农民分下的房子，给农民积极分子起浑号，等等。一位富农因老婆病死做丧事，收了别人送的

礼，请人看风水、烧纸，为安葬死者又砍掉了集体 6 颗小松树和两捆封山柴，被认定为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破坏山林等，以抗拒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

农民分到地主富农的财产之后，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忐忑不安，担心将来这些财产的安全。在河北省一些地区，土改之后，农民把分到的好端端的房子拆除，再去他处重建，原因之一是怕“变天”。因此，1947 年以后的几年，许多村里出现一些新房，仍是坯、砖垒砌，但是粗梁大檩，有瓦挡脊兽，有雕龙刻凤的窗架、台石。文革中出现的屠杀四类分子的案件，最初往往是传说四类分子要报复。湖南省新田县 1967 年秋谣传四类分子成立 205 师，“贫下中农杀一半，共产党员要杀光”，因而从 9 月 8 日开始，40 天内杀害四类分子 668 人，因害怕而自杀的 180 人。1979 年给四类分子摘帽时，这种顾虑更加突出。有的地方，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怕地富摘帽后遭打击报复，怕地富子女改变成分后起来掌权，自己受到排斥。

农民的担心并非多余。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了所谓反攻倒算事件，主要是地富亲属索要甚至抢占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有的还围攻、殴打土改中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为被镇压的人搞祭奠活动，树碑立传；个别地区发生残害人命的恶性案件。辽宁省地主子弟柳某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向政府索要土改时被没收的 2650 亩上地。凌源市四个乡镇，有 6 户地主富农强行抢占并扒毁集体房产，占为己有。

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专门对如何处理反攻倒算案件作了答复，成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准则。到 1995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经批示：“像这类反攻倒算的事，必须严肃对待。特别是党员干部产生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连锁反应下去酿成大祸。”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指出，反攻倒算是现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旗帜鲜明地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捍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是三个反攻倒算房产的个案：个案一：吴某之父解放初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吴家原有木屋四间，土改时被国家没收，后由一个工厂作为仓库使用，并进行了产权登记。1991 年吴某强行搬进床铺，让其母居住，时间长达 20 余天。1992 年，吴某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个案二：任某，其父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其父解放前有几间房产，长期无人管理，年久失修。1957 年镇工商联经组织批准建房时，原房址已变成一块空地或房底子。1982 年，此处平房被扒掉，镇政府在此建了一座餐饮服务楼。1991 年，任在其父去世后，重翻历史旧帐，对他家那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打起主意，从此开始了 4 年的上访。镇政府专门给北京司法部写信进行政策咨询，司法部回信明确答复：这类情况不予平反，不予返还财物，维持土改时的结果。因要求得不到满足，任于 1995 年试图杀死本溪市信访办官员，未遂。

个案三：冯某原为富农成分，祖上有 8 间草房。1953 年土改时，陈庄供销社暂借这 8 间房屋使用。这一暂借就是 40 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冯提出索回自己的房子。1983 年，冯一家强行搬进来居住。当时政府负责人说冯是富农分子反攻倒算，要批斗他，于是他又吓得赶快搬了出来。1999 年，法院判冯胜诉。

补白：1971 年夏，双楼一队的几个社员在沈家黄角树下乘凉。那时家家都挂毛泽东和林彪的大幅照片，一个姓邓的社员指着沈家门上那幅照片说："你们看，林彪的样子，真是勾勾鼻子鹞子眼——吃人心，挖人胆！"社员无意中把这话传出去了。公社革委会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令邓某到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待罪行。邓社员学习了一个星期，无论怎样诱供逼供，始终没承认他有什么过错。区公安特派员到双楼一队反复侦查。姓邓的平时没得罪过人，加之说过林彪是勾勾鼻子鹞子眼的人多的是，所以，都回答：没听到邓说过那样的错话。因为姓邓的是贫农，又无把柄，政法部门

无法结案。后来县里接到九一三事件的文件，这个反革命案件也就自然了结了。　　　　　　　陈宗培

神佑张乃仁　　黎学智

吉林省海龙县第一中学造反派关押了老师黎学智，为了彻底打倒黎学智，必须除掉他的妻子张乃仁，因为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而且还为他收集情报证据并邮寄上告信。造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语文教师马福生，群专负责人数学教师颜世忱，驻校军训队负责人李德铭，多次密谋，决定借刀杀人！他们认为，对于胎儿横位、即将临盆的张乃仁来说，剖腹产本身就存在着生命危险，就算她下得了手术台，没钱住院，没人护理，孩子无人喂养，母子肯定性命不保。所以，他们决定派于秀芝押送黎学智反革命冤案家属张乃仁到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沈阳生孩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于秀芝押送张乃仁乘火车去沈阳。一路上革命教师于秀芝与反革命家属张乃仁基本上没有语言上的交流。虽然张乃仁意识到她此去凶多吉少，可能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但她还是反复琢磨获取情报的方式与途经。

机会来了。于秀芝上厕所，张乃仁坚决果断地打开了于秀芝的手提包，迅速抄记并秘密收藏了于秀芝携带的海龙县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 1968 年 11 月 4 日(校革介字)第 053 号介绍信的抄件：“兹派于秀芝同志，负责押送并安排反革命家属张乃仁住院生孩子(横位)，请予以监督协助为盼。”正当张乃仁把于秀芝的手提包放回原处时，恰好被回到座位的于秀芝发现。于秀芝怒斥：“随便翻动别人的手提包太不文明，太不礼貌了！”张乃仁回击：“你知道什么叫卑鄙无耻吗？说，你是陪送还是押送？”“陪送。”“谁给我定的反革命家属？”“学校革委会定的。”“一所乡镇初级中学有权定反革命和反革命家

属吗？”“我是组织派遣，请张老师理解。”

两人各想心事，不再交锋。车到沈阳东站，张乃仁先下车，于秀芝紧随其后。突然，张乃仁没有站稳，几乎摔倒，一位好心的女列车员手急眼快当即扶住了她。与此同时，张乃仁瞬间觉得腹中的胎儿扭动了一下。

经沈阳小河沿妇婴医院检查，张乃仁的待产儿已经由横位转成顺位，完全可以自然产，不需要剖腹产！此时的于秀芝尚不知手术情况有变，正忙着向医院革委会、医生、护士以及部分待产妇交代张乃仁的反革命家属身份，请大家协助监督。于秀芝完成组织重托之后，认为即将进行剖腹手术的张乃仁已无畏罪潜逃可能，于是甩掉张乃仁，去沈阳航空学院探亲访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张乃仁终于自然产成功，生一个男孩。可怜可敬的张乃仁没有任何人陪护，每日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无一滴奶水供婴儿吸吮。张乃仁虽为反属，但她端庄的容貌，高雅的气质，镇定自若的举止，面对苦难的从容，引起了医生、护士和同室产妇的极大同情和尊重。于是，医生送来奶粉，护士送来自制小孩衣服，产妇们轮流为孩子哺乳。人间自有真情在！

张乃仁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只有 55 元，去掉住院、医疗等费用已经所剩无几。产子三天后，张乃仁不得不出院，自己抱着儿子，携带日常用品，乘坐三轮车，由沈阳小河沿到沈阳东站，坐四个小时火车，到达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在东北的隆冬季节回到自己独居的陋室。

补白：著名翻译家冯亦代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家蹭吃蹭喝聊天。他把章的谈话默记在心，然后向上头密报。 告密得到的好处是冯自己早早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只是为了继续扮演告密者，冯摘帽之事秘而不宣。有时还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还有，有关领导会请冯在有名的饭店吃顿饭，或送给几张紧张的演出票。

桃园钓客　　从维熙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大约 20 米宽的水塘对面，是团河农场的医院。我们经常看见水塘对岸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不太正常。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9 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农场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应穿病号服，而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这个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垂钓方便，风景秀美，他何不去那里？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

我们几个老右脑袋里可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怎么不见警卫？""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是？"董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董的回答进一步印证了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副业”。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有一次我回京去老岳父家，无意间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 1928 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时，他与潘有过不少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 30 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本人出任出版经理。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 1955 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的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冤枉的

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

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木刻使他对人生产生了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但是他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

由于这块地方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哭，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这么多历史风云的过客，在我劳动过的桃园留下感伤和悲哀，以及苦涩的历史背影，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补白：毛逝世那年，12 月 26 日厂里纪念完毛的生日之后，一位根红苗正的女工向厂领导举报另一位女工狗胆包天，要求抓出来批斗，原因是：后者的生日是 12 月 25 日，昨天她过生日了——竟敢比伟大领袖毛主席早一天过生日，这还了得！　　贺承业

富农儿女的婚姻　　燕赵客

我的故乡在冀中大平原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子里，距离北京 150 公里，天津 100 余公里。村里当时 160 户人家，人口不足 1 千。村里没有人家划成地主，有 9 户人家被划成了富农。富农家的人丁兴旺，几乎占了全村人口的 10%吧！

富农的儿女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参军升学。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们都想跳出富农家这个火坑，即使找不上贫下中农，起码也要找个中农或者上中农，没有一个人甘心情愿嫁到富农家去。成分好的人家的女儿，更不会走进一个富农家里去做媳妇。假如有姑娘看上了富农成分的小伙子，父母和家人也不会同意的，因为参军或者入党都要搞外调。如果姐姐或者姑姑的婆家是富农，当兵和入党也要泡汤。我没有详细的调查，只是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周边村庄没有一个富农的儿子能单独找上媳妇的。他们的媳妇都是换来的。

我们生产队有一家富农，共有七个女儿，两个儿子。大概是 1976 年左右，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里干活了。有一天，那家的三女儿没出工。第二天出工了，我看到她的情绪很是低落，平时她是很爱说爱笑的。过了两天才知道，家里想让她给哥哥换媳妇。她不同意，做父亲的就动手打了她。过了一段时间，她的亲事说成了，是外村一户富农人家。她哥哥当年就结婚了，她是一年后才结婚的。就在这一年里，这个三女儿出了作风问题，曾经怀孕引产。她是不是以此来报复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大姑家也是富农，一共有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弟，还有两个表姐。大表姐嫁到了北京郊区。大表哥那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一个说媳妇的也没有。大姑每次回娘家来，就跟我爷爷和奶奶念叨大表哥的亲事，说实在没招儿就用二闺女给儿子换一个！爷爷认识的人多，就开始张罗着给表哥换媳妇的事。最后成了，是三家转的。他们陆续结婚，都不付彩礼。大表哥结婚时我去了，婚礼很简单很寒酸。在婚礼上，我见到二表哥，心想：眼见着他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大姑家也没女儿了，

将来他的婚事怎么办呢？

我大表哥的婚姻是幸福的，可是听说二表姐对丈夫不是心甜意恳，主要是嫌他个头稍微矮一些。二表姐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是她自己找婆家，她不会嫁给我表姐夫的。

我是富农后代中最幸运的一个。1973 年，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别说找个工作，连小队的会计和民办教师也当不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眼看也到了找媳妇的年岁。望着茫茫的星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难道我也要重复大表哥找媳妇的路？难道自己也要用姐姐来换个媳妇？

那一年真有人给我说媳妇来了，说是让二姐给我换。转眼已 1978 年，我幸运地考上了一所中专。真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也许我只能靠二姐来给换个媳妇了。

不管是换亲还是转亲，女儿有了婆家，儿子有了媳妇，做父母的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可是，实际上换亲和转亲给人们带来许多家庭悲剧。夫妻不和离婚，是夫妻双方的事情，可换亲就不一样了。结婚以后，双方过了一两年，有的两口子合不来，就折腾着闹离婚，赌气回到娘家，说什么也不想回婆家了。你不是不回婆家吗？对方的父母也会让女儿回到娘家来要挟对方。因为媳妇是用女儿给换来的，不能白白搭上一个女儿！最后，媳妇如果不回到婆家去，哥嫂的婚姻也只能告吹。

有女儿的让女儿给儿子换媳妇，没女儿的就没辙了。我姑奶奶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姑爷曾经当过八路军，解放后当教师，反右时成为右派，只得回农村干活。他家也是富农。姑奶奶一共生了五个儿子，我的大表叔和二表叔是 60 年代前找上的媳妇。到了 70 年代，三表叔年岁不小了，总也找不上媳妇，后来就找了一个有点傻的女子。三表叔是农村中非常精明而又能吃苦耐劳的人，可惜，生下的两个儿子智商非常低，看来是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了。我的四表叔和五表叔，人长得都不错，到了年岁，连三表叔那样的傻媳妇都找不上了。后来就去闯了关东，成了盲流人员，落户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山沟里。那里

也许是天高皇帝远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关内搬家去的富农们，政治空气一点也不浓。富农们多了，谁也就不用歧视谁。四表叔和五表叔都在东北找到了媳妇。改革开放以后，带着妻子儿女又都搬迁回来了。

1979 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们县四十万人口，错划的富农成分达到了七百余户。我们乡里有一个村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被划成了富农。粗略地统计，一个县的地主富农就有四五万人。我真不敢想象，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晚上五年，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换亲或转亲，不知有多少富农的后代要断子绝孙，不知有多少人会逃往天高皇帝远的东北山沟里，不知人世间还要产生多少悲剧。

农村不再讲成分了，我大姑家的二表哥和表弟，随着形势的变化，没用换亲就找上了媳妇。不但是我大姑家，过去所有富农的后代，也都陆续地找上了媳妇。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要回几次故乡。改革开放几年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换亲或转亲，换亲永远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消失了。

补白：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笔者在一个没有公路、偏僻贫困的山村插队。刚到农村时，农民住房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文革初期“红海洋”（到处刷毛泽东的语录）的痕迹。凡是墙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条语录的，这户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李若建

地主之殇　　野　夫

恩施易帜大抵是 1949 年底的事。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

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

在这新旧交替的一年里，祖父或许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可以向谁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 年恩施各县开始全面土改，许多工作组派往四方，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干部姓宋，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年。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这里的土家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

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农会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 1951 年的 4 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一位郑姓人的家里。这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他把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

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 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串打击后，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 15 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 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

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今年 80 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

妇，无后。

补白：前不久同学聚会，有同学提及文革初期开班会，有人高呼“黑五类滚出去!”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随即黯然离开教室，于是一声呼喊就剥夺了同学参加班会的权利。这些同学说到当时的经历，深感自己的自尊心被侮辱。那是1966年的夏季，一群北京红卫兵来学校来串联，身穿黄军装，腰系武装带，肩佩红袖章，一派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架式，自称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大会上叫人报家庭成份，叫到陈校长时，校长报资产阶级，北京红卫兵就叫他滚！这位平时受学生尊敬的陈校长只能黯然离去。学校盛行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逻辑，许多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和老师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

当时我虽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我反对这种出身论。那次班会上究竟是谁喊的“黑五类滚出去”呢？事隔42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是班长,开班会的事与我有关,是否因环境影响冲口而出这句话?我迷糊了,但我又想这不可能是我所讲,因为我当时反对这种说法……由此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我惴惴不安地给当事的同学通电话，证实了这话不是我讲的，而是一位造反派同学所为。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清华老子和牛　　潇　雨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脾气。

我们知青组的住处与四类分子对门，经常一开门就打个正照面。每当这时，他就面带恭谦地退回去，让我们先走。这倒叫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我想，可能因为他是四类分子，看到我们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有点敬而远之。至于他究竟属于四类中的哪一类，我一直没搞清楚。问了袁婆婆和谢大嫂，她们也都含糊其词讲不明白。又问队长和团支书，始略知一二。他的祖父曾是办私塾的。他从小跟祖父识字，后来到长沙上学，解放前还当过几天国民党的户籍员。土改时，因土地比别人多，被划了个富农。划成富农倒也罢了，他还时常抱着个书本啃。最大问题是他农活干啥啥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多年前，他的婆娘跟别的男人走了。

四类分子毛笔字写得极好。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门上的对联，谁家红白喜事的帖子，队里出个财务公布表格、刷个标语，全是他执笔。只见他熟练地把那些红纸白纸折好格子，铺开，瘦长的手指捏着毛笔，一改平时的窝囊相，满脸自信，叫人刮目相看。那笔在他手里抑扬顿挫，运筹自如。写出来的字真是漂亮，围观的人连连称赞。只有这时，他的背才好像伸直了许多。

因为四类分子干不了别的什么活，队长就安排他饲养队里的一头母黄牛。这活他真干得叫人无话可说，一年四季他的生活中心都在牛身上。每天一大早就牵着黄牛出门去吃露水草，傍晚社员们都收工了，他才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慢踱回来。夏天他手里晃着一个自己用茅草做的掸子，跟在牛屁股后面驱赶牛虻，冬天他会把牛栏铺得暖暖和和，准备充足过冬的粮草。农忙季节，队上要使唤牛了，他会心疼得要命，跟着牛到田边，深怕用牛人的鞭子抽得太重。牛一收工，他就赶紧牵到河边洗抹干净。那牛呀，硬是被他养得膘肥体壮，浑身油光光的缎子一般。队长常拍着那牛滚瓜溜圆的身子，满意地点头。

五月的一天，春插已完，四类分子一早带着他的宝贝牛出去吃草。他看屋前长得好的草不多，就把牛牵到较远的坳上山坡。那里草儿又青又嫩，是个放牛的好地方。这山坳坡多田少，只有几丘冷侵田，又深又凉收成低，队上早已不指望它，只是在秧苗多的时候就来栽上几兜，随便收几粒粮食。

四类分子将那母牛牵到草多的地方，让它放开肚子吃个饱，自己则在周围弄几根茅草做一个新的赶牛虻的掸子。牛儿吃饱了，路都快走不动了，四类分子的新掸子也做好了。他准备带着牛儿回家，自己也好吃早饭，可就在过一道田埂的时候，出事了！那母牛一脚滑到了坎下的冷侵田里，身体重重的摔倒在田坎上。那牛的身子太笨重了，肚子又吃得特别大，两只后脚全部陷在了冷侵田里。不知是折了牛腿还是别的原因，任凭四类分子怎么用力也拉不起来，而且越拉陷得越深，后半个牛身都快陷进去了。

四类分子急得摇晃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来叫人，可那时队长已带着强劳力到东门挑石灰去了。四类分子又晃动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坳里看他的母牛。那牛起初自己还死命想往上爬，可是后脚使不上劲，反倒陷得更深了，最后精疲力竭，动弹不了。可怜的家伙只剩呼哧呼哧喘气，圆瞪着两眼看着饲养他的主人，眼里泪汪汪的。四类分子摸着它的头，安慰着它，也眼泪汪汪的，早忘了一早起来自己还空着肚子。

傍晚，队长带着几个壮实汉子，拿着饭碗粗的木杠，想把那牛从冷侵田里抬出来，可是那冷侵田太深，人站在里面使不上劲。田周围都是田埂和山坡，往上拖也使不上劲。队长和社员们挑了一天的石灰，早已累得不行了,忙乎了一阵子,看看没指望了,只好各自回家歇了。

那牛在冷侵田里泡了一天，早已是两眼无神，浑身哆嗦。四类分子更是像丢了魂一样，不知所措，对着他的宝贝牛都哭了好多次。那一夜，他就守在那黑咕隆咚的山坳里陪着那母牛……

到了第四天，那牛已奄奄一息。队委会作决定：宰牛！那日收工后，队长嘱大家到山坳那边去等着分牛肉。袁婆婆特意关照我们知青组，要拿个大点的箩筐去装牛肉。每人起码有四五斤肉分，我们知青组有十一个人，那就有四五十斤肉哟！这对于好长时间没有开荤的我们来说，兴奋的心情不亚于小孩子。各家各户都点上松油灯，一个个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举着松油灯排成一条火龙，往那山坳里去看宰牛，分牛肉。

知青们没见过这号场合，也跟着去看热闹。出门的时候，我看见

四类分子家的煤油灯亮着。他是不会去现场的，他怎么忍心看着人们宰他的宝贝牛啊！寂静的山坳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冷侵田的周围被松油灯照得通明透亮，灯光把围观的人的影子放大好多倍，投到凹凸不平的山壁上。人们都很兴奋，大人小孩叫着嚷着。我站在人群后看着，不知为什么心中频添了一种压抑的感觉。母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体的大部分已陷在田里，只有头还搁在田埂边上，牛角被人系上了一块红布条，瞪着一双牛眼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群。队长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朝牛走过去，身后跟着一个拿着斧头的壮汉。听他们说这是请来杀牛的人，要用黑布蒙住牛的眼睛，再用斧头去敲碎它的头！只见那牛看着队长，挣扎着晃动了几下脑袋，竟然淌下一行泪珠！

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不忍再看下去，打着手电筒转身就走。走不多远，听到身后传来那母牛长长的一声哀嘶，接着是一声很重而沉闷的敲击声“嘭！”众人惊叹“啊—耶！”我的心紧揪着，加快了离去的脚步。很晚了，社员们陆续回来，我们知青组也分到了一大筐牛肉，可是却带回来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母牛肚子里竟然有一头已经夭折的小牛崽！天啦！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夜，我失眠了。次日，我在四类分子家门口看到了那只已长成型的小牛犊。它软软的躺在地上，紧紧地闭着那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双眼，娇嫩的身体上有一层浅黄色的卷曲的绒毛，显得那么乖巧可爱。我想，如果不是它的母亲摔这么一跤，不久它是会睁开它的双眼，在他的母亲身边玩耍嬉戏的。

四类分子没有要牛肉，他只要了那个被斧头砸碎了的牛头和已经死了的小牛犊。他把牛头清洗干净，留下头骨，摆在屋子里与它为伴，把小牛用背篓背到山上掩埋，然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多天不见出房门。队上的社员有人议论，他怎么连那母牛肚子里有崽仔都搞不清楚，对这事表示怀疑。队长在开社员大会时严厉的批评了他，后来那四类分子一天到晚神里神经，好象丢了魂似的。

不久后，我因母亲下放七宝山，也转调到那里，从此离开了大围山。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城了，有一次知青组的朋友聚会，我问及此事，他们告诉我说，文革开始后，队上有人说那牛是四类分子蓄意害死的，是他故意将牛推到田坎下的；还说他明知那母牛即将生产，是

故意弄死它，破坏农业生产。此事引起公社革委会的重视，特意派来工作组调查，认为这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的一种表现。于是他们对四类分子进行批斗，白天给他戴上高帽子，自己打着铜锣游乡；晚上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脖里挂着那母牛的颅骨。他那本来就勾着的背被挂得更加佝偻下去。他们还让他把自己的罪行用毛笔写出来，贴在生产队的墙上。听说，他贴出来的检查书，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字帖。

多年后再回大围山时，四类分子已不在人世，队长也老了。我问起四类分子当时怎么会不知道牛肚子里有崽仔，老队长长叹一声说："哎，其实只能怪那个牛兽医。牛配种后请兽医看了，那兽医硬是说没配上，我们也都以为没配上。清华老子那时真是冤枉咧！"

四类分子名叫李清华，我在那里时从未听到队长这么叫过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管四类分子叫"清华老子"。四十多年过去了，清华老子那颀瘦的身影，诚惶诚恐的笑容，还有那膘肥体壮的母牛和它那长着一身卷曲黄毛、静静躺在地上的小牛犊，总在我眼前晃动，与我那悠悠的大围山情愫缠绕在一起，难以释怀。

六叔三案　　玉壶生

邓六叔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文革中却糊里糊涂犯了三次反革命案，坐了三回牢，差点把命都丢了。一天晚上，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祠堂里评工分。每次评分前都要由公社驻队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语录。那天驻队干部忘了带报纸，随手一指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们今天就念这个！"

邓六叔一看墙上的红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说了一句："写得这样马虎，一个都认不到。"众人哄的一下笑起来了。原来墙上的语录是村美术老师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草体字原样画上去的。那时全国都是那样，文盲邓六叔哪知道这个啊。有人告诉邓叔："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写

的呢！”邓叔不以为然，还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么都好，就是这手字写得太潦草了，让我们没文化的贫下中农看不懂。我们要给他老人家提提意见，请他老人家写工整点，让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清楚！”众人更是开怀大笑。

这一下惹祸了。只见驻队干部脸色铁青，愤怒地指着邓叔的鼻子吼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胆敢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众人肃静下来了。但是驻队干部不依不饶，双手叉腰，突然站到记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员同志们，刚才邓老头对毛主席的恶读攻击你们都听见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老头其实就是混在我们贫下中农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邓叔坐牢回来后，老实了好几年，对凡属与毛主席老人家相关的东西都毕恭毕敬。那时每家各户都派发毛主席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邓叔家就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睡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领到画像后，邓叔把它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把毛主席像当成灶神一样的膜拜。后来发觉那里的位置不好，因为时间久了会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脸上熏黑。于是邓叔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上去时是用稀饭水粘死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等他又急又怕费老半天终于揭下来时，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还是弄烂了。

尽管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了最黑暗的睡房墙上，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的人又来了，他又到牢里坐了一个多月，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这次坐牢回来后，

邓叔似乎开朗了许多。他说他是政治犯，白天不用干苦活，而且牢里有吃有睡，比村子里过的日子好多了，很舒服的，坐得他都不想出来了，但是牢里的干部不允许，说我没什么大罪，就要求上面让我回来。村里人都笑他，说他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饥，才会说坐牢好。村里人其实是很忌讳坐牢的，总觉得那是坏人的事。

过了几年，邓叔又犯错误了。一天中午，全队人在村中一蔸大樟树下学习，驻队干部拿着一张刚到的报纸传达蒋介石死了的大好消息。邓叔一听，竟咋咋呼呼惊叫一声“蒋介石死了？”他的本意是想说蒋介石终于死了，但话一出口，别人听起来好像他很可惜蒋介石死了。驻队干部放下手中的报纸，和全村人一起看着邓叔。邓叔惊惶失措地说“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当天邓叔又被公安局抓走了。县革委会讨论了半天，有一半人说此人屡教不改，该杀！另一半人说，节省点子弹吧，一个快死的糟老头了，让他去坐牢算了！这回坐得最长，足有三年，到 1977 年才放回来。回村后，邓叔就不再说什么话了，直至 1984 年死亡。

少年陈丹青　　曾慧燕

陈丹青的父亲陈兆炽是影响他一生的人。陈兆炽毕业于海关大学，任职财政局。1957 年中了“阳谋”，成为右派分子。在逆境中，他一直教育儿子“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后才能搞学问事业。

陈丹青的正直正派，很大程度得益于父亲的从小教育。陈兆炽提起儿子赞不绝口，他说丹青读书很用功，聪明超乎他们的想象，他的很多思想超过他的年龄，很敏锐，感情丰富，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好。

陈丹青从小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1957 年他 4 岁时，父亲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此后苦难如影随形。1967 年文革如火如

茶，陈家被红卫兵抄家，书籍、画册全被抄走。14 岁的陈丹青已显露艺术天分，眼看心爱的画册被抄走，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陈兆炽劝他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可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陈兆炽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图案是一幅油画名作《意大利姑娘》，马上拿回家送给儿子。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画得栩栩如生。

陈丹青成名后，很多人问陈父为何给他取一个代表绘画所用颜料的名字？陈兆炽说，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让儿子学画，取这个名字源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诗“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叫丹青、丹心。陈丹青的女儿陈夜谭的名字则取自“天方夜谭”。

1968 年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偷偷临摹达文西、米开朗基罗的男裸体纸片。“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1970 年 4 月 4 日，是陈丹青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日子之一，那一天他被送到江西宁都农村插队。“上海知青都知道这是变相的劳改，没人以为是去‘革命’。”另一个对他重要的日子是 1982 年 1 月 6 日，他坐飞机到美国。“这两个日子对我的改变很大，一个是从此离开家，一个是从此离开祖国。”

1975 年，陈丹青从江西“流窜”到江苏继续插队。期间，只要一有空隙，陈丹青便掏出随身带的本子自学绘画。油画《在长征路上》获选参加美术展，令他信心大增。他说，那时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没有诱惑，他至今怀念那种没有功利的单纯。

陈丹青生命中遇到许多伯乐和贵人，他的妻子黄素宁是其中一位。他在苏北及皖南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当了八年知青，从没有放弃对绘画的追求。当年他得以认识妻子，油画家陈逸飞无意中为他们牵了线。那时陈逸飞为陈丹青写了推荐信，要他去南京艺术学院拜访陈德曦老师。陈德曦设法让陈丹青到教室做一次示范绘画，请当时在座的学生帮忙推荐，黄素宁慨然应允，没想到成就一段姻缘。

黄素宁出身军区干部家庭，根正苗红，却非常同情出身黑五类的陈丹青。她本身很也有艺术才华，出于对陈丹青的赏识，1976 年，她受西藏自治区委托，物色三名画师帮助筹备美术学习班。她问陈丹青

是否愿意去？并说他应该去。他一心向往艺术创作，同时为了改变当时农村生活的艰苦环境，欣然前往。

1976 年，陈丹青第一次到西藏，这片苍茫大地的雄奇壮美，带给他无数艺术灵感。“西藏的辽阔苍凉，令人太震撼了！我被西藏俘虏了。”久藏在他心中的创作欲望，像洪水般奔泻而出。当时他只有 23 岁，“西藏居然把我当个人才，文革中年轻人从来不看什么学历”。

进藏不久，毛泽东逝世，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绘画鲜少悲剧题材，更不能画工农兵哭泣。可由于是“伟大领袖”逝世，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沉痛之中。围绕这一重大事件，陈丹青创作了大型油画《泪水洒满丰收田》。画面上丰收的麦田金灿灿，听到噩耗停止收割的藏民，穿著深黑色的袍子，表情凝重哀戚。这幅画入选当年全国美术展览，成为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后来考入中央美院的敲门砖。

整人要用二百五　　朱之泓

我第一次参加批斗四类分子大会是在下乡到宁夏固原杨郎四队的第二年冬天。会议一开始，男人女人们就都尽量躲在灯影照不到的暗处。女人们照样分秒必争地做着自家的针线，脸上没有丝毫的冲动。男人们照样慢条斯理地卷着旱烟，眼中没有丝毫的激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一个侄子态度最严厉，高声叫着自己亲叔父的名字：“保占英，你必须老实交代！”其他人对站在中间的被斗对象，不外乎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再进行一番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教训，比如：“保占英，你的剥削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你今后要进一步改造你的剥削思想，好好劳动，听下（清）了吗？”保占英恭顺地答应着：“听下（清）了。”批斗会就这样平平淡淡结束了。

在杨郎其他生产队，批斗的火候可就大不相同了。一队有个地主分子邓培勤，白天在队里劳动，干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回到家还常常吃不上饭，晚上又被社员们施加车轮战。一会儿触及灵魂，一会

儿触及肉体，他终于活不下去，上吊自杀了。死后，贫下中农们揪来他的老婆代替，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三队有个叫万耀宗的地主，每次批斗时，他夫妻俩双双站在会场中间的凳子上。地主婆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时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再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斗争，再掉下来，就再打。

一队的地主曹汉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贫下中农从外边搬来一大块冰，逼她脱光鞋袜，光着一双小脚站在冰块上接受大家批斗。等批斗结束时，地主婆的两只脚将冰块融化了两个脚窝。下一次批斗时，贫下中农代表又变换花样，搬来一大块冰，让她坐在上面。到结束时，屁股底下融化了一个大窝窝。第三天批斗，再换一个花样，让她跪在冰块上。批斗结束，她的膝下化了两个窝窝。第四天，又将冰块放到她的胸部，冰块被体温融化，水从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一队曹汉英的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场的大石磙上，两肩还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脚下稍一动，石磙子就滑动，她不是摔下来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当场昏死过去。还有一个地主叫张道方，此人在旧社会比较吝啬，人们借粮他大多不肯。批斗他时，那火药味儿就更浓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掴耳光。

看着我们杨郎四队批斗四类分子的方式，听着其他生产队的批斗状况，我感到纳闷。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为何对地主阶级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怎么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办事。” 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 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

百五。”

补白：作家刘绍棠说：“1947 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机械部退休干部冯志轩撰文回忆土改，称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地主父亲的惨死。作家鲁顺民描述，斗争大会将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荫冠的鼻子，用铁环穿起来，令其儿子、党员牛友兰牵着游街，把牛荫冠被活活斗死。四九年后，牛友兰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学者顾颉刚的日记记载：“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共产主义本要打倒资本家，无如帝国主义保卫之，打不倒，乃移其祸于我国地主。地主中固有恶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网打尽，讵非冤也？”　　冉云飞

邓朴方的贱民岁月　　张士峰

邓朴方上八一小学时，学生中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诸如此类。邓朴方回忆道：“别人问你爸爸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爸爸是什么，当时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直到五年级，11 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我上中学的时候，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借钱去买公共汽车票。我们班主任说，他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1966 年，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邓朴方和姐姐邓林、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邓小平的罪证。造反派对邓朴方进行了残酷迫害，把他打成反革命。1968 年 8 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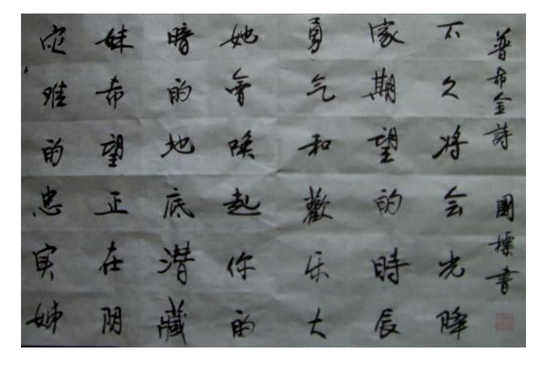
邓朴方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无法保持这种人格。最主要是，如果成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太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邓朴方受伤后被送到北医三院，可因为他反革命的身份，不可能给他做手术。“苏醒过来以后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半年后，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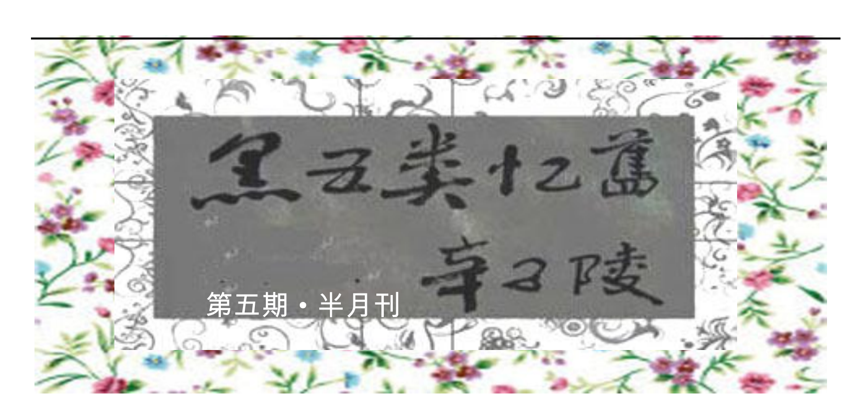
邓朴方说：“后来我想，病还是要治治，就摇车子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口的战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让我靠边站，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把我和三轮车一块儿抬上一辆吉普车，送回救济院了。”

1971 年 6 月，经邓小平多次争取，邓朴方被送到江西。在江西这段日子，邓朴方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党籍开除了，没有职业，也没有工资，我就修理收音机。妈妈到处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江西那些工人家家都没有收音机。那时候多穷啊！后来我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装，装了再拆。”

当时照顾邓朴方的，除了妈妈和奶奶，还有已经 69 岁的父亲。邓小平虽然是国家领导人，可在文革中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对此是不是很内疚？邓朴方说：“爸爸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没对不起任何人，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普希金诗　　焦国标书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戝民的种类　　焦国标

五谷不止五种谷，黑五类当然也不只五种戝民，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政治戝民？迄今还没见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日前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就指出台属这种戝民还可细分为新台属和老台属。老台属是指随蒋介石国民政府赴台人员的家属。朝鲜战争结束后，有 5-10 万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选择去台湾和美、加各国，他们留在大陆的家属被称为新台属。这些家庭“立即（被）摘掉了‘光荣军属’的红牌，打入另册”。

信中写道：“以我本人（右派）被管制期间目睹的，还有两类人你忽略了。一是五十年代的一贯道。……还有一类是天主教神职人员。我 1958 年入狱时，同牢就有个犹太人叫‘望光名’的神父，入了中国籍，就只好坐中国牢了。汉语说的不怎么流利，不久被送往大城市的监狱，说那里有‘战犯管理所’通用的翻译。剩下的几个农村教堂的神职人员就没有这个福分了。有的 1980 年才平反，出来也没有教堂可栖，只好分配成农户插队。时隔 30 年，现在又因家庭教会新抓了一些

人。”

这封来信还指出：本刊发刊词中的“黑五类在 1984 年以后均享有国民待遇”之说，与实际不符，是过高地评价了中国的政治平等度。1984 年黑五类摘帽，并不等于全体中国人就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的确，又过了近 30 年，中国至今也没有实现国民待遇平等，一个月前我还看到一份 2010 年政法类大学的入学政治审查表。中国一直有生生不息地制造新贱民品种的传统雅好。

————————————————————————————————————

铁流捐资百万设立新闻基金

铁流原名黄泽荣，是五十年代第一批工农出身的老记者、老作家。几十年来深受极左路线以言治罪之害，曾因一篇说实话的小说整整蒙冤 23 年。1980 年末获改正，重回新闻单位和作家队伍。此后，响应改革开放号召，放弃公职，举家北上，成为最早的北漂族。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勇敢拼搏矢志不渝追求改革，终于成为小康之家。铁流称，“本人年已七十有七，来日不多，去时将近，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自愿拿出多年积蓄的 100 万元人民币设立铁流新闻基金，用于推动新闻出版的立法事业，同时资助那些因揭露贪污腐败遭黑恶势迫害或生活遇到暂时困难的记者作家。”这 100 万元分 10 年支付，每年 10 万元。如若国家政策允许，将按有关政策法规，正式申报成立铁流新闻基金会。在未得政府正式批准之前，暂以个人名义进行一对一的捐助。第一笔 5000 元，已捐赠给《大迁徒》作者谢朝平先生。若《大迁徒》一书自费出版，将支持其不足之数。

————————————————————————————————————

目　　录

草葫芦血案　　沈不沉

1970 年春，下汪劳改一中队出了一桩奇案。乐清人周金弟，原在

虹桥中学读书，与同班女同学小玉从小青梅竹马。小玉是他们学校的校花，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周金弟脑子灵，从毛主席石膏像中获得启发，准备别出心裁，利用草葫芦闯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新路。反正学校也不上课，干脆回家种草葫芦。他的想法得到小玉的支持。

他从集市上买来一个毛泽东木雕头像，放在一个盒子里，浇上石膏，拆开后就成了一块阴模。等到草葫芦结果时，把石膏阴模套在葫芦的小头上。成熟后，草葫芦就成了一尊毛主席像。再灌进一些水泥，此像就成了不倒翁，憨态可掬，拿到市场上十分抢手。那年秋天，他光是卖草葫芦毛主席就赚了 300 多元。

二人正筹备结婚，不料大祸临头，周金弟被抓了，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而且走资本主义道路。

丑化伟大领袖是大罪，少说也得判 10 年，小玉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她找到公社治安员，请他设法搭救周金弟。这位钱姓治安员，年龄四十开外，疏眉谢顶，一副长者的模样。他告诉小玉，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他一句话，周金弟就可以出来。小玉信以为真，千恩万谢。可是接着这位貌似长者的治安员就对小玉提出性要求。小玉大为意外，断然拒绝。事后想想，只要自己的心上人能平安无事，就吃点眼前亏吧。不料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案件拖了半年，终于判决。并没有传闻中那么严重，周金弟只被判刑三年。最糟糕的是，小玉竟发现自己怀孕了。牺牲自己的贞操，不仅没有救出自己的心上人，反被人欺骗，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千思万虑，她觉得对不起周金弟，已无颜活在世上。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她留下遗书，带着一个近半年的小生命，跳进村边的大池塘。

一天，蒋堂农场的一位管教干事，特地来到下汪劳改队找周金弟谈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还出示了小玉的遗书，并教育周金弟正确对待此事，不要意气用事。周金弟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出工时，周金弟逃跑了。蒋堂农场预感此事严重，立即派员赶到乐清。但为时已晚，那位钱姓治安员已被捅了 30 多刀，心肝被挖空。次日一早，有人发现周金弟自杀在小玉的坟头，坟上摆放着一副血肉模糊的

心肝。

这是 1970 年我从武林机器厂调到下汪大队后听到的第一个如此惨烈的故事。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我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补白：爷爷当过保长，三个老婆生了六子四女。共产党来了，爷爷逃跑了。也许是觉得逃无可逃，也许是想念家人了，几年后爷爷自己回来了。他夜里先摸到四儿子（我四叔）家，因为他家独门独户。四叔害怕受连累，开门给他一碗饭，就让他走了。爷爷很绝望，决定自杀。但是没死成，又逃到萧前湾村萧金的父亲家去敲门。萧金的父亲很高兴，说："你不是老保长吗？"爷爷就这样被捕了。我父亲去看他的时候，他被绳子反绑着，坐在门槛上。十多年了，见到自己的小儿子，爷爷很激动："是小八吗？""是我，大。"爷爷被判刑 4 年，入狱的第二年（1960 年）就死去了。监狱不通知家属，只给大队写了一封信。大队里没人愿意给地主捎话，所以我们家的人直到 1961 年别的狱友出来后告知才获得爷爷的死讯。当时死掉的犯人都被埋在一个地方，上面插上竹条，等人认领。爸爸他们去认领时，那块地早被别人平整了一遍，麦子都有膝盖高了。所以现在罗甸子水库边爷爷的坟，是空的，衣冠冢。爸爸经常说："也许你爷爷的骨头渣子被水冲到一个风水宝地去了，要不然哪里会有你们的今天。"杜冷丁

——

送父还乡　　潘　虹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 26 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

头一天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静，今天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 30 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她送我上了 43 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我说带了。“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我点点头。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补白：有一天我教的一个男学生问我："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他刚十五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说话时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描述说，在王府井天主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驱逐出去（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报导），然后他们住进去。教堂里储有罐头，吃饭不成问题。他们每天到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进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另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用时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艾柏林

——————————————————————————————————

右派的苦难没完没了　　俞梅荪

父亲俞彪文，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原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1949 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参与制定国家保险政策和业务规

章，组织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受到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 年以后，保险业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 年 5 月，父亲按照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的要求，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遂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7 月 22 日，不忍受辱，含冤自杀，终年 31 岁。

父亲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母亲郑珍经批准，携 4 岁的我和 1 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是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迫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业停业，公司全部撤销，母亲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至退休。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文革期间更甚，被抄家被辱骂。1974 年弟弟中学毕业时因受歧视刺激，自杀未遂，患上抑郁症。1977 年我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当了钳工，弟弟则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 多年来，每隔七八年就要住院治疗。我俩从小怨恨父亲带给我们的不尽劫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父亲，连想都不愿去想他。

1979 年 4 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母亲携我上访，遇见久违 20 年的父亲的同事、诗人北岛的父亲赵济年（时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他带我们求见父亲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传出话说没空。一周后，赵伯伯又带我们去见林，林仍说没空，不予见面。我们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父亲的档案，做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 1957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其中有父亲的发言。父亲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

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 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父亲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任何错误。我据理力争，几经争执与周折，人事处长张秀苒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海淀区民政局按照父亲的行政 14 级副处级待遇，按 1957 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 360 元。我提出应该按照 1979 年现行标准 1500 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 500 元补助款，母亲和我用此款把父亲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4 年，我又遭人栽赃，蒙冤入狱 3 年。

每年 7 月，母亲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此时我和弟弟都格外小心，但从不关心父亲的忌日具体是本月的哪一天。2003 年，母亲在最后一个 7 月（半年后去世）告诉我们，当初父亲去世时，母亲本想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然后自己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太没意思。”我每每打断她的话，安慰她，却从不询问父亲的去世经过。

2007 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 50 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父亲的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父亲的同办公室同事周庆瑞，可惜的是周已在上个月去世了。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我们的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 5 号院（财政部宿舍）1 门，鼓起勇气登上 4 层楼，查看父亲从 5 层阳台坠楼之处。在底层 101 室的窗前，我徘徊观望良久，却最终也没有勇气叩开“我家”的房门（父亲去世后，我家搬走，母亲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在其《三不老胡同 1 号》一文中写道：“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北岛的回忆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吃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的一个夜晚，母亲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的昏暗病房看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 4 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父亲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 年来我从不会想起，也不会说起，更不曾向母亲询问。1979 年在为父亲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原本要召开批判父亲的大会，不料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 3 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父亲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2008 年 4 月，我到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兄弟俩平生第一次谈及自己的父亲。弟弟认真地看着北岛的文章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父亲在给家母的绝命书中写道，希望她努力把两个孩子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落泪。弟弟还提起，1997 年，我获释出狱后，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 6 室祭奠父亲。她要我俩向父亲灵位鞠躬，她自己则仔细擦拭父亲的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从不理解父亲，过去母亲要我去为父亲扫

墓，我一向拒绝。

1997 年，我出狱回上海，把因我入狱受惊吓而发病住院、仍然滞留在精神病院的弟弟接出院。此时祖母已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闲置起来。我的知青“朋友”惠进德，在弟弟住院期间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此时提出无偿借住我家祖居一年。住满一年后，他又与我家攀兄弟，要求把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私下廉价转让给他，并以保留我们兄弟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负责代管我弟弟日后回上海住院的监护事宜和出院后安排我弟弟在他的私企工作从而回归社会为条件。2002 年弟弟回上海住院后，惠进德回避其保留居住权的承诺，多次拒绝医院的出院通知，并对我家隐瞒此事。2007 年底，滞留在市区总医院 6 年的弟弟，被遣送至郊外闵行区颛桥分院。他深感出院无望，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医生及时发现抢救，施以电休克治疗。这种疗法每每使弟弟昏死过去，丧失记忆。

为此，我向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拒绝，他还警告我“要识时务”。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竟发现我家祖居（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480 弄 76 号花园洋房第三层 4 室 1 厅廉租公房）早在 1999 年已被惠进德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并伪造其签名和私章退掉了。他们还伪造《住房调配单》，把我弟弟调配到郊外北新泾平塘路 185 弄 112 号 302 室，而实际上这是别人的住房，根本无法迁入。惠进德又伪造公文，把他全家 4 人从虚拟的 185 弄 100 号 603 室迁入我弟弟的住房，再利用离婚把我弟弟的住房有偿转让给其“前”妻。到派出所查询发现，惠进德的儿子已成我弟弟《户口本》的户主，惠进德自己则另买房子迁走，完全脱身了。就这样，我弟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实际却无住房的黑户。我家三代居住 64 年的祖居，就这样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非法手续，“几经易手”，被悄然“合法”夺走。

2008 年初，为了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为使弟弟恢

复正常回归社会，我时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几日。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回北京，我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祖居被占问题。2009 年初，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公室的通知后，满怀希望回到上海，把病愈滞留在医院多年的弟弟接出，一同去上访。没想到，长宁区政府信访接待员一面怪我当初引狼入室，一面却又用惠进德提供的自相矛盾的所谓证据为其辩解，说惠有社会地位，可以搞定事情，还代惠转告，尽快把弟弟的户口迁走，另买房子给弟弟住。

在我们的祖居之地，惠进德极为嚣张，说他与信访办已经沟通，信访办相信他、会帮他的，并嘲笑我们上访无用。惠进德的妻子丁有娣甚至对我弟弟推推搡搡，要把我俩赶出大门，引起周围邻居公愤。弟弟拼死要住下，我则因寄希望于继续依法维权上访，把弟弟劝回了旅馆。

我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继续上访市政府信访办，处处被非难，无家可归，贫病交加，生存无着。147 天后，终于盼到市政府信访办的《复核意见书》，可是一切虚假手续仍然被认定为真实、有效、合法，予以维持。弟弟屡被刺激，大哭不止。他责怪我当初他回祖居要拼死住下，我不该把他劝回旅馆，说我相信依法维权反而被法害了，更把他害惨了。他不愿看到我，要以自杀而离开我。我羞愧难言，走投无路，积郁成疾，高烧 40.2 度。弟弟把我送进杨浦区控江医院。我出院后，弟弟厌食厌世，精神恍惚，卧床不起，极为虚弱。我送他回医院后，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成危重特护病人，体重下降 15 公斤，入院数月一直要自杀。我们兄弟俩依法维权上访，求告无门，惨遭加倍侵害，险些丧命。

2010 年初，我到法院咨询。法官告诉我，惠进德伪造签字和公文，涉嫌欺诈犯罪，应该报案。我到派出所报案，并请求其纠正惠用非法手段把家人户口迁入我弟弟的户籍而成为户主。两周后，我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我按程序向区公安分局申请复议，两周后又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我上门请求与警方面谈，也被拒绝。这就是中国的司法

现实！不少法律法规看上去面面俱到，很完善，但一旦人们当真去依法维权时，方知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你可能反而遭受更残酷的迫害，真正是旧债未了，又添新仇。法律不仅是形同虚设，而且有极大的欺骗性，危害公民，危害社会。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况很糟，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无效，挣扎于贫困绝望之中。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原为财政局干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农场 20 余年。获释后，其祖居住房被亲友侵占，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 84 岁的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 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 22 年获释回原单位，不久又被陷害，判了无期徒刑。12 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 34 年），1996 年出狱。祖居住房已被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 120元的低保维持生存。

野夫的文革　　梁文道

野夫四岁时文革开始。当时孩子们没什么游戏可玩，便到田野抓癞蛤蟆。抓癞蛤蟆干什么？先用泥巴糊成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然后把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住窑口。窑口上留有小洞，把冷水灌进去。生石灰遇水，产生高温。在蒸汽泥泞中，癞蛤蟆呱呱惨叫，由强变弱，气散声绝。扒开这个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皮已完全蒸掉，露出新生婴儿般的晶莹酮体，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野夫六岁时，是 1968 年。放学时，一个老师把大竹扫帚拆散，发给每个小孩子一根竹条。干吗用？用它打抓来的一个小偷。原来有个小偷，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他家里有个小孩，五六岁大，无衣蔽

体，冬天很冷，想偷块布回去给孩子做衣服。小偷被逮住了，绑了起来，然后让小学生惩罚这个小偷。他们用竹条拼命打他。小偷的小腿，皮肤粗糙还带着泥巴，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嚎，绝望得手足乱舞，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最后，他喉咙嘶哑，嘴如鱼唇般无声开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怦然栽倒。

野夫的父亲是小地主的儿子，后来当了缴匪英雄。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常设计诱杀一些山野逃难的乡民。后来他被打到，人也斗他。有个斗野夫爸爸的人，老在家里架着机关枪，威胁要杀野夫爸爸一家。

野夫的父亲被打倒后做矿工。这帮人在矿井底下暗无天日，没有什么娱乐，便以抓老鼠取乐。抓来老鼠，用生黄豆塞进老鼠的肛门，再用线把肛门缝起来。黄豆在老鼠体内膨胀，痛不欲生的老鼠被放生之后疯狂乱蹿，闯进它们熟悉的家就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鼠类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这就是当时一帮工人平常的休闲生活。

那时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对敌人温情就是对人民残忍，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这样的教育发展了每个人心里潜藏的残忍天性。1982 年，19 岁的野夫当了个中学老师。有天半夜，他在深巷看到了他小时候那个对他家架机关枪的仇人。在路灯下，那人潦倒而苍老，整个身子佝偻着，但是野夫还是上去把他一顿暴打泄恨。

————————————————————————————————————

补白：我三哥王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几年后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实际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五七年反右，三哥怀着赤诚之心，给高层首长林铁提意见，批评他重用其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上级领导劝三哥认错收手，

他不听规劝，固执已見，被打成极右，发配农场劳改。1959 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四个老婆，江青与毛先孕后婚，不是元配夫人，被揭发检举，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后提出申诉，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四年，刑满后留场劳动（俗称二劳改）。文革期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七年。七九年平反时，三哥已 52 岁，恢复 18 级干部待遇。其时军校编制已撤消，被就地安置工作。让人欲哭无泪的是，三哥七年冤狱的判决书竟然是伪造的。因没有存档底案，政法部门据此不予受理赔偿。四哥王古白，1949 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一家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五七年大鸣大放，四哥给劳改政策提意见，揭露了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尔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 年改正复职，未获任何赔偿。 王誉虎

——————————————————————————————————

哥哥庄彦斌　　庄晓斌

我的哥哥庄彦斌比我大 9 岁。哥哥很有体育天赋，各项运动都很擅长。他的速滑纪录，在我家乡据说至今也没人打破。15 岁那年，哥哥被选进黑龙江省少年篮球队。后来又进了黑龙江省青年篮球队，成了省队的主力前锋。为了能和当时在佳木斯评剧团当演员的女友团聚，他放弃了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学业，到佳木斯市队打球。

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随潮流而起，在佳木斯撑起造反大旗，被该 36 万工人推举为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司令。1967 年 4 月，他作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途经家乡时，我对哥哥说：“你别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但出身于剥削阶级，那可是与生俱来的罪过。我在学校虽然品学兼优，可是作为“可以教育的子女”被打入另册。学校里的各个造反团队都不接纳我。我天生要强，斗胆自己挑头成立了一个名叫“一身是胆”的造反团组织，可是不到一个月便被红五类子弟砸了。我的情绪极端低落，劝哥哥说：“我们是革命对象，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你还是适可而止，好自为之吧。”

哥哥真诚听取了我的规劝，答应从北京回来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腾了。可是从北京回来不久，哥哥被牵进“6•30 反革命凶杀案”。该案是文革期间佳木斯市发生的一起两派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胜范，是电机厂的工人，另外一名死者是军人。案件牵涉到我哥哥，他随即被军管会收押入狱。被关押的还有另外两名凶手，一个叫陈铁生，佳木斯市第 15 中学的学生，另一个叫魏征明，也是电机厂的工人。这两人都惨死在牢狱中了，我的哥哥却侥幸熬到出狱。他在看守所整整关押了 3 年，1970 年 6 月获释。这 3 年里，他受到过多次酷刑拷打，有时把他的头用麻袋罩住，然后再打。

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的一头秀发一寸寸发白，最后生成满头霜雪。哥哥的变化更大，已由狂热的巅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经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获释之后，被监督改造。单位里的当权者都是原来的对立面，哥哥当然不甘受这份委屈。此前在狱中，他与各类社会渣滓日夜厮守，良知日益麻木，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堕落。如今为躲避监督劳改，他逃离单位，想偷渡去香港，然因被人告发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决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帮助下跳车逃跑，被一伙刑事犯罪分子搭救。从此哥哥与这伙搭救他的人为伍，在辽宁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两年之后，他的罪行暴露。为逃避追捕，哥哥秘密潜回到家乡藏匿。

哥哥从辽宁潜回家时，带回一部红旗 803 牌短波收音机。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广播。香港有一家电台播送一个“听众信箱”节目，他听得着了迷。那是台湾国民党在香港

设置的，专门面向大陆作反共宣传，并鼓动大陆人给他们写信。受这家电台的蛊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香港九龙新浦港彩虹道 2 楼 2 号，石艳芬收。因为这封信就是我在黑龙江南叉邮局为哥哥投寄的。这封信闯了天大的祸，一场灭顶之灾正向我家袭来。

1973 年 6 月 9 日，全国挂号的“73•2•11”反革命挂勾信案件侦破，我和哥哥、父亲相继被捕入狱。一年半之后，我哥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上，我哥哥庄彦斌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共有两条：一是曾因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拘押教育两年，释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二是自 1972 年 10 月以来，隐藏在家中地道内，收听敌台，并进行反革命宣传，书写反革命匿名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策划叛国投敌。我父亲被判 8 年有期徒刑，我本人则被当成了一个被宽大的典型，免予刑事处分释放了。但这是个精心编织的骗局，我的自由仅仅有 3 个月。1975 年 2 月 1 日，我又被抓回，重新查究出我新的反革命罪行，最后判我无期徒刑。

1974 年 10 月 31 日是我哥哥被执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区召开广播公判大会，并组织伊春地区所有单位收听公判会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会上当场释放的。但我的哥哥却没有与我和父亲一样被押上审判台，因为他在临刑的前夜，用一个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静脉，企图自杀。详细情形是一个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后来向我讲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里监护我哥哥的两名囚犯之一。“你哥哥在接到终审判决后，曾平静地对我俩说：‘你俩放心，我是不会走上共产党的刑场的。’我俩当时没理解他的意思。临刑前夜，他让我俩给他铺好行李，说要好好地睡一觉。我们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能自杀。他身上藏匿着一个用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时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抽搐，赶紧掀开被子。他已经把脖子上的静脉割开了，血流不止。我们赶紧报告看守，经过紧急抢救，人虽然还没咽气，但已奄奄一息。”

开宣判大会时，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没能站在台上。但当局有办法，他们把我哥哥绑在一扇门板上，立在刑车上。在宣判他时，

刑车从会场的主席台前驶过，然后直接驶往刑场。后来我们家属去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时，起初狱方不想给，怕家人发现行李上的血迹。我们觉得蹊跷，执意要领回行李。狱方没办法，向上级请示，才给了行李。两个褥子上均有脸盆大的血痕，可见当时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遗书，原文是："父母恩重，节衣缩食，积铢累寸，育儿三十年，原期诗书成就后，精忠报国，阖家欢颜。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卷，受人蛊惑，起来造反。虽披肝沥胆，全抛私念；虔诚笃信此心丹！谁岂料，只落得容颜憔悴，皮开肉绽，身陷囹圄有 3 年。更可恨，那奸佞鬼魅，逼我进退难，异念差，上梁山，铸成千古大错。恨海难填，酿成终生憾悔，可谓定数使然。虽死无遗憾！只堪惜，二老霜鬓，稚儿童年，居家牵累，父兄同入监。丝丝缕缕连心肉，撕裂肝肠全抛闪！苍天兮！怒问不闻语？心似碎，谁见怜？奈何桥头愤何悔？黄泉路上恨岂单！把笔一曲成绝唱，犹似膝下拜慈颜！儿去也，二老休牵念！"

这封遗书写在一个装药的纸袋上，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乘狱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里的。遗书上的书写日期是 74 年 7 月 17 日，也就是我哥哥临刑的 100 多天前。这封遗书是怎么辗转到了我父亲手里的，至今不得而知。被释当天，我向伊春法院谭一琴审判员提出要为我哥哥收尸。可谭板着脸说："家属就不要管了，尸体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我当时是刚刚释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再争辩，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妥善处理"。

我家有个远方亲戚叫赵忠祥，当时是伊春卫校（今伊春市医学院）的在读学生。赵后来透露，是他和他的老师亲手"妥善处理"了我哥哥的尸体——用大锅把尸体煮烂，他把骨上烂肉剥掉，他的老师把骨骼做成标本。赵忠祥还把这个标本的编号告诉了我们家属。起初他并不知道那具尸体是庄彦斌的，事后知道了，又懊悔又恶心，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许多年后，我们家属曾去伊春卫校找寻那件标本。卫校的管理人员拒不配合，让家属去找伊春法院交涉。2000 年，我和我的亲侄子曾到伊春法院交涉一次。接待人员态度暧昧而蛮横，说："这

件事（尸骨标本）查无实据。你哥哥有罪这是事实，早有结论，绝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苍天啊！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经“海晏河清”了的时代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啊！

我母亲叫丁敏，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给他们每人颁发了一枚解放勋章。我母亲很少佩戴这枚勋章，也不轻易示人。母亲的大衣柜里有个红绒小匣子，这枚勋章和其他几件母亲所钟爱的物件就珍藏在这个小匣子里。每逢建军节和国庆节，母亲都把这个小匣子捧出来，用红绸布一边精心地揩拭勋章，一边陷入深深的遐思。每当这时，哥哥和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凝视那枚勋章。

1974 年 10 月 31 日上午，母亲从广播里听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时，竟没有掉一滴泪，只是痴痴地一声不响。听完广播，母亲把她的那枚勋章拿了出来，摆在饭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勋章，一句话也不说。

哥哥被执行死刑后大约一个星期，几名身着警装的公安人员来到我家。那时我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仅 10 岁的侄儿，靠每月每人 8 元人民币的社会救济度日。年过 18 岁的妹妹，每天到家属生产队干活，一天挣 6 角钱。

警员来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决书郑重地向母亲出示，冰冷如铁地说道：“根据伊春市人民法院 74 刑字第 4 号判决书，你的儿子庄彦斌已于 1974 年 10 月 31 日被执行死刑，现郑重地将判决书送达给家属，家属应签字。”警员把判决书铺开，放在母亲病床旁的饭桌上。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笔，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好了字。警员又高声说道：“按照规定，家属还要缴纳二角钱的执行费。”“什么？”母亲闻言厉问：“什么执行费？”“执行费就是……”警员不好解释，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母亲的眼睛势若喷火，盯着警员问：“说清楚了，什么执行费？这是哪个上级规定的？”警员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亲冷笑了，颤微微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走下地，走到大衣柜前用双手捧出那

小红匣子。她把那枚金黄色的勋章捧出来，“啪”地摔在桌上，说道：“你看，这个值不值二角钱。如果值，你们拿去吧，顶你们要的执行费！”处决罪犯的区区二角钱的子弹费，还要向那个已经肝肠寸断的可怜母亲讨要，这是令希特勒也望尘莫及的“伟大壮举”啊！

前些年，中国废除了反革命罪，许多死去及侥幸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当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诸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然而，中国至今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平反。对于他们的冤案，当局不但没认错，甚至连一句体恤家属的话语也未曾表示过。

哥哥短促的 32 年人生就这样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是闭不上眼睛的。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没有为他平反，甚至没有表示一句歉意。当年那家蛊惑人心的台湾电台也早就销声匿迹了，主办者国民党现在也变得开明了，不仅和大陆通商通邮，而且似乎大有天下一统的诚意。他们都视民如草芥：杀人者，依然故我，拒不认错；蛊惑人心者，煽动小小百姓往共产党的枪口上撞，也心安理得。没有一个人为他们的行为忏悔，整个世界都沉默无语。

———————————————————————————————

补白：过去家家户户主房当门都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或祖先牌位。文革时，牌位都被当成四旧扫除，代之以供奉毛主席画像。1967 年，毛主席像章开始风行全国。毛的石膏像和瓷像也逐渐出现于市场，很快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供奉有毛的石膏像。购买毛的石膏像，不叫买，而叫“请”，与请观音、请财神一样。石膏像是易碎品，有许多人因不慎打碎毛的石膏像而获刑。其中最令人捧腹的一例是，有人设下巧计，利用毛的石膏像被弄碎来惩治村中恶棍。陈正满原是村里游手好闲、贪吃懒做的小混混，凭着其父在县里当官的一个老战友的关系当上党支部书记，从此在村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民看在眼里，却敢怒而不敢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村里有个退伍老兵，决定惩治一下这个恶棍。陈正满为人大大咧咧，不管到哪里都一屁股坐下去。那

老兵先在自家堂屋里放一个箩筐，箩筐里摆放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箩筐上放块木板，将石膏像遮住。堂屋内所有的椅子与凳子都搬走，然后让人去请陈正满。陈正满一来，就到处找地方下屁股，可是屋内都没有可坐之处，就一屁股坐在箩框的木板上，毛像立即被压得粉碎。此案人证物证俱在，陈正满被判刑 5 年。沈不沉

——————————————————————————————————————

黑五类的亚类　　陶渭熊

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

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词汇，各种刑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具体实施时则以所谓“民愤极大”为标准。但是什么程度的民愤才是“极大的民愤”，全由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一般地主又被称为普通地主。他们是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侥幸存留而没有被杀的地主。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劳改，但总算活了下来。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大量存在，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即使个别还在世，也已八九十岁高龄。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尽欺凌。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头号政治贱民。

所有地主都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旦违犯则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轻则批斗捆绑吊打，重则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笔者在大巴山下教书。生产队在学校附近插秧，一个年青地主正和许多社员一起赶趟趟（比赛谁插得快），被路过的公社书记看见了，认为秧苗栽得东倒西歪，是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马

上追究责任。在公社书记的威逼下，大家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年青的地主。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批斗会，把那年青地主定为破坏生产的不法地主，后来竟被逮捕，判刑五年。

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乡，躲藏起来，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绝大多数被清理出来，押回原籍，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杀头。笔者家乡有一个叫刘佳辉的地主，当过保长抓过壮丁，被定为恶霸地主，决定枪毙。就在枪毙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脱逃，隐姓埋名躲藏在贵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后来被清查出来。此时土改杀人高潮已过，经调查他并无大恶，抓壮丁不过是奉命行事，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现在还在世，已 95 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权利，不再受到社会歧视，也没人称他们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 1956 年极少数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须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饱受社会歧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他们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

漏划地主是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清理出来重新划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被拔高成分而划定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定为开明地主。全国解放初期，在征粮运动中，一部分地主积极上交公粮，也常被征粮工作队称为开明地主。但是在土改运动到来时，所有地主都是斗争对象，原来定为开明地主的，都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开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牺盟领导人牛冠英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援抗日，定为开明地主。土改时被农民用铁丝穿着鼻子，强迫他的已是中共干部的儿子牛冠英牵着游街，后来被折磨致死。

几年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华北某个村庄（记不清具体地名）在土改时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杀光了，最后留下一个三岁小女孩寄

养在一户人家。村委会决定把该小女孩划为候补地主，等她长大到 18 岁时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与名目繁多的地主帽子相比，富农帽子种类稀少。富农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都曾经受到过有限度的保护。当然，许多地方还是把他们和地主一起加以打击。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 1963 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那就要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之后，富农就上升为反动阶级。它的种类大概有旧富农、新富农和漏划富农几种。

旧富农指解放前，或共产党武装割据掌握政权之前就比较富裕，达到划分富农条件的人。新富农指土改以后分得了土地，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受到党的恩泽而勤劳致富的，因此受到过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被毛泽东认为他们是在"两极分化"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农业合作化的障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敌人，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漏划富农是四清和文革中被清理出来划为富农的人。

反革命分子的阵容极其庞大。从解放后各种运动中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直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妻子江青变成的反革命分子，其总数恐怕不下数千万之众。其种类计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新生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是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的人，主要指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以及党务骨干、政府官员、三青团骨干、汪伪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等等。现行反革命指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如叛国、叛乱、投敌、越狱、间谍、资敌、煽动等等。现行破坏活动在文化革命中被无限扩大，凡议论、批评过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都是"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学生在墙上胡乱涂鸦，也可以构成书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时口误说错某些敏感词语，也可以说成呼喊反动口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新生反革命应该是"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它和现行反革命有

什么区别，笔者不清楚。文化革命中，大巴山脚下的南江县新店公社，有一个 17 岁小孩叫梁大勇，对于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现代宗教仪式极其厌恶。每次举行仪式大家山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大声呼喊“敬祝梁大勇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梁大勇身体健康，身体健康！”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时，这个 17 岁小孩就被逮捕法办，戴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处管制 5 年。

戴坏分子帽子的人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因政治原因定为坏分子的，如被认为破坏生产、散布谣言等，他们其实应归入反革命类。另一类就是流氓、盗窃、强奸、抢劫、纵火、诈骗、贪污、扒窃等等犯罪分子。不管是哪类坏分子，都没有划分为更小的种类。在民众心目中，坏分子一般指后者。与其他五类分子比较起来，坏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犯事以后，也不见党支部书记上门动员家属离婚、划清界限。即使到了劳改劳教农场，也会被管教干部利用来监督其他犯人。

官方公布的右派人数是 55 万多人，民间的说法是 300 多万人。右派的种类有极右派、反革命极右派、一般右派、无案右派、内控右派、中右、漏网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童分子。

什么是极右派？划分极右派的标准是什么？笔者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极右派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看得最清楚，认识最深刻，批评最尖锐，在被批斗时拒不认罪，态度最顽固，共产党最痛恨，所以遭受的处罚最严厉——开除，劳教，成为没有期限的劳改犯人。反革命极右派是头上戴着极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的人。凡是被定为反革命极右派的人，无一不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杀，如圣女林昭。

一般右派又称普通右派，是右派的大多数，其生存状况因具体环境而有很大差异。有的仍然留在单位继续工作或学习，有的被长期下放当工人农民，有的则被开除回家或遣送农村监督改造。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人人可以践踏的贱民，政治上被迫害，经济上遭剥削，生活中受歧视，甚至连婚恋权也被剥夺。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二十余年。

凡是被正式处理的右派，都有清楚的档案文本，将其右派言论、组织定性、处分决定、审批机关等等事项记录在案。但是有一类右派，却无档案可查，既无右派言论记载，也无组织处分决定，往往是单位头头，甚至党员小组长之类的人物一句话，就当了右派。等到 1979 年给右派改正时，才发现他们的档案里无任何有关右派的记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右派，却“享受”了右派分子的一切“待遇”！所以我称他们为“无案右派”。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闫桂勋，1957 年为凑足右派指标，班上的小组长（党员）捏造事实将其划为右派。虽然未经党委批准，却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这种右派各地都有，在落实政策时遇到很大困难，当局说：“你本来不是右派，我凭什么给你改正？”

有些著名人物或重要的科学家，已被划为右派，但不宜公开宣布的，此为内控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工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皆为内控右派。著名演员新凤霞，因被文化部某领导看中，动员她与右派丈夫、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离婚。新凤霞坚决不从，于是被定为内控右派。有些高中学生也被划为内控右派。四川省自贡三中高 58 级学生邓尔谦，出身贫苦，品学兼优，被誉为“党的好苗子”。后来被政治老师王永琼恶意动员写大字报鸣放，终将他定为内控右派。内控右派与其他右派没有本质区别，也逃不脱批斗、认罪、检讨之类侮辱与惩罚，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更免不了遭受迫害。萧光英在文革中不甚忍受迫害而自杀，其妻得知丈夫自杀，毒死了女儿，然后也自杀。中学生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升学、就业门路全部被堵死。

反右运动给每个人进行政治定位，划分左中右。左派、右派营垒分明，中间派又细化为中左和中右。中右指那些有右派言论、思想右倾或同情右派的人，但肥猪还不够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批判、检讨、认罪是免不了的，是党团员的还要受留团（党）察看之类的处分。可以说他们吓出一身冷汗！他们的档案中的政治鉴定暗淡无光，走到哪里都不被重用，师范毕业的连当班主任

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中右分子还被精减下放，清理回家，在后来的四清、文革等运动中继续遭受迫害。

有的人在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了右派罗网，但档案中留下思想右倾、右派言论之类的不良记录。如果他们再有言语或行为上的不慎，被人抓住把柄，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被人揭发出来，戴上帽子，就成为漏网右派。

自 1959 年国庆节宣布给“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之后，陆续有一些右派分子被摘掉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成为摘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比戴帽右派好不了多少，政治上仍属贱民，生活、工作上只有吃苦受累的分儿，婚恋上则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虽然平时都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每次运动还是理所当然的“运动员”。特别是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他们没有人能逃脱被批判斗争和关牛棚的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全国 99.999%以上的右派改正，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基本上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的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但是一旦提到他们的过去，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一旦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与领导或周围人群发生利害冲突，则他们还是要被人骂为右派。说穿了，改正右派还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特殊群体。

反社会主义分子指下面两部分人：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中的右派分子和未成年的中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因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把工人、农民和十多岁的中学生划入资产阶级，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发明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名称。工人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多少？有文章说不下百万之众。中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据《五八劫》一书记载，1958 年 1 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全省 58 级高三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批斗并变相劳改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竟超过 3200 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人！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也不过一万人。虽说这个运动在高三学生中进行，但其他年级也受到影响。被打成反

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才 13 岁。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在中学生中揭批反社会主义分子？目前还不得而知。

享受右童分子“殊荣”的，目前知道的似乎只有张克锦一人。那时他才 12 岁，要和成年人一样戴右派分子帽子似乎不太适合，于是整人本事出类拔萃的我党干部发明了“右童分子”这顶帽子，戴在这个 12 岁少年的头上。反右运动中，四川达县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领导提意见，并请从小就有绘画天赋的小学生张克锦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xxx》的漫画。冉某因此事被打成右派，自杀身亡，漫画被查出是小学 5 年级学生张克锦所作。1958 年 4 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张克锦被叫到城关镇礼堂。那里人山人海，还没等回过神来，他就被人反剪双手推到台上。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吓得大哭。随后张克锦被戴上右童分子帽子投进监狱，一关就是 7 年。

名目繁多的黑五类帽子，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从专政者来讲，便于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分化瓦解；便于因材施斗，因材施整，因材施治，把无产阶级专政演绎到极致。从被专政的黑五类自身来讲，虽然都感受到政治迫害的残酷，却又有一种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我虽挨整，但是比别人还好一些，于是就默默承受苦难而极少反抗。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配合默契”，共同维护着铁桶式的强权统治。黑五类帽子系列，是整人学上一大创造发明，值得认真研究。

——

补白：外祖父原是安徽含山县教育科科长，正直而又认真。正当他满腔热忱地工作时，突然被宣布为右派，挨了批判，投河自尽。平反右派时，舅舅得知，外祖父竟不是右派，县里从未做过把他打成右派的任何决定。可当时是按右派批判的呀！他自己也是按右派自杀的呀！这样莫名其妙的右派全国到底有多少！　　　李子军

——

母亲被枪杀　　甄秀梅

1966 年八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 15 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开始翻查，撕字画，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被搬到院子里点上火。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我们愿把这些书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没收了。

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解放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 年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大连支部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　”为由回绝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的丈夫早日认清形势。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做运输业，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

托克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1948 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我们在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做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敌特，平日人们对金银首饰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赃物的证据，把爸妈都抓走了。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 800 元，后来不断成倍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凡干缺德事的都是坏分子，是黑五类中最让人厌恶的。

此前的 1962 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落下抑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病情更重了。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哥哥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才缓上一口气。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他从此不再哭，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

下地干活的废人。

那几年，穷，大家是一样的，而我们还要加上低贱。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我们得等人家都捡完了才可以进去。

1968 年 8 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大批的大连公检法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我爸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目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1970 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革委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也不准家人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此时霏霏细雨下个不停，进入会场的卡车开过来时，我们看到了妈妈。她高高的个子，昂着头，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双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我们不敢喊，只能让泉涌般的泪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

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遗言的权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 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 800 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 年 5 月 22 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华团一行 340 人，来大连进行友好访问。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妈之托打听到我们，由此我们才知道大姨妈和姨夫现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二姨妈全家在美国的圣迭戈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医医院。

1978 年 6 月 25 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由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 1970 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光大连市截至 1978 年 8 月中旬，全市 175 件集团性冤假错案已平反 159 件，占 90.9%；

涉及 7693 人已平反 7489 人，占 99.3%；3437 件个人冤假错案已平反 2043 件占 59.4%。

1980 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2002 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父亲经常慰藉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难者的 800 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 47 户居民，文革中有 3 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 户被抄家、批斗，其中 4 人死亡。

——————————————————————————————————————

补白：河南人口头不干净，动辄爱说"球毛"。因是之故，河南多出一个右派。"毛"是当世最神圣的字眼，与"球"连在一起，那就是亵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反右积极分子如是向单位领导举报。于是那个爱说球毛的人被打成右派，送入监狱。到了秋季，单位没完成打右派的指标，还缺一个。于是领导想，那个能揣度出球毛的亵渎含义的人，其内心也够亵渎的了。于是该反右积极分子也被送进监狱，与那个因爱说球毛而被他指控为右派的人共处一牢房。面对着床铺上的许多球毛，两人谁都不敢再说球毛一词。必须说及这个词的时候，两人都讳之为"金曲连儿"——金色的弯弯曲曲的小东西。陈　更

——————————————————————————————————————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 1949 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母亲是家乡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二哥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为了照顾数十口亲眷，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中，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与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父亲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一直是工作积极分子，反右时曾把一名据说是有作风问题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 1962 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到报应，妻子儿女与他一起被赶到乡下务农。从此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我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我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我小时候爱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拉卖煤”时拣来的。“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当地人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钱买菜割肉过年。

1971 年春天，刚刚 6 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的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

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漂亮女人，还能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

补白：在土改中，女人也是财富。除了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财富之外，还没收他们的女人。我的一位本家，也是被斗户，有二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这可馋坏了一些工作组成员和翻身户中的老光棍。一位刘姓长工老光棍，提出应该把富户的闺女配给贫雇农，并声言，他是雇农，更应优先。他想把我本家的姑娘弄到手。为了达到目的，他在村里显得特别积极，各项活动都带头参加。但他无文化，无靠山，又无手段和能力，在村里翻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人们对他都很反感。不久，村里的头头和外来工作组便以搬石头(为运动扫清障碍)为名，把他推上台批斗。挨了两顿打骂之后，刘长工老实了，不再打富户女儿的主意，并从此退出乡村政治舞台。刘光棍的被斗，其实另有原因——我本家的女儿早已被村基干民兵惦记上了，同时也被住村工作队的一个有权势的成员看中了。他们不敢说配给自己，但同样是趁火打劫。就在我的这位本家即将被斗时，村贫协主任去他家说媒了。与其是说媒，不如说是逼婚。本家的两个女儿日夜啼哭，哭了几日，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胜利者的手心，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网　文

————————————————————————————

一个以山作墓的刑满右派　　陈　更

李黾儒，河南西峡人氏。热爱文学，胆怯而口吃，在西峡县某乡

粮管所供职。五七年春天，因为说错一句话，被划成右派，判了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带着被子回到粮所，同事们像赶牲口一样赶他出去。他只好携带被子回家，没想到父母亲也不让他进门，斥骂他说："咱们祖祖辈辈可都是贫农，怎么出了你这个右派？"李黾儒面色煞白，想做解释，但啥也说不出来。李黾儒又耷拉着脑袋到邻居家询问妻子的情况，邻居告诉他："你一入狱，你媳妇就回娘家了。"李黾儒抬头看天，无处可去，只好满怀惭愧到岳父家寻找妻子。已经正晌午了，岳丈家正在用餐，李黾儒饿得厉害，向妻子讨些饭，就着勺子喝起来。岳母夺过勺子，将饭倒在狗盆，骂道："右派，休来找我女儿麻烦！"李黾儒遭到这样一连串打击，痛苦万分，眼睛直呆呆的，一摇一晃，返回东山的来路。

东山是孩子们放牛砍柴的地方。有一天，放牛儿童突然发现山边的洞窟被石头填了起来，而且有人用泥巴从里边抹起来，从外往里什么也看不到。孩子们感到好奇，决定扒开石块探个究竟。外边的阳光照进洞里，孩子们吓了一跳：洞中一具尸体，尸旁一堆灰烬，灰烬边扔着几片红薯皮，是那人死前吃剩下的。

孩子们赶紧把这情况告诉了村中的老人。一位老者临场察看后推断："这人是经过一再思考才弃绝生路选择死路的。洞口垒上石头，从里边抹上泥巴，他是将这山当成自己的坟墓啊！"村里人向周边村落放出消息，求主收尸。半个月后，人们弄清楚了：那洞里的是李黾儒的尸体。一些善心的人重新拿石头将洞口垒砌起来，这座山就成了李黾儒的坟墓。

李黾儒有一个儿子。二十年之后，他的这个儿子调到西峡做县长。听了别人讲了父亲生前的悲惨故事，心有所动，带着纸酒到东山祭奠父亲。县长内心悲恸，焚香酹酒，望山膜拜，安慰父亲说："要感谢党的恩情啊，现在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

话还没说了，只听山顶上传来扑沓扑沓的声音，好像鬼吓得乱栽跟头。县长又将此话叙述一边，山头上传来更为瘆人的声音。这位县长似乎明白了，他的父亲生前受的精神刺激太大，以致于听到"右"

字就害怕极了，根本分不出语意好坏。县长流着眼泪，把县政府地名办公室的负责人叫到面前，吩咐说："把这座山的名字改为墓山，以警醒后人！"

据说，后来李黾儒的鬼在这一带不断出现。西峡县的人都知道，这鬼闻"右"丧胆，鬼的害怕反过来又导致经行者的惊惧。因此，人们从墓山经过，右、友、有、又等字都不敢说。如果不慎说出这些字，就能听到十分怕人的鬼的声音。

补白：我曾经是被批斗的黑五类，但我知道自己今天沒有资格仅仅扮演一个控诉者。1994 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 年 8 月 4 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后成为被打的？"凭良心说，是因为后者。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没有自主选择打人与不打人的权利。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谁把我们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泊里？2001 年夏天，在美国纽约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我以《文革与人生》为题做短讲："从那时（红八月）直到后來的岁月，我們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时代人的心灵与生命中产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我們有责任如实回忆，翔实记录，诚实忏悔。"　张　敏

——————————————————————————————————————

国民党军官李植荣之死　　陈世忠

李植荣，河北顺义人，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入伍。后当上排长，随傅作义起义，接受改编，不久复员回家。1957 年，李植荣被打成右派，

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 6 天，即被逮捕，判刑 10 年。他认为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那时，上诉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撤销原判，改判 15 年徒刑，发配黑龙江劳改。

李植荣幻想着通过刻苦劳动获得减刑，以便早日回家与苦等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团聚。已经熬过 13 个年头，满刑在望，李植荣劳动的劲头更足了。1969 年 4 月，我们中队 130 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 3 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 300 斤。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 415 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 435 斤的李树文。午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

打草是有固定范围的，以红旗标示边界（警戒线），不能出线。两杆红旗之间的距离是 300-500 米。下午，干了一小时左右，战士马洪才从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要受批斗、受处罚。李植荣指了指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大为不满，命令李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原本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通常情况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越出警戒线的犯人，也都只是被罚站原地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命令他们回去继续干活。当天，在李植荣之前，已有三四名犯人打草越警戒线而被罚站在那里，然后回来继续打草，可是这次的李植荣却没有那么幸运。

解放军的代理班长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王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队长说了。""都随便出警戒线，

要红旗有什么用？”“我下次注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植荣。”“你犯什么罪？”“历史反革命。”“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国民党军的排长。”“杀过人没有？”“杀过。”

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向前走了几步，王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又服从了。重复好几次，李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他的腹部，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慌乱中，子弹掉落在草地里，马蹲在地上找到子弹，然后再上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李队长。李赶到现场，看到被击中腹部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怎么回事。王和他嘀咕了几句，接着他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王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来一条腿，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等带领犯人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这期间，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任何抢救。王、马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到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李植荣仍然还没死，与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对话。这时仍然没有任何人企图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在一名犯人用牛车拉回的半路上，李植荣才断了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结论，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向各分场犯人传达时，也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不得已开枪将他当场击毙。

（编者曰：不信神的族类当然可以由着性子撒着欢儿地侮辱、蹂躏、嫁祸于任何有嘴但无话语权的弱者、衰人！中国人的一切罪恶和

苦难皆源于心中没有上帝。）

李植荣的生命被剥夺了，还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的帽子，仅结婚 6 天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过父亲的小早则背了几十年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黑锅，无法抬头做人。

补白：在市郊某村，当地革命群众为营造出“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大好形势，在水稻田里遍插画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或写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大牌子。当时正是禾苗追肥的季节，化肥少，基本还是用人畜粪便作肥料。这一天，社员钱 X 富想进城办点事，天不亮就起了床，挑几担粪便，到生产队长指定的几块田里去泼肥。中午等他从城里回来，远远看见田头上站满了人，有人还对着他施过肥的田块拍照。他好奇地凑上去往田里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冷气：那些立在田中的画像牌和语录牌上，粘满了一团团粪便和经纸。这是有人发现了他，立即叫了一声：“就是他干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将一副冰冷的手铐带到他手上。钱 X 富虽然也犯了反革命大罪，但因出身三代贫农，被从轻判处三年徒刑。服刑期间，他因多次检举其他罪犯撕烂印有伟大领袖画像、语录的报纸当卷烟纸用，有立功表现，被减刑半年。史　海

——————————————————————————————

同学闵志强　　晓　寒

闵志强和我是孩提时代的朋友。从小学到初中，我俩一直是同学、玩伴、近邻。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解放街，隔青年路相望，拿杭州话说是“一炮仗”的距离。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到他家门口，叫上他一起去上学。到井亭桥右转弯，沿浣纱河一直朝北，走到学士路，就

是我们的五爱小学了。那时，浣纱河绿柳拂岸，碧波荡漾。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自由自在地沿河游玩。路边有很多玩杂耍、变魔术、唱小热昏的卖艺人。我们常常站着看，尽情尽兴，忘了回家，花一两个小时在放学路上是常有的事。那时志强是“小开”，我的家境也不错，口袋里总有几个零用钱。我们互相“请客”，今天买油兜儿，明天买卤豆腐干。那时一分钱都可以解解馋。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到志强家门口叫他，好长时间他都没出来，我便跑进店里去。他家是前店后屋，住宿在楼上。只见他爷爷一言不发，在悲愤地整理不知被谁翻得乱七八糟的店面。他母亲，一个与我母亲一样常常穿旗袍的端庄女人，正坐在屋里一张小凳子上哭泣。志强茫然地站在母亲她身边。看到我进门，他母亲擦了擦眼睛，拉过志强的手说：“去吧，小朋友来叫你啦，读书不好迟到的！”我们并肩穿过店堂时，我看了看他爷爷怒气未消的脸色，第一次没喊“阿爹再会”就匆匆离去。

那天放学，我们各自早早回家。走过志强家门口，觉得比往日冷清了不少。他家门口的大人们戳戳点点，一片肃杀气氛。原来他父亲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公安局抓走了，家也被抄了。再后来听说他父亲是什么托派，死在监狱里。随着家庭变故，志强的欢笑一天比一天少。没出三年，我的父亲也在下一个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一个从不问政治的医学专家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好，没送进监狱，而是交群众管制。我们都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划入黑五类子女，两个同学的欢乐童年被红色恐怖摧毁了。

由于家道中落，志强没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他在青年路的一条巷口摆了个小书摊。有一次我路过，他还热情地招呼我过去看书。志强一个大小伙子，守着这么一个破烂小书摊。我虽然还算幸运，能继续升学，却无力帮助背负生活重担的同龄人，想来真是感到难过。我不忍心再看到志强，有意回避他的书摊。后来我下乡、支边，历尽艰辛，想见也见不着了。就这样足足 20 多年，再没与昔日的好朋友见过面。有时想起志强，不禁自问：“一分钱看一本”的生意是怎样支

撑着志强的生活，伴他捱过那段苦难的岁月？80年代初我们重新见面时，想不到俩人只有这么简短的对白：“别提它了好不？一切都过去了。”“唉，一言难尽啊！”

——————————————————————————————

补白：刘文辉，江苏省无锡人，因父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辍学，到上海浦东造船厂当学徒工。57年整风，因批评中共厂委书记腐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开除团籍，留厂察看2年。58年旁听判决父亲为历史反革命时，想到父亲因爱共爱国而拒绝去台湾，气愤难平，与法官争辩，遂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被补为右派分子。62年，主动下放浙江舟山嵊泗修船厂，找寻偷渡出境机会。64年因偷渡出境计划被告发，开除厂籍，定为反革命分子，押回上海市街道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开始，因父子都是反革命，连续被抄家5次。对毛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写下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复写14份，由弟弟刘文忠带往杭州分别寄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一个月后，兄弟同时被捕。1967年，配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经张春桥、马天水等批准，刘文辉于3月 23日被公开枪杀，年仅30岁，其弟刘文忠被判13年徒刑。
五一三

——————————————————————————————

刘光应写反诗　　陈宗培

197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奉节县朱衣公社机关、中心小学和朱衣区供销社、区粮站的大门外，都贴有一张用歌谣形式写的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无毒不丈夫。”

这是两个字谜，即毛主席和林彪。中间几句记不全了，好像有这样几句："大红太阳当空照，晒干水田晒枯苗。灭资兴无割尾巴，没粮下锅看吃啥。早请示来晚汇报，抱着'忠'字把舞跳。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紧跟随。斗天斗地斗爹妈，夫妻怕说知心话。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将开口就'勒令'。"全文都是讥讽毛主席、林彪把国家搞乱了。末尾几句是："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地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

朱衣公社武装部长陈部长立即向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报案。陈部长认为，作案人已暴露无余，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朱衣农中学生曾国林。第一，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第二，他家住双楼四队，与单楼村相对应。第三，他是地主的儿子，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怀有阶级仇恨。陈部长拿着传单到双楼四队侦查核实，没想到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否定了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第一，曾国林没有这么傻；第二，字迹很像生产队会计刘光应的；第三，刘家与曾家有仇，刘光应想借刀杀人，陷害曾家。陈部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局长带着刑侦组来了。王局长听了陈部长的汇报后，十分断然地说："只有受过管、关、斗的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反动。刘光应是贫农，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说，我刚才用舌头舔了一下传单，是用熟洋芋粘贴的，还带有盐味。现在食盐是凭票供应，哪家农民舍得在洋芋里放盐？侦破范围只能锁定在区、社所属单位的阶级敌人。"经询问，王局长决定把区供销社和公社中心小学的历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但是，经过核对笔迹，诱供逼供，毫无所获。王局长只得根据陈部长的意见抓刘光应，刘光应当场就招供了，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徒刑。

———————————————————————————————————

补白：李 X 灿十八岁就读一所中专时，正逢三年大饥荒。一米八个头的他，每餐吃一个小炖罐，有如老虎吞苍蝇，饥饿难当。一段时间里，学校食堂不时发生病号剩饭半夜被盗，屡查无果。有天半夜，

老师巡夜，抓到李 X 灿躲在蚊帐里，抱着饭罐狼吞虎咽。学校当即就把李 X 灿送到派出所，想让他领个教训。结果，第二天事情发生了质变化。原来那天食堂炊事员起来做饭时，发现饭厅里供奉的那尊伟大领袖座像摔破在地下。文革时，各单位规定，所有进食堂就餐人员用餐前，必须到伟大领袖像前高呼三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该校食堂原先在墙上贴了一张领袖画像，供师生们祝祷。后来有人别出心裁地在饭厅中间摆放一张桌子，供上一尊领袖的石膏像，让师生成群星拱月状，围绕座像祝祷。这既体现了革命师生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的身旁，也增加了视觉的审美效果。领袖像被打破，校革委会立刻宣布，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到市人保组。关在派出所的李 X 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号嫌疑人。经过审案人员的一番审问，李 X 灿供认了自己摸黑进食堂时撞倒了桌子的事实。李 X 灿被判劳教两年。在劳教期间，又因经常偷窃农场瓜果等裹腹充饥，被延长劳教一年。改革开放后，他去了香港，后又定居美国。事业有成回大陆在老家盖了一座大房子，吩咐家人，遇有饥饿者，请进来免费吃个饱，以永记饥饿的痛苦和“饥寒起盗心”的古训。史 海

——————————————————————————————

针扎毛眼风波　　高洪明

1970 年初春，我从机务排贬到农工排当农工战士。这个班共有 12 个知青，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很好很团结。连队有电灯，但经常晚间停电，所以我们差不多每人都有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柴油灯。当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订有《人民日报》。我的铺靠墙，靠我的是小 L，靠小 L 的是小 P。墙面发潮，有时掉土，我用旧报纸糊了半截墙。那天晚上又停电了，我点上油灯，靠着被褥看书。靠我睡的小 L 凑过来对我说：“老哥，借你个光补补袜子。”“补吧，

省得点俩灯呛人。”我头没抬。小 L 盘腿靠墙，坐我边上补起袜子。一屋子人，各干各的，说说笑笑，很快活。当时没手表，也不知几点了。这时班长从外边回来了，说明天还出工，赶紧睡觉吧。于是大家就寝。

早上 7 点敲钟，班长已打来热水，大家你洗脸，他刷牙，各自忙活。小 P 眼尖，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指着我这边的墙壁说：“谁把针扎在这儿啦？”屋里无人搭腔。一会儿小 L 倒洗脸水回来了，小 P 又指着墙壁问：“小 L，这针是不是你扎这儿的？”小 L 满布在乎地说：“我扎的，怎么啦？扎这儿碍你哪根筋疼啦？”小 P 一听勃然大怒，高声喝道：“好大胆子，你敢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小 L 也不示弱，梗着脖子反问道：“哪个孙子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你别诬陷好人！”小 P 一个箭步迈到火炕上，指着墙壁上扎着的一根针大声喊着：“小 L，你小子别不认账，你好好瞧瞧，你的针是不是扎毛主席的眼睛啦？”小 L 一看傻眼啦，马上泄气七分，小声说：“针是我扎的，但我不是故意的。”这时小 P 士气大增，招着手说：“你们几个过来，看看是不是小 L 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啦？”

大家围过来一看，都明白了。原来，墙壁糊的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小 L 的针正巧扎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我问小 L 这是怎么回事，小 L 嗫嚅着说：“昨晚班长喊睡觉，我怕针扎着别人，就顺手把针插墙上了，谁知道稀里糊涂地把针插在毛主席的照片上了。”我赶紧打圆场说：“小 L 不是故意的，我糊报纸时注意点儿就好了。”这时班长一本正经地对小 L 说：“你平常吊二郎当，天天读毛选也不认真，别人都不像你那样，你好好想想吧！”

傍晚收工吃完晚饭，大家像往常一样在屋里各干各的事。我以为小 L 的事过去了，还是看我的书。只见小 L 坐在被褥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心事重重的在想着什么。一会儿班长进来，把小 P 叫出了去。过了一会儿小 P 回来了。一会儿班长又进来，把我叫出去。在宿舍过道上，班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 L 的事我已经向指导员汇报了。指导员很重视这件事，他要求班里对小 L 批判帮助一下。你是毛著学

习积极分子，你带一下头怎么样？”我很难为情地对班长说：“小 L 这事的确不是故意的，说说他就算了，批判他怎么批？”班长启发式地说：“连部说批咱就批呗！不批怎么交差？你就上纲上线地批。”

一会儿来电了，屋里的灯大亮，班长宣布等会儿指导员就来给班里开会，要求大家踊跃发言。不大一会儿，指导员进屋了。他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六五年部队集体转业来到北大荒，个子不太高，但很健壮，说话嗓门大，土里土气的东北味儿。他一进屋就盘腿坐在我这面炕上的正当间，马上开讲：“昨天小 L 的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上纲上线说就是不三忠于四无限的问题。每个人就这件事谈谈自己的认识，批判帮助一下小 L。”班长不愧是班长，他首先带头发言：“小 L 的事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由于他平时不认真学习，特别不认真学习毛选，从而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才发生了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事情。我希望他能深挖思想根源，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正错误。”

班长话音刚落，小 P 抢先发言：“小 L 的错误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当时就指出了小 L 的错误，但他那时不认账，还骂了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不要求小 L 向我赔礼道歉，但他必须向毛主席赔礼道歉！”冷场一会儿，指导员开始动员启发：“小 L 的错误错在哪儿，根源在哪里？说多说少是能力问题，说不说是立场问题，希望每个人都谈一谈。”副班长接着指导员的话茬儿发了言：“我看小 L 的事不是个小错误，而是个大错误，他敢用针扎毛主席的眼睛，他还能对毛主席有无产阶级感情吗？还能誓死保卫毛主席吗？我看他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才行。”小 L 听了副班长的发言，心里不服委屈，但不敢发言，只是嘟嘟哝哝小声说：“谁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啦？我也不是故意拿针扎的报纸，当时屋里黑我没看见。”指导员厉声制止了小 L 的嘟囔：“小 L 注意你的态度，犯了错误还不让人说，你老实听别人的发言！”

此时我也不得不发言了，尽管我和小 L 是北京老乡，他又是挨着我睡觉，但班长事先已经嘱咐了我要我发言，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小

L 的确不认真学习毛选，他的错误不好说他是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的问题，但他做事马马虎虎的确实是个大问题。他是城市贫民出身，对毛主席还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看我们还是要批判帮助他，别一棒子把他打死。”我发言后有些后悔，我辜负了班长对我的嘱咐，发言有点轻描淡写。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发话了：“今天批判帮助小 L 不要留情面，要上纲上线。”在指导员动员下，班里其他几个人也都先后发了言。我认真听了他们每个人的发言，心里想，大家都和我差不多，谁也没有能够上纲上线地批判帮助小 L。如果真的那样，那么他岂不成了阶级敌人了。最后指导员说：“现在让小 L 检讨自己的错误，要求大家认真地批判地听。你们有什么看法，底下找我谈，今晚不做结论。”

小 L 本来坐在炕沿边，他慢慢站起来，低着个头，哭丧着脸，哭腔检讨：“我的确不认真学习毛选，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没有同志们深，但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在报纸上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我真的是稀里糊涂、黑灯瞎火地把针扎在报纸上了。请指导员和全班同志原谅我的错误，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学习，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向毛主席请罪了！我求求指导员了，求求全班同志们了！”说着他呜咽地抽泣着。我很同情他，他才 17 岁呀！指导员见状可能也动了恻隐之心，遂用严肃但并不严厉的口气说：“小 L 今天的检讨有一定的深度，但还应当深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还要进一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要做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今天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大家早点儿睡觉吧，明天还出工呢！”指导员走后，全班人没有一个像平日那样说说笑笑。大家心情都显得有点郁闷沉重，各自洗脸洗脚，不一会儿都铺被子躺下了，班长拉灯也睡了。我没有睡好，一直迷糊到天亮。

几天过去了，班里没有再开小 L 的批判帮助会，指导员也没有再来班里，班长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小 P 也没有对小 L 骂他的事不依不饶。这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总算过去了，幸亏没有什么人非要搞什么上纲上线不可，到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小 L 慢慢开始有笑容了。

这件事过去 40 年了，写出来让人们听一听，也好让年轻人了解一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是什么样的社会气氛。

——

补白：在 1968 年送往下汪大队的劳改犯中，与毛主席有关的就有 20 来起。有人说领子与袖口最脏，叫老婆洗干净一些。领与袖合在一起就是领袖，中国人的领袖就是毛主席，说领袖最脏，实属恶毒污蔑，判刑 3 年。两个青年到公园里谈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了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面。不料报纸上印着毛泽东头像，男女各判徒刑 3 年。一位农村的马大哈，因为偷懒，把炒好的菜连锅端到桌上，临时找了张报纸垫在下面。不料报纸上印有毛的头像。这一放，毛像面目全非，判刑 4 年。还有两例，由于在火灾中抢救了毛的画像，证明对毛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于是一名提前释放，一名减刑两年。沈不沉

——

与黑五类相关的几个政治术语　　李若建

本人成分：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家庭出身可以追溯到土改前的家庭成分，并且随血缘向下传递。《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如此界定成分和出身：“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分之间的纽带，借此打破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用于处理最轻度的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当时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

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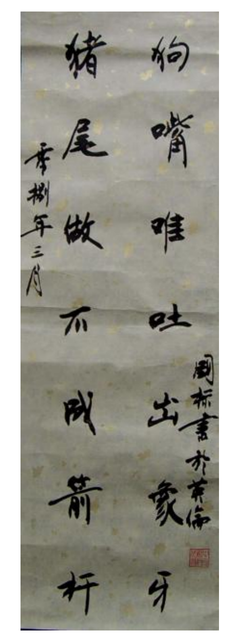
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理论上（按有关法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相当庞大，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四川省绵阳县 1952 年被管制人口占总人口 2.9%，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 1972 年 4 月统计，全县有五类分子 7750 人，到当年 12 月猛增到 1．25 万人。有一个农民，1961 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 5 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没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1973 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他曾经被判管制，于是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 年，县公安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对人处以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上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未见过官方定义。根据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给人戴帽子，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谁有权给人戴帽，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确的，一般基层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

签，比如 1979 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四类分子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分而成为某类分子的，如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富农，并且往后传递）；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某类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分）。从法理的角度讲，本人成分并不等于“分子”。严格意义上说，四类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监督劳动的人才够格，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本人成分是地主、富农的人，或者曾经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处于监督劳动状态，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



焦国标书

右派大校蔡铁根　　方影竹

蔡铁根，曾用名蔡委心、蔡泽生，1911 年 12 月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学于厦门大学。1936 年 12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 年入党。曾任 115 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第一总队副总队长。1949 年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 年被划为右派，1970 年被处死，是反右、文革中被整肃军人中军阶最高的一个。有人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却是被拉出去枪

毙的。

我与蔡铁根有两面之缘。第一次是近距离的交谈。1949 年 3 月我入华北军大学习。蔡铁根是该校青年总队（从刚解放的北平招收的青年学生）的首长。有一次，蔡铁根来我所在的中队讲话。休息时，他站在中队门廊和我们这些小青年闲谈。他穿灰色粗布军装，还不及我们的绿军装平展。他口才很好，平易近人。记得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要是有一百个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早成功好多年。"当时他 38 岁，我 17 岁，我不觉得他是总队长，只觉得他是长辈和老师。他说这句话时，神情专注，目光炯炯，这句话便钉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再次见到他。那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场合——全总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听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动员解放台湾的讲话。蔡铁根是主持人，在大会的开始和结束都讲了话。他接着朱德话茬，教育我们要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在谈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他走到台前边沿说："我们在国统区时候，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那还得了！"我断定，他一定自身经历过白色恐怖，才有那样的神态。但他没料到后半生历史对他的捉弄：他逃脱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却不能逃脱 10 年后的反右恐怖，再过 11 年竟死于红色恐怖。

当时我感到他在朱德面前侃侃而谈，太放肆了。后来才知道，他和朱德是老熟人，还给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当过秘书，也是刘伯承的爱将。

第二年，蔡铁根陪同朱德、刘伯承在北京郊区大巡察，旨在找块合适的地方，办一所最高军事学院。这所学校最后选址在南京，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点名要去了蔡铁根。

1958 年毛泽东为整肃彭德怀，发动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首长，含泪登台检讨。刘帅挨批，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也逃不掉。他当然可以好好检讨一番，蒙混过关，许多"老运动员"正是这样成为不倒翁的，但蔡铁根甘当异类。有人批判他参与编写的"共同条令"是教条主义产物，他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一伙人拥

上来，连轰带扭，高呼“大右派”，当场扒下他的帽徽领章，带出会场，关押起来。1959 年 4 月，他被明令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下放江苏常州。

刚到常州，适逢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他说怕什么，大不了上山打游击。他还给一个叫巢尔谷的人写过 19 封信。文革一来，巢尔谷卖友求荣，把信交了出来。红卫兵抄了蔡的家，掠走了他 40 多本日记。信和日记的内容自然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交友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谈打游击对付国民党成为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推翻共产党政权，与巢尔谷曾同游常州名胜善卷洞是为打游击先去察看地形。于是被捕入狱。

蔡铁根无处申冤，便决定越狱上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越狱行动。第一次是青年时代参加东北军，在部队开拔剿共时，他串联 30 多个弟兄，准备携枪投共，不料事机泄露，被捕入狱。他趁风雪夜只身脱逃，几经周折，找到红军。第二次是七七事变后，他赤手空拳，成功策反一支土匪武装，又因部队叛变，身陷日寇之手。他在狱中饱受酷刑，却以凛然气节折服难友，组织暴动，逃出魔窟归队。这第三次的越狱设想暴露了他的天真。捕回后，手铐之外，还砸上了脚镣！

1970 年 3 月 11 日凌晨，常州西门外一处公墓空地上，响起沉闷的枪声，蔡铁根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三个元帅的爱将，越狱、越狱、再越狱的传奇英雄，丧命于他为之效命的政权之手。后来平反昭雪，开追悼会，骨灰入八宝山。蔡铁根的日记，听说现在保存在他孩子的手中。那里面定有珍贵史料和真知灼见。如果说在今天恐惧未除的环境中不便公开，我相信终会有与世人见面的一天。

————————————————————————————————

补白：林 X 媛大姐是工厂一名技术人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单位每次大型活动，标语横幅都出自她手。这天一大早，她刚起床，就被紧急叫到单位布置会场，说上午要召开学毛选经验交流大会。她到单位三下五除二把一应标语横幅搞定，就回家吃饭去了。吃完饭她捧

着红宝书正要跨出家门，迎面撞上在单位支左的解放军带领几个红卫兵向她扑来。他们揪着她的头发，别过她的双手，以当时最流行的喷气式形状把她押走。任凭她怎么喊叫、质问、争辩，都无用。到了单位，原定的学毛选交流会已改作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她。小礼堂里已站满人，见了她都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 X 媛！”开始林大姐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自己一早写的标语字闯下了大祸。“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面的四个字，她写颠倒了两个，变成“万无寿疆”。“四个伟大”中的“伟大舵手”，她写成“伟大蛇手”。在审查期间，这个 50 年代大学生，一个充满才气的女技术员，一个善良纯朴的贤妻良母，寻机冲向行驶的汽车，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三十五年的生命。 史 海

————————————————————————————————————

一对老地主 朱之泓

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生产队砖瓦窑上干活时，我单独保占英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砖瓦窑完全冷却就开始出窑。新烧制的砖瓦，粗糙坚硬，火辣烫人。有时热砖灰还会被吸进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刺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下边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顶着下巴，犹如紧靠我腹部和前胸的一堵小墙。我无法低头看脚下的路，仅能凭感觉从窑口走向摞砖场。砖灰把我的呼吸器官刺得疼痛咳嗽不止，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休息时，保占英躲在砖垛后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

容，绝不像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嘛。"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我便告诉他，我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 40 天内陆续有 6 位家人去世，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成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伎俩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像普通的老农一样，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说话时常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的。他说自己一家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据说解放前地主老财都穿老羊皮大衣，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他的地主成分真的是靠自己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有些好吃懒做抽大烟的人，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折腾光）了，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

败了），就成了贫农。

保占英有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土改搞得早，那亲戚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就将自己在山西的生意变卖，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在杨郎买了 15 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进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 15 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哪知道很快杨郎和山西一样也土改了。这 15 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因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说不清，只能乖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棚棚。”

杨郎公社梨家河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梨家河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被划为贫农，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另一次偶然。那时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在保占英家与他老伴儿同宿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烦躁地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她点着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只见她先在墙壁上寻找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它那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臭虫。尽管这样，我再次躺下依然睡不着。臭虫前仆后继来袭击，我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继续满墙壁寻找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

对小辈的爱称）咬得遭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遭孽的。”看我依然睡不着，她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和我拉起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听说我没妈，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遭孽的，遭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农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这次借宿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逮臭虫灭臭虫的方法实在使我惊奇，我闻所未闻；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听过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明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2006 年 7 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已经患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吃食一个劲儿往我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

我也提示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100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

叶企孙、熊大缜沉冤　　淳于雁

叶企孙教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熊大缜是叶企孙的高足，叶本劝熊留下协助教学工作，但熊激于救国热潮，应熟人推荐，毅然奔赴八路军吕正操部的冀中根据地，为部队制造炸药军火和无线电通讯等军用器材，备受吕赏识，被委任为军区的供给部部长。

后来，受熊影响以及叶教授的协助动员，平津等地又有许多知识分子前来冀中根据地投入抗日斗争，在熊的指导下建立兵工厂，开设医院、学校、银行等机构。

熊大缜千方百计扩大制造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弹药的生产，源源不断供应前线作战和打游击的需要。对日本侵略军威胁最大的各种特强爆炸力地雷，就是地道战、地雷战中使用的那种炸药地雷，就是经由他领导建立的技术研究社研制出来的。他们作战使用的反坦克地雷，把日军机械化部队师团的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炸掉，并曾炸毁运送日军及装备的军用列车机头，以至于日军司令部惊呼八路拥有了反坦克的新式武器。美国盟军派来冀中考察的观察组惊叹道：“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冀中根据地紧靠北平、天津、保定三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有三条重要的铁路线包围。从军事实力的对比来看，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团兵力是很难站住脚打游击的。他们正是依靠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硬是把原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军打怕了，不敢轻易出动展开扫荡，成功地巩固了根据地，创造了军事上的一大奇迹。为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在唐县北大悲村接见熊大缜，对他的成就和贡献予以鼓励表扬。

就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冀中军区的锄奸部门突然发动一场肃反运动，扬言根据地内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供给部是特务的大本营。锄奸队立即把熊大缜当作汉奸、特务抓起来，供给部和所属的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报社、商店、学校等机构，共有一百多位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一律被逮捕审查，制造了一起轰动的特务汉奸大案。据说这场锄奸运动直接听命于延安，所以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更高一级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不必打招呼，也无权过问。

在根据地部队转移途中，负责押解熊大缜的一个名叫史建勋的干部，因出言不逊辱骂熊是汉奸、特务，引起抗辩，双方发生口角。史一气之下，威胁要枪毙熊大缜。熊大声说：“你要打死我，不必开枪，把子弹留下来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用石块打死我！”这个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竟真的拣起一块大石头，把熊大缜活活砸到头颅爆裂、脑浆迸流而亡。熊被定性为死有余辜的国民党特务。据说史建勋因此立了大功，成为锄奸英雄，解放后官运亨通，当上高级干部。熊大缜的特大沉冤则直到 1986 年才由河北省委羞羞答答、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做出一纸《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

得意门生无辜冤死，叶企孙教授多次奔走呼吁，要求调查此案，为熊平反。1967 年 6 月，叶也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揪斗、抄家、关押、停发工资，送进黑帮劳改队，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次年 4 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逮捕叶企孙，关进监狱，逼他多次写笔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CC 系（中统）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当年

亲自介绍熊大缜加入CC系，派遣他打入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叶在威逼之下违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写道：“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连续八次提审讯问，逼叶“屈打成招”，可是经专案人员多次反复内查外调，查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当局只得给他扣上中统特务嫌疑的罪名，在折磨监禁一年多以后把他送回北大（1952 年清华物理系归入北大物理系）。名曰释放，实际上继续关押在保密的简陋斗室内隔离审查，严密封锁，与外面完全隔绝，直到 1975 年才解除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

1976 年春节，叶教授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人，被允许来北大探访。由于遭到长期摧残，叶企孙过早地衰老了，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彼此见面，恍如隔世，悲感万千。此时，北大当局给他做出的结论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 年冬末，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师叶企孙教授，含冤离开人世，头上还戴着一顶“特嫌”的大帽子。

补白：文革时期，各地机关、单位、学校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每天上午 8 点正，学校、机关、矿山、工厂甚至火车上，所有人员都必须集中起来，把红宝书举在胸前，由一位领头的高喊“向毛主席敬礼！”然后是高唱《东方红》，再后是背诵红六段（六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读的红六段包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等。再接下去是“老三篇天天读”，人人手捧红宝书，逐字逐句念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之后集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全体肃立，齐诵“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

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至此，早请示的仪式程序算是完毕了。晚汇报的程序和内容与此相同。沈不沉

————————————————————————————————

乡村告密风　　梅桑榆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镇虽小，却是区委所在地，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许多人因说话挨整，其中以税务所的杨某最为知名。杨某曾是志愿军，据说还立过功。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因而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他欣然接受。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批斗，明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更是名声大噪。特别是他的“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共鸣和引用。当然，引用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

内心很是自卑。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因而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有资格参加。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人喊口号时情绪往往很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正是如此，一不留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即便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出来。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

大队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会场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了个罪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因喊口号倒霉的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刘、保卫毛时，她也把人物喊错位了。她嗓子好，声音高，“反动口号”一出口，不少人都听见，个个吓得半死。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要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

徐某 40 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像拉锯似的在鸡脖子上拉了两下，

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扇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徐某被告密为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造反派得到举报，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

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那时，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重复的。发言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禁忌，竟一再重复，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大感难堪。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未能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就没说过这话。造反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祖辈贫农，后来不了了之。但徐某从此落下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开骂：“小狗日的，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扔进粪坑。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简易的小厕所，仅供自用。路人若遇内急，也可就近方便。那一天，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而且上面有领袖像，吓得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天天如此。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

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因是公厕，谁污辱的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头目。于是钱某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舍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的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辩解无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抵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本人也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号召，就积极表现。"学成归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大忠，不跳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

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算了结了。

被人告密诋毁忠字舞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受告密之害最深的是我每遇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被淘汰。那些“人民来信”都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达到毁灭我的前途的目的。由于自己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今天，有人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是“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实在不知是何居心。

————————————————————————————————————

补白：毛泽东执政 28 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最终也难逃被毛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顾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49 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自己蹲进这座监狱，并写诗记其事：“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

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的折磨。　　邵燕祥

——————————————————————————————————————

父女情　　华　夏

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没什么文化，但他出生的家庭曾经是很显赫的。那是江苏一个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祖上遗留不少田产。后来日本人来了，家产被抢光，全家逃难到了上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放弃了学业，不到 14 岁就给人当学徒，做小贩，整日在外奔波劳累。解放后，父亲为了获得一份高收入，瞒着家人，报名到外地当石油工人，从此一别上海 40 余年。

土改时，父亲家被划为地主。作为地主的后代，我也天生低人一等。别的孩子肆意欺负我，我不敢做丝毫抵抗，我怕他们骂我是小地主。每学期开学都要填一份表格，那是我最伤心欲绝的时刻。每次胆颤心惊地填上“地主”二字时，我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为此我曾经在心里恨过父亲很长时间，我恨他让我小小年纪就要承受那么多的屈辱和难堪！

有一次父亲回上海探亲，给我带回一件祖母亲手缝制的缎子夹袄，夹袄上还有祖母用金线精心绣制的花边。我穿着这件新衣服上学，同伴们嫉妒得眼珠子都要瞪红了。他们一边朝我吐口水，一边骂我是小地主。我一路哭着跑回家，将那件衣服狠狠地扔在地上，再用力踩上几脚。父亲让我捡起来，我就是不捡，父亲气得扬起手要打我。我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谁让你不是贫农？你为什么是地主？如果有贫农愿意要我，我现在就不做你女儿！”父亲扬起的手慢慢地又放了下来。那一时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眼里含着眼泪。

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守规矩”。他像培养大家闺秀似的培养我，我说话、走路、坐卧、吃饭乃至端碗的姿势都必须按他的要求去做。他经常把我关在家里，让我背《三字经》、《增广贤文》、《弟子规》、《千字文》等等。哥哥比我大一岁，父亲却放任他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 我经常是我一边背一边哭。那时我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有个地主爸爸，让我守这么多的臭规矩。如果我有个贫农爸爸，保证我再不会背什么“养不教，父之过”了。

其实父亲很疼爱我。我上技校时，一个冬天的傍晚，寒流来临，气温骤降，父亲担心我被褥太薄，骑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来给我送厚被褥。途中天降大雨，父亲怕被褥淋湿，脱下雨衣盖在被褥上，自己冒雨前行。他来到我宿舍时，嘴唇都冻乌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当时正沉迷于一本小说中，躺在床上，连句问候的话也没对父亲说，更不用说去送送他了。

西谚云:“年轻时犯的错,上帝都会原谅。”然而我对父亲犯的错，我想上帝肯定不会原谅。在父亲活着的有生之年，我从未给他买过任何东西。我送他的唯一礼物，一双羊皮手套，还是我在技校参加法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奖品。我把手套拿给父亲时，他眼睛都笑眯了，连声夸赞:“还是女儿好,女儿有出息。哪像儿子，一点用都没有。”他戴着那双手套坐单位的班车，有座位也不坐，偏要站着，故意抓着上面的栏杆，让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戴手套的手。有人夸他的手套漂亮，父亲立即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女儿奖的。我那个女儿可有出息了，别人都叫她才女。”父亲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他仍旧兴奋地自顾自说：“我女儿文文静静的，一点也不像别人家的女儿疯疯颠颠的。”母亲看不下去了，说他太虚荣了。唉，一双羊皮手套就能引起父亲那么多的满足，可惜我对此认识得太晚了！

1997 年，父亲到了胃癌晚期。每去一次医院，我心灵就要受一次煎熬。我后悔自己对父亲关爱太少。坐在父亲病床前，我问他:“爸爸,我真的不是个好女儿，你怪我吗？”父亲笑着说:“傻孩子，爸爸怎么

会怪你呢？从小到大，你都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你哥哥就说爸爸偏心，爸爸是偏心，爸爸就是喜欢你比喜欢他多！”

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死了。医生说你没救了，不准备管你了，忙着去斗私批修。你妈妈没办法，跑来找我。我正在上班，一听就急了，跑到医院逼着医生抢救你。我说如果你们救不活我女儿，我就跟你们拼命。医生吓坏了。后来又说要给你输血，我二话没说就让医生抽血。那时我刚下夜班，头昏得厉害。”听着父亲的叙述，儿时的往事如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上小学时，每逢下雨天，父亲都会到学校接我。怕雨水溅湿了我的裤脚，就一路背着我回家。路上还边走边说：“有谁要小女孩啊？我家卖小女孩。我的女儿又聪明又漂亮，你们买不买呀？”趴在父亲背上的我就连声高叫：“不卖，不卖！要卖就卖哥哥。”父亲接着又说：“你哥那个臭小子，没人要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哥哥就走在他身旁。

还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水渠边拔野花，一不小心掉进水渠。水流湍急，一下子将我冲出好远。父亲当时正在很远的地方，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疼痛，预感到我要出事，就拼命地往前蹬自行车，赶到一把将我从水里捞上来。我上来时已经昏迷不醒，他再晚来一步，我恐怕就不在人世了。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已经有些神智不清。有时我去看他，他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哥哥含泪对我说，父亲临死前两天，突然回光反照，把哥哥叫到身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一直说爸爸偏心，爸爸是偏你妹妹，所以你妹妹才那么任性。你妹妹有得罪你的地方，你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是我把她给宠坏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照顾你妹妹，你是哥哥，你妹妹有事你一定不能不管。”啊，父亲，我深深挚爱的父亲，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对我那深如海洋般的爱呢？

写到这里，我已是泪流满面。父亲是一本书，做女儿的就是一位读者，我想我只能用一生的时间细心地去读这本书，才能够品尝出这本书中的酸甜苦辣，才能够感悟到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真谛！

女儿悔　　淡　然

父亲，您的音容笑貌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留下的只是遗像上那张年轻英俊毫无生气的脸庞定格！多少不眠之夜与您对坐，无言的悲痛充溢我的内心，刻骨的悔恨填满我的脑海，自责的泪水潸然倾泻！我知道，无论如何谴责自己，永远无法饶恕自己对您的误解鄙视不敬不孝！今天是您的生日，就容女儿在这特殊的日子，借助我的文字知己，倾诉女儿发自肺腑的忏悔，卸去压在我心坎几十年的重负吧！

我七岁那年，在城镇任党委书记的您，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饮弹自尽，我们原本残缺的家庭破碎了。我心目中慈祥伟大，为怕我受委屈单身多年，深受人们尊敬的父亲，转眼间成了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我们家门口贴满列举了您种种罪状的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您的名字被打上了大红叉！一瞬间，我从备受宠爱、令人羡慕的孩子成了小伙伴讥讽歧视攻击欺负的狗崽子，一些亲近的人突然地躲开了我们。我懵懂不解呀，父亲，您为什么要干坏事，为什么当了反革命分子呢？女儿为您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耻！

您单位三天两头开着专政车，载来满车人，在我们门口高喊口号。一些人凶神恶煞一般冲进家里，翻箱倒柜搜查黑材料。我好害怕！我哆嗦着依偎在风烛残年目光呆滞的祖母怀里，任由这些杀气腾腾的人把家里折腾个够！我纳闷，何谓黑材料？一定是极其反动的东西了。您从哪弄来的？又把它藏到了哪里？父亲啊，我怨您！

家里人严肃紧张的表情使我感到更大的风雨欲来的恐怖。深夜，我被一阵轻声低语吵醒，几个亲戚围坐在我和祖母合睡的床前。从他

们的片言只语当中，我多次听到我的名字。我在惊恐不安、恶梦缠绕中迎来了天亮。

一早，姑妈流着泪帮我穿上表兄那宽大得足以把瘦小的我包裹住的高领厚棉袄，姑丈领我踏上了去您单位的汽车。一路上，姑丈在叹气，抱我的手在颤抖，不祥的预感撕咬着我幼小的心灵。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作为您的替身去接受批斗，那厚棉袄是为了保护我瘦弱的身体！

父亲，您能想到 7 岁的女儿细细的脖子上挂着写着您名字的沉重巨大的牌子被押上审判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听着高音喇叭义愤填膺的声讨，被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惊吓得瘫倒在地上小便失禁那惨不忍睹的情景？您可知道这一惊吓导致了女儿发烧昏迷说胡话几天几夜，醒来后开始沉默寡言表情木呐到了近乎痴呆的地步？父亲，您做的坏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也茫然不懂，为什么要我替您承受，代您受过？可恶的父亲，我如此倒霉，当了您女儿，我恨您！

学生时代，女儿在您的阴影下痛苦孤独地煎熬着。学校一出现反动标语，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是我！女儿从开始的低头哭泣恐惧辩解，继而学会了抿着嘴昂着头以漠视的眼光与审问者对视，保持倔强的沉默！委屈的泪水只有在放学的路上躲到无人处尽情流淌，回家闭口不谈。年迈的祖母知道了又能如何，她只会无奈地抱着我痛哭，声声叫我苦命的孩子。这只能如鞭子一样抽在我鲜血淋漓的胸口上增加痛楚！一个反动透顶的小兔崽子名声传遍了全校，乃至我们居住的周边，人们像躲瘟疫一样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心里的痛苦委屈愤怒转换成了对您刻骨的仇恨！

为了洗刷您带给我的污点，女儿勤奋读书，卖力的做好事，劳动课挑最脏最累的活干，课余时间帮助孤寡老人做家务，甚至把买文具的钱当成捡到的上交老师，希望以出色的表现来抵罪。可一切都是徒劳，红小兵的红袖标永远与我无缘。学校传达什么文件，我被排斥在会场外。同学们在讨论什么，看到我就嘎然停止。“反动仔”、“坏

分子”代替了我的名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父亲啊！多么可怜可悲的我！父亲，我恨您！

父亲，您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你眼中天真可爱娇柔可人的小女儿，经常在夜深人静的午夜站在您的遗像前，凶狠地注视您，与您的目光进行着战斗；严厉地质问您，对你进行审判；恶毒地诅咒您，对您进行心的控诉！无端地受到如此株连，我想不通，我委屈哭诉无门！天哪，这是为什么？

年复一年，寒暑更迭，女儿长大成人了。经历了婚姻的挫败，事业的挫折，岁月风尘的磨砺，几次生死线上的徘徊，女儿的心智逐渐成熟，慢慢理解了父亲。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弥足珍惜；父亲，您也无法免俗啊。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您是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外冷内热的人，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骄傲。亲戚邻居都尊重您喜欢您，遇到大事都找您商量。

您那么热爱生活，每次回家都要把家里清理一番，使之感到舒适；您是那么孝顺，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陪祖母聊聊天给祖母捶捶背；对待亲戚虽然不是很热情，但只要亲戚有难总是出手相助；对于我这个宝贝女儿，更是宠爱有加。为了我，您拒绝了好多痴情女孩的追求，忍受了一个热血男儿孤寂难耐的单身生活。父亲，您是多么的不容易，女儿为有您这样的好父亲感到由衷的自豪，女儿敬重您！

当您举起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扣动扳机的时候是多么勇敢无畏，为了人的尊严，您选择了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使 5 分钟之后就要您跪着挨批斗的大会没有开成；为了人间的正义，您宁可放弃生命，也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您的离去使当天下午要您主持的对一个无辜干部的罢免仪式落了空。您是个铮铮铁骨的好汉！人们听到枪响踹开房门，看到的是您那张已经去世、面带微笑的安详的脸庞。人们震惊了！父亲，您是好样的，面对死亡毫无恐惧！虽然你的生命只有短暂的 33 岁，可却留给后人一个正直善良顶天立地的好汉形象，女儿崇拜您！

父亲，虽然社会早几年就还给了您清白，为您平反恢复名誉，撤销了莫须有的罪名，可女儿到今天才对您深深忏悔，请您原谅女儿的

不懂事，包容女儿对您的误解，饶恕女儿对您的痛恨！您的离去的确给女儿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那不堪回首的劫难在女儿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甚至影响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可那不是您的错，如果您知道女儿所受的苦难，您会多么痛心与不舍！如果有预知，我相信您不会选择这样的解脱方式，女儿理解您！

父亲，今天就让我把这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沉重心事尽情的对您倾诉，把对您无限的愧疚尽情表达，也让我把委屈与忏悔的泪水一并倾泻。父亲，您听到了女儿的心声了吗？您接受了女儿这迟到的忏悔了吗？女儿好想得到您的谅解，听到您的声音，哪怕点个头也好啊！可我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纵使我千呼万唤痛心疾首，您也不会知道的！我惟有将满腔的悲痛，万般的悔恨，汇成虔诚的话语对您说一声：安息吧，我最最敬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还当您的女儿。让我用来生来弥补今生对您的不孝，赎还今世大逆不道的罪孽。答应我，好吗？

————————————————————————————————————

补白：1949 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放大。每次运动中，凡是“称职”的干部，都是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人,得毛泽东之真传,想毛泽东之所想,心中有了一个“小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设计的制度框架内，秉承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理念，以人为螺丝钉，为驯服工具，为愚氓，蒙蔽之，利用之，驱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驱使奴役之不足，更戏耍之，凌辱之，打击之，陷害之，总而言之是敌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所谓政治运动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这一过程，不断把百分之五的人树之为敌。三千六七百万饿死的人，并没有定性为敌人，但在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着，这个死亡数字，大约也正相当于当时全国七八亿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灭了，不叫敌人而遭遇大体与敌人同。　　　　邵燕祥

————————————————————————————————————

儿媳是这样娶来的　　赵仲泉

王印人，昌邑潍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萧洒，急公好义，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辩，主持公道，故在村内威望极高。年令刚过 18，就与邻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为求好养，拜广饶县一起当兵的刘天录为干爹。夫妇和谐，恩爱有加。白天俩人下地干活，晚上男的灯下读书，女的缝衣作鞋，村人无不羡慕。

时在 1944 年，日寇侵华已过 7 载，印人已年届 20，为不当亡国奴，遂弃家投军。当地没有别的抗日队伍，于是投奔国民党四纵队当兵。抗战胜利后，本可解甲归田，以享民乐。谁料想，国共两党又开战局。高密一战，印人被俘，遣返归家。此时印人只想过安稳日子，谁知又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处于无休止的管制监督之下。

到了 1956 年，村干部找到他说："你只要老实改造，处处拥护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多干活，做好事，就可以给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从此，印人整日以汗水来洗刷干国民党军队的罪恶。可谁知干了十几年，力没少出，礼没少送，帽子却始终戴在头上。60 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凡对四类份子敢下狠手，进行残酷斗争的人，被看成阶级觉悟高，可以入党、当兵、升学，年龄大的还可以在村内当干部；凡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村干部，在四清中都被划为四不清，有的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就成了村干部的一大忌讳。有的村干部甚至说："打死四类分子是个方法问题，给四类分子摘帽可是个立场问题！"四类分子的帽子成了铁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无期徒刑还难受。

到了 1971 年，印人年届 48 岁。其子狗剩，将近 30，因出身不好，虽长得一表人才，可再丑的姑娘也不敢嫁他。大家都知道，一旦进了这样的家庭，那是永无翻身之日。正在此时，远在光饶县的刘天录写信来，邀印人参加其子的婚礼。印人盘算：我这 20 多年，头不

敢高抬，气不敢大喘，话不敢高声，力不敢少出，时不时还要拉出去上台示众，向人民低头认罪，当年给王豫民司令当警卫员的机敏锐气早已被磨了个净光，今天何不借去干亲家贺喜之机出一出风头，尝一尝做人的滋味？20 多年虽然在家被管制，受欺负，可是到了广饶，谁还知道我是四类分子呢？

想清楚了，于是便和狗剩去峡山水库下穿网，忙活一夜，捕了 50 多斤鲤鱼，又从中挑那些 2 斤左右的，满满装了一筐子，用红包袱盖了，作为礼物，还去供销社托人走后门买了两盒大前门烟，去油库找表弟借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和一件小大衣。第二天摸黑早起，穿带整齐，骑上借来的大金鹿自行车，直奔广饶而去。走到昌乐境内时，前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他面前嘎然而停。车内走下一名解放军军官。印人吓了一跳，急忙下车，弓腰低头，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差一点尿湿裤裆。不料这位军官向他打了一个敬礼，问道：“老大爷，去乔官怎么走？”印人吱唔半天，竟没吐出半个字。解放军以为老大爷是个哑巴，开车远去。

天将至午，到了广饶大王村。迎宾者忙接过车子，礼让进门。与干亲寒喧一阵，将礼品送上。干亲打开包袱一看，见礼品厚重，喜形于色。众人也皆感叹：从没见过有送这么大礼的，昌邑客好大手！看来日月肯定过得不错。干亲婆接着说：“光看人家这貌相，干什么也错不了。就是还有个儿没定亲呢。”旁边的女宾应声说：“那肯定是挑选多了花了眼了。”

此地风俗，干亲为大客。迎宾者推印人落坐，印人毫不推让，一腚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见桌上摆的是两毛钱的丰收烟，印人不屑一顾，从小大衣口袋中摸出两盒大前门，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顺手放在了后门台上，然后打开大前门的锡纸包装，弹出一支，启动火机点燃，昂首朝天，喷云吐雾，旁若无人。众人见其气派，皆恭维有加。这干亲刘天录也是此地有影响的人物，虽然干过国民党兵，但其叔是 1937 年就参加马保三牛头镇起义的老八路，解放后在省城任要职。人家不但不戴四类分子帽子，还在村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儿子结婚，村内干部，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带匣子枪的公安员等要员，都来

致喜道贺。

王印人高坐主客位上，陪客者笑脸相迎，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这个叫叔，那个叫爷，吃国库粮的就叫同志，把个王印人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酒至半酣，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指手划脚，阅历和经历使他的谈吐语惊四座，说到绝妙处，高举酒杯，一碰而干。众人皆服其酒量，顺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时，上菜的伙计手托传盘来到席前。他环视一下众人，说："今天我昌邑客要点一个菜。你去和大师傅说，给我上一个龙凤配。"众人皆惊，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菜，如果上不上来，可就丢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见做菜大师傅穿带整齐，两臂著白色套袖，手托传盘，进门就说："哪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给您上来了。"只见王印人手持汤匙，从汤碗中捞出一个鸡头和鱼头，看看，放下，然后舀了一匙汤，放嘴里尝尝，说："味道不错。"随后一转身，从后门台上取下那盒大前门烟，放在大师傅的传盘上，说："拿回去抽吧。"

不知不觉，红日西沉。待天黑席散，刘天录耳语告知："今天陪你的那个人，见你气度不凡，儿子定也错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龄，想与你结为亲家。你可在此多住两天，促其婚事早成。"

话说到了 1979 年，我在王印人所在的村子里住队。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还是执行阶级斗争路线。突然有一天来了中央文件，要给全国的四类分子统一摘帽，叫他们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于是我便召开村民大会。

会场上，一边坐的是社员群众，一边是十几名四类分子。宣读完中央文件，我叫十多名四类分子走到社员一边，并大声宣布："从今天起，你们的帽子已被摘掉，与社员是同等地位，那个时代将永远过去了！"此时，他们都大声痛哭，几个年龄大的还当场昏到在地，连哭声都发不出来，其场面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感动落泪。散会后，狗剩找到我说："你宣布我爹摘掉帽子，30 年的阶级敌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设宴庆贺，请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没有摘。"我听后沉思良久，对他说："别人家我能去，你家

我当然也能去。”

后来有一次我问王印人：“人家带帽分子的儿子都打光棍，你的儿子怎么还能说上媳妇呢？”王印人就向我讲述了上面的故事。印人已于 2004 年去世，享年 80 岁。其妻于氏今尚健在，年龄 86 岁。狗剩在改革开放后成为著名企业家。两个孙儿都上了大学，现都供职京门。

此稿写成后，狗剩阅读数遍。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建议隐去村名，文中人物也用化名。只是狗剩之名为狗剩自选，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

补白：某中学红卫兵头头孙 X 东，带领大家在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喊口号，把该喊“打倒”的喊成“万岁”，该喊“万岁”的喊成“打倒”，当场被台下红卫兵冲上去，五花大绑押送到人保组。其父母害怕受儿子牵连，在他所在的学校和居民社区贴出大字报，宣布与儿子划清界线，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在关押审讯期间，孙 X 东上吊自杀了，时年十八岁。尸体是被年近古稀的外婆领走的，草草掩埋在郊区荒野中。他的档案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因犯现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宣布平反时，有关人员送了三百元“补偿金”，其父母接过钱，扑通一声跪下，感恩戴德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儿子的一个鲜活生命，换来的只是区区三百元人民币，还要千恩万谢！令人悲愤。悲愤之余细想，也不能全怪他们。谁都想过有尊严的生活，但当尊严被踩在脚底时，弱小的人只能选择卑微、卑贱甚至卑鄙。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敢喊十八年后又是好汉一条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史　海

——————————————————————————————————

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　　岳　盟

1957 年反右时，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的部门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 5%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部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最后却保护不了自己。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 11 个月之后，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他被打成右派，并揪出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尽管温济泽一直身体瘦弱，又有肺病，也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农场劳动。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起初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他只能搞点资料工作。1960 年 10 月摘帽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的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温再遭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班讲授的新闻广播学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 年“夺权风暴”之后，全国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温济泽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 14 路公共汽车去医院治病，车到某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悄没声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当作陌生人，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他才注意到，一个跟胡乔木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不久前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竟能相遇，却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8 年 1 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一年多。一天晚上，胡乔木通过一位中间人与温济泽通电话。因为温济泽自从被补为右派之后，家中的电话就被撤去了。胡在电话中告诉温，他本人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实社会科学院，问

温是否愿意去。温说愿意，只是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

胡乔木说，先过来，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更快地解决。就这样，温济泽调到社科院，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科研组织局副局长。一夜之间，温济泽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 20 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

1978 年 3 月，温济泽率团代表社科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会后不久，温济泽向胡乔木提出党籍问题。胡要温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社科院政治部转至中组部。

胡乔木在将申诉书交给政治部时，还附了一封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政治部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说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胡耀邦看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命人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看对被搞错了的情况究竟叫平反还是叫改正。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胡耀邦即刻让干审局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被错划右派的问题。1958 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处分，也被一并取消。

此时，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的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温济泽，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据说胡耀邦在一个专门讨论右派问题的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

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就这样，温济泽成为几十万右派被平反的第一人。

——————————————————————————————

补白：菜农唐 X 杰，每天一早挑菜送到城里的蔬菜公司。这天，菜送完，经过一商店，看见柜台上摆放着许多伟大领袖的座像，便请了一尊。他把座像放进空簸箕里，座像在里面滚来滚去，险些要摔出来。他急忙找个僻处，用草绳打个死结，套住座像的脖子，吊在扁担头上，再挂上衣服遮挡一下。走到村口时，觉得有点冷，他顺手拿下挂在扁担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哼起小曲进村去了。没走几步，迎面走来一队红卫兵。他们是到村子里来砸祠堂的，正高唱革命歌曲凯旋。唐 X 杰用草绳吊毛主席脖子，被红卫兵抓个正着。关了半个月，没有查出什么破绽，加上贫下中农成分，最后从宽处理，批斗几场放了。不过村里人另有说法，说这是唐 X 杰的老婆做功夫的结果。有人亲眼看见他老婆几次半夜三更去找造反派头头求情。唐 X 杰的老婆是外地人。大饥荒家乡饿死人，唐 X 杰的老婆与母亲一起出逃。母亲腿脚不灵，半路被乡干部抓回。她只身一人躲过抓捕，沿途讨饭到唐 X 杰的村子。三十岁的光棍唐 X 杰留住了她，娶做老婆。原来的讨饭婆又黑又瘦，很不起眼，后来三餐填饱了地瓜、菜叶，出落得又白又丰润，很有几分姿色。救夫心切，唐妻拿自己的身体与造反派头头做了交易。史　海

——————————————————————————————

白娘娘　　徐卓人

文革之初，我随母亲“发配充军”到一个偏远的小村，住在一户四类分子家的一间旧屋里。那是一家富农，富农早被镇压，剩下富农

婆母子两人相依为命。人家叫富农婆“彭娘娘”，我听起来倒像是“白娘娘”。这白娘娘是个瘦小又干瘪的老太，经常穿一件黑底小白花的对襟衫。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觉得有一股阴冷的感觉。我们刚搬进她家时，她只看我们一眼，面无表情。白娘娘的儿子是个很高大的小伙子，干活非常卖力，却从不与别人说话。后来发现，他们母子也很少说话。

村东住着小队长一家。小队长对我母亲非常关心。他不在乎什么劳动改造，常常一口一个“王老师”，与村里所有的人一样叫。小队长有个儿子，过继给他的瘸腿光棍堂兄。光棍正当中年，虽然有着重大残疾，却非常暴唳，打起他这个领养的儿子来毫不手软，常常拿扁担、桑树杆大打出手。男孩已经十几岁了，常被他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一天，村东又传来凄惨的嚎叫。我奔出门去，远远看见那光棍正举着一个木桶，劈头朝男孩头上猛扣下去。木桶罩在头颅上发出很响的“嘭”的一声。这一声就像撞击在我的心口上，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估计这男孩的头颅是裂了。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说一声“要死！”回头一看，是白娘娘。她苍白的脸色有点红，眼睛也是红润润的。她说了声“要死！”便拔脚往村东赶去。

白娘娘是到小队长家去的。她告诉了小队长亲生儿子正被养父毒打。光棍见小队长的老婆来劝架，而她前面就走着白娘娘，便明白是这富农婆去报的信。他操起一把铁锨朝男孩劈去，边打边骂：“我打的是自己的儿子，四类分子挑拨离间搞复辟啊！”

好多天没见白娘娘的面，他的儿子走进走出也不说话。有一天，我见白娘娘的儿子换了一件比较干净的衣服，知道他是要去镇上了。中午回来时，他手中提着一串中药，我便知道白娘娘病了。白娘娘的善举并没有减弱我对她的那种阴冷的感觉，她的生病也没有引起我的同情。我认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包括她生病。我不止一次听大人说，装可怜是四类分子的惯用手段。

离开这个小村后，有一天，当年的小队长到我家来作客。无意中谈起白娘娘，小队长说白娘娘死了，并叹口气说：“她这一辈子很苦

啊。”

——————————————————————————————————

补白：在濒临台湾海峡的一个小镇上，有个叫孙 X 厚的年轻人。孙父临解放时赴台谈生意，滞台未归。解放后，他与母亲成了镇中最为忌讳的台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好在他父亲每年通过香港亲友寄回一笔生活费，母子得以苟且偷生，相依为命，过着与世隔绝的蜗居生活。文革期间的一天，他母亲被红卫兵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游街，他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人家理论。红卫兵毒打了他一顿后，又抄了他的房间，搜缴了他的日记本和一本写满评注的《毛主席诗词》。在日记里，他倾诉了自己满腹的心酸、痛苦与屈辱，言辞间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当然被认定为是“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妄想复辟万恶的旧社会”。更致命的是他写的那些评注。虽然有褒有贬，但所贬之词，每个字都够砍他的脑袋，诸如“此词暴露了作者严重的帝王思想，可见其借革命之公器，谋君临天下之私利”云云。年仅二十八岁的孙 X 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死前，他咬破指头，在看守所墙壁上留下八个血字：“如此世道，民何以堪！”其母当天收埋了儿子的尸体后，面向那块让她母子梦萦魂牵的海外孤岛，上吊自尽。若干年后，其父回来，带走妻儿的骨灰。临行对族人说：“此生永不再踏祖地一步。”果如其言，次年，其父 87 岁病逝于台北家中。史　海

——————————————————————————————————

宁陕县的一打三反　　佚　名

1970 年 1 至 5 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第三、五、六号 3 个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打击现行反革命犯罪，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是为一打三反。这场运动来得快去得急，至当年 10 月底结

束，是继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清理阶级队伍后的第三部曲，目标直指普通老姓。当时我在陕西南部的一座小县城宁陕县居住。全县不足 4 万人口。县城仅有一条街，二里长，居民约 4 千人。虽然此前全县已清理过阶级队伍，县级各机关几乎再难找到显眼的阶级敌人，县军管组还是在县电影院召开了近千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县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

动员大会后，我就学的宁陕中学立即行动起来，号召广大师生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晚上住校的同学扛着自制的红樱枪，站岗、值勤、放哨，进行护校活动。3 月下旬，学校召开全校紧急会议，称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联络了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在秦岭保山撒下各种反动传单，现已被基干民兵缴获，并抓获了与台湾联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周后，县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已破获暗通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并对已抓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宣判。

公判大会那天，天气阴沉。县中队战士早早就在宁陕中学操场城墙四周制高点架上机关枪（两人一组），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大会会场。10 点左右，在一阵阵“打倒反革命分子”、“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激昂口号声中，县中队两个战士一组，将 4 名人犯像拎小鸡似的提至大会现场。文革时抓捕的阶级敌人全部五花大绑，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抬头或呼喊口号，脖子上还要勒一条绳子。行刑的人为了压倒阶级敌人，自己的胳膊要从人犯被绑的胳膊下穿过。一旦犯人想动，他的胳膊一抬，犯人能疼得瘫倒在地。若是用劲，犯人的胳膊就会折断。

宣判大会开始，县军管会组长开始宣判这几人的滔天罪行。他们都是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或当地农民，年龄 20 多岁。其中一名叫张弟学，此人初中毕业回乡务农，自制一部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并与其他几个人一起收听广播。有人揭发他们是收听境外广播，搞反革命串联，于是遭到逮捕。这就是所谓敌特分子勾结台湾敌特组织阴谋颠复我红色政权的主要犯罪事实。至于所谓的反动传单，实际是秦岭深山里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写的日记，被说成是敌特传单。大会宣布此 4 人

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执行。人犯立即被拉到宁陕中学后的河滩，一阵乱枪打死。其中一名青年被击中脑部，没有立即断气。县军管会马部长当着正在接受教育的小学生的面，站在稻田上，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叭叭”对着还在喘息的犯人头部又是两枪。该人犯立即脑浆开花。马部长又用穿着长筒马靴的脚踢了人犯两脚，看是否还有气息。现场的小学生被此举吓得直哭。我也随学校组织到现象观看，至今每想起那横七竖八的尸体现场，仍然毛骨耸然。

此案后不到一个月，军管会又宣布破获一起隐藏 20 多年的历史反革命案，并声称这是一打三反深挖暗藏阶级敌人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成果。此案共枪毙 9 人。公判大会在宁陕中学大礼堂举行。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悄悄透过破烂不堪的礼堂窗户向里看，十几个犯人（含有判有期徒刑的）全是农民。在呼呼的冷风之中，他们个个穿着破衣烂衫，五花大绑，浑身颤抖，缩在墙角。公判大会之后，9 名被判处死刑的阶级敌人被拉到稻田，一阵枪响，全部打死。文革中有个习惯，被枪毙的犯人，不许家属当场收尸，要展示一天，让广大人民群众从血腥的杀人现场接受触及灵魂深处的阶级教育。一般犯人家属收尸，都是先就近把死尸埋了，几星期后再选择人静夜深时重新挖出来运回老家。

一个多月后，县军管会又第三批枪毙了 6 个反革命分子。这次我没有参加公判大会。这样，宁陕县关口镇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的三个月中，共枪毙了 19 人，判刑几十人，基本全是农民或没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

接下来的几个月，大规模枪毙人的速度开始放缓，更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判处有期徒刑。华严公社草沟大队队长文德清隆冬季节买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天寒地冻放在背篼怕压碎了，抱在手里太冷怕摔碎了，就用绳子一头绑在石膏像头上，一头挂在自己脖子上，走在街上被抓住后关进监狱，然后在各公社轮流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军管会了解到他是生产队大队长，又是贫农出身，关押游斗数月后押回原地监督劳动。

因抓人过多，县监狱人满为患，只好抓了人迅速判刑，送往安康

地区监狱。1970 年，全县共抓捕近百人，枪决几十人。最多一次枪杀 17 人，抓捕 38 人。根据我的记忆，在抓捕及枪决的人中，没有县机关、学校及所属各部门的人员，全是农民、林场工人或普通老百姓。全县共清理案件 160 起，杀关管 356 人。这一年是宁陕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杀人最多、关押人最多、县城监狱最繁忙的一年，也是当地老百姓经历最恐怖、最血腥的一年。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国家各级部门受到冲击，让社会精英与名人志士受到迫害，而且在基层对普通老百姓也采取了野蛮残酷的大迫害。这种践踏人权、毁灭人性的罪行，应当给予揭露与批判，这样才能警示后人，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本人写的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愿意对其负责。

————————————————————————————————————

补白：1967 年夏秋之交，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仅 8 月下旬，北京就有数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因毛泽东随口一句话而更名宋要武，并开始发狂，一人独欠下五条以上人命。她深知罪孽深重，害怕高悬的正义之剑落下的那一天，文革结束不久便亡命海外，跑到美国再也不回来了。在崇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迫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死。在东四，一个中学生被胁迫用哑铃砸碎奄奄待毙的资本家父亲的脑袋，他本人也因此精神崩溃成为疯人。　　　　　　艾柏林

————————————————————————————————————

作为地主崽的童年　　邢诒心

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亲从内蒙劳改回来后的第二年（1958 年）出生的。母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工地上孕育了我，并且在没有医生护士接生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把我生下来。母亲因劳累过度，加上严重营养不足，我出生时头大身小，给人的感觉是个畸婴。

母亲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林姓有钱人家。外祖父是南洋富商，在马来西亚有橡胶园和商铺，在家乡也置有很多土地房产。母亲是林家唯一的女儿，美丽聪明，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疼爱。父亲九岁丧父，十三岁失母，靠哥嫂抚养。那年父亲参加文昌县升中学会考，名列第一，名声大噪。抗战期间，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后在国民政府机关工作。五二年海南岛土改，外公家被定为恶霸地主，家中财产全部没收。外公外婆在恐惧中撤手人寰，可怜的小舅舅顶替地主之名，长期管制监督劳动，备受精神和肉体折磨。

我家的命运更惨。虽仅有几亩地，但因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事，被定为地主，并以反革命罪被捕，押送到遥远的内蒙古蹲监做苦役。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大姐，凶残的民兵将其双臂捆绑起来，吊在树干上毒打。在此惨酷状态下，大姐难产出世。自己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母亲既不敢回娘家，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外婆家。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被斗是在村子的祠堂里。那天下午，我和小朋友到祠堂去玩，突然听到祠堂里传出雷鸣般的叫骂声，我们一窝蜂般拥过去看热闹。啊！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名民兵揪着父亲的胳膊，头压得很低，黑压压的人群挥着拳头，愤怒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反革命分子低头等认罪！"疯狂的叫声仿佛要把父亲的身躯撕碎。我先呆了一会儿，接着大声哭叫着冲到台上，抱着父亲的双腿，一边哭喊"不要欺负我爸爸！"一边用力抠开揪着父亲胳膊的民兵的手。

祠堂里的人群一下子被我突然的哭闹声弄楞住了，整个会场一时鸦雀无声。片刻沉寂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突然一声狂叫："把这狗崽子赶出去！"同村一个高个子民兵走上前来，用力扯开我紧抱着父亲双腿的手，像老鹰拿小鸡一般拎着我的胳膊就往祠堂外走。

那民兵把我夹在腋下，我哭喊着，挣扎着，用沙哑了的声音凄惨地喊着："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我被那民兵扔在村口的沙堆上。他恫吓我，如果我再过去，他们就会将我和父亲一齐宰了。我踉跄着走进家中，母亲正用手巾擦拭自己红肿的眼睛。我猛地走上前仆在母

亲怀中，哭诉父亲正在祠堂被人欺负。母亲紧紧抱着我，一边为我拭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孩子甭怕。爸爸会没事的，会回来的。"

从此之后，父亲几乎每月都会被背枪的民兵带到外边批斗，回来时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每当这时，母亲就上山采摘苦楝树叶回来煮水，用毛巾醮着热腾腾的苦楝水，流着眼泪，轻轻地敷父亲被民兵打的伤口。在我们这个一千多人口的乡里，就有几十名像父亲这样被定为五类分子的人。最后能平安捱到今天的，除了父亲，似乎已看不到第二个了。父亲既是中国那段残酷历史的受害者，又是那个畸型时代的见证人。父亲能活到今日，那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比我小三岁的妹妹突然发高烧，躺在床上。母亲中午收工回来，见妹妹病得不轻，想留下来照顾妹妹。下午出工哨响了，母亲向生产队长请假，那凶神恶煞不但不同意，反而气势汹汹地训斥母亲："你这地主婆想不劳动，做梦！我们今天就开会斗争你和你的反革命老公！"母亲只好将我叫来照顾妹妹，我答应会看好妹妹的。母亲用手摸摸妹妹的额头，噙着眼泪扛上锄头走了。我照着母亲的嘱咐，定时给妹妹喝凉开水和在她额上敷湿毛巾。妹妹的烧退了，起来走动了。我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便跟着小朋友上山骑牛玩去了。

傍晚我从山上回来了，看见一大群人围在我家大门口，我顿感不妙。进了屋子，只见妹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旁边是一位脖子上吊着听筒的医生模样的人。二哥和父亲一动不动地呆在一边，愣愣地看着妹妹，母亲和姐姐跪在妹妹身边哭成了泪人。我立即意识到出事了，冲过去紧紧地抱着妹妹，一边嚎啕大哭叫着妹妹的名字，一边猛摇着她的头。我不相信刚刚还下地走动的妹妹真的会这么快离我而去。我感到妹妹这个样子是我的责任，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亲人，我没有看好妹妹，是我害了她，我无地自容。

过后才知道，妹妹是在我出门之后，跟几个小朋友到村头的水库边玩，不小心滑进水里。其他几名小朋友也都跌入水库中，但他们很

快被大人救起，而妹妹因为是地主的孩子却始终没人愿救。还是母亲听到呼救声后，才跑过来捞起妹妹。因落水时间太长，妹妹在捞上岸前已涨着肚皮浮上水面。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一家人低着头，默默地守在妹妹的身边。妹妹涨得发圆的肚子上驮压着一包重重的沙袋，惨白的脸上睁着一双凝滞的眼珠，一动不动。受沙袋挤压，肚子里的水不断透过她那张开的嘴巴，丝丝往外冒。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双手，仿佛在无声地安慰母亲。医生说，没希望了，要父母准备后事。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眼巴巴望着妹妹离去，一家人痛苦地在祷告着，希望妹妹能够醒来。

到了第二天凌晨，哗啦一声，妹妹肚子里的水连同胃中的食物，突然一股脑儿被全部吐出，涨圆的肚子也一下子瘪下去了。只见她翕动着嘴巴，嘤嘤了几声。不知谁在大喊“醒来了！醒来了！”顿时我们都围了过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真的出现了，妹妹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滚动着。她醒来的第一声就是问“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为什么你们都围着我？”母亲热泪直涌。穷人家的孩子命最硬，妹妹终于逃出这次大劫难。不然的话，我将会遗憾终生。

1965 年秋，我上小学了。母亲用南洋亲戚送的澳洲面粉袋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来到校园门口，母亲叮咛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然后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告别了母亲，在我刚跨入校门的时刻，几块泥巴突然从侧边向我袭来。我转身一看，几名比我稍大的孩子，一边兴灾乐祸地拍手称快，一边叫喊着：“快来打地主仔呀！”他们也学着自己的父母，用斗争我父亲的手段欺负我！上学第一天，我便尝到受人无端侮辱的滋味。我紧攥拳头，不顾一切地朝骂我最凶的一个小孩扑了过去。那孩子冷不防被我摔倒在地。我俩抱在一起，在地上撕打、翻滚。另外几个孩子一齐围拢过来，狠扯我的头发，撕我的书包。

正当我寡不敌众的时候，母亲突然了。她一边大声喊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边张开双臂护住我。群殴我的顽童忿忿走开，嘴巴不停地嚷“打倒地主婆！”

我脸上被抓得道道血痕，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新衣服被址掉纽扣，新书包被撕断带子。看着受委屈的我，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冰冷的泪水落在我的额头。我虽年纪尚小，但完全明白此刻母亲内心的痛楚。

小朋友不懂事，很难怪他们，但那些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却连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也没有。从上学第一天起，我尊敬老师甚于自己的父母。在父母亲面前，我有时会撒娇淘气，可在老师跟前，我却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顺。我敬重老师，老师却视我为草芥。在学校老师的心目中，我是天生的下等人，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谁都可以肆意凌辱我。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来了个姓林的教师。他得知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后，把我列入另册，看不起我，冷落我，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讲课谈到阶级斗争，一定要把我父亲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让同学们耻笑我。他有个三岁的女儿，常带到学校来。他讲课时，常常叫我到课堂外边替他看小孩子。有时上课时间，他竟要我出去扫地。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在教室门前拉得满地屎尿。当时我正在听别的教师讲课，可这位林先生却走进教室，要我马上出去将他儿女拉的屎屎清理干净。我明知他是在欺负我、愚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清楚我与其他小朋友的处境不同，不能有丝毫反抗，必须咽下这口气，必须逆来顺受。那时，我几乎被他当成一名童奴使用，稍有不依，除了遭辱骂，有时还挨耳光。学校曾是我日夜渴望的地方，后来却变成了我惧怕、憎恨之地。初小毕业时，我竟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

我二哥性格沉静，非常聪明。小学毕业时，学校推荐他报考海南最好的中学——海南中学。他考上了，那可是千里挑一，但终因父亲是反革命，录取通知书被大队干部扣压。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回乡当了农民，二哥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关

起门来哭了几天几夜。限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接受教育，逐渐消灭这个反动阶级，是毛泽东的既定图谋。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掌权时，阶级斗争暂时淡化，我大哥才得以顺利上了中学。相对我们几位弟妹，大哥是个幸运者。二哥、姐姐和我虽然都有读书的天资，却也只能读完农村的小学，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

二哥失学后，父亲鼓励他振作自学。二哥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大目标——像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发愤学习，将来成为作家、诗人。白天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劳动，晚上挑灯夜读。那时大部分乡村人都是文盲，要找一本书相当不容易。二哥无论是到亲戚朋友家，还是到外乡修水利，只要看到书就借来读。有时候偶然在垃圾堆上捡到一张别人包东西扔掉的旧报纸或旧杂志，也如获至宝拿回家来慢慢细读。我家原有不少古书，父亲戴上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后，害怕惹上麻烦，除了留下一本王云五编写的四角号码字典外，其他书全都烧掉了。父亲留下的这本字典成了二哥的良师益友，也使我受益不少。二哥一有空就捧着那本厚厚的字典翻来翻去，即使被调派到外地当劳工，也把那本字典带在身边。这本上千页的字典，二哥耳熟能详，无论你问那个汉字，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怎样解释。直到现在，这本字典还一直陪伴着二哥。

二哥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写的读书笔记可能有几大箱。二哥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那记录着他一生辛酸苦辣在日记本，相信他至今仍收藏着。二哥表面文弱，内心刚强。他不满社会的黑暗，用手中的笔进行无声的抗争。二哥写过一本反映生活现实的书稿，在床下墙顶藏来躲去，生怕被人发现。我那时年幼，读不懂他写的这本书。母亲说，主要内容写的是一对出身反革命家庭和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不满血腥的现实统治，冲出樊笼追求真爱的故事。这样一本书稿若被其他人发现，那可要大祸临头，轻则被判罪坐牢，重则会被枪毙，而且株连全家。后来父亲常被抓走游街批斗，形势越来越紧张，母亲害怕民兵抄家时将书稿搜出来，就劝说二哥将书稿焚毁了。二哥花费多年心血的劳动成果，在这一刻间付诸东流。

不知不觉间四年过去了，我在乡间读完了初小。这四年与其说是上学，不如说是胡闹。上头号召停课闹革命，我们乡村小学的校长也野心勃勃想趁机大干一番事业。他和那位姓林的教师一道，乘我们反革命家属不敢反抗之机，侵占我家祖宗留下的土地。他们要我们这些小学生开荒，毁掉我们家的果木树林，强占了我们仅有的几亩土地。四年的初小，我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老师的教育近乎虐待，同学无端侮辱，我几乎是在诚恐诚惶中度过每一天。我想永远离开学校，我不想看老师那凶神恶煞模样，不想听同学唤我反革命仔。我将自己不想再上学了的念头告诉父亲，想不到被父亲狠狠扇了几个耳光。父母亲把我们五个孩子当作他们的希望，最痛恨的就是我们说不想读书。尽管他对那个年代那种制度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坚信读书必有用。

青涩惨痛的婚恋　　王誉虎

六十年代初，我连续两年参加高考，两次的答卷，都自我感觉良好，却都名落孙山，而那些平时比我学习差的同学，却个个登上高等学府的殿堂。这样的结果，是我一直琢磨不透的迷团。事隔二十年之后我才解开，原来当时地富反坏右子女考生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毕竟我的学习成绩不在出类拔萃之列。

我曾经反复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文学巨著，为真理、正义而殉道的英雄情结充斥着我的心灵。我家一门三右派（父兄），我自然地拥有出身原罪感，并伴生出一种背叛本阶级利益、改造思想、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殉道者冲动。1963 年 10 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

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戍边。

1966 年底我到佳木斯搞串联时认识了杜崇娅，我们一见钟情。她是北大荒 852 农场三分场的气象员，苗条又漂亮，曾是总场文工队的舞蹈演员。小杜出生在香港，1964 年初中毕业。父亲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杜振远，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毕业。举家从香港归国，任铁道部部长顾问工程师，1958 年初被打成极右派。诚惶诚恐在家三年，写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检查。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三个月后逝世。小杜的母亲出身大家闺秀，书香门第，相夫教子。文革初起，红卫兵抄了小杜在北京的家，母亲惨遭揪斗。

杜崇娅与我相近，受共产党洗脑教育，有一种家庭出身的原罪感，思想上追求进步，与右派父亲和出身地主的母亲划清界线，力争脱胎换骨。1969 年初，小杜从 70 多公里外的三分场到一分场六队来看我。我独住一栋茅屋，外间是过道和炉灶，里间是土坑和简单的陈设。我很爱她，她内心也爱我，可她脱口而出的多是公式化、概念化、革命化的语言。我觉得她的身心与语言有着激烈的矛盾和冲撞。在她的影响下，我原本正常的欲望和冲动也受到了抑制。我精心招待她，在老职工家为她燉了一只大母鸡。我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她则以当时的标准答案回答我：“结婚成家太早不好。应趁大好年华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改造思想，要求进步。”我无言以对。她当时 21 岁，我 25 岁。

冬天的夜晚，村内出奇地安静，我们在茅屋内无人打扰。接近子夜，杜崇娅蹲在外间灶口最后一次添柴烧炕取暖，火苗映照着她那俊美的脸宠。她有八分之一意大利血统，大眼睛楚楚动人，通天鼻线条优美。我情不自禁地弯腰轻吻了她的乌发。她没有反应，继续向灶眼添柴。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呼吸有急促，说：“我累了，我想睡觉。”

我已把坑上的被褥为她铺好，轻揽着她的腰身，扶她坐在炕沿上。我蹲下为她脱鞋脱袜，然后又为她宽衣。她穿着秋衣秋裤钻进了被窝。我坐在炕沿上，抚摸着她纤细的手背，仔细端详着她，爱情之火在我

胸中升腾。杜崇娅突然双手轻拽我的胳膊，我敏感地接收到了这一信号。正待我准备搂抱亲吻她时，她却又把我推开，发出了近似无助地哀求：“你别糟蹋我，你别糟蹋我！”

我像被电击一样惊愕，满怀热烈真挚的爱情犹如被泼了污水，瞬间联想起当时的一个时髦词汇——奸污。在那个年代，婚前性行为被认为是不轨行为，是大耻辱。我真心爱她，本能的肉欲并不强烈，理性的爱情主导着我。我站起来温存地说：“崇娅，你好好睡吧，扣好门。我到男生宿舍去，明早八点我再来。”我至今懊悔我的放弃。如果我不放弃，门当户对的我们或许会很幸福美满，而后的灾难或许也会避免。

不久，小杜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以及与我的亲密关系，使她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群众专政指挥部挂牌游斗她，大辫子被剪掉，大木牌上写着“地主右派的狗崽子、坏头头杜崇娅”，名字上面还打着叉。我开始对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暴行产生咬牙切齿的憎恶。这种丑化人格、践踏尊严、玷污灵魂的行径远比法西斯恶毒和下作！杜崇娅是那样的美丽、纯真和自尊，面对被扭曲、丑化、践踏的她，我倍感内疚和自责。

几个月后，我接到杜崇娅的来信，说她已“解放”，在三分场五队劳动，很想我。我利用休息日，骑着从修配所借来的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三分场五队。那时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杜崇娅身穿褪色发白的蓝棉衣，腰间扎着绳子，明眸皓齿，风采依旧。我的到来显然给她带来了快乐。虽然她很克制，我仍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深情依恋。我们的时间不多，中午一点还要出工，我们相互嘘寒问暖，在宿舍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打饭。食堂很大， 墙壁贴满大字报，其中有几张是批判杜崇娅的，而那张杜崇娅自己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吸引了我的眼球。

这张自我批判的大字报，字里行间写满与反动家庭决裂、与父母划清思想界限、立志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走革命化道路的誓言和决心，甚至骂大地主出身的妈妈是老母狗。为此，我异常严肃地批评了她。

杜崇娅懊悔地说："那一阵子（半个月前）把我斗晕了，好像天要坍了似的。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自杀了！"吃完午饭，她要出工去场院干活，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开了。从此一别四十二年。

分开不到一星期，我接到了杜崇娅寄来的一封信。她郑重其事地提出与我分手，并要我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毫无疑问，这封信是迫于压力违心写的。

我又开始恋爱了。新的恋人刘某，出身高干家庭，六六届高中毕业，六八年八月下乡，虽能歌善舞，但不张扬。她爱看书，熟读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司汤达、海明威等大家的名著。她有一副好嗓子，1960 年精神度荒时出版的《外国民歌二百首》几乎全都会唱。她思想活跃，对极左那一套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家庭出身，她与杜崇娅都有着明显的反差。俄罗斯、苏联名著她看的不多，但她赞赏并理解那种殉道般的献身精神和伤感深沉的情调。我们情趣相投，弥补了我与杜崇娅分手后的空虚与孤寂。几个月后，我们便从知音、朋友发展成恋人。麦收过后，我向指导员马吉海申请回京探亲结婚。马表示祝贺和支持。

在北京家里，妈妈得知刘怀孕了，眉开眼笑，一口承诺将来负责带孙子。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农场，意想不到的噩梦开始了！我们的结婚申请被工作组扣压。马指导无奈地说："团政委有指示，不经他同意不准王誉虎和刘某结婚登记！"我怒火中烧，去找工作组常驻副组长陈绍仪理论。陈是现役军人，小个子，黄面皮鼠眼，阴阳怪气地说："别着急嘛，先把问题搞清，态度要端正，拖三五个月怕啥呀！"我判断工作组已经知道刘怀孕的消息。在工作组策动下，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了。

内心无愧加上性格因素，我坚决不肯违心检查，更不肯低头认罪。僵持一个多月，工作组仍不批准我们结婚。我与刘商定：请事假回京做人工流产，或分娩后在京滞留不归，我独自在这里与他们周旋到底。

一星期后，刘收到一封电报："奶奶病危，速归！"刘找到工作

组，副组长陈绍仪说研究一下再答复。晚上开大会，陈绍仪代表工作组宣布："刘的电报有问题，不予批准。从今天起，刘某离开一分场必须请假，若到总场必须要有人陪同！"工作组一方面限制了刘的人身自由，一方面找刘多次谈话，做思想工作，大谈阶级斗争，让刘不要辜负革命先辈的期许，不要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站错队，并许诺，如果揭发检举王誉虎的反动言行，杀他的回马枪，工作组会安排刘去医院做人工流产，调到团部中学教书。

一直都沉默不语的刘，在陈绍仪摊牌后，终于一反常态地光火了："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父母参加革命时还没有你呢！你们凭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难道我是黑五类？你们凭什么违反婚姻法不让我们结婚？你们违法，违背党的政策！小心我去告你们！我和王誉虎两相情愿，我们结婚结定了！"

陈绍仪显然已掌握了刘的身世，知道刘的父母只不过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中高级干部，对他陈绍仪构不成制约，便阴险而强硬地说："毛主席说重在表现，出身再好，表现不好，站错队，也一样犯错误！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既不能结婚登记，刘也无法做人工流产。工作组的恶毒和卑劣昭然若揭。我显然即将成为阶级斗争的祭品，老婆孩子也将面临终生的不幸！

愤恨、恐惧、焦虑袭扰着我。未婚生育在当时是让人无地自容的丑事，孩子成为私生子更是灭顶之灾。前思后想没有出路，我的精神接近崩溃。为了妻子，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为了避免家庭悲剧，我屈服了，我走进了工作组预设的圈套。我瞒着未婚妻刘某，主动找陈绍仪低头认错，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甚至主动坦白曾与有夫之妇有过暧昧关系。我一时的脆弱、胆怯让我悔恨终生，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太天真了，我误以为我的屈服能换来工作组的赦免。工作组不只需要屈服，更需要的是揪出阶级敌人！我的屈服正好给工作组提供了炮弹。他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置我于死地。懊悔悲愤之下，

我狂饮了半斤多 70 度的北大荒白酒，躺在茅屋土炕上烂醉如泥，大骂工作组，并狂言要拿冲锋枪嘟嘟了陈绍仪！

工作组威胁利诱刘未果，便在与我接近的北京知青中安插眼线。1968 年来场的六六届北京知青王某某出卖了我。第二天晚上开全体职工大会，我被当场揪斗羁押，罪名是企图枪杀解放军。我因此被看管强制劳动 8 个月，白天 8 名六九届的女知青轮流看管，夜间一名老职工和一名男知青彻夜监视。监管期间，我断断续续了解到外面的一些情况。团政委王学礼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王誉虎与刘某现在不能结婚，将来也永远不许结婚！我们要对革命干部的后代负责，时刻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个雨夜，负责监管我的天津知青赵子玉，带我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妻子独住的茅屋。第一次看到沉睡在襁褓中的儿子，我心如刀绞。前途未卜、凶多吉少的我若真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将沦为比印度贱民、比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如的专政对象，我的妻、我的儿也将沦为红色中国的贱民。妻子刘很平静，没有半句怨言，只是说孩子刚降生半个月，她父母还不知道。工作组威胁要与她父母联系，逼她与我决裂。妻子还说，孩子快出生时，她准备把孩子送人。但当儿子呱呱坠地，看到粉红的湿漉漉的儿子时，她觉得不能失去儿子，即使再艰难也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我极其痛苦地告诉他："我要是真定为反革命，你就离开我，最好托你爸爸或你在成都军区的叔叔，走后门参军。孩子的归宿你决定，反正不能让儿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反革命爸爸。"我吻了妻子，又轻吻了熟睡的儿子，便悄然回到"牛棚"。赵子玉，这位天津知青，我和前妻至今都还感激他。

而后，在工作组和她父母的压力下，在无依无靠的恶劣环境中，刘忍痛把已满三个月的儿子送给了团部中学的一位教员。几天之后，在刘送给我的棉被里发现一张卷紧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笔迹抄录了一首闻一多的诗：

花儿开过了，果子结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骄阳炙干了，
一夏底荣华被一秋的底馋风扫尽了。
如今败叶枯枝，便是你的剩余了。

天寒风紧，冻哑了我的心琴；
我惯唱的颂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伤心，我的爱，
琴弦虽不鸣了，音乐依然在。

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
你的荣华永逝（这原是没有的事）
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余痕，
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况且永继的荣华，顿刻的凋落——
两两相形，又算得了些什么？
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残，果烂，叶败，枝空，
那缜密的爱底根网总没一刻放松；
他总是绊着，抓着，咬着我的心，
他要抽尽我的生命供给你的生命！

爱啊！上帝不曾因青春的暂退，
就要将这个世界一齐捣毁 ，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儿暂谢，
就敢失望，想另种一朵来代他！

妻离子散的痛苦像毒蛇一样啮噬着我的心，工作组的恶毒卑劣残忍让我仇恨满腔，复仇雪耻的念头逐渐成熟。当时正值中苏边境暴发武装冲突，每个连队都抽调几个知青去武装连集训。武装连有几个哈尔滨知识青年与我关系不错，有时假借与看管我的知青聊天来看我，给我好烟抽。他们背着冲锋枪，有时就把枪放在炕上或靠在墙边。我决定铤而走险，舍命相拚。工作组办公室与我相隔一栋房，晚上陈绍仪就睡在那里。我以写检查之名写了绝命书，准备看准时机，抢枪干掉陈绍仪，巧遇王学礼政委更好，然后引弹自尽。

有一天晚上，副指导员突然来“牛棚”查岗，看到两个武装连的知识青年把冲锋枪靠在墙边，申斥道：“枪不离身，身不离枪，你们怎么这么随意！”副指导员刚从部队转业，左得出奇，知青反感他，不买他的帐。两个知青异口同声地说：“弹夹是空的，没子弹怕什么。”真是天不绝我！如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那时哪怕我抢的只是一支空枪，我也死定了。

两个月后峰回路转，我的监管解除了。在此十天前，我已从小道消息得知未婚妻刘已经走后门参军（县团级及以上的干部子女享有这一特权）。几个月后，我接到刘的一封短信。“老虎：你被解除看管，让我惊喜！那个流氓、恶棍政委早晚要遭报应！我没经受住考验，为了离散的儿子，我向你请罪！工作组恫吓欺骗我，说你是破坏解放军支左的反革命，政治上已宣判死刑，为了不断送我和孩子的前途，为了不做黑五类的亲属，也为了维系与父母的关系，必须让我与你当机立断。我太轻信了，也太脆弱了——实在无法忍受那屈辱而又艰难困苦的处境，实在忍受不了看不到希望的煎熬！工作组还与我父母串通，不明真相的父亲勒令我要么走后门参军，要么断绝父女关系！参军，犹如从地狱直奔天堂，自私的本能占胜了罗漫谛克！我再次向你请罪，为了我们的儿子，也为我对你的背离！这封信是进城投递的，你可以回信，但要注意分寸。我爱你，一如既往——如果你还能原谅。”

我没有责怪她，还为刘跳出火坑而欣慰。几经打探，半年后我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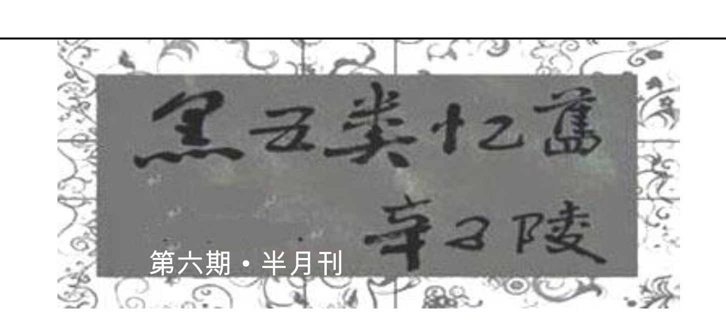
到了儿子的下落。我去看望离散的儿子，领养人感到错愕、惊慌。他们曾被告知，孩子的父亲王誉虎是反革命，没有出头之日的可能。已满周岁的儿子显然营养不良，大脑袋与身子不成比例。儿子似乎认识我，喜欢我的爱抚，依偎在我的怀里不愿分离。我想要回孩子，年逾花甲的老母亲也特意从北京赶来与养父母协商。儿子的养母胖胖的，慈眉善目，是学校的炊事员，看来很疼爱孩子。借口是组织安排，她拒绝了我们母子俩的要求。此后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孩子，给他带糖果和玩具，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花得所剩无几。

孩子开始叫我爸爸了，悲喜交集的我再次与收养人进行交涉。养父是一位面目阴沉不苟言笑的转业军人，与养母性情迥异，说话不讲情理："你想要回去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征求生母的同意，第二是要付抚养费。这孩子身体不好，看病、营养没少花钱，快两年了，最少要两千元，包括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两千块钱对于当时月薪 38 元 6 角的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的妈妈尽管想孙子心切，可她也没什么积蓄，爱莫能助。为此，我与团政治部交涉，说这妻离子散的悲剧事出有因，上级组织应承担责任，帮助解决，遭到他们婉拒。

三个月后，儿子的养父母举家搬迁，地址不详，相关领导声称负责为他们保密。儿子的失踪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对儿子的思念啮噬我的心，最终化成对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制度的仇恨。

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焦国标书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仇恨如何才能消减　　焦国标

周舵先生说："《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这个担心提得好。在一个崇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社会，如何消减仇恨，确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研读几本基督教的书，其中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耶稣和此后殉道者的死法。面对行刑的罗马兵丁和犹太同胞的戏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稣竟为他们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死于耶稣死后两年，在耶路撒冷城外执行极刑。当乱石雨点般砸来时，司提反平静地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样死去。耶稣的同母弟雅各，因传讲哥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人用石头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死前，他重复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基督耶稣为后世门徒不仅树立做人的榜样，也仿佛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就死模式。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私自将圣经翻译成方言仍是死罪，圣经英文翻译的开拓者威廉·丁道尔即因此被英王判处火刑。临死前，丁道尔不是诅咒国王，而是为国王祈祷："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间，临难时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成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的就死风度。这堪称是一个人类奇观，一个可能是仅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奇观。

中国传统的主要就死模式有两个。一个是戏曲野史小说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壮语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砍头不过碗大个疤，要杀要剐悉随尊便"。另一个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谭嗣同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号。抗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皆呼此口号。反蒋烈士是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江姐、刘胡兰、邓中夏等临终即喊此口号。瞿秋白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到刑场，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腿坐下，等待枪响。混合了中国传统精英和共党烈士的就义模式。

文革时期，中国推出一种别具新意的就死模式，被动消音模式。代表性的个案是林昭、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之死。枪决前，林昭、王佩英都是喉管处勒着绳子，李九莲则是舌头和下颚被竹签扎在一起，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下垫砖，不消毒不麻醉，一刀把喉管割断。其中林昭、李九莲之死还有后续，林家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九莲则遭抛尸、奸尸和割去双乳。

杀戮与仇恨互为因果。可是为什么耶稣和圣徒被杀戮时却没有仇恨？他们过滤、吸收仇恨的力量从何而来？当今西方的社会政治文明与殉道者的就死风格有着怎样的联系？试图消解仇恨和试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人，似应深长思之。

目　录

中国邪火　　周　舵

我的那篇《自杀——一个案例研究》，是六四之后被关押在昌平一个招待所时写的。那时正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写下的东西，“真实”是可以保证的，但毕竟火气太盛，有失厚道——尤其对我的父亲。现在真有不堪复读之慨。

我母亲是相当严重的洁癖。我一直以为这很好，以至于在朋友之间我也以洁癖著称。直到自己得了哮喘，才知道清洁过度原是哮喘的祸根之一。后来娶了太太，她乃一超级洁癖，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洁癖正是我父母争吵不断的战火之源！我从中合逻辑地得出了凡事不可走极端的结论。从此我改邪归正，洁而无癖。

父亲文革中被关押在单人牢房 6 年，成了躁郁型精神病人，1973 年出狱，直到 1989 年病故，16 年之间，除去最后几年有保姆帮忙之外，基本都是我在伺候。洗衣做饭，吃药看病，洗澡理发，一切一切，都得我一手照料。你要是没有亲自照料过精神病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那不折不扣，就是一个活地狱。同时我还要上学（读研究生），上班（在大学教书），等等，真是“二斧劈柴”，心力交瘁。我自己常常纳闷，我哪来的忍耐力，居然挺过了这 16 年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煎熬？我的神经莫非真的是钢丝做的不成？话虽如此，毕竟人的神经不是钢丝做的，心里郁积的邪火，也就难免借文字发泄了出来。

由此想到我们中国人这个邪火十足的民族。

邪火不一定是出于邪恶的动机。我指的是愤怒和仇恨这些心理学上明显属于负面的不健康的情绪情感及其造成的危害。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事实上，那些有着十分公平正义甚至是崇高道德感支持的邪火，往往反而危害最烈。很简单，正因为它基于正义冲动和崇高道德，才会对于人类当中那些比较优秀的、自觉“仰望星空”的那一部分成员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而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于是，愤怒和仇恨就被成十倍地放大，其后果也就尤其严重。“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良愿望铺就”，信哉斯言！

焦国标的《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下大力气挖掘 1949 年以来这部人仇恨人的历史的总根子，以为后代永远的鉴戒。

有一本好书，《仇恨的本质》，值得大力推荐。美国人写的，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人类有两个大脑，低级的和高级的。高级大脑是人类文明化社会生活的产物，低级大脑是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仇恨就是我们低级大脑的一种本能。仇恨本能在我们面对严重威胁，尤其是生死关头时，能调动起身体的自卫潜能，所以是不可少的。只不过，它往往会和高级大脑的某些思维功能结合，转化成一种初级原始思维，从而把仇恨合理化、理论化。

初级原始思维有以下七大特点：

1，表面联想式思维。一个人在某月 13 号吃了交通罚单，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车又坏了，于是初级思维马上得出结论：13 号的星期五注定是个倒霉日子。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简单概括性思维。初级思维只知道混为一谈、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种各样，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应当区别对待。这种思维经常和草率概括结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过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类之敌”的结论，同时伴随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惧和厌恶感。

3，极化思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敌。

4，个体化思维（主观化、情绪化思维）。每件事、所有的判断，都和个人的情感、利益、愿望紧紧相连，不能跳出自我做客观公正与己无关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狭隘经验式思维。固着于现在和过去的有限经历当中，既不能对过去进行反思，又不能通过运用想像力对未来作出预测。

6，选择性记忆。只记得和“仇恨”有关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场景，而忘记其它成分。

7，刻板反应。一切被归入“敌人”类的人和事物永远会本能地引起强烈的仇恨，没有灵活、从容对待的余地。

对照一下这份清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位大胡子鼻祖，想起他那一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教唆。不管涂上多少理论、学说、科学的油彩，也遮掩不住其你死我活、敌我二分、非黑即白的“初级原始思维”的本色。

请一定注意：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原本没有这种东西。儒释道墨，甚至最严酷的法家，也没有幼稚低劣到这种地步。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初级原始思维”的事例，那些以道德杀人、以理杀人的事例即是。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初级原始思维地基之上，堂而皇之，成体系并且自称“科学”的大套理论！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一个半世纪以前西方极左派们的水准。他们实在是蠢透了，简直无可理喻。当今中国的极左派们之不可理喻正是祖传的。我们中国人原本没有那么蠢——我们从来没有过奴隶制，我们原本不可能干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类蠢到远低于普通百姓常识水平的大蠢事——哪个老百姓的常识会相信亩产十几万斤粮？说到底，是近代以来，我们追求富国强兵、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却没找对样板。好的没学，偏偏把最坏的东西学来了，才会有了那个完全是人为建立的，由黑五类的悲惨遭遇所集中体现的，20 世纪的新奴隶制。甚至，比奴隶制还坏，是新种姓制，现代极权政体下的种姓制，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空前残忍、极其荒唐，全民赤贫（一小撮特权阶级除外）、自由等于零的超级专制。把它的根源扯到中华文明头上，是一桩大冤案。中华文明当中当然也有最坏的东西，那就是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那也比当代自西方输入的极权奴隶制好过一千倍！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前述初级原始思维就是和极权主义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能够有效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法治和宪政下的民主）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支持。至于什么是公民文化，请看另一部好书，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

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公民文化一定不允许煽邪火，即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立和斗争，一定不能搞黑白二分、善恶是非敌我截然对立那一套。相反，一定要牢牢树立起普适人权的核心观念。只要是人，不是阿猫阿狗，不是桌椅板凳，不论阶级出身、性别年龄、贫富强弱、智愚贤不肖，哪怕他是个白痴，也必须享有宪法载明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人格尊严，身体、财产和生命安全，思想观点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自由。就连“十恶不赦”的罪犯，除去依照公平正义的法律审判限制其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基本权利。普适人权的意思是，基本自由权利适用于每一人，绝无例外；当然，更是绝对不允许把“人”区分为敌我，什么“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公民文化强调“恕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恨罪行，不恨罪人”，反对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别人，就是不审判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极权主义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这段空前惨痛的历史，不是单单靠道德审判就能够清算的。极权主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但是，我们仍然要“恨罪行不恨罪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更要认识到，极权主义的罪行是集体犯罪。尽管责任有大小，但是，除了像王佩英、林昭这样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不是指她们的一切言行，是指她们的精神），应负的责任我们人人有份！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曾经区分过四种责任：1，确有违法行为的人应负刑事责任；2，帮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的人负政治责任；3，听任罪行发生的人负道义责任；4，一切没有尽到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人负抽象责任。按照这一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人，责任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即便是身为“黑五类”，我们仍然不妨反躬自省：我们没有打骂、侮辱、迫害过其他人(犯刑事罪)吗？我们没有追随和支持过那个坏制度（帮助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吗？我们没有“听任（默认）罪行发生”

吗？我们曾经像王佩英、林昭那样挺身反抗过吗？我们尽到了“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了吗？进而，假定我们不是“黑五类”，而是“红五类”，在那种恐怖的制度之下，我们真的能够保持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仁慈和良知，如焦国标所说，“扎紧我们的篱笆”，或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善尽“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吗？

我想，仔细反思过自己以上的种种责任之后，我们的邪火一定会少得多吧。

补白：遇罗克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转达给家人，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临刑的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年仅 27 岁。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不予录取，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我们从初通人事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佩英不朽　　郭宇宽

1959 年初的一天，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的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时，一

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小孩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有些人借此整人，“狠挖思想根源”。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当时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她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此事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以干部身份被安排当清洁工，显然这是一种政治打击。

1961 年，王佩英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那时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不像后来文革时期那么浓厚，买毛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儿子张大中记得，母亲刚买来这尊像之后还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在 1959 年单位办的庆祝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会上，她不称刘主席，而称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在家里，王佩英有时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声阅读。

大约是 1962 年，大饥荒之后，王佩英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把毛视为恩人转变到直接批评。她公开表示，刘少奇是对的。“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1963 年 3 月，单位用车把王佩英送到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她的档案中记载，1965 年以来，王佩英“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 13 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甚至激烈到去天安门广场和灵境胡同散发传单。灵境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她大概此时还寄希望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1965 年 4 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

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

1965 年 7 月，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不久，王佩英被单位强制送进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之后转至回龙观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也很少有人敢去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很动感情，回忆了当年地下党在开封战斗的很多情景。许多细节曾洁光都忘了，王佩英却记得一清二楚。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这个阶段王佩英有很多言论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变质了。“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层政治的丑陋之后，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却从来没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在王佩英坚决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那段时间，王佩英经常给儿子大江讲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国王临死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折，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折断了。老国王又拿出来一把箭，让他们折。他们用尽力气，谁也折不断。大江对政治毫不关心，但对朋友很讲义气。想来母亲是希望大江日后能照拂兄弟妹妹。文革期间，作为

黑五类子女，王佩英的孩子们的确没有受过红卫兵多少欺负。

最小的孩子女儿张可心记得，1965 年前后，春夏之交的一天，晚饭后，妈妈专门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别的孩子都没带。走到大约是军事博物馆附近，母亲搂着开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那几年，大中每隔一段时间都在周末去探望母亲。每次去都带大约 1 元钱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母亲从不和他谈自己政治观点，只问候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有一次大中去医院要走的时候，一个好像是工友的中年妇女拦住他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们的小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能看到你们。"1967 年夏天，兄妹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三个孩子，扎着红领巾，在前排，笑容纯真灿烂；身后的四个哥哥，表情都是严肃的。

有一次，大中去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之后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导致反映迟缓、口角流涎，但她的基本信念始终非常清晰。1965 年 12 月 20 日的病历中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至 7 月，北京已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

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 年 6 月 6 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王佩英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

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中正在家中，母亲单位的王世彦书记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大中收拾好这几样东西，却不敢去送，叫小妹可心送去。

被从精神病院押回单位的王佩英，开始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关押的地方离家不远，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

这只有几秒钟的一幕，永远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房间里，对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儿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地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说话，更不让人喊出口号来。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难友回忆，王佩英当时“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有一次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许多菜叶烂得粘糊糊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

歇工时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她劳动她就加倍地劳动，但要逼她认罪，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王佩英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当被看押去食堂的时候，她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 年 9 月 9 日，9 月 30 日，10 月 4 日，王佩英甚至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 9 月 29 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

王佩英在食堂非常镇静，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造反派急忙七手八脚堵住她的嘴，把她拖回去，然后饿饭，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难友们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是 10 月 4 日，她已不可能慢条斯理讲话，而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那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与这个癫狂的社会完全彻底地分庭抗礼。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劝她，不要鸡蛋和石头碰了。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王佩英哭了。审讯人

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时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可擦干了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在赤裸裸地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969 年 11 月，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他所住的小屋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一号这座专为他修建的行宫式别墅里。这是在饿殍遍野的 1960 年为他建造。

1969 年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革命群众强迫被批斗者以“喷气式”的方式低头认罪，另有人扮演“人民群众”，歇斯底里地在下面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区别于传统专制之处在于，它要提供给群众一种虚妄的参与感。这样一方面人民被像木偶一样操纵，另一方面很多人却能找到一种主人翁一样的自豪感。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大家喊口号的时候，她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一开始，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到后来干脆批斗时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她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有一次，在 57 中操场，举行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三个人才

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她一个脚上的鞋袜都掉了。

王佩英的大儿媳杨永茹的一个姑姑和姑父是海淀四季青大队人，因出身不好，经常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批斗王佩英的批斗会。结婚前后，杨永茹曾向家里人提起婆婆王佩英，他们立刻就想起来“那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王佩英的力气当然不可能有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大，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是对红色恐怖的彻底蔑视。

1970 年 1 月 18 日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 年 1 月 22 日得到批复，文革期间的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 年 1 月 27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 月 27 日这一天，离除夕夜只有 9 天了，正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光。全北京，包括中小学生，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工体是 1959 年全国总工会建设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容纳的观众最多。第一届全运会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刘少奇就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它的主要功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囚禁的。

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到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台上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异教徒，是魔鬼，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也是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可能想不到，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

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经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丈夫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自己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地下党战友胡俊三等当年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牺牲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 49 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时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事业，到头来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吗？！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上嚼子或拿抹布堵嘴太明显，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死前的几句话都承受不了，所以他们挖空心思用一根细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陷进肉里的绳子。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被发现已经勒死了。

在那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她为自己所看见和所相信的，行动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王佩英的儿女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但他们还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补白：赵某家住在一条老街上。老街都是木板房，邻居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板壁缝隙大的连手指都伸得进去。为避免不雅场面被邻居偷窥，各家就用旧报纸糊住板壁。文革开始后，各家各户为表现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还竞相在板壁上贴满大大小小的伟大领袖画像。居委会挨家挨户统计，开展检查评比。一天，下着大雨，赵某

从外面归来，脱下湿漉漉沉甸甸的蓑衣挂到板壁上。由于钉子太小，挂不住，于是他便找来一根三寸长钉，往木板壁上钉。没想到，钉子穿透到邻家，不偏不歪，从那家贴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头部穿了出去。邻居素与赵家有隙，立马报案。人保组办案人员把赵某叫到邻居家一看，赵当场吓尿，瘫坐地下，一个劲儿地哭天抢地。赵某解放前曾任过伪职，镇反时因有立功表现，没有杀掉。现在旧帐新帐一起算，被以反革命罪判十二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赵没有熬到“天亮”，病死在劳改农场。农场叫人用几块薄板装一下，拉到后山埋了。家人来收拾遗物时，被告之：“罪有应得，给国家省了 24 斤粮，支援亚非拉。”不过还好，农场没向其家人索要棺材钱。

我的大学　　徐化扬

1956 年，17 岁，我考进了北京邮电学院，分在无线电通讯工程系，专业是通讯与广播电视。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台。日本的一个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带来一部小功率电视发射机，架设在西直门城楼上，有效范围几公里。学院把教研室的电视机（苏联造）搬进大教室，让大家看电视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相声，然后就实况转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计，当时全北京市的电视接收机不会超过二百台。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公众电视信号，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观众。

一年级时政治环境很宽松，大家对政治也不很关心，还没有产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栏上贴出一份通知：今晚 7 时，在学生食堂，院长孟贵民同志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自由参加。反正没事，我拎上一只马扎前往。会场里稀稀拉拉，连通常全院开会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孟贵民先生参加了那次国务会议。这么重要的传达，这样可以自由参加的会，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次。这足以表明那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宽松。我想，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整风时也不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右派。我有个看法，1954 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结构和体制虽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气神儿还在。1957 年后就不同了。1957，是划时代的。我们 1956 级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多少有一点自由精神的旧大学的末代大学生。我常对我的学弟们说，听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可以自由参加，你享受过这个待遇吗？

反右是我亲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57 年底 58 年初，开始了定右派运动，即划定右派分子并作出处理，全面停课。当时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级的革命家强迫给右派学生套上白袖章，黑字书写外号“大鲨鱼”、“白眼狼”等。食堂门口贴出 “我们工人不为反党右派分子做饭”的通知。有的右派就当没看见，照样若无其事进食堂。有的右派犟劲上来了，拿着餐具去院部要饭吃。

我们班划了一个右派分子——沈联志，重庆人，已经因病休学。对沈联志做的是缺席审判，罪状似乎是早就拟定好了，安排积极分子一人揭发一条，然后证人附议签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他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有同学看报纸，笑谈章伯钧荒唐，搞什么政治设计院，沈联志接过话茬儿，“搞一个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学同情沈联志，公开认为沈不够右派。大老蔡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来痛哭流涕作检讨，称自己是穷孩子丧失了阶级立场。幸亏他出身好，否则很可能就要开除团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几十年来，沈联志与我们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向党交心运动起初名曰“民主会”，小班三十来人轮流敞开思想，然后互相提意见。开头气氛还不错。我主要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个人主义等等。同学们给我提意见，称我白专道路、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班会让我做检讨，继续交心。几天后，我以日记的

形式交出了一份检讨，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在哪儿跌倒了我自己爬起来。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场，则必哭无疑；如果谁抚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厉害，在亲人面前撒娇。这更不得了，认为我是拒绝大家帮助。

大班的学生党支部成员 A，认为我的要害是回避立场问题，必须接受批判。民主会开始变味了。同学 B 偷看了我的日记，于是 A 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学将近五年时间的全部日记和手抄的诗集，唯独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读后感言剪掉了，其余一字不缺，全部上缴。

我赤诚的交心没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灭顶之灾，还带得几位也写日记的同学非将日记交出不可，虽然 A 一再宣称交心是自觉自愿的。同学张有顺严厉地批评我带了个坏头，“你坚决不交，他们还有啥办法吗？”

日记和诗集都还给我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对我的批判会火力更猛了，措辞最尖锐的是班长蔡富山。他说我虚伪、态度恶劣、不近人情、说谎骗人。还有，说我不爱帮助别人，只和吴玉奎等少数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其余时间大多独往独来。女同学来请教问题，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给她们看，一言不发，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还有一次，我病了，两位女同学特地来宿舍看我，我竟然装睡着。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学很难堪。还有，走路仰着脸，鼻孔朝天。

党支部成员们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该读《鲁迅全集》，更不该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瞧这书名就不好，你就批评不得？谁损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气，反驳道：“书是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翻译的，难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谈话，告诫我：最好还是不要读鲁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书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扬的书。要认真读周扬同志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周扬同志说的非常深刻，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你好好认识一下。”

1957 年，短短一年时间，我的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叫变异，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这个变化是带有本质性的，即异化。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工具。

蔡富山也是个异化的典型。蔡的父亲是老八路，抗战时期下落不明，可能牺牲了。母亲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经讨过饭。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时候讨饭落下的毛病。他的继父也是高干，某军工厂厂长。蔡富山是个极端热情、极端直率、极端认真的人。二年级他当了一年班长，到三年级说什么也不干了。团支部开会帮助他提高认识，党支部找他谈话，但他蠢牛撞南墙，不回头。支部说，你是个苦出身，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你应该负起责任来。蔡说，我是个讨饭娃，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读书，为人民服务。

要读书，在当时还无可厚非，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给扯进去。他竟然说："我从小讨饭，基础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读书，你看徐化扬同学读了多少书！我要向他学习！"他发了疯似地看书学习，当我的面扬言："今后你看什么书我看什么书，你看什么电影我看什么电影，你干啥我干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没办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张有顺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名言："你怕啥？多这一条罪状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谈起莎士比亚，我向蔡推荐曹禺翻译的《罗蜜欧和朱丽叶》，说这是几种译本中最好的。他立即进城买了一本，读到得意处，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我着迷读新版《鲁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员的批评，称"鲁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言下之意现在不合时宜了。蔡富山帮我讲话："你不看书还不让别人看？那国家出版'鲁迅'干啥嘞？"

大跃进带来的巨大灾难，已经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北京是"首善之区"，灾难也已初见端倪，物资紧张。学校楼前广场，花园撤了，改种蔬菜，用自来水浇地。北京展览馆附近每株行道树下一圈土，以前种的是草，现在改种胡萝卜——胡萝卜缨子也很好看。彭真作报告，

劝说大家不要见天排队。他讽刺一个老太太，见排队就跟上，到跟前儿才知道是买《红旗》杂志。

张有顺是河南南阳人，1959 年暑假，来京读书 3 年后第一次回乡。开学返校后，学院正开展反右倾教育，让大家畅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张有顺不想说假话，他的发言只讲了一件事、一句话：水库修得好，社会主义好。他私下里却跟我说："好他老头鸟！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俩鸡蛋。过去咱那里农村再穷，到谁家做客，没说拿不出鸡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没见着一片。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俺那里农民说，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咱不要。"

所谓毕业鉴定的预备工作，就是在学习小组会上各人自述历史和家庭情况，要忠诚老实，不得有任何隐瞒。我们的小组长林茂，虽一向很革命，很得势，可是这此却翻了船。

每个人依次发言，不做记录。个人讲完之后，大家可以提问或帮助你提高认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从来不隐瞒，这次再重复一遍，并再表示一次"与父亲划清界限"。在出身问题上，林茂过去不止一次向我发难，批判我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这次他倒没有狠咬我，不知什么缘故。

刘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林茂应用阶级分析理论（富裕中农是两面派，脚踏两只船，有剥削行为），向刘玉昆发难。刘玉昆决不认账，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论和终极真理。

林茂最后发言。原来他不是贫下中农，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在受管制中病逝，长兄是县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全县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瞒着同学，也瞒着组织，如今才不得不说。

于是，刘玉昆带头，我和全组同学紧跟，一起向这个无耻之尤开火。平时受林茂白眼、乌眼的同学太多。刘玉昆的言辞很尖锐，涨红了脸，指着鼻子骂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寄生虫，喝劳动人民鲜血长大的野心狼，两面派，伪装革命，暗藏的双料反革命分子子弟，

我富裕中农是劳动人民，你打击我劳动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话语没有刘玉昆尖锐，但很刻薄。我指责他是假革命，企图蒙混过关，命令他必须和他父亲、哥哥划清界限。多数人和我的意见一致，指责他不老实，不相信组织。

林茂没通过毕业鉴定的第一轮工作，哭了。活该！这小王八蛋不是设法取得群众谅解，而是向党支部状告刘玉昆报复。支部找刘玉昆谈话，刘玉昆不让步："这是林茂搞阶级报复！"

无耻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难岁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坚信，现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过得不错，一定很得势，因为他下手狠，因为他一生决不会说一句真话，因为执政者太喜爱谎言，太喜爱伪装了。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会伪装成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从林茂身上，我得出一个结论：黑五类子弟一旦沦为野兽，比极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险。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没有回过故乡，父亲怎么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无所知。

父亲抗战前夕毕业于一所著名的中专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一生在水利部门工作，最低一级，八级工程师，科长。解放前，他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交待清楚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过。父亲沉默寡言，但相信共产党，积极要求进步，与地委农工部领导、党员局长相处都不错。1957年四五月间，他被安排进了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非党员进党校学习，那就意味着是发展对象，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离结业不到一个月，学习终止，学员返回原单位，参加反右斗争。不料，父亲从一名准左派跌进右派队伍。

父亲既没写大字报，也没参加鸣放，由于汛期防汛任务重，从党校回来也没参加"反右斗争"，就上圩区第一线去了。仅根据揭发出来的平时闲谈的片言只语，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级，成为九级工程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倡导的淮北水网化，破坏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盐碱化程度，不可行。这就是父亲的右派言论之一。曾的

“壮举”是 1950 年代中期的事，1960 年代初已被铁定为彻底失败。曾霸王此时已经被撤职，发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过几次，挂牌晒过太阳，没吃什么大苦头，算是有惊无险。然而惊魂未定之际，批判他“老国民党员、老右派”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又出现一条大标语：“热烈欢送革命干部徐某某同志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父亲被下放农村。最高指示，干部下放劳动，老弱病残者除外，可父亲当年已经 58 岁。

文革后期，我与本单位一位老干部闲聊。谈及父亲 1957 年左右命运之转换系于一线，实在冤枉，且祸及我终生，这位老干部说：“照你这么说，你父亲肯定是右派。那时安徽省委有规定，谁反对曾希圣的双改——改水、改种，谁就是右派。没商量。”

前几年在网上读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几份小右派档案》一文，证实了这位老干部的话。茆说：“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

呜呼，无可奈何矣！父亲已于 1998 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的妹妹。

1960 年 10 月，在大饥馑的关头，我大学毕业，去了武汉，长航局电讯修理室。年 21 岁。

岁末，临近子夜时分，我踱向武汉关，迈上江堤。始终喧闹不休的武汉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静下来。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车辆，也绝少行人。“惟见长江水，无语东流。”

武汉关浑厚的钟声敲响了，1961 年来了。

1961 年 8 月，突然把我调出武汉，调去九江，建筑材料工业部九江玻璃纤维混凝土造船试验工厂技工学校。我很高兴离开武汉，来了 10 个月，没有结识一个朋友。长航电信科一位副科长通知我一声就完了，至多 3 分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也不问。就这么走了。似乎新

天地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

到九江报到，我很正常，“船厂”的人却觉得太不正常了，统统大吃一惊：船厂和学校已经下马了，没一个人上班，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调进来？

办公室的人找来副校长还是副教导主任，三十多岁，人很和气。他摇头，什么也不问，给我找个房间住下，搬来一张床，完了。房间在教学楼办公室，套间，里间住着大连海运学院船舶系毕业的两位大学生。我住外间，没有桌子，灯——有灯口，没灯泡。

在九江两个月没开过一次会，没上过一天班，等待命运的裁决。我已经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机要部门，调到一个行将烟消云散的单位。毕业才十个月，还没有转正即调动工作，似乎是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将我赶出电讯部门，必定有什么我不知晓的原因。我的毕业鉴定尽管不那么令人放心，总算还好，也没给我什么处分。那么，唯一的解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一打三反，办了我的学习班。业余学习，不关押，不武斗，照常上班，行动自由。一天，党委办公室一位干部，不是办班成员，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找到我，很关切地悄悄告诉我：“你没多大问题，就是给你的大学毕业鉴定——‘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没别的什么事。这个问题你不要辩解、交待，等他们抛档案好了！”

去交心运动已十二年了，我执意忘却，也几乎忘却了，然而档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却。果然，单位机关开了我的批判会（次于批斗会）。一位工人发言说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铁托，在 56 年大批修正主义的时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铁托在普拉发表的演说”。他批判说：“你好个一口气！爱是有阶级性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修正主义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党办那位干部已打了招呼，我还是感到极度震惊。这位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编造不出这条罪证。显然是我日记里的话。十二年

前交给了 A 同志，A 同志摘录，塞进了档案。若不是这位工人此时揭发，我哪里还记得日记里有这句话，哪里还记得铁托在普拉发表过演说，哪里还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这个地方！

铁托的演说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是配合学习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发表的反面教材。铁托演说了什么，编辑部文章写的什么，如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在那场批判会上，出乎意外，有人对我的检查交待进行批判，说我继续放毒。我在交待中说，感谢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还公费医疗没让我花一分钱治好了我的肺结核。现在一月工资 50 多元，我很满足。这位批判者批判说："你肺结核不好的话，就反党？你 50 多块钱满足了，对党就有感情，那我们大多数人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就该死、就该反党吗？"

如今，我档案中的"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之类内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实，不应该清理，应该公开。见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类同胞。销毁档案不是在保护我，而是在保护那些嗜血的打手。因为那虽是我的号衣，却更是我另一类同胞的确切罪证和不朽的功劳簿。应珍藏，警后世。

2009 年 4 月 26 日，七十周岁时，我赋诗一首：

死灰复燃无有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身穿号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写旧诗。
拿云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壮嗟也迟。
白首闲话应更好，晚风落日笑催卮。

北京李先生来信：发来的关于黑五类的数期文章，均已收到，且拜读了。这件工作极有意义。我也想过搞点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想说，毛没有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他就让人民互相残杀，永远生活在不安定之中；暂时的安定，就成了幸福，就要感谢领袖。整人和被整，

都需要集中精力，领袖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就永远能大位稳固。这个做法十分无耻。是罪恶。

右派教师岁月　　顾延龄

现在教师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时代，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假期里总是安排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右派教师更是如此，从 1957 年到 1977 年的 20 个暑假，我都在农村劳动，少则半月，多达一月。

1960 年暑假，我跟随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庙农场割早稻，种晚稻，时间一个月。我是“跟”学生劳动，而不是“带”学生劳动。学生由班主任带领，右派老师被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只能叫“跟”学生劳动。

一个月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实在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蚂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声不响地叮在你的脚上吸血。吸得滚园，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里。如果刚刚叮上，要想把它拿掉还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脚上拉不动。一双脚整天浸泡在掺有猪牛粪的水田里，被蚂蝗叮过的疮疤痒得不得了，一抓就烂，苦不堪言。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仓库里，学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夹背也照样呼噜大睡。我就没这福气。腰酸腿软，浑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别喜欢我，老在耳边嗡嗡叫，即使点了数支蚊香(蚊香约一米多长，由锯木粉拌雄黄塞进直径约 1.5 厘米的纸圈里压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两手抓个不停。蚂蝗叮过的红疤被抓破，溃烂的双脚更烂了。实在太睏了，才不知酸软疼痛，忘却一切悲伤，深睡几个小时。睡梦中还恶梦、冷汗不止，实际上已经感染了肺结核病，但我浑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颊潮红有微热，这是肺结核发病的征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动，肚子老有饥饿感。我必须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

让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饭量明显比学生少。

一个月的农忙劳动，饭基本能吃饱，不要粮票，下饭菜一般多是青莱、芋艿、罗卜、咸菜等大锅菜。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劳动结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说晚上会餐，有肉吃了，健康状况极差又担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顿肉吃。

会餐前，一位学生干部对我说："今夜会餐你自己到农场员工食堂买饭吃！"我顿时惊呆了！劳动了一个月，最后连会餐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沸腾了！就算是劳改犯，烈日下一个月田间劳动下来，给一块肉吃也不为过。就算右派是敌人，我总还在讲台上上课，难道与学生会一次餐就混淆敌我了？耻辱！羞辱！这是对我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这件事永远留在我记忆中，一辈子忘不了。

那天最后的晚餐，在农场的食堂里，农场干部、员工、学生、老师吆三喝四，杯盘狼藉，唯我一人从食堂窗口买了三分钱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钵头蒸饭，站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在他们眼里，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这是对右派的惩罚。我教书，双倍的工作量，却只给我一半工资。我劳动，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却不许我吃。原来我是一头牛，只配吃草，干重活！牛干活虽重，还有主人爱惜它。我干了两个人的活，甚至超过两个，有谁怜惜我呢？

大王庙农场劳动结束时，离开学还有近十天。我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囊中羞涩，立即赶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虽怀疑生了肺结核，可为了不使家人担心，我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母亲看见我那又黑又烂的双脚，心里止不住的哀叹伤心。我宽慰母亲说："在家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一转眼秋收到了，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去嵊州中爱公社上杨大队收割晚稻。三人一组，与我同组的是叶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块稻田。三人事先也没分工，一直是他们两位割稻，我一个人用脚踏打稻机打稻。那打稻机用力小一点滚筒就不转。尽管叶李两位割稻速度不快，

我一人既要接两个稻把，然后紧握稻把在滚筒上翻动，同时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农忙结束，回校开总结大会，学校书记兼校长诸丹忱热情赞扬了老师们积极投入秋收劳动。突然，他板起面孔，话题一转，开始训斥我："顾延龄这次劳动不认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懒洋洋，稻谷打得不干净，没有做到颗粒还家。"我一个人踏，叶李两个人割，等于是一人干了两人的活，最后还是落了个出勤不出力！我始终是学校的反面教材，随时拉我做靶子，杀鸡给猴看。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的肺结核病被确诊。医生说应当休息两三个月。我不敢，我不能丢掉"教书"这个饭碗，照样每周上 24 节课，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无论精神多差，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万幸的是，我从没有挂过盐水，只自费买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却奇迹般地钙化了。直到 70 年代末，我 40 多岁了，有了公费医疗，也没有挂过盐水。90 年代初快退休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挂盐水。

从 1958 年开始，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种田，秋季割晚稻停课下乡劳动外，还决定在郊区方田山开垦荒地（60 多亩）。方田山原本长满小松树，为了种粮，毁林开荒。各班轮流去开荒，每星期劳动半天。

那时我任高二四个班和初二四个班的数学，每周 24 节课。下乡劳动，我要跟高二学生；半天的开荒，我要跟初二学生。

开荒出发的路上，我拿一把锄头，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许多老师不敢同我接触，怕被指控立场不稳，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引火烧身。所以我从不与带队的班主任讲话。

我的这群初二学生，天真，好问，好奇。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冷暖，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他们判断一个老师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课学生能不能听懂，对同学是否一视同仁为标准的。

劳动时，一些男同学喜欢到我旁边来，七嘴八舌对我讲一些他们

感兴趣的事。我几乎不插嘴，不发表看法，只在他们问我时才应答一下。小孩子劳动很卖力，但也难以持久，经常盼着休息时间到或收工回家。他们问我：“顾老师，现在几点了？”我说：“我没有手表。”起初他们难以理解，老师怎么会没有手表？后来他们改问：“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了？”我根据太阳光线的位置，根据劳动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约几点几分。学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问。一对，基本准确。学生惊奇、开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能人。从此，他们有事无事更喜欢到我旁边来。

对教师来说，手表是必需品。当时一块普通手表人民币 100 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教师两个月的工资。我这个右派老师每月只有 25 元生活费，给父母 10 元，自己剩下 15 元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时就是 1 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买。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堂课 45 分钟，我只能凭感觉，凭教课内容，估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我从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学任务，这也是学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 1957 年大学毕业，到 1964 年底才穷尽积蓄，花 91 元买了一块苏联宝石牌手表。这块手表是我家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如今这块笨重的宝石牌手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躺在抽屉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后，嵊州一中退休老师倪和钦先生对我讲：“当年我们学生称你顾老师为三个 25，即年龄 25，工资 25，上课 25（实为 24 节课／周）。”他又说：“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课上得好。劳动、休息时喜欢到你旁边，没有手表也能准确估算时间。学校领导得知你很受学生尊重，就召集班干部教育我们，说对右派老师要提高警惕，保持距离。” 嵊州剡山小学退休老师马木芳先生也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几个同学非常喜欢与你接近，班团干部就找与你亲近的同学个别谈话，要我们学生揭发顾延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可在那个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学生尊重、喜欢右派老师就是错误，就要被找去谈话，被要求与他们划清界线，揭发右派反党言论。

毛泽东执政 27 年，为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为的阶级斗争。未成年的学生也随时被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孩子纯洁的心田里播种仇恨，制造恐怖。

1960 年国庆节后，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停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叶是嵊县的特产，茶农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县委哪个人头脑发昏瞎指挥，可是全校照样召开了批判“秋天无茶论”的大会。

出发那天清早，我随高二丁班学生自背铺盖动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来到嵊县与绍兴交界的北山横路坑。晚餐是毛笋咸菜粥，第一次吃感觉还好。以后天天吃，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饥。

每天上下午，我跟随十多个学生在茶山里转来转去。茶蓬光秃秃的，那有什么茶叶！可是学校领导还要听从上级指示批判“无茶论”，真是可悲。

采茶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么办？聪明的学生早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试验茶园，里面一排排茶蓬，长得郁郁葱葱。似乎没有看见管理员，学生们喜出望外，就大胆去偷摘。当时学生没有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他们知道我是随班监督劳动的右派教师，任何事都由他们自己作主，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学生嘻嘻嚷嚷进园不久，就听见一声吆喝：“谁叫你们来偷的？”学生们被赶到一旁，把我夹在当中。那位管理员大声问：“谁是老师？”没有人回应，我也闷声不敢响。当时我年轻，衣着寒酸，个子不高，又不戴手表，完全不像一个老师。管理员继续问：“谁是老师？”这时有几个学生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那位管理员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扫到一位戴眼镜、长得有模有样的童姓同学，说：“你是老师？”瞬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位管理员无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师，就这样平息了。

照理说身为老师的我，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可我没有这个勇

气。很明显，一旦承认，后果不堪设想。唆使学生偷茶，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轻则开批判大会，重则送去劳教，甚至判刑。几年前一次会议，碰到这位童同学。谈起他被误为老师“偷茶”往事，我们都笑了。他说：“我戴了一副眼镜，就把我当教师了！”感谢这群天真可爱的学生，他们保护了我，使我免遭一劫。

补白：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有这样一个情节。文革期间，某部一位老少配的师长，其妻寂寞难守，勾引勤务兵与之偷情。为控制对方，师长妻设下陷阱，让勤务兵无意间打破伟大领袖的石膏座像，以此要挟对方死心塌地跟自己苟且。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与之异曲同工。且说某沿海小镇有个漂亮姑娘叫邱翠花，十八岁那年嫁给一个大她十六岁的港客。结婚三天，夫君返港。此后丈夫一年回来一次，来去匆匆。文革开始后，因有海外关系，怕红卫兵抄家找茬，邱翠花主动与一造反派小头目勾搭。小头目不时上门，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行偷情之实。港客有所耳闻，传言要休翠花。翠花急了，眼看自己的赴港签证就要批下来了，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断送前程，于是想与小头目断绝关系。小头目哪里肯依？万般苦恼，翠花心生一计。这天中午，小头目又潜入翠花家，欲求云雨之欢。翠花说：“我要考验你，看你是不是死心塌地跟我好。”小头目一阵指天发誓。翠花指着厅堂案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斩钉截铁地说：“把它砸了！”欲火中烧的小头目，此时哪顾得许多，操起一根木棒就对座像横扫。座像摔下供桌，粉身碎骨。几乎就在座像落地的同时，她冲着大门外疾呼：“快来呀，他砸毛主席像啦！”手里拿着木棒皮带四处游荡的红卫兵闻声而至，逮了个现行。小头目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但邱 X 花的一箭双雕之计也未得逞。港客还是休了她，另娶了一个更年轻、漂亮大陆女。

我的母亲　　朱国琳

我的母亲叫年静甫，排行老二，姊妹三人，陕西汉中人，据说是年羹尧的后裔。母亲和大姨上学时，大姨的老师是地下共产党，把大姨及班上大部分学生偷偷带去延安。大姨把在延安抗大的照片寄给还在上学的母亲。她穿着灰军装，戴着灰军帽，腰上扎着牛皮带，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手枪，很威风。母亲把姐姐的照片给同学们炫耀，后来校方追查共产党活动，才赶忙收起来。

母亲长得很漂亮，后来和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汉中）当队长的父亲结了婚。据说母亲很羡慕父亲穿着马刺走路的样子，又说是母亲在回家的路上被巡警刁难，恰巧父亲路过，为母亲解了危。

解放后我一直没再见到父亲，也不知他在那，更不知他的死活。有时见母亲偷偷包点莫合烟和裤衩之类的东西托人带走，我就想父亲大概没死。

母亲个子高，嘴长得比较大。每当坐在母亲对面，望着她把一团十分粗糙的食物放进嘴巴的时候，我就想知道这些粗糙的东西在经过一个坐过飞机，穿过旗袍，做过太太，细皮嫩肉的母亲的喉管时，母亲的心理是怎样的。

上小学时，我见别的孩子有钢笔，就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只。母亲一声不吭，嘴抿得紧紧地，泪水从眼眶里滚出来。我不懂事地继续央求，邻居阿姨一把把我拉开，对我说，傻孩子，你妈妈哪有钱呀。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母亲整夜整夜偷着给人家做衣服，很少睡觉。做一条裤子才 8 毛钱。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做私活的，也不允许凭个人劳动挣钱糊口。可是，母亲一个女人要养活五个孩子呀。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央求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我家在草湖，位于疏勒、疏附和阿克陶三县交界处，解放前叫马家花园，原是一片长满芦苇、红柳、骆驼刺等多种野生植物的原始荒

原，东西长约二十公里，南北宽约十五公里。塔孜洪河和罕南里克河将草湖分割成三块，分别是小草湖、大草湖和红柳戈壁。民国初期，喀什提督马福兴在小草湖为他建造了一座花园式的豪华公馆，占地百亩，当地人称为马家花园。1924 年，新疆都督令马绍武清除马福兴，马家花园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解放后，马家花园成为兵团一个团场的驻地。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有七十多里，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很难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约上几个家住草湖的同学，星期六放学吃完晚饭后结伴往家走，双脚在没脚脖的尘土中移动着。没有星光的夜晚，大家一边走一边唱歌，以消除心中对黑暗的恐惧，每次到家都是半夜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那么艰难地回一次家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看一下艰辛的母亲，也许是为了回家能吃一顿饭。

六十年代，吃饭可能是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家中没有吃的，最好的食品是公家配给的一种叫代淀粉的东西。先把玉米芯碾成粉，然后将其发酵，然后再过滤、烘干、碾成粉，是谓代淀粉。这种粉可以做成食品，可以吃，但不好吃。它是优点是可以饱肚子，缺点是吃完后肚子发胀，硬硬的，鼓鼓的，更要命的是大便十分困难。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让我多吃几个这种代淀粉馍馍。母亲说我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吃好点。其实我知道，即便是这种东西也是定量配给的，我吃了，母亲就没得吃的了。小时候不懂事，为了自己的嘴巴，而忘了生我养我的母亲。现在长大了，是该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有一次回家是为了问如何在初中升高中的履历表中填写父亲一栏的内容。母亲坐在那一声不吭，好像进入了深深的回忆，又好像什么也没想，一动不动。我央求母亲说点什么，结果她什么也没说。最后我凭记忆和想象，自作主张填写了四个字——大官，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吃尽了苦头。在批斗母亲的风头上，我回了一次家，为的是想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破烂小屋门口的炉灶被踢得稀烂，我以为母亲搬家了。趴在门缝中往小屋里望去，依稀可以看见床和被褥。我很慌，也很急，开始无目标地寻找母亲。突然，我看

见几个人提着鞭子，赶着一长串“牛鬼蛇神”过来了。我从头到尾仔细看去，发现走在最后面走不动的就是我那可爱又可怜的母亲。一个拿鞭子的朝我母亲屁股上踢了一脚，母亲痛苦地朝前倒下。我冲了上去，可是一个人拉住了我。我回头一看，并不认识他。等我转过身时，那几个拿鞭子的和那一串牛鬼蛇神全不见了。

天渐黑了，我敲了一个阿姨的门。她很害怕的样子，说了声不知道，就赶忙把门关死了。我又敲开一个叔叔的门，他也惊慌地说不知道，忙把门关死。

天黑得像一口锅扣在大地上。我一个门一个门地敲，谁也不给开门。一个门内忽然伸出一只手把我拽进了进去，像蚊子叫一样说了声“你妈在狗屋里”，随即把我推出门外。我没有时间思考，飞一般地向狗屋冲去。狗屋原是一个养军犬的地方。我一脚踢开狗屋门，十几双惊慌的眼睛望着我，小声说：“你妈回去了。”我急忙跑回那破烂的小屋，一丝灯光从黑帘中透出。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母亲惊慌地问是谁。当确信是自己的儿子时，她开门将我一把拉进去。母亲告诉我，未成年的小妹已经藏起来了。几年后一个阿姨告诉我，说这期间母亲曾两次触电自杀未遂。

母亲的后半生也有过几次微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两只兔子，下了一窝小崽。小兔子长大一点时，母亲决定杀一只叫孩子们尝点肉味。两个弟弟负责这件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两个弟弟不太积极，因为兔子主要是他俩拔草喂大的。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次肉，他俩无可奈何地在兔子头上敲了一下，把兔子敲死，然后挂在树杈上开始剥皮。他们先把兔子嘴边的皮割开，然后是头，脖子，最后紧紧拉住兔子头上的皮毛，使劲往下一拽，整个兔子皮就被脱下来了。就在弟弟把兔子皮从头到尾往下拽的那一瞬间，母亲笑了。这一瞬间，她似乎忘记了贫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我想母亲的微笑起码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自己的孩子今天有肉吃了；二是两个小家伙长大了，可以干活了，不会饿死了。

我上初中时发表过一篇小散文。大妹妹在未成年时就下地干活

了，放暑假时我去大田看她，她正在摘瓜。兵团是条田化作业，大条田里遍地都是瓜，摘下的瓜堆成小山，香气四溢，蜜蜂飞舞。那天我吃了好多瓜，大开了瓜的眼界。回校后，瓜的香味依然包围着我，于是在作文课上我写了一篇名曰“瓜田小记”的散文。文章不长，但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老师叫我抄好送报社。文章发表后，草湖的好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向母亲祝贺说：“老年，你儿子这么小年纪就发表文章，将来不得了。”母亲大概高兴了好几天。这是母亲的第二次欢喜。

母亲最后一次微笑是在病床上。经过长期批斗，母亲倒下了，任何鞭子也打不起来了，当时我在离家五百公里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再教育不是让你读研读博，而是让你天天干繁重的体力活，滚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进行触及灵魂的劳动改造。有一天，有人跑来说，草湖来电话了。我急忙跑到公社，把电话打到草湖总机。总机说，你们家已没人了，都到毛拉医院去了。我知道毛拉医院就是师部医院，离我这有八百公里。我马不停蹄，坐汽车，坐拖拉机，坐马车，再步行，心急如焚地赶到毛拉。母亲已不省人事，弟妹们在床前一面呼唤一面哭泣。医生把我叫出来说，你母亲没有几天了，准备一下吧。我忍着塌天的悲痛，白天守在病床边，等待奇迹出现，晚上用缝纫机给母亲做老衣。我虽然只跟母亲学了一点缝纫技术，但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母亲穿上儿子亲手做的衣服，尽最后一丝孝道。

人急时总有急时的办法。我们几个孩子首先央求医生给母亲输血，医生说输也没用。我们一再央求，医生最终答应试试。化验结果，我和二弟的血型与母亲的一样，都是 B 型，于是当场各抽了 500CC 给母亲输进去。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母亲睁开眼睛了，看见了自己的骨肉。我和二弟又各抽 500CC 给母亲输上，更大的奇迹出现了，母亲坐起来了，微笑地望着五个孩子。这是母亲最后的笑容，这个笑容太美了，太珍贵了。这是战胜死亡后的微笑，我留下了母亲这个最后的微笑，这是母亲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照片。

医生用肯定的语气高兴地说：“你母亲还可以活半年，你们可以放心地回去工作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五个月以后，也就是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八个年头时，母亲死了。她永远看不见她含辛茹苦养育的孩子了，孩子们再也看不见可爱可敬可怜的母亲了。我们把母亲埋在草湖的沙丘里。我们成了孤儿。我的母亲只活了四十八岁。

补白：刘某是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一家木器厂的老炊事员，孤寡一人住在厂里。这天晚上因暑热难熬，跑到河边公园纳凉。躺到半夜，准备回去，听见牌楼上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叫。他到河边抓几把河泥，向牌楼掷去，想打中几只麻雀，回去炒了吃。第二天一早，一个清洁工看见牌楼上的伟大领袖像上粘着什么东西，便赶忙叫来几个工友。大家仔细一看，吓傻了，伟大领袖满脸污泥。案子立刻报到市革委会，革委会主任拍案而起，下令马上封锁道路，严禁人员过往，强行通过者和传播该事者格抓勿论，同时迅速组成专案组。案子很快真相大白。市革委会在广场上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刘某五花大绑，奄奄一息，被拉上审判台示众，吓得魂不附体，一次次瘫倒。大会当场宣判刘某“恶毒丑化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光辉形象”，实属滔天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本拟判死刑立即执行，后考虑其出身贫民，认罪态度好，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服刑期间，刘某因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崩溃。一天野外劳动时，疯疯癫癫地跑出了警戒线。看押人员抓回来一顿拳打脚踢，当场断气。

作假证　　卫普安

1969 年春天，由于战备的需要，要把我们镇里通往县城的沙石公路修成一条柏油路。为处理路两边合抱粗的垂柳，公社革委会请来县木材公

司的晁中哲给古树作价。晁三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头，与我姑夫是同事。前几年他在我们镇上工作时，经常来我们家。忙完作价工作，天晚了，还起了风，晁中哲就没赶回县里，在我家住了一夜。

中秋节后的一天，我正与社员一起干活，队里的民兵排长突然找到我，神神密密地告诉我，县里来俩人，现在我家，找我调查个情况，还要我小心点儿。那年头搞外调的特别多，一般都没好事。我心里敲起小鼓，赶紧往家跑。

一进门看见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穿便服，白白净净的，手里提着个黑色塑料公干提包，上面印着“临猗县公安局”一行白字。另一个瘦高瘦高，二十几岁，比我大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两人都挺严肃。见我就问：“你是卫普安吧，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今天找你了解个情况。”“是，我是卫普安，那咱们屋里说吧。”进了屋，大盖帽说：“咱们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再给你交代一下政策。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落实晁中哲给公路估树价时在你家收听敌台的事。你别着急，好好回忆一下，他在你家共收过几次敌台，收的什么内容。”“收听敌台？”我一听，马上头就大了。这几年经常在县革委会发的布告上看到收听敌台的人，名子上不是划红叉，就是判无期。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这是哪有的事呀！连忙说“没有，没有”。大盖帽又说：“你好好想一下。晁中哲收听敌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已经承认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落实一下。你不要包庇，要老实交代。”我说：“真的没有，你们让我交代什么？”那个提包的说：“卫普安，你要想清楚！你们家是不是地主成分！”

一说到我们家的成分，顿时我就觉得自己矮了几分。提包的又说：“在这儿问我估计你也不说，那咱们到大队去。”到大队就到大队，没影子的事，到哪儿都不能胡说。那时大队叫革委会。到了革委会办公室，大盖帽突然从腰里掏出一幅明晃晃的手铐，“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大声呵斥道：“你不老实！告诉你，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晁中哲都承认啦，

你还包庇他，包庇也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说，今天就把你带到公安局!”提包的那位说：“别急，我提示他一下，中哲是不是给你说林副主席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什么？”我说：“是不是定时炸弹。”“对，对，就是这一句。他是不是说啦？”大盖帽抢着问。我说：“没说过，真的没说过。”“什么，什么，没说过，你刚才都承认啦，现在又说没说过。你这个家伙真不老实，看样子今天不来点硬的，你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带走!”那个大盖帽看来真是急疯啦，拿起手铐又“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同时把桌子拍的砰砰响，气急败坏地向我吼叫。

“普安，我给你说，虽然你家是地主成分，但你还年轻，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积极地揭发坏人坏事，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现在晁中哲已经被逮捕了，他都承认了在你这儿散布过反动言论，你还保他干什么？况且你能保住他吗？只要把他给你说的那句话给我们写出来，我们对你是不会追究的。你好好想想，我们等着你的回答。我想你不会让我们今天给你带上手銬，把你带回公安局吧？也不会跟着晁中哲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继续与人民为敌吧？”提包的在开导我，却每句话都暗藏杀机。

看样子这两个家伙今天不在我身搞出点名堂是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顶不住了，说道：“好吧，我写。”在公安局的稿纸上，我违心地写道：晁中哲某年某月某日在公路上估树价时，给我说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写完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们看了看，从包里拿出一盒印泥，让我盖个手印。望着食指上鲜红的印油，我眩晕了，我崩溃了，我知道我这手印盖下去对中哲意味着什么。中哲叔，小侄对不起您啦！我的手指无情地盖了下去……

第二天，村子里流传起我和县里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起收听敌台广播的消息。晚饭后，挂在村中间那棵歪脖树上的破钟当当一阵乱响，人们三三两两提着小板凳，懒懒散散来到村里那间由破库房改建的会议室里。昏黄的灯光下，几十号人坐在一起。年老的男人抽着难闻的旱烟袋，闭着眼睛打瞌睡。勤快的女人就着灯光呲呲纳着好像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子。

今晚的社员大会，政治队长亲自挂帅。他先是神采飞扬地讲了一通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以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如何健康，接着话锋一转，义正词严宣告：“最近，咱们生产队发生了地富子弟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事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说明一小撮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总是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必须时刻擦亮眼睛，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同时，我也警告你们这些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饶不了你们的！”不知为什么，他竟没有点我的名子。点不点吧，屁大的村子，谁不知道谁，何况就我们几个地富子弟。

一入腊月，大队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把我哥叫去了，原因是我们队一个积极分子检举揭发说我哥和晁中哲在公路旁的一棵古树下收听敌台十多次。我哥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就把这件事揽到他自己身上，在学习班里承认晁中哲给他说过那些话，与我无关。腊月二十八下午，我远远望见哥哥回来了，背着一个脏兮兮的铺盖卷，无精打采的。我快步迎上去，哥哥看见我，马上打起精神，还咧嘴笑了笑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哥没事。”望着瘦了一圈的哥哥，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还好，没给哥哥戴什么帽子。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个手里提着黑色塑料手提包的人径直进了我家大门。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县木材公司的，姓乔，前几年也来过我家。乔叔告诉我，他这次来是要我把中哲的事再落实一下。一听中哲的事，我委屈的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把公安局那两个人如何威逼我，我如何写下了假证明，仔仔细细说了一遍。乔叔一听，眼睛瞪的溜圆：“这娃你怎么能这样说哪？写就写啦，你现在还想翻，你翻得了吗？中哲反对林副主席，他自己都认啦，公安局都定案啦。你现在这么说，不怕公安局再寻你？你还不知道你家是个什么成分啊？可不敢胡说！”又是一个把中哲往死里整的主。说啥呀！我牙一咬，脚一跺，唰唰几笔写好了证明，又啪的一声盖了一个鲜红的指印。

又过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地富子弟，每人挑着一对臭哄哄的稀茅罐往地里送，出巷口迎面碰上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从穿着打扮上看，

像是干部，四个兜的中山装干干净净，脖子上的风纪扣严严实实，自行车头上挂着黑提包。看见我们就问：“这是南连村吗？”我们说：“是啊，找谁。”“请问有个叫卫普安的吗？我们找他落实个情况。”人家说话柔柔和和的，可一听找我，我身子一软，稀茅罐险些从肩上掉下来。我说：“我，我，我是卫普安，啥事？”我战战兢兢地问道。“能不能咱们到你家谈谈？”我只好把稀茅罐放在村口的水渠边，在同伴们异样的眼光中，领着他们到我家去。

两人说他们是县上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问我是不是打过两个证明材料，说晁中哲散布反动言论。我说是的，他确实在我这里说过反动的话，你们也不要再问了，这次来是不是要我再写个证明，好，我马上给你们写。经过上两次作假见证，现在我已是心如铁，胆似钢了。反正说啥都是白搭，干脆你要我说啥我就说啥，大不了把我也逮去。“你弄错啦，”那两个人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晁中哲是反对林彪的，反得对，林彪确实是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这不，自行爆炸了，证明中哲同志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对这样的革命同志，我们一定要给予平反昭雪。”“什么，什么？”我的眼睛瞪得溜圆，头一下子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只看见那两人的嘴巴一张一合说着什么。接下来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已全然不知道了，只记得我又给他们盖了个红红的手印，是哆哆嗦嗦盖下去的……

从 1969 年至今（2008 年），近 40 年了，一直再没见过中哲叔，是我羞于见到他。这件荒唐事几十年来我从未向人启齿，一直深埋心中，每想起就深感不安。听说中哲叔几年前已作古，我良心的谴责更重了，总想把此事告知世人，可几次提笔都未能成文。春节前，我脚骨骨折，女婿见我无聊，送我一台电脑。我不会用，承蒙朋友多次指教，儿子儿媳一旁指导，敲打数日，终成此文，借以告慰中哲叔的在天之灵。

补白：某纺织厂有一位姓刘的电工，一天夜里下夜班回家途中突

然感到内逼，急着要方便，但身上没带纸。急促中，他跑到前面的大字报宣传栏，看四周无人，撕下一块纸，躲到后面方便去。第二天当还在睡梦中，专案人员已“光临”他家。他才知道，被他半夜拿来擦屁股的那块纸，竟然是半张伟大领袖的头像。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到劳改农场不到半年，刘某病死。衣袋里存着一小本子，上面写满了一句话：“毛主席呀，我不是有意的！”

补白：文化革命中我下乡的地方发生一件事。一张姓农民，妻子长得漂亮，受村支书的引诱，二人发生通奸关系。有天晚上，姓张的外出归家，看见村支书与妻子正在床上，气愤极了，要拉支书去政府说理。支书骑在荡妇身上，根本不当回事，从从容容，继续行云作雨。同时还厉声喝问姓张的：“你啥成分？”姓张的一听此问，身子软了半截，怯怯懦懦回答道：“我是富农。”书记与荡妇做完那事儿，气粗胆壮地拉姓张的到官府说理。见了主事官员，姓张的告支书与她的妻子通奸。村支书反告说，别听他的，他是富农，他是在搞阶级报复。主事官一听双方所控罪名，明白了，判姓张的阶级报复罪，念其情节较轻，关了两个月。　　　　　　陈　更

恋爱守则　　李子军

1972年，无休止的批判有了停息的间歇。疲惫的劳动，无聊的生活，恶劣的“食料”，吃不饱，精神的空虚，让男女知青看不到尽头。胆大的知青开始谈恋爱，和地下工作者一样，各种方式争奇斗艳。如今想来，仍让人喷饭。我们班有个知青叫俞宝康，白白的，胖胖的，非常文静，苏州人，非常爱干净，白球鞋刷得干干净净。最近一段时间，每逢天黑，他就刷白球鞋，顺手就把鞋放在门外的窗台上，然后，信步向连队后面走去。我们这些马大哈根本不在意这些小事。不料，

有位有心的知青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每当俞把白球鞋放在窗台上不久，就有一位女知青也向连队后边走去。他向我们公布了他的发现，我们立时来了劲。跟踪的结果，正是这样。怎么办？第一个办法是偷偷拿走白球鞋。俞宝康一走，我们立即替他把白球鞋收起来。那位女知青走到我们宿舍附近，一看没有白球鞋，很快就回去了。不一会儿，俞宝康就怏怏地回来了。初战告捷，我们高兴地不敢大笑，只能捂着肚子捂着嘴偷笑。

后来，俞宝康放扫帚，我们收扫帚，放什么收什么。他恨死我们这些促狭鬼，但又毫无办法。后来，他改成唱歌，唱样板戏之类，这样我们倒毫无办法了。看着俞宝康天天容光焕发，我们这些癞蛤蟆心里酸溜溜的，总想给他制造难题，破坏他的心情。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阴暗心理吧。有一天晚上，俞宝康又出去了，黔驴技穷的我们只好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告诉连长去。于是，我们班最小的知青（15 岁），自告奋勇跑到了连部。连长毛连元正在喝酒，满脸通红，醉醺醺的。一听报告，立即摸了一把铁锹，嘴里一边大骂，一边喊着“抓流氓!”向连队后面冲去。我们班的几个知青跟在后面助威，只见前方两个白影倏地突然分开，然后向两个方向跑去。由于连长醉得打晃，我们又不是真的想抓俞宝康，所以无功而返。整个连队轰动了，笑的，骂的，一晚上没安静。

没几天连里出台了一部谈恋爱的规定，由于时间久远，细节记不清了，但大致内容如下：1.男女知青谈恋爱必须年满 25/23 周岁。2.谈恋爱必须向连部汇报，经同意后方可，不然以流氓论处。3.谈恋爱的时间，规定每晚 7:00—9:00，其余时间不许谈。4.谈恋爱的地点在连部办公室门前的窗户下，其他地点不行。5.连部提供条凳，用后归还，损坏照价赔偿。6.男女知青的正常接触，需有男女知青排的排长在场。

按照这个规定，我们这些未满 25/23 的知青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年龄大的知青也绝不会跑到连部去谈恋爱。俞宝康也歇菜了，再也没有白球鞋之类的接头暗号了。在此，我向俞宝康表示歉意，但

愿经历过风雨的你们更幸福。没想到一场恶作剧让我们刚刚萌芽的爱恋之情遭遇了全面的打压，致使我们回城探亲都不敢为女知青捎东西。因为一旦带回来，你必须给班长检查。排长检查完，还要经女排的排长、班长检查。然后，六个人站在连队中间的大路上，才能完成货物的交接。幽默吗？今天我们可一点也笑不出来。

补白："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是一首今天许多过来人都很熟悉，当时在所有知青点都悄然传唱的《知青之歌》。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此歌曲诞生一年后的 1970 年 5 月 24 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裁定，南京知青任毅编写的这首反动黑歌，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后幸得许世友将军干预，改为 10 年徒刑。

父亲的背影　　梅桑榆

父亲于 1996 年 10 月去世，至今已十载有余。我这个以写作为业的儿子，却未写过一行怀念他的文字。每当想起此事，便不免有些愧怍。

这些年来，父亲的形象有时浮现于脑海，有时于梦中出现。特别是我 1997 年末初来北京那段时间，也许是父亲辞世不久，也许是独自初到异乡，也许是我身上穿着他曾经穿过的棉袄，不由得睹物思人，我竟常常梦见父亲。父亲的神态和谈笑，一如生时，并且都是患癌症之前的健康形象。在梦中，我与父亲相伴，不再是一个独闯异乡的人。

但梦醒时分，我却独自躺在床上，被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每当此时，心里便会弥散出一种难言的凄凉，叹息与父亲阴暗两隔，再无相聚之时，叹息自己到了望五之年，仍要背井离乡，为改变生活境况，为实现理想而拼搏。

父亲早年投军，在新四军某部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初期，曾在滁县专员公署门诊所和专区医院任职。1952 年被上级调到当时属于滁县专区的江浦县（今南京市浦口区），任县医院院长。1958 年，父亲因响应号召，大鸣大放，针对某些地方干部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在会上提了一些意见，并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民主，将来会开倒车的。"结果触怒了领导，指使整材料的人将"如果"二字去掉，又捏造所谓"反党言论"，对他进行诬陷，说他"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结果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人押送回乡。我曾经看过他的处理决定，那是一张油印着几百字的 16 开纸，就是这张发黄的纸，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父亲本可以在当地农场"劳动改造"，但他执意要求回家乡务农，他认为家乡人不会拿他当"敌人"看待。但家乡岂是"桃花源"？他后来的遭遇证明，这只是幻想。那一年，我才 7 岁。父亲离开江浦那天，母亲带着我为他送行。我已记不清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还是车站，也记不清当时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只记得父亲用扁担挑着行李，一头是装满医书的铁皮箱，一头是铺盖衣物，离我渐渐远去。我对那只铁皮箱印象很深，因为后来家中用它盛米多年，而那些医书，其中有些是我后来学医时读过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的想象又为这个背影添上了一些细节与背景，好像父亲如农夫一样卷着裤脚，又好像他离开江浦那天正是细雨蒙蒙。送行时的情景和一些细节，虽然被岁月所漫漶，但是，几十年来，父亲挑担前行的背影却始终让我无法忘记。

直到父亲去世后多年，我才和母亲谈起当年为父亲送行的记忆。时隔几十年，母亲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送别时的情形。她说，当时是秋天，我和你把你爸送到浦口上火车。你爸挑着担子，被带枪的人押着，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的月台上。等到你爸上了

火车，站在车门口与我们告别时，你挥着小手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时你爸和我都流泪了。我听母亲这样说，心中一阵酸楚。算起来，父亲那时才 33 岁，按照现在对年龄段的划分，仍属青年，但他却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踏上了一条前景如同暗夜的人生歧路，再无回头之日。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歧路上，他将任人侮辱，任人作践，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种将入地狱之门的心情啊，我懵懂的问话，怎能不让父母黯然落泪！

父亲回乡不久，母亲便要求调动工作，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家乡。父亲因医术精湛，当一段时间的农民后，便被公社安排在当地诊所上班，月工资 20 元。后来父母又被调到总铺区医院工作。

大饥荒时期，医院人满为患，父亲每天拖着浮肿的双腿，坚持工作，并且经常步行几里、十几里出诊看病。有时遇上重症患者，即便是雨雪天，也要出门。遇到粮罄灶冷的人家，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忍饥而归。偶有大队干部家人患病，要他出诊，倒是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但因父亲是“阶级敌人”，上不了桌子，人家只是给他几块饼，一碗菜，让他蹲在厨房灶边，一饱饥肠。父亲舍不得吃完那些饼，总是剩下一两块，带回让我们分享口福。

文革开始后，父亲成了革命群众、造反派批判斗争的靶子。他每天早晨挂着“极右分子”的牌子，和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街头“亮相”，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次又一次挂着牌子，或是戴着高帽游街，被反反复复地批斗。一次又一次被侮辱、遭毒打，并且曾被关进群专指挥部的囚室里，每天被棍子队押着和难友们一起劳动。后来又被医院革委会勒令停止工作，停发工资，不得不再次返回黄泥铺老家，在大队合作医疗诊所工作。灾难与打击，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父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乐观坚强的人。在被群专关押期间，他开导那些因被侮辱、批斗、打骂折磨而陷入绝望的人，为他们唱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唱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等唱段，用领袖语录鼓励他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

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看守被他的歌声惊动，说他“变相反抗”，恶毒攻击革命派，把他们比作日本鬼子鸠山，对他进行恫吓与警告。但父亲唱的是语录歌和样板戏，又不好扣什么帽子，看守也只有吼叫几声了事。在他的安慰和鼓励下，这些人精神振作起来，囚室里也有了笑声。

父亲是勤奋敬业、信奉人道主义的人。他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靠着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在江浦工作期间，又到南京进修，掌握了内外科、妇产科等医疗技术。做为一名乡村医生，正需要比较全面的医术。他回乡后，成为当地的名医，求医者甚众，即使被“专政”期间，医院其他医生解决不了的疑难重症，仍要让棍子队队员押着他前往诊治。他对官员和百姓一视同仁，凡来求医者皆认真治疗，连迫害他的革命派或其家属生了病，不得不找他诊治时，父亲也丝毫不带个人怨恨。在他眼里，这些人只是就医的患者。这种胸襟与职业道德，令有些天良未泯的整人者怀惭，令旁观者由衷地敬佩。父亲在总铺与黄泥铺两地工作 20 多年,救治病情危重的患者无数。直到今天，我回家乡时，仍有一些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救过他/她的命，他们至今仍对他心怀感激之情。

父亲是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因言惹祸，使他遭受了多年非人的待遇，但性格并未因此有所改变。即使在尊严遭人任意践踏的日子里，他也从不向有权势的人屈服。对于那些处境艰难，生活困窘的朋友，他均尽其所能予以帮助。他鄙视那些对上阿谀谄媚，对下傲气十足，毫无信用，满口假话的人，常教育我们兄妹做人要正直善良，待人要不卑不亢；名利皆身外之物，不要妄求，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公家的东西，即使扔掉、烂掉，也不要往家里拿。

1979 年，父亲得以平反，与母亲回南京工作。我因已参加工作数年，不能随他们去南京，独自一人留在凤阳。两年后，父亲患了冠心病。在南京某医院住院治疗时，我从凤阳赶去看他。当时父亲的病情已比较稳定，刚输完液，精神还好。我陪他吃了晚饭，离开医院时，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医院的大门外。我告别父亲，走出几十米后，情不

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见父亲竟面对医院的大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去，见父亲脸色苍白。我一时有些慌乱，问他怎么了。他向我摆了摆手，过了片刻，才淡淡一笑，说：“刚才心绞痛又发作了，我已含过了药，现在没事了。”我又把他送回病房，才离开医院。

我在赶往五弟就读的南京药学院借宿时，眼前不时浮现父亲站在医院门前的背影。沿途的街景让我浮想联翩：我脚下的路，父亲早年也许走过。他那时的身影和步态，不正和我现在一样年轻吗？而现在，父亲已经老了。父亲 20 多年前离开江浦时的模糊的背影，又重现于脑海。他离开江浦时还是青年，再回到这个地方时，已 50 多岁，离退休的年龄不远。父亲离开江浦时年轻的背影和现在病魔缠身已经年老的背影之间，是长达 20 多年的蒙冤受辱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父亲精神和肉体遭受长期的折磨和摧残，是不是患病的原因……

1994 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胃癌，已是晚期。至 1996 年去世，做了三次大手术。两年间所遭受的痛苦，非常人可以想象。

父亲原名长发，参加新四军后，部队首长说此名俗气，为他改名秀，后来他又自己改名雪樵。这本是一个寓意不俗的名字：一个孤独的樵夫，挑着柴担在崎岖的山路上踏雪前行，以自己的艰辛，换得家人的温饱，且为世人送去温暖。这个名字，却成了他人生旅途的象征。

父亲没有给我们兄妹留下什么物质上的遗产，但精神上的遗产却非常丰厚。我以父亲的正直善良，不卑不亢处世待人；以父亲的乐观与坚强，面对人生的坎坷；以父亲勤奋敬业的精神从事我所追求的事业，笑对种种歧视与不公，不被任何挫折吓倒，克服重重困难，从一个半文盲最终成为能够著书撰文的作家。若不是受父亲精神力量的影响，即使得到百万遗产，恐怕也未必能有今天这样让我无愧于人生的结果。

补白：在（刘）燕子的童年记忆里，存有一些类似黑白照片的历

史镜头。1965 年的四清运动，她那在北京林业部设计院工作的爷爷，被诬告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斗而死。爷爷被批斗时，始终昂着头不服。一次燕子长大和父亲一起回老家，探望爷爷的衣冠冢，因为突发洪水过不了河，白发苍苍的父亲哭倒在一堆烂泥里。茉　莉

补白：刘晓东的妈妈在大会发言时由于紧张，说错了一句话，把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说成大内奸、大工贼毛泽东，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打得浑身是血，关押起来。当时父亲也作为走资派挨斗。刘晓东上下奔波了三个月也没能见到母亲，后来终于在下乡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得以见到。母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下乡”。她回答到：“我明天就走。”母亲立刻两眼含泪，马上被带走。

松北土改亲历记　　冯志轩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们学生被编成小组，参加土改工作，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是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东北地区的土地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一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个大圆规，约一米五高，两腿间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

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附近四屯。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这个屯。我要亲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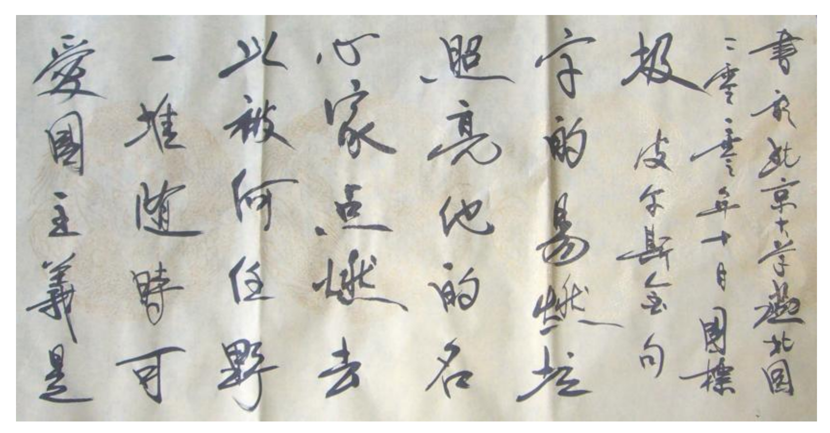
第二阶段是土地评级。用弓丈量过的地块，要画出地块图，算出地块亩数，然后由贫农团的人根据土壤状况评出每块地的等级，共分四个等级。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极为满意。几个月后暴行来临时，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没有被打死。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为地主成分。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一天夜里，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工作出色。他们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带声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财宝。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儿，农会的头儿说话了：“行啦！别打了。他家是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净身出户，就是仅穿着当时的衣服被赶出家门，此后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皮尔斯语　　焦国标书

我家净身出户后，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农金凤鸣家的一个小棚子里。金的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深夜了，金三姐轻轻地敲开我家屋门，没头没脑、慌慌张张地悄声告诉我妈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定下什么啦？”我妈妈反问她。“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这时父亲还响着鼾声。事情过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这一切相互交织，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惊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说县里的什么头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都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点着什么几几豆正（阶级斗争）的火。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明天打死寇玉铭和冯天禄，一

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雇农，有点文化）插话说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了，说这是县里树吉（书记）定的。别的人就不再敢说什么了。”金三姐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的小棚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亲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最后自信地说：“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可是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定了什么？”父亲问。“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这句话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我心底的铅块似乎轻一些了。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如何解释几个月前我们家的净身出户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边往西望，见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进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我父亲架上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转眼间我们被拉到了三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东头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了一样，断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如此凄怆血腥的场面，那个民兵竟能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难忘！野兽并不可怕，人兽才可怕！我预感到父亲要被打死。进乡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

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十几个地主家属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红色，抽打时粘下来的皮肉碎屑腻住它们的全部纹络。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一级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历史上可曾有这样的先例？

进屋后我被推上炕。那些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撕人心肺。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妈妈找一个破柜来收尸。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 3-5 百万人。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也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卖日用杂品的小铺子，掌柜的叫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几十个烟蒂——他是多么不愿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可那时候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两个小

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坊），停办了。所有受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农会干部钟义来敲门。“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看到我母亲，他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事后听说，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都在农会朋友的暗助下躲了过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后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分浮财。分浮财有个原则：不平均分。农会给贫雇农定了等级，给浮财定了价钱，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我也都计算出来了。瓜分胜利果实那一天，贫雇农早早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里都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

现在要进入第七阶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

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轮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贫瘠的沙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座落和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地界桩。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春节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

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运东的土改复查　　碧薇萍

1947 年 8 月 1 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 8 年党龄，年仅 32 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 62 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

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太爷被土匪绑架。爷爷和父亲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太爷被肢解的尸体。据说太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被杀害。后来土匪又到我家后院的郭家绑架，被村民捉获。经拷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我们村的同伙（是兄弟二人，为土匪当“钩子”通风报信，开门揖盗）。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队迫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撤退。家乡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为保卫家乡，村村修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后被共产党收编）即其中之一。我们村那两个暗通土匪的两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亲当时 24 岁，年轻气盛，为了给爷爷报仇，亲手处死了其中一人。

钩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两个老婆。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

可见他们生活并不困难。8 年后，1947 年，他儿子竟成了搞土改运动的贫下中农。为了为他的土匪爹报仇，在群众大会上打死了中共地下党员——我的父亲。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他的老婆曾当街痛骂他：“你为你爹报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吗？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亲被害一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实情。在我们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冤案并非个案。东阿县委组织部当年落实政策的王某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像你父亲这样土改复查斗争时被打死的人有的是。”

1996 年我回山东老家，在东阿县委组织部听一位部长说，还有一位当时的县长也是死于土改复查斗争。80 年代，在拜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时，老人家告诉我：运东地区（山东运河东岸）土改复查左倾严重，后聊城会议上有过处理，但对受害者却不了了之。

我在黑龙江林业局上班时，认识一位原籍山东齐河的老乡，姓张，曾任南瓮泉林场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是军转干部，曾随解放大军南下广东。80 年代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冤案时，他说他的父母也好险，差点儿被活埋。他的家乡搞土改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再晚回去几分钟，父母就没命了。当时埋人的坑已经挖好了，他是军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们村除了父亲遇难之外，还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这一家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记了一张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单（所谓变天帐），被发现了。后来这个孩子连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她爷爷因不堪惊吓，在囚禁地上吊自杀。她们村有一户人家，男人侥幸逃跑，60 多岁的女主人跳坑自杀，被捞上后又被活埋。其年轻的儿媳妇被拉上“望蒋竿”，被喝问要死要活？当时只能说要活。要活就必须听话，放下来后乖乖地做了当时村干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实憨厚，嫁给一个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给买了不少土地。小伙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于是成为斗争对象，不仅丢了命，五脏六腑还被土改积极分子掏出来煎炒当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个叫关营的百户小村，一个大坑活埋了 48 口人，

有 80 多岁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个被囚禁的人打死一个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后，连同亲属，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据说当时是夏天，一个月后，这个埋葬 48 口人的大坟竟长高了两尺！第二年扒坟认尸体时，我老伴（当时 5 岁）去姥姥家正巧路过，被惊吓得几天不敢睡觉。

这就是我们家乡运东地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我的高中　　丁晓宇

读完小学一年级要上二年级时，父亲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测试，最后说："看来丢不了啦，这学不用再上了，就跟我一块放羊吧。"母亲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孩子正当上学的年龄不让上学，放羊？"父亲答道："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认识地名和常用字就够了。知识越多越苦恼，我不能让孩子再有我这样苦恼和不幸的人生了。"父亲伤心而无奈，说话声音都变了，有些颤抖，有些哭腔。我受惊不小。母亲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上学不上学应该取决于孩子的意愿。这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快乐所在。你说不是吗？"妈妈已经哭了，满脸的泪花，面对着我，很认真，但始终不正看我一眼，问："珂儿，你喜欢上学不？还想上学吗？""想，我喜欢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

小学毕业正赶上实行联中制，各大队的十几所中学全部撤销，由公社办三个联中。五六个大队的五六个中学合并为一个联中，一半的孩子将因此上不了初中，我这个右派子女肯定在辍学之列。然而吉人天相，恰逢教育回潮，实行考试和推荐相结合，我考了个第一名，刘堂联中和山白联中均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离外婆家较近(家里常年缺粮吃不饱，可到外婆家蹭饭吃)，且校长和副校长都是我母亲的老部下的刘堂联中，还当上了刘堂联中一四班的班长。

上了一年半初中，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父亲再次受到批判暴打，

卧床不起长达年余，母亲近乎失明。家中没有劳力，大队书记、生产队长不让上学，我不得不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等父亲能起床劳动时，我才重返学校。这已是一年之后了，联中也解散了，只好回到刚恢复的大队办的初中，并退了一级。不料因祸得福，这一年多的农村劳动和退级，不仅强壮了我的身体，学会了犁地、耙地、耩地、扬场等技术农活，还赶上了本来不可能的上高中的机会。当时县里号召大办教育，大队也办高中，我不费吹灰之力连考试都没参加就直升到队办高中了。连教室都没有换，我已成为高中生了。

1975-78 年的密县可以说是世界上高中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其高中教育的格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县人口近八十万，分为十几个公社，社社都办高中，而且不止一所，通常是两所，一所叫社办普通高中，一所叫社办农业高中，有的公社还有第二农中。公社下面的大队还有队办高中，全县近 300 个大队，办了近百所队办高中。

真要感谢这些社办和队办高中了，如果没有这种高中教育的大普及，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是读不了高中的。那时父亲竭力不让我到公社高中去上学，理由就是，即便你过了高考分数线，可是作为右派子女，政审通不过，还是上不成，徒然蒙受心灵创伤。当时父亲不支持我转学到白寨高中（密县第五中学），77 年不让我参加高考，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1977 年高考成绩揭晓后，我找到考题自考一下，信心大增，完全可以上本科。参加高考的决心已定，于是我果断离开大队高中，回家自学，对父亲说："如果没有公社以上的高中可上，我宁肯在家自学，免得再在队办高中耽误时间。"

1978 年 5 月 20 号，经多方争取，右派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西腰大队高中，走后门去白寨高中读完高中阶段的最后三个月，然后参加 1978 年的高考。在离高考还有 40 多天的时候，全县举行了一次高考摸底统考，我侥幸取得全县第一名，随后被选拔到密县教育局组织的密县第一高中的 40 天高考强化班学习。这个强化班分为四个班，文科一个班，理科三个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师是从全县一百多所高中里

选调出来的顶尖老师，学生则是从全县近五千个应届高中生里选来的尖子生，其中许多学生是 77 年 11 份高考达到录取分数而未被录取或被录取但不满意学校或专业的落榜生和择校生。理科三个班的应届生还多一些，约占三分之一，文科班只有两个是应届生（年龄最小的我和李志洲），其余都是参加过 77 年高考的老大哥。

40 天的强化班结束，我离开县城，回到白寨老家。几天后，参加 1978 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白寨公社高中和西腰大队高中办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有人调侃说，这两所高中似乎是专为丁晓宇考大学办的。

北京陈先生来信：你们发来的第二期《黑五类忆旧》和第三期“父亲专号”我都收到了。你们在做一份沉重而有益的工作，把那黑暗而血腥的时代记录下来。但我以为，时间的磨洗已经削弱了记忆的力量，柔弱的民间之笔，似乎不足以承当记录那个残酷、非人性时代的重任。我曾经历过那个时代，撕心裂腑的创痛、风雨如磐的压抑，似乎未能在这些记录里被充分表达出来。但我仍然以为你们的工作是有益的。你们先做民间收集，等待我们的民族出现如椽巨笔。

北京王先生来信：看了两期“忆旧”，感到文章的类型过于单一了。回忆性的述说，固不可少，并且这可能是贵刊的创立缘由之一，但就杂志而言，还是复合型的更好些，以满足不同口味要求的读者，并可起到引领作用。比如每期能否读到一篇具有较高水准的评论性或研究型文章？又如每期能不能上一篇写域外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性质相同或相似事件的文章？哪怕是梗概性的介绍也好，这也是一种忆旧。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的打通，有时对读者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我看到的大陆电子刊物有四五种，贵刊作为新军，希望能后起竞秀，越办越好。

斗四伯　　李佐廷

这是长春郊区西湖生产队审讯斗争会的一幕。房梁上吊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长（姓齐和姓张）一个手操木棒，一个手握牛皮带，边审问边抽打，不时传来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这吊着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称他四伯。

据说有的地方从地主家里挖出了枪支，为了扩大战果，号召各村各屯都要对地主家进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缴枪支的斗争。解放前东北农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枪支。这次追缴枪支的土改式斗争，当然少不了四伯。姓齐的群专队长开始审问。他冲着吊在梁上的四伯问："吊着舒服吗？"四伯不敢说不舒服，脱口说了句"舒服"。"看来你还没吊够，那就继续吊。"张姓队长裂嘴奸笑一声。伯父意识到回答失误，急忙改口说："不舒服，确实不舒服！""还想吊吗？"齐群专问了一声。"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问你一个事能说实话吗？"四伯父急切地说："能！能！"

"解放前，你家养过枪吗？""养过。""养过几支？""养过两支。""是什么枪？""三八大盖。""有匣子枪吗？"当地人将手枪叫匣子枪。"没有。"

张群专怒吼一声："你他妈的不老实，还得吊起来让他清醒清醒。"话音刚落，两个造反派迅速将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几分钟后又把他放下来。四伯父两腿刚落地，齐群专走上前怒吼一声："匣子枪有几支？""真的一支也没有。""是不是还要吊起来再悠一悠。""再吊起来，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枪。"

"老东西，那两支三八大盖枪藏在哪里？""解放前就交给区工作队了。""谁能证明？""当时给了一个字据。""既然有字据，就交出来吧！""字据放在夹袄的夹层里，被老嫂子洗衣服时洗碎了。""你他妈

的不老实，再给我吊起来再帮助帮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阵暴打。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冲动地喊一声：“我可以证明。”群众队长们以为我这个串联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见过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划清界线，揭其老底，就很客气地叫我到前边来。我走到会场中心。齐群专对我说：“你和他对质吧！”我说：“有一天我三伯母将一个洗碎的纸条拿给我看，问纸上字能看清吗？我说只能看清一个枪字。三伯母吓得哭了。这个字条真的洗坏了。”“你这个孝子贤孙，这哪里是证明！是为地主分子开脱。”齐群专火了，冲着我嚎叫谩骂。

“我是协助群专队把问题搞清楚，怎么是为他开脱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地主分子过关。”“我只是说实话，没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阶级敌人，你恨不恨他？”“当然恨。”我不敢说不恨。“李佐廷你恨敌人，现在敌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枪要变天，你给我狠狠教训改造他一下。”齐群专边说边将一个手指粗的木条递给我。“毛主席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能搞武斗。”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语录来拒绝。“李佐廷露出了本来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贤孙，今天来闹会场，保护地主分子过关，向毛主席请罪！”齐群专一边喊叫，一边用力摁我的头，让我跪下。我挣扎着不肯下跪，张群专上来助阵，我无可奈何地跪下了。齐群专又摁我的头，让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又挣扎又喊叫：“我无罪。”这样一来，激怒了两个群专队长，不容分说，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打。为了不再吃眼前亏，我只好老老实实跪下，并自我安慰说：“我李佐廷给父老乡亲下跪，跪得着。”我老老实实的跪着，两个群专队长觉得制服了我，获得到一种内心满足，趾高气扬。“李佐廷，今天就要你来帮助帮助这个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帮助。”齐群专向我下达打四伯的命令，我还是坚持“只能文斗，不能武斗”。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决定将追缴枪的追查斗争会，改为对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李佐廷的批判会。群专队带着大家念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然后高喊口号：“李佐廷不

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佐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转入批判我以后，四伯闲起来了，虽然也跪着，但总比吊着舒服。几个人都冲着我批呀骂呀，再没有人理会他。我引火烧身，遭受批判斗争，但四伯获得了解脱，我心里很痛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还有群专头目的毒打，再折腾几个小时，不死也要脱层皮。过后，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见我时说：“你救了四伯一条命，叫你受苦了。”

挨斗后，我返回本来不愿意返回的开始派性武斗的学校。父亲受我株连，群专队继续折腾我的父亲，又派人去学校要把我揪回来。我不能任其揪回去遭受肉体折磨和人格辱侮，无奈之下，我开始浪迹天涯。当时大串联尚未结束，有学生证在身，坐火车不用买票。

补白：父亲说，小时候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姥姥家，因为姥姥家是中农，在那里不会有人歧视，在那里也才敢跟小孩打架。这个经历培养了父亲隐忍的性格，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发威。父亲在自己村里，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八岁那一年，一群小孩围着逗弄一个残疾小孩，把那个残疾孩子逗哭。他老爹过来问谁干的，那残疾孩子就赖我父亲，结果他老爹一把抓起我父亲摔到地上，说这样的富农崽子，摔死也没事。父亲回家告诉奶奶，奶奶只能说：“以后你自己老实点，离他们远点。”无奈的奶奶，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心理伤害呀！父亲回忆说，当时摔死确实没事，根本不会有人追究责任。还有一次经历，父亲刻骨铭心。他当时在幼儿园，幼儿园中午有饭，父亲和另一个小孩出去看光景回去晚了，那个管幼儿园的老婆子却只给另一个小孩吃饭，不给我父亲饭吃。烟台山

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1969 年 1 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 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 1968 年 11 月 22 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 48 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 年 3 月 8 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 24 岁。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 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 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 1975 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 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 31 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建国后的宋庆龄　　何　方

1950 年 3 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 年 10 月再次给

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 年 11 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 年宋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 1958 年起，宋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继续参加。

1959 年 4 月，宋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样子，对国家不利。”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 人中 18 人赞成，3 人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和康生。当时毛发言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 年 8 月，69 年 11 月，76 年 6

月，宋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在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迷惘和苦闷。“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 年 3 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他们传话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 年 11 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 年 5 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她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 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补白：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多去“支左”，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用旧《解放军报》练毛

笔字的念头。当时报纸每天都印有套红的大幅伟大领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的画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领袖像下笔，偶有涂及，及时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他爱人从江苏老家来部队探亲，本来他要去接站的，结果写到兴头忘了。听到叫声，他扔下笔关了门就冲了出去。这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开门见满桌涂抹墨迹的军报，翻了翻，皱起眉头，沉思片刻，最后果断地拣了几张，折好放进军用挎包，离开办公室。与老婆一番亲热之后，陈某带着满脸快意返回办公室。他发现桌面报纸有人动过，细查一下，发现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顿时大惊，心说“完了！”陈某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回老家去。”没等老婆反应过来，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他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给我写信找我。”1972 年，陈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后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养护权，免得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中。从此他与一切书写工具断绝接触，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再写一个字。与此同时，原本一个身材魁梧、行坐有着标准军人仪表的他，自暴自弃，变得猥亵、卑微，常常为半匙菜一瓢汤与其他犯人争得脸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陈某获得平反，恢复了军籍。有一天，他穿着上校军衔的军装，带着一个勤卫兵，重游旧地，借以借以洗刷在这里留下的屈辱，找回做人的那份尊严。

也说侯振亚的儿子　　心不易

世界真小，《黑五类忆旧》第一期的第三篇《侯振亚的儿子》中所记述的，是我在福建师大附中的同一届同学。只是那位侯振亚的儿子，本是谭力夫一类盛气凌人的太子党，并非什么真正的黑五类子弟。写这篇文章的海宽先生，不知何人，当是我们附中当时念初一的一位

校友。其文对侯氏颇多溢美之词。其实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侯振亚的这位公子，名叫候漳林，当时念高三。我当时在附中的高二五班。我们这个班是市里“三二制高中”的试点班，所以我们的高二就相当于高三，与侯漳林算是同届。当年的附中，有不少省委和省军区的高干子弟就读。除侯漳林外，还有省委秘书长李敏唐的公子李平、李纲等多人。这些贵族子弟，平日里自称革干、革军子弟，有十分浓厚的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他们读书都不咋的，所以又觉得在附中没有得到与他们的家世相当的尊敬。

文革初起，北京的宋要武们被毛接见，远在福州附中的以侯漳林、李平、李纲为首的权贵子弟们也迅即响应，率先成立了福州第一支高干子弟红卫兵——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和附中的高干子弟为首）。他们认为自已根正苗红，革命、造反都是他们这些八旗子弟的专利。我们班上的林培高当时也申请加入，但因其父仅是省军区的一名大尉军官，不入八旗子弟们的法眼而被断然拒绝。为了标榜他们血统高贵，是毛的正牌御林军，侯漳林这伙人在附中大操场正式成立东海前线红卫兵的时候，竟公然通过校广播站杀气腾腾地勒令全校师生要规规矩矩地呆在教室内，在成立仪式完成之前，不得踏出教室一步，也不准透过教室玻璃窗观看他们的“成军仪式”。李平、李纲等甚至大白天带着美制卡宾枪在学校操场打靶，以显示他们的威风。东海前线红卫兵甫一出世，就有当年黑衫党冲锋队那种暴力特征和嚣张气焰，福州全城的打砸抢风随之而起。东海前线红卫兵成立不久，侯漳林又被录取为空军航校飞行员，全校师生欢送，正是烈火烹油，福州宋要武的气焰一时达到顶点。

谁知好景不长，猫这回的革命，竟是要清算自己党内的那些高干。随着侯振亚被归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列，侯漳林也从飞行学员被贬为空军地勤人员。此案定性之后，侯漳林更被勒令退伍，退回原籍。这位纯正高贵血统的红五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戏剧性地完成了凤凰变乌鸡的全过程，被扫除到黑五类子弟之列。

还有更巧的。我的这位贵同学的妻子，即原文中反复赞美的那位

为了爱情，不惜千里迢迢以身相许，随侯漳林到内蒙插队的山东姑娘，文革后竟成了我的同事，使我对侯漳林其人其事又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位山东姑娘叫徐晓苹。74 年邓小平复出后，侯振亚的处境即大有改善。相应的，侯漳林也结束了插队的苦日子，上调到闽北邵武的一家工厂。文革后，侯父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侯漳林也就更上层楼。当时省委组织部让他自己挑一个最好的部门给予安置，他于是挑了省外贸（鞋帽公司）。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高干子弟都愿到外贸部门工作，既有油水又能出国。此时徐晓苹也妻随夫贵，被直接安排到省美展馆做出纳。又过了不到两年，讲文凭学历之风开始兴起，侯漳林被保送到厦大外贸大专班带薪专修两年。正当徐晓苹以为苦尽甘来、寒窑熬尽的时候，灾祸也随之降临。侯漳林在厦大学习期间，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女高干子弟旧情复燃，逐渐嫌弃平民出身的徐晓苹与他门不当户不对，终至毕业后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徐受此刺激，后来信了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单位和整个省直机关中的法轮功“死硬分子”。

建国之初，也有许多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抛弃农村的糟糠之妻，与城市里的美丽小姐另结姻缘，成为现代的红色陈世美。由此可见，是制度之恶使人变恶。当侯氏公子落难时，他也就失了八旗子弟的骄焰，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或知青有了平等的交往，并受到他们的庇护。一旦这些旧官僚重回文革期间暂失的“天堂”，他们就很快显露中人性中见利忘义的邪恶一面。

补白：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日），闽北某山城发生一件惊天大案。深夜，一胡同深处的一座破木屋里突然传出了巨大的音响。有人先是用怪模怪样的喉音，夹杂着敲击声，把哀乐演绎得像西方嘻皮士音乐，接着是模仿唢呐奏喜气洋洋的《秧歌曲》，后来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举行一场狂欢会。这声响无疑让本来就生活在极度压抑与

恐惧中的人闻之心惊。惊恐中的邻居暗中哀叹道："老黄家儿子又要犯事了。"果不出所料，几分钟后，远比现在 110 出警还快，一群红卫兵破门而入，把还在高歌狂舞的一个衣裳褴褛的男子拖走了。他是老黄家的大儿子，叫黄 X 德，28 岁。这小黄打小就喜欢唱歌，音乐天赋很高，过耳不忘，嗓音宏亮高亢，尤其爱唱"红歌"。唱到动情处，热泪盈眶。一次表演唱圣歌《东方红》，双眼含泪，走台步不慎摔下舞台，脑部受伤，落下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时不分时间、场合，没完没了地唱红歌。文革开始后，以领袖颂歌为主打的歌曲一统天下，黄 X 德如鱼得水到处唱。起初各造反派抢着要他去助阵，后来发现他唱着唱着就乱套了，东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噪音，就把他赶走了。发展到后来，他一唱歌就掏出裆下物，当众露阴，于是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从此，凡国内外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被列入重点控制对象。家人怕受牵连，躲走了，留他一人独居。1976 年 9 月 9 日晚这一顿乱唱，为黄 X 德招来现行反革命罪，领刑十四年。在狱中他经常半夜三更高歌，没少挨揍，最终死于拳脚下。若干年后，其海外亲人回来寻找遗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坟上。然昔日的埋葬地已变水库，其骸骨连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红歌，永远沉寂到水底世界了。

曾家的宝珠　　史　海

1958 年炮击金门时，她八岁，曾经参加慰问团到前沿炮兵阵地慰问演出，是全团年纪最小的演员。一首表现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声情并茂，博得阵阵掌声。那张演出照，被她视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和骄傲，一直高高地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参军亲手把炮弹打到台湾，把五星红旗插到宝岛，让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也过上我们这样的天堂生活。

一次，教育局长到校视察，了解政治教育情况，在她班上出了两道题：三面红旗是什么？周恩来在国家担任什么职务？班上大部分同学答“队旗、团旗、党旗”和“当很大很大的官”，只有她回答：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国务院总理。校长当场表扬她，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从小关心政治，将来当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然而在后来的拔白旗运动中，她的父亲被查出临解放时曾参加押送一批黄金到台湾。实际上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平时经常往返台海，那次台湾之行不过是执行公事而已。但政府不这样认为，最后被定为为反动派卖力，与人民为敌，属于历史反革命。她的宏伟理想一下子变成了白日梦，连上台演出的资格也没有了。她开始恨父亲，是他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文化大革命来了，或者说机会来了。她决心要和父亲划清界线，接受党的考验，做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红色接班人。破四旧了，她砸了家里的一尊古董级的观音菩萨，把母亲脖子上的佛珠扯下扔到大街上。一天，她领着一批红卫兵到家里，先是冲着她父亲集体高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歌，接着高举红宝书喊当时流行的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随即她向前走了两步，大声喊着她父亲的名字，颐指气使地说：“从今天起，你要继续把在旧社会做过的坏事，统统交待出来。不然我要和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脱离关系，划清界线！”一向文弱的父亲，短暂的惊愣过后，疯了似的冲向前，一巴掌掴过去，伸手扒下她的红卫兵袖章和军帽。红卫兵见状，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她父亲架起来拉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批斗会上，她当众宣布与这个反革命的家庭决裂 ，“一颗红心永向党”，“永远跟党闹革命”。

她父亲经历了那场女儿造反后，引发神经错乱，常常满口胡言乱语，唠唠叨叨地说些对“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大不敬的话。每一句若要被人检举了，都可以“斩立决”。她母亲成天生活在万般惊恐中，感到身边的丈夫就像一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与其等待这样的悲剧出现，不如自己痛快地走。想定后，她弄了一瓶农药乐果，选择一

个深夜，与丈夫一起喝了。

两年后她回来了，父母已离开人世，房子被贴上封条。生她养她的家没有了，亲友也不肯接纳她，而她心目中追随的无比神圣的“革命大家庭”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时她，第一批报名，决心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后来知青陆续返城，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嫁给了当地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队长的儿子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她当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又担心留不住她，平日对她严加看管，稍不顺意便棍棒相加。万念俱灭中，她用乐果把丈夫毒死，被判无期徒刑。服完十二年刑后，她被减刑回家。

她再一次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她父亲在台湾的一位挚友找到她，帮她嫁给一个台湾鳏夫。到台湾后，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她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终日奉香礼佛，了却余生。她叫曾宝珠。降生时，其父初为人父，视女儿为最可宝贵的掌上明珠，故取此名，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寄托长辈的希望。

地主婆刘大妮　　张耀杰

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 10 多岁，比我母亲大 10 多岁。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圣洁。

刘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开封读书，后来竟没有音信了。在儿子没有音信的情况下，蔡家征得刘家的同意迎娶了刘大妮。代替儿子与新娘子拜堂成亲的，是蔡家的小女儿。大嫂子与小姑子拜

堂成婚，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辈人经常谈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见过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劝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一个妓女嫁给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刘大妮抄起棍子，把这位好心人赶了出去。此事传扬出去，成就了一段贞女佳话。后来刘大妮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度起寡妇生涯。

抗美援朝时期，村里一轮又一轮强征公粮。年轻漂亮的已婚处女刘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来挨第一刀。强征公粮动员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从乡里派来的荷枪实弹的公家人，总是先让地主富农们带头上报要缴纳公粮的数目。热闹一通之后，公家人劈头断喝："刘大妮站起来！"刘大妮便只好应声而起。"你家打算缴多少公粮？"刘大妮报上数目后，公家人大发雷霆："把刘大妮绑起来押乡里去！"于是人群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把刘大妮五花大绑拉扯出去。接下来的强征公粮自然是一片踊跃。被绑出去的刘大妮其实并没有被押送乡里，而是走出村口便松绑回家去了。刘大妮被工作人员当作革命斗争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后，回到家里补偿和慰劳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来炸油馍吃。

刘大妮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与炸油馍有关的游斗游街。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岁之间。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操场旁边，一边观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上体育课，一边拿自制的玩具红缨枪做着摹仿动作。突然间，一阵锣鼓声由远处传来。正在操练中的红卫兵学生失去约束，一窝蜂冲向街头，向着敲锣打鼓的声音迎了过去，嘴里兴奋地叫喊着："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我们几个光屁股小孩从人缝里钻了进去。那天游斗的对象正是刘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大红缎子的新棉袄和新棉裤，胸前挂

的并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铁锅，五彩缤纷，汗流浃背，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组织者，照例是村里的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之类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还有跟随在他们身边的骨干民兵和积极分子。游街队伍停下来，先是村干部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刘少奇!”之类的革命口号，接着是一个姓姚的男人揭发一些我当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后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来，前一天下午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刘大妮与村里的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馍慰劳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里。

这姓姚的男人本是县城中人，在战争年代立过功、负过伤。光荣复员后，在县城里当了一名小官。1958 年大跃进时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里的一名干部请到村里，领导全村人进行向共产主义天堂大跃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利用控制集体食堂的权力欺男霸女，玩弄过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能够把刘大妮搞到手。大跃进过去，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斗之后被撤了职，依然不肯放过刘大妮。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让占便宜就要去告发相要挟，刘大妮却像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刘胡兰那样宁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恼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告发刘大妮抗拒改造，同时却隐瞒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图。

遇到这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村干部自然是闻风而动。他们带上几个民兵冲到刘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馍和用来炸油馍的油锅。姓姚的干脆从刘大妮的衣柜里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红缎子的棉袄和棉裤。一帮人极其野蛮地扒下刘大妮身上的单衣单裤，把棉袄棉裤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锅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条绳子牵着上了街。

拉刘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

出好戏。附近的几个村里除了许多越穷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还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位任谁都搞不到手的老处女，无疑是公开发泄变态性欲的最佳对象。

时近中午，被人们推搡簇拥着往前走的刘大妮，浑身上下冒着热气。红缎子棉袄的扣子早就被人扯开，两个大白奶子上点缀着一颗颗混浊的汗珠。每当刘大妮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壮汉冲上来撕扯一番，捎带着在她的细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凑上来占便宜的，还有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们。她们用铁锅上的油泥涂在刘大妮粉白透红的脸蛋上。

刘大妮最后一次瘫倒在街道中央时，任凭这些男女怎么揉捏撕扯，怎么喊口号吐唾沫，她都是瞪着双眼不能动弹。一个与我一样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间亢奋起来，举起小鸡开始往刘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没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刘大妮一条性命，心满意足的大人们喝一声彩，轰然而散。

到我读小学时，几乎天天与刘大妮见面。我的身份是小学生，她的身份是专职打扫学校厕所的地主婆。当年农村人没钱买卫生纸擦屁股，印着红头文件和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就是他们最好的手纸。有一个贫农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红卫兵学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领袖像折进去，领袖脸上被抹上屎。老师和同学们当即把他从厕所里拉出批斗游街。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从作业本里撕扯下来的废纸就是最好的手纸。遇到没有作业本的时候，就只好从厕所墙壁上取下土块和石块蹭上几下，或者沿着厕所墙壁的棱角从上到下蹭下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刘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厕所里看到刘大妮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的身影。我当时已经懂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防大逆之类的圣人古训，非常奇怪刘大妮何以面对我们拉屎撒尿而无动于衷？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能够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无所顾忌？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答案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刘大妮一脸圣洁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连同六个同胞兄妹当猪崽子喝斥喂养的

亲生母亲来，我总觉得刘大妮更加亲切也更加圣洁一些，以至于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会隐隐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直到近年读到杨绛先生的自传，我才恍然大悟：刘大妮正是一位与杨绛先生相仿佛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一位在强制异化的残酷和荒诞中，始终葆有意志的坚定和人性的辉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杨绛先生所说出的，也许就是刘大妮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16 岁离家后，我再没见过刘大妮，对于刘大妮的那份美好记忆却一直伴随着我四处漂泊。她最后结局如何，我既无从知道，也不愿深究。至少在我个人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是一位美好的受难女神。残存在没有人性的变态社会和邪恶年代里的人性火花，才是人类文明薪火流传的真正火种。

补白：小溪河公社社员张新兰，1959 年春因生活困难，全家外流滁县 2 个月，同年 8 月又带领两个小孩外流到娘家。1960 年 3 月回家，丈夫死了，一个妇女带 4 个孩子生活(最小的 5 岁)。1960 年夏季，当地口粮标准名义上规定 1 斤，因包产不落实，实际仅半斤。秋收结束即断粮，早秋作物搞一点吃一点，食堂经常停伙。她家因小孩多，吃不饱，不断偷青，自己交代小孩偷大麦约 100 斤，本人藏小麦 150 斤，还偷小秫秫（高粱）、玉米、谷子等。所偷的粮食大部分被干部查出。为偷青，张曾被斗两次。第一次在会上承认了错误，表示不偷，可是

第二天就饿了一天，又得去偷。第二次在会上挨斗时，张新兰说:“不偷没办法，小孩饿得哭。偷了你们看见就拿去，看不见我就吃，今后我还要偷。”最后，张新兰被逮捕，判了 3 年徒刑。家中丢下 4 个孩子无依无靠，全靠左邻右舍帮助。

北京马先生来信：那天你送的刊物，回来后就翻阅，却是一气读完，然后是一晚上没睡好。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就让人狂热到亲情不认，人性全失的地步？这决非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一场浩劫。其根源想想恐怕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怪胎。单是中国文化，怕是结不出这个；单是西方文化也难得到这个果。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共通的基因？

乡村批斗会　　梅桑榆

农村文革起初的批斗对象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早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就用这些手段整治社员，农民对这一套熟悉得很。
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两人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被困者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这种捆绑方式应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文明国家里似乎没有——编者）

批斗时通常要罚跪。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房屋，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梁，此时这道横梁便成为吊打人的设施。被批斗者手腕被捆，绳子从横梁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时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梁上，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坐飞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为了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耐力，他曾在阳台上练习坐飞机，其姿势就是这样。乡村的坐飞机更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梁，捆脚的绳从另一根屋顶横木上穿过来；行刑者喊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两个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罚跪、吊起之外，还有殴打、侮辱，或拳打脚踢，或棍击棒捣，或用鞋底扇耳光，或用绳子抽打，或往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不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开始批斗干部。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也得“低头认罪”。还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稍一晃动就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于是革命造反派便另找批斗对象，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殃了。

一个时期，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两盏桅灯。主席台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

社员芦某，30 来岁，平时爱胡扯。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他与一个妇女开玩笑说："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要是能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于是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又有人说他侮辱贫下中农，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手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是开开玩笑，当然不服，辩解道："说我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镜子"，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造反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则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为生机所迫，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陈某说："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批斗者又说他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洋工。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管制劳动。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高级社员”）。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是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刚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新加坡侨生洪氏兄弟　　佚　名

1970 年 2 月 27 日，枪声响起，一个年轻的生命倒在厦门海滩上。他就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厦门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判处死刑的新加坡归国侨生洪沧海，死时 21 周岁。

洪沧海祖籍同安，生于新加坡，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祖父为了孙儿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俩告别父母，离开新加坡，于 1967 年 3 月回到祖国，定居厦门。

回国后，哥儿俩双双进入集美中学，适逢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洪沧海大失所望，加上根本不知国内政治斗争的深浅，由直抒已见批评文革，书写日记直指伟大领袖独裁，发展到书写张贴反标，在观看样板戏的戏票上写“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彻底，江青有女皇梦”，对刘邓的遭遇表示同情。

1968 年 11 月，洪沧海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忠孝里的家被抄。祖孙三人同日被抓，并株连房东夫妇一家被抓。兄弟俩进了电台山“鸽子龛”拘留所。二个多月后，两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学，参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沧海的批斗大会。这是兄弟俩的生离死别。最后一面，却因不准交谈，没说一个字。随后洪沧海被押往全市各个学校，轮流

批斗，全体学生必须参加。

1970 年开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进入高潮，洪沧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批共十二人。厦门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全副武装士兵押送，五花大绑，挂牌，姓名打上血红叉。处决后弃尸海滩。已上山下乡的哥哥洪沧江要求回厦收尸安葬，被拒绝。祖父一听，晕死过去。姑婆（祖父的妹妹）从马巷来厦门要求收尸，遭到呵斥。后尸体被医院拉走，作人体解剖材料，直到无法使用后，运往殡葬处火化。三年后，作为无人认领骨灰被处置。

洪沧海死后数年，在新加坡的舅父从当地报纸的一则《昔日亲共分子，终成共党刀下鬼》的新闻中，才得知外甥洪沧海的死讯。十年后，洪案得到平反。1980 年 6 月 6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称：“洪沧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满，在书写张贴散发的标语中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陷鸣不平，斥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正确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所致，确属冤杀。”

所谓“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是指洪沧海不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矛头直指”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

洪沧海被逮捕后，洪沧江在集美中学牛棚继续关押审查，直到 1969 年 8 月获释。此时他身无分文，在学校人保组监督下，向二位亲朋好友借了 21 元钱。这张借条洪沧江四十年来一直珍藏着。1969 年上山下乡，每个下乡青年都可以领到棉袄、蚊帐、解放鞋、手电之类的东西，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却对洪沧江说，他是被强制下乡的，他弟弟是现行反革命，不能领取这些东西。没人为他置办任何行装，没人送别，洪沧江一无所有，一个人下到离公社三十几里的偏远山村。

1970 年 2 月 28 日到公社赶集的洪沧江，在墟场发现了弟弟被厦门市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公告，当即来到公社要

求请假回厦收尸，被一口回绝，理由是需要大队同意请假的证明。他赶回大队，得到的答复是接公社人保组的通知，不能请假外出，必须参加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学习班，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对外的一切书信包括和远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断。下乡前市人保组曾警告他，不准将弟弟的情况告诉海外的亲友。否则一经查出，按里通外国论处。

1977 年恢复高考。洪沧江参加高考，上了分数线，尤其是英语，更是出类拔萃，但因弟弟的关系，与上学无缘。1978 年，下乡十个年头已经成家生子的洪沧江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成绩仍是不错。自己从小就会英语，充满自信，报考了安徽外语学院和福建师大的英语系。高招办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因弟弟的原故，他无法就读涉外专业，希望他能改一下专业。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洪沧江不得不改专业，得以就读厦门大学大专班读财政专业。班上一个全程看了洪沧海公审处决的同学告诉洪沧海，弟弟在最后时刻拒绝下跪，共挨了五枪。

1980 年 6 月 6 日，正在上课的洪沧江被叫到学校办公室，和两个穿蓝制服的人（一个是省高院的，一个是市中院的）见面，宣布洪沧海平反，并将一份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交给他签收。洪沧江郁积了十年的泪掉下来了——人头都落地了，还能死而复生吗？

同时洪沧江被告知，作为受害者家属，如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将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洪沧江提了三点：洪沧海被处决时，家属要求收埋遗骸，被有关部门拒绝，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而要求有关部门找出受害者的遗骸以带回他的出生地入土为安；洪沧江受株连后被迫在农村结婚成家，要求家属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厦门市区；发还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给予受害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赔偿。

三点要求的第二项得到了落实。有关洪沧海的遗骸，有关部门进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遗体被某医院作为教学材料解剖使用后，运往火化，最后作为无人认领尸骨处置掉了，没有下落。至于经济赔偿，

法院的答复是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无法承担赔偿问题，但法院可以给予人民币 500 元的困难补助。洪沧江拒绝了。抄家时抄走的私人物品，包括兄弟俩各自从新加坡带回来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等等，已被全部折价卖出，无法查明购买人和去向，无法归还。个人储蓄存款已上缴国库，法院同意申请无息归还家属。

1976 年，母亲通过一位从新加坡回乡探亲的亲戚，联系上了洪沧江，才得知洪沧海已被枪决的死讯。在出事后八年时间里，洪沧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寄出的信没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沧江的舅舅从新加坡执政党的刊物上得知洪沧海的不幸遭遇，却因耽心他们父母无法接受而始终绝口不提。

洪沧海于 1980 年平反，两年后祖父去世。1981 年，洪沧江大专毕业，分配到厦门锻压机床厂财务部门任职。1984 年，洪沧海的父母从新加坡回国探亲。1967 年一同回国的祖孙三人，只剩下洪沧江一人。与阔别多年的父母相见，三人相拥而泣。

附记：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全校数千名学生一道，席地坐在一中大操场上，批斗一名五花大绑的二十岁现行反革命侨生洪沧海。十六岁的少年参加批斗大会，看得心惊胆战。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四十年后会为这名因言论被处死的侨生写纪念文章。

补白：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很高兴。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怎么都轮不到我上大学。父亲只有小学毕业，连初中都不让上。有一次写作文“我的理想”，父亲只能写“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农民”，因为工人、解放军等行当，那是想都没资格想的。父亲娶母亲的时候，是拿着盖有中农成分证明章的工作合同书给母亲看的，等于是连骗带哄娶回的。母亲娘家距离我们老家不近，不易打听。后来看父亲人不错，也就嫁给他了。曾祖母临死时告诉孙子（我的父亲和叔叔）：“如果能看到你们两个的媳妇，我死也瞑目了。”那时成分高的人家娶媳妇是个难题。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消息，父亲是在县城听说的，连夜

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告诉爷爷奶奶成分不管用了。初听之下，爷爷奶奶根本不敢相信，得到确认以后，全家人哭了一夜。烟台山

按出身杀人　　姚治邦

有一天我们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鬼见愁”，借以辱骂我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是“你们放心”，作为回敬。那时辩论会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一块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不会追究红卫兵造反派打死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事。

当时传来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黑五类家庭成员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

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湖南省道县县委书记熊丙恩，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称："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 1967 年 8 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4 千多人，被迫自杀的 300 多人，涉及全县 36 个公社、2700 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在道县所在零陵地区蔓延，全区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

希特勒。

反革命轮奸犯　　朱之泓

1967 年冬天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马家湾时，汽车因故停了下来。有个知青便恶作剧地对那位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给他当老婆之类。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当时那姑娘被吓哭。

回到连队后，这伙青年又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传了出去。谁知，过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轮奸了那姑娘，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复复调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认发生轮奸的事。专案组对知青进行刑讯逼供，并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认定轮奸案证据确凿，5 个“主犯”中的 4 个被判处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缓，其余 4 个被处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轮奸”的女方是贫农出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黑五类出身的男子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阶级报复”。

记得这四个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时，大街上到处贴着被红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义愤填膺，人人皆曰这种无耻的“反革命轮奸犯”确实该杀。有人还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些什么知识青年啊？北京怎么净打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垃圾来支援我们西北？”

当时我也挺纳闷，来宁知青中怎么这么多黑五类子女？数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年正因为出身不好才在升学中落榜，落榜后报名参加

边疆建设兵团自然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径了。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轮奸的定案，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做‘思想工作’才认可这个结论。”另一个曾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时，首犯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案发时正怀孕在身）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该旅社一个姓马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也算坚强，平时出来进去都满脸冷静不声不响。有一天，她娘俩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唉！看样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问题时受了什么刺激。我问小马：“你怎么不进去劝慰一下？”小马边说边摇头：“唉，可怜！可怜呀……我想进去劝解，又觉得不合适。”

呜呼，四个来建设边疆的北京知青啊！无论他们出身多么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后每当在杨郎走夜路时，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饮弹而亡的年轻生命，我在心里呼喊着：“你们的阴魂此时还在大西北的旷野中游荡吗？”

北大荒片断　　王誉虎

我们家一门三右派（父亲和两个哥哥），我必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 年 10 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亲自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农场场部，近 200 名知识青年分为 6 个小队，组成为期半年的学习班。我被委任为第三小队队长。

在欢迎晚宴上，我们被招待一顿牛肉馅饺子。不料，当夜，全体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起初误认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折腾一阵，未见任何证据，最终真相大白，原来包饺子的面粉有问题。第一次吃有赤穗病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往往出现头晕、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经常食用者，症状逐渐转轻。赤穗病面食，当地的猫狗都不吃！然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上交国库的任务指标，好的麦子都上交了。

我们吃这些猫狗不食的面粉，算不算是一种无私奉献呢？这样的疑惑只在脑中盘旋了几分钟，我便认定，此时正是身体力行献身主义的大好时机！生命都可奉献，何惜头晕呕心！这是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首次思想实践。在接下来近两年小麦赤穗病大爆发的时间里，在生产队大食堂，玉米面或大碴子竟成了病号饭中的首选。我每天吃着赤穗病面食，扛不住了就用剩余的工资买月饼，却从来没有装病冒领过病号饭。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就是战天斗地、忘我劳动。奋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勘探队员之歌》，构成我们知青学习班的主旋律。

1963 年 12 月，学习班全体知青去距总场 50 公里的五分场参加劳动。一望无垠的积雪深可没膝，康拜因连秆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远远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涛。我们每三四个人一组，围着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从积雪中扒出玉米秆，然后掰下玉米穗，

堆成一堆，等拖拉机拉着雪耙犁过来再装车，玉米秆则边掰边烧。

严冬的北大荒，气温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烟炮”，则狂风四起，雪雾弥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当地俗称“风三”。我们这些从北京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根本缺乏起码的御寒知识和准备。在短短六七天的奋战中，加之赶上“风三”，近 200 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冻伤，可是却没有一个缺勤溜号。第六小队的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肤白皙（父亲是傅作义手下兵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民党少将军衔），右脚虽严重冻伤，却发扬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回总场当天，他便住进医院，被确诊为二级冻伤！

来年开春，我与另外 3 名知青被分配到离总场 30 公里的一分场六队。住的是昏暗的草顶土坯房，点的是冒黑烟的柴油灯。早晨起来，鼻腔、口腔里都是黑的。六队有百余户人家，近 2 万亩耕地，还有待开垦的一望无边的荒草地。东边是逶迤的完达山，南边有一条蜿蜒的溪流，西边北边是铺向天际的黑土地。

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一位老职工（山东贫农）杀猪卖肉，我们 4 个知青为改善生活，凑钱买了 4 斤猪肉。回宿舍细看，好猪肉里竟夹裹着半斤多带皮的囊膪。这种看来司空见惯、无足轻重的小事，当时竟对我造成极大的震动。从学校到媒体再到学习班，所宣传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全是纯朴真诚、是非分明、立场坚定、道德高尚的模范，我们知识青年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却让我错愕。那时的我，是愚昧、无知、单纯而又笃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脑、被蒙骗、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强力壮，又表现优异，很快被调到机务排。一次开荒时，我的左脚被五铧犁路轮半轴的鸭铁压伤。脚面被压开，掉了一个小脚指头。由于感染奇形坏疽，险些截肢。分场领导建议我可因伤残离场回京。我没有考虑，认为是小题大做。苏联小说《无脚飞将军》里的无脚飞行员阿历克赛的刚毅形象激励着我。未等伤愈，我便冒着严寒，自告奋勇到排水工地挖沟开渠。疼痛、劳累和寒冷磨砺着我的意志，

保尔克察金冰雪泥泞中筑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样。

工地上绝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窨子里。平地下挖两米左右，两面用树枝、茅草、席子搭成地铺，中间留一米多宽的过道，安上烧柴取暖的火墙，再用长园木、树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顶，就建成了一个地窨子。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头顶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窨子里只有几盏煤油灯。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我竟能天天坚持看《毛泽东选集》，写日记！

年终，我被评为五好职工，并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在指导员马吉海的支持下，我为团员和有兴趣的老职工宣讲哲学基本常识，深入浅出地介绍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讲时事政治。谈到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河南“盲流”来场的孙立国却颇有微词。我第一次从孙口中听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惊。我还第一次听到了亩产万斤的放卫星闹剧后面的悲惨和血腥，和“反瞒产私藏粮食”运动中对已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的抢夺和残害。起初我有些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孙立国是农民意识，思想偏激落后。此后在劳动闲暇，我又亲耳听到另一个河南“盲流”的儿子狗剩儿讲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肿而死，妹妹挖野菜时倒毙，母亲浮肿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儿跟着父亲，昼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里偷得县种马场的 10 多斤马料，连吃带卖，终于得以活着跑到北大荒！孙立国和狗剩儿都是三代贫农。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老实人，无论如何应该不会故意制造这种只有“阶级敌人”才可能制造的谣言。我确信他们讲述的都是真实的。但我仍认为，他们说的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闻封锁、舆论蒙骗和暴力镇压下，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京城的大跃进，饿过两年多肚皮。那时，我们北京分司厅中学在劳动生产基地有半亩实验田，学校党委召开“放卫星”大会，誓言要种出亩产 20 万斤的小麦。我清清楚楚记得，半亩地真的掘地 3 尺，而且是 3 公尺！然后垫一层土铺一层粪肥，再垫一

层土铺一层肥，最后密播小麦种。因撒种太多，来年小麦密密麻麻全长成了“草”。除了地边，几乎颗粒无收！

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我校领导号召全体师生捐铁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铜合页拆下上交，险遭母亲暴打。上千师生上交的废铜烂铁和木柴堆在操场，然后放在土炉灶中进行冶炼。我负责拉风箱。操场上火光冲天，烟雾缭绕，喧声四起，好不热闹。大干夜战两天一夜，烧成几块合金铁疙瘩。然后系上红绸，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簇拥着送到教育局，为年产1070万吨钢“添砖加瓦”!

听了孙立国和狗剩儿令人惊厥的“海外奇谈”，再结合自身在大跃进时期的亲身经历，我开始独立思索，并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党中央也会犯错误。但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认为那些错误、失误，大多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是前进中的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还遇到亘古未有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仍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毛选》四卷反复看过多遍，读书笔记写了好几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现在水落石出了。不仅不存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据已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也压根儿不存在“苏联逼债”问题。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同时急令苏联驻华大使与周恩来沟通，协商援助事宜。周向毛汇报，却遭毛一口回绝，说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鲁晓夫的一粒粮食，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务必要赶着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毛泽东甚至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让妇女敞开生孩子，饿死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能补回来。不能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补白：1969年初夏的一天，一辆囚车停在了某劳改农场。从囚车陆续走下来的囚犯中，突然出现一个电影《江姐》中小萝卜头似的囚

犯。此犯年仅 12 岁，因犯反革命罪被判 15 年重刑。小萝卜头低着头，用怯怯的目光偷偷地看着与他同龄的几个农场干部的孩子，孩子们则冲他叫“小劳改，小劳改”。小劳改的到来，让管理干警伤透了脑筋。第一个晚上就尿床，把下铺的人淋得叫苦不迭，还引发牢房里半夜吵闹。干部们误以为哄监闹事，荷枪实弹地冲进来。小萝卜头平时小错不断，还常被大犯人利用干坏事。打嘛，下不了手；骂嘛，见他哭鼻子也骂不出口，真拿他没办法。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小萝卜头叫陈 X。12 岁那年，小学四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学生们个个佩戴上红袖章，成天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平时罚自己做作业、向家长告状的老师一个个被他们揪了出来，挂上黑帮分子大牌子批斗。陈 X 在批斗老师的革命行动中表现最积极，也最有创意。他把从老师家里抄出的女老师的裙子套在男老师头上，又把男老师的裤子围绑在女老师的脖子上，牵着他们在校内“游街示众”。开始他是跟着大同学“闹革命”，后来他感到不过瘾，拉几个低年级同学自立门户，叫“天不怕地不怕战斗队”，自封队长，每次活动都必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 X 感到自己也是头儿了，也可以享受万岁待遇了，于是对手下说：“你们也要喊我万岁。”然后带头振臂高呼“陈 X 万岁!”这还不够，他又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写满“陈 X 万岁”的字样。恨透了这个“革命学生”的老师们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了学校的支左工作组。陈因此坐了整 10 年大牢，出狱后开的士。

我的朋友顾复初　　朱长超

我的朋友顾复初，上海市南汇县横沔乡汤巷村人。他的父亲有几亩土地，还办了一个碾米厂，属于亦工亦农能干的新式农民，但土改时被定为工商业地主。1957 年反右，乱抓阶级斗争。1958 年 4 月，顾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 7 年，根据是他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入狱后，顾父不时有信寄到家里，后来被押到安徽合肥砖瓦厂（劳改工

厂）服刑。至 1960 年 2 月，顾父就再也没有音信了，直到今天（90 年代。几十年里，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给顾家一个解释。顾复初曾亲自到安徽寻找父亲的下落。那里早已没有砖瓦厂的痕迹，也没有寻到父亲遗留下的任何信息。

顾复初从小喜欢机器，自学了许多技术。父亲无缘无故被抓，20 岁的顾复初感到留在家里很不安全，就跑到杭州浙江工程技术学校帮学生修理机器。顾勤奋肯干，学校很需要人，便同意他把户口迁到杭州，成为正式职工。顾复初回乡迁户口，文书叫他明天再来。次日再去，几个穿警服的人立即把他铐住，关进看守所。

看守所里正在大炼钢铁。有一次鼓风机停了，顾复初鼓捣几下就又呼呼响了起来。在场的南汇县政法部长宣林芳见这个小青年技术很高明，与他聊了很多。在看守所里一晃一个月了。这一天，所长对他宣布解除逮捕。宣林芳也在，告诉顾："你暂时就在看守所工作，晚上睡在县委招待所，以免再有什么麻烦。"又过 3 个月，宣林芳又让顾到下沙机械厂工作，不让他回家乡工作。由于技术好，顾复初被介绍到多家机械厂当修理工，后来又被借调到南汇县物资局工作了一二年。

1968 年，文革初期的大风潮消退了，顾复初回到了离开 10 年的家乡。当时全国都在大办化肥，顾复初冒出一个灵感袭。化肥生产多了，一定需要塑料袋。为了节约成本，一定会尽量使用旧塑料。旧塑料再生，变成塑料袋，需要加入增强剂，也需要挤塑机将其挤塑成型。现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己先研制挤塑机，将来一定很受欢迎。经过了一段时间钻研琢磨，图纸全画好了，机器在他的脑子中成型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可以将机器造出来。

江苏丹阳松卜工业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转辗听说了顾的发明，于是请他帮忙。不久，松卜工业公司造出了挤塑机，也开始生产塑料袋。这家小公司下边原有个小塑料厂，10 来个工人。机器造出后，迅速增加到 100 多个工人，创造纯利润 100 多万元。这在文革期间可是个很大的数字。松卜厂对顾充满感激，给他 4000 元钱作为报酬。顾本人所在的横沔机械厂却有人写出大字报，称他开设地下工厂（当时属于严

重犯法行为)。

湖南郴州地委办的一家工厂，利用顾的图纸也造出了机器，获得丰厚利润。宁波某厂也想生产这种机器，请顾帮忙。所谓帮忙，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使用其专利发明，可那时是不能拿报酬或工资的，拿了就是剥削，是犯法。作为变通，该厂愿意为他们的一二个家属到那里工作（当时找工作非常困难)，每月可拿二三十元钱的工资。顾身边的好几个技术工人都想让自己老婆去工作（包括卫金祥和刘子奎)。由于名额限制，最后让卫妻去了。为此，刘子奎心怀嫉恨，向公安局揭发说，顾造机器的图纸是抄来的，帮别人设计制造挤出机是诈骗行为，顾所得的那 4000 元钱是诈骗所得。于是，卫金祥、顾复初和顾的妻子等人相继被捕。最终，顾复初以技术诈骗罪判处 7 年徒刑，卫金祥 3 年，顾妻半年。

在牢里，顾又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囚犯生产手表，其中一道工序是手工送表壳，每人每天要送 1 万多只。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顾想办法设计制造了一条流水线，让机械手送，准确及时。狱方非常高兴，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上海几家手表厂，为上海手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凭借这项技术发明，顾复初本可以申请提前释放，可他拒绝这样做。狱方问为什么，顾说要申请提前释放，就必须认罪，可他压根就没犯罪，何来认罪呢？这本就是一件错案，他宁可坐足 7 年牢。

1983 年出狱前，狱方主动表示想为顾安排工作，留在监狱里参加技术管理。顾断然拒绝，称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大，自己能找到立足之地。出狱后，顾得知刘子奎患重病长期躺床，便去探望。刘已不大能说话，临终前，他让儿子拿来纸和笔，强支病体写了几个字：“很对不起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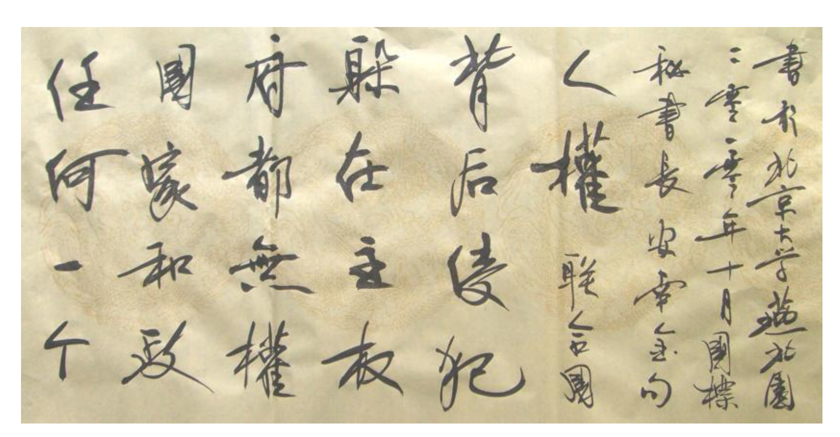
随后顾复初在汤巷一家社办工厂就业，开始生产电缆，并渐渐在此行业闯出点儿名气。1986 年，中国向阳号南极派考察船需要电缆，需要量不大，但技术要求较高，上海有家国营电缆厂感到不合算，推辞着不肯生产。顾听说了，向有关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经过

技术攻关，名不见经传的汤巷厂居然造出合乎标准的电缆产品。汤巷厂的名气响了起来，1987 年被列入上海市星火计划，1992 年获得了星火计划二等奖。同年，顾复初被推选参加全国科技奖授奖大会。

当初顾本无罪，却被判 7 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犯罪。所得酬谢是劳动所得，且对国家有益，为什么算犯法？他付出了劳动，对方不付报酬，是不是也算犯罪？他如是责问法院。二是因父枉子。判决书上称他是反革命子弟。

顾复初无辜蒙冤 7 年，至今没有得到改正。文革前的中国有大量冤案，后文革的中国仍然有大量冤案。顾在服刑期间曾审诉过不下 40 次，都没有任何结果。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这件不平事仍然令他耿耿于怀隐隐作痛,希望有生之年得到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顾当初做的一切，包括指控他的那些罪状，今天看来都是功绩。判决书上说顾是个反革命子弟，这对顾案的处理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顾父无故被抓、失踪，本来就是当初错误政治的牺牲品，在父亲受害的基础上继续加害其子，更是天理不容。历史已经证明，顾复初是个优秀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他淡泊名利，拒绝当区政协委员的提议，同时用自己的发明和企业所得为当地办起了幼儿园、敬老院。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

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华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毕业生，已退休，许多年前采访过顾氏，总觉得顾案判案有误，顾家父子的遭遇不公。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我郑重建议有关方面复查顾案，还历史一个真相，还顾氏一个清白。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语　　焦国标书

《黑五类忆旧》第七期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莫忘造文献　　焦国标

因编本期《黑五类忆旧》，浏览到陈思和教授的《六十年文学话土改》一文。该文有句话引起我许多联想。这句话是：“在 1949 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土改）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六十年的大陆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

我的联想之一是，大陆六十年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此”这个代词，实在上不止可以代土改，也可以代这六十年里的一切重大历史题材。土改题材固无杰作，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野蛮计生这些

题材又如何呢？有杰作吗？同样没有。

联想之二是，不止是文学领域“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史学领域有吗？同样没有。中国每一所文科大学和综合类大学都有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科院里都有历史所，那里的历史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多如海沙”，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历史杰作又有几部呢？不止以土改为题材的，以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迫害、野蛮拆迁、野蛮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历史学著作又如何呢？不也同样影子也不见吗？

联想之三是，学者要研究文献，更要制造文献。中国是文献大国，所谓学者就是在文献里找食儿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学者不仅要在文献里找食儿，还应该，或者更应该，制造文献食粮。你研究的文献都是祖先造的，你也应该制造文献，留给后人当矿藏，让他们从中寻宝找食儿。

职是之故，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不要单单吃文献，也要花一些精力把身边脚下的资料想办法保存起来，供后来的同行享用。如今是硕导、博导满街走，可是迄今我没听说哪个硕导、博导组织自己的研究生编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计划生育等等当代最重大题材的文献。

联想之四是，当代中国学者分两大类，一是书斋文献学者，一是御用歌德学者。这两类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眼睛都是朝上、朝虚，下层民众不入其目。前者的人格理想是传统的士大夫，后者的人格理想是政府官员。士大夫不考虑小民生活，他们考虑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宫廷政治，都是大话语。胡适、鲁迅、陈独秀不谈四书五经宫廷政治了，换成谈民主谈自由谈国民性谈朋友谈文坛对头谈军阀政客了，仍然一如旧士大夫，作品里几乎不见下层人的灾难。

因而我建议硕导、博导们组织自己的研究生，搞搞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拆迁、计划生育等当代重大题材的文献编纂工作。网上就有很多零散的资料，让学生分

门别类做做收集整理编辑的工作，丰富一下文献宝库，也是挺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目　　录

土改惨祸　　吕政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大陆西南山乡读小学。我县是个盆地，周围是山，中间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户人家。那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树木长绿，溪水长流，百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风景十分秀丽。一年稻麦三季收成，人们忙碌勤劳，吃的虽不算好，甚至有时吃不饱，但十分康乐。我从小就会喂猪、养鸡、放牛、割草、养鱼，稍大一点就下地干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干。虽然很累，却也十分乐意去做。

贫富差异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几百亩，房屋几百间，还有池塘、草地、竹林，还有人在政府当官，也有人经营工商业。1945 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车。不仅在我村，在全县也是出名的富家。尽管他家家财万贯，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没有人说要去偷他抢他。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人勤快，有文化，会经营，财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积累的。他们家有钱但不乱花，当官但不腐败，还出钱在村里办很漂亮的小学和毡靴厂，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均免收

学费甚至杂费。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们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时也都以他家为榜样。

村里的贫穷人家，也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田地。每个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运经历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类），导致贫富也有差异。全村 300 多户人家，分住在几个小区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块儿，共 15 户人家，15 户人家又分前村后庄。家家地亩数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户是典型的农业户。户主和妻子十分能干，使牛、种田、挑担什么都能干，一天忙到晚，有时还挑灯夜战。不过，他们一家都没文化、不识字，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种田，偶尔做点生意，虽辛苦，但很少偷摸。让他们干别的也不会，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还一户是专门做棺材生意，开小店，不种田。虽然有钱，人们也不愿学他，看见他怪腻歪的。还有一户，做中人，为买牛卖牛者做中间牵线人，也能赚点钱。他家大儿子还会医术，在本村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也有钱。但是做中人、行医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每只鸡都带俩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还有做豆腐、宰猪、卖肉的专业户，还有土建专业村、将军世家等等。

总之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睦和谐的。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绝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充满阶级斗争，充满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们那 15 户人家，多数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凭力气和本事吃饭。也有两户人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被人称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俩，年青时在外经商。老大忠厚肯干，事业有成；老二吃喝嫖赌，一事无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仅小学或初中毕业。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懒无比，且诡计多端，为人十分奸诈。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蛮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无文化，也无财产，又好吃懒做，没个正经，故生活无着。野仔古、火仔两兄弟经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东西不还。哥俩也经常互打。1949

年以前，这兄弟俩就对我家的东西十分垂涎，迫于国法，也不敢过分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罢了。

另一家有个儿子叫更夫仔。其父没文化，靠种田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时我曾祖父自学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为我县县长。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种田，便求我曾祖父给他在县里谋点差事。我曾祖父为人甚好，便把他留在县衙做报信看门之类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后因生活好转，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这更夫仔长到 10 来岁时，其父死。他读完小学也就不读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没别的本事，除了应付着种点地之外，每天摸鱼捉虾、挖笋伐树，懒懒松松稀里糊涂过日子，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贫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其父给人当长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读书，自强不息，考中秀才，官至县长。又与乡人集资办学，亲自授课，成绩斐然。他还精通医术，常免费为乡人治病。他为官清廉，乡人许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让一子外出求学深造外，其余各子均在家务农或经商。通过艰辛劳苦，盖了房子，还买了十余亩土地。

由于操劳过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过 60 岁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儿子均英年早逝。我记事时，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养塘鱼、养猪，我祖母、我妈、大妈和几个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或车水灌田，没闲过一时一刻。我也帮他们干活，种花生大豆时，我妈翻地我放种子。晚上祖母、母亲、叔叔们还要纺纱织布，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曾祖父当过四任县长，死后政府和百姓还为他树碑立传。我上小学每天都从他碑旁经过，心中常有一种荣誉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着我祖父在家从事农副业劳动支持他念书，最后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史科。解放前当历史、文学教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府委员。

我祖父临近解放时当过近一年的粮食仓库保管员。我伯父当过中

学教员，解放后又考上研究生，当了大学讲师。我父亲解放后参军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三叔参军去过朝鲜，其余两个叔叔解放后上中学，后来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最后当上工程师和大学副教授。

我们是耕读之家。即使当学生或教师，平时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没空也要挤时间参加劳动。我的几个叔叔，一放学就先去地里收稻子或挑担子、打场，很忙很累，但农活再累也要念书。中午干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门板卸下，放在地上躺着睡觉。我们躺下时，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汉字典，学几个单词再午睡。

环顾周围各家，没有一家像我们家那样努力、那样上进。我们家在十多户人家中真的如鹤立鸡群，文化高、作风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亲、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还有一个叫外乡仔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农田干 10 多个小时，农忙时也有请人或换工的。我祖父、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参加劳动，不仅种田，还养猪、养牛、养鸡、织布，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书的，家里有点活钱，生活略比一般邻居好一些。

土改那年，来了工作队。他们摸底调查，扎根串联，也到我家吃派饭，认为我家是团结对象，还把我妈借到土改工作组，帮助成立农会搞妇女工作，计算成分等，常常深夜开完会才回家。最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村里那位首户被划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还有几户被定为富农。与此同时，学校、地方剧团大演白毛女。村民对地主黄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联想。他们认为黄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坏，本村地主好。我在学校也很积极，入了少先队，帮助共产党宣传这宣传那。

土改结束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可是突然从传来消息，要搞土改复查。我们家人想，复查就复查，还能咋的？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派来的工作队员也不到我家吃派饭了，更不找我妈开会了。原来邻居见面都有说有笑的，现在见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脸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邻居偷偷给我们送信，说工作组要搞你们家。我们

一听都大惊失色，如雷击顶。

后来得知，我县土改工作结束后，请来专区、省的检查团验收。他们均认为可以通过了，便呈报中共中央，结束土改。谁知中央报告毛泽东，请其批示，毛竟批示不通过，说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来。原来毛心中有个百分比，每个地区地主户数不能少于这个百分比，否则就要重来。中央抽调大批外省的土改队员，直下到我县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户数。

我家已被他们圈定了！听说要定我家地主，我们的二流子、地痞、懒蛋、投机分子邻居们可高兴坏了！第一次土改时，他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劳动力，定不上地主，他们也就分不到东西，便懒得动弹，不开会不学习。看到临近小区域的穷人又分田地又分房，还大把大把东西往家拿，都眼红得不得了。现在听说来了新的工作队，要定我家地主，他们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来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们经常在我家周围东张西望，有时还用脚步丈量什么。看见我们家人，他们眼中喷射出异样贪婪的目光，像是恶狼见了羔羊，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开会串通、挑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使我们十分害怕。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原本十分积极乐观，突然变得眼光凝滞、唉声叹气，常常抚着我们的头说什么时候你们能长大一点呀！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屋，几乎每夜醒来都看见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长叹，有时还掉泪。

灾祸终于降临了。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十来个人，还有四个民兵，用枪口指着我爷爷奶奶和我妈。几个人上来就把他们按倒，用绳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背后插上竹签，拖着就走，我七八岁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员不在家），最后被推到早已准备好的斗争会场。

几个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们按跪在地。这时台下一片呐喊，口号声、锣鼓声乱成一片。接着就让他们事先教唆好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控诉斗争我们。但是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把更夫仔父亲的前妻，90 多岁的老太太，扶上来控诉我们。老太太说我祖父乘她

房子着火之际，迫她卖房欺压她，还动手要打我爷爷。实际是，更夫仔父亲过世后，他的两个老婆便分开单过。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间）失火烧光，十分困难，缺吃少穿无房住，大家就想办法，安排她住进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她想把房子烧后的地基卖掉，就找到我爷爷奶奶。当时我家没钱，也无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与我家房子也连不起来。可她三天两头来说此事，死乞白懒要我爷爷奶奶买下。我奶奶心肠软，被她缠得没办法，就从我们口粮中扣出两斗米，说是买房，实际是送她两斗米才算了事。此后地基就放在那里，谁也没动。这个老妇，平时我们对她不错，她还乘机讹诈我们。现在在工作队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谢我家，反而恩将仇报，欲把我们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后工作队宣布，从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官僚地主！我爷爷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亲均为地主分子，监督改造。我母亲、祖母是全村公认的好劳力，天天参加体力劳动，还要你监督改造吗？说我爷爷是官僚地主分子，他当过什么官？不就当过几天粮仓保管员吗？说我们家从粮仓挑了粮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挑回来的。当时发不出现金工资，是以粮代薪发给我爷爷的。

更为可笑的是说我们家雇了长工，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那个外乡仔就是我家的长工。那么那个外乡仔是怎么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经灾区，看见不少少妇把孩子丢在路旁。有个三四岁的弃婴，哇哇哭着向他扑来。他不忍心离去，就把他带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当自家的孩子养着。因他来自外乡，小名就叫外乡仔。大了送他上学，一直养到十五六岁，读到小学毕业。因他生性好动，天资又不是很高，小学毕业后（当时文化已不算低了）不愿再读书了，就与我家的人一齐干活，一样吃穿。身体长得十分健壮，20 岁左右，仪表堂堂，肤色红中带黑。我爷爷为了让他日后成家立业，费心机托朋友特意在一个工厂找到一份他十分胜任又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很高兴，和我们家人关系也很密切。

工作队搞土改复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显，我家主要劳动力十分充足，达不到定地主的条件。于是，奸刁狡猾又无耻的土改工作队就和铁蛋、更夫仔以及诡计多端的野仔古等人串通一气，想把外乡仔作为突破口。他们用尽心机，极力挑唆外乡仔，并许诺他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以后好处大大的，还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怜又可恨的外乡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对我家恩将仇报。在一次斗争会上竟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我们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给他饭吃。我家就这样有了长工，就这样被硬定为地主。

定了地主之后，全家可就惨了！我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队工作为由遣送回家。起初还能教书，或给人补习，随后越来越恶化，至 1957 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学校念书，尽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绩十分优异。我经常没钱交学费买书，老师主动给我垫钱。即使这样，还不让我念下去，说我是专政对象。我含泪离开了学校，每天修路、挑石头、挑沙子。我一个叔父，高中毕业，考的成绩很好，但学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愤交加，一天背着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后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坟上大哭一场之后，把整盒的火柴往肚里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汉发现，经灌肠才捡回一条性命。另一个叔叔，解放初参军，在部队搞医疗卫生工作。家里被定为地主后，很快也被送回家。仅有的一点就业费，也被村里那些流氓无赖骗走。他生活无着，精神失常，疯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我爷爷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么苦，我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个入党升官，当了什么农会主席、民兵干部，个个趾高气昂！他们实在真比土匪强盗卑鄙千倍万倍。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帮土匪强盗明明自己是土匪强盗，却说自己是最革命、最光荣。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放人家一条生路，他们却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死为止。

他们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象吆喝牲畜一样把我爷爷奶奶叫醒，稍晚一点就咚咚乱踢门。爷爷奶奶出来后，就被他们押着出去做苦工，一连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非但累如牛马，还分文不给。想问个究竟，他们把脸一沉，露出可怕又狰狞的面目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监督改造，还想要工钱！"

种田吧，留下一点田，非但土质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节已过，又无钱买肥料，只好种点杂粮什么的。这帮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东西，非但不给我爷爷奶奶种田的时间，还把统购统销分下来应由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压给别家，而别人的购粮指标却被他们贪占，害得人家没饭吃。本来我家有几个学生，可以向国家买粮，可他们就是不开证明。他们有购粮指标，又坑蒙拐骗弄来钱；有了粮，又有钱，就大吃二喝。吃饱喝足了就干坏事，就大生孩子。那个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连生下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最后生下一个男孩。高兴得昏了头，大摆宴席庆贺，共有六七十桌，气派热闹的样子简直难以形容，不知道比过去所谓的地主阔气多少倍。过去他们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业，一旦有机会，他们铺张浪费起来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毛泽东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他们最想发财，连做梦都在想怎样抢人家的东西发财，这帮无聊无耻的东西！

我爷爷既无粮又无钱，还要做苦工，饿昏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人家喂猪的泔水缸里去偷捡又臭又烂的白菜叶子充饥。一次被我看见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我抱头大哭！"奶奶，你把我们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过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么今天竟惨到这等地步啊！当晚辈的不能报答你养育之恩，真是罪该万死啊！"奶奶只是掉泪，毫无办法。

爷爷奶奶连累带饿，还遭那些猪狗不如、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歹徒们管制，实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爷爷走出家门，跳水塘自杀。等到找到他的尸体时，已被水泡烂了。我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过几天上吊自杀了。家人为她收尸时，眼睛怎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讯全无。我们明知凶多吉少，但还是忍悲含泪，竭力不去想他。终于传来的噩耗是：家庭被定为地主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文革挨游斗，惨不忍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头戴高帽，双手被绑。但他突然挣脱绑绳，推开旁人，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脑浆崩裂。

三伯父死后，他们不许我嫂子哭，要批斗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们的字典里早已是罪恶的东西了。嫂子怕我们伤心，迟迟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最终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当即晕了过去。

我父亲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挣扎几年，把孩子养大一点。但是这环境、这形势，我们这号好人还能活吗？全身灌满邪魔的二流子们早已成仙成妖了，他们大办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办食堂顿顿鸡鸭鱼肉，大刮共产风吃吃喝喝，他们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奸狡诡诈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瘾，自己不养鸡，竟到公社去诬告我爸偷他的鸡。我爸我妈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鸡给了他。

我爸万般无奈，满腹经纶的大学生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最后只好去学理发。可是那些狗东西连理发也不让我爸干，说我爸利用理发宣传封资修，砸了他的理发挑子。已经活到头了，我爸心一横，把几个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给了人家。那几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说有笑的，谁知那是在最后安慰我们！那几天，他收工后总说去挖点野菜，然后就独自一人背着锄头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见爸爸回来，我妈、我和大弟弟都着急了，四处叫喊，不见人。我们连哭带跑，求人帮忙寻找，黄昏时分才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了他。只见他躺在一个墓坑中，旁边还有一个装敌敌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那几天他一人背着锄头出来是给自己挖坟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敌敌畏躺下，永远离开我们去了。我一时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妈一看也一头栽倒，但很快就爬起来，朝旁边的池塘一头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们把父亲的尸体收拾好，火化后，我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一小

撮父亲的骨粉藏在身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掏出装着父亲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向它磕头。我说：“爸爸呀爸，孩儿不孝无能，未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之万一。今晚望你在天之灵再助孩儿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说完，泪水雨下，我把父亲骨粉重又藏好，然后紧闭眼睛，纵身跳入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游向茫茫的对岸。我大声喊：“老天呀，你开开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粤中土改杂忆　　牧　惠

1950 年代初期，我在中共粤中地委（现江门市）工作。土改中，那里发生了好几宗大冤案，如江门镇郊的楼山事件，鹤山县的宋森被逼自杀事件，恩平县的松仔岭事件。当时我被调去搞地区直属机关的三反，不在土改第一线，对这些案件虽略有所闻却不得其详。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我几次动员身历其境又身受其害的原粤中纵队司令、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抽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把他所见所闻的左祸写下来供后人见识。但是，吴有恒断然拒绝我的建议，甚至根本不愿再同我谈当年的土改。作为他的老兵，我很不理解，却又不敢问为什么。

事后证明，1956 年以前，广东历次政治运动错伤很多干部，与当时陶铸为代表的一些南下干部对广东地方干部的看法大有关系。1952 年夏，陶铸在华南分局党校对学员讲话说：“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势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们估计，广东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们的，县一级的干部大部是我们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的，大部分是人家的。”南下干部这股极左势力对广东地方干部是歧视和蔑视的。

且看楼山事件是怎么回事。楼山靠近江门，粤西区党委和粤中地

委都设在江门，于是楼山不幸成为领导们的土改试点。这时，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已被调到区党委当秘书长、宣传部长，新来的地委书记把自己从湖南带来的一批以廖原为首的土改队员，派到楼山搞土改试点。廖原到楼山后，原武工队员、现任楼山乡长李波热心向他介绍了该乡的历史和现状，表示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廖却不予理睬，偏要选中两个参加过同安堂反动组织的人为扎根对象。廖原一伙人依靠这两个人，用逼供诱供加上酷刑手段，挖出一个 40 余人的“特务组织”及其“反共救国军冈州楼山大队”的番号，李波竟然是该大队的参谋长，地主苏东海为司令员（只有解放军才称司令员，廖原搞假一眼即可看穿）兼大队长。不到一个月，就逼供出特务、特嫌 200 多人，逮捕扣押 40 余人。

廖原于是被请去作典型报告。听报告后，吴有恒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说：“廖原这个典型报告是假的。”并指出了破绽所在。可是区党委领导却仍安排廖原到华南分局机关作报告。吴有恒看了廖的报告文本，发现这些报告是从湖南《土改简报》上抄来的。县公安局长庞震也提出怀疑，派出调查组前往调查。经调查，证实廖原提供的材料不可靠，并了解到土改队酷刑逼供情况。在此情况下，地方领导仍批准廖原的做法，称楼山案民愤很大，群众要求押解“特务”回乡斗争。由此引发乱打乱斗，仅木朗村一天便打死 4 人。李波被打得含冤自杀。另有 4 人以特务、地主、恶霸罪名被枪毙。而且枪毙是在专员兼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中分院院长谢创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的。

半年后的 1952 年 6 月，粤西区党委在不断听到楼山广大群众不满呼声的情况下，派吴有恒亲自率领检查组到楼山，终于查清楼山事件纯属混入共产党内的三青团区队长廖原制造的假案。廖原和他的合谋者赖志群被正法。然而对此案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县、地、区党委并没有一人被处理，甚至连检讨也不必，报纸上更未出现半个楼山事件的文字。李波和其他被害多达 20 余人的干部、群众白白地成为牺牲品。在连南县，副县长邵良楚捏造县府内有“反共救国军”，司令正是县委书记兼县长成崇正。三人被枪毙，成崇正入牢，株连了三百多干部受

冤。

陶铸来广东搞的两次反地方主义、土改整队，不知伤害了多少地方干部。粤北连县还发生一桩以老干部父亲的人头来开展政治攻势的冤案。这位老干部的父亲，充其量是一般地主，没有罪恶，可是土改开始就被枪毙了。据他们说，不杀老干部的父亲，声势不够大，只有杀老干部父亲才能起到强大“政治攻势”的作用。

广东华侨多，许多就是海外打工仔。他们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房子，买回三两亩田，让在家守活寡的妻子（往往再加一个养女）能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这些侨眷根本不是地主，但是为了多分果实，仍然把她们划为地主，房屋被没收。华侨和侨眷不但身心受到伤害，有的眷属甚至被斗死或被迫自杀身亡。恩平君堂镇石潭村一旅美华侨郑家宰夫妇，1952 年在土改中被当成地主批斗，还迫使他们写信给在海外的儿子郑 XX 寄 3 千美元回来充作斗争果实。郑家宰夫妻二人，走投无路，一起自缢身亡。郑 XX 在外闻讯之后，捶胸顿足，悲痛万分。后来，他家虽被端正了政策，由华侨地主改为侨工，但作为儿子的郑 XX 一直对父母的惨死耿耿于怀，不但对共产党满怀仇恨，而且对自己一位在外地参加土改的亲侄也甚为不满，怀疑他与自己的父母不幸被害有关，足足长达 42 年都拒绝与之来往，音信全无。

补白：文革下放农村，村里有一地主婆。丈夫死得早，一个小脚女人守寡还带个儿子。没劳力，没技能，只好上大户人家当佣人。人老实勤劳，和东家的关系好，母子两人吃穿用住都在东家。当佣的工资没处用，就积攒下来买点田，再放租出去，收回的租谷积下来也换成田再放租。多年下来滚了些钱，还供了儿子读书。直到解放，她还在那里当佣人。可她的田呢，够地主了，就成了地主分子。儿子就要高中毕业了，地主崽子是不该读书的，就不许再读了。虽说高中也算知识分子了，因是地主崽子，也不会让你干什么。另一个地主婆，90 岁多时来城市生活。隔壁请了裁缝做衣服，剪下的碎布丢到垃圾桶里，她都去捡来，成块的剪好，做鞋垫；成条的剪齐，折起来缝一路，做

成带子以备用。别的地主、地主婆什么样不知道，这两个地主婆肯定不像过去书中或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

爸爸的出身障碍　　鸭　山

爸爸因为地主崽子的特殊身份，被禁止上高中，最后考进县农业技术学校。在学校，爸爸人际关系特好，为人仗义，处事能力强，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主持学生会日常事务。部队来县里招空军一名，爸爸被校方保送，经体检面试，爸爸成为全县唯一的胜出者。最后政审一关，爸爸因为是地主崽子，被取消了参军资格。

那时恰好赶上三年大饥荒，家家都没有粮食吃。秋季，爸爸去挖老鼠洞。老鼠洞与人类的房子布局一样井然有序，分为卧室、库房及厕所。鼠洞里的粮食很多，摆放得很整齐，而且各种食物绝不会混在一起，都是分类摆放。爸爸挖得许多粮食，供自家食用。冬季，爸爸一个人赶着马拉爬犁，走到几十里以外的芦苇塘去打鱼。把苇塘上的冰层打破以后，不计其数的野生鱼就都争抢着来呼吸空气。这时爸爸拿起插捞子（捞鱼的用具）直接舀鱼就可以了。每次去都可以打几麻袋的鱼，自家吃不完，身为地主崽子，又不敢拿到集市上去“搞投机倒把”，只好悄悄便宜点儿卖给商贩，贴补家用。

爸爸毕业后被分在某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由于与学生年龄相差无几，工作起来倒也得心应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爸爸的一生。他班里有个年龄较大的男同学，经常对同学们说学校某未婚年轻女教师不正经（男女作风不好）。该女教师知道后，哭哭啼啼找爸爸告状。爸爸是个急性子，加之年轻气盛，把那个说闲话的学生找来对质。他不承认，爸爸一气之下打了他俩耳光。事后挨打的学生家长知道了，告到校长那里。校方决定让爸爸写检查，爸爸拒绝写。本来就不喜欢当孩子王的他借机辞职，校方以不给爸爸户口为由力挽他。他最后放弃了户口，选择了辞职。

爸爸来到双鸭山市的大伯家，大伯通过关系在双鸭山给爸爸重新上户口。爸爸为别人家拉煤，掏火墙，建房子，苦活累活他都忍受。后来县里征兵，全县只有几个海军名额，爸爸报名后，体检等各项都合格了，等到政审时，因家庭成分是地主，又被拒之门外。

1963 年，中铁二局在双鸭山等城市招工，爸爸报考后被录取，从此在中铁二局工作。那时东北的铁路网最发达，南方几乎没有铁路，爸爸他们就在贵州一带修隧道，建桥梁，铺铁路，在外漂泊。

1967 年，爸爸与当民办教师的妈妈经媒妁之言结婚了。爸爸工作努力，为人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后，援助坦国修建铁路，爸爸与另一位工程师做为二局十三处的佼佼者，成为预备援坦的技术人员。政审时，爸爸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取消援外资格。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爸爸的单位停工，工人天天打扑克，打麻将。当权派被打倒了，造反派头头是爸爸的光腚娃娃朋友，权力都交到爸爸手里。可是在家中的妈妈，却因为与地主崽子成婚，混淆阶级界限，被校方辞退。

补白：小时候我听母亲说过斗地主的事情。她说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头目，在大队的批斗会上喊完口号后，就用有钉子的木板朝已绑住跪在地上的地主头上拍去，直至地主被打死。后来许多从那里路过的人说，一到晚上或阴雨天的时候，好像那块地就有人在哭泣。再后来，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女头头被法办了。我们村本来是没有地主的，是从邻村分配了一户地主，供大家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和管理。这户地主人家特好，是两代相传的中医世家。其父仲光是远近闻名的中医，三十年代就著有医学专著。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幺叔挺身而出，以保护医生为由，把这户人家的顶梁柱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斗死的当场死了，没斗死的到处游街，有的因此自杀了。剩下的虽然活着，但跟死了的没什么区别。没有被批斗的，就把标语写在他们家的墙上，地主看一次标语就像死了一次。 ??

我家七口亲人是这样被饿死的　　李发刚

我们一家的变故发生在 1952 年的土地改革。父亲接手当家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很快摸清我们家的底细：当地首屈一指的土墙瓦屋，仓里有粮，罐里有油，圈里有猪，不仅土地多，而且雇长工、请短工。雇工就有剥削，剥削就是地主。工作队发动群众诉苦，将我父亲批斗一阵，理所当然划为地主。更要命的是父亲还有二房，便被认定为霸占民女。于是这个只会读诗文、从不与人红脸的文弱书生被定性为地主恶霸。

民兵一绳子把父亲捆到官渡区公所关了起来。在关押的几天里，由家住官渡的一个姑姑每天给父亲送饭。老家干沟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亲乐于助人、兴办学堂，便经过商议，利用送公粮到官渡镇的机会，联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区公所派员核查后，居然接受民意，把我父亲放了。

可是不久，乡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们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将父亲单独另关一个单间，由民兵持戒专人看守。土改工作队在堂屋向我们一家八口人郑重宣布：瓦屋房没收，上山住岩洞去。并要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民兵从我家拿出一口原来煮猪食的破锅，一个背篓，一钵没吃完的“合渣”，还有一口袋苞谷皮磨成的粉子（我家原来喂猪的），命令我们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家来到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无名山头。我们离家后，父亲在村里被群众大会斗争过几次，最终由我母亲陪斗之后，被押送到官渡区公所。不久被判刑，解押到沙洋劳改农场劳改。后来的事实证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因没留在本乡，却因而留下一条活命。刑满后父亲不想回老家，一则有愧于自己的过去，无颜面对一家 7 条冤魂；二则从心底感激劳改农场依法办事，让他保住一条性命并获得新生，便决意留在“新人队”。

我妈被撵上山之前设法带了火种，那口破锅能把野菜和少量苞谷

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上暂活下来。可是没两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马上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大本，柯艾氏（我小妈）下山陪斗。小妈以自己女儿尚幼，不能久离为由，宁死不下山。民兵们也还通情达理，就要柯曾氏（我妈）下山陪斗。不幸的是，他们发现我们居然还能生火煮菜、搭棚避风，日子过得还蛮“滋润”，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们那口破锅砸了，留下两个民兵把我们一家撵到一个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凉的山头上，那里周围十几里没有一人。我妈知道那个地方荒凉，已经预知我们家只有死路一条了。被带走陪斗前妈妈悄悄对我说：“玉泉，你机灵，懂事，不要一家都饿死在那个山上，悄悄投奔你外婆去吧。他们是贫农，兴许会给你一条生路。”说完，我妈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斗。

那时我虽然只有 11 岁，却有一个坚定信念：活命。在两天都没进食熟野菜的情况下，我沿着一条“毛狗路”去寻找下山陪斗的母亲。在一块庄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围没人，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几把菜豌豆角塞到嘴里，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饱了。至今回想起来，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饱之后，恢复了些气力，再往前走。

突然，发现我母亲躺在路上。赶紧过去一看，母亲的白眼珠翻出来了，睁得大大的，怎么叫她都不答应，推她，硬邦邦的。原来妈已经死了。我连眼泪都没有了，害怕周围有人发现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妈妈，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回头地走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头看了妈妈最后一眼，算是与慈母永别。傍晚我终于到了外婆家。外婆为我妈的惨死，且不得收尸，搂着我哭了又哭。其实，那时“磨棹地”还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她把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煮给我吃，似乎不仅是对我的补偿，更是对女儿亡灵的祭奠。我当时几乎只有生理需要，狼吞虎咽地吃下鸡蛋之后，胃里一会儿就像满锅开水在翻腾，难受极了，很快就全部吐了出来。上山之后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里接受不了这样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几天，漫漫调养过来，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互助组轮到在我外婆家干活，他们发现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孙，一个地主崽子，立即报告村领导。领导不敢马虎，严肃警告外婆："你是贫农，怎么能丧失立场，弄一个地主崽子在家里？赶快走人，否则，后果自负！"外婆一家老实巴交，不敢不听村长的话，只好要我去投奔家住官渡附近的一个远房二伯。此后，我成天东躲西藏，或给别人做"抱儿子"（养子），或当零工，或当放牛娃、小猪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都干过。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我知道我必须活下来。

几经人生周折，我终于长大成人了。我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却见字习字，不断温习，一般常用文书、写个书信之类的，难不倒我。我勤奋老实，一米七五的个子，经人撮合，二十岁便与同为反革命劳改犯的女儿，一个十分可人的姑娘结了婚。

岳父蔡明宝的刑期早满，已经是"新人队"的队长。他得知农场需要新增劳动力，就为远在家乡的女儿女婿报了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便从竹山来到千里之外的沙洋农场，并且成为场里的正式农工，与"新人队"的父亲、岳父同在一场，时有见面。如今一晃将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儿子从警校毕业后，也分到沙洋农场，当了干警，现在已是三级警督，副科级干部。我早已从沙洋农场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随父母先我而去。

对于六十年前的那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许是年纪大了，我总是魂牵梦绕千里之外的那块"磨棹地"，因为那里有我一家饿死的七个亲人。他们是三十七八岁的母亲、三十挂零的小妈、十四五岁的金花和银花、幼小的奶女儿、六七岁的如意和随意。

不知道我悄悄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在"磨棹地"究竟又撑了几天。小妈既缺乏山上生活的经验，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说不定她在孩子们之前便已离开了人间。如果小妈真的先幼儿而去，在荒无人迹的"磨棹地"，剩下的五个孩子将在怎样的恐惧和煎熬中度过自己短短的余生？还在官渡的时候，我曾想知道，他们的尸骨是不是当时就被野兽

吃掉，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终于我没敢问。

几十年之后的上个世纪末，我回到阔别将近五十年的干沟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饿死，尸臭顺风而来，当地政府不几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现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权，驱赶妇女和儿童上山，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可曾受到过追究？当事人后来对此可有几分愧疚？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汶川大地震时，现场指挥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个生命，令我由衷地感动。我衷心拥护当今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觉得过去那段历史需要如实记录，因为，我家“磨棹地”的那段遭遇，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横或者一点。

补白：罗红从小就是具有领导力的娃娃头，性格强悍。文革时期，家庭成分不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地主，有个小朋友常以此欺负他。先是吵架，骂他是地主崽子。小罗红不服，便动手把对方打得找不着下巴。后来，被打小孩的家长找上门来讨个说法，可父亲仔细问清楚情况后却说：“你儿子欠揍！我是国家干部，我儿子是国家干部的儿子，不是地主崽子的儿子，比工人阶级还高一层呢。你没教好自己的儿子，该打！”父亲的撑腰让站在一旁的小罗红眼前一亮，阴云散尽。此后，每每遇有人欺负，二话不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然后记在小本本上，伺机报仇。父亲保留了小罗红身上的野性与自信，这对他以后的人生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到今天他都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影子。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便是：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不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在恐惧中长大　　陈破空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

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只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父亲被毒打，构成我人生的最早记忆。这一切是怎麽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爲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

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麽意义？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

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领导，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他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 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于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之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患绝症，骤然离世。虽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沈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

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当我偶有机会成爲“孩子王”的时候，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

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的怒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亲，"六四"终于觉醒。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毕业报到时的冷遇　　黎学智

1963 年 7 月 27 日早晨，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黎学智我从吉林省长春市动身，到通化地区长白县教育局报到。经过六天五夜的奔波，终于到了县教育局。我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派遣证、

共青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派遣毕业生工资关系介绍信、户口迁移证明、城镇居民粮油关系证明，经查验无误之后，发给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教育局工作安排介绍信。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档案，用一只尚未削过的铅笔在我家庭出身“地主”栏里若有所思地敲打多次，然后阴丧着脸、拖着长音冷冷地说：“热烈欢迎你到山区工作，到朝鲜族中学报到去吧。”我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似有不祥之感。

“请问，到朝鲜族中学怎么个走法？”我问。“那我给你挂个电话吧，让他们派人来接你。”阴丧脸拿起话筒，说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朝鲜语。不多时，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学校第一教导主任金永旺来到教育局，同样是阴丧着脸，看样子非常不高兴，不冷不热地说：“欢迎到我校工作，跟我走吧。”

“金主任，请问，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多少名学生？”我边走边问。“这跟你黎老师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你的任务就是教课!”金主任十分不解地看着我说。

“金主任，请问，学校有多少名教职工，其中有多少名党员？”我继续天真地发问。“黎老师是党员吗？”金主任这次实在是不耐烦了，不无讥讽地反问我。

“我不是党员，但我想靠近党组织，经常找党员汇报思想和工作。”“噢，原来如此。”金主任终于明白了。

两人默默无语地走着。我不知道金主任心里想的是什么，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自责，悔不该向领导同志盲目提问。

到校后，金主任把我介绍给出纳员小郑。小郑也就 20 岁多一点，反正只比我小不比我大。他两眼对我射出敌视的目光，我十分反感，同时又感到莫名奇妙。他问话的方式和用词则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姓名，年龄，哪年哪月参加工作，请出示工资关系介绍信!”

我把所有的介绍信和证明都交给了他。小郑首先查看了我的户口迁移证明和城镇居民粮油关系证明，忽然冒出来一句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看来你是准备在长白落户了？”我没吭声，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出纳员，他有什么权力审问我？”

当他看到我的共青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顿时显得怒不可遏："你是共青团员吗？""是。"

"你们学校毕业生都是共青团员吗？""不全是。"

"那你怎么就是共青团员呢？""上级批的。"

"哪个上级？""可能是学校团委吧。"

"你们学校团委有权力批团员吗？""我不知道。"

"告诉你，我到现在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郑出纳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如坠云雾之中。我入团有我的情况，他没入团有他的原因，我在长春入团与他在长白没入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对一个地主能入团和一个贫农不能入团十分气愤，十分不满，因此心理失衡。接着，他又审查我的工资关系介绍信:"你是七月下旬报到的,所以只能发给你七月份的半月工资，有意见吗？""没有。"我接过工资后问："那我的路费呢？""你来长白的旅差费已经超支，我们不能补发，你得回到长春去原单位报销!"

我的天哪，我从长春来到长白乘火车坐汽车整整用了六天五夜的时间，让我回长春再回长白，这长达十几天的时间谁来准假？这途中的巨额开支由谁负责？

我到二楼教导处找到金主任，向他陈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派遣费的报销规定，原则上是多退少补：如果派遣费超过旅差费，剩余部分退给接收单位；如果派遣费少于旅差费，超出部分由接收单位补发给毕业生本人。金主任说："你告诉郑会计，就说我同意报销。"

我从二楼回到一楼，向小郑转达金主任意见，小郑说："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金主任的意见。"我第三次从一楼走到二楼，向金主任转达郑出纳意见。金主任说："你叫郑会计上来，我跟他说。"然后我走到一搂，又第四次同郑会计一起从一楼走到二楼。金主任与郑出纳用朝鲜语争论了几个回合，我第五次从二楼走到一楼的总务处。最后小郑极不情愿地把三十几元路费钱甩给我，嘴里嘟囔着："给你，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第一天参加工作就学会告状!"

就这样，我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报销了平生第一次旅差费，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我的见习工资是每月 49.5 元(一年后转正工资为 59.5 元)，而初中毕业后留校的出纳员小郑的每月工资为 31.5 元。这本来是国家有关工资政策规定的，与我毫无牵连。

补白：我出生满月时，我妈抱我回娘家。一进村子，认识我妈的人向我妈打招呼："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啊?"我妈说："是儿子。"我妈的亲二婶刚好从旁经过，马上大声喊："生了个儿子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当女儿养，将来有老婆娶吗?!"我妈的二婶一向恨我妈不听话，不和我爸离婚。几十年来，我妈的娘家人，包括我的两个舅父，都不停怂恿我妈跟我爸离婚，令我妈几十年来都在矛盾和不安中度过。我读小学时，祖母常对我说："你读完这几年小学就会没书读了。上中学要推荐，我们出身不好，成分高，就不用想了。你必须在这几年尽量学多点东西，等长大了你们自己去找门口，看哪里有纯女户要招郎入舍，你就落脚吧！呆在家里你们会成为寡仔的！"地主群体本来是农村的精英，一直以来都有非常优秀的遗传基因，按理他应该可以获得最好的婚配。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娶一些残障女子为妻，累及后代。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廖亦武

老威（廖亦武)：你的电话号码是张进谦老人给的，他对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么啦？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与我分吃生腊肉的故事，将我丑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头饿死鬼一片接一片，连粗粮都不好找，到哪儿去弄肉？况且他张进谦就是孙猴子，能折腾上天，也不过是个劳改犯，更不可能从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灵活现，不亲历咋个能编得出来？
????郭正洪：见他的鬼！退一万步，就算他神通广大，弄到了 9 两腊肉，依他张大炮饿了连屎都吃的个性，会把比钻石还稀罕的肉分给别人？那不成雷锋了？既然是雷锋，共产党又何必关你劳改你，搞个神龛将你供起嘛。哼，都是劳改犯，谁也不欠谁，可他张大炮偏偏到处乱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润了我的肠，我就熬不出头……气死人了！有一回，我两个吵着吵着，差点在丽江街头打起来。他说：姓郭的，狗吃屎还晓得舔老子的屁股，你连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评评理，这叫有文化？这叫老革命？骗子啰。
????老威：都 80 出头的人了，还记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记，死人就不记，憋着，看那个死在那个前头。
????老威：那我们不提张进谦了，从现在起，将他一笔勾销。土改期间你多大？
????郭正洪：我 1925 年生，土改时已 20 好几了。我们兄弟姐妹 7 人，加父母，全家共 9 人，在石鼓街上还算有名。我家有 10 间铺面出租，包括两个院子，所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划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没有。祖祖辈辈都没有。田地属于喇嘛寺，在丽江地区有 5 大寺，周围的农民世世代代都从寺僧手中租地种，然后向他们交租子。当然，直接用新粮交租也可以。拉市坝的指云寺你可晓得？当年我们就是给指云寺交租。
????老威：指云寺的名气太大了，仲巴活佛经常光顾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班禅由仲巴活佛护驾，也来到指云寺。当日惨雾愁云，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阵冰雹，我住的院子里一片白，樱桃树叶子全打没了。
????郭正洪：我家从指云寺租赁了六、七亩，另外还在我姐夫（也划为地主）手里佃了几亩，所以总共有十一、二亩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农忙和收割时，我家请过长、短帮工，这又是划地主

和富农的一条杠杠。

????老威：如此推测，石鼓的剥削阶级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 20 多户吧，几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家底的。而贫雇农都是没住两年的外来户，人人都在寻觅发财机会，一土改，果然就鸡犬升天了。其实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不是换汤不换药，就要闹翻身。我琢磨着，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压在下面的不太见光的土，一锄一锄翻上来，见光过多的土，一锄一锄翻下去，要长庄稼，就得年复一年折腾啰。可妇女闹翻身是咋回事？几千年受压迫？不就是几千年受压迫吗？难道还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

郭正洪：1951 年，清匪反霸过了，减租退押当中。当时粮食大涨价，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粮，一年 9000 多斤的定额，给不起，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去变卖抵押，值钱的，不值钱的。先是首饰、细软，后是桌子、板凳、床。柜子上的铜扣忍痛撬下来交了，过一阵，实在没法，才交整个柜子。唉，门槛都交了，农民协会还不罢休，将我母亲连斗三天三夜，跪倒压杠子，昏过去也打，醒来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当时你母亲多大？

????郭正洪：59 岁。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挤干为止。本来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云寺交租，顶破天也就划个富农。可工作组是外来的，不了解情况，一切就任由贫雇农主席团宰割了。地主帽子乱套，你不承认就暴打，还问你：为啥不老实？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我父亲一直关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实了，才放出来。

????老威：划阶级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错，对富农实行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所以多划地

主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多分财产。穷人咋能不积极？斗垮你，你的就变为我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过左，啥子叫过左？就是够不着地主，可以通过斗争，搞成地主。当时我有个堂妹在区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说啥都认账啰，运动中过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老威：你没挨斗吧？

????郭正洪：没有，上头有父母顶缸嘛。土改时，我已输成穷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为地主子女，仍要背整个大家庭的黑锅。

????老威：听说你曾被劳改？

????郭正洪：那是 1957 年反右期间了。

????老威：农村也反右吗？

????郭正洪：城里反右，农村组织学《人民日报》，没右派？就把四类分子弄来斗争，算解放前的旧帐。我和张进谦就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

????老威：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张进谦提过的那个胆小鬼老表。你经不住恐吓，把啥子陈谷子烂芝麻都坦白了，政府却没有从宽……

????郭正洪：这老狗还说了我些啥？

????老威：他还说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裤裆里了。

????郭正洪：哼，他狗胆包天，他抵赖到头，差点叫打死逑了，刑也没见比我少判。

????老威：听说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转过来就多挨了几百拳头。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参加国民党和“放水淹秧田”，还有他老子张永生纵子行凶，唆使张进谦本人殴打贫农李继魁致残。

????老威：张进谦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几年前，张进谦十几岁的时候，他家里的花牯牛跑丢了，他就在山沟钻来钻去地寻，急得满头大汗。正巧碰上李继魁坐在路边石头上耍，他就拉住问牛的下落，不料李继魁根本不买账，

还开玩笑：这阵你找牛，隔会儿牛找你。张进谦气惨了，就飞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滚下沟了？

????郭正洪：没有。他从小就是个瘸子。

????老威：哪“致残”罪名咋个贴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发，就贴得上。嘿嘿，张进谦这辈子，吃亏就在脾气坏，强出头，死不认输。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还吓人：充壮丁，帮国民党打共产党算一条；倒卖枪支弹药和鸦片烟算一条；通匪算一条。

????老威：如此罪大恶极，该枪毙了。

????郭正洪：瞎鸡巴编嘛，不承认就吊起打。我说当壮丁连枪都没放过，逃回来几乎就变乞丐了，谁相信？枪支没贩过，匪没通过，鸦片烟嘛，从丽江到中甸，是人都贩过的，因为解放前，这方水土盛产这东西，差不多当作货币在流通。可是张进谦稀巴烂的狗头榜样在眼前，我的身子骨远没他结实，统统不认账，肯定叫乱棍打死。哎哟，熬不过就认嘛，公审会一开，丽江县法院判的，他抗拒从严，8 年；我坦白从宽，7 年。

????老威：没多大区别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啰。我跟张进谦一起长大，一起当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劳改。日他妈的土改！我在国民党手头，受够了窝囊气，到了共产党手头，反而是剥削阶级！活到 80 几，尽在受剥削，现在都撑起一把老骨头下苦力。我日他妈的土改！

????老威：你俩的命运差不多，可你们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张进谦嘛，有时蠢到家，有时又精到头。我们一道蹲看守所，下劳改队，在米厘铜厂，狗日的经常装病，逃避下井；到了长水铜厂，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信他活得出来。嘿嘿，他硬是有 9 条命呢，现在还摇身一变，享受离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还不太服气。

????郭正洪：我和他都当过国民党的兵，可他太能折腾，一出来就东跑西颠地告状，居然撞进边纵副司令朱家壁家里去喊冤，去要待遇。脸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这么说人哦。

????郭正洪：总之，张进谦是出了名的“八张嘴”，从石鼓到劳改队，没有人能辩过他。所以朱家壁一听他是边纵 7 支队的兵，就同病相怜，亲自出头帮他恢复党籍，落实组织关系。因为边纵被打成“土匪武装”，大伙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虽为中将，也含冤几十年，直到 80 年代平反，已经风烛残年了。这张进谦捡了个大便宜，第一个就跑我家来报喜。本是一个槽里拱食的猪，转眼间他的级别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飞黄腾达，忘了自己爹妈是谁，也忘了眼前站着知根知底的老郭。还边喝酒边给我唾沫横飞地乱吹，说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给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张进谦有鸡巴关系？你能左右国家的大形势？

????老威：你没必要较真嘛。

????郭正洪：穷途潦倒就来找我，还说我沾他的光。这一次，我没对他客气，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姓张的，我以前咋从来没听说你是地下党？他愣了一下，我又说：你因为作风问题，从维西电台被部队资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气疯了：与自己的娃娃亲婆娘约了几次会，就是作风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妈的地主家庭牵连！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们翻脸了？

????郭正洪：没有他张进谦，我也平了反，不实之词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劳改不会吃啥子亏。

????郭正洪：1964 年我就刑满，遭强迫留场就业。

????老威：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有啥子区别？

????郭正洪：一个叫犯人一个叫职工。到了文革，又没区别了，统称“反动派”。挖煤、修铁路、搞建筑，我换的单位不比张进谦少，直到

1985 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补发了多少钱？
????郭正洪：没有一文钱。

补白：过去两年多的下乡采访，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不幸的现象：地主后代的配偶几乎都有大小不同的残疾，他们的后代很多也有先天性缺憾。最典型的是阿发，父母是地主，因熬不住日夜批斗，1952 年双双悬梁自尽，留下他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1973 年经好心人介绍，阿发娶了一个先天性肢体不全的女子做老婆。生的两个女儿倒没什么，但儿子却是自闭症患者。土改使成千上万的地主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后代成为贱民，处处低人一等，受尽侮辱。相同的劳作，得不到相同的工分。购物分配，贫下中农不要了，才有资格分到一点。与人冲突，不管你是对是错，你是地主出身就是你错。你想建房子，村里也不会分配土地给你。

刘文彩水牢真相　　马成广

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水牢。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一时说她是 1943 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时说她早在 1937 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

从 1981 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 70 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一样也不见。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说是在 1951 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 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 3 天，就

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 7 天 7 夜。”1954 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了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筹办人员按此设想进行“布景”。

1958 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 1954 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制作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

1988 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

最近去参观泥塑《收租院》，讲解员带我到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说所谓刘文彩的水牢，实际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鸦片烟土。大烟怕干燥，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中共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了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补白：我有个诗友，今年 88 岁。他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陪毙”经历。1950 年，他在外地工作，听说父亲在家乡被定为恶霸地主，很是惊诧，于是回家乡打听情况，结果他自己这个地主仔也莫名其妙被抓了进去。“进监第二天，有三位地主被绑出去枪毙，连我也被绑了去，当时我的心早就死了。没想到，几响枪声过后，我毫发未伤，原来我是陪毙。”我们家乡有一个叫林游松的小地主，大约每年有几十石粮的田租可收。1949 年前夕，他知道变天了，地主没好日子过了，就跑到香港躲起来。住了一段时间，从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得知，香港海关大楼一条水泥柱的价钱就值 30 石粮，他就想：我每年的田租还不值人家一条红毛土柱（我们家乡人将水泥叫做红毛土，意为外国人的土），算什么地主呢？于是又从香港跑回来。结果被逮个正着，后来被枪毙了。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佚　名

1947 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 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地习俗，无论怎样死的人，死时都要穿上新衣裳。上台被斗，等于就死。尤其是女性，被斗前都把好衣服穿在里面。

康生大笑，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康说：“地主婆里边穿

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一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 780 多人，其中地富分子 190 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 580 多人，为地富的三倍。

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激起群众抵制。当时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长)。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等人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

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

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43 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 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 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土改斗争结束，"挖浮财"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宣读了小册子，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分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 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 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

补白：2006 年 7 月 13 日，我到广东某地开会，顺便参观了一个

藏在山旮旯里的村庄。这个村庄里一大户人家的老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房屋主人是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伯。他说，这座房是他的祖先从南洋背回二十万块大洋建造的，至今从这所房子里走出去的族人就有一千七百多人，有不少后人在海外谋生。我看到房屋的外墙还遗留着文化大革命或土改时期写的两条标语。一条是“向地主恶霸总清算”，另一条是“不准地主恶霸抬头，只许穷苦人民翻身”。老伯告诉我，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之所以至今也没清理，是想把它留住下来做个纪念，警诫后人。

道县杀人一例　　贾　月

1967 年 8 月 26 日，一个漆黑的夜晚，湖南省道县的源山沟的滥杀无辜在继续进行。周群，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横岭中心小学教师。其丈夫蒋汉正原来是她的同事，因为是地主崽子，去年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回农村劳动改造。丈夫被抓走批斗，周群一直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伴着 3 个孩子进入梦乡。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她惊醒。她还未穿好衣服，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一群人已闯进屋里。他们凶神恶煞似的吼叫道：“起来，起来，开会去！”“带好弟弟妹妹，妈妈一会儿就回来。”离家前，周群又跑回床边，对被吓哭的大儿子说。

当她被推到禾场时，只见火光熊熊，几十个民兵个个手拿马刀或鸟枪，如狼似虎而立。火光下，她看到了丈夫，被铁丝紧紧地捆着，还有 14 个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个个战战兢兢。

周群听见有人对支书说：“蒋汉正还有三个崽仔呢。”于是，党支书又到周群家，把三个哇哇大哭的孩子也拖到了禾场上。

这时开始出发。周群虽然是贫农出身，因为是地主崽子的媳妇，也被捆起了双手。三个孩子跟在后面不住啼哭。周群以为要被押到区里去，但到木枫山，支书唐兴浩下令停止前进，就地集中。唐兴浩威

风凛凛，高声宣布：“我们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死刑！”处决的方法叫做“丢硝眼”，即从洞口推下布满笋石、深不见底的溶洞。

开始行刑！支书唐兴浩点一个名，民兵牵过去一名死囚丢进溶洞。点到蒋汉正，两个民兵大汉象拖来一只将要屠宰的羔羊。蒋汉正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凄楚的眼神望着可怜的妻子、儿女。

“爸爸！爸爸！”儿女们死命地哭喊。周群疯也似地想扑上去，但被强盗似的大汉恶狠狠地推了回去。

周群是支书唐兴浩点到的第八个名字。三个小儿女“妈妈妈妈”的哭喊，凄惨欲绝，令在场的每个人心颤。虎狼恶汉凶狠地推开了孩子。周群没有哭，她不能在孩子面前哭，她哄孩子说：“妈妈一会就回来。”

硝眼洞口，凉风嗖嗖，黑古隆咚，阴气瘆人。

“跪下！”两条恶汉将周群按到地上，对准后脑壳一根钢钎打下去，跟着飞起一脚，把周群踢进黑洞。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见“妈妈”的叫声，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儿女连同一个四岁的狗崽子小女孩也被扔下了硝眼。因为有人垫底，他们都没有死。大女儿给中周群解开了捆手的麻绳。

第二天，有人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大女儿连滚带爬躲避，跌到了底层。周群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在死人堆里，他们一家竟然都活着！从洞外的地狱移到了洞里的地狱，一家人又团聚了！

在黑古隆冬的地洞里，一家人拥在一起，哭啊哭！却又不敢放声哭。蒋汉正被铁丝捆住，怎么也解不开。

孩子不住地喊渴喊饿。周群五内俱焚，却万般无奈。蒋汉正已精神失常，喉头不断蠕动，嘴里念念有词。周群抓住丈夫：“汉正，你清醒一点，清醒一点！”蒋汉正立刻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

大儿子先去了，小儿子也死了，大女儿也死了。奄奄一息的蒋汉正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

了几下，没有咽下水，头一歪，也死了。

在洞中地狱里团聚的一家五口，只剩下了周群一人。最后，周群被两个学生救了出来。她在黑洞里过了整整七天七夜。但是，周群从洞中地狱出来，到洞外仍是地狱，仍然继续遭到追捕。

摘帽前后　　同　年

我有一个小伙伴，名叫李茂，身体健壮，人也聪明，由于出身地主，经常受欺负。有一次大队发毛主席像章，看到别的小孩都有，他也向民兵排长要。没想到，民兵排长说他一个地主羔子哪配戴毛主席像章，还扇他一巴掌。李茂的母亲看到孩子挨打，心里难过，就去找排长说说，结果也被民兵排长羞辱一顿。她说："俺娘家又不是地主，我也不该随便受欺负。" 排长说："你嫁给地主你就是地主，我们贫下中农就有权力欺负你，欺负你你也白看着。"李茂的母亲气得大病一场。

有一次队里栽的杨树苗被人折断几棵，民兵排长暗中调查，几个小孩指证说是李茂折的。这下不得了了。李茂先是被捆起来打，又被罚一百多斤粮食。他妈又差点儿气死。杨树苗实际上是狗子折断的。狗子的大爷是民兵营长，村里不敢惹，就拿李茂当替罪羊。李茂很倔强，打几顿也没招认。李茂上初中了，学校里发展团员。他以为只要表现好就可以入团，没成想老师说："地主羔子还想入团？做梦娶媳妇，你想得怪美！"这个老师特别差劲，一到填表时就故意问李茂什么成分。李茂一说是地主，就会引来一阵哄笑。

于是李茂就恨自己的爷爷，因为爷爷给地主家管过事。后来有老人告诉他："你爷爷很好。他本人也是长工，只因老实、卖力，地主家就让他管点事。他也很会过，省吃俭用攒点钱，买了几十亩地，到解放后就被划成地主了。他又没干过坏事。有的人家本该划成地主，结

果吸上大烟，把地卖完了，解放时反而划成了贫农。很多人家是不该划成地主的，像河工弟兄几个，只因为他哥当过国民党的一个小官，结果都被划进去了，你亏也没有办法。你恨你爷爷是不应该的，他是个好人啊!”后来李茂迷上武术，日夜苦练，练得筋骨强壮，力大无穷，一气能翻几十个石磙。

地主摘帽以后，地主和贫下中农一下子都适应不了：欺负过地主的人担心地主报复，地主担心不老实会重新戴上地主帽子。一时间大家相安无事。后来听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了，贫下中农接受不了。再后来听说刘少奇平反了，一些人更是接受不了。他们想：坏人咋能一下子变成了好人呢？看来世道变了，估计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再后来，市场开放了，土地承包了。

李茂看看形势，估计天不会变了，就开了打面房。生意很好，赚的钱也多了，愿意嫁给他的人家也不断托人说媒。有了钱，李茂不再低三下四。于是有人造谣说，表现不好的地主还会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李茂听了笑了笑说：“要想再回到过去，除非一个人从棺材里坐起来。可惜啊，他永远起不来了。”有一天，羞辱过他的那个老师来打面，李茂不愿意给他打。那个老师说：“我打面又不是不给钱。”李茂说：“你给钱我也不给你打。”说罢，李茂掏出一棵烟独自抽起来了。那个老师脸上很挂不住，恐怕再多说会自找难看，就默默把粮食带走了。李茂望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

有一次邻村放电影，李茂看了半截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走到半路上，他感觉自己的棉花地里有人。他不知是干什么的，就悄悄蹲在地头。过了一会，他明白了，是有人偷他家的棉花。李茂冲了过去，偷棉花的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三个人都被李茂打得躺在地上，李茂的拳头多硬啊！他苦练多年还从来没用过呢。他拿出手电筒一照，惊呆了，没想到偷棉花的竟是我村的人，也没想到会是原来屡次欺侮他的民兵排长和他的老婆、弟媳妇。李茂这时明白了：怪不得这几个人挨打不出声。这时，棉花地里来了很多人，李茂说：“老少爷们都在，我可没有冤枉你们吧。都是几十几的人了，这样做不合适吧。走吧，

把棉花给我背回去。大家都在，其他的我也不说了。”结果，民兵排长回到家十几天没出门，丢人啊！回想过去自己做的事，惭愧啊。

后来有人跟李茂说：“像民兵排长这样的孬货，你应该狠劲揍。揍过了再送到派出所。想当年他是怎样欺负你的，你不能忘了。”李茂说：“过去的都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他，这应该是时代的错误。想当年，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能被整死。现在让他欺负咱他也不敢。像咱三叔做的就不对，过去欺负过他的人都被他揍了一遍，这又何必呢？欺负过我的人，现在我不找他们的事，他们还害怕呢。我就是找借口一人揍他一顿又有啥意思？过去他们不该这样做，现在咱也不该这样做。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都是同族同宗乡里乡亲，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你看排长见我那个猥琐样，我可以骂他几句说他几句，那又有啥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他要是知道有今天，那时他会那么猖狂啊？上次咱老师来打面，我就不该搞他难看。他过去没意思，咱现在不能没意思。现在，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没好好学习。不然，也跟劳动（本文作者，我）一起考上大学了。现在咱也不错，房子盖起来了，你嫂子也是这几个庄有名的美人。我已经知足了。原来我就想，咱们肯定和长春、老广他们一样，一辈子打光棍——地主羔子，谁敢嫁给咱啊！现在看来，天是不会变了，咱们也好好过日子吧!”

补白：解放了，农会抄家，家里曾经请过的长工翻身做主后，穷尽其能地折磨我祖父母。我父亲考上哈工大，家不敢回，是大伯父偷偷送点钱给他，才有去上学的路费。父亲是靠二姑妈接济读完大学的。哈尔滨冬天很冷，实在受不了，父亲就在身上裹上牛皮纸。 大学苦读四年，又专修一年俄语，可这时中苏断交了，父亲到苏联留学将来当建筑师的梦想破灭了。父亲身高有 174cm，风华正茂，俊朗儒雅，英气逼人，是单位绝对的男 1 号。可是一个地主崽子，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心仪他的姑娘最后还是离开了他。后经人介绍，和我母亲结婚了。母亲身高只有 150cm，胖胖的身段，容貌非常普通。她非常爱父亲，可结婚不到一年，父亲就以专业对口的名义调走了，宁愿选择一个人

漂泊在外的生活。

一定把官当到厅级　　刘加民

地主羔子一词始于文革。此词字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贬意，实际上却是一种极大的污辱，有着极强的杀伤力，给地富后代造成的心灵伤害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 我是个地主羔子，我也有很多地主羔子朋友。其中一位现在北京工作，是有名的教育专家，曾被评为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过他。文革期间有一天，贫协主任到学校给学生发桃子，大家全都有，唯独不给他。当时他不到十岁。不给也就罢了，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就是不给你这个地主羔子！"然后领着学生们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我们和地主羔子势不两立！"

我这位朋友告诉我，那个时代他从来不敢抬头走路。一抬头走路，就有同学站出来骂他："你个地主羔子也敢趾高气扬？"平时不敢当着别人的面大笑，一笑就有同学站出来说："你个地主羔子怎么那么高兴啊？你想反攻倒算是不是？"他说那时他几乎天天夜里做恶梦，梦中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是抬着他往水库里扔，就是一齐把他往油锅里按，有时候还用刀子一点一点割他的肉。他总是在大声喊叫中醒来，醒后浑身都是冷汗。

这些受到伤害的地主羔子，后来和贫下中农子女一样进入到共产党的机关，成为政府官员，早年遭受的那些心灵创伤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后来。有个地主羔子对我说，他一定要把官当到地市级，不然对不起在文革中被人打死的爷爷。一个女地主羔子嫁了个当官的男地主羔子，曾经的共同经历使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感情。但是后来，男的为了进一步高升，周旋于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几个女人之间；女的为了丈夫把官当大，委身于几位上级领导，最后这对夫妻发生了悲剧。

花桥乡的土改　　苏　人

我作为 Z 县新政府的一名通工作人员，被派到该县花桥乡参加土改。前清的举人兄弟沈韶九、沈修五和实业家沈芷人就是花桥人。沈氏一家两兄弟都考取举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很了不起。沈芷人是沈韶九的儿子，留学法兰西和比利时八年，获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解放前去了马来西亚。土改期间，我们就住在沈家大院。此时沈家已被划为地主，逐出本宅，其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农民。

沈家世代书香，祖祖辈辈的藏书和沈芷人从海外购回的各种书籍不可胜数，藏满几大间楼房，抵得过一个图书馆。新搬进沈家院子的二三十户翻身农民，不知是得了什么指示，还是迁怒于那些书籍，竟全体总动员以沈家藏书烧锅做饭、煮猪食。他们用大背篼将书背到灶屋当柴烧，烧完了又去背。那段时间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地烧书，其他燃料都不用了，就烧书。一日三餐，加上煮猪食，完全靠书做燃料。农民的锅一般都是担水锅或三水锅（能盛一担水或三桶水的锅），要把那么大一锅水烧沸，把饭和猪食煮熟，是需要很多燃料的。一家每天要烧多少书？一个大院每天要烧多少书？

我在沈家院子住了俩月。在整整两个月里，农民们一天不停地烧书，才终于将沈氏世代藏书烧完。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主动到一户农民家里去帮忙烧火煮饭，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完全在用书做燃料。我实在是太吃惊了！

在灶屋凌乱的书堆里随手翻了翻，我发现有《万有文库》、《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随手又抽出一本，竟是《广益丛报》，我不禁喜出望外。小时侯常听父亲提起《广益丛报》，说传世不多，极有收藏价值。想不到第一次见到《广益丛刊》，竟是在它即将被焚烧的时刻。

趁人不在，我共翻找到四本《广益丛刊》，记得其中一本上记有温宗尧出使西藏到达拉萨的新闻。我将四本《广益丛书》暗暗藏在一边。这时主人来了，我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往灶里加书。主人很客气地接过火钳让我休息，边烧书边笑着说："这些书烧了好，地主就是把书读多了才害人，我们要烧掉这些害人的家伙。只是这些书不亮火，烟子大，还是没有烧柴好。"后来文革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看来直接源于15年前的"书读多了害人"的观念。

我也是读书人家出身，看到天天这样烧书，心里很难受却又不敢说。有一次我试着跟村长淡淡地说："烧书煮饭烟子太大容易熏坏眼睛，怎么不烧柴呀？"村长呆呆地望着我，一言不发。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什么法子呢，他是个石匠，目不识丁。

那四本《广益丛刊》我后来悄悄带回Z县城家中。父亲见了非常高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惜到了文革，四本《广益丛刊》依然难逃劫难，和我家的大量藏书一起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花桥附近一个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40岁左右，叫李善厚，解放前在Z县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其夫叫沈仲元，其女沈学朴是花桥小学的教师。群众天天把李善厚拉出去斗争，而且是扒下衣服，赤着身子跪在寒风中挨斗。她的衣服经过反复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后来她索性就只穿一件单衣来接受斗争。

这一天，她又被拉出来跪着挨斗。农民们涌上去一把将那件破烂单衣扯了下来，李善厚一身白皙的皮肤和两个乳房便呈现在众人面前。她早已顾不得羞耻了。此时是数九寒冬，农民们大多提着取暖的烘笼。李善厚本是漂亮、娇气的音乐教师，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可是他们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转身提来事先准备好的从水田里捞起的冰冷的稀泥，七手八脚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这还不够，另有人抬来一架风车，对准李善厚，抓住手柄一阵狂摇。风呼呼吹向赤身糊满稀泥的李善厚。这还不够，还有几个人手执大斗笠前来助战，将李团团围住，一起舞动大斗笠向她扇风。

这时口号响起来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一起狂呼：“打倒顽固地主李善厚！”村长也上前怒喝：“快把金银交出来，不交是过不了关的！”说也奇怪，这样反复斗争了很多天，李善厚虽然每次都冻得脸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没有病倒。

积极分子们见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银，又心生一计，把她在花桥小学当老师的女儿沈学朴通知过来，让沈学朴打通她的思想。那时地主子女都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否则就会遭殃。沈学朴带着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财产）回来了。此时院坝里已坐满了群众，斗争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工作组和沈学朴谈话，问她母亲究竟有没有金银。想不到她竟很爽快地一口回答：“有金银！”我们便要她动员李善厚交出金银。我这里正在慢慢给她谈话，外边的群众却大声怒吼起来：“把李善厚拖出来！不听沈学朴的花言巧语！”随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坝里。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沈学朴怒目圆睁走出去，指着跪在地下的母亲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农民养大的！”李善厚大惊，仰起头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趁母亲抬头，沈学朴挥手居高临下啪啪啪连甩母亲几个耳光，然后用脚一阵猛踢。李善厚发出声声惨叫，泪水滚滚而下。

沈学朴态度非常坚决地质问母亲说：“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舍不得拿出来？”李善厚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哪来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书的。儿啊，要有良心，不要只图你自己梭得脱就乱说！”说着瘫倒在地大哭起来。

沈学朴见母亲在地上哭得滚来滚去，扭头走了。

????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把李善厚从地上拉起来，扒去衣服，又开始了抹稀泥、扇风车的斗争。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开罢大会，积极分子们留下来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已凌晨二三点了，忽然有人报告李善厚跑了。积极分子们急了，李善厚的金银还没挖出来，让她跑了岂不是重大损失。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村民兵和积极分子火速出动，开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们有的打起灯笼火把，有的拿着电筒油灯，铺天盖地大搜索。山洞里摸，河沟里捞，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

有人在李善厚的后妈的门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闻讯跑过去。不用说，肯定是后妈给李善厚换了衣服掩护她跑了。不由分说，后妈被押到办公室拷问。后妈什么也不说。由于她是贫农，也不能把她怎么样。约一小时后，她说家里蒸有一笼米包子，准备明天赶场去花桥卖，时间长了怕锅里水烧干，要回去看看。经同意后，她回家去了。

约半小时后，又有人大喊李善厚的后妈吊死了。大家赶去一看，果然已经悬梁自尽。这时天快亮了，随后叫来几个地主，草草埋了。她锅里果然蒸着一笼米包子，还是热的，数一数，有 33 个，分给几个抬尸的地主吃了。

李善厚到底是怎么跑的，两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李善厚见形势严峻气氛恐怖，总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便和女儿沈学朴暗中策划逃往重庆。沈学朴的弟弟那时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到那里去躲一躲。

女儿哪有不心痛母亲的，沈学朴暗地里早为母亲流干了眼泪。为了成功出逃，沈学朴为母亲准备了衣服和路费，又偷偷仿刻了村长的私章，伪造了一张路条。后妈冒着极大的风险，一口答应帮助她们。她是个贫农，不受任何人监督，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后妈家换了衣服，抄小路赶往附近的精华乡。夜幕沉沉，没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惟一的疏忽是仓促之际将破衣服掉在了后妈门前。二人如同惊弓之鸟，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岭，天亮时已经走出几十里路。沿途完全是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她们历尽艰险，徒步走了 600 里到重庆。

沈学朴在会上当众痛骂踢打李善厚，只不过是母女二人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

????沈芷人先生是重庆著名实业家，在 Z 县老家购置田产甚多。他不能回家理财，就委托花桥人陈月轩管事。陈是有名的老中医，精于歧黄之术。土改中，陈也是斗争对象，每天晚上照例被拉出来扒光衣服跪在地坝里泼冷水抹稀泥扇风车。

天寒地冻，谁受得了如此折磨？陈月轩本是精通药性之人，挨了几天斗争后便心生一计。红砒可以防御冷水浸袭，于是便在每次挨斗之前往身上抹红砒。泼冷水的时候药性发作，他正可以借此躲过一劫。积极分子们看陈月轩每次不论怎么泼冷水都无所谓，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一天，陈月轩照例抹了红砒上场挨斗，到该泼冷水的时候，药性发作了，全身如火烧一般，可谁知积极分子们这天却不泼水了。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中间有什么奥妙，要看个究竟。陈月轩热不可当，等了很久也无人泼水，心急如焚，于是止不住大叫："拿水来呀！"如此一来，积极分子们反而越发不泼水了。一会儿药性大发，烧得陈月轩皮肉发裂，满地打滚，苦苦哀求泼水，落得积极分子们看了好一阵热闹。

????

????村里有个地主的儿子叫沈联航，刚重庆大学毕业。民兵捉拿逃亡地主，莫名其妙地把他也一起押回来了，并罚他交出黄谷 300 石。沈连航从小离家去重庆读书，对家乡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他交出 300 石黄谷，他看形势很严峻，没怎么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晚上斗地主，他被民兵带到会场。看到其他地主跪成一排，他也主动跪下去和地主们一起挨斗。他去哪里找 300 石黄谷呢？民兵追得急，他害怕了，就谎称县城有熟人可以借钱。听说能找到钱，马上由民兵陈以洪押着他进城。从花桥到 Z 县的漫漫崎岖路，走了两天才到。他们在城里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哪里找得到熟人借钱。两个人饿得肚子疼，钱却一分没找到，只好卖掉衣服换饭吃。沈联航的好衣服已经被当成胜利果实没收了，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没有人要。陈以洪不得已把自己稍好一点的棉衣卖了才填饱肚子。沈联航为什么要

这样欺骗民兵呢，原来他是想借机逃避斗争，得暂时的解脱。最后他因欺骗贫下中农遭到更严厉的打击。

为了壮声势，过一段时间要枪毙一批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这一天，花桥场上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审会。把几个死刑犯的罪恶宣布后，行刑的民兵即上前将死刑犯的帽子或者头巾摘掉，准备推出去执行枪决。死刑犯中有一个姓沈的地主，刚从拔山押解回来。此时他已无话可说，只等一死了。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径直走上台去对审判长说，刚才宣布的事实与沈某不符合，请求枪下留人。大家认得此人姓肖，解放前是个道士，成分贫农，为人比较正直。会场一时鸦雀无声，全场人都把眼光投向审判长。审判长马上进行复查，果然查出沈某的案子有误。原来民兵去拔山解押时搞错了，被判死刑的是另一个姓沈的地主，关在拔山没有押回。这一个沈姓的地主是判的五年徒刑，却被押回来执行枪决。由于肖道士挺身而出，在生死关头将沈姓地主救了出来。不久，上级宣布停止镇压，所有死刑犯一律免死，那个被判死刑的沈姓地主也因此躲过一劫。两个姓沈的地主，一个要毙的没毙，一个不该毙的差一点毙了。生死之际，命悬一线，亦属传奇。

补白：地主、地主婆一家垂头丧气地站着，村民们则自带凳子围坐一圈。首先勒令地主老实交代过去如何剥削农民，然后村民站出来揭发。孩子们也没闲着，把地主的孩子（他们被称为地主仔）拉来批斗，要地主仔趴着让贫农的孩子当马骑。过去你们地主把我爷爷爸爸当牛马，现在我们解放了，轮到你给我们当牛马了。

台湾的土改　　康　慨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初，占台湾农村人口 11%的地主拥有土地 56%，88%的农民只占耕地 22%，近 40%的佃农和雇农无地。他们向地主缴纳

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 50%以上，有的高达 70%。“封建剥削极其严酷，农民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村经济极其落后。”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操作，于 1949-1953 年在台湾开展土改运动。

台湾土改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变为事实。蒋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陈诚决定“不以暴力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不抢富济贫”,“不实行激烈农民革命”,“实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 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焦国标撰联并书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 年 7 月，台湾当局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 2.5 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券（7 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 成 ）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 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

????70 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

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反观大陆土改，贫下中农争先恐后瓜分地主浮财，无不笑逐颜开，都认为强占地主财产是一种革命行动。这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这种仇视地主的言行延续到7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视和凌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多地主子女在历次运动中不堪受辱卧轨或投河自尽。

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证明了从阶级斗争到妥协，从阶级敌对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阶级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学说的破产。柏杨语/钱振选书

晋绥土改暴行种种　　余　任

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为止。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

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 63 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 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

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

?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 1947 年冬至 1948 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写道："据 1948 年 6 月 22 日统计，兴县 8 个区域 290 个村，打死 1050 人，其中有地主 380 人，富农 382 人、中农 345 人，贫雇农 40 人。自杀共 863 人，其中地主 255 人、富农 285 人、中农 310 人，贫雇农 11 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 63 人。"

? ?? ?

土改如何算剥削账　　叶匡政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应该是土改学。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场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从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对于今天的中国，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研究它。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是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哪来的钱买的？""靠剥削来的钱呀！""你为什么要剥削人？""大家还不都一样嘛，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 1989 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观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这样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或者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农民诉的苦："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却做到了。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自己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地主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上来。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非常清晰，也确实有效。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之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把地主活埋），也犯得心安理得了。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你是怎

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

地主袁力锋之死　　佚　名

家乡土改中揪斗不少地主，有的还遭到镇压，其中包括袁力锋。

袁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因煮盐为业，略有家财，土改中定成地主。那时政治上上纲上线，斗争起来残酷无情，人性扭曲，亲戚反目，骨肉相残，妻子批斗丈夫，儿子告发老子。袁力锋运气太坏，儿子告发老子之类的事也降临到他身上了。告发他的是他的一个侄儿，说他私藏武器，有一背篼手榴弹，悄悄倒到了水塘，而且是在他授意下，由侄儿亲自背出去倒了的。

土改工作组马上把袁力锋抓了起来，由侄儿带路指认现场。一起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地主。大冬天，几个地主下水打捞了半天，连个手榴弹的影子也没有。接下来，很自然，他受到拷打。一天，有人报告，说他畏罪投水了。工作组带人赶到事发现场一看，发现他投水是实，但人却还没有淹死。原来他身材瘦小，又穿了件大棉袄，跳到水塘后怎么也沉不下去。工作组的人把他打捞上来后，捆到街上的柱头上示众，连湿衣服也没有让他换一换。他脸冻得铁青，身起鸡皮疙瘩，在柱头上颤栗。

袁力锋平时为人谨慎，待人和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还是挺不错的。在他遭捆绑在街柱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对他很同情。我父母亲就很想给他端碗饭去，但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终于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

下给他端半碗饭吃。

袁力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快不行了。工作组一合计，认为让他就这样死了，会没名没分，不如把他趁早打死（枪毙），还可以教育群众。到了打他那一天，工作组派人去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碗鸡蛋面，马上遭到一顿臭骂：“狗日的！剥削农民还不嫌不够，还想吃面！”端到他面前的还是天天端给他的煮红苕。

袁力锋是同其他十多个地主一起镇压的。那天，全两河区几个乡的群众都集中到两河宽宽的河滩上。河滩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安放了喇叭，工作组的人就坐在上面。下面是群众，一把草加一墩石头，就算是座位。程序是先揭发批斗，然后高呼口号，最后是执行枪决。打袁力锋那天，他的亲戚也是在场的。

1950 年代，家乡农民每家每户都养狗，无论贫贱富贵，都是这样。区别在于，富贵人家的狗大一些，贫贱人家的狗小一些。大狗小狗，跑得到处都是。那时的狗是用来看家的，十分凶狠，跟现在城市居民养的宠物狗完全不是一码事。土改时，凡是遭到镇压的地主都是人民的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因而，一般来说当天是不敢有人去收尸的。袁力锋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大群狗在河滩争夺食物，厮打之声远近可闻，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

袁力锋的一个成年的兄弟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去收尸的时候，尸体已经所剩无几了。两个人走了十多里路，用绳索捆住残骸，从两河抬了回来。等到把残骸抬到坟山的时候，两人又饿又累，连挖坑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就草草把残骸放到一个古墓洞穴，捡些石头封住洞口了事。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扩大耕地面积。大人开挖坟山，小娃在附近玩耍。阳光灼灼，眼孔、鼻孔、嘴孔，三个圆溜溜的孔洞，一个完整的头骨就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一个肩扛锄头的农民路过这里，一锄头下去，只一下，顿时把完整的头骨敲打成了碎片。

由于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袁力锋的骨骸早已无踪无影，现在

他的后人要去祭奠都找不到地方了。

揭发袁力锋的那个侄儿，土改后不久生个男娃娃，样儿倒长得很乖，也肯吃喝，喜欢笑，但是有问题。吃喝以后总是要呕吐，还要放声大哭，哭得脸青面黑的——他生来没长屁眼儿。没屁眼儿就屙不出屎来，实在憋慌了，屎就从小鸡鸡儿处渗透出来了。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很差，这样的病没法医治，于是带到绵阳进行手术。绵阳的医生在小儿屁沟里开个口子，口子外安个塑料小漏斗。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娃娃还是呕吐，还是放声大哭，还是哭得脸青面黑。有时一哭闹，一挣扎，噗的一声，塑料小漏斗从屁股上喷出，屎照样屙不出来。把小漏斗找回，重新安放在人工屁眼儿上，一哭闹，一挣扎，又噗的一声从屁沟里喷出来了。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娃娃还是在痛苦中夭折了。

袁力锋有个儿子，那时正在上学。在老子挨整的时候，公开同父亲决裂，划清界限，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不过，有人听这个儿子私下讲，其实对土改中揭发、批判、镇压他老子的人，心头还是非常仇恨的。

补白：我岳母是学生成分，因其父被划为地主，她终生只能在一个小县城当营业员。我岳父要求入党，党组织从不批准，因岳家是地主。我岳父一生对党员很崇拜，当初我与他女儿认识，老人家一听我是党员，立马同意。我岳母的大哥，四八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水电系。家乡在斗地主，不敢回家，跑到武汉，在一个水库工作。因地主出身，在单位终身不受重用，七九年后才给他定个工程师。他的大儿子上山下乡回不了家，招工推荐上大学从来没他的份。他应该是地主的第三代。他的二儿子后来考入华工大，现任武汉某局局长。我岳母的弟弟，解放时还是个孩子，家乡还是给他安个地主帽子，从小到大到老都在农村。谁愿意把女儿嫁给地主羔子呢，就是地主的女儿也想嫁个贫下中农。老人打了一辈子光棍儿。我见过他，很聪明的一个人，农活什么都?会干，还会木工。我曾问过他，现在农村的地主后代在干什么？

他告诉我，这部分人，学习很勤奋，上大学的上大学，没上大学的也发了财。早年看电影《流浪者》，里面有句台词：“小偷的后代就一定是小偷吗？”当然不是。可是在中国，政治迫害一直延续到第三代，真是恶政了。

十指点灯　　张家正

当时正值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白热化时期，共产党急需兵源、粮源、财源。杀人土改绝对不是为农民谋利益，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用血腥残暴方法制造民众分裂，使农村社会自相残杀，从而达到战胜国民党的目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表面是分土地给他们，实际上土地只是诱饵，目的是把农民绑在共产党的国共内战的战车上，跟着共产党走。农民跟着共产党分了土地，杀了人，斗了地主，就只能跟共产党走了。

1953 年底，我作为文书，参加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的一个土改工作组。那时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做依靠对象。

我们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烂，就进哪家访贫问苦扎根子。就像毛泽东点拨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就是我们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我们就要依靠他了。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懒做、偷鸡摸狗。

当时共产党利用的是穷人的仇富心里。最穷的找出来了，最富的也就找出来了，最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了。先轰开局面，就是杀人啦，确定这个村第一批杀 20 个、30 个，拉出去啪啪啪一干掉了这些人，农民胆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

贫雇农高呼的口号是斩草除根，因此杀地主的手段惨绝人寰，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甚至

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盖头，跪下来，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这个是最起码的了。还有十指点灯。如果有些地主现在还活着，十个指头都是光光的，不用问，是土改时被烧掉了。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点燃，叫十指点灯。

分到土地的农民好景不长。没两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种的粮食归国有，还增加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民从此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所谓土地收归国有，其实就是中国只有中共一个大地主。现在中国进行再一次土改，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都垄断在自己的手里。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政府，要买地也只能从政府那买，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产商。

补白：我们知识青年点的厨师叫张玉民，生产队让他教我做饭。我跟他学会了做河南名吃胡辣汤，因为张师傅是河南永城人士。生产队看张师傅特别老实，就想发展他为党员。有一天他非常腼腆地请求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是户长，队长听你的。"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不够党员标准，缓些天再加入共产党。我很纳闷，我们想加入还不够条件，他怎么能推辞呢，真是不可理解，因此我没有答应他。那几天他特别郁闷，经常把饭不是做咸了，就是蒸馒头把碱放多了。一天听到生产队党支部要给他的老家发外调函，我高兴地告诉了他，不料他的脸色特别难看。第二天他没有来知青点做饭。生产队通知我说，张师傅老家老人生病了，他请长假回老家了。张师傅一走，我忙了起来，经常要提前起床 2 个多小时，晚上又要迟睡一个小时。春耕开始了，张师傅仍然没有回来。一天党支部书记突然通知我们说，张玉民是个地主羔子，已经跑了，外调材料回来了。我们很吃惊，一下子感觉到他已经是个坏人了。大家议论了好多天，我的心情也开始沉重起来。我当时是以贫农和革命军人子弟的身份下乡并当了户长的，可是我清楚，我姥姥家是地主成分，而且全家天主教徒。至今 32 年了，张玉民师傅你可好？我曾经做梦梦见你开了一个非常气派的饭店，胡

辣汤的味道实在美极了，至今让我回味无穷。但愿这都是真的。
戎爱平

土改斗地主的运作模式　　李巧宁

土改前，经济上相对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农村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说，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当地农民中的威望，使之名誉扫地，为乡民所不齿，从而打破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

斗地主要先动员。要让农民普遍起来斗争作为乡村权威的地主，必须从思想上说服他们，打破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报复和良心、命运等观念。为此，新政权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农民，人是有阶级的，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剥削阶级，他们是靠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发达起来的；没田没地，生活贫苦的人是被剥削阶级，他们是因为被人剥削才生活困苦的。地主是剥削阶级，为富不仁，游手好闲，穷凶极恶，不仅剥夺了本该属于贫苦农民的田地，占有了雇农的大部分劳动果实，而且霸占了贫苦农民的妻女。贫苦农民只有在新政权的支持与帮助下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才能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

????阶级和翻身的话语看似简单而有逻辑性,但离农民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等）太远，和农民所信奉的社会伦理（有借有还、人各有命、做事凭良心、租地交租天经地义等）大不相同，更何况农民和地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邻里关系、宗亲关系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谨慎、勤劳实在，是公认的本分人或于己有大恩大德的人。因而要让农民把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现象都用阶级、翻身这一条线贯穿起来并不容易。

????为了使这套话语尽快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民所接受，土改工作队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

????理论讲解就是通过大会小会向农民讲阶级剥削及翻身的道理。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 1950 年 10 月至次年 2 月曾先后在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以土改工作队成员的身份参加土改。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向农民讲阶级理论：10 月 31 日，“下午开贫雇农（即无地少地）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11 月 12 日，“饭后急回集，召开村干代表会，讲阶级，未竟”。11 月 15 日，“开二次代表会（农会会员会）。上午 XXX 致开幕词，XXX 讲阶级”。11 月 16 日，“晚召开贫雇中农会，讲阶级”。12 月 20 日，“至张冉 XXX 寓所开贫雇农中农会，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农会作用”。

可以看出，讲阶级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反复说明的艰难过程。具体怎么讲呢？通俗地说，就是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点一点地归于阶级剥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释。比如在青年会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释为阶级剥削，穷人娶不起媳妇或看财礼嫁女儿是因为贫困，贫困的根源是地主无情地夺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劳动果实。在老年会上，把老人没钱看病、遭儿女嫌弃等日常问题和阶级紧紧挂钩，称这些都源于穷，源于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其他阶层的会议上亦如此。曾在四川泸州进行过土改工作的吴茂荪 1951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介绍土改经验时就强调：“妇女会上应将一切妇女痛苦归之于地主，家庭不和亦然。”

理论讲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队成员实施。它面向一定群体的听众，有相当的影响面，所讲的问题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为每个个体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千差万别。针对个体进行串联，弥补了理论讲解不易深入具体的缺憾。串联有时是工作队员入户发动农民，有时由工作队培养的根子联络进行。所谓“根子”，是土改工作队下村后，经过了解情况，寻找到的苦情大、有热情、善于团结人、可以为工作队所依靠的典型群众。由于根子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对每户的具体情况及每个人的性格都有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们和农民面对面地交谈，逐个地启发动员，既能从每个动员对象的具体问题出发，以农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农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阶级问题，又可以用阶级观

点把其它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联系起来，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联有时是在根子和动员对象之间一对一地进行，有时是根子带着几个已经串联好的人一起去和动员对象交谈。串联的内容一般是从农民的穷苦谈起，千方百计地把穷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剥削与罪恶，自然地激发起动员对象对地主的仇恨。这样的串联对思想单纯、思维方式简单的农民一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请看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 1952 年 2 月土改串联的一幕。2 月 7 日晚，一批串联来的人一起在邓荣禄家串联穷苦农民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他捏死。

????但有时，串联也不是费一番唇舌就能见效的。同样是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1952 年土改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邓旺家碰到邓荣福。我们围着火，同他谈了很久的家常。在这次谈话中才知道，他他曾受过下回（屯子名）地主邬枫先长期的剥削，他曾先后当过邬家七年的长工。我们帮着他算了剥削账，可是这个单身汉的感触却并不大。”另一件是：“天福家穷，根子从现实的苦况出发去串联天福老婆。……问她衣服为甚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甚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都不敢去串她。”

????遇到邓荣福和天福老婆这样的主儿，就需要多次串联，或用诉苦的方式来启发。诉苦就是由培养好的苦根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饱蘸感情、声情并茂地诉说地主剥削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巨大苦难，然后由土改干部或其它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当众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标引向具体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但要算剥削，还要查政治压迫，不但要追穷根，还要追后台，由

地主阶级到帝国主义，由反革命分子到蒋介石到杜鲁门。”诉苦是一种煽情，它不仅可以使听众由他人之苦联想到自身之苦，而且会使参与者的苦难感成倍地膨胀。经追查穷苦根源，浓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阶级。

????诉苦一般经过如下主要环节：寻找可能的苦主（或称苦根）→启发引苦→小会诉苦→帮助总结小会诉苦的经验教训，指点一定的诉苦技巧，培养成熟的苦主→大会诉苦→干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阶级压迫。要使诉苦产生预期的效果，寻找人品好、生活苦、会诉苦的苦根很关键。找到合适的苦根后，土改干部对他们进行启发，引出他们的苦情，并帮助他们根据土改斗争的需要对苦情的内容加以取舍，然后给予苦根在小会上诉苦的实践，并帮助苦主分析总结小会上诉苦活动的经验教训，指导一定的诉苦技巧，经过几次小会诉苦的实践锻炼后，逐渐使之成为成熟的苦根，并选择其中的突出者到大会上去诉苦，煽起更多群众的苦情；土改干部在苦根的诉苦刚刚结束，群情激愤之时，趁热打铁，及时地运用阶级观点对苦根的苦情进行分析，并明确地把受苦根的根源指向地主阶级，把群众愤恨的焦点引向地主阶级。

陕西南郑县十八里铺区在总结土改诉苦经验时所说："诉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启发运动，打破顾虑，深入进行讲苦、引苦、连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够意想到自己痛苦，而激发出激烈的诉苦要求。这时即应开始典型诉苦，以苦引苦。在诉苦过程中，领导善于根据情况随时启发诱导、深入连苦的教育，使台上与台下领导群众的情感完全融合起来，苦苦相连连成一片。在几个典型的引苦下，为了普遍诉苦，应速转向小组诉苦，小组诉苦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照顾到面的发展），发现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即可正式转入大会诉苦，诉苦也必须要和追穷根结合起来。"

????在诉苦活动中，无论苦主还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农民所熟悉的，所以对农民的触动较大，煽情、发动的效果也相当明显。

很多农民在听诉苦时都被深深打动，形成了一定的阶级认识。

这里是广西柳州柳城县 1952 年土改中几个屯的根子们小会诉苦的一个场景:“根子们围着一堆柴火团团地坐着。主席杨坤林（南村人）说了几句话后，大家渐渐地诉起苦来了，其中四个女的诉得最成功。当关妹说到她被卖到六休不忍离开自己的爹娘及被卖后生活如何困苦的时候，她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坐在她旁边的三个妇女也跟着她哭了起来。山脚的桂英对她的苦情还没有诉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父亲及逃难时被鬼子冲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妈，以及她被地主剥削的苦况时，便放声号啕痛哭起来。有几个男的贫雇农也跟着落下泪来。”

????这次诉苦会连在座的土改干部都被打动了:“这个会不仅教育了农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从诉苦中受了一次阶级教育的洗礼。”大多数土改干部所宣讲的阶级观点多来自书本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自身并没有多少切身的阶级仇恨和感性的阶级意识。他们用阶级观点组织农民诉苦，反倒给他们自己所接受的阶级理论增添了鲜活内容，强化了他们的阶级认识，并更坚定地以之教育农民。土改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这种互动，催化了阶级意识在农村的成长。

????通过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加上在地方戏、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到处布置“贫雇中农团结紧，消灭地主阶级做主人”之类的口号，几种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起来斗争地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

????为了彻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风，斗地主一般有两个主要环节：其一是开斗争会，其二是没收地主财产。

????开斗争会是打垮地主威风的重要手段，新区土改中各地几乎对每个地主都开过斗争会。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乡为单位的。为了把斗争会开得轰轰烈烈，这类会议一般都与诉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养好的苦根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

激起与会者的愤怒情绪，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下由地主交待认罪。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不仅要看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众的斗争下表现得服服帖帖。

广西柳州柳城县山脚乡 1952 年 2 月 24 日晚上斗争地主杨福相的场面：“斗争一开始，他（杨福相）就自己承认他的罪恶，痛骂了一顿自己，并且大哭着，自己跪了下去，请求群众宽大他，给他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这么一来，群众都软了，泰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边，荣福（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牵了起来，有的人更表现出怜悯他的样子，把头都掉了开去。当然也就没有人肯面对面地斗下去了。”

26 日中午斗争地主杨富相的场面：“斗争大会开始，当杨富相拉到会场来的时候，群众一齐盯着他，忽然静下来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杨火贵。火贵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不去，他就威胁各村的农民说：‘不去，我把你们全村的人杀绝!’当火贵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愤吼起来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跳上去控诉的，有杨安泰、杨定坤、龙伯妈、杨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来斗争他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斗争表现得很激烈！可这家伙却甚么都不承认，……总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赖甚么。”????这两次斗争会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对杨福相的斗争会缺乏激烈的群众斗争，对杨富相的斗争会缺乏地主的认罪。如果对哪个地主的斗争会不成功，土改干部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多数土改干部或鼓励，或听之任之，或身体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斗争会上，经过诉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愤，难免冲上去对地主又打又骂，甚至泄私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土改干部认为只说理不足以彻底打掉地主的威风，体罚地主不仅能长群众的士气，而且能较快地使地主变得服服帖帖。

陕西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

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来，动员群众去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梁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 30 个乡，计有 18 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 40 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 12 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即使经过了土改初期的阶级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区群众都完全接受了阶级观点，在斗争会上对地主充满仇恨。或者说，阶级观点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消解群众原有的价值观念。谭其骧所记安徽五河县乔集村 1951 年 11 月 20 日斗地主张学申时，“群众皆发笑”，因为群众知道张学申不过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1952 年 3 月 16 日柳城县六休屯的几个农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杨成的会上打瞌睡、吃红薯、发笑、叽叽喳喳等；就连在斗争被土改干部认为是最“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杨朝达时，也有群众在发笑，还有叫“朝达哥”的。陕西南郑县土改斗地主时，发言的主要限于积极分子，大多数群众不是理直气壮，说话时藏在人后边把头低下去说。

????开斗争会是要从精神上打垮地主，没收财产是从经济上打倒地主。1950 年 6 月 30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财产指的是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它财产不予没收。事实上，各地不仅没收了土地法许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财上。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甚至连地主家属的财产也没收了，好像旧时犯法

人家被抄家一样，家里任何东西，工作队都可随意搬走。许多地主家里被搬空。

????这里是广西柳城县六休乡 1952 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生动场景："没收地主杨朝达家财产的工作今天开始。中午六休农民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荡荡地一齐向杨家进发了。六休农协代表主任邓旺把杨叫了过来，要他首先交出红契。……红契点交完毕，群众要杨自报他家的财产。自报不实，大家就起来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财产交出来。没收委员会的人却一涌而进，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锅盏、犁耙锄头、碗瓶缸罐，一切大小杂物通通都搬出来了。杨的老婆被捆绑着。……他女和两个孙女便把群众带到左边的楼上去，大家一搜，便发现了夹墙，从夹墙里搜出了一堆烟叶，再一搜便从一处楼角边的小夹壁内搜出一大堆左轮和卡宾枪的子弹来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弹，怒火都燃烧起来了。……这老家伙看见自己的秘密被发觉了，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只好承认他知道杨澄（杨朝达的儿子）还有枪支和子弹埋在白洋岭，他愿意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来！……入晚，当白洋岭又挖出五六百发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扬扬地闹开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杨朝达和杨澄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个从来就不大参加会的老头子也很早就到会场上来了。"

????对地主的斗争除了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形式，如公审会的威慑、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对地主不断训话和传讯等。人民法庭开公审会就地镇压甚至枪毙几个声威比较大的地主，对其他的地主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很容易使他们变得顺从；通过标语、口号、民间歌谣等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并不断地对地主传讯和训话，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认为土改作为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风平浪静，因而想"拖"过关的思想。

????　????

????斗地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于地主而言，家里的东西被没收殆

尽，物质生活陷入困境，一些靠勤俭发家的地主变得无心生产。他们昔日在乡邻中的声威一扫而光，不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没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陕西西乡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中说：经过土改，“向来农民最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在农民口里随便叫谈着‘张地主’、‘李恶霸’”。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地对地主另眼相看了。双石铺地主高 XX 到大坪开会，灰溜溜地一个人圪墩在庙墙根没人理他。农民们在一边大说大笑，谈论他们的土改，也谈论着：“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地主杨维时的外甥说：“群众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给，要是地主杨维时借，那就不行。”有的贫雇农说：“土改前咱遇见了地主，你得先给人家打招呼，现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他把头低下，不敢抬起来，要是抬起头来，也得他先招呼咱，咱还不理他。”有的地主领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绑吊打斗争对象的手段，此后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

也有一些被划为地主的人对自己的遭遇深感不公，内心不服。陕西洋县石冠乡地主杨 XX 骂斗争他的群众：“狗日的斗争我，过不了三年国民党来了，叫我亲爹都来不及。”另一个地主靳 XX 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烂，踩在脚底下乱骂：“你把我害扎了。”陕西城固县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后依然愤愤不平：“我家土改被斗争过，房子叫共产党拆了，土地被穷人分了，共产党是叫人上望蒋杆，五牛分尸。这是利用穷人整穷人，比土匪抢人还要厉害得多。”

土改时曾作为地主而在家乡浙江硖石被斗争的文人章克标数十年后回忆起自己被划地主的经历，心里仍“有点摆不平”：“庆云街镇上，一共评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知道评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要看藉以为生的主要来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为主，才可以评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来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哪里能是地主呢？……但这一项桂冠，却无端而来了。”

????在土改结束的总结庆功大会上，章克标作为地主上台表态接受改

造。他以复杂的心情说了一堆反话:“我评到了地主这个名头，太开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创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多少辛苦惨淡经营，也许还要克勤克俭，尺积寸累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地主。我没有这样用过苦工，下过大力，平白得了个地主成分，哪能不开心。……看到家家户户的请神祭祖的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请地主太太，甚么时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总是到处有饭吃的，这就无论如何也饿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来地主老爷也一样。所以评到地主分子，想到将来死了之后，可以有这样的铁饭碗可吃，实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

????贫苦农民原本处于农村社会的边缘，经过土改，不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从未享用过的东西，还被新政权当作依靠对象，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对新政权充满感激。广西柳城县六休乡 1952 年 5 月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上，一个农妇说:“十几年我没讲过话，现在当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胆地讲话了。从前我们多苦啊，现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欢喜啊。”有的男子说:“几千年来，我们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个人来说，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从前，给杨朝达做活，全家劳动还常常饿饭，那日子有多苦啊！现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说:“我奶姥今年八十岁了，甚么时候见到过这样好的皮袍！现在她分到这件东西了，多好啊。”

????对地主的斗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价值观念。土改以前，农民以富为贵、为荣。土改中地主被斗，很多农民认识到新时代是穷人的时代，穷是资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后农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产不节约”、“发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为相当流行。许多农民在收获后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产上的投资与积累，而是上街吃喝、买消费品。有的群众甚至仇富，认为富就等于坏，等于不仁，人一富就变质，就变得凶残，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土改的目的和恶果　　陈沅森

???一、地主的土地和财富三种来源

????1、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以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书香世家，几代没出“花孙子”，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土改时代这个儿孙手里。这位继承者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有些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花孙子”，把万贯家财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

2、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中国几千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也不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投资兴办实业。“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有钱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

????3、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地主。

二、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社会（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当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肩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　地主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

三、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 年之后解放的地区）

开展土改。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 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进行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 200 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言相告？显然有难言之隐。

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一直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月黑风高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红区附近的白区土豪也被打光了，老百姓也跑得精光，最后形成一条 30 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 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新政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说，土改的第一大真实目的是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相当强烈。自发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给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很不幸，他选择了地主。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

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 ?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若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带领下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立即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

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如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如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

四、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干净，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沃的良田，可就是种不出粮食。土改后的第一年，农业生产是倒退的。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 1906 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 1 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 4 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做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簸箕……”不但不以没文化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

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 1960 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 3500 多万农民。

????第四，1953 年土改结束，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绝对权威地位得以确立，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此后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 80 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今天使政府头痛的三农问题，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补白：我的外祖父是地主，那一年被枪毙了，外祖母也随之上吊自尽了。母亲像一片秋天的落叶，瑟瑟发抖着，等待命运的判决。一天夜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冲进母亲的住处，声称要把地主的女儿干了。就在他们要施暴的时候，我父亲出现了。父亲像一座铁塔，居高临下地盯着那几个家伙，喝道："你们要干什么？"那几个家伙说："她是地主的女儿。""地主的女儿怎么了？"他们说："地主干咱们的女人，我们就干他的女儿!"父亲说不过他们，心里一急，说道："她是地主的女儿，可……可她是我的女人!"就这样，母亲后来住进了我父亲的屋里。

被斗的两个地主婆　　网　友

文革第一次斗地主是批斗一个地主婆老太太。当时我还没有上学，听到村里大喇叭喊要开批斗会，于是赶紧和几个小伙伴一路大呼小叫着"看斗地主喽"跑到大队部前面的场院去看热闹。挤到了最前面，

但见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颤巍巍地站在一张桌子前。桌子后面坐着支书，桌子旁边站着一个民兵，全村的社员包括学生们都席地而坐。批斗会开始，那民兵领着人们开始一遍遍喊“打倒 XXX”。只听见学生们呼应，大人们的反响稀稀拉拉。

喊完口号，那民兵突然走到老太太跟前，一脚踢飞了她的拐棍，并大喝一声：“站好啦！”老太太的拐棍应声而飞，她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老太太艰难地弯下腰拾起拐棍，嘴里还嘟囔了一声：“看看，差点砸着孩子。”然后努力地站直身子。批斗会在“打倒 XXX”的口号声中结束。?

第二次是批斗老两口。当时我已经上学了，在学校的组织下亲临现场。批斗会的布置依然是被批斗者站在桌子前，桌子后坐着支书，桌子旁站着一个民兵，我们席地坐在对面。老头儿的罪名是“破坏生产”，老太太的罪名是“攻击新社会”。

批斗会照样是在“打倒 XXX”的口号声中开始的，跟着卖力气喊口号的依然是一群学生。听了支书严肃的批判发言，我们才明白，原来老头儿后半夜浇地时迷糊了一会儿，被队长抓个正着；老太太是和别人聊天说鸡下蛋的事情时说了一句“鸡不吃红高粱不下蛋”，结果被几个长舌妇七传八传传到了支书耳朵里。不成想，一件平常事（下半夜浇地的人没有不睡觉的）和一句平常话（大约是有人说鸡不下蛋——可能因没粮食喂鸡，老太太接茬说了句“不吃红高粱不下蛋”）竟然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不但被打到一回，还被处以扣工分的惩罚。?

这老两口的孙女和我同班，长得很秀气，学习也很好，因为家里成分是地主，所以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但即便如此，班里一个调皮男生动不动就趁上自习的时间纠集几个人“批斗”那女孩子。有一天晚上，那小子闲得无聊，一声招呼“斗地主”了，就把一个板凳腿卸下来夹在那女孩子的脖子上，说是“戴枷板”，然后扭着她的胳膊让她在教室“游街”。那女孩子边走边哭，班里学生的哄笑声几乎把房顶掀翻。

十年过后，这两个人竟然成了两口子，而且小日子过得很恩爱。某年春节在他们家喝酒，说起往事，男的说：“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到家给俺爹说起在学校的‘英雄壮举’，让我好挨了一顿笤帚疙瘩！”女的说：“呵呵，那时我们都傻乎乎的。”但那时犯傻的岂止是不明事理的小孩子啊！？

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知道我当年见到的斗地主还算是“温柔的”。文革江浙一带斗地主，竖起根根高杆，顶置滑轮，让地主分子坐进筐内，然后向上拉起筐子，一边拉一边问地主“看见蒋介石了吗？”心眼实在的便说没看见，结果被一直拉到顶端，然后手一松，被重重摔到地面，不少地主分子因此送命。

呜呼！我们可以把那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战犯施以无产阶级的人道改造，然后送回日本，可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却不仅仅是精神上打倒，而且甚至要肉体上消灭呢？中国的“外圆内方”策略有时实在不可理解！？

不能否认，世间确实有恶霸存在，但恶霸一定是地主吗？地主中也出英雄，苦出身里也有败类！陈忠实《白鹿塬》最后写到，一帮红卫兵挖开了大儒朱先生的坟墓，发现一块砖，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恕”，一面刻着“折腾到何时为休”。发人深思！？

今天我批准你哭　　王俊义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四点左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从北京到上海，从所有的城市到所有的乡村，人们都聚集在广播旁边倾听着，流着悲伤的眼泪。那个时刻，公路上正在行走的汽车，司机听到讣告就将车停了下来，加入到痛哭的行列。骑自行车的人听到广播，车子顾不上扎稳，就对着广播大哭起来。当时

的中国人都有听广播的习惯，而毛逝世那天，是全中国人听广播最多的一天。

有一个住在公路旁边的民兵营长，跪在村庄的高音喇叭下痛哭，并且对那些哭声小的人大声痛骂。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驶过，司机俨然没有听到广播，民兵营长站起来，对着远去的司机大声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车还往哪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没有下车听广播，民兵营长一脚踹倒车子，拉住骑自行车的人说："毛主席死了，你的自行车还往哪儿骑？"

骑自行车的人丢下车子，开始大哭起来："毛主席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中国咋办啊？你死了中国谁管啊？你死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咋办啊？你死了右倾翻案风谁整啊？"民兵营长一听骑自行车的哭出这么重要的问题，也开始一边哭一边说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死了谁管我们贫下中农啊？你死了谁来收拾地富反坏右啊？你死了谁来收拾走资派啊？"于是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比死去了亲爹亲娘哭得还要伤心。

河南西部有一个村庄，老榆树上挂个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哀伤的声音把全村的人震惊了，都集中到老榆树下听广播。广播在树上响着，人们在树下哭着，一个村庄都沉浸在无边的痛哭里。

忽然树下走来一个挑大粪的老头，是一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他把粪桶往地上一放，跪在老榆树下大哭起来，并且哭得惊天动地，比贫下中农还伤心。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站起来，狠狠踢了地主分子一脚，说："我们贫下中农的伟大领袖，你哭什么？"

地主分子说："我伤心啊！"

政治队长问："你伤什么心？狼子野心？"

地主分子说："毛主席去世了，日本鬼子打来了怎么办啊？"政治队长说："地主分子闲操心。"

地主分子说："跑老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日本鬼子机枪扫射死了，我害怕再跑老日啊。"

政治队长说："虽然你是个地主分子，今天我批准你哭。"

地主分子重新跪到地上，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汇集到村庄所有人的哭声里，谁也分不清哪一声是自己的，哪一声是别人的。

补白：当知青时我曾经跳到水里救过一次人。当时我们六个知青救了六个人，一人救一个。我救的那个是地主的女儿银秀。救完回屋，正为没米发愁，不料那地主带着银秀上门来了，说有救命之恩，要她给我磕个头，然后送我二十个鸡蛋、两斤面条。这可是好东西，比磕头好得多。于是我们知青都盼着其他被救的人家也来送鸡蛋送面。可是左等右等，再没人送。过后我们终于想明白。因为我救的是地主的女儿，其他同学救的都是贫下中农，这就大不相同。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有本质上的区别。地主的女儿地位最为低下，大概是可救可不救的，你救了她，所以他必定要来感激的，好像捡了意外的便宜。贫下中农是应该救的，必须救的，你只是做了应该做、必须做的事，当然用不着多说。这件事给我们知青震动很大，从此深刻地晓得，知青的地位虽在地主之上，却远在贫下中农之下。

一对同案少年　　南　山

一九七二年十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两个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一个是十岁的富民分子。他们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分子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

他们虽然犯了大罪，但现实表现却不错。十二个号子里的便桶都是他们提进提出。还帮着送饭，打扫卫生，帮着叫号。叫号就是提审时点名被审对象。干部（看守所对管教人员统称干部）对他们俩另眼相看，相对自由一些，还喜欢看他们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号子里那时定量低，他们帮着送饭，从来不会多要。有一次那个富农分子还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地让给病号吃。每天他们俩都会在“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的横幅下早敬、晚敬！口里叨念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九一三之后，不准他们念了，虽然他们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都是地主、富农分子吗？”

“材料报上来写的就是这样。家庭成分呗，没法变。”

“那现行反革命分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十二岁半捡到半截粉笔，在厕所墙上、会堂边乱写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

“那十岁呢？”

“跟着写呗！问过多次，大的说只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岁写的。十岁说，他什么也没写。又说，只写了‘打倒’两个字。好多地方都写了，就是没有跟十二岁半写到一起。这不，一起送进来了。不然，在外面会被红卫兵打死的。”

“怎么没判呢？”“不知道。就这么关着都快一年半了。他们也不愿出去，家里哪有这里好？没得吃，还要天天挨斗，挨打。农村里斗地主可厉害，甭提什么反革命了。”

九一三之后，批林批孔时有个落实政策的机会。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的，按理应无条件释放。可有人看了卷宗之后，提出异议：他们不光反林，还反毛呢。

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就这么一直关在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呢。

算起来，他们现在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是在家种田，还是在外打工，他们都过得好吗？

补白：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遵循解放区的做法，要求每个村子，无论大小，都要进行土地改革。当年八月，中共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随后，各村成立农会，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划分阶级成份。地主一共被划了三批:第一批，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土改试点到一九五一

年第一次土改的那一批。他们大部份都是占有二三十亩耕地，比每户的平均数多六成左右，通常会请几个帮工，房屋的漂亮程度一般。由于善于耕作，他们的产量一般要比其他人高，所以积累大量的粮食，故此都有一个酿烧酒作坊或营商，旨求再次增值。除农技知识，他们的其他知识水平都不高。第二批，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六月第二次土改的那一批，多由中农上升地主，他们占有十多亩的耕地，刚好是每户的平均数。房屋比较上豪华。他不怎么懂耕作，都有请帮工，家境中上，但都舍得投资教育，出读书人，为村中绅士，出国也多。第三批，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土改复查那一批，也是最冤枉的一批，赤裸裸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因为村中第一、二批的地主都死完了，得重新找一个地主，塘中无鱼以虾为大，他们大都是比别人多出了一亩几分地，房屋比别人漂亮一点就成了地主。

好地主李元彬　　江义高

我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当天，大队革委会张主任就指示我说:“江知青，你出生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代表大队革委会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原来，经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把我安排在三队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此前院子里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两家。李秀柏是贫农，李元彬是地主。大队革委会本意是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阶级立场不坚定，常常搞阶级调和，致使管制不力。我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选。我那时 20 来岁，思想激进，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向张主任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把李元彬这个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李元彬是个 50 来岁的半拉老头，背微驼，患有间歇性哮喘。住下的当天，我就把他找来训话，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他站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地点头。我足足训了半个小时才命令他滚蛋。他

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过身，喘着粗气，吃力地走下我门前的台阶，蹒跚地往对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怎么闪过一丝怜悯，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对敌人的仁慈是对人民的残忍，只有对敌人恨得透，才能对人民爱得深。

当晚我设计了一套对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10 遍，给我把水缸挑满水后再出工；下午收工后把村小操场打扫一遍，再向毛主席画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恶；每个月写一份书面悔过书，交我审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张主任的赞许。

时间长了，我逐渐从社员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况。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县中学教书。土改前几个月，他父亲病死了，他辞职回来料理家业。评成分，因继承了父亲的田产，被划为地主。他为此多次申诉过，说按照解放前 3 年实际从事的职业，他的成分应是教师而不是地主。但上级没有受理他的申诉。

文革期间，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诉的事实，说他想翻天，经常开批斗会斗争他。他不服,可又没有办法。他的哮喘病就是这么落下的。他有个女儿，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嫁出去后就极少回来。他两口子的身体都不好，挣的工分很少，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回来，欠了生产队的债，日子过得很苦。李秀柏因为同情他，偶尔悄悄送他点粮食、蔬菜之类的，大队知道后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资格。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我决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训，丝毫不同情李元彬，严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严、管死，管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来。有一天收工后，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场没有打扫。我冲进他的屋子，掀开被子，把他拉起来，强迫他把操场扫完。还有一天早上，下着雨，他向毛主席画像请过罪后，站在我门前说:“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说:“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给我挑水，结果淋得像只落汤鸡，导致哮喘病发作大病一场。我却认为这是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这些行为常常受到张主任的表扬。下乡半年后，我被评为公社的模范知青，还在区里召

开的模范知青代表大会上介绍对地主分子实行专政的经验。

这年 9 月,县革委派出工作小组检查各公社开展“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的情况。公社要求各大队突击办一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壁报。张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向张主任表态说:“我将办出全公社最好的壁报。”文革时我就是我们学校《闪电》报的主编，办一期壁报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两天时间我就把壁报办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队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协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锣打鼓地迎接县革委检查小组的莅临。不多久，县革委检查小组的大员们在公社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神气十足地来了。张主任满脸堆笑，把他们迎到了大队办公室，向他们汇报大队抓毛泽东思想宣传做的大量工作，然后又把他们引到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宣传栏前检查壁报。张主任一手拿个小本本，一手握笔，一脸媚笑地对检查小组王组长说:“请王组长对我们的壁报做指示。”

检查小组王组长穿一身旧军装，仰头看着壁报，背着手踱来踱去走了十来分钟，转过身慢吞吞地对张主任说:“你们的壁报内容倒是不错，只是字迹不一致，像是拼凑成的。”我闻言一惊，壁报的策划、编写都是我一手包办，怎么会字迹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壁报右上角那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席语录，的确不是我的笔迹。李元彬每月要交给我一份书面检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语录出自他的手！刹那间，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顶，这是地主分子在捣乱!可是我没敢说出来，因为这对我们大队不利。

张主任满脸媚笑地对王组长说:“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们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张主任是真的发现字迹不一致，还是在敷衍王组长。王组长还指手画脚地对壁报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去收拾那个捣乱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队办了两桌丰盛的酒菜招待检查小组的成员。我作为壁报的编撰者，也有幸能陪领导们共进午餐。可我对桌上的佳肴美酒丝

毫没有兴趣，匆匆扒了两碗干饭，便找个借口溜了出来。

我一溜烟跑回李家院子，一脚踹开李元彬的木门。李元彬正在桌边和老婆喝菜稀饭。我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骂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烦了么？”他站起身来，忙不迭声地说:“江知青，小声点，小声点。我晓得你要来找我的，我让你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飞快地跑进内室，拿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来。一时间，我弄不清这是什么意思，但气冲牛斗的气焰顿失，抓着他衣领的手也下意识地松开了。

他接过老婆手中的字纸，展开后对我说:“你看。”那皱巴巴的纸上写的正是从壁报上撕下来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可我不明白这一切。他见我满脸疑惑，又低声说:“你仔细读一遍。”我仔细一读，顿时惊得脑袋嗡地一声。原来，我把那段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天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凭这一点，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刑！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张纸扔进了灶膛，平静地说:“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着觉，天蒙蒙亮就出来走一走。路过壁报时，偶尔发现了这个。告诉你又来不及了，又怕张扬出去，才这么办的……”

“李叔，你帮了我大忙。”下意识中，我竟一改平时“狗地主”的称谓，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我问他:“李叔，我平常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他喘了几口气，咳了几声，微笑着说:“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时疏忽才把那几个字写错的。如果让大队或公社干部发现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听了他的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地主分子居然还这么“心地善良”？然而这就是眼前的事实呀!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见我尴尬万分，李元彬端起稀饭碗，依旧平静地说:“江知青，公社和县里的干部还没有走，你赶快离开我这儿，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他的小屋的。

此后，虽然我依然履行着“管制”李元彬的职责，但力度却大打

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为由，取消了他早上为我挑水的资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后打扫村小操场的苦差。再后来，竟像李秀柏那样和他搞起“阶级调和”来，比如在他哮喘发作时帮他挑水、推磨，把重庆家里面寄来的怪味胡豆给他品尝，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他一起在灯下研究书法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较偏僻，李秀柏也从不“装怪”，这些事从未被“外人”发现。

就这样，我一面敷衍大队张主任，一面与李元彬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 1971 年 3 月我调出农村。

我结识的地主一家　　李遗民

从接受教育起，地主就被列为黑五类之首。他们的典型形象是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等。他们集人性丑恶之大成，贪婪、狠毒、奸诈、腐化、堕落，无恶不作，无耻之极。他们的形象，贼眉鼠眼，鬼鬼祟祟。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因此我从小对地主就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和厌恶。

直到下放农村，我才接触到真实的的地主。我们村有两个地主，都是五六十岁，两人是表亲。稍年长的那个地主个子矮小，古铜色的脸上皱纹纵横交错，永远一身皱巴巴的破衣裳。村上的年青人告诉我他是地主，我仔细端详，看他同村里的农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我仍然害怕，因为我满脑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毛主席教导。第一次与他偶然照面，他看着我，脸上似乎想挤出笑容，我则板着脸，警惕而又冷漠地看着他。

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和剥削分子。随着对这个地主的逐步了解，我简直不相信他是地主。最重要的一条，他是我们村干农活的第一能人。当地农活，一个是堆草垛，再一个是筛大筛子，属于技术活。村上能干的没几个，包括雇农出身的生产队

长，曾经的长工头，他会堆草剁，但大筛子筛得不怎么样。另一个贫农，大筛子筛得好，但草垛堆得不怎样。就这个地主，两样农活样样做得漂亮。其他农活，如耕田、耙地等等，他样样在行、麻利。一天农活干下来，身上衣服不带一点儿泥星子，实在是道地的种田把式。队长是个种田好手，一般庄稼汉的种田水平他都看不上，但是对这个地主的农活一向夸奖。

更奇怪的是，队长说这个地主的为人不薄，从来不亏待打工的。他不止一次地介绍说，农忙在地主家干活，一天五六餐，大鱼大肉尽管吃，地主家人也没有他们吃得好。地主对长工从来没有斥责，特别对他这个长工头，工钱也开得最高。

最后我知道了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当年村上有田有地，镇上有半条街的店铺。他一生辛劳，是种田的好把式；他是地富反坏右之首，但在村上口碑不错；他很有眼光，几个儿子都供在外面念书；他作风正派，没有妻妾。他的老婆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时很是漂亮，解放后成为地主婆，两人相依为命，苦度余生。

我下农村那几年，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正紧。地主作为黑五类之首，遭受的磨难是最多的。三天两头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富农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样敌对、仇视的氛围中。我注意到，地主们从来是上工最早，下工最后，最苦的活肯定派给他们。贫下中农干活时偷懒耍滑，停下来聊天说笑，地主们不敢停（尽管没有人监督），而且似乎对这些说笑充耳不闻，脸上没有什么反映。贫下中农为自身利益可以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地主们似乎对个人利益十分淡然，不回嘴，不争辩，不解释。我从来看不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来听不到他们对生活、对身边的事物、对个人行为发表看法、做出判断；他们永远无声无息，他们的表情要么漠然，要么是微笑，附和着你谦卑地笑。

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和不识字的妇女没有学会斥责与吆喝，他们习惯性地称呼地主夫妻为某某他爸、某某他妈。地主夫妻也同样称呼底层的普通农民为某某他爸、某某他妈。

跟着倒霉的是地主的子女。听说这个地主的大儿子参加过志愿军，因为有技术，回国后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二儿子是某厂职工，结婚后育有一女。三儿子学的是兽医学，毕业后在某农场担任兽医。文革一来，因地主成分，二儿子一家和三儿子都被下放回家。四儿子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在家种田。

二儿子不但农活好，而且会驾驶和修理拖拉机。因为有技术，加之见过世面，擅长交往，虽然成分不好，政治上倒也没有吃什么苦。尽管生活艰苦，尽管养的是个女儿，他仍坚持送女儿上学读书（村上女孩子读书的很少）。

三儿子兽医，因成分不好，为人谦和没架子，非常受乡人欢迎。远近农民家里猪有病，肯定找他，包括村干部、共产党员，也不在乎他的地主成分。三儿子外出给猪看病，从来不收人工费，都是搭上自己的休息或工分。他有一技之长，有文化，长得不错，人缘又好，可是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对象。

地主的四儿子当时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他长得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身材魁梧而匀称，干农活一把好手。他自知出身不好，见人三分笑，客气、谦和但是绝不显卑微。他实在是个优秀青年，可是那年头，没有人家敢于把女儿嫁给他。

1970 年代中期，邻村迁来一户苏北父女。那女孩子高大丰满而水灵（当地人称她飞嫩），长得不丑，居然就看上了地主的儿子，并且恋爱上了。

虽然宣传自由恋爱很多年了，可那一带基本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通常是一场交易，双方家长通过媒人谈判，主要内容是送女方的彩礼多少。谈判成功，婚姻就算定下来了。男女本人结婚之前，难得有机会见面，说悄悄话谈恋爱更是一种奢侈。

地主儿子的自由恋爱，属于离经叛道，遭到许多光棍青年的嫉妒，由于不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多少贫下中农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地主儿子闷头干活，但是不言放弃。那个女孩子遭到她父亲的多次打骂，不知哭了多少次。一天晚上趁父亲不在家，她偷

偷住到了地主儿子的房间里。女孩子主动投怀送抱，而且公开承认生米煮成了熟饭，她父亲气得半死。村上人也骂女孩子不要脸。两人就这样算是结了婚，也没有办什么酒席。

幸亏当时一打三反已经结束，否则地主的儿子可能被判刑。当时的我们，非常讲究所谓纯洁的爱情，对地主儿子的这种不光彩的同居，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看不起这一对患难中的男女。现在重新审视往昔，越发觉得我们由于浅薄而显示出的冷酷。如今应该没人歧视那个地主儿子了吧。遥祝他们夫妻幸福，安享晚年。

土改暴力的文学反省　　陈思和

文革后最先反省土改暴力问题的文学作品是山东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山东是革命老区，土改进行得最为惨烈。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小说仍然有经典的意义。

主人公隋抱朴出身地主家庭，亲眼目睹了几十年来暴力不断的惨烈事件，苦苦思索人性与暴力的关系。他始终警惕在历史的轮回中暴力会以各种新的名义死灰复燃。他苦读《天问》与《共产党宣言》，天问所问的是宇宙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则是在《共产党宣言》里找到的，那就是人类私有制度和贫富的不均与分化，最终会让人们在争夺利益过程中变得冷酷无情，暴力是人性异化的必然产物。张炜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土改中的暴力作为一种个案的病例，放在人性的聚光灯下加以解剖和考察。在作家的思维力度所能够达到的范围内，他把暴力视为人性异化的结果，超越了政党与政治的斗争。土改暴力的轮回，有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与报复，也有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的血腥暴力。仇恨激化了人性深处的暴力，每个地主的家族和血统，在长期的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下都犯有罪恶，而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复仇中也情不由己地以恶报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有一个老汉手持镰刀，走到杆子下边，猛然砍断绳子。'面脸'（一

个地主）倏然落下，跌得七窍出血。一伙人围上去就踢，老汉挥手挡开，伸着镰刀问台上的干部：‘我儿子给面脸扛了五年活，伤了腰，卧炕不起。我要剜面脸一块肉煮汤给儿子治腰！这个要求过分不？’干部还未表态，人群就嚷：‘快割快割！’老汉低下头去，在一阵惨叫声里剜下了巴掌大的一块肉，高举过顶，对台上喊一声：‘我们的账结了！’说着跑走了。”

张炜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狼子村佃户吃了一个恶人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把吃人的民族历史从古代延续到了现代。他揭示出，土改中的暴力不仅仅是因为农会混进了流氓坏人作祟，真正的阶级报复是来自被奴役者集体无意识的创伤记忆。小说里的批斗会上，除了一个有姓名的坏人赵多多以外，所有施行暴力的全是没有姓名的“老汉”、“老婆婆”、“民兵”等等。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内心深处的火仇恨山一旦爆发，谁也挡不住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决堤狂泻，弥塞他们整个心智。

人性的拷问还没有结束，紧接着作家又以同样的笔调描述了地主还乡团对劳苦群众和土改干部的疯狂报复，照样是血流成河的屠杀和骇人听闻的酷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栾大胡子在多人的注视下，被绳索套住，缚上了五头黑牛。栾大胡子大骂不止。有人喊着号子，另外五人各自鞭打黑牛。黑牛扬脖长啸，止步不前。又是鞭打，又是长啸。这样折腾了半天，五个牛才低下头去，缓缓地往前拉。栾大胡子骂着，最后一声猛地收住。接上着噼噼啪啪的碎裂声。血水溅得很远；五条牛身上同时沾了血，于是同时止步。当夜，还乡团又从碎肉中分离出肝来，炒菜喝酒。”

老汉剜了地主的肉给儿子补身体的细节，对应了《药》里华老栓用烈士夏瑜的血来做治疗肺痨的药，对应了狼子村佃户集体吃了一个恶人的故事，那么还乡团的兽性大发的描写，我们又一次会想到鲁迅笔下出现的徐锡麟被杀后清兵的兽性报复。张炜非常尖锐地指出，暴力不尽是农民大众的本性，也不尽是地主阶级的本性，而是几千年私

有制度形成了贫富不均的制度，形成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积累了难以消解的仇恨，一代一代以暴易暴的斗争彼此交替，终于促使了人性向兽性的倒退。在反省了私有制是仇恨的总根源的基础之上，张炜把暴力与人的攻击本能与侵犯性联系在一起，从检讨人性的角度给以展示与考察。

《古船》对暴力的反省达到了文学史上的最高水平。他不是一般地揭示人性与暴力倾向的内在关系，而是把人性中的暴力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异化的产物，这样，就与一般地从抽象人性角度来探讨暴力划清了界限；同时，他也没有把土改中的暴力行为仅仅归结为少数流氓痞子的本性使然，而是把暴力视为一定阶级关系下必然性的表现：既是农民的，也是地主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都可能产生暴力行为。

张炜对暴力的考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暴力应该是人类从动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过程中残留的动物本性。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过程中，暴力是动物捕食、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是以强力破坏另一个生命为主要表现特征。即使现在，人类对动物仍然在使用各种暴力攫取它们的生命。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人类自身对暴力有了限制，尤其是建立了国家这一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后，人类个体生命的暴力倾向被法律禁止，但同时又被升华到国家机器的功能。通过国家化的形式，转移了人类个体生命的暴力倾向。现代社会由国家暴力来转移个体生命的暴力，一方面是人的攻击本能和侵犯本能受到了国家机器(法律、军队、警察、社会制度、社会风俗、道德宗教教育等意识形态等等)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国家以更大的利益驱动利用了暴力，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对反抗者实行武装镇压，监狱制度下的“躲猫猫”，法西斯的集中营，灭绝种族的焚尸炉，以及关于英雄主义暴力的渲染和意识形态的教育，等等，都使暴力变得合法。这样，人类进化中的原始的暴力性，在现代社会中可能转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民众的暴力，它是在国家法律制度的约束一旦松弛的情况下，由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它的爆发；另外一种是国家暴力，

即通过国家机器在现代文明制度下履行使命的暴力，它的前提是维护国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并且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核心，分出多层的社会阶层。当有一部分人被宣布为国家政权的敌人，这部分人不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那么，这部分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暴力的对象。

张炜的深刻性还表现为对这两种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同所有的土改题材的创作一样，《古船》对于解放区土改的全过程有准确的把握。首先是暴力与土改的最初宗旨的冲突，小说里的工作队王书记被塑造成一个严格执行土改政策、反对群众暴力的人，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发动的是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发动一部分人的兽性！"但问题是，一旦群众真的发动起来，连王书记也控制不了局面。接着是土改复查中王书记和洼狸镇的土改工作被批评为右倾，于是左的暴力狂潮开始泛滥，乱打乱杀从此开始，三天里在非法酷刑下死了十多人，其中最多是五个人有死罪的。王书记带来了"巡回人民法庭"，宣布这是违反政策，但有人当场在下面呼喊打倒富农路线。紧接着，地主还乡团回来疯狂报复，更残酷地杀害了土改干部和无辜农民，人们又开始后悔：后悔当初没有把那些家伙更多宰一些，大家恨不能重新开一次杀戒才好。当这种仇恨被带到了战争，成为大批农民参军投入解放战争的驱动力。

这里所描写的场景完全符合后来历史学家关于土改的研究成果。土改暴力，以前常常被学界认定是事先由土改当局设计好的、为紧接而来的战争服务的举措，但是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土改最初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农民对土地的进一步的要求，这是重新分配国家资源的一个民间自发的举措。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都考虑过用土改来满足农民渴望土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尤其是在广袤的抗日敌后根据地。而中共抢在前面实现土改，是由它一贯地站在民众的立场的宗旨所决定。当局起先并未使用暴力的动员，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实现和平土改和赎卖政策，但是随着土改的深入和出现的情况，尤其是当局的长期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不通过残酷斗争，地主阶级是不会轻易放弃田地，他们的经验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所以本能上站到了民众暴力的一边，结果造成的是国家政权暴力非但没有升华、转移和替代民众的个体暴力，反而由民众暴力取代了国家政权的意志，国家政权鼓励了民众的暴力，最后发展到无法无天不可收拾的惨局。这样的惨局，在文革中又重演了一遍。由党的领袖的名义来鼓励和号召民众暴力，一旦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占领了上风，暴力就变得不可驯服和难以收拾，反过来取代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暴力来完成的工作。

《古船》以后，关于土改暴力的反省还是在继续中。尤凤伟也是山东籍作家，他的小说多次涉及到土改背景，但他更多的是在人性本来的意义上探讨暴力的来源。在尤凤伟看来，暴力是被一种遮蔽人性的仇恨观念所唤起的。他在小说《诺言》里描写土改前的李家庄本来有着千年不变的文化传统："世间万事皆以古训为道：仁义礼仪、三从四德、忠孝廉耻、种田交租、借债还钱、犯罪交官、老实长在、富贵在天、福祸由命……世世代代，千古不变。"然而，土改使一切都被颠倒过来。

"其实，多少年来住在一个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并不陌生，可是在知道了这伙人是他们的敌人后就突然感到陌生，并且充满了仇恨。"于是，"与数千年漫长岁月相比，这一切几乎是变化于一夜之间，惊喜而迷惘的人们甚至来不及对发生的一切进行思索，只好运用便当的翻转逻辑来衡量客观是非：大肚子都是坏蛋，穷兄弟都是好人；有钱是罪恶，赤贫最光荣；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不讲仁义。"这些观念，是一夜之间由土改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因为是观念带来了暴力，所以，尤凤伟也天真地相信，只有人性的善良和道德重新被发现，才可能避免人类的暴力行为。《诺言》以地主的女儿李朵为中心而展开，也写出了杀人如麻的民兵队长李恩宽良心发现。在一篇叫《小灯》的作品里，他写出了一个土改运动中"人性之光在瞬间微弱的一闪"的故事。因为一个穷苦农民出于同情和怜悯私自放走了那些土改中受难者，结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据说在还乡团复仇的时候，那些受过那个牺牲者帮助逃命的人阻止了血洗村庄的行为，而且这个村庄从

此就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在长篇小说《衣钵》里，作家又写了一个老实农民出于同情，帮助一群学生逃出解放区，自己终于被迫害死去的故事。从人性善良的角度来纠正、战胜土改暴力的还有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作家把人性之美写到了极致，以至于在更为广宽的人性的背景上，暴力也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在另一个度向上，刘震云与张炜一样，还是从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考察暴力与政权、人性的关系。但是刘震云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描写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民间的痞子运动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暴力的民间社会。《天下故乡黄花》从民国初年孙、李两家为富不仁争夺村长位置开始写起，他们同样是利用了民间的土匪流氓力量来争权夺利，故事一直沿伸到“文革”中的两派武斗，比《古船》更进一步地揭示了民间的痞子运动是如何与政治斗争遥相呼应。这又深入到另一个与土改暴力相关的问题，即群众运动中的痞子因素。文革后的农村土改小说中对于痞子的揭露仍然继承了赵树理的尖锐性，如《古船》里的赵多多，《天下故乡黄花》里的赵刺猬和赖和尚，等等，这是中国农村特有的一种人群，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杨奎松关于土改论文的主要成果是阐述了中共领导人为适应解放区农民在抗战胜利前后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要求，而及时调整政策，全力支持和领导了一场土改运动，设法满足农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需要的过程。在土改实践中，本来也是有和平土改的可能性，但在阶级斗争观念和支持农民立场等因素的制约下，最后导致了暴力土改的左倾泛滥，结果是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代价。这种破坏性是中国民族传统中特有的。在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在长期的贫富不均和土地兼并中，必然会出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沦落为农村流浪汉，他们可能有机会成为雇工，靠出卖劳动力来养活自己，也可能连正常的打工机会也没有，迫使他们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谋取生存机会。这群人，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被称作游民无产者。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刚开展不久，毛泽东就注意到这群人与革命的关系：“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

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我们要注意，毛泽东在这里用了“处置”和“引导”一对动词，既表明了革命政党与这群人的距离，又抱有热情的期望。

按照毛的解说，似乎游民无产者可以归入流氓组织的范围，其实，是否参加民间秘密组织并非是游民无产者的主要特征，而无固定职业和收入，无固定居住的社会环境，无固定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观念，才是这类社会群体的普遍特征。他们可以是流氓，土匪，青红帮，也可以是一般的雇农和工人，而后者的社会身分更加具有影响力，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对既成秩序的强烈的仇恨和破坏欲望。这群人在传统社会里就是江湖上的流浪者，如《水浒传》里的赤发鬼刘唐、混江龙李俊、白日鼠白胜等等，均属此类。往好里说是江湖好汉，往坏里说就是泼皮流氓、亡命之徒，他们挤入了官场就是董超薛霸，蔡福蔡庆，占领了山寨就是吃人心肝的燕顺王英，混入黑社会就是恶霸老大如混江龙李俊之流。他们身上并没有反抗阶级压迫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在社会上是弱者，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反抗愿望，但是他们具有破坏性，一旦个体汇合成疯狂的群体，他们马上就成为最活跃也是最有力量的人物。

王朔语录/焦国标书

《黑五类忆旧》第八期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焦国标

奥巴马总统最近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这句话可以当做一个公式到处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缺乏正义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实际上奥氏使用的这个句式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非常“陈腐”修辞法，一千六百年前奥古斯丁说过“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一帮强盗”，四百年前帕斯卡尔说过“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奥巴马总统的这句话稍微变通一下，也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阅览、编辑黑五类的故事，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当事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心灵生活都极度贫乏。施者心灵生活固贫乏，所以只剩毒手段、无心肠；受者心灵生活亦贫乏，所以只剩无奈、麻木和绝望。信神的人遭遇凭一己之力无法抗拒的祸患时，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连神都没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连求告的对象也没有，连缓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鸦片”也没有。

把思考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止是黑五类故事里的施者和受者，中国人整体说来就是一个缺乏心灵生活的族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比如四大名著，有称得上心理描写的内容吗？没有。人物的心灵是白版一块。如果说他们的思维还活着，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对付人、应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这些心理活动不能叫心灵生活，只不过是厚黑、谋略或心计而已。所谓心灵生活，是思考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学作品中却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页成页关于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心理描写。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切身的反思。毛泽东有句话：“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请我们每个人想想，“一事当先”时，我们自己内心可曾掠过一丝真理、正义的影子？“一事当先”，我们考虑的只是如何托关系，走门子，送礼上供，不择手段地去解决我们遭遇的问题，从不问这个解决方式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合乎道义，是不是对对方太不

公平。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一个结果：势强时欺负人，势弱时被人欺，压根儿不知公平、正义的滋味是甜的咸的。

比较而言，士大夫群体在中国人中算是心灵生活相对丰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写出《正气歌》，司马迁因受刑写出《报任安书》，可是请看毛泽东时代的士大夫们受难时脑袋里在琢磨什么东西：

邓拓的遗书这样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你们（妻儿）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傅雷遗书的这一笔是："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

翦伯赞没要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他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三位这么大的士大夫"大腕儿"，他们的遗书里有可以称之为心灵生活的东西吗？没有。完全失血，完全脱水，完全苍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们不愿受上帝的统治，我们就必受暴君的统治。"我接着推理这句话：受上帝统治，死前还能考虑考虑真理、正义这些心灵元素；受暴君统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该万死、毛理当万岁这些意识垃圾了。

2010-11-29 北京

奥古斯丁语　　焦国标书

目　　录

补白：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她质问：“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1970 年 5 月 8 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的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约因其父是高干，被轻判五年徒刑。另一位四川平民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陶渭熊

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 1968 年 8 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 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 47 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

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 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

————————————————————————————

补白：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土改一来，被划为地主。邱国军还在当地经营一家小旅馆，在穷乡僻壤的痞子们看来，他算是当地的首富了。他们逼他交出浮财，他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是过不了关，说他还有财宝藏在哪里。实在拿不出，他们也不善罢甘休，将他绑在树桩上，将其双手十指全包上棉花，浇上桐油，然后将棉花点燃。邱的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这叫“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惨叫，痛死在树桩上，还被宣布“与人民顽抗到底”，拉出去又枪毙一回。　　　　严家伟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杀　　朱长超

南汇路 10 弄 15 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住着黄育申一家。黄曾在沙逊洋行当买办，1946 年病故，留下妻子谢月仙和 2 子 5 女。长子黄宗南，次子黄宗丙，5 女分别是黄莉菱、黄秀娣、黄秀润、黄秀珍和黄秀菁。1949 年，黄家已经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将离沪去港的最后一刻，长女黄莉菱萌生了留沪观望的念头。母亲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几个儿女见妈妈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这么留在了上海，买好的 7 张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废。谁也想不到，这一念之差，十几年后竟夺去一家 11 口人的性命。

1966 年 9 月 1 日，党委派来一大群人，高呼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然后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也没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黄家对面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那里也在抄家。两支抄家队伍不时交流信息，交换经验。抄荣家的人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后发现有东西。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启发，也开始一桶一桶将水吊起。井水终于干了，抄家者下了井，一阵摸索，从井底下捞起几十发子弹，还有两把小手枪。这给抄家队伍打了兴奋剂，也使黄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子弹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家二女儿黄秀娣与美国医生麦克莱恋爱结婚，这位美国医生当过军医，有手枪。秀娣与麦克莱 1949 年离开中国去美国时，麦克莱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他行医的衡山饭店。黄家把那些东西运回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就留在家里了。次子黄宗丙从香港回来，看到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遂决定自己把枪和子弹悄悄处理掉。本来顺手往外边河里一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取远虑，轻易丢进了自家院子的井里。

黄家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

的事。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必是潜伏的特务在与敌人联络。谁是潜伏的特务呢？黄秀菁成为疑点。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很小巧，常常听完节目就放在梳妆台上。有人怀疑这台收音机是收发报机。

9 月 3 日夜里，一片狼籍的黄家，老老少少个个皆成惊弓之鸟。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亲已经 70 多岁，身体不好，也说"活够了"。就这样，一家人"稍拍即合"，决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 14 口来到楼下灶间里。母亲和长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 4 个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带着 2 个孩子在一起，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 14 人。灶间的 6 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煤气丝丝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35 岁的小女儿黄秀菁并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间门口的她，悄悄打开一个门缝。煤气很浓，因有新鲜空气进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14 口全都救活了。

黄家 14 口自杀未成，又在批斗和惊恐中熬过一年。1967 年 10 月 18 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斗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末了还带走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10 月 22 日是星期天，大哥黄宗南从隔离室里放了出来，头发已被剪成阴阳头，鞋子、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黄宗丙也回来了，监管他的人不给他饭吃，还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黄宗南对全家诉说了这几天受到的污辱，又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活着还会受侮辱。母亲响应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黄宗丙也愿意自杀。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黄秀润对妹妹秀菁说："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下楼的时候轻一点。"黄秀菁也选择与大家一起死。黄宗南怕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的。

灶间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 4 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母亲谢月仙身体虚弱，躺在一只躺椅里。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秀菁对姐姐秀润说："万一这一次

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安眠药还是让我吃吧。”黄秀润就将一百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妹妹。黄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药全吞进肚里。秀菁和秀润一起坐在煤气开关旁边，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姐妹俩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黄宗丙最后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

这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救护车又来了，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一弄堂。这一次，母亲谢月仙死了，长子黄宗南切开喉管抢救，没救转，也死了。次子黄宗丙救活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了，黄秀润也救过来了。黄秀菁服了 100 片安眠药，又吸足了煤气，双管齐下，按常理必死无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一条小命。服药后，她很快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吸进去的煤气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 42 天之后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死了母亲和大哥，一家人心里悲伤。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思，担心招来横祸，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六七那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他没有到厂里，而是独自悄悄去了杭州，住进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后，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后来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只见其一只鞋，不见其人，检查房间，发现他已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几天后，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黄宗丙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他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自己选择到杭州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给母亲和大哥过完六七？没有人知道。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黄家再次遭殃。这次灾难起因于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当时汉华 20 岁，在上海培进中学读书，同学们经常骑自行车到他家来玩，来了就把车停在弄堂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有一次他俩来敲黄家的门，

黄汉华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根据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断定，同学们都在黄家，黄汉华也在。这两个同学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于是揭发黄汉华和他周围的同学私下议论蓝平（江青），攻击中央文革。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汉华和他的同学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后来处理时，判刑最高的 15 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送饭。有一次，专案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举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顿。专案组还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逼她揭发哥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他们又按住她狠打一顿。

1968 年 7 月 5 日，黄汉华突然逃回来了，告诉母亲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觉得，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儿也被打伤，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非常害怕。她那年才 19 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柜子里。

告别母亲，黄汉华从三楼窗口一头栽了下去。楼下是水泥地，只听嘭的一声，黄汉华脑壳破裂，脑浆四溅，当场死去。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儿子去，还是照顾娇弱的女儿？最后，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对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没有当场死，3 天后死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1962 年考大学时，数学是满分。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进了羊毛衫四厂工作。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这个案子，在厂里被隔离。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于 1968 年 10 月 15 日在隔离室上吊而死，25 岁。

黄莉菱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骨灰来

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相机和手表，其实是她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想为儿子说几句话。汪君范原来在厂里表现很好，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

汪君范之死引起厂里很复杂的反应。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革命委员会派的人就来了，说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鸣冤叫屈。他们写她的大字报，列她许多条罪状，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最后还是忍痛读了革命委员会写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文革开始一两年，开始是祖辈自杀，接着是父辈自杀，现在连孙辈 20 岁的青年人都没了生路。1968 年 10 月 18 日傍晚，儿子死了刚三天，黄莉菱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 1966 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黄莉菱对幺妹黄秀菁说："以后你要多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长久被隔离、批判，一度行为失常。她似乎并未从姐姐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也许那一百粒安眠药已经损害了她的大脑。

吃完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去上班，却发现大姐没有做早饭，大声叫，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53 岁的汪铭璋吊在房门旁，死了，黄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儿汪佩未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丙的小女儿黄以华在一个柜子里吊死了，黄秀润吊死在另一个柜子里。这一次，在这一个房间里，一次吊死了 5 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和女儿黄以华），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气

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最后决心与大姑妈一家一起去死。黄莉菱一家 4 口（她和汪铭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人们在汪佩未的鞋子里发现一张她写的字条，说她的弟弟们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黄秀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因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后来要求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几次申请去香港都没有被批准。她没有结过婚，有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过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她最终没有披上婚纱。

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黄莉菱托付：他死后，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后，黄莉菱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哥哥，现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让哥哥的孤女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

黄家长子黄宗南一家 4 口，长女黄莉菱一家 4 口，全部死绝，加上次子黄宗丙、三女黄秀润和母亲谢月仙，黄家一共死了 11 人。买办黄育申在大陆的后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红玉和她的 4 个儿女，及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石红玉与黄宗丙的 4 个儿女分别是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和黄维华。黄宗丙去世时，黄维华才 5 岁。后来他们四姐弟有一个去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1972 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 11 位亲人，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黄秀菁 1972 结婚，丈夫 10 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旧宅里。

我采访黄秀菁时，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给我看。她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的遗照，是丈夫主动帮助整理的，还留有题跋。照片并不

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黄秀菁的丈夫在整理这些旧照时曾有一次灵异经历。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干，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有什么深意呢？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二女儿黄秀棣嫁给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居住于亚利桑那州。三女儿黄秀云，1953 年到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有一女陈漪琴，一子陈企平。

黄家的案子最终也平反了，但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上海国棉二十八厂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与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 11 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高考歧视　　袁剑平

我的中学是开封育才中学。我校高 59 届共 200 余人，除了不愿升学的，其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让人费解。当时人们不敢询问原因，改革开放后谜团才解开。原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每个学生都做了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审的依据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地富家庭，右派家庭，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基本上都属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

江雪，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读初二，门门功课 5 分，被保送入高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1959 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很自信，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那年的文科考生，各科成绩都在 85 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是第一名。有 8 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的政策面前退却了。

范天成，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准备，然而因家庭出身被不宜录取。

吕延梅，初中毕业以全 5 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 1959 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种做法不止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 66 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述相同，引起轰动。这证实了直到 1966 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政策仍在执行。档案显示，1958 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 7%，1966 年是 6.1%。自 1958 年至 1966 年，8 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记述：“1955 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 90 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 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

吴祖光有几篇文章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的 3 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送到北大荒作了 7 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 70 华里送信。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冯骥才是天津的一位不宜录取者。“我 1961 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家庭。”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母解放初期是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的老板，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 年，遇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 年遇罗克高考落榜后，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

当农业工人。1962 年又参加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所在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大学梦再次落空。

报告文学作品《胡杨泪》里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1963 年高考，钱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公社不给档案。次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 个月后，公社书记多次到校逼迫学校令其退学。1965 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被迫到新疆谋生。1984 年《胡杨泪》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钱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1985 年 10 月 1 日凌晨，钱宗仁去世，肝癌晚期，41 岁。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据河南省教育厅的文件，1959 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 1960 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 年 4 月 25 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指出 1960 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 17300 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 14756 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 10%估算，有 1476 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 4010 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 4000 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就是一例。父亲被劳改，蒋筑英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一位前校长，当年报志愿时，老师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录取。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1939 年生于河南宝丰，是我们的同龄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属于有严重家庭问题者之列。如果崔琦当年不去香港上中学，而留在河南宝丰，难逃不宜录取的命运。

王立群的前世　　飞　天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

1958 年王立群小学毕业，学习成绩全部五分，学校决定保送他到当地最有名的中学读书。因没见过面的爷爷的成分，他不能进好中学，最终只收到一家民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王立群的父亲毕业于齐鲁大学英文系，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母亲告诉王立群，学校条件差也能培养出好学生，关键是看自己有没有骨气。民办中学经费困难，靠学生打工维持运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天，自备干粮步行十几里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学校支付微薄的报酬，对学生提供白开水。每天干完八小时活，还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步行十几里回家。第一天干完活儿，第二天上课浑身都疼，有时连笔都拿不住。第三天一早，又要上路去干活，风雨无阻。

在《百家讲坛》主讲人中，王立群是惟一的一位教过小学、中学、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教师，还是教过中小学除体育课外所有课程包括音乐课的教师。

王立群初中阶段的一半时间被干活了。高一休学一年，代父回山东故乡照顾祖父，做了一年农民。十六岁的少年，深夜扛着三八大盖步枪，揣着从来不上膛的一粒子弹护秋。1965 年王立群高中毕业考试，几门理科主课（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俄语）全部 100 分，所有功课平均 97 分。他品学兼优，高一做班长，高二做校团委委员，高三做学生会主席。可是高考时，爷爷的成分又决定一回孙子的前途——发挥正常的王立群没接到任何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知道复读无用，便应聘一家国企的教师职位。该企业有两个学校，一个技工学校，一个小学。他去应试技工学校，考官是两位临时抽出来代课的工程师。口试了整整一个下午，考官很满意。一个月后，备好课即将上讲台的王立群被校长喊去，不做任何解释，通知他：“你的工作变了，到厂里的小学教书去。”事后得知，有位主管厂长认为，一个高中生怎能教相

当于高中的技工学校？

王立群来到小学，教语文、数学、珠算、大字、自然，甚至有一次在接到学校的任务后一周内学会拉手风琴，教音乐。

1977 年恢复高考，王立群似乎有望实现大学梦了，却被一条规定卡住了：年过 30 岁的考生，必须是 1966、67、68 年毕业，王立群则是 1965 年参加高考的落榜生。

1974 年开始评法批儒，王安石被官方认定为法家。王立群所在国企的“工人理论组”奉命和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合搞《王安石诗文选注》，他被分配去注释王安石诗词。此后三年，他天天去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上班。王立群从没见过这么丰富的藏书，从没接触过这么多博学的教授。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从他的人生中渐渐淡出，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王安石开始进入其视野。

1978 年恢复招研究生，同等学力可以报考。得知信息，当年报考已来不及，准备第二年考。此时他已做了中学教导主任，教两个毕业班的语文。工作非常繁忙，没有时间，没有教材，他一分一秒虎口夺时。家属院露天放映《望乡》电影，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王立群从自家窗子里就可看到银幕，可他不看，跑到清静的地方看书。王立群的俄语是高中水平，已经荒废 13 年了。他花了一年死工夫，把大学俄语教程啃下来了。

1979 年，王立群考上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研究生。王立群后来说：“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孟子讲的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是自强不息。正如一个气球能够升腾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氢气，一个人能够升腾是因为他具有自强不息的强势人格。这种强势人格不一定表现在外部，而是内化为数十年自强不息的坚持。”

拉粪过年　　佚　名

公元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辛丑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晴。

农民都休息了，但是城市离不开运粪工，这光荣的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五类分子身上了。一早起床，在生产队的食堂领取一碗红苕稀饭，倒进肚子，舔净碗中的剩余价值，然后拉着借来的粪车，向市区进发。拉架架车，我已是老驾驶员了，但是这运粪的行当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青羊宫大门左侧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厕，这是我早已熟知的，所以就十分自信地直奔目的地。停下车，打开粪桶盖，抄起粪当（长柄的舀粪工具）开始灌装了。不多一时，粪桶装满，盖好桶盖，准备打道回府。

突然一声巨喝好象从地下冒出来："逮到偷粪的！"我惊呆了。三个青年农民包围着我，厉声质问："你是哪个公社的？""苏波公社。""哪个喊你来偷粪的？""我不晓得，我想到是公共厕所。""这里是分给我们保和公社的，你们的（舀粪地点）在祠堂街。"

我把粪车退到粪坑边上，拔下粪桶尾部的木塞，一阵"咚、咚、咚、咚"响过之后，我拉起空粪车就走。可是这时却身不由己了，三个人像押解囚犯似的把我带走。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他们生产队的一个院子里。

"罗队长，逮到一个偷粪的。这个龟儿子奸得很，把粪又放回茅厕里去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预设的陷阱：如果逮到"偷粪者"，就迫使其"义务劳动"，把一车粪运送到他们的生产队。我居然把粪桶放空了，怎能不激起他们的怒火！那罗队长威严地命令："把车给他砸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嘛！我急忙低三下四地哀告："我是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寒假回家，今天第一次出来拉粪，不懂规矩，请罗队长原谅。""锣队长，还鼓队长呢！给老子跪倒！"

看来，粪车可能是躲过了厄运。于是，我便在天井里直挺挺地跪了下来。虽然是艳阳高照，我毕竟只穿了两件单衣一条单裤。这数九

寒天，跪在冰冷的泥地上，艳阳的暖意一丝也感受不到。随着太阳的移动，我投在地面的影子逐渐缩短，达到极限值后，又逐渐延长。我的双膝不再感到疼痛，整个下肢几乎失去了知觉。

忽然，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原来，罗队长家里准备吃“团年饭”了。大约三点钟左右，满面红光的罗队长回来了。一口浓痰夹带着浓厚的酒味，射到我的面部，紧接着一声“特赦令”:“给老子爬!”我挣扎着站了起来，问了进城的路，拉起劫后余生的粪车，摇摇晃晃地起步了。走出大门之后，才敢揩拭罗队长喷在我脸上的秽物。

我记得将军衙门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找起来并不费劲。我在那里灌满粪桶，拉着满载的粪车，出通惠门，沿城墙边，经十二桥，穿青羊正街，过青羊宫门前，来在送仙桥。当年这里有一座石拱桥，是我归途的必经之桥。

已是薄暮时分，十一个小时前吃的一碗红苕稀饭早已消耗得无踪无影。我在桥头休息了几分钟，便沿着二十多度的坡度向桥顶冲击。一步，一步，一步，距顶点只有三步之遥了，可是，极度的疲劳和极度的饥饿使我崩溃了。虚汗涌出，眼前火花闪灼，粪车停了下来。我搜刮出最后一点生命之火，尽力使之不要倒退。一旦顺坡下滑，必将是罕见的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我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忽然感觉粪车又在向前行进。啊，有人帮忙推车！车到桥顶，我却控制不住下行之势。下桥后，又向前冲了二、三十米，才停了下来。回头往桥上，却不见人影。在这关键时刻，是什么人不顾粪车之污秽，帮我一把，救我一命？我却不得而知！好人哪，愿你一生平安！我也暗自立誓：要帮助需要帮助者。我挣扎着拉车前进，过了光华村。还剩下最后几里路，已是精疲力竭。

在这除夕之夜，公路上除我之外还能有谁呢？！我把车停在路边，解下拉车用的袢绳，抄近路回到生产队，到了食堂。呀！感谢炊事员，因发现我拉粪未归，竟然还在等着我去领取晚餐。午餐和晚餐并用，胃里有了一点充实感。

把一车粪卸进生产队的粪池时，已接近午夜。这一天的经历折腾

得我毫无睡意。干脆，我也来“守岁”吧，拉起粪车，去完成正月初一的那车任务。又走到将军衙门公共厕所，装满粪车。回程时，再次通过青羊宫拱桥，我不禁又回想起那未曾谋面、也永不知名的恩公。

出城不久，天光大亮。啊，正月初一，新年大吉！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我的“阳文八字”，在前面抛下长长的阴影。

补白：田栋云将军是原国民党政府交警总队的总队长，少将军衔。共军入川后，田仍率部与之激战，后向云南方向败退，不知所终。田是四川筠连县人，有一姐，嫁与高县天星桥的书生王二先生。王二家境富裕，既未当过官，更从未作恶。1950 年，田氏已年过古稀，由于夫家是地主，更由于弟弟与中共持枪对抗结下冤仇，他们便将一腔毒怨发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身上，定其为恶霸地主婆，决定将她弄出来祭旗，枪毙。但是并不就地枪决，而是先将田氏弄回娘家筠连，美其名曰教育群众，实则借此羞辱田氏一族。田姐年事既高，又是小脚，根本无法长途行路。那时既无公路，又无汽车，他们就用一个竹箩筐将田姐装在里面，叫人抬着，边走边打锣，吆喝着游街示众。当地只有抬动物才用箩筐，所以有骂人的歇后语“狗坐箩筐——不受人抬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被从天星桥抬到筠连县的罗场来处死。枪决时用枪指着老人的头部打，整个脑袋被打得稀巴烂，尸体成了一个桩桩。这种杀人方式，当时有个流行术语，叫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头颅，在那些人看来就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简单，一样无足轻重。　　　严家伟

我们村的婚姻故事　　崔东汇

我们村自古以来就地碱水咸人苦。穷的最直接结果是盛产光棍，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纠纷，外村人都怕我们村。一听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马就说：“算啦算啦，可别惹他们，光棍汉子

多，打架不要命。”与外村打架我没见过，但有一事足以说明我村光棍之多。那时穷得喂不起牛马，犁地靠人拉。八人一张犁，我们生产队的光棍汉组织起来拉两张犁。队长说，再凑俩就是十八棵青松了，咱队也来演《沙家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们说，那就让你老婆演阿庆嫂，好好给我们服务服务。一个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队尚且如此，全村六个小队光棍汉该有多少？光棍汉子都火气大，两句话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说我们村人嗓门大，这与光棍多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我村，别说一人俩老婆，就是一人一个也有很大缺口。不过，据说清末我村的秀才老代先生就有俩老婆。老代我没见过，有俩老婆的地主崔满仓我见过。

我对崔满仓有记忆的时候，他已成了革命对象，整天低着头挨批斗，俩老婆也早已离他而去。两个老婆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村里人说崔满仓的那个家伙不能用。

虽说是地主，崔满仓家总共才七十亩地，在外村连个富农也够不上。我们村穷，矬子里面选高个，崔满仓就成了地主。我父亲说，老满仓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攒了七十亩地，到头来却当上了地主。崔满仓不奸不狂，基本上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我们村几乎没有民愤。唯一让村人，确切地说是村里光棍汉们，忿忿不平的是崔满仓有俩老婆。他们连女人半条腿也没有，所以批斗崔满仓时发言最踊跃的是光棍汉们，尤其是崔二兴（当然此时崔二兴已脱离了光棍行列，解放后年近四十岁的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二兴曾给崔满仓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满仓不在家，在满仓小老婆屁股上摸了一把，结果让崔满仓扇了两耳光，扣了一半的工钱。所以批起崔满仓来，崔二兴格外卖力。有一次他竟话里有话地说：“活该你当地主，放着现成的东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用。”人们哄堂大笑。旁边的光棍就逗崔二兴：“今晚让你老婆到我家过夜，要不你就是口头革命派。”崔二兴也笑了，说我就一个，不像崔满仓那么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兴私下对一个年轻的光棍说，要让我有俩老婆，就是当地主我也干，结果被告发，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义思想严重。

风水轮流转。老子若干年前的梦想，若干年后让儿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崔二兴的儿子大头比我大一岁，读书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当了社员。后来在城里打工，又到东北捣腾药材。一去三年，回来时领了一个东北妞，家里的老婆寻死上吊地闹。财大气粗的大头以离婚相威胁，结果家里的老婆妥协了。大头在城里买了房，和东北妞继续卖药，城里乡下两个家。有时摆布不开，经常求我帮忙当义务调解员："老弟，帮帮忙，算我没本事。"我心里就发笑：妈的，没本事还俩老婆，有本事你该多少？碍于面子，不能不帮。一旦两个老婆相安无事，这小子就会借着酒劲跟我吹："没办法，现在成功男人都肾虚。"气得我直想用巴掌抽他。

游家在我们村是独姓，游大麻子是跟着他爹娘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民国三十二年爹娘饿死，游大麻子原来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后来一贫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队长。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战勇敢，多次受到永肥县抗日政府的嘉奖。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阵子，一次县大队端了许庄村的炮楼，皇协军小队长被打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是小队长从山东带来的，一双小脚。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不现实，再说她怕名声不好也不想回老家。负责善后事宜的科长犯了难，于是就想起了游大麻子。经请示，把这个战利品奖给了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战。民兵排里好几个光棍小伙子因此闹情绪，科长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谁勇敢奖励谁。"

天上掉媳妇，游大麻子那几天高兴得脸上麻子坑都发亮。若干年后，当年曾闹意见的老光棍三秃子在街头与老人们聊天说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军，狗日的大麻子他凭啥哩。"三秃子为此事专门找县长论理，又与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几十年面和心不和。

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斗。游大麻子辩论说，她跟着皇协军是坏人，她现在跟了我这个贫农她就是好人，她是县政府奖给我的，谁敢动她一指头老子跟他拼命。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她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村妇女中最多，村里

曾把她作为“活学活用”先进典型推荐到公社，后来还是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老婆这一点而遭淘汰。

虽然游大麻子和妻子一辈子恩爱，可日子过的并不如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到外村倒插门，小儿子虽然不痴不傻，就是因为家穷，四十多岁才花钱买了一个贵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贩子拐卖来的，过门两天就开始逃跑。被追回后严加看管，在生下两个女儿回贵州后，再无音信。小儿子气得整天疯疯癫癫不下地干活，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颠着小脚既要照顾孙女，还得照顾儿子。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路上遇见老太太背着一捆棉花杆艰难地走着。我给她打招呼，她眯缝着眼好一阵才认出我是谁。我给她一支烟，点燃。她一辈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楼上当官太太时养成的习惯。她说我长胖了，感叹我母亲没福气死的早，又说自己：“像我这样活着受罪，还不如跟你娘一样早早走了好呢。”

在村口晒太阳的三秃子则对我说：“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里不该成家。这不，他早早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受罪。”看来三秃子还耿耿于怀。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经商，领回一个老婆，村人不会惊奇。一个穷小子在外给人家扛长工，居然领回一个漂亮媳妇，那就令人惊奇了。这个穷小子就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轻时是我们村出众的帅小伙儿，方脸、大眼、高个儿，就是家穷，不得不到山西长治给地主扛长工。崔自高模样好，人也厚道，深受东家的信任和东家女儿喜爱。崔自高也喜欢东家的女儿，可长工的身份让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个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国即将解放，土改即将开始，他知道就要变天了，开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儿叫在一起，说你们俩都不小了，该成家了，我也知道你俩对脾气，以后社会也不知道变成啥样，我给你们点东西，一块回河北那边过时光吧。于是，穷汉子一条的崔自高不但有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还有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一挂大车许多粮食布匹和银圆的丰厚家产。

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杜寨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得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们村的女儿家。虽然我们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墩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更滋润了，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我说没问题。然而，我因为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我村的光棍有两类，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光棍。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

可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

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得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都是保留节目。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大多只放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议论的话题。莲花家是贫农，她的爹娘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富农子弟恋爱。多次劝说和打骂无效，匆匆忙忙把女儿嫁给了邻村一个贫农子弟。那一阵子，云兴像傻了一样整日不语，总是一个人默默发呆。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横笛，声音凄切，令人心酸。

因家庭成分，云兴三十岁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给换的，妹妹嫁的那个男人是地主子弟。云兴今年六十岁，今春大奶奶过世，我回老家奔丧，在葬礼上见到了满脸皱纹的云兴。不过他不是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他是我们家花钱请来的响器班子中的一员。他凭一支炉火纯青的横笛加入了响器班子。休息时我与云兴打了招呼，他说孩子都成家了，就地里那点活儿，不忙了跟着人家挣个零花钱。

他屋里根把好　　哥　巴

X 爹是我们队的老贫农，有两个女儿。这两姊妹虽然没读过什么书，穿得也不怎么好，但脸庞红润，面容佼好，勤劳开朗，浑身上下透了一种健康、淳朴的美。来提亲的不少，可是对那些看似条件不错的人家，X 爹却一概没应允。

X 爹要把女儿放给什么人家？一个惊人的消息最终传来：X 爹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本大队的地主子弟了。大队支书坐不住了，跑到 X 爹家说：“你一个老贫农要站稳阶级立场啊！这么多好人家你不放，为什么要放到四类分子家？”大队支书大道理、利害关系讲了一大箩，X

爹就是不听。问他看上地主家什么了，他没啥词儿，只是说“他屋里根把好”。

过了两年，二女儿又要放人家了。与上次一样，X 爹又把女儿放给了一个地主子弟。不消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大队支书又跑到 X 爹家。做思想工作无效后，支书祭出他的杀手锏——要开群众大会斗他。斗就斗，老贫农 X 爹不吃这一套。问他为什么要把二女放给地主家，他还是那句话——“他屋里根把好”。

“他屋里根把好”，当时人人都说 X 爹在说胡话。不过这句话几年后验证了。改革开放后，X 爹的两个女婿很快成为当地富户，最先砌了新屋，很快又帮岳父和两个小舅子砌了新屋。什么是“根把好”？我也大概明白一点了。

李香芝之死　　鲁　民

李香芝，山东阳信人，17 岁参军入伍，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作为 23 军文工团员随军入朝参战，1955 年归国，转业到地方，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

李香芝 1 岁丧父，6 岁时母亲改嫁，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9 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做到团长，至 1945 年已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孤女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看地、看树、捡柴、收割。10 岁时，伯父全家迁到阳信县城内居住，香芝才得入小学读书。逐渐懂事的李香芝打听到母亲的下落后，多次要求探

望，均遭伯父母拒绝。14 岁时，伯父母强令她与本县一个区长的儿子结婚，她决心逃出家庭牢笼。1947 年春，在参加革命的同学帮助下，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同年 12 月分配到军大文工团。

从参加革命开始，李香芝就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共产党。她曾给共产党的县长严清泰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把所知家中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给组织。

由于表现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习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1958 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再后又调到南京工作。李香芝工作勤恳，为人正直，曾跟友人说过："1958 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1966 年，李香芝经过一阵迷茫，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被推选为江苏省歌舞团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别的可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说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 6 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 10 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 年自己就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最后她把这份已写成的意见书烧了。

1967 年 1 月 26 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夺取了江

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大打派仗。李香芝心灰意懒，又生了肝病，退出了造反派组织。

1968 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开始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第一个迫害步骤是清理阶级队伍，各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李香芝被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因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几年，她被诬称为地主分子；因转党手续不全，她被诬称是假党员；因文革初参加一些派性活动，她被说成犯有反党乱军罪。有人还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事实真相是：“据我所知，（李香芝）用牛奶洗脸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把这些事说成一贯的，经常的，显然是有人为的夸张。”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对李香芝的隔离审查取消了。刚从牛棚释放出来喘口气，从 1970 年 8 月起，李香芝又作为一打三反的重点对象被关了起来。1972 年 2 月，李香芝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逮捕入狱。“揪李香芝战斗队”指控她态度恶劣，她却骂战斗队是反革命，随后发展到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们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她死也不干，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最终还是被逼疯了。在大寒天里，她脱得只剩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他们说李香芝装疯卖傻。1971 年 4 月 18 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写出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1971 年 8 月 2 日，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

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至 23 日，这位负责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9 月 2 日，林彪出逃前 11 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被仓促拉到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参加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李香芝被冤杀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多次向党中央、江苏省委写信申诉爱妻蒙受的不白之冤。1979 年 2 月 12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家庭批斗会　　朴女士

我们家是从朝鲜搬到东北的。1952 年我 5 岁，在村子里玩时，走进一间快要倒的破屋子，门窗都没了，一进屋就发现几个人倒在一堆草里，我认出其中一个是我爸爸。我惊讶地喊了一声爸爸，爸爸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他们都被反绑着，天气很冷，只铺着一堆烂草。我哭着跑回家，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要在那儿？那儿好冷好破。妈妈赶紧制止我，不让我哭，并嘱咐我：“你还太小，以后别问这些事了。”看得出，妈妈好怕。1954 年，赶上三反，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上初二时我已经写过十几次入团申请书。有一次，老师说要跟我谈话，我以为是谈吸收我入团的问题，没想到老师竟这样告诉我：我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老师特别喜欢我。如果不是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我早就能够入团了。老师叫我以后不要再写入团申请书了，写了也不会有结果。放学后，我独自一人趴在教室里哭。眼睛哭肿了，我不敢回家，怕被别人看见，也怕家人看到为我伤心，只好等到天黑悄悄往回走。

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刚到家门口，爸爸早已在门外等我入团的好消息。此前我已告诉家人，老师要跟我谈入团的事。爸爸迫不及待地问我谈的如何，我强装笑脸喊了一声爸，就再也控制不住，扑在爸爸怀里哭了起来。爸爸极力安慰我：“都怪爸爸的出身不好。”可是我知道，爸爸的心里比我更难过。

有一次五四青年节，学校排节目，音乐老师安排我打小鼓。忽然得到这种机会，我和全家都高兴的不得了。那个年代，孤独、自卑和歧视牢牢笼罩我们全家。为了我参加节目表演，家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为我做了新衣。五四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着新衣服来到学校。可是因家庭成分，我被临时取消了演出资格。15 岁的我，心已经死亡。

姑姑那时是街道妇女主任，是干部培养对象，领导要她必须和自己的亲哥哥（我爸爸）划清界限。我叔叔家的三个孩子，老大是县武装部长，老二是工厂厂长，老三是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和自己的亲伯伯（我爸爸）划清界限。文革的第二年，姑姑组织我们家族的 30 多名亲戚朋友，搞了一次对我爸爸的家庭批斗会。

那是 7 月的一天，姑姑带着这一大帮亲友，高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来到我家。爸爸几乎整天挨斗，浑身是伤，在家里躺着。看到姑姑来了，爸爸艰难地爬起来问候了一句：“你来了。”姑姑开口吼道：“朴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要不决没有好下场！”那年爸爸已经 65 岁了，比我姑姑大了整整 35 岁。在我们朝鲜族，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这样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个荒谬悖逆的年代，爸爸只好忍气吞声：“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文革两派，无论哪一派搞批斗会，都要把我爸爸抓去，在他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的湿木板子，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朴和均”，名字上还红笔画一个大叉号。爸爸的脖子几乎天天血肉模糊，脸肿得认不出来，脖子和头一样粗。姑姑接着吼：“你还坐着干啥？站起来！”爸爸低着头，弯着腰，哆哆嗦嗦硬撑着站了起来。爸爸血肉模糊的脖子上再一次被他的亲人挂上了那个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湿木板。

姑姑逼爸爸背毛语录，爸爸全身发抖，结结巴巴背不出来。姑姑再次怒吼："你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三堂哥掏出手枪对准我爸爸气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你说！"他们边喊边靠近我爸爸，已经六亲不认。我从五岁开始就亲眼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当我看到了我的堂哥和姑姑也变得这样没有人性时，我愤怒了。我冲过去，挡在他们面前，一边保护着我爸爸一边大声吼道："你们来干啥？！滚出去！"二堂兄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边打边骂我："该死的，你干啥？！你为什么还不划清界限？！"我被重重打倒在地。二堂兄、三堂兄同时用手枪指着我爸爸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垃圾？你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垃圾！"看到我被打倒，我的妈妈和嫂子哭作一团。爸爸只好在自己的亲妹妹和亲侄子等 30 多位亲戚面前连声说："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967 年 9 月，也就是遭受家庭批斗会两个月后，爸爸被抓到林业局农场接受改造。不准家人探望，没有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年半以后的 1969 年 4 月 18 日，劳改农场来人通知我们：朴和均已经死了，赶快去办理后事。

爸爸被扔到一个乱石堆里，一条破被子裹着。我哭着说："爸爸，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这哪是我的爸爸？脸已被打得认不出模样了。现场监视的人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连一把锹都不敢借给我们。我们全家只好一边哭，一边用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父亲。

补白：川南筠连县原沐爱区中心乡，有个李姓女地主，三十来岁，容貌姣好，乡村痞子对其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该女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土改中，几个流痞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一次弄来几块肉，叫她当众吃下，称："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们先是对她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

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到痞子们的身上、脸上。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氏女的裤子，破口大骂："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其他几个痞子帮着作恶，扯手按脚，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严家伟

丈夫被害之后　　陆云芳

从反右到文革的 10 年里，我们的大家庭失去 3 位成员。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广西宾阳县宣传部工作，因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妻子（我丈夫的三妹）被逼与他离婚，否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三妹已是 3 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 7 个月。为了孩子将来不被歧视，三妹只好含泪和心爱的丈夫离婚。后来三妹夫被送劳改，折磨致死。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文革一开始就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次年含冤去世，丢下 2 个年幼的孤儿和年轻的妻子。

我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在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一来，被该校造反组织扣上 34 条罪状，诬蔑他是历史反革命。1968 年 8 月 15 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所在的中学，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内各小学，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

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召集起来，听齐某的动员报告。齐某要各个点的负责人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我丈夫早已是阶级敌人，我也被定为阶级敌人。斗阶级敌人的手段花样百出，剃十字头，罚跪，反手绑，拳打脚踢，棍子打，等等。逢集市的时候（三天一集市），白天拴着我们上街游斗，强令我

们敲着口盅、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喊声不够大，跟在后面人就推打。晚上回住地，继续在学习班批斗。学习班开班第四天，即 8 月 19 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绑着拉到该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然后扔到池塘。

我们一家 6 口（4 个孩子）原住在丈夫学校的宿舍里。1967 年我和孩子们被赶出学校宿舍，家庭被拆散。在学习班上，我和丈夫也不在一个点。丈夫惨死的当晚，我一无所知。次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丈夫送早餐。他不在宿舍，我感到不妙。在校院内，有人告诉我，丈夫昨晚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我惊呆了，悲愤难抑，立即去找齐某。我质问他：“是谁打死我丈夫？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有什么好处理，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埋在心中。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回家先把这不幸的消息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听到哭着要爸爸。我妈听到噩耗也惊呆了，泪流满面，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我 4 岁就没了爸爸，如今运动又把她唯一女儿的丈夫夺走了，剩下母女一门双寡！在巨大的打击下，母亲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衰老了许多。

埋葬了丈夫的当天，他的学校就勒令我两天内把丈夫的东西从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次日早上，两个最小的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们送饭去给爸爸吃吧？”听到这话，我的心都碎了。丈夫生前很疼爱孩子，一到吃饭时间，孩子们就想起爸爸。丈夫未被隔离前，最小的孩子想睡觉时就叫爸爸抱，摸着爸爸的耳朵才肯睡。我含着泪对他们说：“爸爸永远不会吃我们的饭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他不在了。他们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脸再也没有笑容。年迈的公公、婆婆得知儿子的死讯，哭得死去活来。公公泪流满面，说过去我靠一条扁担挑在肩上养活一家 14 口，那么艰难，我没有流过泪。战乱年代，我的儿子投奔共产党的军队闹革命，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下，现在竟惨死在他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党手里，让我老年丧子，白

发送黑发，真冤啊！

丈夫死后的第三天，他们派人叫我回学习班继续迫害。他们用绳子绑我、打我，叫我跪下，有时一跪就是三四个小时。丈夫没死时，我不被挂牌，他死后我挂牌了，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的臭老婆某某”。晚上我请求他们让我回家住宿，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一个家伙说，你回去就挂牌回去。我说，请你看在我年老母亲面上，不要叫我挂牌回家。她看见这块牌，打击太大了，会受不了的。她要是再出什么问题，就没人帮我看管这几个孩子了。他凶狠地回答说：“不行！”无奈，我只好天天挂着这张牌回家，快到门口时就拿下，把字翻过来，放到门背后去，以免母亲看到受不了。

在将近 3 个月的学习班里，他们强加给我莫须有的罪名，说我好大的胆子，丈夫死了竟敢去问齐副主任如何处理，想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诬蔑我参加反共救国军，是救国军的联络员。他们一共列了八条提纲，围绕这几个问题批斗我，没有一天不罚跪挨打。

10 月底，血腥的学习班结束了。在我所在的学习点，有 2 个老师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学校的那个点，死了 4 个（1 个书记、1 个副校长、我丈夫和 1 位女教师），其他点死多少人，我不得而知。学习班结束后，他们不让我回学校上课，把我赶到农村生产队，一边接受劳动监督，一边继续写交代，交代得好还可以当老师，交代不好就永远别想当老师了。当时我的工资每月 34 元，他们只发给我 21 元，只够买 6 个人的口粮，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

我什么交代也不写，我没干坏事，没什么好写。我恢复工作后，孩子们仍然处处受歧视。一天晚上，妈妈上公厕，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外面等，邻居的两个十四五的少年竟用木板鞋把我最的儿子的头打得鲜血直流。派出所一位姓石的警察看到了，立即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救治。我赶到医院，看到小儿子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的两件衣服都被血渗透了。我的心好疼啊！赶把儿子抱在怀里。护士拿着药和绷带给儿子包扎，说谁把孩子打成这样，真是太狠心了。

1976 年文革结束。据 1984 年官方透露，我所在的县，30 万人口，

文革期间就被迫害死了 2200 多人。有一个乡镇，一天就死了 160 多人。文革过去 30 多年了，但中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

祖母曾被共妻　　王文怡

文革开始，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初大人瞒着我们姐弟二人，我问奶奶究竟怎么回事。原来父亲早年因爷爷去世，为生活所迫报考了国民党宪兵军官学校，因为军校不用交学费。

被隔离审查的父亲天天做检查，不久安排他为造反派双方抄写大字报。父亲练得一手端正清秀的正楷毛笔字。每张大字报，开头都必须写上“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一天父亲抄错一个关键字，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贴出 14 天后才被发现。对父亲的迫害陡然升级，动不动就被拉去痛打一顿，成为双料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母亲也时常被拉去陪斗。父亲最后被送往农场劳改。

父亲刚被隔离时，我天天到群众专政委员会给父亲送报纸，路上常被一些半大孩子围追着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不知如何应对，只会背地抹眼泪。过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显冷淡了。一次，不到 6 岁的弟弟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围殴、谩骂，为躲避挨打，吓得竟爬到树上躲避。我闻讯赶去解围，换来的只是讥笑、辱骂。情急之下，我捡起半块砖头向领头的砸去。他们看我真要拼命，一轰而散。惊恐万分的小弟从树上下来，嚎啕大哭。

年迈的老奶奶，以前从不谈论国事。我常琢磨着问她一些往事，她总闭而不谈，有时自己呆坐在窗前，长时间流泪。奶奶虽然裹小脚，却识字，整天拿本《雷锋的故事》读。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对奶奶震动很大，常常像讲故事式地自言自语给我们说过去的事。我们开始对奶奶的经历有所了解。奶奶 27 岁守寡，洁身自好，誓不再嫁。五

十年代初，誓约被无情打破，她被分给一个贫雇农做老婆。1956 年父亲回到北京家乡时才将她“赎”了回来。

黄埔八期邓祖稷　　赵子法

邓祖稷是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八期学员，1941 年在甘肃省福非县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被授予少校军衔，1949 年在湖南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在湖北省中南军政大学任教官。学校日渐由新政权的师资充实，1954 年邓祖稷受到排斥，回到广西南宁。当地民政部门以种种理由不予安排工作，无奈之下跟随父亲做煤油灯维持生计。

文革开始，邓祖稷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抓，冠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沿街游斗，斗争会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家被抄，凡值钱的东西，衣物、用具、钱财都被抄走一空，也不留收条，如同被土匪洗劫，幼小的子女战战兢兢，哭泣都不敢出声。

1969 年，邓祖稷全家 6 口被强迫送回原籍广西扶绥县，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劳动。在此期间，一切权利均被削夺，并经常被社员开会斗争，交待历史反革命罪行。邓家祖屋后墙的排水沟被邻人霸占，在上面盖起厨房，致使邓家的房屋不能排水，墙基常被水泡，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邓祖稷却一直不敢怒也不敢言。

1978 年政治形势变化，邓祖稷得以携妻子回到南宁。表面上他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摘去了，暗地里却仍在接受监督改造。80 年代初，中国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包括退回被抄财物和补偿问题。当地政府告诉邓祖稷：“当时抄家也不是政府去抄你的家，像你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不在退回被抄财产和补偿之列。”文革的十年血泪就这样不了了之。

1989 年当地政府核发住房宅地使用证，邓祖稷发现那排水沟的使用权已不属己有。当时到处都在强调以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邓祖稷抱着也许能讨回个公道的想法，多次找村委会、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最后得到的调解书竟把 0.93 米宽的排水沟变为 0.3 米。0.3 米宽，无法进去打扫卫生和维修，邓祖稷多次找发证部门反映，政府工作人员文善威却回答道:“这条水沟从前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们相争，我就收为公用，30 公分宽的排水沟为公用，不服你去告吧。”

1990 年，邓祖稷到广西扶绥县法院起诉。法院迟迟不接诉，接诉后又迟迟不开庭，最后判决又偏袒被告，连这 30 公分宽的水沟地都不承认了。邓不服判决，又上告到广西南宁地区中级法院。南宁中院的判决出尔反尔，改了又改。当年舍命抗日保国的邓祖稷，到头来连自己家的排水沟也保护不了。1993 年 7 月 25 日，老人昏倒在去南宁扶绥县法院的路上，一瞑不视，享年 78 岁。

补白：阿兴姓杨，人高大魁伟。土改时，其家有四十亩地，另租四十亩，雇工一二人，共耕种此八十亩地，被划为地主，送浙江安吉劳改。劳改场买来一耕牛，性暴烈，无人能驭，于是打报告请示：牛既不能耕地，当如何处理。指导员批复，留着无用，杀了吃。地主阿兴就去跟指导员说，此牛是头好耕牛，杀了可惜，遭粗声责斥：“你说是好耕牛，难道你能让它耕地吗？”阿兴低声答：“能。”但有一条件，“让我先放它半月”。指导员答应了。此半月中，阿兴精心放牧饲养那牛，人牛建立了感情，牛变得很听话。半月时间到，牛上轭了，拉犁了，很顺服地听阿兴使唤。牛一旦能上轭，耕上地，成了习惯，其他人也就能驾驭了。那些很强悍的劳改青壮年，大概有报复牛的心理，超负荷用牛耕地，把牛腿累瘸了。牛又不能耕地了，又打报告。指导员无法，批复:“杀!”阿兴又去求告:“X 政府（犯人对指导员的称呼)，请你派俩政府监督我上山采找草药，牛腿可以医好，千万不要杀它，它是一头好耕牛呵!”又经阿兴半个月的精心治疗调养，牛痊愈了，又可耕地了。

——————————————————————————————————

父亲尹煌沉冤　　尹建云

父亲尹煌，1913 年 5 月 8 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市育段乡东塘村王家屋场。1927 年参加国民党部队，1934 年在武汉参加地下党，1939 年考入黄埔军校，16 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冲锋陷阵，先后参加 6 次战役。在温州野战医院抢救时，从身体的不同部位取出好几块弹片。部队安排回家休养一年，伤未愈又奔赴抗日前线。1948 年 9 月，父亲与解放军四野联系，率部投诚，先后被任命为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为湖南长沙和平解放做出很大贡献。后调入 47 军 145 师，任作战参谋，参加湘西剿匪。全国解放后进入南岳军政大学深造，是湖南军区重点培养和发展的中坚人才。

????不料此时祸从天降。1952 年，湘乡县政府通知父亲从南岳军政大学返乡。人未到家，中途秘密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未履行任何必备的法律程序，也未通知家人，一张白纸公告（公章都没一个），就把父亲枪毙在湘乡夏梓桥涟水河的沙滩上（农历七月初十日）。

时隔 3 日，一位在湘乡街头做小生意的乡邻，冒险到我家告知此事。全家人无法相信事实，我家大门上还挂着“军属光荣”的牌匾。当天中午，我和哥哥（15 岁和 16 岁）冒着烈日，步行数十公里火速赶到吾父丧生之地。沙滩上插了一块一米长的竹板，上书“尹俊超，现名尹煌”。见此惨景，兄弟俩顿觉天旋地转，哀号父亲，双手扒开埋在父亲身上的沙土。父亲赤着双脚，身上只穿一件短衬衣和一条内短裤，双眼圆睁。真是亲人血脉相连，扶起父亲时，一股鲜红的鼻血从父亲鼻孔喷出，喷到我们兄弟身上。

吾父死后，全家立即陷入灭顶之灾。此后的 32 年里，父亲的“反革命”罪名导致亲人一个非正常死亡，一个终身致残，一个失去工作就业权，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收到影响的直系、旁系亲属数十人。

1985 年 3 月，我家等来了湘乡市有关部门送达的《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85]法刑查字第 06 号刑事判决书》和 400 元的补偿款。判决书撤销 1952 年对尹煌判处死刑的决定，恢复起义人员名誉。我们对为父亲恢复名誉的草率认定和微不足道的补偿款不服，不在送达书上签字，期待着党和国家及部队的有关部门给我父亲一个公正的认定。但期望无果，一些腐败官员多次无理关押我们夫妻俩和儿子。今年（2010年）6 月 10 日，市委书记李世宏下令市法制办主持公开听证。法制办书记公开承诺，9 月 10 日前一定解决此案。

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也是古稀之人了。我父亲尹煌，为国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却如此蒙冤，当地政府不但不安慰功臣之后，反而屡次报复，天理何在？请求上级领导为我主持公道，让吾父尹煌在九泉之下安息！

补白：镇反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地区人口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镇反的第二个特点是没有法律程序，定罪杀人依据领导指示和个人体认，追求速度和痛快，根本无视法律。中国传统法律的长处在于刑法和行政法，受到中外法制史学者的高度评价，不仅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同时代的法制水平所不及，而且许多内容完全可以达到现代法律的水准。清末民初，汲取西方法制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新法。中共建国后废除已有法律，又不颁布新法，直到 1979 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刑法。镇反的第三个特点是滥杀无辜。有上面两个特点，必然就有这第三个特点，也可以说这第三个特点是前两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

西藏的一打三反　　唯　色

赤列曲珍是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1970 年 2 月的一天，拉萨

人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赤列曲珍的大会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南郊流沙河刑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2001 年，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 30 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目睹了赤列曲珍被枪毙："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她当时还活着吗？""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当时西藏也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打三反，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不幸被抓获的，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严惩。20 岁的图登晋美是拉萨中学高 66 班的学生，与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逃亡时被捕。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晋美被公审处决。枪毙图登晋美那天，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到刑场时，图登已经被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 3 人，2 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 20 年徒刑。1958 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亲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

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同伴格桑强久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将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 岁的东觉和 14 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 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被中共盛赞为爱国上层人士的擦珠活佛的一个 16 岁的外甥，被判刑 20 年。

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尼姑，60 多岁，因将毛像倒贴在墙上被枪毙。曾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40 年代在某县当秘书时曾

将摄政王热振活佛手下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此时此事也被翻腾出来，判处死刑。1960 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发生拒粮事件，一位活跃的回族穆斯林被当作叛乱分子处决。

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在天葬台附近执行死刑，并非为了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 年和 1971 年被枪毙的人之多，仅因 1969 年“再叛乱”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 295 人。后来这 295 人有的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先后给家人安慰费 200 元和 800 元。很多人认为，被枪毙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 100 多人。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汉人陶长松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 200 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 800 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云龙和雨龙　　王德邦

1972 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快放学时，忽有五六个民兵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从校门口经过，其中两个民兵还背着步枪，他们中间还跟着两个个头跟我们相仿的男孩，老师和学生都来围观。

两个男孩一下见来这么多孩子，尽量往大人后边靠。那大队干部大声喊：“云龙、雨龙，你们过来。”两个本想躲闪的孩子怯怯地走了过去。那干部告诉老师：“那稍高一点叫云龙，矮的叫雨龙，是王时仙的仔。”老师恍然大悟：“原来你们是去接他们回来。真是不觉过去四五年了，看他们都长这么大了。”

去接这两个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传一段时间了。有些村民不同意这么做，认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岁，小的不足八岁，接回来以后怎么生活？然而大队干部与村中一些阶级觉悟高的群众的观点相反，说必须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动权。

王时仙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几代单传，积累下来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还算个大村，有两百多口人，不划出个地主说不过去，就定了王家。当时王时仙还不足十五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造多年，比贫农还贫农的王时仙一下成了专政的重点。1968 年，在大队的一次大批斗之后，王时仙终于死了。关于他的死，有说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说是把头按在水中溺死的，还有说是用电电死的。王时仙当时不到三十岁，撇下了五岁多的云龙、三岁多的雨龙和一岁多的女儿。在极度恐惧中，王时仙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回离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转眼六年过去了，村中一些干部看别村阶级斗争热火朝天，深感本村没地主可斗的寂寞，于是就要求将地主的儿子带回村来接受改造。我村属广西，云龙、雨龙的外婆家属湖南，在那个粮食紧张、户口管理极严的年代，跨省要人回来，手续是很麻烦的。然而当时阶级斗争挂帅，一切给阶级斗争让路。由大队干部出面，基干民兵为主，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队，先后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当局积极配合下，工作队终于如愿接回了小地主云龙、雨龙。

他们原本想将三个地主仔一起接回来，由于那村一批觉悟不高的群众出来劝阻，更兼地主婆（王时仙的妻子）牵着那六岁的女儿跪地哀求，村里许多群众也跟着下跪，工作组就高抬贵手了。不过已经说好，待孩子长到十岁后，还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队干部对师生、村民绘声绘色地讲着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两个地主孩子却在那里偷偷落泪。故事讲完，大队干部极为荣耀地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两个地主仔，在村民簇拥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没人住、也无人管的屋，门半掩着。干部让两个地主仔进去，并说这是你们的老屋。谁知那俩个孩子一听到老屋，就惊恐得全身颤抖，想转身逃走。大队干部连推带拉，硬是把他们塞了进去。进屋后，俩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并哀求那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别处去。大队干部根本不理会，也不问原因，只交代身边一个跟来的老农说："你也算是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帮着照看一点，可别让他们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问。"老头唯唯应着。两个孩子紧张地瑟缩在一块，村民在暮色中纷纷散去。

我到家时，父母正悄悄议论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亲连连叹息说："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让他们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愿进的鬼屋中，他们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时仙祖上留下的。文革开始，革命群众冲入老屋斗地主，将王时仙反绑双手，高吊在屋梁上，要他交代"变天账"。在反复拉上拉下的吊罚中，王时仙痛苦的喊叫声响彻全村。每次吊打王时仙，还将一家老少绑屋中观看。云龙、雨龙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吊打，多次昏死过去，屎尿并流，吓得大哭，为此他们也挨了红卫兵的毒打。后来他们的祖母也吊死在这老屋的梁上，祖父也在这屋中被折磨死。

他们母子去姥姥家以后，这屋中再没人住。村中传说，雷雨的夜晚常能听到屋中传出凄厉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让孩子到这屋里来，队里也不敢拿这屋存放东西。云龙兄弟到他老屋时之所以颤抖、哀哭，显然与当年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有关。后来他们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间小房，从侧门出入，从不到堂屋去。

我母亲与云龙的母亲是同村人，从小就认识，后来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亲跟云龙的母亲总是结伴而行。文革期间，我母亲每年回外婆家时，总会偷偷去看云龙的母

亲。云龙、雨龙被抓回村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母亲经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俩。那时大人是不敢明目张胆关心地主仔的。

云龙、雨龙兄弟被接回村后，就被那些阶级觉悟高的干部像扔垃圾一样丢弃了，没有人会想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兄弟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没法挣工分，就承担了村中的养猪工作。每年将养的猪送到生产队，按猪的重量结算工分分粮食。那年月，连人都吃不饱，拿什么喂猪？可是养不出猪，年底就分不到粮食，没粮食就没法活。养猪难，不养更难，于是兄弟俩只好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扯猪菜。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牵着个近八岁的孩子，无论风雨，每天都得采几筐猪菜。几年下来，兄弟俩竟比村中老人还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猪菜时，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

采猪菜不易，砍柴更难。煮猪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须走十来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担柴，孩子砍柴就更难了。猪养得不好，粮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俩一年只能分到四百来斤稻谷，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这点粮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饱。至于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着从他母亲那里来时穿的那套秋装，变化的只是不断增加的补丁。

兄弟俩被从母亲身边带离时在上学，大的三年级，小的一年级。接回村后，上学就甭想了。哥儿俩对上学充满向往，每看到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都远远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们熟，别的不是欺侮他们，就是远离他们。每天放学后，我也常帮家中扯猪菜，我们经常相约在学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个小山坡后见面。我曾多次要求他们到校门口等我，但他们坚决不去。他们常常就在那山坡后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里有一块地方被他们兄弟卧得连草也生不出来了。他们趴在那里等我，能清楚看到学校，学校的师生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常常早早采好猪食，就到那里趴着看学校，顺便等我。我每次放学后到那坡后，他们就围着我问当天的学习。我拿出书本给他们看，兄弟俩轮流看语文、数学。为了这份友情，兄弟俩经常把好不容易采来的猪菜分一些给我。

有一年儿童节，学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游戏节目，欢度节日。结束时天快黑了，我匆匆赶到山坡后，发现雨龙一个人在那坡上已经睡着了。他满脸泪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着了。我在他身边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识地擦擦眼睛问：“你放学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其实他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他肯定在这偷看我们玩游戏很久了，也肯定因为触动太大，太伤心了，所以才哭得睡着了。我奇怪他哥怎么不在，他告诉我说，哥哥有点感冒，先回去了。正说着，哥哥又来了。他也是双眼红肿，好像刚从水边洗脸回来。他见我也不好意识地说：“今天放学真晚噢。我们回家去吧！”兄弟俩都低着头，我们一起回村。

每年春节，他们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门，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与孩子的嬉闹声中，兄弟俩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们思念母亲，也深深挂念着自己的妹妹。有几次我母亲回外婆家，他们偷偷将自己省下的好东西，托我母亲给妈妈、妹妹带去，有一次竟将仅有的一只鸡托我母亲带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云龙、雨龙兄弟喜欢到离村较远的一个高山上去采猪菜，其实那山上并没有什么猪菜。有一个星期天，我要求跟他们到那高山上采猪菜。他们尽管不太乐意，也不好拒绝我。到那山上我才发现，他们是为了能遥望他母亲所在村后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的母亲也可能会带着妹妹在那山上干活。兄弟俩看着，谈着，情不自禁地流着泪。

兄弟俩有时候生病，或受伤，或受村中别的孩子殴打，从来没哭过。除了我曾见过几次他们哭泣，村中其他人应该很少看到他们流泪。有几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斗，村中那些狂热的阶级斗争干部就把他们兄弟俩拉来陪斗。每到这时，他们兄弟那满脸的痛苦，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但这种时候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流泪。他们只是默默低着头，紧紧咬着嘴唇。有两次，被激起阶级仇恨的群众冲上台，殴打别村的被斗者，顺便将他俩也揍了。被扶回家时，他们没哭，人都走后，他们才缩在被子里痛哭。多少年后，兄弟俩只要一听说开大会，就浑身不

自觉地发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兄弟俩唯一的愿望是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因为自 1972 年被带离母亲后，母子就再未见过面。

李先生来信：焦博士你好！谢谢你发来的《地主专号》。感谢你的辛勤耕耘。我对地主二字充满了恐惧感。我的曾祖父少年丧父，带领两个弟弟打拼，到我爷爷这一辈，历经两代人，四五十年的时间，土改前在青岛郊区崂山县置下了几十亩薄田。五零年老家土改，祖父被枪毙，他的一个弟弟被抓起来，在看管的地方死了。我父亲吓破了胆，窝窝囊囊担惊受怕一辈子直到去世。土改那年我七岁，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尽管自己很老实，也很努力，还是处处受歧视。地主这个词对我来说是太沉重了。多多保重！

————————————————————————————————————

丁先生来信：我有一个朋友，曾做过检察官，一次交谈中告诉我，他去下面县里和乡里搞过平反冤假错案，见到许多被枪毙的人的卷宗中仅有一张记着名字的白纸，具体事实、证人、证词等等统统没有。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当年竟是如此草菅人命！"

刑场观礼　　百　姓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在辽西的一个小县城，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听说有一座监狱还是制造钱币的工厂，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钱币最可靠最安全。小县城的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狼山的一个小山坳，那儿是一处刑场。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杀人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国庆前夕，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

犯。死刑犯们面色青白，非常可怕，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出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的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 XXX”或“杀人犯 XXX”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大牌子就被翻过来，变成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名字上画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推推搡搡押上解放牌卡车，伴随着广大革命群众高呼的口号声，游街示众，赴刑场枪决。

行刑的队伍阵容很庞大，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没有警笛，是由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重复广播判决书的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不是警笛，比警笛还恐怖。

有一个死刑犯叫闻占武，是个现行反革命，脸庞长得像个大男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军衣，我至今仍记得他可怜的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那双好看的，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好像在人群中搜索着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一样，他嘴中塞了一块木头，牲畜嚼子似的铅丝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的待遇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看清了，胆敢反革命，就是这下场。行刑车队出发前，我站得离闻占武很近，隐约听见车上的他喉咙咕咕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围观者中，有个女人小声说道：“唉哟，那个姓闻的，三个孩子啊，大的才十来岁。”我明白了，他的目光可能是在人群中搜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人们议论说，闻占武是个有战功的前志愿军战士，复员后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侠义心肠，人缘好，有文化，能说会道，很有号召力。文革初他组织造反派，贴大字报反对林副统帅，被群众专政，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狱中听说林彪出事了，他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释放平反。闹了半个多月，终于闹出了结果，不过这结果与他的愿望正相反——不仅没得释放，反而被枪毙。

狼山刑场早已人山人海，先期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

西湖慕才亭联　焦国标书

——————————————

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可以像在古罗马斗兽场里那样，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个一清二楚。刑车开进来了，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警察把他们按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一一按跪在地。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他们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其实并非他们的仇人，也并非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像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在灵魂深处发出懦夫的战栗——这正是他们公开杀人想要达到的目的。

面对死亡，那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旁边架着，他们不会保持站立。闻占武则仍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大男孩的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那七八个老少反革命都还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直挺挺地跪着，像是在站立。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排号射杀。这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刑事犯们最先处决，反革命被排在刑事犯之后。

最后时刻到了，行刑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刺刀尖几乎戳着犯人的后脑，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固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袋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栽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就呜呼哀哉了。

第三个刑事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第一声枪响时，他竟然自己先倒了，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

轮到闻占武了。枪声一响，他的脑袋象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炸子儿"。后来我有个当兵的朋友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子弹端头的铜

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他认为他杀的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九一三事件期间，这个小县城共杀十五个人。

兴凯湖纪事　　陈奉孝

八九月间的一个来月，兴凯湖的蚊子多得你难以想像。在关内，蚊子白天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眼睫毛真就派上了用场，能挡蚊子。手不停地干活，蚊子落不上。

那年八月，我们参加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像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全部被整编，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罪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监狱和劳改队。傅作义部队的下级军官，这样命运的，我接触过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

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王锦泉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得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叫。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囚衣成了红的，全是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王被塞进小号，三天后死了。

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

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吃晚饭也要钻进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一种是牛虻，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兴凯湖的犯人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垫子，垫子底下是烂泥。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要把脚冻坏。

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垫子漂在水上，底下是烂泥，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有一次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垫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了上来。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割水稻，割完还要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辊子。每个辊子上，四个犯人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辊子上脱粒。每个辊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

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脏累，而且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辊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辊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脱粒辊绞进了他的脚，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那一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喂机子的犯人，因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不论是在脱粒水稻，还是在脱粒黄豆，犯人年年都有伤亡。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是伤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

我的刑期是十五年，我怕熬不出去。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还喊我着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就这样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甘心。有一天在水稻田里平水田，犯人郝志祥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国民党时期是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犯人的铁锹天天用，磨得像刀子似的。这一锹若劈在他脑袋上，非削去半个不可。他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吓得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他弯下身，我的锹就够不着他的脑袋了。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在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三截。谁也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带上手铐脚镣，塞进小号。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我一米六三，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

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从稻穗上撸下稻粒，在

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细细嚼，把稻壳嚼的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不会得阑尾炎。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脱谷时还用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满稻谷，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

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于是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犯人都要解开棉袄、裤腰带接受检查。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还扣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现行反革命就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右派，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如果他掌了大权，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还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

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父亲去世，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豁出去了，不过一死。我偷偷预备一根镐把，藏在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每天犯人吃过晚饭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大多数时间就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读报。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学习”，我想等他走时，我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打死他，然后我扑电网。

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地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一怒之下杀了一名干部。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可是说来奇怪，一连等三个

晚上，姓鞠的都没来。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

开封的镇反　　国　亚

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反高潮，他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父亲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对后心开枪也有问题，经常打好几枪还不死。开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挨了两枪后倒地，几秒钟后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某喘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开封城里有一家私人照相馆，我父亲刚参军时去里面照过像。照相馆老板跟人说话特别和气，但是没过多久突然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滑县一股土匪武装的头子，害过不少人命。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到开封，开了这家照相馆，以为从小地方跑到这个二十多万人口的省城就算是万事大吉了。镇反开始之后，两次排查都没有被怀疑到，他不禁忘乎所以，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结果被一个熟人看见，立刻检举了。真实面目被暴露，枪毙了。

公安部队里有一个经常行刑的刘排长。那时物资匮乏，刘排长在城外枪毙了反革命，还要把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团成一团，再朝刺刀尖上一挑，带回去，有时绳子上还沾着血迹。有一次刘排长一帮人枪毙完了犯人，觉得挺热，就把军装脱下来一扎，也挑在枪尖上，光着膀子穿个裤衩回部队。这样的军容军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就沿着城墙根走。谁知路上还是被首长撞见了，狠狠训了他一顿，还让他写检讨。死刑执行方法改成对后脑开枪以后，刘排长在把犯人拉出去枪毙之前，在每个人后脑勺上都用粉笔画了个圆圈，指着圆圈对战士们说："看见了没有，过一会儿就往这儿打。"结果还没出部队大门，又让首长给撞见了。首长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道："就你喇咕点子多，擦掉！"刘排长不得不把圆圈擦了，又写了一份检讨。

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明眸皓齿，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镇反进一步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

镇反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的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获释回家。大姑虽然侥

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重庆Z县的镇反　　渝　生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Z县县志办公室任编辑。办公室里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曾是Z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先后任过六个区的区长或副区长。一日与我闲谈起当年的镇反，他说当年他在官坝区主持过多次枪毙人的公审会，那时枪毙人常常有陪毙的。有一次枪毙12个人，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毙的杀了一个。这可是人命关天啊！我问老范后来怎么解决的，他说这在当时不算什么，补一个手续就行了。所谓补手续，就是写一张纸条，就这么简单。这样草菅人命的离奇枪毙人事件，Z县发生过很多起。

该县黄金乡金银村有一个姓方的青年，在成都某高校读园艺专业，毕业后娶了一个成都姑娘，回乡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园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那时黄金乡和汝溪乡同属一个区，区上要把全区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开公审会枪毙，以壮声势。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里远，要经过一道山溪。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过，那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民兵只好绕道而行。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就迫不及待地开枪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赶到，早散场了。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方某就这样捡回一条小命，他实在是太感谢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40多年后的1994年夏，我在一位当地政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黄金乡拜访这位已经70多岁的传奇老人。他和妻子，当年那位成都姑娘，正在精心料理他的苗圃。一见我和那位官员，他就满脸堆笑——那种很扭曲的笑。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挖点东西出来，谁知他什么都

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共产党好啊，呃，人民政府好啊，呃。”我顿时从心底升起一阵悲凉。

比方某的命运转机更偶然的是，一位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枪毙进入高潮时，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曰：“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 Z 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是国军 15 兵团司令、著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

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堂弟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这样一个人也要被枪毙，罗广瀛的妻写信给政府，请求宽大，称一家 8 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了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的性命。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是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 Z 县自卫队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接受了许多新思潮，坚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所以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快到 Z 县时，他通电 Z 县 48（？）个乡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解放军入城。意想不到的是，解放军入城不久，新政权稳定局势后，马剑秋成了阶下囚，然后被枪毙。

狱中的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说他对自己的起义

之举依然不悔，在最后的时刻，他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后来我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篇《马剑秋传略》，准备收进 Z 县志的《人物志》，但这篇传略后来并没有收入《Z 县志》。

关于马剑秋的死，我问了我父亲。父亲当时是县财政科干部，参加了马剑秋的公审大会，亲睹了马剑秋被枪毙。父亲说，马剑秋被绑赴西山公园刑场，与梁树芬、伯永梁（皆国民党 Z 县官员）等十数人站成一排。临刑前，被反绑着的马剑秋要求讲话，所讲内容跟我见过的档案资料《刑场上的演讲》差不多。站在旁边同样被反绑着的梁树芬很不耐烦地对马剑秋说："马上就要枪毙了，还说那些做啥子!"但马剑秋还是喊着"共产党万岁"饮弹而亡。马剑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园草坪，后来长期成为 Z 县的刑场。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里倒在枪口下，鲜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块土地。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那天，西山公园广场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 个死囚被押了上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 Z 县精忠中学（今 Z 县中学）的教师、陕西人张国锦。

当宣布他的罪名是一贯道成员时，他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

近万人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

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上南门官茅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两个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坐定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张的直系亲属除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 3 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象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吭一声。快到 3 分钟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 3 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 15 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张国锦慢步徐行，不断高呼：“实事求是万岁！毛主席万岁！”直到枪响倒下。

我父亲一直坐在审判台口的石坎上看完了这场旷古未闻的人间丑剧。几十年来他多次向我讲述那一难忘的场面，后来又将此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据父亲说，散会后，一路不少群众为张国锦流泪。为此，公安局连夜到居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统一思想，讨论张国锦到底该杀不该杀。人都已经杀了，这种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谁又敢说不该杀呢？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到了文革。这时我已 10 多岁了，枪毙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西山公园依然是刑场。每年仍有几次公审会在那里举

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声势浩大。

1970 年夏季的一天，一个叫彭成的农民在西山公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偷越国境。据说他曾先后 3 次偷越国境。那天看热闹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反正文革期间大家都没有正事可干。彭成其人的罪行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死后所受的凌辱却令人扼腕。

只听枪一响，人们潮水一般涌过去，一圈圈将尸体团团围住，像欣赏玩物一样盯住尸体不转眼珠。后面的人纷纷往前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踩到尸体上。这时一个汉子，分开人群，挤进核心，俯下身去将扑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裤子扯掉，露出赤裸裸的下半身。众人不知他要干什么，正惊愕时，那汉子从腰间嗖的一下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人，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男根，右手挥动尖刀向下刺去。众人一下明白了，他原来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

那汉子动作十分利索，尖刀环着那儿挖了一个大洞，把一大团血肉糊糊的东西生生割了下来。他将那东西在手里掂了掂，血直往下滴。他脸上露出带着几分麻木的微笑，提着那东西站了起来。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哗的一下自动闪开了一条道，那汉子便如入无人之境，提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扬长而去。事后听说，那东西是拿去做药治疗弱症（阳痿）的。

1971 年 3 月 9 日，西山公园又开了一次公审会。那天枪毙的是一个叫樵天珍的年仅 24 岁的女犯。据说本来准备 3 月 8 日枪毙，考虑到在妇女节枪毙女犯不大好，就推迟到第二天。樵天珍是因为毒杀丈夫而偿命。不幸的是，行刑的枪一响，一个早有准备的男子就飞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还未到达，就将樵天珍破碎的脑袋里流出的脑浆全装进一个大盅子里。然后他抽出尖刀，刷刷几刀就挑开了死者的上衣布纽扣，露出心口来。他举刀对准心窝，正准备开膛挖心，忽然被一个值勤的军人喝住了，手中高举的刀很不情愿地放了下来，随后悻悻然端着一盅脑浆走了。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欣赏女死刑犯尸体的机会不是很多，听说人们把死尸的裤子都脱光了。

21 世纪初，由于三峡工程，Z 县沿江许多地方要淹没，新城要建许多大桥。其中有一座鸣玉大桥，从老县城跨过鸣玉溪架到西山，西桥头的位置就在原来的杀人刑场旁边。施工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心中没有一点阴影，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发生了许多事故。一些砌好的石壁莫名其妙地垮塌，一些人老是皮肉受伤，事故不断。施工者认真检查，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才听说这里曾经是刑场，有无数怨魂积聚在这里不得超度，工地上屡屡发生事故，可能是那些屈死鬼作祟。

这一说把人吓一跳，不说不知道，越说越害怕，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从此，工人们每天清晨上工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鬼魂们烧香放鞭炮，请求手下留情，冤有头债有主，望不要再给工地制造麻烦。不烧香放鞭炮就绝不动工。如此这般，工地上竟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事故发生了。

补白：川北某县朱某，50 多岁，家庭出身富农，是五一小学的教师。1968 年的一天，他与学生在教室里做游戏，比赛谁的弹弓打得准。他先在教室的黑板上画个圆圈，让同学们以圆圈为靶子。那天他正好手腕痛，弹子打偏了，正中黑板上方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向字的口上，留下一个小坑。这事被另一个老师知道了，此人一向与朱某有过节，便将此事报告校长，称朱某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乡里无人管此事，被搁置起来了。一打三反是，此事又被人提起。朱某被抓了典型，以侮辱伟大领袖罪判了 3 年刑。

———————————————————————————————————

朱自清长子之死　　佚　名

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小名阿九。朱自清早年的散文《儿女》里提到过这个头生子，说他爱读故事书。在其名篇《给亡妇》中，

朱自清又提到这个 14 岁的孩子，说：“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

朱迈先在北平崇德中学读高中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下回到扬州老家，一面在省立扬州中学读书，一面从事救亡活动和地下党的工作。当年 10 月，19 岁的朱迈先被任命为中共扬州特支书记。不久，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他同陈素、江上青等人参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离开扬州，前往内地宣传抗日。

次年，根据中共提出的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针，经长江局批准，这个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桂林、桂平一带整休。1942 年桂林失守后，朱迈先被派到国民党新十九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政治科中校科长兼政工队长。

抗战胜利后，蒋雄部开往海南岛三亚，朱迈先因病在海军医院住院治疗时认识了护士傅丽卿。两个飘泊天涯的年轻人产生了恋情，1946 年 10 月办了婚事，生活十分融洽。

1948 年 8 月，朱自清先生去世，朱迈先远赴北平奔丧。次年由老长官蒋雄师长介绍，朱迈先到蒋雄任专员的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年底，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共产党的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获得成功。随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

1950 年 12 月镇反开始，蒋雄被捕，同时也逮捕了朱迈先。次年 11 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立即执行，时年 33 岁，身后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男一女三个幼子。

朱迈先被捕后，傅丽卿曾向朱自清遗孀陈竹隐夫人求助。每月工资只有 60 元，膝下也有 3 个儿女的继婆母陈竹隐，立即寄 30 元给儿媳救急。

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 30 余年里，她多方申诉、奔走。1984 年，新宁县法院认真复查旧案，承认 1951 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之后，年近

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 36 年来第一次跨进朱家门。

补白：陕西凤翔有一种小吃叫豆花。点豆花最好的辅料是石膏，一般农家没有石膏，只好以醋代之。可是董家河乡乔家堡村有个小伙子却用石膏点豆花，大家都很羡慕他，但不知他的石膏是哪里弄来的，谁问也问不出来。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那个用石膏点豆花的小伙子被抓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原来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偷偷把一个用石膏做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用刀子一点一点削了，拿去点豆花。尽管他只有十几岁，但所犯的罪行实在太严重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震动不小。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在领袖像上打起了主意。对于我们来说，弄点石膏固然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谁能想到领袖像是石膏做的呢！想不到。我们甚至在一起悄悄议论，他是怎么用小刀削的？先削哪一块？削了个半拉的塑像他藏在哪儿呀？同时，我们也在揣测着他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有的小孩认为，这家伙实在是罪大恶极，能够在毛主席身上下刀子，这次非吃枪子不可。后来，这个为了吃可口的豆花而不惜牺牲主席塑像的小伙子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刑期记得不是很准了，大概是七八年。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为他的年龄过小。如果他是成年人，那就非枪毙不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为吃豆花而坐监狱，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例。？

——————————————————————————————

既然是地主　　严家伟

川滇交界的云南省盐津县兴隆乡境内，有一个穷山沟叫龙塘沟，是个穷山恶水、地瘠人贫的所在。在这条十来里路长的狭长地带里，全是斜坡地，田就更少。一亩坡地的玉米产量只有四百来斤，一亩田的黄谷产量不过三百多斤。经济条件稍微好的人都不在那里居住，几

个拥有一点土地的人都搬到邻近的四川省境内居住，把田土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

那时地主收取租子，只收秋天一季，而且只收田租，地里的出产，粮食、蔬菜、山林以及春夏二季的收成，全归农民所有，地主分文不沾。因此，龙塘沟不但没有一个农田的主人居住，而且一年里当地农民只在秋天才能看见田主人来收租，收了就走。这些所谓的地主，究竟家住何处，农民都不清楚。

土改一开始，住在四川的地主肯定不会再回云南的龙塘沟去收租了。但土改是政治任务，抓不出地主来，那不成了“和平土改”？那岂不犯了天大的政治错误？当地土改工作组，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排查摸底、对比分析，终于在当地普遍穷困的农民中发现了一个地主。

此人名叫刘洪发，40 来岁。他家祖上留给他几亩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约 2000 斤。另有一点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约 300 斤。刘洪发一家 5 口，有几间破草房，又矮又烂。虽然刘洪发一家自耕自种，但比起当地那些无田无地者，也就成了“拔尖人物”，于是被划为地主。既是地主，后续的待遇就没什么悬念了，左不过是没收土地、耕牛、农具，还要勒令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里有什么金银！没金银就是不老实，捆、斗、打、吊诸刑伺候，整了 10 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时还捆吊在树上。

被镇反冲走三十年　　白伟志

1949 年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用，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1949 年，杨姓军官独自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换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没过几天，姚承霖被请到公安局。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

接受审问。原来房客把他们母女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姚承霖。姚实际是在公安局工作，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姚承霖莫名其妙地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关押。几天后，公安局领导召开大会，向同事们说：“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解放初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新旧政权交替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上海，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的头 7 个月，共发生强盗案 737 起，盗窃案 11430 起，抢劫案 530 起。1949 年 6 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发生盗案 173 件，平均每天有五六起之多；窃案 2205 件，平均每天 70 多起。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两天后，毛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双十指示”下达 3 个月，上海方面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不满意，于 1951 年 1 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此后他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批评上海“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3 月 15 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毛泽东，电文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 1068 人，处死 100 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 10000 人，关 4000 人，管 3000 人。在此背景下，1951 年 4 月，姚承霖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管理干部对姚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

子送来的，走的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

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一年之后，他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住草棚，每天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魏风光，是从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因镇反扩大化被劳改，没有具体罪行。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过得平静自在。

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封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他。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写了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

1955 年，已经服刑 4 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包兰铁路的建设。1957 年刑满后，他还是政治犯，只是有工资了，每月拿着 25 块人民币。

1980 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 30 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 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

回到上海，他才发现这 30 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

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也没什么感情。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姚承霖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 200 块人民币。

在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

1987 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30 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对我说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

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姚承霖喃喃自语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补白：1977 年的高考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尽管上面政策说“重在个人表现”，实际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仍很严重，直系亲属和重大社会关系的政审结论仍然很关键，直接影响录取结果。我当时在地区招生办担任政审组长,发现基层单位的领导如果对考生有意见,就随便在其档案中写上“表现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右派”或“母亲是地主分子”等等内容，让考生背上沉重的枷锁。有一位考生，初中还未毕业，因出身不好，只好在家务农。恢复高考时，他毅然报

名参加考试，成绩很不错。北大想录取他，但发现其政审材料里写着“母亲是地主分子”，北大很犹豫。我翻了翻档案，发现其父竟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其母是现职小学教师，怎么可能是地主分子呢？我赶忙打电话通知该县招生办，要求补充调查。然而该县的同志不知是接了电话就忘了，还是其他原因，迟迟不予答复。至北大招生的最后一天，我和北大的老师商量，认为补材料已来不及，就由我们招生办出具证明，表明该考生“清白”，最后北大录取了这位考生。毕业后该生去美国留学，后来定居那里，事业一片辉煌。还有不少考生，考试时父母仍未落实政策，到录取时父母的问题才得以平反，我们就很及时地为这些考生补上材料，让大批考生“翻身得解放”。　　黄锦章

———————————————————————————————————

镇反与肃反　　信力建

镇反运动持续时间：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0 月。

镇反打击的对象：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被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可分如下几类：1、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此类人数也很多。3、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於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4、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镇反放手杀人的目的：从 1950 年至 1952 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 20.4 万件，被杀人数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

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还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大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镇反就是借朝鲜战争为掩护，大量杀人，借以立威。

镇反杀了多少人：1950 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600 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 3000 人，50 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玉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 3 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间，至少有 3 百万人被杀害。据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 年至 1952 年有 280 万人被毛处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万人被杀。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 4 省一个月之内死了 117 万 6 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 150 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 3 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 2 百多万土匪”。

据统计，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 240 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 127 万，管制 23 万，杀掉 71 万。以被处决人数 71．2 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达到当时全国 5 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准了。

肃清反革命运动持续时间：1955 年 6 月至 1957 年 10 月。

肃反的范围：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肃反的过程：1955 年肃反与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直接相关。1955 年初开始批胡风，运动发展到 6 月底，已经被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以“大约有 5%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

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5%成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种经典比例）。全国（除西藏外）城乡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冰心后来说：“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著，要他教课。不应该那麼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肃反的成果：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工作报告总结，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 1800 多万职员中开展，查出 10 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 5000 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260 名，混入共青团的 3000 多名。

在国家机关中查出 220 多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刽子手。历史上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同志的凶杀，迫害方志敏、王若飞等同志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来了。查出 360 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的新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查出了 65000 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自动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大约占总数的 20%，即 2 万名左右；稍加触动就坦白交代的大约占 25%，即 25000 名左右。查清了 177 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严重的占 13 万人。全国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有 37 万多人。

据解密档案，肃反运动到 1956 年底结束，一共逮捕了 214470 人，判死刑 21715 人，非正常死亡 53230 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据朱正《忆凤翔》一文：人们根据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 140 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 94%。

地主叶老五　　易文辉?

1964 年初冬，我被抽调到贵州省晴隆县以中央四清工作团的名义参加四清。由于我是从高校抽调来的，所以除了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坚持日常四清工作外，还多了一项任务——撰写地主阶级剥削史。具体说来，就是撰写我所在的箐口公社叶家的剥削史。

地处贵州省西南角的晴隆县，几乎全在绵延的群山包围之中。在那种人迹罕至、鸟兽无踪的荒山野岭里，即使走一天也难得碰到一两个行人。咳嗽一声，四壁回音轰然而至，宛然置身于神奇世界，令人恐怖。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有一个叶姓家族，数百人分布在附近的几个生产队里。据他们自述，祖先于明朝洪武年间从广东迁徙到这里。

他们的语言与当地口语并无二致，只是有一个词很是特殊，就是“哼彭冷”——统统、全部的意思。在我们上海方言里也有“哼彭冷”一词，是上海开埠时广东商人带来的方言土语。

发贡一队有一个地主分子，村上人都叫他叶老五。这叶老五 40 出头，干瘦、憔悴、病容、气急，高高的个子因为驼背显得如秤钩一般弯曲。两眼大而无光，牙齿稀疏，说话漏风，发音含糊不清。穿着一件破旧的卡其布中山装上装，纽扣残缺不全，口袋处脱了线，一角向外翻卷。裤子是蓝色土布缝制，脏得发黑。脚上那双布鞋脱了后跟，冒着脚趾，里面没有袜子。第一次见面，他抖抖索索站立着，右手捂

住左手，两脚不断轮流踏地，好似在做原地踏步动作。

“工作干部，你好!”“工作干部”是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对国家干部特有的称呼。“家里人呢？”我问。“全都出工去了。因为工作干部要来问话，我等在家里,要不然也出工干活了。”

叶老五告诉我，他是附近几个生产队仅剩的 3 个地主分子之一。还有两个老太病倒在床，不能动弹。土改时他还年轻，罪恶不大，得以苟活下来。寨子里的地主分子，枪毙的枪毙、斗死的斗死，有两个 1962 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被贫下中农用绳子吊到树稍上，问看见蒋介石没有，答没有，就不放下来。两个手腕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实在吃不消，只得说看见蒋介石了。于是贫下中农一松手，地主分子就从高空摔到地下。要不了几回，就见了阎王。叶老五的双腕严重残疾就是那个时候被吊断的。

叶老五中学学历，土改时 20 几岁，写得一手好字，就是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每逢过年村民们仍旧来求他写春联。1962 年断了手腕，再也无法提笔。现在劳动时锄地，两只手捏在一起举起锄头勉强还能劳动，别的活都干不了了。

我写的《叶家剥削史》，虽然短小，四清结束居然得了奖。亏得叶老五帮助，为我提供了不少写作素材。

补白：2007 年我到河南省某监狱采访，陪同的警察告诉我，他们那儿还有一个“反革命犯”! 我很震惊，因为反革命罪在 97 刑法中已废除。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就请求狱警让我见见，并保证不在报上发稿子。此人犯罪的原因很简单：1974 年和大队革委会主任吵架时，被主任痛揍一顿，痛极怒极，高叫要操革委会主任的姥姥，后来变成要操毛主席的奶奶，人民法院判他个无期徒刑。80 年代中期，这名犯人服刑 10 年后伺机脱逃，本世纪初又回监狱自首。原来的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脱逃，所以要服完最后的余刑。考虑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据监狱的意见，从轻处罚，只加了半年刑（一般脱逃罪加刑三年）。监狱里的警察对这名犯人很同情，

而且他的翻砂技术很精湛，现在在监狱里基本上当高级技工使用了。

——

从血仇到姻亲　　松　北

1975 年秋，我岳父二哥的三儿子长盛，带着他的新娘子进城来探望我岳父全家。长盛一口一个姐夫地叫我，十分亲热。相比之下，那个叫秀秀的弟妹却显得十分腼腆羞涩，独自坐在炕角低头不语。尽管她打扮不俗，还是遮不住乡下女孩的气质。岳母看她挺拘束，就拿出钱对长盛说："你带秀秀去门口商店逛逛，顺便给秀秀选点东西。"他们一走开，岳父就开口骂："犊子玩意儿，讨不起老婆了，找了个仇家的闺女，你说咱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败类？"我和妻子一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岳母便从头讲起那恩怨的由来。

秀秀的爷爷与我妻子的爷爷，也就是长盛的爷爷，原本是吉林山河屯同一个村的人。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两家都由吉林山河屯迁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妻子的爷爷叫房香阁，是个中医郎中，医术高明，尤擅针灸和骨外伤。几年来，患者送的木匾、玻璃匾、铜匾挂满一屋子。秀秀的爷爷姓祁，跟他当学徒。

1940 年，妻子的爷爷 43 岁，正当盛年，竟双目失明了。那时满洲国鼓励百姓迁往北满，许以减免地税及各项杂捐。为全家 16 口人的生计，爷爷将半生积蓄投到（松花）江北，买了 70 晌土地（15 亩/晌）。那时土地很便宜。岳父弟兄仨，下地耕作，余下的土地租出，爷爷仍为乡亲诊脉治病。岳母念过国高，字又写得好，成为老人的助手，负责开方子、抓药。爷爷还打破世俗，将医术传授给儿媳（我的岳母）。他一生积攒的医书、验方也都由岳母保管和缮写。这时秀秀的爷爷已离开这里。由于跟爷爷学会了中药知识，他自己单独在外做起倒运中药材的生意，也发了一笔财，后因腰病，落下残疾，就听了爷爷的劝告，也置了 40 晌土地，由他的 3 个儿子耕管。可惜这哥仨全抽上大烟，

好好一份家业，时间不长就全祸害光了。老爷子气死后，连下葬的寿材都让债主收去了，还是我妻子的爷爷出钱办理的后事。不久，祁家的老大、老二也先后病死。爷爷看在同乡份上，收留了祁三，并用中药帮他戒掉烟瘾，又租给他几亩地，并帮他盖了间土房，后来也娶上媳妇有了后。这祁三就是秀秀的父亲。

不久爷爷过世，三个儿子分了家。岳父继承了老爷子的医术，分家时就得 8 晌地。那时村子人均耕地是 10 亩多。1947 年冬，村里开进了土改工作队。岳父家被定为富农，两个大伯被定为地主，祁三被定为雇农，还当上了农会主席。他私下对人说："看咱多有眼光，我家那些地光复前不败光，今儿能当这农会主席吗？"

那年冬月，大户的土地已被分光，但家里还有金银手饰、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物等物，于是掀起挖浮财运动。第一次动员会是在村公所开的，30 多岁的徐队长操着一口山东腔讲话："贫雇农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勇敢地向地主恶霸们清算吧！今天有共产党给你们撑腰，一切都由你们说了算，要让这帮地主恶霸们过去吃进去的今天全他娘的都给吐出来。"

岳父家三兄弟虽说分了家，但还在一起住。一天傍晚，祁三带着他的"棒子队"，背着套筒子枪，破门而入，将全家集中到大伯的正房里。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他们在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将大伯、二伯双手反背捆起，又将带来的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全家其他人全都被赶到炕上站立。

祁三发话了："俗话说，船破还有三千钉，你家少说还有八千多。你们虽然交出了一点，但还差老鼻子了，今晚就是来挖的。怎么样二位，是让我们打出来，还是主动交出来？"两个伯父急忙哀求道："祁主席，我们拿脑袋作担保，全交了，要说还有就是这屋子里的家什了。""少废话，吊起来！"话音刚落就把他俩吊起，脚趾触地，像跳芭蕾舞，晃来晃去，然后用马鞭猛抽。二伯母跳下炕，扑向丈夫喊道："打死我吧，用我的命来抵你们说的那些没影的事。"

这下激怒了祁三，命令手下人一顿棍棒，把二伯母打个半死。这

些人虽是邻里乡亲，可变脸比脱裤子还快。全家人都下地跪成一圈求饶。然后他们满院子乱翻，各屋子乱挖，砸墙，敲地，足足折腾到天放亮，也没找出一点浮财。最后，他们将老爷子行医时患者送的牌匾统统抱走，全家人身上的棉衣裤都得脱下给人家。每家只留一套棉衣裤和一床被，其余东西，包括炕上的草席，全部家私都被拉走。

那年冬天，一大家人只好用蓝草现编成草衣穿上过冬，那套棉衣裤谁出门谁穿。挖浮财之后是扫堂子运动。让各屯的农会，互相到对方去扫，也就是再到外村逼打一番。实在扫不出什么，临走也不能空手，什么炕席、锅碗瓢盆、铁锅都揭走。大户都被扫得家徒四壁，最后遭殃的是中农。他们懊悔说，老鼠不吃，都给猫攒了。甚至贫雇农刚分的土改“胜利果实”也被扫个精光。

几天之后接着展开更加血腥的“刮骨斗争”，凡被认为是恶霸的地主都得打死。岳父所在的屯里抓起 20 多人，全关在村公所里。说这样也没完成上级规定的比例，就又抓进一批。这些人都是富农和上中农。两天后，乡政府所在地东山屯举行批斗宣判大会。大会开始了，先将定为恶霸地主的 7 个人五花大绑押上台来。第一个被批斗的是老茅头，伪满时是屯里的甲长（相当于村长），没有民愤。祁三冲台下喊道；“大伙说，对这个大汉奸恶霸地主该怎么办？”只听下面的农会积极分子们大喊：“打死！”马上就被拖到桦树林，由棒子队一顿乱棍打死。

第二、第三个都是由于平日小气抠门，得罪了一些人。三五个人一喊，当场也被打死。轮到大伯时，祁三先跳出来一个耳光扇去：“房老大，没想到你还有今天！”说完对着台下哭诉道：“康德（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年号）九年我在他家扛活，说我偷懒，被他父子俩捆起来灌辣椒水。对这个大恶霸，怎么办？”没想到台下死一般沉寂。稍待片刻，当年给老爷子当过长工的傅老爷子嘀咕着什么。徐队长立刻站起喊道：“你大点声说。”老头子吓得不敢吱声。这时他身旁一个叫大山的人站起来，大声说道：“老傅头说，那是他犯了大烟瘾，人家老东家让儿子帮助将他捆起来给他灌戒烟药。当初不是老爷子救了你，今天还有你咋呼的份？我说祁三呀，人的良心可不能让狗叼去！”徐队长听

后马上问大家："是这样吗？" 台下一片呼应："是这样！""老房家地多不假，但从不欺压人。那老东家在世时可是个善人，给我们穷人看病都不收钱。""放了这哥俩吧。""饶了他们吧。"两个大伯被当场释放，捡条老命。祁三则灰头土脸一时下不来台。

对余下的两个地主的批斗根本拿不出实质性的罪状。对老李家的批斗，都冷场了半天。在徐队长一再鼓动下，秀秀妈站起大声说道："康德八年夏天，是你家的大狸猫咬死了我家的母鸡，你硬是不认帐，还把我赶出你家，大家说怎么办？" 看来她今儿要替代丈夫主持大会了。徐队长一看这也端不上桌呀，就来了个新点子："这账我看这么算吧，那母鸡已死 6 年了，按母鸡下蛋，蛋再孵化小鸡，鸡再下蛋……算满 6 年，折算出价钱让他赔偿。"

岳母的妹夫的哥哥是吞河人，伪满时也当过甲长，提前逃了。他们屯就拿岳母的妹夫出气，说他曾帮哥哥催过粮，将他列入死亡名单。这个人平日乐善好施，信佛念经，实在出不起粮的人家都是他代缴，深得村民尊敬，所以农会对他的执行分歧很大。他们屯子里没人肯下手，上级决定让我屯的祁三带人去执行。

回来后祁三对屯里人夸耀："那姓果的小子对我说：'看在老辈面子的份上求你瞅准了，一棒子解决，可别让我遭罪。'咱这手艺，只听咔嚓一声，那脑瓜子就开瓢了，痛快地送他上了路。现在他在九泉之下都得念我的好呢。"

听完岳母的讲述，我问道："这俩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他们的婚事吗？""都反对。他俩死活不分，婚礼也没办。今年春上他们自己就登记结婚了，搬出去单过。"说实在的，我挺佩服这一对敢于抗衡强大政治世俗的农村年轻人，特别是那个带有乡土气质、羞羞答答的秀秀。后来长盛和秀秀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先后考入齐齐哈尔大学和天津的一个大学。

父亲的冤案　　薛效凝

我的父亲薛靖献属起义投诚人员，1951 年被潼关县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冤死异地他乡。

父亲生于 1911 年，西安财经学校毕业后，在陕西财政厅、蓝田、临潼等地工作，1946 年调到河南兰封(今兰考)工作。1948 年 6、7 月间，父亲在兰封任县政府主任秘书期间，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的接见，伺机接受起义指示。8、9 月间，时任开封代理县长(只有几天)并兼自卫总队长的父亲，率国民政府人员及地方武装在开封北神岗附近起义，对和平解放开封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开封警备司令王其梅、市长吴芝圃和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孔从周的表彰，随后王安排他到军干校学习。学习期满后，他要求回陕西工作，1949 年 8 月身着军干校发的呢子军装回到故乡潼关。

父亲带着河南省军区开具的证明信、介绍信和个人的有关证件，经陕西省军区到渭南军分区，见到了军区司令员王敬斋。王让他先回家听候安排。父亲带着证件和介绍信到潼关县政府找县长刘仲英，刘态度冷漠，不予安排。为了一家 5 口人的生活，父亲到黄河码头当了一名装卸工。1951 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们突然被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惊醒。几个持枪的便衣闯进我家，不容分说将父亲带走。第二天，一个叫杨炎杰(杨牛)的人带几个便衣来抄家，翻箱倒柜一阵，只找到了几件军装、军用毯子和解放军军事干校发的衣物等个人用品，另有开封军区的证件和介绍信等物，一起拿走。当时我们住在第一巷王凤山家。他家院子很大，前房内有一个弹棉花机。我和弟弟给他家摇棉花机，每天能挣两三毛钱。母亲因受此沉重打击，神经失常，到处乱走。我和爷爷、弟弟只好由二姑来照顾。二姑家有 3 口人，姑父是个卖醪糟的小生意人，生活也不宽裕。

起初我们在醪糟摊子上收钱、刷碗，过一段又和二姑到北街船委会门前卖开水和熟鸡蛋。因维持不了生活，我和弟弟就去山西风陵渡背煤和红薯，回来摆在街上或挑到巷子里去卖，有时也给搬运工人拉小推车(木质独轮车)。从黄河滩拉到西关火车站，一次挣伍分钱，一

天能挣两三毛钱。冬季，黄河结冰，弟弟到一家油条铺当杂工，烧火、扫地、拨油条(因年令小，站个小板凳才能够着),我给山西人秦仰哲开的私人诊所当小保姆，看孩子、扫地、烧饭。

父亲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又不让家人探视。小小年纪的我每十日半月到县公安局去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有一次那个站岗的让我站远点，不耐烦地把取出来的衣服扔到了大街上，我只好一件一件把它捡起来。这种歧视和侮辱极大地伤害了我年幼的心灵。

1951 年 10 月 13 日，街上贴出告示：在潼关县金陵寺召开公判大会。小小的县城轰动了。当被押解的 10 个犯人走到第一巷口时，父亲停下来对着第一巷口磕了一个头，随后被匆匆带走。在金陵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执行院长刘仲英、杨树华宣布：薛靖献历任伪职，在开封假投城；在当装卸工期间，唆使“九弟兄”进行反革命活动，故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逮捕到判刑，又到外地劳改，家人从未收到过法院任何有文字的东西或口头的通知。从此，父亲音信全无，死活不知。

1953 年 4 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要求全国各地清理错捕、错押、错判案件，争取半年内处理完毕。9 月 25 日，潼关法院在呈报省法院的信件中写道：将“九弟兄”视为反革命组织是不恰当的，因没有事实和证据，应予以平反。但该案个别被告，除历史上有罪恶外，还有不同的犯罪事实，故经我们研究，判处薛靖献八年，沈均海三年，王玉杰五年。判决书写道：“薛靖献历任伪职，伪装投城，阴谋叛乱；暗示沈均海非法活动对抗工会，唯其阴谋叛乱未成事实，情由可原。故觉原判过重，应改为八年。”(兼院长李克荣、副院长刘克盛)

1954 年 8 月 31 日，潼关法院收到陕西省人民法院来函：“张兼、刘副院长，本院 1953 年 10 月 13 日刑字 416 号，令你院调查薛靖献一案材料，迄今已八月有余，尚未见复，希接文后迅速办理。并将调查材料寄本院，以便核办为荷。”1955 年元月 28 日，陕西省人民法院再次来函“催促希速复查为要”。1955 年 10 月 25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来函：关于薛靖献反革命一案，在前院长会议已给你院院

长作了布置，并在电话上催过有关材料，但至今尚未报来，希接函后速报本院。11 月 20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来函：你院 1955 年 10 月 12 日，判处反革命犯薛靖献暗示沈均海组织“九弟兄”进行反革命活动一案，业已判决，在案执行。在执行期间发现此案以“九弟兄反革命案”认定属错。1953 年 9 月 27 日刑呈字 27 号，以部分平反案呈报卷宗材料一并收悉。本院派员调查了解，以核阅原卷后提出以下意见：1、被告薛靖献解放前在开封假投诚，以电报伪政府，誓为蒋效劳死而不渝。反动行为证据仍不充足。且投诚后又无显著的破坏活动事实。若在此间劳动表现好，可以释放。2、有关被告确系羁押，家庭受到损失，酌情赔偿；3、接文后另作判定，公开宣判，恢复被告政治权利。

1956 年 4 月 9 日，潼关法院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函，调查薛、沈的情况。7 月 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潼关法院来函：关于询问薛、沈情况的信件已收悉。经查，薛靖献在石河子玛纳斯水利工地劳改，陕西潼关人，反革命案，无期徒刑，已于 52 年 6 月因病死于新疆原农建师，现农七师军法，41 岁。

1956 年 10 月，据说潼关法院召开了审判员会议，研究“九弟兄”案。会上，刘院长认为薛靖献在开封假投城，按潜伏特务，只是没有机会活动，可以列入反革命，判他个七八年是可以的。省院让放人，我们意见判八年。10 月 15 日，潼关县法院又一次在金陵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九弟兄”案在判决上是错误的，该案在押人员全部释放。当场释放 9 人，唯有薛靖献不在现场。法院又说，薛靖献解放前一贯任伪职，开封解放时假投城；又暗示“九弟兄”企图夺取工会领导权，还是有一定罪恶的，故按以上两件事判他八年。从 1953 年到 1956 年，一个错案竟用了三年时间！刘院长置上级的函电催促而不顾，一意孤行，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儿戏。父亲被一再错判，我和弟弟受此牵连几十年。

1979 年 2 月 20 日和 9 月 14 日，我两次向潼关法院写申诉，要求彻底平反我父的冤案，特别要求对开封起义之事作出符合历史客观面

目的公正结论；要求公开宣判，恢复政治名誉，并消除几十年来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要求因错判造成我家破人亡的损失及没收他个人的全部财产，按政策予以赔偿。潼关法院为了应付局面，于 1979 年 11 月 20 日作出裁定：撤销原判，不以“反革命论处”而了之，但对开封起义投诚之事仍未做出公正的结论。

为此我又多次找县委、政法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1983 年 12 月 5 日，潼关县法院再次判决：撤销 1956 年和 1979 年的裁定，“宣告无罪”，并轻描淡写说“薛靖献 1951 年投入劳改后死亡”。我再次找县委书记宋某，宋于 1985 年元月 25 日批示：“着重政治平反，一些实际问题也要解决。”满书记批示：“法院应系统汇报一下解决的程度。”潼关法院苗某仍无动于衷，一拖再拖。我又找主管政法的严书记，严书记很重视，派人去开封了解。我也给开封写信询问当年的情况。开封两次来信谈了情况。1986 年 4 月 28 日，潼关统战部通知：“经研究，薛靖献按投城人员对待，其它问题由法院解决。”1988 年 5 月 20 日，潼关县法院拿出 700 元作为赔偿，其中 600 元作为 8 年冤狱赔偿，100 元作为财产赔偿。

事情就这样草草了之，既没有办案单位或人员对薛靖献进行正式政治平反，也没有对因错判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消除，更没有对错案给我们身心造成的创伤进行道义上的抚慰。拿着赔偿家破人亡错案的这 700 元钱，我能说什么呢！最后，我只想对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说：对于我提出的司法错误问责制的建议，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以安抚死者的灵魂、活者的心愿。

老伴儿进牛棚之后　　张惠华

1968 年 5 月，老伴儿进了“牛棚”，这一下可苦了我。我刚做过肺切除手术不久，由于营养较差，身体一直很弱。大儿子欣欣不满七周岁，二儿子巍巍不满四周岁，都在幼儿园全托，每星期接回家一次。

老伴儿在家时，自行车都是他帮我搬到三楼，每周还能替我到幼儿园接送孩子，买煤买粮往楼上扛。现在，这些活儿都得我自己干。往楼上运煤，尤其使我发愁。

老伴儿住牛棚期间还惦念着家里的事儿，知道我的身体不好，去煤厂给家里买了一车过冬用的煤球。望着这一大堆煤球，我心想，看来也得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搬完这座山了。平时学习老三篇，这回可真的要活学活用了。我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往楼上端，刚端了几盆，就心跳得厉害，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不知休息了多少次，整整干一个下午才把这堆煤运完。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算完，老伴儿何时才能回来，想着想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老伴儿每月 50 元工资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其余都叫别人捎给我。除了给妈妈寄去 10 元外，我一分都不敢动，全部存入储蓄所。听小道消息说，被揪出来的人员以后就不发工资了，只发给本人伙食费，我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每月工资只有 41 元，除去两个孩子每月托儿费 24 元外，剩下的 17 元，除去水电房费、购粮、煤外，就所剩无几了。尽管我的身体需要加强营养，可是惟恐老伴儿停发工资造成经济危机，所以平时我一人在家，除了白菜就是萝卜，一天三顿窝头（那时国家供给的粮食指标百分之七十是粗粮），省下的鸡蛋票、肉票、糖票都留在周末，等把孩子接回来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最多买一斤鸡蛋，二三两猪肉，再买上点儿饼干，几块水果糖，星期日这一天就算过去了。星期一把孩子送走，剩下我一个人又开始凑合。

我们单位的牛棚里有一个被迫自杀的，姓何。何某被揪出前，贴了工会常某一张大字报，揭发后者有一天晚上与一个女人在河边行苟且之事。后何某因历史问题被揪出，常某借机报复，在批斗会上经常对何拳打脚踢。又发现何某日记里有一首诗，写他与妻子的私事："香腮颐，酥胸露，摸嫩体，哪有够。解罗裙，半推就，劝君慢动手，且把灯吹就。"造反派将此诗用大字报抄下来，贴到何某的原单位城建局。因这首写自己夫妻私生活的诗，何某挨了多少打骂，受了多少苦楚。实在受不了折磨，何某下狠心，把一根大铁钉钉进了自己的耳朵。何

某就这样死了。又过几天，城建局副局长于某也自杀了，是把一根大铁钉子钉进了自己的心脏。群众对何某和于某的死有怀疑。他们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二人一个在城建局，一个在市政公司，却都用铁钉自杀？

有一个王某，20 多岁，忘了哪个单位的，因骂江青被揪出。带到我们单位游斗那天，五花大绑，大牌子挂在后面，牌子用一根铁丝栓着，铁丝勒在两片嘴唇之间，嘴角被铁丝勒得淌血，目的是怕他喊反动口号。王某被折磨得半死，最后执行枪决。

有一次在工人剧院门前召开公判大会，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缠足老太太，严重耳聋。她家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毛主席语录。有一天老太太家的炉火灭了，没有木柴生火，就把这块语录牌用菜刀劈了生火用。邻居平时与她有点儿矛盾，举报了她。公判会上，老太太被判处死刑。造反派揪着背后插着白标的老太太上了汽车。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一点儿恐慌害怕的样子。造反派推拉着，她不慌不忙，迈着那双缠足的小脚，一步一步走向汽车，拉到市外西郊鸡毛山执行了枪决。像这样屈死的一般老百姓，全国不难道有多少！这些平民百姓的生命简直不如一只蚂蚁！

这期间，我落下一个毛病。一听到大喇叭里传出把某某揪出来的喝喊声，一看到把某某揪到台上的场景，我都感到仿佛心脏马上就跳出心口，喉咙立刻堵上一个大疙瘩，精神极度紧张，心里马上联想到，此时此刻老伴儿是否也在批斗会？是否也正挨造反派的训斥和鞭打？老伴儿被揪出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巍巍所在的幼儿园，小朋友都不愿和巍巍玩了。那天送巍巍到幼儿园，我找他们的阿姨说:“巍巍爸爸是站错了队，可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你们对小朋友们说这事，挑拨孩子的关系，搞得都不跟巍巍玩，你们做老师的，这样做合适吗？他是个吃屎的孩子，不懂事，难道你们也不懂事吗？”我因身体很弱，气得头不由自主地摆动，手也发颤。那几个阿姨互相使眼色，一个个都溜走了，没和我顶一句嘴。

这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掀起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热潮。邯

郸市的毛思馆设在中华大街，由全市各单位抽出的工人干部义务劳动建成。中间是主馆，两边是副馆，前面是一片广场。建馆期间，工人三班倒，工地上灯光亮如白昼，大喇叭不知安了多少，整天整夜播放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时值盛夏，周围居民一天到晚无法休息，也不敢抱怨一句。反对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那罪名大了！

受老伴儿牵连，我由财务科出纳员贬到收发室搞收发。那年我 28 岁，参加工作 12 年来，还没经过大的政治运动。后经观察周围厂矿企业的情况，都是如此：一家只要有一人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其余家庭成员都不得安宁。4 岁的巍巍在幼儿园不也因爸爸站错了队，受小朋友们的孤立吗？想来想去，谁都不怨，就怨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从中央到地方，多少老干部和无辜老百姓受到迫害和诽谤，何况我这个小小的普通干部。反正就这么着了，爱咋的咋的，我豁出去了。如果总想不开，病倒了，我的两个孩子谁来照顾？

从此，每天上班，我先到院子里看大字报。那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我的大字报，说我老伴儿是三青团小分队长，让我管收发工作不可靠；还说麦收时我没参加劳动，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小姐。一开始看到这些大字报，真有点儿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习以为常了。无所谓，任由他们瞎说八道去吧，我都当作耳旁风。

1968 年 9 月 1 日，欣欣已够上学的年龄了，想就近在中轴路小学（现展览路小学）上学。此时学生起来造老师的反，不少老师被揪斗。邯郸三中揪斗老师最厉害，把挂牌子的铁丝挂在嘴上，被勒得顺嘴角流血，红卫兵一边走一边用木棍打。听说其中有一位 20 多岁的女教师，因为两根大辫子过膝长，特别好看，招人喜欢，就把她揪了出来，不但剪去辫子，还给她剃个大光头。

上了学的欣欣在学校也受孤立，经常被欺负，哭着回家。有一次，那些孩子竟把欣欣的棉帽子抢下来扣在狗屎上。我听了这些，心里很窝火，但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叮嘱孩子不要理他们。这一切都不管用，最后发展到每天晚上吃晚饭时，几个孩子站在对面楼阳台上，往我家玻璃窗上打弹弓。一共 12 块玻璃，打碎了 7 块。幸亏是南边的

窗户，如果是北边的窗子，这大冬天的，西北风可着口灌，我们娘儿俩可就受罪了。那些日子，几乎每天的晚饭我们都是生着气吃的。没办法，只好关上门，叫他们随便打吧，只要不伤着人就好。

我天天盼老伴儿早一天解放出来，从五一盼到十一，从十一盼到元旦，又从元旦盼到春节，好不容易盼到有解放回家的消息了，我没告诉孩子，只是暗自积极准备过春节的年货。到了年根底下，我公司的女汽车司机赵某告诉我，春节前还是不放这些住牛棚的人回家。我心里骂这些混蛋狗日的简直不是人，只顾自己高高兴兴过节，不顾我们这样的家庭度日如年。老伴儿春节前是回不来了，我想，做几样好吃的送去总可以吧！大年三十那天，我一放假（共放 4 天假，正月初五开始上班）就开始准备年饭，一直忙到深夜 12 点多。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把准备好的饺子、炸元宵、红烧肉、炸丸子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里，用网兜提着，和欣欣一起去给老伴儿送年饭。因路远，把巍巍锁在家里看家。天下着小雪，娘儿俩坐公共汽车到了郊外干河沟站。下车后，从远处望着老伴儿的单位，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尽力克制内心的悲伤，想来想去，还是让欣欣一人背着东西送去为好。

在路边等了老半天，才看见欣欣从那大门里走出来，身后还背着那个纸盒子。欣欣告诉我："爸爸打开纸盒子，看了里面的东西，说他那儿没有炉火，不能吃这些凉的东西，拿回家留你们吃吧。爸爸还给您写了一张字条。"我接过字条，见上写着："你们给我送来好吃的东西，我感到欣慰，但这里不准家属送吃的东西，还是带回家留你们吃吧。我这一切均好，不要挂念。"我连看三遍，头上像泼了一盆凉水。心想，难道我老伴儿的罪过，比那些入狱的犯人还严重吗？每周犯人的家属还可以给犯人送吃的东西，狱里都让接受，为什么我送的东西不让接受呢？难道不让老伴儿与家里人有任何联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老伴儿怎么样？娘儿俩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一回到家，两个孩子就出去玩了。唉！这两个吃屎的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能分担我一点忧愁啊！自文革至今，我与亲戚几乎中断了

书信往来（除了给我母亲每月寄钱外）。不敢写，怕招来大祸，也怕老伴儿住牛棚连累别人。当时我家的这种情况，所有的亲戚都不知道。两个孩子小，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回来。我只能独自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这次送饭回来的路上，我的泪水总想往外涌，觉着泪水、苦水已装满了我的胸堂，再也容纳不下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出来。好不容易到了家，把门一关，趁孩子们不在，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大年初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我一人。有生以来，从不曾有过如此冷清的春节。外面连一个炮竹的响声都没有，也听不到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祝福声和欢笑声。整个家属院一片死寂，有不少家庭和我一样，无法过一个团圆欢乐的春节！我们这个单元，9 户人家有 6 户有人住牛棚。以这个比例计算，全国该有多少个这样不幸的家庭啊！1969 年春节，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没有团圆，没有欢乐，只有泪水和悲伤陪伴着我，终生难忘。

正月十几，老伴儿终于被解放回家了。他先在外面洗了澡，理了发，还买了半斤牛奶糖，算是给老伴儿和孩子们的见面礼吧！这半斤牛奶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甜蜜、欢乐和团圆，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一种安慰和弥补。

父亲的八次创业　　大　河

我的母亲和大姨、小姨三姐妹全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我的父亲魏家文。三姐妹出生书香门第，日本占领南京时期，外公是无锡《新锡日报》的总编，因写文章讽刺日伪政府被关进无锡监狱。母亲和大姨去探监，认识了典狱长的朋友魏家文。经魏帮忙，外公得保外就医，最后母亲和大姨竟同时嫁给了魏家文。几年后外公去世，父亲魏家文带着妻小和我的外婆、小姨、小舅，长途跋涉几个月，举家搬回父亲的家乡重庆。时值 1949 年初春。

为养家糊口，父母亲在重庆民生路开办了艺文打字研修学校，为西南地区培训打字员和维修打字机。母亲负责培训工作，父亲负责维修技术，大姨管理财务，生意井井有条，生活富裕祥和。好景不长，三反五反开始，街道盯上了多个老婆、穿着讲究、风度翩翩的父亲，无缘无故把他定为贪污分子，送监狱劳改 2 年。

1954 年从监狱出来后，父母亲和姨妈继续经营艺文打字研究社。1956 年公私合营，父母亲积极响应号召，将自己居住的房子贡献出来，全家另行租房居住，并把设备、流动资金都捐献出来，走合作化道路，带头与其他 5 家私营打字业同行合并，成立了重庆打字机生产合作社。父母亲均在合作社担任技术工作，父亲还兼生产厂长。那时父亲每天干劲十足，打字机厂生产红红火火。

当时打字是用字钉撞击蜡纸，再通过蜡纸印刷。蜡纸越新，打出的字越清晰，印的张数越多。当时全中国只有上海、杭州生产打字蜡纸，父亲决定研制重庆自己的品牌打字蜡纸。父母亲和大姨妈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钢头牌打字蜡纸，并逐步占领重庆及西南市场。不到一年，他们的合作社就进入国营行列，成为国营重庆打字机厂。进入国营，上级派人来做行政领导。新来的领导看不惯父亲多个老婆的婚姻状况，父亲则对这位不懂业务、不懂管理的上级也看不顺眼，相互之间产生了矛盾。1957 年整风反右，父母亲积极参加运动，写大字报，画漫画，与大家一样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叫嚣“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最后父亲和大姨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松山化工厂劳动教养。国营打字机厂也因管理不善，没人能生产打字蜡纸，导致效益退化，回到合作社。当晚抄家时，年老的外婆又气又急，脑溢血中风发作，瘫痪 4 年后于 1962 年含恨去世。

那年母亲也与父亲离了婚，结束了 12 年的畸形婚姻。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母亲毅然离家去煤矿工作，开始了又一段悲剧人生。

1962 年，劳教回家的父亲重操旧业，成立七星岗人民公社打字机厂。父亲带领几个学徒，为重庆市各机关单位修理打字机。由于父亲技术精湛，服务周到，深受各单位欢迎。不久，公社书记换人，新书

记无视打字机车间的良好效益和影响，认为一个劳改劳教分子，有多妻的经历，怎能当负责人，遂要父亲的几个学徒与师傅划清界限，并调离父亲去烘炉车间打铁。父亲与他据理力争，拒绝其调度，表示此处不用人，自有用人处，准备离开他自己一手创办的单位。该书记却声称：“你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走着瞧。”

1963 年，父亲被迫举家搬迁到成都，与他在成都的学生一起成立集体所有制企业，依然干他的老本行。此系父亲第四次创业。那年我刚入小学，我们的家在成都市南大街一个幽静的四合院内，里面有一口井，隔壁图书馆院子里的参天大树透过来的缕缕阳光洒落到我们院落里，简直是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放学了，我们手牵手上学到父亲工作的地方，等到傍晚和父亲一起回家。父亲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边的横梁上，弟弟坐在后边行李架上，姐姐哥哥走在父亲旁边。每当经过艺宾苑餐厅，父亲就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支卤鸭脖子作零食。回家之后，我们在有天井的院子里遥望星空，听父亲讲《封神榜》的故事。有时我们感冒生病，父亲亲自为我们打针拿药。父亲还为我们缝补新衣，为我们理发，那真是我们童年时期少有的幸福时光。可是这短暂的幸福时光只维持不到两年，重庆那个公社书记就多次派人来，要求工商局取缔父亲的店。

1965 年初的一天深夜，一群人突然来我家将父亲铐走，称父亲系非法合伙营业，并抄家抄走了父亲的劳力士手表、毛毯、风扇、大衣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关闭了父亲的店，甚至抄走了父亲的维修工具，兑现了那公社书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手掌”的誓言。同时宣判父亲为“管制分子”，时效 3 年。成都无法工作，父亲无奈于 1966 年初又举家搬回重庆这个伤心地。在那位书记的授意下，街道办事处根本不予安排工作，欲置我全家于死地。

文革开始，我们家进入最艰难困苦的时代。由于父亲被剥夺工作权利，生活来源断绝，一大家人吃饭无着。几个哥哥姐姐只得拿着扁担去做临工，到河边担河沙、水泥、石灰，参加修路，挣得最基本的活命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科大学的大姨妈也参加洗衣组，洗卧铺

列车上的被子。我的母亲曾经就读于上海商科学校，精通英文和日文，离家之后也只能在煤矿做体力活。她每月将一半工资（40 元）寄回家维持我们的生计。在贵州地质队的舅舅，也每月寄生活费支持我们。我们食不果腹，一日两餐稀饭咸菜。红卫兵三番五次来抄家，拿走所有值钱的东西，批斗、游街成为家常便饭。

地段罗大户以整人为乐，有一天晚上将父亲关在地段学习室，用轮胎条子狠命抽打。父亲后背道道血条，半夜里痛得解不出小便。罗大户指挥红卫兵每两天批斗父亲一次，游街示众。父亲行走困难，服用一颗止痛片后，在我一个姐姐和哥哥搀扶下，在红卫兵群拥下，头戴高帽子，游过大街小巷，游到我那唯一有正式工作的一个姐姐的单位示众。罗不时还要挟小姨去交待问题，要小姨检举揭发父亲，打得小姨遍体鳞伤。第二天又拿药来我家给小姨擦,声称当时是打在小姨身上，疼在他心里等等。小姨伤好后，罗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度。即便此时，父亲仍然不屈服，认为凭手艺挣钱吃饭天经地义，自己根本没犯法。

已是 70 年代，父亲又经好心人介绍，由涂山人民公社出发票，到各单位上门修理打字机，不到半年又被那罗大户向公社施压而中止。1976 年初，渝中区交通机械厂聘请父亲，拿出门面房让父亲开业干老本行。才几个月，地段罗大户又气势汹汹带人将父亲铐走，宣判父亲抗拒改造，劳改五年，送长寿菩提山农场。

无奈之下，大姨妈也和父亲离婚，带着她的 5 个孩子离开了家。我和哥哥、姐姐为了生存也各奔东西，只剩下小姨留守家等候父亲归来。有一天我和两个姐姐去看守所看父亲，父亲蹲在那里显得特别瘦弱，我的后背一阵发凉。已是 6 次创业，皆被人毁掉，几次被劳改的父亲，这次恐怕在劫难逃，可是父亲仍然不放弃希望，坚信“天下没有不变的物质，总有一天，问题会解决”。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我们兄弟姐妹私底下也当笑话来自嘲。

1982 年，父亲平反获释回家，并得到 360 元的国家赔偿。一家国营单位主动聘请父亲为顾问，恢复老字号办厂，组装打字机。效益非

常好，解决了几十个职工子女就业。当时父亲已近 70 岁，那是父亲的第七次创业。

1987 年，74 岁高龄的父亲和我们儿女一起开始了他的第八次创业。这次父亲遇到一个好领导。我们企业所在区的区长当过知青，非常开明。他佩服父亲 70 多岁的创业精神，全力予以支持。父亲这个曾经的右派、黑五类、坏分子、特务嫌疑，先后以民建会员的身份当选为政协委员、工商联理事。我们的企业口碑良好，多次获得“十佳企业”、“纳税先进”、“优秀私营企业”、“守合同重信用”等等殊荣。1994 年，80 岁的父亲退休，将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跟随他一起创业的三个姐妹，安享晚年。

1997 年，我们三姐妹将企业改名，加进父亲的名字“魏家文”，以纪念父亲的创业精神。 2004 年 4 月的一天，父亲已经卧病在床，他欣慰地告诉我们，幸亏邓小平让他赶上了幸运末班车，他今生已经没有遗憾，并嘱咐我们在他去世之后将骨灰撒进长江。一个月之后，90 高龄的父亲安祥地离开了我们。那年 5 月，我们按父亲的遗愿，将老人家的骨灰撒进长江，流经忠县故里，汇入大海。

一个右派的余悸　　梅桑榆

1958 年，杨先生所在的单位为完成指标将他划为右派。一无材料，二无批文，他便被送往劳改农场。大炼钢铁期间，劳改犯被派去支援炼钢，杨被高温烤昏，从高炉上摔下，经医生抢救，幸而未死。三年大饥荒期间，许多犯人病饿而死，杨因过度饥饿劳累而倒下，人还未死，便被管理人员抛入干沟。场医刘某与他有旧，冒着很大风险，悄悄叫人将他抬到一个麦场上，夜间送些稀粥、菜汤喝，并写信通知其妻前来。在刘场医和妻子的照顾下，杨先生渐能站立走路，重回劳改农场宿舍。

劳改场因饿死大量减员，总场决定将分场合并。杨先生随队转移，

由于身体虚弱，走出几里地便晕倒在路旁，管理人员再次把他当死人抛弃，醒来时发现队伍已不知去向。这本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但他却牢记管理人员的训教："无论你们逃到哪里，都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逃跑，只能使自己罪加一等。"于是他又拄着树棍，硬撑病体，赶往总场报到。他每天只走几里地，白天乞讨，晚上宿在农家的草堆里。

上世纪 90 年代末，杨先生已成为杨老。杨老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我答应将整理发表）不久的一天，我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说她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杨先生写给我的，信写得很简短，说有要事商谈。我立刻给杨老打电话，问有什么要事。他说，他是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打听到南京我母亲的地址的。他让他的老伴告诉我："你要把老杨的经历写出来，我们觉得有些不妥。以后万一政策有什么变化，或者再来什么运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利，我怕老杨说的那些事又要成为罪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写出来没什么意思。我们只想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不想再惹祸，我们这个年龄实在经不起什么打击了。我请求你不要将老杨那些往事写出来。老杨的录音磁带，请你保存好，千万不要交给别人。什么时候回来，请你把磁带带回，还给我们。拜托拜托！"

她的话令我十分惊讶，想不到在许多人对那个时代已经淡忘，甚至对那个时代大怀其旧的今天，我竟然还会听到这样的语言。想不到时隔 40 年，那个时代的阴影仍未从两位老人的心头抹去，当年那非人的折磨与迫害，至今仍使他们心有余悸！

——

补白：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所在的那个企业不在我家这个区。我们早就听说"刘贼的大狗崽子"被挖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区的人一直无缘参加斗争。忽然有一天，"刘贼的大狗崽"要轮到我们这个区游斗，大家老早就跑到大街上等候。刘允斌站在大卡车的车斗前面，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左右两个带红袖标的人用手捉着他的两个肩膀。所到之处，人群中一片唧唧咕咕议论声："像，像，的确是像。"他脸

色惨白，像一张纸，没有一点血色，目光呆呆地看着前方的马路和人群，一动不动。至今他在我的印象中仍然像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不知道他的眼神和面孔若动一动是什么样子。不久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允斌在二道沙河卧轨自杀了。两三天后，我正在楼院里和一群同龄小朋友们玩耍，突然看到两架直升机飞过天空，并在天空盘旋了两三圈。孩子们都没见过直升飞机，十分兴奋，跳着喊着追看了半天。第二天，广播说周恩来总理飞抵我市，出席我市轨枕制造厂的落成典礼。事后大人们说，周实际上是专为处理刘允斌的后事而来。二道沙河是一个郊外小村，一条从主干铁路分出的支线，从村边农田穿过，直指北部的中蒙边境。有一次我乘车路过那里，突然想起刘允斌卧轨的事，朝着这那条支线铁路凝望了很久，心想：他怎么会在深夜时分走到离市区这么远的一个荒凉小村来卧轨呢？他在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来的路上想了什么呢？生命是多么可贵，难道还有比死亡更不能忍受的事情吗？

父亲的骨气　　燕　云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街头偶遇许XX（建国初期任城关镇的武装队长），他对我说：“你父亲这个人不简单，我服了！”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有过一次接触。那是清队时，我们单位有个干部，交代自己的经历不清楚，几次追问，也没谈具体，最后说方润先生知道我这一情况。负责专案的同志就决定去找他提到的那个方润先生取证。

“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行两人，到你家中向你父亲调查。他娓娓道来，把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凭他提供的信息，根本达不到想把那个干部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志火了，对你父亲一再威逼、训斥，叫他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父亲始终从容不迫，

毫不改口。最后那位同志把自己的记录交给你父亲，说这是你说的，我记的，你签个字！其实他并未按你父亲说的记，而是按自己想把那人定为反革命的需要来记的。

“你父亲接过细看之后，拒绝签字，说本人亲笔写的证明更具证明的可靠性，你们不是要求凡本人能写的就本人亲笔书写吗？我本人亲自写份证明材料，你们明天来拿！我的这位同行者平素调查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无往不胜，这次都被你父亲给镇住了，只好第二天来取你父亲写的材料。

“我多次搞外调，一般来讲，接受调查的人对外调人员都是毕恭毕敬的，外调人员把自己的记录交其签字时，大多是说你们记的还会有错吗？看都不看就签字了。你父亲非但不在记录上签字，还坚持要自己写，这确实少见。如果那天他在记录上签了字，很可能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冤假错案，以后又要重新调查平反落实政策。我们当时不知道方润先生是你父亲，是以后才慢慢知道的。”?

九岁的反革命翠儿　　刘　路

我 8 岁上小学那年，记得语文课文都是一些“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老师教得很认真，反复警告我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说这话时，老师的脸色铁青，我吓得大哭，尿了裤子。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我送回家。

回家以后，我坚决拒绝再去上学。父母无奈，就决定让我第二年再读。第二年刚上学，我们学校就出了一件政治大案：比我高一个年级，一个叫翠儿的 9 岁女孩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

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

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同学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

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 54 名同学齐刷刷地站起了 53 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

翠儿最终因是歌词的原篡者当上了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都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像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众批判。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 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翠儿因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

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了。

——————————————————————————————

补白：舅舅张振文，桐乡屠甸人，外公是开米行的，家里还算殷实。抗战时，一家人乘一艘脚划船，逃难到海宁。当时还是热血青年

的舅舅，一路唱着《松花江上》，流浪到硖石。初到海宁，人地生疏，一时无以为生，舅舅只好托人到当地的抗日队伍（解放后被定性为土匪部队）里做伙夫，后又经人介绍到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当文书。解放后，舅舅开始了新生活，在硖石一所小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并光荣地当选为镇人民代表。这一段时间里，舅舅尽心尽力做着他的教师事业，并娶妻生女，生活安定。文革一来，舅舅因历史问题被学校开除。经母亲牵线，舅舅到建设公社鸟船村大队当了一名小队会计。1970 年，中央发动“一打三反”，因这段历史，舅舅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公社、大队轮番批斗。那时我十五六岁，因父亲去世，全家随教书的母亲住在鸟船村大队的小学校舍里。每当看到舅舅佝偻着背走进大队部去挨斗的身影，看到母亲一脸的无奈，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桐乡人

往期订正　　徐化扬

（一）第一期，焦国标撰《发刊词》

原文：1984 年，四类分子全部平反。

读者按：“平反”一词不妥。

（二）第一期第 69 页，王佳佳《会六国语又如何》

原文：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

读者按：什么会开了“一年多”？似应是“一天多”。

国标回应：“这样的会”，不是“这个会”，也许有一年多的可能。

（三）第三期第 10 页，沈云彪《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原文：1953 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

读者按：胡风案发生于 1955 年。

（四）第三期第 25 页，刘斌夫《父亲的一次粗疏》

原文：1953 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 150 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 60 万斤大米。

读者按：应是旧币 150 万元，即 1954 年新币 150 元，约合 1500 斤大米。

（五）第三期第 98 页，王誉虎《父亲王药雨》

原文：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

读者按：书名可能错了，应是《医学中中参西录》，意思是“以中医为中心，以西医为参考”。读者在一位已故老中医那里见过这本书。

（六）第四期第 48 页，大隐《忆苦思甜全过程》

原文：“忆苦思甜大会”会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个话筒。会台旁边设有席位，村革委会成员就坐在那里。

读者按：当时无“村革命委员会”一说，应或是大队革命委员会。

（七）第四期第 49 页，大隐《忆苦思甜全过程》

原文：忆苦思甜饭，一般是用糠皮、麸皮和萝卜叶子掺一起做成的菜团。

读者按：似乎全国都叫“萝卜缨子”，无论规范还是方言。

国标回应：也许植物学上可以叫萝卜叶子。

（八）第四期第 98 页，冉云飞《补白》

原文：斗争大会将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荫冠的鼻子，用铁环穿起来，令其儿子、党员牛友兰牵着游街，把牛荫冠被活活斗死。四九年后，牛友兰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读者按：牛友兰是父，牛荫冠是子。牛荫冠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康德语　　焦国标书



黑五类忆舊

茅于轼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现行反革命专号

卷首文——

奉毛的名胡来　　焦国标

编辑《黑五类忆旧》，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是在午夜之后完成的。根据阴阳学说，此乃一日之内阴气最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段编稿子，有时我恍然觉得身后围满了一个个屈死的鬼魂，他们争相伸着脖子，甚至超过我的肩膀，想看看电脑屏幕上我编裁出来的关于他们的血泪故事。奇怪的是，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里升起的竟不是恐惧，而是有这些鬼魂围在背后，反倒觉得可靠、踏实、安全。

本期"忆旧"，是现行反革命专号，故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文革期间，其中一些故事与"毛泽东侵权"有关。这些"侵权"行为千奇百怪，比如有人在童话作品里写了一个唇边长个小黑点的毛毛虫，于是被指控影射下巴长有黑疣的毛；有人在集体厨房里边切菜边高唱毛"万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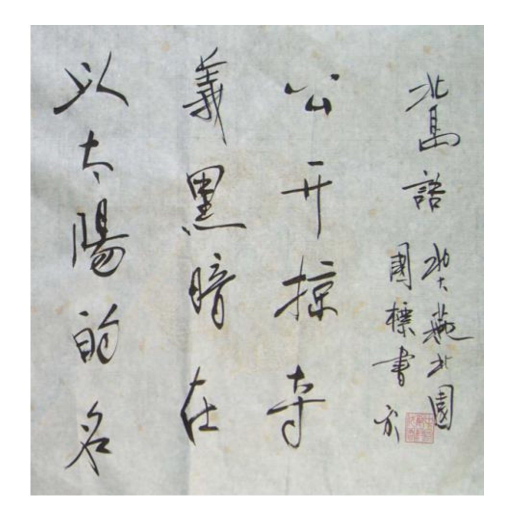
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于是被指控“一个万寿无疆切一刀”，分明是对伟大领袖发泄刻骨仇恨；有人生来口齿不清，跟着大家喊“万寿无疆”，被指控喊的不是“万寿无疆”，而是“万臭无香”；有人应命在五个山头上写“毛主席万岁”，被指控“岁”字上面的三小竖歪在一旁，写的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毛主席万歹”。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因为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犯罪指控被剥夺了生命，或自行了断性命，成为冤魂。

今天回首看来，或在今天的年青人看来，彼时的中国人何以如此野蛮愚昧，何以那些人只要奉毛泽东的名就可以胡来。实际上，不止是彼时，也不止是奉毛的名，历史上不乏奉任何东西的名胡来的任何先例，君不见民间奉黄大仙（黄鼠狼精）的名或奉小白龙（蛇精）的名也可以胡来吗？人本质上只是一个电脑硬件，究竟能“显示”什么，端看脑子里装了什么软件。现在有人还想往中国人脑子里装毛字号的红色软件，好，鄙人乐观其成。只是我想提醒一句：当初凡奉毛名胡来的人，后来皆被人胡来。

差不多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说：“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和尚庙里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我说，现在想给我们国民一种防腐剂，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病根没去，中国人仍然是信仰真空。不过，我要纠正梁任公先生的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不是确立信仰，而是确立什么信仰。黄大仙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气，是妖气；毛主席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气，是邪气。

目　　录



北岛语　　国标书

补白：一位退休教师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的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该女医生判处死刑。

驶进校园的囚车　　童　话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子，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校门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即将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着镣铐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在严寒中席地而坐。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得知被批斗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举行，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这位中年女教师，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记得，妈妈与王阿姨常来常往，“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家里还有一件王

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会场秩序森严，杀气熏天。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一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迷人的霜花　　孔庆西

那天晚饭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四连召开

班长以上干部会。由于天气寒冷，连部窗户玻璃上结满霜花。靠窗坐的一个排长，大约对会议内容没什么兴趣，下意识地用手指甲在那玻璃霜花上乱写，不知觉间写了“毛主席”三字，又在下面写了“大坏蛋”三字，连起来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坏蛋”。坐在旁边的人发现了，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写反标！”

会场顿时炸了锅，如临大敌。那排长立即被控制起来，军务股连夜来人把他拷走。审查几天，那排长被押解回来开现场批判会，身份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该排长原本是个很有前途的知青，下乡前就入了团，很能干，文笔口才也很好，听说不久就要入党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没用，没人同情他，也没人敢同情他，昨天还是令人尊重的排长，现在却没人敢和他说话。

有一天趁人不备，那排长自己跑到离连队很远的阿伦河边，在一个废弃的渔房子里上吊自杀了。大家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可怜他，还给他加上自绝于人民和畏罪自杀的恶名。团里通知他的家人，他父亲来处理后事，草草埋了儿子的尸体就走了，也没敢说什么。听说他父亲是一个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

补白：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一九七〇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因为这句话，余渭国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刘处长的发现　　佟舒颂

刘处长文革前是市直机关负责政工的干部，老实、厚道甚至有些木纳。处在那样的年代，又负责这样的工作，虽然是个老实人，如果

不按阶级斗争的节拍去整人，自己也要被人整。在长期的运动磨练下，刘处长原本敦厚的个性开始变得有棱角，政治嗅觉也一天天变得灵敏。终于有一天，刘处长下乡做“五七战士”时，挖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反革命。

刘处长下乡的那个村子，非常贫穷，多年一直靠政府的返销粮解决吃饭问题。那村有点像世外桃源，外面轰轰烈烈地闹文革，它那里却看不到标语口号，更不见批斗会。公社、大队称它是“小台湾”，那时台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该村不到30户人家，有两大姓，林姓和高姓。刘处长一到该村就嗅出了问题：30户人家竟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户，而且是外来的独姓（高）。高姓早先靠织土布袜子挣点儿小钱，勉强划为中农。至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村里更是一个没有。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阶级斗争，刘处长暗中告诫自己：当心，这里很可能有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一天，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刘处长与一位林姓青年村民闲聊，问道：“你们姓林的，你这一辈应该是玉字辈，你们家兄弟几个怎么都是兴辈？”这位青年村民支支吾吾说是他父亲定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抛开既定的辈分字不用，另用其他字，在一个依靠辈分标识身份地位的家族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刘处长想，其中必有重大问题。从这一天起，刘处长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并向其他村民询问，但村民的回答是超级一致，都是“不知道”。这越发激起刘处长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好奇心。最后，刘处长做出一个决定：直接到高家查访。

刘处长是在一天晚饭后去的，这个时间全家人都在，这样就可以多了解一些信息。他了解到，高家老两口有六个儿子，老大、老二在队里干活，其他三个在读书，小六还很小，别的也没了解到什么。刘处长回家与老伴说起此事，老伴说他神经过敏：“你是干政工干出了毛病，看谁都可疑，都有问题。”

一天，又到村民领返销粮的日子，刘处长帮着念花名册。待念到这一家时，刘处长仔细看这家人所有人的名字，觉得有点儿蹊跷。过

后，刘处长又把这家人的名字按花名册上的顺序自上而下写了一遍，猛然发现，这家六个儿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中、华、民、国、东、州。谜团一下子打开，原来六兄弟的父亲是要“兴”中华民国东州。当地人早年称日本为东州。显而易见，这六个儿子的父亲一定有历史问题。刘处长连夜赶到公社，向领导报告他的重大发现。

第二天，调查开始。原来，此人在日伪统治期间当过某县监狱的监狱长，日本战败后又成为某县的警察局副局长，但是不知为何，解放后此人仅被关几个月就被遣送回乡。现在这一发现充分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于是立即将其打成历史反革命，挂上牌子，用拖拉机拉着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他的已上初中的老四、老五两个儿子也被从学校赶回了家。

——————————————————————————————————————

补白：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毛应星议论说，现在有一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于是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倒在城外的一块麦田里。

切菜切出反革命　　淞　民

今天和一群离休的老伯伯一起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他们大多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七八十岁的年纪，有的胸前还挂着奖章。参观后是座谈会，座谈之后闲聊，一个老伯伯不经意间说道：“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打仗，挨饿，差点当烈士，走资派，现行反革命……”

旁边一位老者随口问道：“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么

戴上的？”那老伯悠然一笑，道出原委。

在奉贤五七干校期间，老伯伯与其他两人被派到厨房里帮厨。一天，老伯伯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听到歌声，老伯伯不禁随口跟着唱起来，组成歌曲与切菜的洪亮交响。

一曲未了，突然冲进四个造反派，直斥道："XXX，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对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说，将他揪出去批斗殴打。怎么回事呢？造反派说，他唱最后几个连续的“万寿无疆”时，每个“万寿无疆”后面都跟着一菜刀，这是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

造反派通知警备区，说是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让他们带走。警备区带走了老伯伯，通知老伯伯的妻子时，只说 XXX 是现行反革命，现已拘捕。至于原因，一字未提。

警备区立即派人来调查，证人们都说这老兄生来喜欢唱歌，想来不过是随口乱唱，早年也是出生入死，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关了三个月，证据不足，被放出来。

退休的同事　　阿　啃

刚毕业教书时，经常在学校里听人讲一个故事。五七年反右，上面规定每个单位必须划几个右派，有明确的指标，跟现在生孩子指标一样。不过，领导最初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只给你这么一个右派称号，不影响其他，比如工资待遇什么的。学校里通过做广大教工的工作，总算划出了几个右派，但还缺一个不达标。怎么办？校长召开全校教工大会，鼓励大家发扬民主，提名推选。大家都不说话，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某年轻教师内急，憋不住，去尿个尿，回来发现自

己已被选为右派。

我一直以为故事里的这个年轻教师是我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此人在我开始工作时就已退休，现在 70 多岁了，慈眉善目，酷似弥勒佛，笑起来找不到眼睛，和善得很。如今年老无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学校跑，聚在教师中间讲故事，主要是臧否人物穷开心。有一次他嘲笑英语教师水平低，说 80 年代有美国友人访问我校，其中一男友人想小便，问厕所，可他用的不是 WC，也不是 Toilet，而是一个美国土词，全校英语教师没有一个听懂的，茫然无措。实在沟通不了，美国朋友只得动用人类共通的手势语，捏着裤裆嗷嗷直叫，大伙这才恍然大悟。

现在此老没事儿喜欢在街上闲逛，找错别字，尤其喜欢找《绍兴晚报》的错儿，找到就去跟报社理论。人家都不理他，当他吃饱了撑的。他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打电话。有一次，他来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晚报接电话那人一听是他，没好气，出语不逊，双方在电话上吵起来，老人家满脸涨红，对着话筒咆哮。

我是语文老师，有时候他也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来二去，彼此熟悉起来，我这才知道，当初他并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即便后来出狱，他也不能教语数外等主课，叫他教地理，也不给评职称，最后是中学中级职称退休的。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说起来，这个发现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很多人都发现了，只是人家都是聪明人，憋在肚子里不说。这位先生天真得可以，把这个当作天大的发现四处宣扬：“喂，朋友，我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呢！”

革委会把他抓了起来，劳教，受了不少苦，还连累他的孩子。老爹是反革命，儿子当然是狗崽子，无产阶级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不是比喻，是写实。文印室刻钢板的一个教工，出身好，有一次真的用皮鞋踩他的小儿子，踩到往外吐食物。

当时去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健在，二人相安无事，他也不记仇，只是对踩他小儿子的那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老人至今耿耿于怀。改革开放初，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可是这位老人说，他的现行反革命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有一天，他把当初判决书的复印件拿给我看，上面某某革委会的公章赫然在目。我问他正本在哪里，他说那是不能给人看的，他要藏起来。

这老反革命多才多艺，会书法、篆刻，还作古体诗。他把整理成册的狱中诗集拿给我看，新近写的诗自署“退思居士”。很多人都把这位老人当个笑料，但我知道他不是。我记下他，不是因为他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乃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受苦的人，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部门来承担这个责任。

————————————————————————————

补白：一个同学打靶挖回不少子弹头，把里面的铅烧化，用自制的模具浇注毛像章。铸的像章不少，但个个呲牙咧嘴，便想赶紧处理掉，不然会惹麻烦。他找来锤子，一个个砸平，以为别人看不见就没事了。不料还没砸完，被邻居发现，举报了，他成了反革命。

————————————————————————————

父母琐忆　　冷　明

1968 年 8 月我到锡盟草原插队，次年 10 月第一次匆忙赶回家，因为我的反革命父亲与我母亲、16 岁的弟弟和 14 岁的妹妹，即将一同被遣回四川老家。草原没有车，我步行十天到达北京，可是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离京。我只得冒着严寒返回草原，路上险些冻死。

父母落户在荒山野岭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吃没烧，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弟弟上山打柴，掉下万丈悬崖，幸被一棵树挡在半山腰，折断一条胳膊。妹妹多病，数次病危，乡民用滑竿抬几十里山路到乡村卫生院抢救。生活如此无望，母亲数次自杀未果。

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送情报，策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母亲跟着没少担惊受怕。建国不久，父亲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反间谍公安战士，破获不少大案，美蒋特务一个个落网。母亲本以为父亲会飞黄腾达，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有人诬父亲贪污、通敌，经调查，纯属子虚乌有。领导以父亲有历史问题为由，迫其退出公安队伍，自谋生路。

父亲开了一家铁工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久公私合营，父亲被分到一个濒临倒闭的残疾人福利厂当工人。他自告奋勇搞革新，搞销售，福利厂起死回生。厂子有了油水，上级开始安插亲信，派个女厂长瞎指挥，厂子迅速陷入亏损。父亲看不过，跟厂长吵了几架。此人的丈夫是宣武区公安分局局长，于是轻而易举地把父亲打成双料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

父亲在团河、清河、天堂河、新都暖气机械厂等几个臭名昭著的劳改场辗转劳改。大饥荒的三年，母亲一人靠加工零活、干临时工维持生计。五个孩子要交学费，要穿棉衣，实在没辙了，母亲就去偷着卖血，养活一家八口。

周有光逸事　　春　红

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周有光对倪海曙讲了什么。周想，平时与倪讲的话多了，没什么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周对老伴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张允和说，你好好想想，平时有没有跟人讲过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话”提醒了周，有一年和倪海曙对对子，倪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脱口对曰“秦皇汉武毛泽东”。谈笑之后，早忘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是错，合不合适。

这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关带着满腹狐疑，早早到牛棚把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

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现行反革命分子”头衔。

1969 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周的一项工作是捡骆驼粪和野驴粪。荒郊野岭，一丛一丛的节节草，大的有筷子粗，一两丈长，瘦小的和牙签一般细。当地人拿这粗的、长的造屋顶，编帘子、席子，细小短的当柴烧。周有光捡几根细的节节草带回来，把包在外边的一层衣皮剥掉，露出象牙一样洁白而润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断，再斜着剪，一平一斜两剪刀，就做成一个精美的牙签。节节草做成的牙签，不像竹子的偶尔有刺，会刺嘴，也不像木头的，到嘴里容易变软。那段日子，业余做牙签成为周有光的一大乐事，自己做，自己用，也送朋友。他至今认为，当地可以建一个节节草牙签厂。

平罗的蚊子不是天黑出来，而是白天出来。上午十点一过，蚊子就多起来，空中伸手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满手掌都是蚊尸。过了晌午，天稍晚一点，蚊子还没退去，小咬的就随着风像雾一样地上来了，真是“小咬如雾蚊如烟”。

快到秋收时，周有光和林汉达被派到十几里外的土岗子看高粱。看高粱有规矩：不许坐下，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人来看守这两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到第四天就不规矩了，走一走，停一停，还坐下聊天，聊着聊着，两个语言专家还放胆躺下了。

林汉达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过一会，林又问周：“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林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那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周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

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林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兴起，二人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仿佛对着上万棵高粱讲演。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只有他们二人。

宁夏人烟稀少，秋天，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个雁群至少 2 万只。距干校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从这里飞过，有的就落在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再起飞。那时局势紧张，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巡逻队员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一旦有人闯入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打开强光电筒照它们，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吓坏了，赶快离开。

有一天，干校正在广场开大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有光回忆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粪便就像雨一样落到我们头上、肩膀上。雁便黏糊糊的，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

———————————————————————————————

补白：朱某的老家河北，抗战胜利后成为解放区，他和同伴白某同时加入了共青团。那时虽曰解放，但国民党军队常来搔扰，形成拉锯区。有一次国民党来了，把他们几个青年抓去，问谁是共产党，有的说了，有的没说。朱和白当时都非常年轻，敌人一打，便都说了出去。共产党一回来，他们照样当兵、南下。解放后，朱、白都转业在南昌工作。审干时，朱向组织交待了拉锯区的一些情况，并没有把那时的那些做法理解成是变节行为。文革中，组织审查，认定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根据就是朱当初的交代。朱某不服，给当时已身任要

职的早年同伴白某写信，要他证明自己的清白。事情反反复复多次调查，白某从未承认有朱某交代的拉锯区发生的那种行为。文革后期三结合，白某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朱某成了阶下囚。这一正一反的结局令朱某很揪心，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坦白向党交代却成了坏人，而蓄意隐瞒历史的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文革结束后，朱某经组织审查，被定为一般历史问题，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然后三番五次去找过白某，白拒不接见，当革命领导干部当到离休。南　山

——————————————————————————————————

口号岁月　　李六和

文革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举国欢腾。这一天，建筑学院召开庆祝大会，主持会议的谢要武振臂领呼口号："热烈欢呼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爆炸成功！"全场群众也跟着喊，可是喊至"卫星爆炸"，觉得不对，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我们卫星爆炸，于是谢要武当场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进牛鬼蛇神队伍。

谢要武的儿子谢红兵，在学院的附属学校读书。红小兵头头找到他，要他和反革命爸爸划清界线。谢红兵在会上无情揭发和彻底批判爸爸的反革命罪行，举起小拳头喊"打倒我爸爸"，全场不懂事的小学生也跟着高呼"打倒我爸爸"。这下完了，学校的红小兵头头说他"哄骗广大红小兵战士称现行反革命分子为爸爸，恶毒之极，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勒令谢红兵当场脱掉"红小兵"袖标，命他天天打扫学校卫生。

丈夫和儿子都因喊口号被关，急坏了谢要武的妻子冷梅，四下求

人说情。学校工宣队里有位队员，是冷梅的同学，上学追求过她，那时她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人家是有权有势的工宣队员，冷梅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求他放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一马。

这位同学见昔日的梦中情人求到自己脚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事不好办。不过看在过去同学的份上，我试试吧。"此后，他总往冷梅家跑，冷敢怒不敢言，为了丈夫和儿子，有泪只能往肚里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宣队发现此事，要开他的批斗会，让冷梅上台揭发。工宣队长说，只要冷梅揭发得好，就可以解除对其丈夫和儿子的专政。冷梅又羞又恨，上台后光张嘴不知该说什么，工宣队长急了："不发言喊句口号也行。"受此启发，冷梅突然举起右手，喊"打倒工……"，后面的"宣队员"三字还没出口，冷梅就停住了，头上冷汗直冒，心想，好险呀，我也差点成了反革命。

工宣队长见状，问："你要喊什么口号？""打倒工贼。"冷梅急中生智。"对，他就是工贼。"然后工宣队长带头高呼："打倒工贼！"全场群众跟着高喊："打倒工贼！"工宣队长意犹未尽，又问冷梅："工贼还跟你说过啥？""他说过要给俺买一件的确良花衬衣。"队长气愤地攥起拳头喊："要他买！"台下的群众也亦步亦趋跟着喊："要他买！"

———————————————————————————————

补白：一天早晨，突闻高年级一个叫梁梦溪的同学昨天半夜被县革委会抓走了。几天后，学校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梁梦溪有期徒刑 15 年。梁平时学习特别好，其他各方面表现也很好，因动手能力强，尤得物理老师刘的赏识，是刘老师组织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的成员。他们这个小组的成员，个个都能自己组装收音机，还经常帮邻居、同学修理各种小电器、有线广播喇叭等等，是个很受欢迎的小集体。因接触收音机较多，梁梦溪无意间听到了美国之音、ＢＢＣ、莫斯科的广播。若是自己偷偷听，可能还不会惹那么大的麻烦，梦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按照广播里提供的地址，给美国之音发信

索要节目时间表！梁梦溪至少被关了 5 年，后来我上大学，他得到平反。他不属于文革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复查的时间相对较晚。出狱后，梁梦溪还是用自己的专长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部，赖以为生。

————————————————————————————————

补白：上海一个作曲家，采用越剧曲调谱写一首歌，歌颂江青，可是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反革命，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妻子因此嫁我　　易　平

一位转业军医，因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又因酒后失言，被同事送进监狱。为了将此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年仅六岁的女儿在厕所写了“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门配合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将这个六岁的孩子隔离审查。

几经转移审查地点，这个不懂人事的小女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面对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种种问题，除了茫然就是哭着要找爸爸。一个女公安柔声说：“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谎，你只要承认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你爸爸叫你写的，我就带你去见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诉你，快点承认，承认了你就是好孩子，我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糖。”

在好多糖糖的诱惑下，小女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写不来字。”审讯她的人一下乱了套，可是一个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谋：“没关系，叔叔来教你，你好聪明哟，一定学得会。”关押半个月，在这位朱叔叔耐心教导下，小女孩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铁证，造反派心花怒放。

一年后，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告诉她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没有资格读书。”万般无奈，小姑娘只好随亲人远走他乡入学，直到文革

结束才回乡。这个小女孩后来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再以后成了我的妻子。她嫁我的唯一理由是，虽然我长得很丑，蛮格格的，黑麻黢黢的，极像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但她认定，一旦嫁给我，任何人就不再敢欺负她。她知道我一身正气，浑身是胆，亲见我把好整人的某院长打得满地找牙。

当年小姑娘失去了十五天的自由，后来那个朱叔叔因犯重罪，刚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封匿名信　　顾启明

我原在常熟县卫生局担任秘书，文革开始后被推为文革小组长。下面各公社卫生院的年青医生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到县城闹革命，我多次接待他们。我一面欢迎他们送来的大字报，一面又劝他们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耽误医疗工作，但是劝说不仅无效，反被指控为压制革命。为此，我曾以卫生局文革小组的名义，到邮电局打电报，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上述情况，请示怎么办，但没有回音。

文革继续迅猛发展，县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围攻、游街，党组织瘫痪了，政府机关无法工作，学校停课，有些工厂停产，听说外地已发生斗死人的事。如此混乱下去，怎样收场？至年底，我化名王伟东，愤然命笔，写信给毛主席，严词直陈混乱情况，强烈要求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秩序。信的内容如下：

毛主席：

惊悉无锡发生“一二. 四”武斗事件，死伤数百人。消息传来，惊心动魄！近来，各地都发生了武斗事件，难道是形势大好？！

现在某些方面，各级党委都受到炮轰、围攻，领导人被游街、批斗，机关瘫痪，学校停课。难道只要保卫你一个人？！

为此，向你提出强烈要求：

一、向人民请罪；

二、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

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四、对杀人凶手要严加惩处；

五、对死难家属要适当安置；

六、解放军要进驻重要单位和学校，加以保护；

七、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搞；

八、要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各级党委”、“保卫人民”等口号。

常熟人民 王伟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至 1967 年春，县委和县政府完全瘫痪，军管会成立，但混乱局面并未好转，反而越加严重。10 月 15 日那天，常熟发生两派持枪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 22 人，震惊全县。1968 年春，经军管会努力，两派达成联合协议，成立了三结合的常熟县革命委员会，局势渐渐平稳。

6 月，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7 月，县军管会、公检法公布了几个已列入侦查范围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号就是王伟东反革命匿名信案。我大吃一惊，恐慌异常，自杀，未成，只好听天由命，期望侥幸得脱。种种迹象表明，我已被怀疑上。11 月初，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顶不住，承认了这封匿名信，于是我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个人信件和日记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笔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一张千元储蓄存单被冻结。

我被反复批斗，指控我立场反动，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鸣冤叫屈，还逼我交待写此信是受何人指使。他们点了几个领导干部的名，要我指认，劝我何苦一个人担责，要反戈一击，交待出首恶，争取从宽。我反复说明，无人指使，我就是首恶，不会诬谄他人。

不久，我被押到县工人纠察队关押，工纠队员上来对我痛打一顿耳光，眼镜被打坏落地，罚我手捧红宝书低头站立，早晚请罪，有时寒夜里喝令我站起来恭听最新指示，有时在我面前殴打其他人以示警惩。

一位后押进来的人告诉我，县城各条大街都贴有打倒我的横幅和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有的还贴上我的照片，报纸刊登着揭批我的长篇报导，县广播站两次广播了这篇报道。满城风雨，名誉扫地。

1969 年 1 月 30 日上午，工纠把我押到工人文化宫批斗，县革委会领导宣布处理决定：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干部队伍。县军管会、公检法的干部宣布了对我的判决：猖狂叫嚣要“保刘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布后，我被戴上手铐。

1969 年 2 月 27 日，我被押送老家支塘公社“就地服刑”。那天上午，雪后阴天，天气寒冷，上了汽车，我回头望望虞山，山上白雪皑皑，阴云浓重，显得无限凄凉。屈指算来，在虞山脚下的虞山镇我已工作生活了十八个年头。虞山，别了！今日一别难再见！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汽车先到支塘公社，再到十九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大会批斗。批斗结束，带到第五生产队，把我安排在一间草房里住下。夜幕降临，室内无灯，眼前一团漆黑，我倒在稻草铺上，大哭一场。自第二天起，我天天参加劳动，或田间，或养猪场，不离生产队一步。

我妻已成为二十二种人的一种——反革命家属，被赶出工厂，到农村和我一起务农。我领养的女儿，初中毕业了，也插队来农村和我在一起。一家三口，算是“团聚”了。生产队要到麦熟才分口粮，我们只能自己出钱凭粮票买粮度日。我在镇上的五间住房被拆去，在生产队造了三间房，多余的材料归队里，还要我付五百元的建造费。

5 月，县军管会、公检法来了孙、陈两个干部，会同大小队干部，在生产队办公室厉声问我：“到农村后，是否有人寄钱给你？是否有人写信给你？你是否写了信给别人？”我回答都没有。他们又对我说：

“对你已作了宽大处理。按照你的罪状，可以判刑十年十五年！”我心想，莫非判死刑也可以？之后，生产队对我的压力加重了，要我早出工晚收工，当中不能松，不许“乱说乱动”。有时大队干部来，看到我就当众无端呵斥，甚至打我一拳。

在公社的大喇叭广播里，经常听到公社通知各大小队和社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每逢节日或阶级斗争需要，我便被押到大小队社员大会上，低头弯腰，乱批一通，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妄想停止文化大革命，要刘少奇上台，要走资派上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吾俚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吾俚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要斗争到底。有一次，批斗后挂黑牌到镇上游街，黑牌上写着“反革命分子顾启明”，并逼我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顾启明！”还有一次，我被押到支塘小学，由贫下中农宣传队主持大会，天真烂漫的红小兵（小学生）用娇嫩的小手举起红缨枪，对着我的后背一阵乱打。

此时，我妻患了腰椎结核等多种疾病，不能劳动，经常服药打针，领养的女儿为避免受牵连，和我划清界线，由生父母领回，和我们脱离了关系。我每天出工劳动，上面规定，不给计工分。年终分配时，队里只给我平均口粮、柴草和二十元钱。我妻有病，很少劳动，所得工分更少，拿到口粮、柴草后，成为透支户。

有一天，听到社员在讲，附近生产队有一个南京来的姓范的右派分子投河自杀了，我大受震动。范某是我的小学同学，竟先我而去！我强自镇定，反复告诫自己：切不可步其后尘，除非劳瘁病死！

我忍辱偷生，年复一年，到 1972 年 1 月 30 日，三年“就地服刑”期满了，可是没有上面干部来宣布。我天天盼望，焦急万分，在田间劳动，时常偷看大路上有没有县里来的人。我害怕起来：莫非此刑无期？一天天，一月月，挨过整整四个月，一天早上，队里通知我到仓库场上开会。我赶快到会场，一位大队干部叫我听好，当众宣读了县军管会、公检法文件，宣布将我刑满释放，不戴“帽子”。读完后，那干部对我说：“你当社员了，不能翘尾巴，‘帽子’还在群众手里！”

我心想，刑期不明不白延长了四个月，还留下一条不能翘的尾巴，又要当心被再次戴上帽子。后来，有的社员称我是二等社员。

我妻病了七年，就医服药，到县城住院看病，做手术治疗，过去积蓄的钱都用完了，就陆续变卖家具、用品、衣服等，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我想起了这句最高指示，就多次到县革委信访科和县公安局，要求“给出路”，给我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但都没有得到解决。有一次在县公安局接待室还被训斥了一顿：“刑释分子，要老实改造自己！”

1975 年冬，听说 69、70 年下放农村的工人可以回厂或办理退休、退职，县里还成立了临时机构五人小组专管此事，我妻便拿了当时厂方所写的介绍到农村务农的信件，多次到原来做工的工厂要求对她作下放工人处理，但遭到厂方的拒绝。厂方说：“当时县级机关学习班电话通知厂方，你是随夫就地服刑，到农村务农，不属下放。”我也多次到五人小组提出要求，但小组负责人不详察情由，以冷酷的态度拒绝受理。

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1977 年初，五人小组因工作结束而撤销。我妻以及公社、大队干部，分别多次向妻子原单位主管部门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她的退职手续终于办理下来了，月领保养费 15 元。当年下半年，县卫生局李如宝局长出力疏通，介绍我进支塘公社卫生院当临时工，月工资 30 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交生产队记工分。

1978 年 6 月 2 日，支塘卫生院通知我到当地派出所，我去后见到县人民法院苏宗德院长和陶高欣、周大钧两位干部，他们请我坐下，喝开水，我一时很感意外。他们对我说：“关于你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经复查认为，现在决定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恢复原干部待遇，补发工资，还要恢复党籍，即将在县里开大会宣布。暂勿外传，等待通知。”

过了六天，通知我上城。在县委第三会议室，在由县级机关和卫生系统各单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县人民法院和县委组织部领导干部

分别宣读了上述复查判决和复查决定。会议结束，卫生局会计叫我到局先领取当月工资，后再补发。我赶快乘车到支塘，下车后飞快奔回家中，把此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同难共苦的妻子。

南京小屠杀　　使　者

1970 年 3 月 6 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 10 万人大会，判处 11 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 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

继“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 月 28 日杀 12 人，7 月 30 日杀 24 人，12 月 10 日杀 10 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 月 10 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 57 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 年前后，57 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 100％。

中国近代史上，南京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曾发生过多起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血腥事件，最有名的当数 1937 年日寇占领南京后的南京大屠杀。如今，每年的 12 月 13 日，中国人都在沉痛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屠杀的数十万同胞，然而 1970 年几次南京小屠杀中死难的人们却被彻底遗忘。这是为什么？难道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遗忘，中国人杀本国无辜百姓就应该忘记吗？

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 1970 年 3 月 6 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 11 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 11 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象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走了四十个年头！

侥幸的愣小子　　李　汉

1968 年初，有一次早请示，全体同学循例挥动红宝书齐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俺班一个平时二二乎乎的小子，这时忽然神经错乱，大声说：“祝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冈村宁次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全班愕然，一下子谁都不说话。那傻小子自己愣神儿半分钟，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肯定是被自己的胡言乱语吓哭了。在场没有老师，都是同学，谁都不敢说话，都楞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小子自己突然喊道：“我是反革命！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去自首！”说着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我们都觉得，这小子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大家在教室里等候结果，议论纷纷。过了两三个小时，校革委会副主任（原是珠算老师）来了，说：某某同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的家庭出身是小资本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团结的对象，他不可能对人民公敌蒋介石有什么感情，更不会对侵华日军司令有好感。他的错误属于口误，而且事发之后立刻主动投案自首，认错态度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假如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出身的，那就另当别论。所以经学校革委会讨论，并请示上级南开区教育局革委会领导和驻局军代表，决定责令该同学作出深刻检查，并通报全校批评，如有再犯，从严处理。另外特别警告，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走资派家庭的同学，由于你们的家庭出身背景，你们如果犯了同类错误，将加重处理，给予记过处分！

这事儿，居然就这么过去了。

透视看大样的由来　　李振盛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来，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形成一个习惯：编辑、记者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既了解国内外新闻，也找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有发现，就写到评报栏上。我拿起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由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图片，心里美滋滋的。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我被指派参加该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报纸每天刊发我拍摄的单幅新闻照片，我希望在音乐会闭幕前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图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成名成家思想浓厚，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年轻人，我心里整天想的就是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突然取消记者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想呢？心里虽这么嘀咕，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满整整一块版，虽然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社内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这是我李振盛拍摄的作品。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第 6 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评为“好稿”。

就在这时，有人跑进 3 楼摄影组办公室，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们冲上楼来把你揪走。”

我还没弄清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躲在楼顶，仍能听到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喧嚷吵闹声。我在楼顶探头下看，但见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挤满了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看起来，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有的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讲着什么，有的又吵又嚷，在与报社职工争论着什么。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我问同事，他们究竟抓到了图片专刊什么问题，这时才从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时我们的报纸每天 4 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版。8 月 22 日的报纸，为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增版两块，共出 6 版。我拍摄的 9 幅音乐会舞台照片，发在第 6 版，通栏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是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枪头。背面的第 5 版，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配有哈夏音乐会会徽——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单独看这两块增版，翻来覆去怎么看都找不

出丝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迹，反而会称赞这一天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实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极好。

然而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透视看报纸”这一损招儿，一些红卫兵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8 月 22 日的报纸，对着阳光一看就发现问题了：第 6 版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枪头，正巧从第 5 版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刺出。这样，“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红卫兵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真是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拿起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看。天啊!那红旗的枪头真的是不偏不斜，正从毛泽东头像顶上穿过。心中不仅暗暗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一幅《你追我赶》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都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我怀着极为愤懑的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理论一番。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他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争论着这个不成问题

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我如实介绍了这一版图片选片定稿、版面设计、制版、付印的全过程。他们大概也听不太懂，仍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我有点不耐烦，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腔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大叫起来。“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纯粹是没事硬找茬儿！无事生非！”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报纸上了，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他们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红卫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顶撞他们，跟他们打语录仗，更是恼怒，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说要拽我到他们造反团总部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明天的造反点火大会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缺少权威性？红卫兵头头一听王总编这话，就说：“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

“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小鲍轻声劝我。

假如我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肯定没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还是抗拒，都会受皮肉之苦。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用那铁扣子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不少人就这样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打致死。哈尔滨三中的老校长，就被该校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用皮带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里。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时轰动全省、全国。一位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老同学来信说，当时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还点了摄影记者的名字，很替我担忧。

经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 3 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结论，公诸社会。

调查半个多月，9 月 10 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由报社印刷成传单，有好几万张，送各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散发全省各地市县，还邮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以消除起先红卫兵广为散发的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的传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心想，应当保留一张调查报告原件，作为这次痛苦经历的历史凭证。几万张调查报告传单都散

发、张贴光了，我把报社大门前墙上的一张揭了下来。这张四角有粘贴痕迹的传单，与一张增刊报纸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将近 40 年。这份调查报告传单如今大概仅存世这一张。

现在读这份调查报告，觉得十分好笑，一个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儿，却兴师动众地去“认真调查，反复核实”，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玩笑。

调查报告对红卫兵围攻报社、揭发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这张传单的落款是“联合调查组”，其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和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在这 4 个造反组织中，有两个造反组织用了“毛泽东主义”，而不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红卫兵们觉得，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都可称为“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被称为“思想”，这不公平！他们发出一个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全国红卫兵纷纷响应这个“伟大倡议”，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据说周恩来曾为此专门请示毛泽东，最后确定还是称“毛泽东思想”，这场毛泽东思想升格闹剧最终平息。

调查报告总结的教训之一是：“过去出版报纸没有隔纸相望检查的习惯。因此，在报纸的各个环节上，也就没有用透视的方法去检查报纸。所以，在《黑龙江日报》1966 年 8 月 22 日五、六版上出现了

这种情况。”鉴于此，报社领导立即整改，总编辑通知经理部，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有普通办公桌那么大，台面是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装 4 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通明透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就像医生看 X 光片那样，能看到“透视效果”。各版大样合到一起，放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调整版面位置。

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经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他各版通常都是各种批斗会的报道或大批判文章。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不得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出现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严苛的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又退了一步，改为不准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印在毛泽东像背面，譬如当时批判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大批判中还常用“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字眼决不允许叠印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值夜班的编辑，人人神经高度紧张，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烦。

报纸大样放在灯光台上，反复透视看几遍，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如此“整改”，给排版车间额外增加许多麻烦，排版工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改动重排，到下班时间也无法下班，苦不堪言。

据说黑龙江日报社是最早制作灯光台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社，后来中央各大报社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当年贴反标　　郑植河

我初高中都在韶关北江中学度过。文革开始，中学停课，学生造反，1972 年后教育秩序一度恢复正常。记得读初一、二年级时，所有考试都是开卷，到初三年和高中，就实行闭卷考试了。1973 年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都绝望了。

同学李小益，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初二时随父母调到韶关。他音乐、数学、英文都很不错，诗词写得特别好。我俩和另一位同学原满韶，三人关系很好，喜欢看书，经常互相借书看，其中有些是受批判的禁书，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等。那时因反苏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让唱，但我们偷着学唱，成为我们高中时代的流行歌曲。

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变得很叛逆，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三个就特愤青。1975 年，我们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根本不可能。那时，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要工作几年后由组织推荐。我被分到韶关耐火材料厂，原满韶去了韶关柴油机厂，李小益去曲江县大塘公社一个知青点务农。虽然分开了，三个人还经常聚在一起。

1976 年，大约是 4 月 7 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运动。8 日，李小益从知青农场回来找我，说起四五运动，明明是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却被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非常气愤，觉得要做点什么，表示对北京的支持。

4 月 11 日晚上 10 点多，我和李小益骑着单车出来。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在韶关市区几个人流较多的地方，我俩一人迅速往墙上贴标语，一个人用雨衣遮挡，一个半小时内贴出 20 多张标语，内容有“伸出医国的手，重整山河”，“XX 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等。

第二天一早，这些言辞大胆的标语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有关方面迅速开展全市摸查。事发一个月后，我们被捕，三人以“张贴反动标语，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街头批斗二十多天后入狱。李小益被判处死缓，我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贴标语的仅

是我和小益二人，原满韶只参与了议论，但有关部门硬要做成“集团案”，我们三人的一些同学、亲友也受到牵连。

在韶关监狱仅关 5 个月，就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进监狱不久，狱方就把我调入医训班，医训班结业后干脆不再让我去劳动，专心写申诉材料。1978 年 11 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你可以出狱了。”

整整坐牢两年半（30 个月），走出监狱那一刻，没什么大喜大悲，只是很开心。韶关市为我们三个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平反大会。我们回原厂上班，省里领导来韶关看望我们，问我们对今后的想法：如果想工作，可以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工厂，如有别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三个想都没想，立即要求：上大学。当初在狱中听说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动，可是根本没可能去考试。出狱时，1978 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已经错过。

省领导谈话几天后，有关方面通知我们：可以参加高考。考前填报志愿，我们三个都选择中山大学，出于政治抱负，而且都选择了文科，我填报的是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学系，原满韶是历史系。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关在家拼命复习。

考试安排在韶关市委招待所，一人一个房间，卷子是 1978 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考副题。我现在唯一记得的一道题是“郑和下西洋”名词解释。总体感觉，对我而言，考题不算太难。1975 年高中毕业后，我三年没碰过课本。幸好，中学基础还算扎实，在监狱里我也经常看书看报。大概过了一周，我们就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试分数没有告诉我们，我知道这个并不重要。

1978 年 11 月 30 日，《南方日报》报道，郑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运动”入狱，平反后被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报道中说，他们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被破格录取到中山大学深造。

1978 级中山大学中文系约 100 名学生，分甲乙丙三个班，我在丙班。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录取的，同学们大多知道我被捕入狱的事情。当年的报纸把我、李小益、原满韶写成是“四五英雄”，但同学们并没有把我当英雄看待，大家关系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种盲目的迷信崇拜已经逐渐在改变。

经过韶关之劫，我在大学里比较沉默，但骨子里依然是个愤青，依然很关心时事，有时会为某个政治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同学争个你死我活。班上有不少愤青，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教材还是很“左”的，像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大家，基本不在视野，徐志摩、胡适等是反面批判对象，重点则是鲁郭茅巴老曹。记得有一次现代文学课，有个观点比较激进的同学对老师说，孙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没写出什么好作品。

1982 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韶钢，负责宣传报道。深圳、珠海的活力吸引了我，1987 年，我决意离开国企，到深圳一家报社当记者。80 年代末，我又调到深圳旅游局，成为中国第一批星级酒店检查员。2005 年，我自己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学，有从政、从商、从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经历过种种挫折，现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经常对部下和朋友们说：“如果与发财的同学比，我要跳右边的河；与升官的同学比，我要跳左边的河。所以，千万别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实，大家的处境不同，与大学毕业后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有关，这恰恰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三十年来在日趋多元化。

吴风琴，吴献忠　　青　苗

吴献忠原名吴风琴，抚顺市第十中学学生，品学兼优，能歌善舞，是班长、校革委会副主任。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她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锦州市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并改名吴献忠——向广阔天地献忠心。在那里，一年之内，吴献忠学会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 1 万公斤，扬得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 年秋，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有人说她眼界高，想上大学。不久，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一致推荐她，她仍然说“我愿意留在农村”，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后来北大、清华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个人申请书，其他所有手续全为她办好了，吴献忠仍然不走。在日记里，吴写下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一连 9 个春节，吴献忠没有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不去。她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作为全国 19 位知青典型中的典型，吴献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决扎根农村的倡议书，一时名扬全国，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第一号骄女。她的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名气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多，可她仍然穿着农田鞋、补丁衣。

作为辽宁知青的唯一代表，吴献忠坐过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不知不觉，吴献忠的爱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萌芽。他是吴的知青同学，也是她的助手——吴是耿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副书记，二人志同道合。寒风刺骨的冬天，吴献忠率领社员兴修水利，需要有人跳到水里作业，她只须向他瞟一眼，他就二话不说，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秋天打场，他包的活儿干完了，看到吴献忠还没干完，不管多晚，他都过来帮忙。吴献忠忙，没时间洗衣服，他拿过来就洗。吴献忠出差，他细心地帮她收拾行装。吴献忠回来晚了，他守候在灶口，将饭菜热了又热。那段日子，吴献忠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当二人牵手准备共筑爱巢的时候，她出事了。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吴献忠说：“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爱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动了。”1977 年，吴献忠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起初，办案人员以为吴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重要骨干，对她批斗的力度很大，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到处游斗，每天上午批斗 4 小时，下午批斗 4 小时，一批就是两个月。为了取得突破，他们决定把吴献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发批判。

那天本来下着瓢泼大雨，可当吴献忠被带到贴满“打倒吴献忠”标语的大台子前时，雨却停了，一束阳光穿过乌云，照耀大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全是她熟悉的乡亲、同学。他们轮流上台批判发言，可没有狂热和激愤，只是冷静地念批判稿。大会进行了 3 个多小时，没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没有人动她一个手指头，反而有人细心地把她的衣领垫在挂牌的铁丝下……

直到批判大会结束，吴献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拒绝对吴献忠作批判发言——他的沉默给苦难中的吴献忠莫大的安慰。

审查了 3 年多，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有任何瓜葛。1981 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 3 年多磨难里对他的无穷无尽的思念。通过一位同学，吴献忠得到了他的确切消息：“他等了你 3 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

在同学的安排下，二人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我希望你能坦然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此结束。吴献忠跌跌撞撞回到家，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家人想把吴献忠留在身边，试图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

回到那里吗？”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全家人不再说什么。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经历大波大折后，吴献忠沉寂下来了，渴望过上普通人平静的日子。然而，作为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她的遭际和人格仍然在一些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时的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陆续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几十封情书，其中一句话令她无比感动：“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吴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那青年说：“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 20 年监狱，我也等你。”“我比你大 4 岁半。”“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 4 岁半，就是相差 10 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他们结婚了，次年有了一个儿子。农科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产生了新的企求：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帮忙。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 年，小叔子一家 4 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8 口人挤在一间半房里，8 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穿的是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

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上桌子。尽管这样，她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睦睦。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她都拒绝了：“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

吴献忠已经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把桌子掀翻。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她千嘱咐万叮咛，要他吃饭说话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话头不少，吆五喝六，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呕出来，从屋里喷到屋外。1989 年 1 月 4 日，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说，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 3 年多。她的精神有些失常，老忘事儿，身体也彻底垮了，体重从 60 公斤降到 40 公斤，风一吹人打晃。吴献忠已经无法工作，需要将养身体，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 20 多年的家乡抚顺。

家乡人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告诉她，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吴献忠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先后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在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在沈阳高楼香鸡公司任经营经理。

1998 年 6 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9 月 28 日，沈阳柳湖宾馆宴会厅，沉寂了 20 多年的吴献忠出现在公众面前，身份是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天，与吴献忠当年下乡插队的日子——1968 年 9 月 28 日，整整相距 30 年。

吴献忠亲身经历了大多数同代人的“无奈三部曲”：想读书赶上下乡；想工作赶上下岗；40 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各种变故。如今，吴献忠已年过半百，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的乐趣就是工作，惟一的追求就是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能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为自己的同代人真正做点什么。

补白：今天我在姐姐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一连吃了 3 个。吃过芒果，坐在沙发里，联想起发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荒诞但绝对真实的故事。1968 年夏，非洲朋友送给毛泽东两筐芒果，毛转手送给驻清华和北大的工人宣传队，轰动全国。我所在的兵团 2 师 13 团有个北京女知青，其父是工宣队员，为了让北京知青也分享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厚爱，他把一个腊制的芒果模型送到我团，供全团指战员、家属瞻仰。当时我也去了，颇有幸福感。一个副连长瞻仰回来，对人说，他在云南当过兵，驻地产芒果，吃过，不是什么好东西。此言一出，遭人上报团部，副连长被撤职，受到严厉批评，成了反革命分子，理由是：非洲朋友送的芒果，一定是稀世珍果，普通水果毛主席怎么会送给工人阶级？再者，这副连长说自己吃过芒果，还说芒果不是好东西，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今天我撰写此文，目的很简单，让国人、今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这个黑色幽默故事，警醒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否则，苦涩荒诞的的黑暗故事就会重演。　　　高洪明

————————————————————————————————————

绅士杀人犯　　孟昭民

运城县看守所有一条老规矩，每隔两个月来一次调监，就是把关在各个牢房的犯人们调换一下监房，以防他们在一起待久了阴谋越狱逃跑，或搞什么反革命暴动。调监一般安排在单月的第一天。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是一个调监日，同牢的其他人全调了，只我一人未调，仍关在坐北朝南的第 12 号牢房，因为我已充当一年多的牢房记录员（一个牢房中的犯人头头）。

新来 12 号的反革命杀人犯薛明最引人注意。薛的犯罪事实，我早有所闻，没想到这次调监竟调到同一牢房。我是个“老犯”，调换过多

次监房，与许多纵火、强奸、鸡奸、贪污、偷盗、诈骗、赌博、杀人、教唆、传播封建迷信等各色犯人同过牢，但和反革命杀人犯还没打过交道。

调监一结束，看守就把我叫到犯人训话室，一脸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这次把反革命杀人犯薛明调到你 12 号监房，就是要保证他执行前的安全。你要以党性作保证，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确保即将召开的公判大会圆满成功！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你应该知道！"那时真是一个人妖颠倒、滑稽可笑的年代，我的公职、党籍都在，只因抵制了极左路线，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更为可笑的是，看守员还要我这个犯人以党性作保证。

为了照拂好这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反革命杀人犯，我特意把他安排在我的身旁，一来易于监督和了解他的行为和思想，二来可以给他一点宽慰。在我们的印象中，反革命杀人犯都是满脸横肉、膀大腰圆、蛮横无理、凶神恶煞，而我身边的薛明却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衣着整洁，言谈举止透着一种现代文明气息，虽年近六旬，却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可以想见，年轻时肯定是一位帅哥。如果不知根底，你绝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普通农民（运城县泓芝驿公社），反倒可能以为是县上哪个部门的负责干部。

薛明安置好自己的床铺，就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并说："我虽然是个杀人犯，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没几天了，但我绝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点不愉快，现在我只能以与各位的和睦相处来消愆赎罪。"

大概是调监后的第八天，岗楼上传来"提反革命杀人犯薛明"的厉声高叫，紧接着牢房铁门被打开，两位狱警进来给薛明带上手铐，架着他就出去了。牢内的犯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回老薛去领取地狱通行证了。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薛明回来了，除了戴着手铐，还被砸上脚镣。他颓唐地坐在炕沿，脸色灰白，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刚才我领了判决书，是死刑，立即执行。我不上诉，已经签了字画了押。老天爷只给我十天的活命了……"话未说完，两行老泪顺着白皙的面颊流了下

来。

此时此刻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是说："老薛，想开点，就是十天也要活好，活滋润。"同牢的犯人们纷纷用最温馨的话语来宽慰这位面临死神的反革命杀人犯。

薛明有三子一女，三儿媳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再加两条油亮油亮的大辫子，就像电影演员一样，小女儿薛雯长得比三嫂更胜几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刘诚一直觊觎这姑嫂俩，使尽百般手段都未得逞。有一天晚上，开完社员大会，刘诚点名让薛家三儿媳和其他几位社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留下，他要对他们谈话。薛家三儿媳被安排在最后一位谈话，就在这天晚上，刘诚强奸了她。

受到污辱的薛家三儿媳，当晚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决心以死来表示对丈夫的忠贞，黎明时分饮下一瓶农药，顿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没过一顿饭工夫，便撇下自己的丈夫和未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西去。悲愤至极的薛家三儿子埋了妻子之后，先后到泓芝驿公社、运城县和运城地区公安处告状。公安人员听完受害人的血泪诉说，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极其淡漠地说：你是地主子弟，可别乱咬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弄不好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冤比天大却状告无门，老三万般无奈，向父亲诉说了实情。他说，既然政府不受理他的案子，还说他是阶级报复，不如拼着一死，除了这一害，为己出气，为民伸冤！薛明厉声阻止儿子：绝对不能干这样的蠢事，我托人想想办法。实际上老薛是怕儿子闯祸，陪了性命，他自己却暗下决心，以老命换取刘诚的狗命。

真是火上浇油，鬼使神差，党支部书记刘诚不知死之将至，竟然兽性大发，不久又在秋夜天幕的掩饰下强奸了薛明的爱女薛雯！

得此噩耗，薛明怒火满腔，血脉贲张，决定立即动手除掉这个孽障。那天一早，薛明亲自登门找到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刘诚，说：老大老二媳妇闹分家，闹了一夏一秋，看来过不到一起了。昨天我到娃

他舅家，大舅二舅都同意，让他们各立门户，大家都安生。今天晚上他俩舅舅都来，你是一队之长，一定过来帮助解决一下家务事，拜托了。刘诚对薛家闹分家的事早有耳闻，依照惯例，村里这类家务事少不了他这位支书兼队长的大人物莅临指导。他欣然应允，顺手掏了一支纸烟递给老薛，说：没问题，吃了晚饭我准去！

薛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五十年代初搭起的七间土坯房已经墙斜顶漏，四壁透风，一家三代十几口就拥挤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宅院里。二十几年前的薛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薛家是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广有土地，宅院连片，骡马成群，牛羊满圈。1941 年，22 岁的薛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随父在西安城经营一座纺织印染厂，1948 年因战乱回到运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土改中，薛家的土地、房产、农具、车马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薛明也被政府辞退，回乡务农，没有住房的薛明在村子最西头搭起了这几间土坯房。

且说吃过晚饭，天黑下来，大队支书刘诚换了一件新上衣，蹬上那双能显示身份地位的翻毛皮鞋，骑上永久牌自行车，朝薛家驶去。薛家大门紧闭，刘诚揿动车铃，大声叫喊：老薛，开门！手持镢头藏在门背后的薛明，听清楚是刘诚的声音，拉开门闩，就在刘诚进门的刹那，老薛抡起镢头，死命朝他头上砸去，刘诚连人带车倒在血泊之中。

确认刘诚已经呜呼，薛明径直奔到大队部，一面用力敲击生产队的大铁钟，一面大声叫喊：“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然后快步回家，取了铺盖、衣物，让人用麻绳缚住自己的双手，迅速返回大队部。当天晚上，薛明被关进运城县看守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法院不看任何具体因果，只以出身论罪（地主出身的人杀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判定薛明搞阶级仇杀，是反革命杀人犯。

自从戴上脚镣，薛明的精神显然萎靡了一大截，但他仍一步一步在地板上走动。每走一步，脚镣上的铁链就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薛

明说，很抱歉，打扰各位了，我坐不下来，蹲在床边更着急。大家都说，不用考虑我们，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天晚上，薛明彻夜未合眼，我也陪他一直熬到天亮。薛明对我说：政府判我死刑，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毫无怨言。刘诚这个畜牲，犯的是国法，我砸死他，出了气，解了恨，杀人偿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我死而无怨。仔细想来，我对不起刘诚一家老少，你以后出去了，一定找到他的妻儿，转达我的悔意，我到阴间也要向他的家人赔罪。我这个杀人犯，理应偿命，但我绝不是反革命杀人犯。解放这么多年，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刘诚这个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我和他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是地主阶级对共产党的仇恨。判决书上说我是反革命杀人犯，我不服，我只服“杀人犯”三个字。日后你出了监，掌了权（我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一定要替我把这个案子中“反革命”三字抹掉，要不然，我这个地主成分，再加上反革命，子孙后辈世世代代都不得翻身。我自己赴死并不可惜，我悔恨的是给后辈儿孙带来无尽无穷的灾难，当兵、上学、入团、入党，都不会有他们的份儿了。

薛明说着，流出两行老泪。我用手帕为他拭泪，问：“那你怎么不上诉呢？”“上诉又会有什么结果，我是地主成分呀！”“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捉摸不准，只要有机会，我会替你说清楚你的意思的，让你的子孙后代不要因此受到连累。”“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他伸出带铐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从头天中午到第二天晚上，整整一天半，薛明水米不沾。犯人们都劝他，哪怕少吃点，吃上一口也行，你不吃饭，所里会惩罚我们的。薛明说，我的胃翻腾得厉害，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会绝食的，我绝不会为难你们。

第三天一早，薛明开始进食，整个监房都活跃了起来。中午时分，薛明明显地振作了许多。他说，我从小在西安长大，也很喜欢秦腔，大家这两天为我操心，喂我吃饭，为我解裤带系裤带，擦屁股，为了报答各位的相助之情，现在我给大家唱几段秦腔。说罢，他哼了一段

过门，唱起了《火焰驹》、《大登殿》的须生戏。老薛的嗓门真好，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唱得满牢的犯人都鼓起掌来。薛明说："年轻时我是秦腔的票友，能唱也能拉，可惜这多年不唱，有些词都忘了。我这是不是死鬼作乐？"

老薛一开头，几个蒲剧戏迷也唱起了《徐策跑城》、《蝴蝶杯》、《回荆州》、《九江口》，杀人未遂犯老赵也即兴唱了几段京剧《十五贯》和《盜御马》，本来死气沉沉的牢房，一下子生气勃勃，活跃异常。

此后一连两三天，老薛异常兴奋，讲自己在西安求学时参加反日大游行的故事，讲如何抵制日货，如何报名参军抗日，讲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且讲到解放后他在运城师范教学时，用英语翻译了《东方红》歌词，亲自教同学们学唱，说着用英语唱了起来。尽管大家都不懂英语，却用汉语和着他唱到曲终。

第六天下午，老薛的左眼突然斜了起来，左脸歪向一边，嘴也歪了。同牢的原县医院中医科大夫、奸污病妇犯张纯德说，老薛患的是中风，要赶快治疗。晚上查监时，我向看守报告了薛明的病情。

次日中午来了一名法医，带着听诊器、血压计，听了听薛明的脏腑，量了血压，又号了一回脉，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急性中风，无大妨碍。他让犯人们把薛明的裤带解开，在臀部注射了一针，又留下一些丸药和片剂，嘱咐了服药的时间和办法，并要张纯德大夫按摩治疗，说完就起身离去了。

服药和按摩都不见效，薛明的口、眼、脸歪斜得越来越严重了，上下牙齿咬不到一起，饭食从嘴角里流了出来，吐字发音也越来越含糊不清。所方非常着急，请来地区医院的几位大夫会诊，经过一番讨论，议定了治疗方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老薛的中风症奇迹般地痊愈了，耳鼻口眼都归了原位。疾病陡消、五官端正的老薛，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开玩笑说，可能阎王爷也不爱见嘴眼歪斜、话语不清的死鬼，所以赴刑场之前全好了。老薛满含酸楚的玩笑话，激起了大家的话头，纷纷向他表示慰问，祝贺他神奇康复。

这一夜，是老薛的最后一夜，他未曾合眼，我也同样陪他一直熬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老薛说：“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里，在许多空白处都写着给家人和儿孙们的留言。这个本子留给你，以后有机会，一定送到我家，让他们仔细看看，以我为鉴，不再做违法乱纪的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大众有益的人。另外，请你转告我的家属，我的尸骨就埋在北坡梁上，绝对不能进祖茔，因为我是因杀人害命而被政府处决的，是暴死，属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之列，进了祖坟就玷污了先祖。我要永世做野鬼游魂，以保持薛家坟茔清白。这两件加上前些天请你转告刘诚家人赔罪的事，一共三件，承蒙办妥，我在阴间做鬼也就于心无憾了。”说着，他把此前取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塞到我的手中。

深夜，全牢房的人都无睡意。薛明挣扎着站在地板上，一字一句地说：“大家都是法绳在身、披枷带锁的人，但犯砍头罪的只我一个，我今日现金身说佛法，大家以后想问题办事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逞一时之愤而铸成千古之恨。我首先是咱们牢房的反面教员，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我虽然是地主成分，却绝不是反革命，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杀人犯。”

几句话说得整个牢房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岗楼上传来哨兵的喝令：“12 号！半夜了，还扯什么淡！”

早上四点半，天还未亮，北院的大铁门哐当一声响，伴着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夜未眠的老薛忽地坐了起来，跪在床头，先作了一个揖，又磕下头去，用哽咽的声音说：“感谢大家十天来对我的照顾，我给大家叩头了。”话音甫落，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几个警察快速架起他朝门外走。走到当院的水龙头前，老薛说：“请警察兄弟放开我，允许我给大家告个别。”整个北院的一百多名犯人，都知道薛明要拉出去验明正身，连衣服也顾不上穿，簇拥在铁窗前向外张望。但见警察们放开了老薛的胳膊，老薛先拱手作了三个揖，跪在当院磕了个头，大声说：“永别了，大家各自保重！”说完他站起身来，又作了三个揖，依旧跪倒在地，面朝着泓芝驿的方向，一连磕

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伴，孩子们，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刘诚家的，我对不起你一家老少，告罪了！"

说完，他在警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朝大铁门走去，脚镣上铁链的金属撞击声在黎明前静寂的夜空里分外响亮和刺耳。

——————————————————————————————

补白：一个退伍兵，年底赶集买一斤猪肉准备过年，又临时决定买一个很便宜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就骑一辆光自行车，怎么往回拿呢？有了！挂车把上。这边挂上一斤猪肉，那边挂着用一根麻绳拴住脖子的毛石膏像，很结实。可是没走多远，被人逮了起来，罪名是想把毛主席吊死，属于现行反革命。

变态的胡老师　　王　匡

1974 年那一学期，语文第一课的课文就一句话："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语文老师姓胡，三十多岁，因她和老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起从长沙的大机关发配到我们这个湘西小县城。胡老师书教得好，人也漂亮，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的三个女儿，长女 12 岁，次女 9 岁，三女 5 岁，也都长得漂亮，比我们小县城的同龄人发育得好，也穿得好，在我们的眼里就像小公主一样。

期中考试，语文课的考题就是默写"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着这么简单的试卷，同学们兴奋得窃窃私语。我心里盘算，一交卷就与好友去学校后面的山上掏鸟窝。不到五分钟，同学们陆续交卷，胡老师坐在讲台上当场改了起来。忽然，胡老师呼地站起身，满脸怒容，气冲冲跑下讲台，左手抓着一张试卷，右手向前伸着，直奔我而来。到我桌前，她右手食指指着我的脸上，我若不是本能地往后靠，

手指就捣到我眼睛了。

“你，你，你……”胡老师气得说不出话，“你看看你写了什么？！”我战战兢兢往我试卷看了一眼，没发现什么问题呀。“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对伟大领袖不尊敬的家伙！打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为过！你看看你写了什么呀？把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方’字写成‘主’字，你念念看，韶山不是成了红太阳升起的地主？”一连串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脑向我扔来，全班同学也都被吓傻了，纷纷回头看着我这个班长，平时我一直偷偷喜欢的学习委员，此时也回头惊讶地看着我，腾的一下我的脸红破了，恨不得课桌下有个地洞好钻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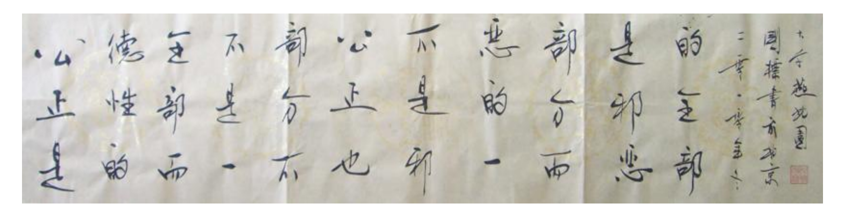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胡老师声嘶力竭咆哮多久，最后只听她问同学们谁知道我的家长在哪里，几个男同学争着说知道我妈妈在两公里外的医院上班。胡老师命令他们几个去喊我妈妈马上到学校来。几个同学飞跑出去，半小时后，妈妈跟着他们跑来了。胡老师严肃地对妈妈说，我写了反动句子，妈妈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不停地给比她还小几岁的胡老师低头道歉认错，仿佛写错字的是她而不是我！

平时牵着妈妈的衣角上街买菜，一路都有人亲热地与妈妈打招呼：“吴医生，买菜呀，你崽长得好好哟！”此刻，妈妈却因我蒙羞。妈妈翻来覆去道歉，好话说了几箩筐，最后胡老师终于开恩了：“好在你孩子的爸爸出身三代工人，你又是年年的先进共产党员，我们也相信孩子不会反党反毛主席，要是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这次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妈妈千恩万谢告别胡老师，临走还讨好地说，胡老师对学生太操劳了，已经有了白发，请胡老师有空到医院去看看，给她开点药。

尽管事情已过去，我还是担心被同学张扬出去，哪天传到解放军叔叔耳朵里，他们就会背着冲锋枪来学校抓我坐牢。文革期间，公检法基本没有了，抓坏人的差事都由当地驻军完成。

那些天，脑海里天天演出解放军叔叔来抓我的场景：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叫某某某，然后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掏出牵牛的麻绳将我五花大绑。这些场景我曾无数次看到过，与我家相邻的那些叔叔伯伯甚至爷爷奶奶们就是被用这种方式抓走的。在赶集的日子，被抓的坏

分子还会五花大绑，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串游街，在大太阳下站在中学操场的台子上低头认罪。坐牢我不怕，就怕游街和站台子，游街害羞，站台子怕给读中学的哥哥姐姐丢丑。



公正与德性　　国标书

提心吊胆过了 10 来天，父亲见我不像过去那么顽皮，放学回来就坐在屋门口的青石板上，一坐几个钟头，饭也吃得少了，晚饭时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开始我不肯说，后来一想，反正他们迟早要知道，不如先说：“再过几天我要去坐班房了……”

“什么？”父亲没听清。我重复了一遍，并说了学校的事和我的担心。父亲的脸由疑惑变得紫胀，后来两条眉毛皱在一块，放下碗说：“你一个九岁的伢崽，怎么会是反革命？只是考试写错一个字，莫乱想。”我争辩道：“隔壁周伯上午还在抓别的反革命，中午自己倒被当成反革命抓了，不就是他中午去粮店买面，篮子里垫了张报纸，报纸上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粮店卖米的人看见了就说他不尊敬毛主席，当场就给捆了起来交给解放军？还有我们学校一个五年级学生，上体育课摔了一跤，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打碎了，不也被公安特派员铐走了吗？我为什么不会被抓去坐班房？”

我振振有词地说完，父亲一耳光抡过来：“你才读了 3 年书，就读得书呆子一个，告诉你，即使要坐牢也是你老子去坐，你从今后不准再想这事！”外婆急忙把我从地上哄起来，埋怨道：“你不知你的手有好重哟？把他脑子打傻了怎么办？要打也只能打屁股。”

几个月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父母都上班了，我一个人赖在被窝里想：听人说，心里喊反动口号，解放军叔叔都知道，都会被抓，

今天我何不试试？于是用被子蒙头，在心里喊了一遍“打倒毛主席”。喊过，急忙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躲在家门外的树林里对着家门的方向张望，望了一天也没见解放军叔叔露面。提心吊胆过了一星期，见没事，胆子大起来，心想：看来在心里喊，解放军叔叔是肯定不知道了；喊出声，解放军叔叔会不会知道呢？于是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躲在被子里又小声喊了 3 遍“打倒毛主席”，结果还是没有被解放军叔叔知道。小小年纪，我开始怀疑解放军叔叔无所不知的神话。

如今人到中年，想起胡老师，想起那个荒唐的年代，她当年那样小题大做，也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一组行刑照的由来　　李振盛

今天是 4 月 5 日，又是一年的清明节。40 年前的 1968 年清明节，我曾拍摄一组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的照片，现这组照片网上流传甚广。

巫、王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 年 1 月 1 日，二人在街头散发、张贴了一批传单，也可以说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 16 开小报，名曰“向北方”。当年的党报，报眼位置都印毛主席语录，他俩油印的《向北方》小报也照此办理，在报眼处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下边，他们又加上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话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遂把此事定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发动群众限期破案。

案件很快告破。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宣布巫、王是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他们两人，不存在任何从犯。两人怎么能定为集团案？而且还都是主犯，

全判死刑？当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巫炳源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便紧紧闭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场被枪毙，巫炳源再没睁眼。

那天共枪毙 8 人，其他 6 人是刑事犯。8 人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押上卡车，穿过市区，开赴哈尔滨西北郊黄山火葬场附近的一片空地。到了刑场，8 人一字排开，双手反捆，被按跪下。8 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外，从脑后开枪将他们打死。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毙命。

报纸对这类新闻只发文字消息，绝不发表刑场照片。当时我 27 岁，血气方刚，出于新闻摄影的职业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想前往拍照。那天，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我们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一次处决 8 名犯人，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摄影组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没用。我心里很想去，但嘴上不敢说。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我悄悄对他说：“我想去，到时候请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接我一下。”我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随军管会的车队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的特写。我使用的是莱卡 M3 相机，只有 35 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才行，因此能闻到刺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怕同事看到这些底片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说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他们当中有的人，每看到我拍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找我谈话批评。

后来半年多，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已经结婚三个月，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在走廊尽头。半夜起来小便，我不敢睁眼，闭眼走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生怕碰到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尽

力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原先我很喜欢吃报社食堂做的血豆腐，此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想呕吐。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智斗会计　　晓　相

1969 年，我 32 岁，和丈夫生有两个男孩儿。丈夫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文质彬彬，很儒雅，在课堂上很风趣，各种鲜活的历史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独特见解，颇受学生们追捧。也正因如此，丈夫不可避免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全家下放到天津南郊一个小村子进行劳动改造。

从市区到农村，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时我任纺织厂的车间副工长，虽不像丈夫博学，但我历经各种生活磨难，谙熟各种为人处事之道，并练就一张利嘴，用丈夫的话说："你做事的胆量和智谋，一般老爷们都比不了。"

到南郊农村之后，丈夫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随身带来的那几本书早已翻得起了毛边儿。我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面对改造。我本以为乐观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一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谁知并非如我所愿，在村民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

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丈夫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我家 25 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去了。沉闷的丈夫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我，这不

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把我气得够呛，要找会计理论。丈夫一再阻拦，我暂且认了这个哑巴亏。

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我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目的就是看看这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我们一家。丈夫回来后，说这次又扣了 35 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直接回来了。

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接奔向生产队的会计室。那会计正坐在那张简陋的办公桌前喝茶看报纸，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 35 分？我们是缺了勤了还是短了工了？"他着实被我这话吓了一跳，操着一口略带河北口音的天津话说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 25 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怎么着？"

只见这时这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跟我谈，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到他说我"老娘儿们"，我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衣领子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由于我的大嗓门，话还没说一半儿，生产队大院里就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其中当然也有村干部。我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此时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旁边一直低声央求我。他怕事情闹大，我可不怕，越大越好。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我解决问题。"玩儿"得正起劲儿的我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

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我家多加 1 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 1 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家调回市区。

时光荏苒，40 年过去了，每当我给身边人讲起这段儿“智斗现行反革命”的故事，总引得他们开怀大笑，并赞许我当时的智谋和胆量。

益阳迎丰事件　　湘　君

1963 年 8 月 30 日，以中共益阳地委书记为队长，地委办公室主任为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益阳县迎丰人民公社，益阳县委派出政府办主任带领 20 名干部，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

工作队一到迎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文件精神，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清理的结果认定：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的生产队干部有经济问题。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粮食 181611 公斤，现金 75369 元，此外还有一批实物票证等。有严重问题，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 394 人，占干部总数的 23．7%，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 135 人，占党员总数的 44%。

工作队运用土改对待地主的办法，开展对干部的斗争。有些贫协组织成员，思想素质低下，揭发出来的许多问题，往往与个人的历史恩怨、意气和成见纠缠在一起，甚至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工作队对这些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上纲上线，一律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处理，造成了基层干部与群众、工作队、贫协组织之间的尖锐对立。至 11 月 30 日工作队撤离，整个运动历时 3 个月，行政开除的干部 15 人，其他各种行政处分的干部 3 人，开除党籍的 46 人，留党察看的 7 人，撤销职务的 14 人，受其他党纪处分的 1 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 22%。

工作队离开后，运动中积聚起来的矛盾开始激化，有些被整的干部对贫协组织进行报复，实行反清算，进一步加剧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1964 年 2 月 19 日至 20 日，迎丰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会上，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因前一段被整，发了一通牢骚，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大队支部书记也借机出怨气。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批评他们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在大会上就不要说了。

21 日至 26 日，连日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参会人员有公社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和在四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贫协会负责人，共 360 人，会议主题是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匡爱国主持会议。由于前段留下了后遗症，会议开始时普遍存在着厌烦、牢骚情绪，少数干部担心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柏荫村大队烟墨塘生产队队长龚雪枚听说公社要开会，就躲到岳母家不回来，说：“去年开会搞四清，这次开会恐怕会搞八清，当家三年狗都嫌，从今后我不当队长了，任你九清十清。”

在会议讨论发言中，一些干部纷纷指出四清运动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对干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几个大队干部发牢骚，称运动中挨整，不愿继续当干部了。参加会议的贫协组织负责人则认为，这些都是针对自己来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双方形成严重的对立局面。匡爱国分别做了干部和贫协负责人的思想工作。24 日，匡被县里抽调去李昌港公社搞四清，26 日的大会总结由社长张锡祺主持。

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了解到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存在的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认为该社的四清运动是不成功的，是严重翻案事件。5 月下旬，地委、县委联合组成迎丰事件专案组，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6 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一位候补书记来益阳，听取地委有关迎丰四清运动的汇报，认为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肃查明处理，并指示把情况报告省委。6 月中旬，迎丰

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写出一份关于四清后出现问题的调查报告，供地委领导人参考。一位地委副书记将一份调查报告邮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送中共湖南省委。

7 月 21 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位省委候补书记，路经益阳沙头，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向两人汇报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两位省委领导当即指示，迎丰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一定要严肃处理，并责成地委、县委继续调查。这时又传来刘少奇的 7 月“郑州讲话”，说反扑四清的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迎丰公社发生的事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阶级斗争之弦也越绷越紧。

地委、县委组织调查组，到迎丰进一步展开调查，最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扑四清的严重事件，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扑的典型”。

8 月 8 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长沙，专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关于“迎丰事件”的汇报，并看了相关的材料。10 日晚，刘少奇在接见省委常委时，对“迎丰事件”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认为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必须反击。省委第一书记随即要求益阳地委书记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益阳地委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将报告赶快写出来。8 月 11 日，《中共益阳地委关于处理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和《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公社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阳县委听取地、县委联合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后，县委常委会进行了 3 次讨论研究，写出《中共益阳县委关于迎丰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送地委和省委，并且对“迎丰事件”的当事人做出严厉处理。

匡爱国是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定罪法办。黄月藻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追究刑事责任，定罪法办。张锡祺，开除党籍，撤销社长职

务，工资降一级。周建秋（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武装部长），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廖长生（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降一级。廖伏生（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撤销监察委员职务和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职务。9 月 10 日，匡爱国、黄月藻二人被捕入狱。

9 月 12 日，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共 510 人，浩浩荡荡再次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击”。10 月 14 日，益阳地委向县委发文，提出对有关人员加重处罚。在原惩处基础上，张锡祺，建议法办；周建秋，建议法办；廖长生，下放劳动；廖伏生，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

11 月 20 日，益阳县人民法院在迎丰公社公开审理“以匡爱国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扑报复案”，认定匡爱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 7 年；黄月藻为反革命犯，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两罪并罚，判有期徒刑 10 年；张锡祺为反革命集团要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 3 年，交公社执行；周建秋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生产。

至次年 4 月底，“反击”调查组得胜回朝，战果如下：彻底铲除了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团，全公社三级干部清查出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粮食 316570 斤，人民币 118666 元。公社一级干部全部定罪法办和查办，146 个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 80 人，占 55%。1213 名生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 267 人，占 22%。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有 3 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64 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在“反击”中，全公社 1072 名干部党员，受处分的有 70 人，其中法办 23 人，党纪处分 31 人，行政处分 13 人，团纪处分 3 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击”战果，省、地、县委还成立了追根组，对凡是在 1963 年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去过迎丰的各级干部(大约 100 余人)，一律进行追查，写出交待材料，其中一些人在捕风捉影、上下株连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

1979 年 2 月，中共益阳县委和地委公开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凡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恢复名誉。

六个字的恶果　　严建设

全国热热闹闹迎九大，满城是如火如荼的游行队伍，人们扎搭着巨大的红旗葵花领袖像彩车，敲着喧天锣鼓，放开喉咙大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那年我 13 岁，一身臭汗挤在人堆里着急，恨不得立马长大，向毛主席献忠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去解放台湾和美国，救出世界上那些水深火热的人。美国人太可怜了，一年四季都要饭吃，还得挨鞭子。

那天夜里，圆大的月亮昏昏昧昧悬挂在西隅。半夜时分，我随游行队伍逛累了，也饿了，回到太平巷的家。回家以后，兴奋得睡不着，现成从父亲枕下抽出一本白皮《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来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上边一段语录使我刻骨铭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我一夜心潮澎湃，人五人六地朗读了一夜，天一亮，撒丫子飞跑到巷子拐弯处，用粉笔写下六个大字：“老子要打天下。”写完也就忘了，或者去荒郊野外拾废铁卖了，也可能和女生一起挖野菜去了。——那阵子似乎停课了。

过了一年，巷里来了一帮工宣队，其中一个跺脚大叫：“这是一条反标！妈的这儿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太平巷里不太平！”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分局来了一伙穿蓝警服的，支起老式照相机，乱拍一阵走了。我吓得要命，做梦也没想到，老牌革命导师的思想居然能成反标。后来的我，真像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巷中游荡。

秋季复课后，我进了西安市 20 中，还当了军训干部，脖子上吊着铜哨子，经常胸脯挺得高高的喊队。后来我把反标一事给一个铁哥们说了，几天后，居委会开会，说有人举报我写反标。我被弄到派出所，

指导员亲自出马，审了一晚。我既瞌睡，又害怕，捱到天明，感到赖不过去，不如缴枪投降，坦白交代，于是写了一份检查，按了十几个红指印，心惊肉跳地回家了。

从此，同学们都叫我老现——老现行反革命。军训干部不用说是当不成了，班主任自己为了入党，经常组织同学批判我。我自己也愧疚得要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思报答 13 年来的党恩，打什么天下？我于是拼命干活，那阵子成年累月学工学农学军，搞政治大批判，开会宣传反修防修，拔麦茬烧战备砖，挖防空洞，野营训练。由于我写检查太多，语文很出色，还写得一笔好字，在学校办了 4 年零 7 个月的黑板报。

那时开我的批判会，先是突然有个粗大嗓子的女生领唱语录歌，所唱大多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然后有同学跑到讲台上，把粉笔折断，横着写下"要斗私批修"。这时那位 6 门功课不及格的班干部严厉地说："大家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 23 面。"那段语录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那一节。大家朗读完语录，班干部厉声叫我站起来。我站起身，娴熟地从腰里摸出一叠检查，用沉痛腔调宣读，之后几个同学低着头揭发批判我。

我有个强烈感觉，凡批判我的同学不久就会入团。当初出卖我的那位，是我学生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光荣地当上团支部书记。我感到自己像被一头阴险的野兽冷不防粗暴地一口咬死，尸体还被同类残酷地蚕食，我的痛苦成为他们政治生命的营养。那段时间，我变得暴躁而自卑，同学们用戒备的眼神盯着我，经常谩骂、殴打我，没人跟我玩。

下乡前，我噙着泪水回首往事，极为伤感，最大的遗憾是积极了 4 年竟没入团，也没打过篮球。篮球是一个集体体育活动，全班同学几乎全和我不自觉地划清了界线，我与谁打球呢？我常做恶梦，梦见凶兽，饿狼或老虎，奇怪的是，这些猛兽偏偏追咬我，任怎么躲都不行，一直把我咬醒，吓得我一身冷汗。

王家滩的严打　　泯　民

这一天，王家滩公社举行落实公安六条严打公捕大会，公社书记谷志高作了《王家滩人民热烈拥护公安六条》的简短讲话之后，皇大炮便高声宣布把现行反革命押上场。他们分别是，一善桥大队贫下中农杨四，七角碑大队面相女大师易观音，汪家塘大队副业大队长钱光禄，月儿坝大队光棍何其聪。接着，皇大炮向大会宣布四名现行反革命犯的"恶毒攻击"罪行。

杨四，男 27 岁，未婚，贫下中农。该犯奉一善桥大队委派，领了钱和粮票去邑川城购买毛泽东石膏头像。因杨是童身，所以才被选派去迎请毛像。杨购了七个毛像，一大六小，一个大的将由大队供奉，六个小的由六个生产队供奉。如何将七座头像迎请回家呢？杨四去商店买了三米鸡肠带（一种用棉线织的筷头宽的带子），将七座头像的脖子拴起来，左右肩各吊三个小的，手里提一个大的，就这样走在大街上。邑川城的人见了无不目瞪口呆，立即将杨四扭送公安局。

易观音原名易枝花，中年妇女，自称凭人的面部长相即可判断其过去和未来，好比观世音转世，故而号称易观音。有一天，易犯在顾客面前卖弄相术，公然以林彪的长相为例，说林一对官刀眉，这是凶眉，一个鹰勾鼻，这是奸鼻，一幅尖下巴，下场不好，这幅长相，完全是奸臣像，不会有好结局。易观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是企图搞乱无产阶级司令部，用心实属险恶，是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钱光禄，男，30 岁，中共党员。族谱规定，钱家近两百年的辈分字依次是承、先、启、万、世、光、华、照、乾、坤。钱光禄是光字辈，其下一代是华字辈。光禄 1958 年结婚，当年得一子，起名钱华泽。1964 年，老婆又生一个儿子，起名钱华东。两个儿子的名字，去掉姓氏字和辈分字，就剩"泽东"儿子。如此一来，就等于钱光禄生了"泽

东”，这当然也是对毛的恶毒攻击。

何其聪，29 岁，准富农分子，口齿不伶俐。生产队搞“三敬祝”，领呼者呼过“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群众接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何其聪却呼成“万臭无香！万臭无香！万臭无香！”领呼者呼过“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群众接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何其聪呼成“永远吃糠！永远吃糠！永远吃糠！”红卫兵负责人让何单独再呼一遍，仍然是连呼三个“万臭无香！”和三个“永远吃糠！”纵使先天口齿不伶俐，也不得在“三敬祝”上出现大不敬，定为恶攻罪。

——

补白：程世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期间，一言九鼎，炙手可热，很多无辜者死在他手下。1968 年，他紧跟形势，取悦中央文革，在江西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以逼供信开路，不到一个星期，五千多人被逼自杀。万年县大黄公社卫生院有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被革命群众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惨不忍睹。不少地方搞“民办枪毙”，仅瑞金县，两天之内就枪毙了 120 多人，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11 岁。全省被打死、逼死 2 万多人。思想犯李九莲、钟海源、吴晓飞等，都是在程亲自定案后被枪决的。程世清的最后被惩处，不是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而是因他是“林彪死党”，诬陷许光达同志，构成诬告陷害罪，又因“情节较轻，“免予起诉，予以释放”。他头上的乌纱帽与其治下百姓骇人听闻的死亡竟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对这些政治元凶总是算政治账，而不去算人命账？难道那么多的人命就不是政治账吗？

——

同号五犯人　　亦　然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地 29 号的号子里关 5 个现行反革命。一个姓陆的中学生，大串连上北京听了江青讲话，回来拿捏着江青的腔调和手势，扭着屁股说：“大家知道吗？我的臀部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是工人修补过的！”被抓。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万古山脉中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 100 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里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一个姓罗的，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当然是严重的“恶毒攻击”。

一个姓牟的青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买回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这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人们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

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这也反革命罪。

有一次，姓牟的问姓洛的：“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我的老师和同学　　怀　人

教我们音乐课的赵老师，白白净净，温文尔雅，是 50 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赵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大家爱戴，可是文革不久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

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我也去了。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赵老师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急哭了。折腾了几天，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教语文的张老师，有一天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这小说大家都没看过，不知道写的什么。人家说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容辩解的。张老师被抓后，公检法下发材料，让老百姓进行民主讨论、民主判刑。材料后面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大家据此认定张老师必死无疑。

张老师的爱人（是我们村的人）抱着一线希望，哭着跑到会场，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讨论的结果上报后，张老师还是被杀，不过不是立即执行，是死缓。一个住队干部说，死缓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搁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犯人早就枪毙了，哪有死缓一说，说得大家都喊起“毛主席万岁”来。

范同学比我高一级，属于保守派。造反派对头是一个姓王的同学，瘸腿，满脸横肉，飞扬跋扈，凶恶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学心血来潮，在一张纸上写道：“同学们，听我言，不要跟着老狗转，要好好听你爷爷的言。”老狗指王瘸子，爷爷是范自称。

王瘸子的一个奸细立即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密。告什么？那张报纸上有一篇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范同学写的“老狗”二字与“毛主席”三字连在一起了。这案情实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为了自保，反而马上开会批斗他。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们下手更狠，将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又让造反派架去继续批斗。

群众专政之后，范同学被送交公检法。一个星期后，范同学疯了，嘴上老在说："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见是个傻子，也不抓了，说继续群众专政。斗来斗去，群众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属的生产队，让贫下中农继续专政。范家有人在生产队当干部，不久把他弄到煤矿当工人。他被安排看管一个废品库房，嘴里仍不时叨叨"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人常说，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会甜。有一次，一辆汽车倒车，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后面看，竟被汽车撞死了。死就死了，家里人也没说什么，叫司机买口棺材埋了完事。

我还有一个高年级同学，姓陈，那时刚开始批判刘少奇，但又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陈同学无意中在毛主席画像后面写了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了现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期间，陈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他八年刑。

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山沟老家务农，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候毛泽东已死了，如果毛没死，他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不仅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当官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不久就死了。

云南G市那个女孩　　马　驰

1979 年，云南边境战火未熄，我奉命到前线采访。由北京飞至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了，就会好些，我便马不停蹄，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离了昆明。达 G 市，再往南就要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找不到车搭，便在 G 市过夜。G 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街上有许多军人，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停在道边，人们谈话的内容大多也是关于战争的。跑了几家旅店，皆客满，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服务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给我们上菜时，每看我必笑。姑娘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她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时髦的漂亮，而像云南的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她随便一笑，就好像把世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了你，我真是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脸蛋红扑扑的，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

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是一笑。过去我见到的城里姑娘也许都太会说话了，装腔作势绕弯弯儿。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的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请她晚上下班后，到我们房间来，为她画像。娘娘的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用围裙擦着刚洗过的一双湿淋淋的白手，滚圆的小手被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我大笑起来，说："你

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我怔住了，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接着，她说出了自己的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我当了10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文革开始时，我6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我记得有一次，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后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爸爸这一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组织性强，文革初他们都被冲击过，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爸爸这一派的把柄，很难把他们搞垮。有一次，两派谈判大联合，爸爸这一派的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了。

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一派是反动组织，他们马上就垮了，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被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难免得罪人，有人就恨他，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他们越查不出问题，火气越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人家会说是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压力真是足足的了，可是没料到有一天出了这样一件意外……

那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写的是“打

倒毛主席”。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的推断有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他们的逻辑，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一派插手了，说是要协助公安系统侦破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我被内定为重点。他们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这反标。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搞我爸爸。当时我 8 岁了，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爸爸就教我，绝对不许说瞎话。我说不是我写的，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是说不是我。他们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用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 8 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 XX”，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批斗，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

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我被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阔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砰”的枪响了，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当”全栽倒了。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10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

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 8 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会好受一些。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我，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了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这时我才 19 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了，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有时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了，但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

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两位画家同伴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

补白：1970 年前后，社会上反革命标语突然多起来了，有时往往一个地方的反标案还没破，新的反标又出现了。有一天，居委会的一间女厕所里发现了反标，公安人员立刻把附近所有会写字的女人都集中起来进行排查。查来查去查不结果，又请来省里的笔迹专家，经过鉴定，认定这条反标是男人的笔迹，于是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附近所有会写字的男人身上。疑点集中到一个曾经有过流氓罪的男青年身上。此人曾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去女子浴室偷看女人裸体，行踪败露，被当场抓获，判了一年流氓罪，刚刚放出来。公安把他叫到居委会询问，一连几天他都死不承认，最后把他带进到派出所，单独审问，进去不久就招供了。他承认，因对判他一年刑心怀不满，就趁天黑跑进女厕写了反标。现行反革命，证据确凿，他再次被关进监狱。佟　平

——————————————————————————————————

小学同学郑成功　　刘　颖

文革开始，我们一千多人的小学组成几十个战斗队。我是雷锋战斗队的副队长，郑成功是小老虎战斗队的队长。那时不上课，整天打打杀杀，发传单，斗老师，开展革命大辩论。我们认为所做这一切都有党中央支持，一天到晚豪情万丈，斗志昂扬。

郑是的班长，游行时要带头呼号。那天上午，出了学校大门，我们就一路“万岁”、“打倒”地喊着。走了几里路，人累疲了，队伍也

开始凌乱，但口号照喊。已喊得声嘶力竭的郑，这时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同学们跟喊一半突然停止了，接着一阵宁静。

郑成功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错误——岂止是错误，简直是罪该万死，一下子乱了方寸，吓得面如土色，对着游行队伍连连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有罪，我有罪！”又急忙跑到队伍前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不停地忏悔，嘴里一个劲儿念叨：“我错了，我有罪……”但是，班主任也被吓得手足无措，背对着他，一声不响地躲开了。

没过几天，郑成功被宣布为新兴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主要罪状有三条：一是当众高呼反动口号“打倒共产党”；二是一次在墙上喷印毛的头像时，他揭开纸模，对着毛的头像开玩笑，说：“哦，原来你在这儿趴着呢！”三是一次在学校逮到一只小老鼠，大家要把它放在水缸里淹死，他说：“看看它能不能畅游长江。”当时全国所有媒体都在热烈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

他成了阶级异已分子，被学校开除，回家接受管制。几年后的一天，我排队买肉，看见他也在队列里。

冬瓜反标　　江　南

在全南县红卫小学读三年级时，我所在的城厢镇下圩生产队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县的现行反革命案。主办案件的领导是县公安局季政委，他女儿跟我同班，据说我这位女同学现在在赣州地区政府供职。

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生产队有一小青年想参军，因种种原因未被选上，闹情绪。一次，该青年趁给生产队看冬瓜之际，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等 19 个字。秋天，生产队收冬瓜，发现了这些标语。队长立即上报县公安局，季政委带人进驻下

圩生产队破案。季政委当时家住县粮食局，跟我们生产队的民宅实际上只一墙之隔。

文盲除外，全队男社员（包括我父亲在内）全部集合到队部进行审查、询问。刻字时冬瓜还很小，如今冬瓜已经长大，字迹已变形，破案难度很大。男社员天天到队部接受审查，也不用出工。有一次午饭，我家隔壁一个小青年跑到我家，用打抖的声音对我父亲说："他们破不出案会不会乱抓人？"我父说不会的。后来事实证明，不是这个小伙子干的，他还因祸得福参了军。午饭时母亲问起这事，父亲镇定地说:"在队部大家写字时手打抖,说话时声打颤,查出来要判好几年。"

记不得过了多久，案子破了。那个小青年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收听敌台广播罪被判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总共刻了 19 个字，判 7 年，7 年共计 2555 天，平均一字判 134 天。

农场里的故事　　汪　辉

农场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一天早晨，广播里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一个单身职工接嘴说:"祝我身体健康呀,我还没起床呢!"同宿舍的人立即举报了他，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乡放影队到村里放革命样板戏电影，照例先放一个新闻纪录片。有一次，由于疏忽，片子放倒了，有人马上站出来大喊："快抓住这个现行反革命!"此时放的是毛主席接见外宾。于是，基干民兵立即把放映员带走了。

那时流行到处写标语，一个会写大字的人经常被安排写农场领导圈定的标语。有一次他写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字就走了，不到半小时，一块"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 XXX"的牌子就挂在他的脖

子上了。当莫名其妙的他被带到标语面前时，他立即认罪不讳，原来把“万”字写成了“无”字。

每家每户都要张贴毛主席像。生产队汪队长头天接到大队通知，说是过年了，大队替每家配了一张毛主席像，要各生产队队长去公社的供销社去领。第二天，汪队长起个大早，借了大队的自行车，火速赶到供销社。足足有一大捆毛像，汪队长想把它们放在自行车后坐上，可是纸捆太滑，放上去又溜下来。汪队长一边继续往后坐上塞，一边自言自语：“岂有此理，还会捉到贼牯冒（没有）绳吊！”

不料这句话被售货员听到了，她立刻窜到生产队长旁边，一边抓住车子把，一边厉声喝斥：“你这反动派！竟敢说毛主席是贼牯！快来人啊，抓住他！”众人齐上前，把他扭到公社派出所。在各大队游斗一圈后，汪队长被劳教二年。

赶形势的牛老师　　旷　夫

牛学言师范学校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来边疆支教，分到某国营工厂子弟学校。他能写会画，一手美术字极为漂亮，学校就让他担任美术教师。有一次教学生写美术字，牛老师在黑板上示范几条标语美术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造反有理”，“打倒黑帮”，这样既赶形势，又能传授技巧。

同学聚精汇神，一笔一划跟着他写，这时下课铃声响了，牛老师说：“现在下课。”不少同学高声喊道：“我们还没有写‘打倒黑帮’哪！”牛老师顺口说“那就不要打倒黑帮了”，随手把这最后一条标语擦掉了。有个同学脑瓜灵，立即喊道：“牛老师你反动！”在场的同学先是一楞，再一想，觉得牛老师的话就是有原则问题，于是很快反映到学校工宣队。

牛老师再也不是老师，而成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天天被批斗，

剃阴阳头，脸上涂墨水，半拉脸红，半拉脸蓝，鼻子尖用粉笔画白，头上顶着生炉子用的拔火筒，脖子上吊块黑板，上写“反革命分子牛学言”，背上披块麻袋片，上写“牛还想学人说话，反动之极!”左手提个破脸盆，右手拿着烂扫帚，边走边敲边大声喊:“我是反革命分子牛学言!”

牛老师本想赶形势，不料被形势赶了。

————————————————————————————————————

补白：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天用长柄粪瓢浇菜，一下子没掌握好，泼偏了，粪洒到了菜地外。农民随口骂了句“狗日的，淋飚了”，不料旁边干活的人思想觉悟高，马上跑去向上级反映。这个农民遭殃了，罪名是公然辱骂敬爱的林副主席。

————————————————————————————————————

工宣队员的讲话　　草　庵

一次，学校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校的工宣队员是轮换的，每二个月换一批新人。这一批新换的是三轮工人。这些人来源比较复杂，文化水准很低，张口就骂街。在那个年代，骂街是革命劳动人民身份的标志，也是革命传统，不骂街的反倒成了另类。

今天主席台上坐着的是一位老三轮工人。一位革命同志念完文件后，领导就请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表态度。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相互谦虚退让，后来就决定由老工人代表先讲。老工宣队员看一眼台下，先往手掌里吐口唾沫，然后双手用力对搓了两下，拿起话筒开讲了:“日你奶奶的，既然叫老子先讲，老子就先讲，装什么洋鸡巴，老子没什么文化，但日你奶奶的讲几句革命道理还讲不坏，保证比那些装洋逼的书生强，咱大老粗就讲大实话，日你奶奶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直来直去，说日你奶奶的，决不会拖泥带水。”

老工人喝口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讲:“同学们，今天我们传达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个最高指示。日你奶奶的，你们知道啥叫最高指示？你们看这天高不高，这天咱够不着，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指示就比天高。”讲到这里，就见军宣队代表用力咳嗽了一声，并私下用脚踢了老工人一脚。老工人马上瞪一眼军宣队员，说道：“日你奶奶的，我一讲毛主席，你就咳嗽，你是什么态度，还踢我！”

军宣队员回答说：“你谈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心得体会，不要老日你奶奶。”老工人一听，不高兴了：“日你奶奶的，我都日了一辈子了，咱这是革命本色，保持革命传统，谁说不行。”

军宣队员一阵脸红脖子粗，不再理会老工人。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插话了，对老工人说：“请您继续讲”。

老工人看了看大家，继续说道：“日你奶奶的，老子讲话就怕别人打岔，一打岔就坏事，把刚才讲的都给忘了。”说着扭头问军代表：“日你奶奶的刚到哪了？”军代表心里更气了，别着头，看也不看老工人，只说：“你自己想，我不知道。”

老工人又喝口茶，想了想说：“日你奶奶的，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呢？”说着挠挠头，猛一怕桌子：“我想起来了，我刚讲到日你奶奶的毛主席……”

老工人话音未落，全场一片哗然。这老工人竟敢当众“日毛主席的奶奶”，这可是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只见老工人刚想继续讲话，那军代表一个健步就从边上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把将老工人拖倒在地，大声疾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 XXX！”

老工人也毫不示弱，站了起来：“日你奶奶的，我啥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军代表一把又将老工人推倒在地：“你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老工人一脸的雾水：“我说啥了？我啥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军代表一脸正气：“你说了，你刚才说了。”老工人还是不服气：“我刚才说啥了？”军代表说：“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是不是你说的？”话一说完，军代表感到不对劲，忙解释说：“我刚才是重复反革命分子 XXX 的话。”说时迟，刹时快，旁边的几位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全都站

了起来，分别将二人都扭了起来，当众宣布：“现在开始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 XXX 和 XXX！”

——

补白：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教师和学生翻阅。到了一九七〇年，那本资料竟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年九月，莫定钦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宣判二十年徒刑。该校两位教室写信抗议，为莫定钦鸣不平，被判劳动管制两年。

——

刘少太可案　　福　生

我们是闽北革命老区的一个小县。那时全国正铺天盖地大贴千篇一律的标语“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而且刘少奇三字要颠三倒四地写，奇字还要拆成“大”和“可”，歪写着，以此表示对刘少奇的阶级仇恨。

一九七零年前后，全县小学停课，全体小学教师按学区集中到某个大队学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期三个月。我们学区有一位年轻男教师，三十岁左右，会写一手好毛笔字，学习班贴的标语都由他写。有一天写到“大可”时，因墨汁太饱，不慎滴下一滴，不偏不倚落在“大”的下边——“大可”成了“太可”，于是有人把这条标语念成：“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太可……”太可什么？当然是“太可惜 ”了。

哇！打倒刘少奇，你感觉太可惜了？不小心滴下的一滴墨汁，瞬间变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同情刘少奇，是保皇派，是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更加上此教师出身地主家庭，更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军宣队成立专案组，处理此案，最终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这位教师的妻子也是一位教师，因丈夫被戴上“现反”帽子，夫妇俩在军宣队专案组撕心裂肺地抱头痛哭。

——

补白：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被县军管会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一九七〇年六月被枪毙。

————————————————————————————————

银川冤狱　　宁　屯

一九七〇年二月，银川市破获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小团体。成员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因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边写了“放屁”二字，被定为“恶攻”罪。其他十二位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论政文章。

其中一位叫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〇届毕业生，撰写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一文，称法西斯主义“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打倒法西斯！”

公审那天，人口仅三十万的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成员的公开宣判。集团案同案犯之一的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此案牵连的东北工学院毕业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消声行刑　　金正月

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
枪毙了。

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予以割喉这一“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至一九七五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他们因刘少奇而死　　佚　名

刘少奇被打到后，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淳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受刘少奇冤案株连被判刑，被枪决的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被枪杀。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锺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说“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查。他继续坚持己见，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称："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为此，张志新成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被割喉枪杀。

搞雕塑的蔡大哥　　曹白瑞

南京贡院街上大多是平房，二层楼有两三座，四层楼只有一座，我们叫它"太平洋"。老人们说，这座四层楼解放前是太平洋旅社，只有达官贵人、商贾戏子才住得起。迎街的一面，延伸出的小阳台，非常雅致。后来，太平洋改为一家国营大厂的职工宿舍，住有七八十户人家。大人几乎都穿帆布工作服，左边的口袋上方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米黄色字。孩子们也有别于贡院街上的其他孩子，很有优越感，觉得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后代。

太平洋和我家一溜边，只隔两个门牌号，我有好几个要好的同学住在里面。我常去他们家串门，进进出出，算得上是半个太平洋人。

太平洋里有个白面书生，姓蔡，我们都叫他蔡大哥。那时他大约二十三四岁，瘦条条的，头发很长，梳理得一丝不乱，有时还打发蜡，油光光的，很有派头。蔡大哥戴一副黑边框眼镜，平时很少说话，显得文绉绉的，整天好像都在想着什么。蔡大哥比我们这群孩子大十多岁，我们一见到他就直着嗓子叫"蔡大哥好！蔡大哥好！"一般他只是出于礼貌，朝我们微微一笑，并不搭理我们。蔡大哥那时在城南一家工艺制品厂当工人，会画画，会写美术字，有时居委会请他写标语、黑板报、喜报什么的，他从来不拒绝。贡院街上贴的好多标语、喜报，还有挂在居委会门口的黑板报，大多出自蔡大哥之手。我们小孩子都熟悉他那如松枝般遒劲的字体，看了后都会说："这是蔡大哥写的。"

大约在 1968 年下半年，贡院街上忽然兴起一股木刻风，用三夹板刻毛泽东像。先把毛像模子拓印在三夹板上，然后用钢锯条打制成的刻刀刻制，刻好后再在作品上涂抹墨汁，像盖图章一样印在纸上，一幅木刻毛像便告完成。我们贡院街上的小孩子无师自通，几乎个个会刻，还经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模像样地交流各自的木刻作品，看谁刻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

蔡大哥不搞木刻这种小玩意，他搞大的，用油泥或石膏雕塑毛像，结果一举成功，轰动了一条贡院街。他就在他家门口搞，有时也在太平洋门口搞，从胚子开始，用雕刻刀一刀一刀精雕细刻，还时不时停下，一手托腮，左看右看，嘴里自言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然后再细细地下刀，直到成像。我曾多次在太平洋门口驻足，观看他用油泥雕塑毛像的全过程。我也看过他用石膏做成的毛像。蔡大哥雕塑的毛像确实好，半身像线条生动，形象逼真，全身像英武豪迈，栩栩如生。我总觉得，这一尊尊毛像可是凝聚着他对领袖的一腔忠诚和满腹爱戴。

有一天晚上，太平洋里和我玩得最好的玩伴小泉约上我，带着各自刻制的一幅毛像，一起冒冒失失地到了蔡大哥家，请他直接“面批”我俩的木刻习作。他接过我俩递上的习作，大致看了一下，摇摇头，毫不客气地指出好几处明显的“败笔”。他说，搞艺术的，首先要懂得用情，比如雕塑，木刻，要刀刀用情，刀刀见情，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也才能流传开来。他又当场教了我们几招，如构图的合理布局、刀法的具体运用等，还在一块三夹板上演示一番他的刀功。他那熟练的动作，流畅的刀法，让我和小泉看得啧啧称奇，惊叹不已，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

这以后，我按照蔡大哥教我的几招，很认真地刻制了几幅毛像，真的感觉自己进步了许多，至少是学会了“刀刀用情，刀刀见情”。有两幅毛像作品，我认为是我刻得最好的，郑重地将它们印在我的小学学生成绩单空白处，用以永久保存，居然一直保存到如今，成了那个年代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记。

可是，没过多久，蔡大哥因为雕塑毛像出了大事。消息如同惊雷，在贡院街炸响，人人震惊，个个不解。原来，蔡大哥有一天在厂里用脚将他所雕塑的一尊毛像踩碎了，被人告发到“公检法军管会”，于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一年。

我不相信我们的蔡大哥会是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青年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刀刀用情，刀刀见情”的青年怎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可是他却被实打实地定为现行反革命，名字和罪状都上了南京市遵义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一张张白底黑字的布告，就贴在我们贡院街上，就贴在太平洋的大门口，刺人眼目，令人惊愕。

一年后，蔡大哥被放了出来，我们又在贡院街上看到了他，还是瘦条条的，只是面色惨白，显得很憔悴，还是头发很长，只是乱糟糟的，好像从不梳理，还是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只是眼神散淡，怯生生地看人。

我常常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看着蔡大哥瘦削的身影，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这就是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青年吗？这就是那个“刀刀用情，刀刀见情”的艺术青年吗？是谁，夭折了他的青春？是谁，断送了他的前程？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也没有人来回答我。

1979 年夏天，我被组织上选调到刚恢复不久的法院工作，正赶上了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无数在那个特殊年代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被宣告无罪，被洗刷罪名，被平反昭雪。我阅读了大量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卷宗，一本卷宗就是一个人的悲剧，一本卷宗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本本卷宗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一本本卷宗像火一样烧灼着我的心。在我面前，一本本卷宗就是一颗颗蒙冤受屈的灵魂的悲伤哭泣，一本本卷宗就是一个个蒙冤受屈的人们的愤怒控诉，而在那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的蔡大哥，是我们贡院街搞雕塑的蔡大哥。

月亮惹的祸　　蔡勋建

那时袁修广是县文化馆的干部，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非常熟悉农村生活，精心创作了一出地方小戏《牧鸭会》，主题是农村女青年不顾父母反对，冲出陈旧观念的束缚，与一个看鸭的青年自由恋爱、结婚。《牧鸭会》获得很大成功，激起袁更大的创作热情，接着又写了剧本《黄莺过岗》，故事取材于我县东山乡一带的范家岭，主题是反对浮夸风，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民生活。

1966 年 7 月，袁修广被开除公职，其妻邹氏也被供销社清洗，双双遣回原籍新建乡曙辉村管制劳动。袁修广有两大罪状，一是他的《黄莺过岗》有一句台词，“吊锅子里煮月亮”，讽喻农民贫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二是他主编的《沱江文艺》，其作者有不少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袁也出身于地主家庭，于是造反派说刊物成了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的狗崽子窝。

1968 年，《沱江文艺》被定性为反革命刊物，袁修广则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逮捕，判刑 20 年。袁修广夫妇育有 5 子女，最大的七八岁，最小不满一岁。丈夫入狱，妻子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就在袁修广被押往沅江监狱之际，其妻邹氏拦住囚车，眼泪汪汪地要丈夫在协议书上签字。虽然如此，袁妻仍被视为反革命家属，其子女也仍然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家 6 口，只有她一人劳动，无论如何无法坚持，最后只得把三女儿送给人。生活仍旧无比艰难，一天，邹氏来到注滋口的渡船上，待船到河心，她纵身跳下寻死，所幸当即被同船的人救了上来。

1979 年 1 月，袁修广平反获释。11 年后再回县文化馆，当年那个潇洒倜傥、朝气蓬勃的小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成天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呆子。馆长段松筠与袁是老同学，有一天，看到袁

失魂落魄的样子，段亲切地叫一声“袁修广”，他竟马上起立，毕恭毕敬地回应一声“到!”然后低头，弓腰，立正，俩手垂膝，完全一副囚犯模样。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刘恒柏将自己创作的小说《蜜祭》送给袁修广看，说敬请袁老师指教。袁迟迟疑疑不知该不该接过来看，既看，又说不知政府同不同意发表。1979 年下半年，文化馆派袁修广随刘恒柏、肖金城、刘建新到湖北秭归王昭君故里出差，其他三人在穿戴上都费了一番心思，袁修广穿的却是监狱里发给他的囚衣，只是上面没有字号。

袁修广先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1998 年 7 月 16 日，袁先生久病不治而逝。时值炎夏，全县人民正在防汛抗洪，我听到噩耗，从抗洪大堤请假赶到文化馆。灵堂前，与袁老师同事多年的刘恒柏先生满怀深情地给袁老师作了一副挽联：“从戎习文，从教为文，名以文立，灾以文临，千锤百炼牧鸭会；著戏钟情，著文倾情，生以情重，死以情别，万缕千丝凤凰篇。”追悼会上，我代表所有学生和文学业余作者作了题为《长风，卷走一片落叶》的即席悼念发言。我噙着眼泪说：“不是落叶的时节，您却霍然凋零了，不是起风的季节，您却被一阵倏然而至的长风卷走了，您像一片落叶在昏暗的天空无奈无助无望地翻滚，翻滚，不知您将流落何方……漫漫黄泉路，何处觅驿馆？袁老师，您走好!”

——————————————————————————————————————

补白：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便于七〇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念名单，念一个名字，下面马上就揪出一个反革命，按成喷气式，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此举后来导致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张春桥当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徐，让他担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

白老师的师道　　马　克

事件是由一支“手枪”引起的。大家都玩木头枪，同学李志平有一支可以射出子弹（黄豆之类）的枪，当然就非常牛逼了。李志平獐头鼠目，其父是附近空军基地雷达站的站长，值班时被战友击毙，于是志平成了烈士遗孤。我班四五十名同学，李志平就怕我一个，手里有了枪，他不怕了。我想看看，想玩玩，不行。一番抢夺，枪已在我手。由于兴奋，我推弹上膛，举枪便射，黄豆打在教室后墙马恩列斯毛像的毛像左下角。

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压根儿没打着毛像。事过很久，李志平向老师举报。老师姓白，上海人，空军家属，长得对得起她的姓，白白胖胖，个不高，一口我们都听不懂但普通认为很好听的上海话。

打毛像的举报立即引起白老师高度的阶级觉悟。本来她很喜欢我，班里组织文艺活动、出板报，都交给我，可是在大事大非面前，白老师首先选择自己要安全。当时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在排练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饰演杨伟才。同学道亮，回族人，长得像阿尔巴尼亚人，饰米国顾问。我最喜欢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儿，演阿妈妮。排练已近尾声，衣服、道具都已由学校出面借妥，即将到空军基地、镇上会演。李志平一举报，杨伟才演不成了，班级、学校开始批判我。李志平成了活跃分子，带头揭发，同学们也都一反常态，生怕与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沾边。

那时我家刚被定性为漏划地主，我又成了少年现行反革命，一家老小的命运一下变得岌岌可危。白天我在学校挨批，晚上没文化的父亲在街道挨斗。

李志平实在太“有才”了，指着我的鼻子，让我交待如何画军用地图，又是如何把军用地图交给苏修的。打毛像是蒙太奇，军用地图就蒙太奇得更离谱。我想，一定是身边的小兄弟，比如道亮之徒，出

卖了我，否则李志平怎么知道我画地图？白老师相信了大家的揭发，让我交代画军用地图的问题：“马克！我告诉你，你的罪行可大可小，就看你的态度了！你天天放学就跑到你家附近的大坝上，爬上树画对面机场的军用地图，连多少架飞机、多少个机窝你都详细画在地图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不掌握？同学们眼睛是雪亮的！快说地图哪去了？交给谁了？”

地图？没画过，画坦克、飞机、大炮倒是我的最爱，可是说了她不信，也没人信。运动后期，事实终于查明：李志平说了谎，是诬陷我。一俟形势平静下来，许多同学都讲了真话。起初道亮把阿尔巴尼亚脑袋摇得十分有力，坚决不承认出卖了我，但抗不住我咋唬，点头了，地图案是他密告的，他害怕白老师说他跟我分不清阶级立场。有人证实，那天我只把黄豆打在了伟人像下的白边儿上，不是脸上或衣服上。

——————————————————————————————————————

补白：1967 年，全国刮起请领袖像风，家家挂毛像，《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一天早上，弟弟到大院的公厕“出恭”，人在茅房蹲，心在外面飞，因为小伙伴喊他去学校呢。弟弟匆忙起身，裤兜里的红宝书不慎滑出，落入茅坑，丝毫没有觉察，大声应答着跑了出去。一会儿功夫，有人发现茅坑里有《毛主席语录》，立即向派出所举报。不一会，民警来了，弟弟被叫回，十岁的孩子，单独隔离谈话，让他承认是故意扔下去的。弟弟虽小，但父母从没教过他撒谎，坚决否认故意。民警进一步询问老师和邻居，调查我家的政治背景。父亲的老八路经历似乎为弟弟减轻了一点罪责，民警告诉学校，给这学生记过一次。为加入红小兵，弟弟去新华书店重新“请”回一本《毛主席语录》，没有用，他的迫切愿望最终成为泡影。如今已是副教授的弟弟，提起当年事，仍然对那个民警耿耿于怀。

——————————————————————————————————————

三十年的上访　　汉　风

江西定南县人李月新，天生残疾，9 岁上学，14 岁下放，小学未毕业。其父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抗日战争期间打过日本鬼子，后来被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民公敌、历史反革命。

文革期间，李月新以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罪名是收听台湾当局的广播。在狱中，李坚持认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想到哪里生存都不算犯罪。狱方认为他立场反动，继承了家庭的反革命衣钵，并向同监犯散布反动言论，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李月新案是一个集团案，首犯是容某，主犯是樊某，李月新与郭某和练某则是同案犯。起初该案被定为台湾特务案，后来改为现行反革命团伙案，再后来查无实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 1979 年 6 月 10 日被改判。同一案子，改判的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改判为无罪释放，有的却被定罪判刑，李月新就是被定罪者之一。有关部门对这种荒谬判决给出的解释是：政策性的反革命案，可改可不改！

如此不公的判决，李月新不服，几十年来一直不断上方。有关部门指责他有精神病，他说："我没病，是你们有公安职业病。"李月新究竟写过多少申诉状，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大约没有一尺也有八寸高吧"，但所有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8 年 9 月 26 日，李月新的冤情在国家信访局网站被公开，次日转赣州市信访局，同日转定南县信访局处理。10 月 21 日，定南县法院接访，但称找不到案卷。李月新再次上访国家信访局，2009 年 2 月 28 日国家信访局再次将李案作为网上公开案例。3 月 11 日定南县信访局给李月新一个答复：当初对他的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属处理适当。请你停访息诉。"

大墙内血案　　俞加深

这天中午，大队都出工了，个别犯人在院子里干杂活，一个叫王大力的中年犯人偷空在墙角吸烟。此时在几米高的监狱大墙上站岗的，是人称愣头青的狱警班长。愣头青班长有个特点，嫌站岗闷，爱找下面的犯人唠家常。

他问王大力姓啥叫啥，王大力有气无力地答道："王大力。""不是叫王八蛋吧？"他开始戏谑他。"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班长嘿嘿一笑："这有啥？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没一个好货！"又问："你啥成分？"

"富农。"王大力如实回答。

"你犯的啥罪？"

王大力是反革命犯，但他觉得这些当兵的素质极差，不值当好好回答，便顺口一说："强奸罪！"

班长更觉有趣，急着追问："你强奸的女人是大闺女还是小寡妇？"王大力觉得有些厌恶，问道："你想听什么？"马上又灵机一动："既不是闺女，也不是寡妇，是个当兵的老婆。"

"好小子，你还真会搞阶级报复，你可知这是犯破坏军婚罪！"迟疑一下又问："那当兵的当的什么兵？"王大力呵呵一笑："和你一样，是个军垦兵，也在农场看押犯人。"

愣头青似乎听出了话外音，怒斥道："混蛋！你在变相骂人，真是胆大包天！"

王大力装得诚惶诚恐："报告班长，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给你逗乐呢！"

愣头青班长越想越不对劲，急忙端起步枪，拉上了枪栓，喝令王大力："你给我滚出大门来！"

王大力也觉得自己闯祸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在警戒区，班长也奈何不了他，便说："报告班长，我没出警戒区，你当然不会开枪。"说着慢慢向院子中间退。

愣头青见他想溜，便将枪口指向王大力，想吓唬他，不料冲动之下，二拇指一勾，砰的一声王大力应声倒下。子弹正好打在胸口，鲜

血立即涌了出来。愣头青班长慌了神儿，急忙放下步枪，从大墙外的阶梯上下来，一把拽开大门的铁栓进来了，慌慌张张拖起王大力的大腿就往大门外拖。

“不许动！你再敢挪动我就要开枪。”大门口值班室的任队长握着枪从后面对着愣头青。任队长是老革命，刚才那一幕他看得很清楚。他果断地命令愣头青：“不得将犯人移动半步，必须保护好现场。”并命令愣头青上大墙取回自己的步枪。片刻，愣头青取回步枪，任队长接过来，抗在自己肩上，命令愣头青进值班室等着。

任队长又大声喊来牢里的犯医等人，还叫旁边厨房的犯人用土坯在王大力周围画一个圈。部队连长听到枪声，也带着两个战士赶了过来。

老犯医蹲在王大力身边，摸一下他的脖子，又翻了翻他的眼皮，报告说，没救了，便找一块草帘子盖在尸体上，等候上级处理。很快，愣头青被铐上铐子，押往团部。

——

补白：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想搞出点成绩升官，把自家狗打死，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该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最后声称揪出一个 16 人的反革命集团，导致一人被枪杀，2 人被打残，自缢身亡 2 人，受株连者 115 人。

——

作协里的反革命　　刘亚伟

侯金镜、冯牧都是《文艺报》的副主编，1968 年初同时被打成现

行反革命。两人秉性耿直，有一次，侯金镜指着墙上毛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大人们的这些谈论，星星点点被未成年的孩子们听到了，于是也学着大人在小酒馆里关心起国家大事。隔墙有耳朵，这些小孩子被抓去严刑拷打，“供出”了侯金镜、冯牧，还有电影剧作家海默、画家刘迅，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作协的革命群众召开大会，批斗侯金镜、冯牧。

批斗会当晚，侯金镜回家喝了一瓶敌敌畏。我那时和侯金镜隔一个单元，第二天一早，听到呼喊声，我和几个人上到侯家，抬他去医院。侯金镜已经奄奄一息，翻着白眼，大小便失禁。我抬的正好是他的臀部，弄得一手脏。好在那敌敌畏已过期，毒性减弱，经过洗胃抢救，幸免一死。3 年后，侯金镜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 40 度的阳光下担着沉重的粪桶，当晚因脑溢血昏迷，被同屋人发现，次日晨辞世，匆匆走完仅仅 50 年的人生。此时离林彪事件的爆发仅仅 1 个来月。

批斗冯牧时，作协有个刚毕业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动手打他耳光。后来在五七干校，二人正好同屋，此时那年轻大学生已被打成 516 现行反革命。冯牧原谅了这位年轻人，根本不提这事儿。冯牧复出后，那位年轻人在外地工作，所在单位来人外调其文革中的表现，并指明了解他是否打过人。冯牧明确地为那位大学生作了辩解，外调的人也找我了解情况，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说了类似的话，最终没有影响他的提拔。有一年冯牧要去那儿，主动给他写了封信，可没有接到那年轻人的回信。

作协另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是《人民文学》的女编辑冼宁，解放前夕北大毕业，参加过抗美援朝。1962 年冼宁在《人民文学》写了一篇童话《小黑点儿》，意在不要歧视有缺点的孩子，要相信在亲情友情的温暖下，有缺点的同样能够成长得很好。童话里写了一条咬过小豆子的毛毛虫，那毛毛虫的嘴边还有一颗黑痣。这就犯忌了！伟大领袖的嘴下不是有一颗痣嘛？冼宁的作品成为无可争辩的大毒草，恶毒

影射和攻击伟大领袖。冼宁一向开朗乐观，大大咧咧，就是不承认有罪，在黑帮窝里照样嘻嘻哈哈。

————————————————————————————————————

补白：1967 年的 10 月，我读小学二年级，亲见我的同班同学周进（8 岁）被打成反革命，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一次，全班同学齐声高呼“打倒刘少奇”，周进慢一拍，让大家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喊的是“打倒毛主席”。就这样，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押上台批斗，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黑纸牌，全校的师生齐声高呼：“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进！”批斗之后没有开除学籍，只被开除出“红小兵”。其父母都是贫农，也没受到太大牵连。笔者还清楚记得批斗两位校长的情景。他们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纸牌，陪斗的女坏分子脖子上吊着臭草鞋。姓蒋的校长比较潇洒，嬉皮笑脸的，姓李的校长则默默流泪。这样的情形已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永不会忘记，也愿它永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

补白：一何姓农民，有一次他说了句“社会主义是幽灵”，被住队干部告发，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辩解说，这话是一个大人物说，人家让他拿证据，他说记不清了。送进监狱没蹲几天，何某被放了，说是县上有位领导，看了他的材料，说《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话。何某虽被放，但不等于彻底平反，因为他说那话的场合不对，误导革命群众，而且马克思说的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不久，何某死了，父母亲悄没声就把儿子埋了。

————————————————————————————————————

杨继年奇冤　　廖亦武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 5 年，4 次逃跑，共加刑 14 年，累计刑期 19 年。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

中国人还不算很悲惨。本文的主人公杨继年，年仅 11 岁，什么都没偷，却被判 10 年刑，4 次逃跑，加刑 24 年，累计刑期 34 年。

当初是，杨继年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 10 年，全家七八口就都跟着成了“偷羊贼家属”，管制劳动 4 年。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天半夜，11 岁的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称他是反革命偷羊贼，关进牢狱，判刑 10 年。其判决书称：杨继年，又名杨志远，男，11 岁，内江县人，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

1963 年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 18 岁，推算回去，杨首次判刑时（1958 年）应为 13 岁。1970 年的加刑判决书称杨 21 岁，即意味着 1958 年进监狱时杨仅有 9 岁。不管是 11 岁、13 岁还是 9 岁，杨离成年都很远，都属于少年入狱。至于出现三个彼此矛盾的年龄，是法院渎职的明证，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明目张胆的残暴。

花样翻新的酷刑，死去活来的种种毒打，土手铐，几十斤重的脚镣，假枪毙，陪杀场，枪一响泼半脸半肩红白脑浆渣子，嘴里打麻药塞棉花，严防临刑呼喊“反动口号”，打断肋骨并撬嘴塞大粪以检验是否装疯，被关进惩罚小号，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长达四年！

杨继年如何能在四年小号黑牢后重返人世？也许全凭他 11 岁入狱练就的童子功。还有，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杨继年的即兴式“逃跑”吧：毫无预谋，从审讯室拔腿就跑。本来这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逃跑的行为，而完全是一种应该送医治疗的精神现象。但没有医生，唯有士兵“赶鸭子一般”追撵。“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该收场了！却不是，双方都兴犹未尽。疯狂了的杨继年继续喊叫着跳跃，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等杨继年舞蹈得力竭命尽，虚脱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嘻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

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写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怀念起《悲惨世界》的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举一动是何等绅士呀！

杨继年忘不了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 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警察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

这一去就是 34 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太自作多情了！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发财成了大富翁，还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的出狱只意味着生不如死的下半生的开始。

阔别 34 年后，杨继年回到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已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他残着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自证身份，村长不信，叫几个老人来确认，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

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

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

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

杨继年问：“你开玩笑吗？”

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

于是乡政府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

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到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

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经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左面的狗腿了。

当杨继年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时，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了，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

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小小的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成“上访作家”。“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 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

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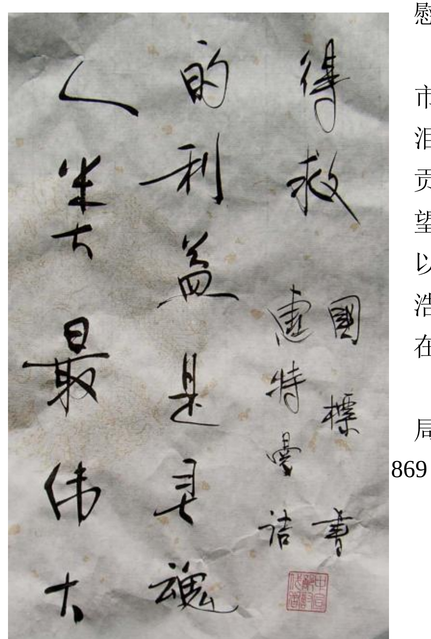
杨继年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严禁脱离农奴地位。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拿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

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 10 年，四次加刑共 24 年，累计刑期 34 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



“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 11 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

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

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 10 公斤炸药，10 支铜雷管，1 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

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

惠特曼语　　国标书　　　　　　充满诗意的巨著？！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基督徒的苦难观　　焦国标

本期《忆旧》收入五篇关于基督徒黑五类的文章。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的风景也很不相同。有些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充满野蛮、残忍和杀气；另有些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尽是安详、温柔和感恩。尤其是在遭遇人生巨大苦难的时候，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呈现的风景

更是全然不同。

在编辑《忆旧》的过程中，为故事中的当事人流泪是经常的，但是编本期《忆旧》中的《这个家是属于神的》一文时，其中一句话却给我带来想嚎啕大哭一场的强烈冲动。父亲因信仰被判刑坐牢，女儿因车祸致死，二儿子求保父亲回来操办丧事而不被允许，大儿子正逢博士毕业答辩，导师和领导们扣下了噩耗电报，以至于遭遇车祸人亡这么大的变故，家里却连一个主事的人都没有；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此时这个家算是背运到底了。大儿子答辩通过后，导师和领导才把电报和返乡的火车票交给他，此时他已赶不上妹妹的葬礼了。回到家，面对母亲，面对爸爸坐监、妹妹去世，他没有怨言，只说："主啊，虽然在人看来家破人亡！但这个家是属于你的！"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永远相信上帝的看顾，这是一个基督徒内心最深处的精神风景，代表了基督徒对苦难的极致性看法。

倪柝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学家，五十年代初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遭到污名化，称其政治上无比反动，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生活上荒淫无耻。对于这些指控，倪柝声不予辩解，他说："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每个人都有原罪，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因而"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之语，同时也意味着你们绝不比我更好。基督徒是罪人，诽谤、加害基督徒的人也是罪人；作为基督徒，遭遇诽谤、误解和各种苦难，是十字架的苦难，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养料，难以避免；牢狱之灾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不应逃避；自我辩解、自证清白等于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是拒绝"为主受苦"，是逃避"基督徒的荣耀"，是不应该的；最终的审判在上帝那里，尘世统治者给你的任何加害或平反，都是不必为意的。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王明道、吴维尊等基督徒却拒绝出狱，或如基督徒蓝志一，既出狱，子女再三苦求他向政府要求平反，他却始终不肯，即出于这样一种苦难观。1972 年，倪柝声死于劳改营，留下的绝笔是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

声。”

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每一个信仰群体所呈现的形态，都是各自观念之树、信仰之树历经数百千年风霜雪雨结出的一个果子。耶稣说过，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结蒺藜的不可能是无花果树，荆棘上也不可能摘葡萄。同理，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信仰群体的当下形态（物质文明、私德、公德和社会制度），可以认出该族群内心风景的良窳、优劣。

目　录

同院的桂　　戴为伟

我们几家合住这个小四合院。北屋住的一家被轰回安徽老家后，北屋就空了。不久，北屋住进新邻居，桂、她男人、婆婆和女儿。桂是机关后勤处的杂役，文革伊始，她由杂役而红卫兵而机关发稿组成员，修成了革命干部正果。桂，发面饼脸，一脑袋黑钢丝似的自来卷短发，棕红色镜架后面的眼睛，好像总是眯在问号里蔑视人。院里除我家之外，其余人家都在同一个机关里挣生活。自桂家搬来，原本稀松无事的小院，有了些暴风雨前的沉闷。

南屋住着地主婆吴姥姥。一天，吴姥姥的 9 岁外孙女去街西口副食店打酱油，被桂拦住，说："哎，给我带 5 分钱韭菜来。"夏天菜便宜，5 分钱能买 2 斤韭菜。一个多小时后，贪玩儿的女孩儿拎着酱油瓶回来，早把桂的韭菜忘到爪哇国。眼瞅着婆婆揉好面等菜调馅，肥胖的桂有些气不顺，叉腰立在当院发泄不满："什么点事儿！地主婆也想翻天了！"温良的吴姥姥原本坐在家门口等外孙女和酱油，这时只得拎起小板凳进屋了。

1970 年，我 6 岁。出生不到 2 个月的妹妹被送到街道托儿所，我只好被单独留在家里。妈每月 28 块钱的工资，供不起俩闺女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托儿所。小院里只有桂的闺女燕儿和我一般大，妈上班

前叮嘱我："别跟燕儿玩儿，她妈会不高兴的。"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可妈前脚刚迈出院门，我后脚就去找燕儿了。妈下班回来打了我："白天，不许出去玩！在家呆着!"我大声哭起来。妈的声音小下来："你再吵别人！燕儿妈最近有夜班了，白天得睡觉，你不能不懂事。还有，不要找燕儿玩，说了多少遍，听不进去吗？聋了吗？"看着妈手里的笤帚疙瘩，我糊里糊涂地点点头。

我记住了妈的话。妈上班去了，我敞着家门，拿着妈的钢笔，在有蓝白格子的床单上乱画。画完，自我欣赏一会儿，在床上蹦起来。咔嚓一声！咦？靠墙的床板怎么塌下去了？我趴到床下看，呦，一只床腿歪了。我使劲儿往上推那床板，可它吱吱哼唧了两声，却并不挪动分毫，只好又爬出来，气急败坏地哭了起来。

冯家妈妈过来问怎么了，我哭着告诉床坏了。不知怎的，这时桂的男人也站到门口了，问："床坏啦？"我哭着说："叔叔，这床，我不会弄。"桂的男人很兴奋，自告奋勇帮忙，说："我来。"我心里高兴起来。他一脚跨进屋，把床上的褥子都掀去。咦？他怎么穿着鞋上了我家的床板，蹲在上面看起褥子下面的那些信来？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翻看了好一会，这男人才站到塌下的床角边，一手抬床板，另一手扶直下面的床腿，然后说："好了，没事了，成了。"说着转身出了我家。

妈回来后，看着一床乱糟糟的被褥，问了问，皱皱眉："下回有什么事，等妈回来再说，不往屋里招人，好吗？"

妈为了让我老实呆在家里，给我买回一条石雕小鱼玩具，手指头那么长，能用鱼嘴这头吹出好听的哨音，我很喜欢。第二天，我拿着小石鱼去找燕儿。不一会，我就发现鱼头和鱼尾巴分家了。燕儿告诉我："我没有（石鱼)，咱俩一人一半吧。"我生气、心疼，找到在水房淘米的桂："阿姨，你赔我鱼，燕儿给摔坏了。"桂瞥了我一眼，端起锅往家走，我撵在她的胖屁股后面，手里紧紧攥着两半儿的小石鱼。桂开了家门进去，门在我鼻子尖前咣的一声关上了。

晚上，妈回家又打了我："让你不长记性！明天给你锁屋里，看你

再往外跑，自己弄坏了东西，还要别人赔，没出息!”我哇哇大哭着，听到桂正在院子里喊燕回家吃晚饭。

漫长冬季的白天真难熬呵，我站在被锁了门的屋里，把脸贴在门玻璃上，无聊地瞪着空荡荡的院子。看着看着，我感到有些困，头沉，勉强爬到床上，呜呜哭了起来。倒座房的吴姥姥往屋里看了看，开了锁，问我哭什么，又坐到床上，摸摸我的头，又看看火炉，说:“可能中煤气了，躺着，别动呵。”老太太往炉子里添块煤，封好火，敞开房门，走了。一会儿，小脚的吴姥姥把一只冒着热气的碗送到我嘴边:“喝了，孩子。”碗里，星星点点的麻油很亮，几根面条上卧着一个鸡蛋。那时每家每月只能买 1 斤鸡蛋。

妈不敢再把我锁屋里了。我又惹祸了，用捅炉子的通条戳碎了吴姥姥家的窗玻璃。吴姥姥骂我比野小子还能闯祸，说等我妈下班回来告我妈。我很恐惧，一顿打又跑不掉了。妈下班回来了，吴姥姥走过来，低声跟我妈说:“街道姜主任来了，问西屋老何家儿子搞对象的事，好像是桂到街道去了，说人家儿子耍流氓，搞男女关系。”妈不满地回应:“不就是欺负老何是右派嘛!”吴姥姥又说:“你还不知道哩，两年前，老何的妈就是她给告走的。老何家是四川的地主，又是右派，这可好，双料啊……”“是右派，怎么了？！右派人家的孩子不就搞对象？人家屋子那么小，还有个哥，都二十大几的了，后院里背静地儿和对象拉拉手什么的，我见过的，人家姑娘看见我还不好意思来着，有什么呀!”妈很不以为然。

“咳，我和赵奶奶跟姜主任说了，人家孩子是搞对象。老姜也说，既然桂去反映了，街道不能不来调查。这不是阶级斗争嘛，是提高什么警惕呗。咳，小何维搞对象这点儿事，桂先告到机关保卫处来着，人家没功夫管这闲事，这才又告到街道啦。哎，大伙多注意吧。还问你家哩，别往心里去啊。我回去了，你做饭吧。不要打孩子啊。”这一次闯这么大祸，妈还真是没打我。

那时候，院里各家都把入冬时卖来的几百块蜂窝煤，整齐地码在自家门口窗沿儿下边。一天，快中午了，我和燕儿蹲在西屋杨家窗沿

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捡来的小棍在地上乱画。燕儿突然想回家去拿新买的化石笔，起身的当口，碰到了身后的蜂窝煤，两摞煤块被撞碎在地上。看着碎在地上的，我担心地叫起来："呀，碎啦！怎么办？你也不看着点儿！"

燕儿看看我，看看碎煤块，不知所措，走了。燕回家没再出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反正不是我碰的，可还是有点不安，在院里溜达了会儿，也讪讪地回了家。

不大会儿，桂突然拉开了我家的门，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告诉你呀，赶紧赔人家煤，把人家煤踢碎了，还没事人似的！"

"不是我，是燕儿！"我争辩着。"你胡说！叫你赔！不赔，等你妈回来再说！"想到妈又会不明不白地打我，心里更急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桂竟都站在了我家煤垛边。桂继续斥责我："你不大个东西，撒谎，挺能的你，啊？！"

"是燕儿碰的！"我仰视着桂。桂贴得那么近，我已经只能看到桂粗壮的腰了。"你再嘴硬，你个小右派崽子！想翻天呐你！"桂咬着牙，手已经拧在我的小脸蛋儿上。"我让你个狗崽子撒谎！"又是一巴掌打过来。我只觉得上嘴唇热辣辣地厚了起来，下意识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湿乎乎的鼻血。"我今天替你那不懂人事儿的妈教训教训你！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桂那棕黄色的翻毛皮鞋也踹了过来。正吃午饭的邻居赶紧围上来劝，我小脑袋里嗡嗡的，只觉得眼前所有的人脸都变得特大，在晃。

"回吧，桂阿姨，您消消气。"吴姥姥嘴上说着，紧紧攥起我的小手，拽回家来。桂昂着下巴，甩手回自己家了。

不知桂为何经常上夜班了。我家隔壁原本是老何家的一间东屋，老何两口子去五七干校后，房子成了桂家的，桂下夜班后就在这间房里睡觉。我恨上了桂，见面不再叫她阿姨。有时，午睡的工夫，我不出去乱跑，而是平躺在自家铺板上，将两条小腿举得高高的，对着与桂家相邻的墙壁使劲儿踹，踹累了就换小拳头捣，捣疼了再换脚踹。墙那边睡着的桂也不再出来骂战，我暗自得意。

这一天，妈工休，又到了院里人午睡的时候。我乖乖地躺在床上，四合院的街门被木棍之类的东西敲得响了半天，也没人去开门。妈忍不住跑出去，拉开木门闩，桂那得过半身不遂的婆婆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进来了。妈关了街门往回走的当口，桂手上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从我家隔壁的房子里冲了出来："你想翻天呀，大中午的这么吵人！"妈一下转不过弯来，一边往家走一边解释："你婆婆叫门，我去开门的。"那跟在后面的老太太也急得啊啊地叫着。可桂不依不饶："你个右派小老婆，你和右派小崽子想翻天呐，我告诉你，只要有共产党在，你们永远也甭想！你们永远也翻不了天！"

桂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指着天："我告诉你，你和你的狗崽子只有被人民，知道吗？人民！踩在脚底下！"桂很忙活地用一只脚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两下。"妈生气了，说道："我是给你妈开门去了，你想想清楚，抱好你手里的孩子吧，孩子都听着呐，别把孩子再吓着，摔坏了。"桂听出妈冷嘲热讽的，更是气急败坏。赵奶奶出来说："为伟妈，进家去！"不愿惹事的妈就坡下驴进了屋。又告诉桂："小桂，赶紧扶你妈进屋吧，别再让她自己上街了。"

桂又去街道告状了，姜主任又来了，说："你们院里右派家属最近是不是很霸道？桂的工作很重要，上夜班审核稿件，错一个字就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损失，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事故。这可是国家大事，你们邻居要保证她能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地主出身的吴姥姥和成分不明的赵奶奶这时体现了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哪里是人家霸道，这院里就是这个桂……"

几年后，爸爸戴煌回来探亲，和妈去粮店买米，在街上碰到姜主任。老人很和气，问："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院子里？以前，桂老来告状，我们也不能不去问问。咳，她那个人就那样，早晚都会过去的，好好过吧。"1978年，爸回机关工作了，爸被选为区里的人民代表了。不久，机关改选党组成员，爸是候选人之一。一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一个同事和爸聊着："老戴，小桂以前你们住一个院子啊。哎，那天她还跟我说呢，你爱人带着孩子，那些年真不容易熬啊。她挺同情

你家的，她公公去世了，她悄悄把好些旧的棉衣、棉裤放你家门口。哎，你爱人都不动啊，她说你家里人可要强了。好多年不见了，她让我给你带个好，老邻居喽。”

1987年，机关院里盖宿舍楼。1988年，我家搬了进来，桂一家也搬来了。后来，爸退休了，桂和她丈夫也老了。桂有时会推着她那半身不遂的男人在院里散步，那眼光里蔑视的问号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信基督而死　　百　科

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名字Henry Nee，福建福州人。被主耶稣基督兴起后，中文名字改为柝声（柝，打更的梆子），英文名字改为Watchman（看守人），自比暗夜的更夫或看守。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父亲倪文修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母亲倪林和平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养女，早年入读上海中西女中（以英文水准高而著称的教会学校）。1916年，倪述祖就读于著名的英国圣公会在福州所办的三一书院，是该校一位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1920年，倪述祖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一位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来到福州传福音，其母林和平接受了福音，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倪述祖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也好奇地去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毅然放弃了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决心一生奉神，并且更改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此后几年间，倪柝声苦读《圣经》，同时博览了大约3000册基督教历史名著，同时与一批年轻人一起，到在福州附近白牙潭村隐居多年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从那里得到极大的属灵帮助。倪被她高深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

1949 年大陆易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工作，自己于 1950 年 3 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的数百处地方教会。1951 年 4 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在控诉大会上，倪柝声被“揭发”出一连串令人难以想象的罪名。政治上无比反动，1940 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圣经中顺服政府权柄的要求，还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欺骗政府，虽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来往，同情他们，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以及其他很多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特务等等罪名。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私通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没有头部）。

倪柝声对于这些指控不予否认，他常说：“我比你说的还要坏。”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诽谤、误解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益的，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自我白谤、自我辩解）。1980 年代出狱的基督徒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牢狱之苦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1971 年 11 月 7 日，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 年 6 月 1 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逝世。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2009 年 7 月 30 日，在倪柝声为主殉道 30 多年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倪柝声这位中国基督教界伟大先驱的浩瀚属灵成就做出表彰：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将倪柝声评为 20 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 30 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 1922 年成为基督徒。30 年代，他

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40 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1952 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监禁。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 100 万本，成为 20 世纪的经典著作。1972 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 69 岁。他遗留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

“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另有几百万基督徒因倪柝声对全球基督教的贡献（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和他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遗憾的是，倪柝声的著作在中国遭正式查禁；与此同时，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倪柝声死后，他的侄女前去领取他的遗物；狱卒交给她一张在他床边发现的纸条。纸条上所写的字，可看作是倪柝声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

补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的方运孚，经与人谈论说：“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他的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队时，公安局曾拒绝银行革委会报捕方运孚的要求。一打三反中，公安局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一九七〇年三月。

倪柝声的绝笔　　颂　恩

倪柝声牧师与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和宋尚节博士同属对近代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倪师母张品惠姊妹是我姨婆，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师的贤内助。公公倪柝声牧师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折辱。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定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昼夜拷打审问。我们在外面只听到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 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多次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著鞋子，头上戴著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著牌子，被责骂、凌辱，站立数小时之久。红卫兵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怒不可遏，分别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决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们的身上头上，说："带著你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

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老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家中所有的《圣经》、赞美诗都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

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柜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本小小的《圣经》对我实在太珍贵了。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更甚。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祷，始终靠主站立，没有羞辱主的名。

1970 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婆婆每天都为我祈祷。临别上海前，婆婆流著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著主。"在插队期间，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柝声牧师 1952 年被捕前，有机会为教会的事宜去香港。当时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1967 年，15 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人间的自由，在狱中 15 年之后，甘心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当中。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风去世。自发病至去世，仅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自己长时间受苦。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婆婆去世後，我们不敢马上告诉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婆婆的去世使他万分痛心，事后同房间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刑期出来与婆婆

团聚。他知道婆婆身体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入狱前，公公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国各地，入狱後一下又是 20 年，他们夫妇俩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恶名，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对他最了解，她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 年 6 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们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到 40 里外的农场医院。这 40 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最忌震动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去世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的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喜欢迎接。”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殉道者一样，他们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起著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加忠心向着主。

富农岁月　　李兴濂

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有几间房，几十亩地，两辆马车，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远远地躲开。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揭阶级斗争盖子、批四旧、刮十二级风暴，哪一次运动，我的叔叔们都逃不了被触及灵魂皮肉的批斗。不批斗他们，村里的斗争就无法搞起来。

我的四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庄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种豆子。种完豆，还剩下一把豆种，四叔本想揣回家，为得水肿病的四婶熬水喝，又怕村头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种埋在了地头上。不知是四叔忘了还是由于害怕，这把豆种就被留在了那里。若干日子后，人们到南山坡地锄地，发现地头上长出一丛茂密的豆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四叔当场被揪出来批斗。有人从庙里抬出一口铁钟，扣在四叔头上。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铁钟，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在人们的批斗声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们说他私吞公家的豆种，罪有应得。

我作为富农子弟，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回家务农。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看瓜地、看菜园、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都是富农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头，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头砸在脚上，无钱医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刚融，架浮桥、打稻埂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冻伤了他们腿上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

那年冬月，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再跳进河里继续干。夜里挖机坑，在水里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无论如何卖力干活，我们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表示与家庭决裂，五叔的三儿子也参加了对自己父亲的批斗。他几次扬起手，终不忍出手，专政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的脸立即成了血馒头，他的三儿子也哭昏了过去。其实富农子女与富农分子没什么区别，老一辈富农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轮到富农子女。

有一次我和贫农青年丁二在牛棚里出粪，本来出这一圈牛粪是我俩的任务，可那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栏干上抽烟。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粪，他不干，悠荡着二郎腿说：“今儿个让你孝敬俺贫下中农，我来教育你，怎么？不服气吗？”说着站起身，用粪叉扬我一脸牛粪。那时我真的忘记自己是富农了，也用粪叉朝他扬粪，不料那粪叉竟把他的手指划破了。这下我闯了大祸。“地主富农反了，打贫农了！”丁二大叫着。队长跑过来，不分皂白，当即叫民兵连长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长喝斥一顿后，把我送进小号。我被送走后，妈妈送给队长五十元钱，又给丁二五十元，还给丁二做了两碗面条鸡蛋汤。要知道那一百元钱是我家唯一的积蓄啊！这还不算完，后来的批斗中都少不了我这个活靶子。

富农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妇。七婶有三个儿子，身子健壮，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亲，七婶愁白了头发。那年月，谁愿意嫁给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呀！贫下中农家自不必说，就是地主富农家的子女也不愿意，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没有媒人说亲，七婶就去求亲戚，亲戚也无奈，后来总算找到一个腿脚残疾比儿子大五岁的姑娘成了亲。

秋后打谷场上分口粮，是村里最高兴的事，可是富农高兴不起来。上风头的粮饱满，下风头的粮干瘪，贫下中农分的是上风头好粮，富

农分的是干瘪粮。春黄不接时，上边拨下救济粮，贫下中农分得米面，富农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农家不许放鞭炮快乐，有时我站在窗前看贫下中农放鞭炮，无语流泪。春节期间，村里照例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锁呐，打大鼓，鼓很大，两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历来都是富农分子。后来富农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富农子弟来接班。那时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父亲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呼？"小伙子一时蒙了，答："俺是贫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几十斤的大鼓，绑上鼓架，抬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响，一天下来，抬鼓的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

———————————————————————————————

补白：一九七〇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将二十四名犯人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挂牌站立，面朝车尾，游街示众。革委会严密组织沿途街道委员会，命群众在划定的地段观看游街。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须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国标按：此文据王唯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1951 年 11 月，我们的部队到达拉萨。离开昌都向拉萨开拔时，18 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　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 1951 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 19 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 30 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 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 5 个团（兵力），达赖有 12 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 20 万块袁大头（银元），用 4 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 20 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 50 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 5 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六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 1952 年 2 月到 1953 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 35 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

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 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 30 年，每 3 年可以晋升 1 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 1 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 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 1954 年。

在西南干校，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 年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 1958 年 6 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 1959 年 3 月 2 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 5 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 4 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 年 7 月份，我组织 3 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 4 年刑，加起来就是 9 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 9 年。一般犯人是到

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科长陈景昌是长征过的老红军，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条件，豆腐厂每天卖 100 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 300 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 6 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 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科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 60 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 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 9 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 3 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他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 3 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 26 岁当右派，这时已经 32 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 1 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 7 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 3 天 3 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 9 年改判为 4 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 5 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 29 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 1963 年起，直到 1979 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 2 米、宽 2 米、高 2 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 4 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 27 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 4 年换曼德拉的 27 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 7 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 40 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 7 年。

满 7 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 3 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 1968 年 12 月 28 日，可是判决书编号却是 1969 年军管行字第 68 号。这等于说 1968 年就把 1969 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 1969 年军管行字第 68 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补白：党治国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在铜川煤矿劳动教养。虽在劳改，却不忘宣传马列主义，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学习《共产党宣言》，结果被控犯了现行反革命罪，铜川市法院判他死刑，上报陕西省待复处决。省法院按指标行事，此次计划枪毙四名，各地报审死刑犯七名，党治国排第五，活了下来。十多年后，党出狱，回母校领取了迟到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排名前四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

引诗贾祸　　沪　生

柳某从一所工艺美术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市美术工艺厂设计室，创作了不少得奖作品。文革后，美术工艺厂被认定是藏污纳垢的地方，红卫兵几度冲进去，把陈列室内布展的封资修的美术工艺作品砸烧毁

坏殆尽。设计人员大都被挂牌游街，柳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每天洗厕所。负责监督改造柳某的革命群众，是食堂一个负责洗菜、切菜、打菜的女工，三十出头，细皮嫩肉，长得有几分姿色，背地里人称蔡文姬。

日子一天天过去。监督与被监督的两个男女日久生情，关系有点微妙起来。蔡文姬的丈夫，三代贫农，文革时揭竿而起，当上造反派“全无敌战斗队”的头头，因肩负“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革命重任，经常是三五天不回家。即便回家，夫妻间也少有昔日的激情，现在让蔡文姬整天看着这个别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心生爱意也是情理中的事。柳某的妻子呢，自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带着孩子回乡下娘家住了。干柴遇烈火，燃烧是迟早的事，一次值夜班时，两人跨过了“阶级”鸿沟，实现了两人唯一的一次最为亲密的接触。这事本来是你情我愿，你知我知，可偏偏弄得满城风雨，并引发一件现行反革命案。

原来这蔡文姬人是长得有模有样，可脑子有点灌水。一次与“革命豪情万丈高”的丈夫做完那事后，顺口说了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你做得没柳工做得痛快。”第二天丈夫带着一批革命群众，冲进厂里，揪着柳某先一顿猛揍，然后以勾引腐蚀革命群众为由，要求厂革委会严惩柳某。厂革委会迫于压力，把柳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勒令他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深挖其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根源。说也巧，这房间正是他让蔡文姬苟合之地。

犯罪事实好写，可挖的这根源那根源总是一次次被斥责写得不深刻，退回重写。一天，他又对着一堆白纸发楞，百无聊赖中开始艺痒，思想也开起小差，在纸上写写画画起来。此时此刻，柳某脑子里竟闪回起当初与蔡文姬在一起的情形，心到手到，一会功夫，竟鬼使神差地勾画出一幅蔡文姬的裸体画。好画要配好诗，正苦百思不得佳句，却突然想到现成的两句诗，于是飞快地题写在画纸上：“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完，他很得意地拿着这张诗配画左看右看，陶然自醉，全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

门突然被推开。柳某被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前些年，我在一次美展上看到有他署名的一幅人物工笔画。画面上的徐娘半老，虽两鬓染霜，但从那双扑朔迷离的眼神与五官匀称的脸庞上，依稀可见她曾经的卓尔不群。我不敢说那就是他当年的蔡文姬，但一定有她的影子，因为她是他生命旅程中一个无法忘记的人。

补白：1969 年我参加学工劳动，到天津国棉三厂筒摇车间当义务童工。我们中学生做半个工人的工作，没有工资，可是每天下班后可以像工人一样在澡堂子洗个热水澡。每个人每天的产量都在车间公布，每天产量最高的是一位姓安的女工。这位女工四十多岁，是我家最早的邻居，人长得特别文静。她是戴帽反革命，是接受监督改造的人员，车间里的人都不与她说话。她是个基督教徒，1949 年以前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清理阶级队伍查档案时把她揪了出来，说她参加反动会道门，定为反革命，被押上批斗台。那时厂革委员会给每个有问题的人都做个牌子，一米高，六七十厘米宽，有木柄，刷上白油漆，用黑油漆写上罪名，下边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再用红漆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叉。那些地富反坏右每天上下班要举着牌子，若有不从，就是对抗运动，要关进牛棚。这位安姓女工，上白班时一路上举着牌子，上夜班时走在路上把牌子提在手里，一进厂就把牌子高高举起。

————————————————————————————————————

岳父岳母　　张允若

岳父王德霖，浙江镇海人，生于 1909 年，幼年丧父，14 岁只身到上海当学徒。满师后做了 20 多年店员，积了点钱，开个小店（华德文具仪器店），维持全家生计。岳父早年就信了基督教，一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人正直，痛恨国民党腐败，盼望新政权能带来一个光明公正的社会。上海解放后，岳父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满怀热情地

参加中共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先后被推举为蓬莱区文具仪器同业公会主任、蓬莱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文具仪器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委员，还被任命为区劳资调解委员、税务及经济委员等，为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密切政府同工商界的联系，做了不少工作。

1955 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夕，蓬莱区文具仪器行业共有 29 户从业者，都是夫妻老婆店。岳父召集大小会议数十次，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工作，终于把这些小店合并为 6 家，1956 年初顺利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7 年反右，同业人员推举他牵头，联名写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业内情况，9 月被上级口头宣布为右派。1958 年 9 月，在参加区工商联会议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两个月后判处 15 年徒刑，送青海劳动改造。15 年徒刑，其实就是无期徒刑。15 年，5500 个日夜，完全与世隔绝，见不到亲人，回不了家，好不容易熬过了 15 年，还要被迫“自愿留场就业”，继续流放。15 年刑满后，岳父曾获准回一次上海，见到了鬓发已白的老伴和长大成人的儿女。假期未满，农场就来电催促，不得不匆匆返回。

“五十岁进去，七十一岁出来。”劳改和留场就业加起来整整 20 个年头。这是无比惨烈的 20 年，也是岳父顽强谋求生存的 20 年，尽管落得一身病痛，总算没有早早去见上帝。岳父有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感到上帝在他身边，心里默默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让黑暗和苦难消退，让光明和平安到来。这种信仰使他比别人有更强的意志去忍受苦难，有更多的信心去等待明天。他在回望过去时总是说，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全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惊叹这种真诚、纯正的信仰，给人带来的可贵而又巨大的力量。

岳母张主召，浙江奉化人，生于 1916 年。她勤劳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辈子含辛茹苦，协助岳父操持家务，养育了两子四女。1937 年八一三淞沪战发，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逃回老家。两个月后诞生一个新生命，这便是她的大女儿，我的妻子。

岳父被捕，对岳母来说真好像遭遇天塌一样，不知道今后这个家该怎样生活下去。当时全家 8 口，上有老，下有小，年纪最大的是 80 多岁经常生病的老祖母，最小的是还没有上学的 7 岁的小女儿。岳母变卖了部分家具衣物，还天天帮临近人家带小孩、洗衣服、倒马桶，从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总算没让这个不幸的家庭坍塌下来。全家人也都能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二女儿在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大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她们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除了留下十几块伙食费外，其余全部寄到了家里。

1979 年，岳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但是遗留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当初岳父被整，家里的三居室有一间被整人的人占了，后又转手给他人。这个被占的房间始终没有归还。22 年被扣发的工资分文未有偿还。单位和法院领导在平反时说，劳改时间算工龄，目前国家还比较困难，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齐。完全是欺骗。二十多年里全家曾蒙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没有一个说法。岳父平反时，小女儿还待业在家，我们要求按当时通行的做法给予“顶替”，也未得同意。

几十年的折磨和煎熬，极大地伤害了岳父岳母的身体。由于行动不便，无人去医院护理，岳父只好采用家庭病床方式治疗。打针吃药，动不动就是几百几千元。尽管这都是劳保范围内的费用，可是单位规定每年只能报销 1500 元。这个数额只够看一二次门诊。所以只好东借西凑自筹医药费，筹不到钱时就停止治疗。面对无钱治病的严重局面，岳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政府，当年不是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给你”吗？现在国家经济已经好转，老人希望政府兑现诺言，至少也该对受尽伤害的耄耋老人有所关照，于是决定向人民政府求援。1997 年，岳父特地委托我写了个申诉报告，请政府对劫后余生的九旬老人作一点“人性关怀”。我们认认真真地口述笔录、撰写打印，恭恭敬敬地寄给应该为人民办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谁知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至老人辞世也没见到一字回音。

1999 年 1 月，岳父病重不起，溘然长逝。对他来说，从此彻底摆脱了人间苦难，来到了日思夜想的上帝的身边，来到了充满阳光和爱

的天国。我的岳母当时正静静地躺在养老院里，听候上帝的召唤，她对老伴的离去已经木然无知。这种无意识状态又维持了多年，2006 年 5 月终于追随岳父，离我们而去。每当我想起他们晚年的凄凉，想起他们一生的困苦和不幸，心头总是难以平静。我只能默默地想念着他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愿。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多么盼望真有这么一个充满阳光和爱的天国存在，多么希望我和他们能在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里重新相见。我们要努力记下他们经历的种种苦难，揭示其根源和教训，引导我们的后人，同亿万受压迫的民众一起，为消除苦难的制度根源，为在人间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不懈努力。

父亲琐忆　　胡迎建

1960 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局势顿现紧张。有一天夜里，星子县教育局领导向全校（星子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传达中央文件，我父亲与母亲都被禁与会，父亲叫我去偷听传达。我隐隐感到，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共产党不信任的人物。

那时学校时常要学生填表，需填家庭成份，父亲说要填地主成分。这使我小时候心灵蒙有羞于出口的耻辱，从此，家庭成分就象黑锅背在我身上。从父母那里得知，我老家益溪舍曾有十六亩土地，土改初划的是中农，土改复查时改为地主，遂牵连二代人。后来听我初中数学老师说，她家在蓼花乡，仅五亩地也划为地主。

父亲 1945 年 8 月毕业于国立十三中，1946 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

年在星子中学教书，曾报考中央大学，未考上，便由安徽军医院院长、姑父刘孟郡介绍，到国防部联勤总部 84 医院（今樟树市内）当了半年政工干事。做这半年事，为自己一生留下了历史污点。

1965 年，我升入星子县中初中部，父亲在县供销社作主办会计。有一次父亲说：我们的子女再会读书，将来也上不了大学，你以后就跟我学做会计。我嗯了一声，心却想，一辈子在星子做会计多乏味。我将来要读大学，到外面做事，把父母接外地享福。

文革伊始，我母亲被揪斗，戴了漏划地主的帽子。说是解放前几年，父亲在外，母亲嫁到胡家，虽有祖母在，但患偏瘫，一定是母亲当家，应戴地主帽子。我全家一度被赶出门，让人挖地三尺，唯恐埋了变天账，哥哥被反剪着手吊起来。一天晚上，父母将家藏的祖父瓷象等文物全抛到医院南面的水塘里。

父亲也作为“漏划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戴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和用铁丝绕成的眼镜圈游街。次日，父亲跪在批斗台上，被人打得眼青鼻肝。家被反复抄过，一天半夜，县供销社徐贤达带了一班战斗队来我家，把砖砌的灶台也翻了，看看有无罪证发现。滑稽的是，第二天，这位革命者也被揪出批斗。

当时父亲在县西山气象站一带种了菜园，都是他在一排排坟墓之间开垦出来的，种得最多的是棉花，因为棉花收购价较高，比较合算。夏日，我们常顶着强烈的太阳光去摘棉花，早晚挑粪浇水。有一次，父亲用小玻璃瓶装了九十元钱，带我去埋在棉花地，并作了记号，后来差点刨不到，到处挖，才找出来，又埋到坟墓旁边一一棵树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反复被抄，怕这点卖棉花的钱也被抄去，埋到野外才放心一些。

我对打打杀杀的文攻武卫不感兴趣，就退避三舍作逍遥派。父亲为我找来字帖，一本是楷书柳体，一本是草书《千字文》，买来毛笔，要我在家学写毛笔字。那时羊毫笔很便宜，但好的少，狼毫笔大号、中号贵，小号还算便宜，于是我用羊毫写大字，用狼毫写小字。父亲的书法很好，在县城公认排名第三。我初写时，整个字的结构总向右

上方倾斜。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见状勃然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从此临摹再不敢苟且。有时父亲带我去他单位，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有时父亲为母亲写申冤书，要我代为抄写。

我曾与一同学在县工会图书室偷了一批图书，有小说、散文集，均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籍。父亲发现后，又一批批将其卖给废品收购门市部。他担心抄家时被发现，给家里带来祸害。他还觉得，对我们而言，读书再也没什么用了。多年以后，我在型砂厂劳动，他劝我不要光看古人的书，要学一些社论文章，说这些东西还有些用，古人的书，读了没用。

父亲生性高傲，善于讲谈辩论，但脾气急躁。历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父亲变得几近惊弓之鸟，在外特别谨小慎微，从不多言，所以一直没有把柄被人抓住。只有一次，当时被管制的舅父徐奠磐从关押中逃出，先到星子，父母留他一晚，被人告发，反复作检讨才过关。文革期间，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预言对他会有什么动作。有的预言是对的，有的是过于着急，有时是近于钻牛角尖。

我下放在隘口公社大鹿湾作知识青年时，常参加大队举行的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大会。批斗之后，便有人高呼“地主富农子女滚出去”。我内心打鼓，是否自己也要走出批斗会场，幸好另有一下放干部，他家里也是富农成分，他不走，我也不出去。

我们知青点有个知青，本是造反派参军，后被开除回来，其父作为漏划的工商业兼地主在城里挨斗，他却在乡下打地主富家以表现自己进步。我对此很不理解，这种事我做不来。当时一个生产队长，见我劳动卖劲，人又诚实，说要让我做赤脚医生，后来有人到县里，得知我父母均为三查对象，只好作罢。星子县城东有一座梯云塔，当时县革委会指挥一批三查对象，腰绑一条绳带，爬上塔，硬是将七层宝塔一层层折毁。塔上的厚砖是以糯米掺石灰粘合的，非常坚硬，竟被铲开，废物利用，用其砖块建成县剧院，当时是作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用。星子县是江西省两个“大寨县”之一。

1971 年，我上调到石粉厂，其时父亲已解放，被安排在食杂品公

司商店当营业员。我学了点儿广告宣传画的画法，父亲要我为商店大橱窗画广告，有四特酒、李渡高粱酒等图案，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久，哥哥也上调到九江搬运公司。父亲开始为我们的婚事着急，当时有工作的女性，难得瞧上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记得父亲曾到乡下为哥哥找过一袁姓女子，未谈成。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战战兢兢挨过一年，1972 年 4 月被供销部门开除公职，遣送原籍都昌苏山益溪舍劳动，不戴帽子，以工分自养。没有了工资来源，他伤心恸绝，计划把两个弟弟也带回老家种田，但母亲不同意，说一旦下去，再想上来就困难了。这年春天，大板车将几件旧家具载到船码头，一只小帆船，载着父亲与送行的供销社副食品公司黄主任与我三人，在波浪间颠簸而行。到了都昌苏山公社马鞍山，村里人安排了一些人帮着把家具行李挑到益溪舍村，我则乘船返回星子。

父亲在乡下独自一人劳动，有时看守瓜棚，有时在工地上帮助煮饭。一有机会请假回县城，他的第一要事就是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上访。办公室主任姓万，原粮食局的局长。父亲每次带着乡下的土产万主任，他都说些模棱两可的敷衍话，让人觉得，他在尽力办，事实上却很难，弄得只好一次次送礼，一次次失望与企待。其实，大环境未改变，万主任也帮不了什么忙。

因父亲的牵连，我于次年春也被发落到型砂矿劳动，理由是石粉厂产品难销，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在石粉厂是守纪律、有文化的青年，却被排除出去，不禁放声哭了一场，醉倒在欢送宴席上。

在型砂矿，我受到最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自卑而情绪低落。为了调到县城一家新创办的工艺厂，我在回城休假时，不止一次晚上徘徊在轻工局领导的窗外和县砂石公司领导的窗外，因为公司领导不同意放我走，说那么多贫下中家子女不调，怎么能调地主子女，我真恨不得用一颗手榴弹与那一家子人同归于尽。文革中，凡出身不好的人，无论多么渴望求知上进，但周围环境还是要视他们为异类，受到歧视者，失去前途。我们一家人也不例外，见到共产党员，往往畏而远之。

我对父亲有些埋怨，怪他不为我找人。有一次夜深二点醒来，我发觉父亲没有睡，坐在那里发呆。从此我理解了父亲的难处。我学写旧体诗，也始于此时。我不懂平仄，父亲告诉我，音读得上去为平声，读不上去为仄声。这两句话点拨了我。

四人帮倒台，高考恢复，大姑母鼓励我报考，父亲则半信半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政策。当时单位不同意我投考，父亲叫我去找县教育局长胡华桐，临考时才获单位批准。但此年落榜。次年再准备，临考前几天，父亲将他上班的菜市场腾出一角，让我在那里复习，其时天气炎热，父亲用凉水把地面淋湿。那年本科线 340 分，我考了 350 多分。一些人已经拿到本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却没有任何音信。我急得患了大病，父亲打听到省高招办设在景德镇，心急火燎乘班车赶到那里，找到县教育局长彭青云。彭答应帮助录取到九江师专，但这不是我的心愿。为了脱离苦难的砂山，虽不乐意，我还是去了。

那年我与妹弟均考出了一定的水平，在县城传为佳话。此事改变了父亲的工作，1978 年 8 月被调任星子县中教书。父亲不再被视为一个普通职工，精神抖擞。校领导让他挑选教语文还是英语，他选择教英语，认为语文谁都可教，而外语可因难见能。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备课，常常忙到半夜，其时是知识份子扬眉吐气的年代，尽管艰难，父亲内心充实，情绪是愉悦的。

我在九江师专读书时，有一次被小偷偷去钱财衣物，父亲闻讯后，急赶到九江探望。当时他身体不好，我陪他去一家医院检查了身体。1981 年夏，父亲参加了高考命题组，在杭州的命题工作完成后，还到绍兴游览一回，这是他 1949 年后第一次出省观光。

1983 年底，父亲退休了，我劝他写写毛笔字，颐养性情，但他未能坚持，而是养鸡种菜。一年后，县长段德虞嘱我将父亲聘至县志办，从事县志的编纂，负责建置沿革、商业、财政金融等卷的统稿工作。1985 年我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省古籍办工作，计划写一篇星子出土宋版书的考据文章。急于看到我出成果的父亲，到县文物站，恳

求借出此书，送到南昌让我复印。但我并不领情，反怪父亲不必为我的事情操劳奔忙。父亲于次日返回星子，我心中难过，后悔不该责怪父亲。

1990年《星子县志》出版后不久，父亲即患柏金森综合症，时常叫头痛，但他意志还是异常坚强的，在病榻上写了二十多首诗抒怀言志。其《病中》诗云："药到病难除，怕死不丈夫。天数既定矣，何必强留乎？"又有《偶成》："妻子可怜耳深聋，我瘫不动若龙锺。相看默默各流泪，多情言语却难通。"最能说明他个性的的是《无题》诗："性嫌阿谀憎奉承，生平惹得路难行。多年革命被限制，四载牛栏见实情。运转瀛寰人德改，成林子女各能行。眉须斑白阳光暖，恶疾罹身人不惊。"父亲坚强地熬到八十三岁。父亲一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品德、为人，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成都的土改杀人　　铁　流

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后来逐步收上去，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他们只需动过嘴，武装（民兵）就去执行，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布告也是手写，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地堆放着），即向成都郊外二十里的迴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说

“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按照共产党一贯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这个策略适用于一切政治运动中对人的划分与掌控，比如土改，依靠对像为 25%，团结对像为 55-65%，孤立打击的为 10-15%，依此类推)，土改期间全川杀关管斗的人应不少于 150 万。1978 年我被关押在四川雷马坪劳改农场唐家山中队，马湖分场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讲话中指著几棵弯曲的大树说：“我们雷马坪农场先后关押改造了几十万人，这几棵树子就是吊人吊弯的。”

历史反革命吴九爹　　黄振迪

文革时，满舅是大队党支书。那时过年过节的节目有两个，一是文艺汇演，一是开斗争会。斗争会上最常见到的人一个是满舅，再一个是吴九爹。两人都在台上，满舅是主人，作报告，南腔北调地大骂一通，九爹则是批斗对象。吴九爹和三五个地富反坏右一起，脖子上挂个“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低头、勾背、弯膝、缩脚，很窝囊地站在台前听训，好像没思维似的。

那是大队支书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年代，但满舅还确实是个老实人。他在台上训斥九爹时，没有多余的口舌，多半是：“你这个家伙，老实一点！站好！”这时的吴九爹则是唯唯诺诺，不敢抬头，以免引起公愤。

有一天上午，开完斗争会，几个民兵提着枪，把这些反革命押回去，我跟在他们后面看。回到满舅家那个村时，押解的民兵全去大队部交枪了，最后只剩下我、满舅和九爹一起向家走。九爹走在最前，满舅看起来像是还在押解着他一样，我走在最后。九爹大概六十来岁，

平常走路都是腰板直直的，现在则要做出很可怜的样子，不敢迈大步。三人一起走着，谁也不说话。快到吴九爹家时，满舅见没人了，就说：“九爹，我就不送了啊，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呵。”听到满舅这话，我懵懵懂懂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和满舅继续往家走，我问他：“怎么对不起他呢？”满舅则说：“你不要到外面讲就行了。”

后来我爸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有一天，上小学的弟弟因玩闹腿骨脱臼，老师心情忐忑地把我叫了去。我弄个担架，把弟弟抬回家，我妈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赶车送到吴九爹那里去！”

吴九爹治好了我弟弟的脱臼，可是我家连个感谢也没敢说。我妈心里对此事一直感到歉疚。

后来我知道了吴九爹历史反革命的来由。他原是一个铁路工务段的工长兼地区党委书记（当然是国民党的），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肃反时，他不在本乡，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当时他已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本来肃反也过关了，可是他有文化，在技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一下子被人盯上，就这样被遣返原籍。

十几年后，我想起九爹，向满舅讲起当年斗争的残酷，满舅倒是显得很平淡，说：“九爹被遣返回乡那几年，他们原单位的人来过好几次，要把他押回去批斗，都是我给扳住了。假如让他们狗日的抓回去，你怕现在还有人啊！”

——————————————————————————————————

补白：暮色苍茫，我扛着猎枪在生产队饲料田四周巡绕。突然，我发现离饲料田不远的地方，有个黑影在晃动。我顿时热血沸腾，心想，如果打到猎物，那可是英雄壮举。我抖擞精神，端着猎枪，步步向前逼去。可是那黑影却直立起来，原来是一位蒙古族老妇在割草。我格外扫兴。那老妇背起草蹒跚而去。为这件极为平常的事情，第二天我在知青点会上做了严肃而深刻的自我检查。那割草的老妇是日本特务阿拉坦的老婆，她傍晚在生产队的庄稼地边晃动，肯定不怀好意，而我当时却没有面对面与她展开斗争，说明我的思想觉悟不高，阶级

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其实那个所谓的日本特务阿拉坦，只不过是伪满时期在外地上学读书时学过日语，后来当过一段伪满职员罢了。文革一起来，这种历史不清白，又懂得日本鬼子话的人，肯定是日本特务、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了。在批判会上，知青们对阿拉坦的批斗很激烈，私下里有时又很欣赏他的才气。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蒙古语和汉语的发音很清晰，每句话都有分量和分寸。我们平时既不能亲近他，又禁不住想与他交谈。　军　凤

——————————————————————————————————————

南阳张建功　　陈　更

张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阳的知名人士，张氏也是南阳城的名门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东百步之遥有一座高宅阔第，中堂森森，檐牙高耸，气派异常，就是张家。张先生的父、祖辈曾连出三位进士，民国废除科举，张先生继承祖上文脉，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 年大饥荒，在南阳市商业局任职的父亲，将我从偏僻的乡野带到南阳。商业局就设在张家大宅里，商业局的后院正对着小学，打开后门，可以在铃声响时赶往课堂而并不迟到。这些屋宇是张先生继承的遗产，经其手捐献给国家，后来做了商业局。

进入文革，父亲成为牛鬼蛇神，我随父亲悲惨的足踪，与这所充满少年温馨记忆的大院告别。文革第三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与张先生的女儿张颖在南水北调工地（邓州市陶岔）相遇。她带着名门望族的书卷气，畅朗，智慧，健美，给略感卑微的我以强烈的印象冲击。我与张颖的友谊保持至今，她增进了我的见识，给困厄中的我以温暖、勇气和希望。结交张颖，是我一生的福气。

我是通过另外途径认识张先生的长子张显的。张显是一位儒者，一位极其忠诚的人。相识相交之后，我与他的友谊过于张颖，也许是

因为我们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亲于文革期间死亡于工作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处理，这加剧了我的青年时代的艰难。八十年代，在市信访局工作的张显，力主公道，在我父离世十三年之后，执意按工丧处理我父的死亡，使穷困的母亲略有补益。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在南阳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余暇收集许多当代民间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斋新志》，张显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啮》一篇压卷，此故事即由张显先生提供。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我得入大学。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新潮激荡，我因此遭难。当彼之时，张显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们聊人生，聊历史，聊先辈人物，帮我解脱。

至此，张先生应该改称张伯父了。张伯父生于 1916 年，卒于 1985 年，1934 年进入北大读法律时，正当东三省沦陷，热血在青年学子张建功身上振荡激扬。在中共党员影响下，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供职期间，张伯父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营救过十几位遭受逮捕的共产党员。自 1957 年反右至文革结束，张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国民党残余人员、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叛徒特务。至 1978 年，叛徒特务之冤案方才真相大白。当此之际，张伯父余寿还有七年，一生襟抱，尽化为黄昏的云烟。

————————————————————————————————

补白：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〇年四月被判处死刑。支左的部队首长、市革委会主任，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因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是一起冤

案，这几位受迫害的人的人头才没有被削掉。

————————————————————————————————————

补白：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刘家驹

这个家是属于神的　　白受恩

我出生前，家里每天烧香祭奠，拜各种偶像。有一次，全家人长疮，求鬼拜神不灵，药石无效，弄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我舅舅是位基督教传道人，在全家人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形下，他把我们家的偶像全毁掉，无名的毒疮竟都不药而愈。从此，我祖母、父亲、母亲和姑姑们都信了耶稣。

我出生后不久，尚未懂事，祖母和母亲就把我奉献给主，每周日带我去听福音。那时人家都把我们当成信洋教的，许多小朋友藉故欺负我，打我骂我。小时候还会还手，长大一点才知道这是为主受逼迫。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岁，与小我四岁的妻子结婚，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我们生了两个女儿后，因我家人口众多，家族往来复杂，为着能好好服事主，我和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岳母家。我的岳母大半辈子守寡，自个儿吃粗的、穿破的，却给弟兄姊妹最好的，扶助软弱的，安慰受创的，每天过着不住祷告、亲近神的生活。她这样绝对的爱主，深深影响了我们夫妻和孩子们。

在我们家出入的人，都是来聚会的，从早到晚，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从不间断。一九六〇年，口粮奇缺，老百姓没吃的，妻子没奶水喂儿子，出生不到半岁就死了。一九七二年，十九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结核，服药无效离世。若没有主亲自安慰我们，

兩次的打击都让我们夫妻俩痛不欲生。

一九七五年十月，公安将我抓起来审讯一周，逼人用谎言批判我，又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审问了几个月。审讯时，他们说我很清白，沒有外人送我物质；但群众控告我，女儿生病不给吃药，只管祷告，女儿死了又沒有很伤心的哭号，一定是我们故意把女儿谋害的。之后，当然他们也查出了我並沒有不救女儿，只是他们很难明白，这么个聪明乖巧的女儿，又这么疼她，怎么不见像其他人一样的哀号伤恸呢？因为我们有主，我们知道主已接女儿脱离这地上的苦难，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和女儿还要再见面，同享天上的喜乐！

收取外资与谋杀女儿的罪名都不成立，我被安了什么罪名呢？因为我爱主，就说我是“小群派”，跟倪柝声同样的罪名。其实，我从未见过倪柝声弟兄，但我读过他讲的信息，那信息完全出自神圣生命，让我很得着供应。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每次的批斗我都有分，因为我被列为黑五类中的坏分子。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我读的圣经、诗歌、信息，通通都是四旧。我被抓到台上受批判的次数，大概不下几百次！有时，正在家中吃饭，红卫兵站在门外叫一声，我就得赶快跟他们走。还有一次，那是最炎热的一天，我身上只穿一件短裤，一群人就把我绑到会场，场中有许多人被批判，但因信耶稣被批判的只我一人。在我身后，有兩个小伙子，一人拎我一只胳臂，向前挪移一步，就跪在地上，汗水如大雨般淋满全身！且每移动一次，兩个小伙子的拳头就往我背上揍！连邻居都很讶异，这么重的拳头，这么多的毒打，我居然还挨得住？但感谢主，我沒有昏倒，这並不是我能挨，而是主把我带过来！叫我在这过程中，並不感觉他们是怎么待我，只知道主在我里面对我说，一切的辱骂、痛苦，都是落在主身上，主都替我担当了！

最后，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送河南省西华县五二农场强制劳动。但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我沒有作过任何一件触犯国家法律的事，我只不过是清心爱主罢了！一九八〇年一月，邓小平上台后，农场裁定我构不成现行反革命，宣告无罪释放，结束了第一次的监狱

生涯。

一九七九年底，李常受弟兄关于生命与灵等真理的信息经香港传到内地，我一出监，即深蒙这些信息的光照。我们开始知道，要用灵呼求主名，操练灵；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懂得了运用灵享受主，当时面对如此简单易懂而又可实际操练的路，内心真是欣喜若狂！我们弟兄姊妹就组成福音队，不分日夜大传福音，无论到那里都操练释放灵，带人藉着呼求主名而得着神圣的生命，迁入神爱子的国度。这样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全县十六个乡镇中，有十四个乡镇已点燃了国度福音的烈火。

一九八三年，我们传扬国度的福音达到高潮，逼迫接踵而来。六月中旬，政府贴出告示，定我们为呼喊派，並有人上告中央说，若让我们这些人发展到百分之七十，中国共产党就要变色了。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再度被抓进监狱。那时，全国因此被抓起来的人无以数计，全县更何止上百！他们並沒有查出我有什么反对党或违反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但仍然把我判了十二年重刑，罪名是反革命呼喊派。呼喊派是政府強加给我们的名称，就像小群派，都不是我们应有的称呼。

我两次坐监，並无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事，就像查不出什么罪的主耶稣，仍然被彼拉多钉了十字架。第一次我坐监五年，终得平反，宣告无罪释放；第二次，我虽提出并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动机，又无推翻的目的，怎能算是反革命呢？但他们仍然关了我九年。在这段高墙内的年日中，不能读经、不能唱诗，但在我里面仍感深深的享受，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主。祂在我的呼求和祷告中的同在，是真而又真的。我总是面色和蔼，少有苦闷，别人就觉得奇怪，产生羡慕，于是我就趁此把福音传给同监的犯人，或监狱管理人，让他们也得着在主里的喜乐。

为主坐监，我从来不后悔，因为祂曾为我舍命！这许多年狱中生活，讥诮、捆绑、毒打，都不好受！但最苦的是不让我读主的话。然而，主还是陪伴我，用祂的大能保守我，不断地在我里面加力给我，叫我藉着信成了祂美好的见证人。

事实上，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戴高帽子，被批斗，遊街，不仅是我一人的苦难，我们全家都置身于无理的虐待中。我坐监后，我的妻子就靠整天在农田的劳动来养活六个儿女，夜晚又担心有坏人闯进我家，怎么办呢？只有祷告！一到晚上，她就要到每个孩子的床前，一个个陪他们祷告。念小学的女儿在学校里遭老師用棍子敲她的头，一边打一边吼着：“你这反动家庭的孩子！”让她实在无法再读下去，而成了个不识字的人。儿子在学校里，也是同样要被叫起来接受站台批判，放学回家后还得继续被迫劳动，参加劳动时被别的小孩子毒打，还要我妻子陪孩子去道歉。虽然如此，我们还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主释放他们、拯救他们，脱离黑暗的辖制，显出祂的大能。果然，打我们的人，一家一家地得救了，福音在这里扩展开来，以至于像我们这个不到两百人的村子，就有三处地方聚会，从早到晚有读经、祷告，真是喜乐！

一九七六年我大儿子初中毕业，因我们是黑五类家庭，我又是因反革命被判刑，他不能受推荐入高中，就在家里劳动。后来经亲戚介绍，去念了一个离家三公里、师资差、校舍是草屋的村办高中，每天来回走泥泞路。念了兩年后，各科平均都是九十九点七，又正逢一九七八年高考制度恢复，父母不影响子女的前途，我大儿子就考上了大学。那时真惊动了整个村子，沒人敢相信这鸡窝里怎能出凤凰？有些反对我们的人甚至想让我儿子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好在我妻子无论如何总在主前静静祷告，靠主一路引领，才让儿子顺利上了大学。

大儿子大学毕业后，教书两年考上硕士，两年半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读了两年半，正逢博士毕业答辯的时候，我的四女儿却因车祸离世，噩耗传来，儿子研究所的领导怕影响他，故在他答辩通过后，才把噩耗电报及返乡的火车票交给他,但他已经赶不上妹妹的葬礼了。四女儿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坐监，二儿子上书保我出去办女儿的后事，被监狱领导拒绝，而大儿子也不在家，是主内弟兄姊妹亲手把我女儿埋了！大儿子回到家，面对母亲，看见爸爸坐监、妹妹去世，沒有埋怨，只说：“主啊，虽然在人看来家破人亡！但这个家是属于你的！”

一九八八年，大儿子博士毕业，许多国家邀他去作博士后研究。在政审时，我坐监的事被他研究所的政治处知道了，就派人调查，逼我儿子非写出书面告白不可。他很无奈，就在报告中说："我父亲坐监一事，一直未向组织报告，实属不忠。但我父亲为什么会被关在监里呢？因为他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我国信仰自由的政策下，过着敬虔且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按着圣经纯正的启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天天呼求主耶稣的名，但遇上一九八三年政府严厉打击'呼喊派'，就被抓进了牢里。我父亲是真爱他所信靠的主耶稣，从沒有作过任何不合国家法律的事；他的罪名是反革命，但这种罪名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我父亲根本沒有参加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团体或活动。事实就是这样，组织要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沒有怨言。"

这一关虽然过了，但出国仍有障碍。几个国家都邀请他去，他最有兴趣的是美国，此刻美国也催他赶快过去，他只好拿着邀请函向研究所的领导说："美国的邀请函来，我该怎么回话呢？总要顾及国家的声誉，不好说我不能出国，是我父亲因信耶稣还被关在监里罢？"领导告诉他："你就回信说，我们国家规定，学生毕业需留在国内工作一年，才可出国。"这样，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大儿子才到美国芝加哥作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在纽泽西工作。至今十年来，他天天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传扬福音，过着喜乐的召会生活。如今，我们全家都到了美国，小儿子完成了硕士学位，小女儿仍在读书，两个大女儿虽沒受过高等教育，却在召会里清心服事主。我们夫妻仍然天天把自己及孩子们，奉献在主前，求主使用我们全家每一位，成为祂的彰显。

祂的心意从不是叫我受苦。我所见证的这位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在那些烽火烧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祂从沒有离开我，不然，谁能经得起这些痛苦、折磨呢？像我这样的例子，何止千万？倪柝声弟兄的同工張愚之弟兄，因信耶稣一九五二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到新疆服刑后，因病送回上海，又因传扬圣经、信息，被拉出监狱枪毙。当时见着的人都说，張愚之被枪毙时，既安详又荣

耀……

我两次坐监，为主受苦从来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荣耀。人说我跟从倪柝声、李常受，就定罪我，其实我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的信息却让我能迈开属灵的步伐，向着标竿竭力奔跑。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但在我的深处，却是爱祂、经历祂、见证祂，祂真是实实在在，是带给我喜乐，带给我无尽丰富的活神。

我只是一个破瓦器，主耶稣才是瓦器里的宝贝。哈利路亚！我这破瓦器里有活宝贝，主耶稣是惟一的宝贝，我一切的能力乃是出于这宝贝！神的心意从不是叫我受苦，乃是叫我们在受苦中认识祂的法则，而荣耀祂。我原是一个罪人，一个天然败坏的人，主却爱了我，让我盛装祂的丰富！如今只求主将祂自己的成分再更多地赐给我，叫我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在爱里，成为祂的彰显。

——

1958 年 10 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破坏革命秩序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接着就被塞入铁闷子火车，押送安徽省治淮总队劳动改造。最初在皖南山区径县陈村水库服劳役，当地环境卫生恶劣到无可言喻的地步，遍地苍蝇，好似一层黑色的地毯一般。劳改队规定，吃饭后休息的短短十几分钟时间，每人要灭蝇 200 只。由于苍蝇多得出奇，随便拍拍，俯拾皆是，完成任务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苍蝇 500 多只，本待上缴，但想到每天夜以继日肩头压着几百斤的重担，过着非人的生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将 500 多只苍蝇和水一齐吞了下去。劳改队里的广播立刻狠批、咒骂我，说：“劳改人员陶增烈，为了抗拒改造，将打下的苍蝇 500 多只一气服下，企图对抗人民对他的改造。”此时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岂能惧怕区区批判。食蝇之后，居然没死，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陶增烈

——

父亲董渭川　　董乃强

我的父亲董准，字渭川，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2007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是该社“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中的一本。

1951 年 2 月，父亲应孙瑜、赵丹之邀，观看了他们创作的影片《武训传》，并应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影评，肯定了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该片剧本经中宣部审查通过，摄制款由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付。公映后，从中共高层朱德、周恩来到一般观众，好评如潮，然而却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两次修改定稿的社论，点名批判了肯定《武训传》的 10 篇文章。父亲的那篇影评排在第 11 位，因版面所限，没有被点名见报。这篇社论立时在全国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周恩来被迫作了检讨。父亲除在北师大和九三学社接受大大小小批判并多次违心检讨外，还根据校党委的指令，将这些检讨整理成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51 年底掀起“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再次挨整，排在北师大被“洗澡”教师行列的头一名。与此同时，我四姨夫家里也上演了挖地寻金的闹剧。四姨夫当时是北京市邮政局的一个小头头，他的正读中学的女儿，听了学校“五反”斗争动员报告，便跑到市邮政局“五反”领导小组，告发她爸爸贪污，她的根据是她爸爸长得胖，外号“胖子”，肯定是常用贪污来的钱背着家人大吃大喝的结果。她爸爸一到节假日就到单位日夜值班，她由此推断，准是乘单位无人，盗窃公家财物。市邮政局的人在她的带领下，回家翻箱倒柜，搜寻她爸爸从单位偷来的金条，屋里院内刨土挖地，找藏匿的金条。

有亲生女儿揭发，我四姨夫马上被单位关押，日夜轮番审讯，我四姨也被市邮政局多次传唤询问。他们的女儿则因政治斗争积极，立

场坚定，大义灭亲，立刻被批准为青年团员。

北京市邮政局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结论是：我四姨夫经手账目清楚，并无贪污盗窃行为，“家里藏有从单位偷的金条”的事根本不存在；我四姨夫领导的小单位里年轻人较多，有的趁节假日公休时间补习文化，有的利用节假日谈恋爱解决婚姻大事，他为了照顾年轻同事，就主动在节假日到单位代为值班。这个调查结论虽然使我四姨夫的冤案得雪，但他精神和皮肉之苦都已受尽，从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

1957 年共产党反右整风时，父亲的态度是消极的。直到 5 月 13 日，时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北师大副教务长的父亲，才在教育系教师整风小组会上作了他在共产党整风中的第一次发言。6 月 8 日，“反右斗争”正式开始，校党委按照早已拟定的计划，在全校组织“左派”，对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待定右派”进行揭发批判。一时间，大字报、批判会铺天盖地而来。父亲对共产党由党内整风突然转为整党外人士的作法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就跑去找国务院参事卢郁文问询。他与卢早年私交颇好，既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后又同到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政治部工作，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时还聘卢为教务主任。中共建政之初，卢当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

父亲此去找他，只是想和他谈谈心，问问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卢郁文只冷冷地讲了几句空话，就打发我父亲离开他家。后来得知，卢早在 1957 年 5 月中旬，就在国务院参事室鸣放会上反驳过对中共党内弊病的指摘，此时他已将我父亲视为敌人。

父亲又去找时任国务院二办（文教办）主任的林枫。林原名郑伯乔，东北人，1926 年我父亲在南开中学任教时他正在南开中学读书。在南开中学的一次学潮中，林被校方开除，我父亲见他无处可去，便把他带在身边，并供给衣食。1927 年暑假，我父母带他到了武汉。1928 年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也安排他在东海中学当事务员。后来他专职革命，改名林枫，中共建政后一直是党政高干。父亲找他也只是想和他谈心解惑，可林枫竟闭门不见。这时，我父亲才亲身体会到，共产

党真的是“铁面无私”。

父亲在共产党整风中的发言，大都是对别人已揭露的事实发表感想或重复别人的意见，都是他个人的感受，并非与某几个人串联后商定。单凭这些，远远达不到共产党所拟定的右派标准线。30 多年后，一位年长的知情者私下告诉我，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全在于我四姨家表姐的揭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五反”时大义灭亲、诬告自己父亲的表姐。此时她正在北师大历史系读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件大事。她体察到校党委的意图后，写了一张大字报，捏造我父亲的反党言论，并说这些恶毒言论是她在我家坐在父亲书房里的沙发上听我父亲亲口说的，除她之外，谁也不知道。校党委得到外甥女揭发姨夫的罪证，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件过硬材料抛了出来。

父亲在会上听到我表姐的揭发材料，恼怒至极但无从辩解，会后就气呼呼地回到家中，一进门怒冲冲把身上的钱、物、证件全掏出来放在书桌上，而后就向屋外冲去。当时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备考高中，看到父亲举动异常，便连忙跟了出去。他走得飞快，无论我问他什么话，他都不搭理，我只好小跑着跟他走出校门，又跟他上了 331 路公共汽车。我掏钱买票，跟他来到颐和园东门口的汽车总站。他下了车，直奔颐和园，当时已经闭园，父亲谎称他是园内教工疗养院的休养人员，混进园门。他一进园就朝昆明湖疾走，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这是要投湖自尽，以表明自己从未对我表姐说过那些反党言论。此刻我特别想找人把父亲拦住，但四周并无一人，我只得紧紧地跟在父亲身旁。来到昆明湖左岸，我就紧护在父亲右侧，尽量把他推离湖边。

这时刚巧有一群收工的园林工人经过，我连忙停脚恳求他们把我父亲拦出园外，但他们个个毫无表情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眼看父亲独自走远，我顾不得和工人们再说下去，拔脚去追父亲。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桥头铜牛脚下，满湖平静的水面唯独在这里翻滚激荡，发出阵阵轰鸣并形成一个深深的漏斗漩涡。父亲冲过去就要向下跳，我抱住父亲，用脚使劲抵住护岸石块的棱角，死命地把他推离湖边。我们僵持了一会儿，近 60 岁的父亲毕竟没有我的劲头

大，只好长叹一声随我出了颐和园。但他说什么也不回北师大宿舍，而是执意要去我四姨家。我怕父亲乘公共汽车时再出意外，便叫了两辆三轮车直奔我四姨家。在那里，父亲当着我四姨的面，要用沾上水的手去触摸电门，以抗议外甥女的诬陷，但被我四姨制止了。

在我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得知当初诬告自己的父亲和姨夫、时为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的的表姐李毅，被革命小将揪斗，剃了阴阳头，我生怕家里又要遭劫，马上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勒令”他们辞去照顾父亲的保姆（父亲 1962 年小中风，1965 年再次中风，卧床不起），暗示他们准备自保。我父亲终于还是成了众矢之的，学生们喊出了官方没有明说的“摘帽右派还是右派”的口号，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至，连父亲在校医院看病的收据上都注明“右派”二字。

父亲被“摘帽”后，主要从事教育史方面的资料工作，同时给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讲古代教育典籍课。革命小将抓住他是教授，并在讲课中讲“士为知已者死”，上纲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狂吠‘士为知已者死’”，大加声讨，并冲来抄家，以获取罪证。

不但是父母的住房，就连我单独居住的小屋里的书柜、抽屉甚至床下，都被翻动很多遍，家中一批珍贵古籍、明代的几块古墨、一批私人照片（主要是父亲年青时在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任职的照片）和集邮册中的清末大龙邮票等等，都被当做四旧罪证抄走。不久，造反派以“右派和反动权威根本没有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只配住猪圈”为由，强迫我父母搬出小红楼宿舍，迁到一处不足 10 平方米的阴冷朝北的小屋，二人只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和一只做饭用的火炉。

小红楼宿舍我家门上，交叉贴了两张封条。我平时住校，一天回家，看到封条，吓了一跳，赶快向造反派打听，才找到父母的棲身之处。年近七旬，且已卧床多年的父亲，经此变故，身心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话音变得模糊不清，但脑子还很清醒。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很认真地阅读我带回去的各种小报材料。一次，他用手指点着林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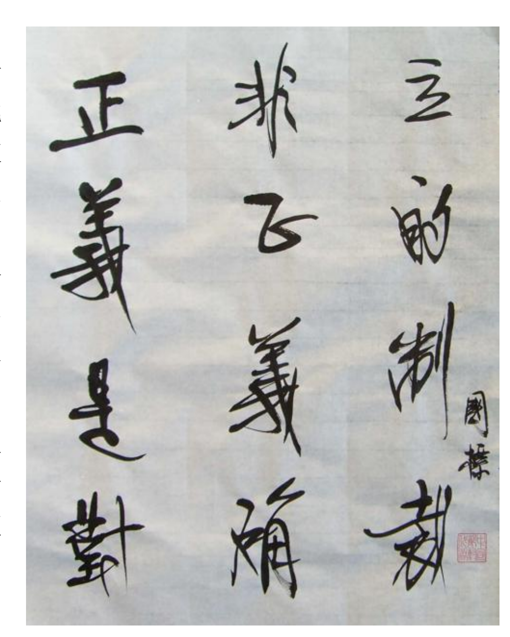
照片，费了很大劲说："奸……奸相。"吓得我赶紧捂上他的嘴，生怕被负责监视我家的造反派看见听到。

文革期间"外调"活动极多，目的大多是为整倒对立派的某个人。有的外调人员，为获得对本派有利的材料，不惜对被调查者使尽威逼利诱手段。我父亲因结识人较多，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者也就很多。他们拿着学校造反派开具的"董渭川务必老实交代清楚"的条子，频繁来到父亲病榻前。对所有外调人员的提问，父亲都坚持如实回答，从不任意乱说。

一次，中共中央党校两个外调人员，专程来查证时任党校校长的林枫的历史，多方引诱我父亲说林枫是叛徒，并许诺，只要写了林枫是叛徒的材料，就此即可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我父亲绝不跟风，也不记恨林枫曾在自己找他时他闭门不见，坚持实话实说。两个外调人员见我父亲这么"顽固"，恼羞成怒，为泄愤，乘我母亲不备，顺手偷走了桌上父亲的一块欧米茄手表。母亲当即跑去将此事报告给学校造反派，却受到"你这是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一顿训斥。几个月后，师大革委会突然把我母亲叫去，发还了这块手表。原来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组织分裂，来我家外调的两人已分属两派，在两派的互相攻击中揭出了此事，便把偷去的父亲手表退了回来。

为让久躺的父亲能起来坐坐，稍稍活动，母亲和我请求造反派批准我们从查封的家中搬回沙发等几件家具。父亲看到沙发，挣扎着下床，到沙发上坐了一小会儿，这给母亲和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哪知此后不久"反击二月逆流"，父亲竟被诬为"借搬家具大搞翻案的急先锋"，居所再次被抄，从家中搬来的沙发和我新购的必需家具物品又被掠一空，居所里外还贴满了大字报。

1968 年 9 月 15 日，我回家告诉父母我的毕业分配方案。母亲和我给父亲擦了一个澡，我俯身抱起父亲，脸对脸地扶着他，父亲睁大双眼紧紧注视着我，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已经虚弱得发不出声了。就在我凝望父亲的一瞬间，我对父亲“沦为右派”后给我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怨恨顿时化为乌有，想到的是他既遭国民党通缉又被共产党诬陷、坎坷而又光明磊落的一生。给父亲擦完澡，母亲和我给他更换了衣服和床单，安排他舒舒服服躺好后，我们才开始吃午饭。寂静中忽然听到父亲发出轻微的“咯”的一声，我赶紧起身去看，父亲已经永远睡去了。我马上到校医院，请医生到家里验看并开死亡证明，内科主任赵大夫拒绝到“摘帽右派”家出诊。我陪笑脸，说好话，央求另一位大夫到我家来，之后又赶紧到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报告。宣传队员们正在办公室午睡，几个年青队员刚听我说了一句，就从床上蹦起来，兴奋地大叫：“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边穿上衣边要到我家来看。当看了校医院开具的自然死亡证明后，他们都泄了气，



正义与非正义　　焦国标书

冷冷地开了个介绍信扔给我。我拿着介绍信，到设在西单的火化厂办

事处，办理火化和购骨灰盒手续。办手续的人，用手点着介绍信上注明的“摘帽右派”字样，同样冷冷地说：“这样的人骨灰一律不留。”

当初我是被北师大附小保送上的初中，因而还想继续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父亲被划为极右后，我突然感到自卑，觉得能有个学上就谢天谢地了，因此被口碑不佳的北京七中录取时，我甚至暗自感到庆幸。该校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环境和学生成分复杂。

入学不久，七中的校行政和共青团委就把我叫去谈话（我一上初中就以少先队中队长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团），要我认清形势，与父亲和七中的右派教师划清界线，至少每两个星期交一份思想汇报。当时北师大已经停止了父亲的一切教务教学工作，改为打扫卫生和抄写资料。因曾经自杀，而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于 1958 年 2 月又被补划为“极右派分子”，按五类处理，即送京郊农村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子有六种处理方式，即免予行政处分、降职降级、撤职、留用查看、监督劳动和劳动教养。母亲原在全国妇联办公厅任处级科长，本拟 1958 年底提升副厅长，父亲成了“极右”，母亲也被迫办了退休手续。我表姐李毅则因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大义灭亲，被批准入党，留校当上北师大历史系的助教，大半年后被派到师大附中历史组当组长，后来升任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

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父亲被划“右派”后，母亲立刻划清界限，与其父离了婚，并把她留给父亲抚养。高考前，她父亲因正接受批判，为让她能有个安静环境好好复习，便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寄宿。谁知父亲的这位朋友居然强奸了她，奸后还得意地说：“你去告吧，没人会相信一个右派崽子的话。”这遭遇强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后来她考上农业大学，常于晚间突然闯入男生宿舍赖着不走，或睡到半夜爬起来，脱光衣服到水稻田中间站着让蚊虫叮咬，诸如此类，令人匪夷所思。大学毕业后，她被分到专业根本不对口的蓄电池厂，厂里专门安排她做别人不做的危险工作，结果中了很严重的铅毒。

我的三年高中几乎没上过什么文化课，大部分时间是上街叫卖报

纸，除四害打麻雀，在铁道边挑砖抬煤，为修人民大会堂到前门拆除旧房，到香山植树造林，修建十三陵水库，在七中铸造车间每周翻砂浇铸四天，等等。香山种树，我曾背扛着 32 棵松苗从山脚无路处爬上山腰，一天往返 4 趟。修建十三陵水库，因土篮装得过满过重，我曾挑断 3 根扁担。在七中铸造车间，上午蹲在地上做砂型，下午端火、倒火（浇铸）。一次与同学合抬满满一大包铁水（端火），重达四五十公斤，前边的同学手一颤，铁水从包内飞溅出来，热铁水一落到湿地上，就“扑”地一声迸射出无数火花，把在后首抬承重手把的我的手腕烫出一串燎泡。我虽疼痛难忍，又不敢撒手，怕一撒手铁水包落地爆炸，将我们两个抬包人都烫成重伤。还有一次，端小包倒火时，因铁水烫穿包体急淌直下，一片铁火顿时流到我脚下，烧毁了我的鞋和裤。修十三陵水库，规定年满 18 岁才能去，我当时刚满 17 岁。我之所以这样透支体力地劳动，既是在诚心诚意为父亲赎罪，也是自己与父亲“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可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得到的只是周围轻蔑不屑的目光和频繁整团（整顿共青团内错误思想）中大家的“批评帮助”。从此我开始学着隐忍，对任何事都保持沉默。

我小学时就展露出表演天赋，初中时是校话剧团导演组成员，到了七中又和一些同学创建了校话剧团，因而高中毕业时，我信心满满，准备报考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我把这些年我改编的话剧剧本，写的导演阐述和舞台设计，平日写的文学习作，等等，厚厚一摞，都作为报考材料，交到电影学院考点。在艺术初试时，我觉得特别幸运，因为所考内容都比较简单，特别是在我认为最难的图画分析考试中，我抽到的那一幅画，居然是我前一天请七中美术老师帮我分析过的。

初试榜上，我列名第一。进了复试考场，主考焦老师拿着我的报名表问：“你父亲是谁？”我如实回答后，焦老师提高了声音又问：“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吗？”我回说是。他点点头，环视着周围说：“好了。叫下一个。”在考官和考生众目睽睽之下，我突感五雷轰顶、无地自容，赶快低头退出考场。以后的文化课考试，我虽然参加了，但面对试卷，我的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脑海里反复出现复试考场上

的情景。

缺了复试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我当然不可能考上艺术院校。半个月后，我又随同学们参加了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听说当年（1960 年）高校大规模招生，全北京市高中毕业生都被录取也还招不满。我想只要有个最差的学校上就行。考后等了一个多月，同学们都接到录取通知报到了，我的通知却迟迟没来，我大着胆子去七中打听，七中让我去问市教育局，到了市教育局，他们又让我去问七中。

从市教育局出来时，我无意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北京高校因招不满学生，调进了两万多名外地高中毕业生来京上大学，现在他们就在市教育局办手续；二是市教育局扣着 200 多名“狗崽子”的考试成绩，既不发给录取通知，又不发给不录取通知。我心灰意冷往家走时，突然想到当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以前我跟他们联络不断，关系也很好，现在不妨到他们那里试试。

儿艺的师友们熟悉我的情况，没考我，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让我回家等通知。刚离开时我很兴奋，转过几个街角就冷静下来，电影学院复试考场上的情景一再在脑海里出现。儿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我的父亲是右派，如果被儿艺录取后再查出父亲的右派问题，不仅我会被侮，和我谈话的师友们也都会被责备。想到这里，我马上在路边买了纸笔，向这几位师友写了封致歉信说明情况。当我把这封信扔进路旁邮政信筒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既有对师友们说了实话而释重负的欣然，又有对自己前途未卜的悲怆。

又了几天，到电影学院考点取回我的报考材料时，看到了新疆电影制片厂的招生通知，我马上赶往新疆厂招考点，交上刚取回的全部材料。他们翻了翻材料，当即就给我办了入厂手续。我兴奋已极，这下子总算离开让我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家庭了，甚至在和父母话别时，我还用磕磕绊绊的语言批判了一通父亲所说的“党天下”言论。

到了新疆才知道，全国同一个天，而新疆电影制片厂又是收容全国电影界右派分子之地，因此我还得继续背着父亲的“右派”包袱老实改造。冬天夜里，我常被叫起来，砸开厂边河沟的冰层，给厂锅炉

房上水，完了回来再接着睡。做了和别人同样的好事，别人可以得到表扬，而我却无人理会。因不满国家困难时期某些党员干部搞特殊化，偶发一句牢骚，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和组织的批判。三年后，因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化部电影局决定新疆电影制片厂下马，按“哪来哪去”原则遣散全厂人员，于是我又回到北京。

虽然在家吃喝不愁，但我总觉得呆在家里压抑，便跑出去找工作，可到处碰壁，最后找到离家最近的东升人民公社，申请当农民，公社一口回绝：“你什么都不会干，还得我们养你、教你，等教会了你，这政策一变你就会走，这亏本买卖我们不做。”

连农民都当不成，我的前途何在？这时父母让我考大学，我不想考，因为大学绝不会收“右派狗崽子”。父亲说他已经摘帽，和戴着右派帽子不同，再加上这些日子四处求职而不得的经历，我就抱着反正无路可走就考考看的心态，第三次走进高考考场。对这次考试，我丝毫不抱希望，却居然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这太出乎意料。事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关于文化工作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的陈毅，在会上脱帽鞠躬，向知识分子认错赔礼，致使高校录取时放宽了政审标准。

我抱着对陈毅的感激之情，决心在大学开始新的生活。入学报到没几天，班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许锡庆，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当时屋里还坐着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孙机，是考古专业的“右派学生”（现在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用他那结结巴巴说不成句的话把我俩，一个右派，一个右派狗崽子，教训了一个多小时，要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定期向他汇报思想。在开学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上，老师讲了斯大林的一个什么理论，我因搞不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向班主任秦文炯请教，谁知他一张口就斥责我的疑问和唯生产力论者的反动言论差不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开学之初的这两记大棒，就此打灭了我开始新生活的梦想和求学

热情。独往独来，尽可能地忍辱寡言，做好随时接受批评或批判的准备，就是我自那时起给自己制订的生活方式。

文革大串连时期，母亲惦念她的三妹，要我借此机会去天津看看。我找到三姨，发现他们全家已很“自觉”地挤在一个小套间里。我敲门进屋时，全家人的表情都显紧张。不一会，套间的小门打开，三姨夫和五姨、五姨夫从里边走了出来，我吃了一惊。在我印象中，身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要员、河北省副省长的三姨夫，永远西装笔挺，正气凛然；长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五姨夫，一向和蔼可亲；既是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又是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的五姨，最喜欢逗我玩，可今天他们都特别尴尬。

交谈之中我才知道，时在河南农村当教师的我的小表哥，参加了造反派。他大义灭亲，揭发五姨和五姨夫的滔天罪行。造反派组织一面将我的小表哥突击入党，突击提升为县教育局长（俗称“双突”），一面四处抓捕五姨夫妇批斗。五姨、五姨夫是偷跑出来避祸的。言谈中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千万不能把他们藏身天津的事说出去。我回京后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母亲，她也只是叹息。

大学毕业那年，送走了辞世的父亲，在那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性的年代，我只能告别年迈且身边无人照料的母亲，独自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当年学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就是把我这样的“右派狗崽子”和“问题学生”（我是“反聂元梓派”）发配到长城以北。

在草原上，我从事过多种劳动和工作。我本想一生独身，以免我的子女重蹈我的经历，可是又怕生病得不到医治，或批斗时被打伤无法治疗，就与医院一位不计较家庭出身的护士结了婚。当时看病必须报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医院拒绝给“地富反坏右”及与其相关的人看病。因写独幕话剧，我被诬指为刘少奇翻案，遭到批斗。回京探亲时，因卷入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险些被捕入狱。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八年的时候，我觉得“革命”之风似有减弱的趋势，就向母亲原工作单位全国妇联提出申请，调我回京照顾老

母亲。听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批示，将我和妻儿一并调回。年近八旬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可是盼了个把月还不见动静。正疑惑时，母亲碰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康悄悄告诉我母亲，说中央文革小组诬蔑周总理是“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而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科尔沁草原，这下子让我和“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连到了一起。那段日子，中共干部又开始用异样的眼神时时监视我。

1976 年 10 月，毛泽东已死，我所在旗县的中共县委宣传部长，代表中共盟委书记，向我因写剧本被诬为替刘少奇翻案而遭批斗的事道了歉。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孩子得以回到北京。为让我更好地承担起供养老母的责任，全国妇联建议北师大安排我们工作。北师大虽然同意接收，但掌权者依然用对付“右派狗崽子”的办法对待我和我妻子。校人事处的林处长，不顾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挤住一间十几平方米房屋的现状，要我应允“今后不得提出增加房屋面积”。历史系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主动调给我们一间面积较大的宿舍。林处长得知后，竟到历史系质问我，为什么又增加了房屋面积。林还不顾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事实，安排我做历史系资料员，“不能当教师上讲台”。我妻子有在旗县级医院工作 20 年的从医经验，拖了半年就是不给安排在校医院工作。当时北师大校园里并不是没有空房，历史系也不是不缺教师，校医院更不是不缺大夫。

1979 年 3 月初，教育系党总支突然给我家送来一份“右派改正审批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复件，要母亲当即签字认可。这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父亲不是已被“摘帽”了吗？怎么现在又来“改正”？冷静一想，这“戴帽”和“摘帽”还不都是整人的权术吗！我母亲以“右派改正”事过于突然，我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为由，对审批表“现在意见”栏中的“经复查董渭川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有错误言行”一句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给整人者留下的一个口实。但拖了几日，母亲生怕会影响到我和我妻子在北师大的前程，才在审批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教育系（中共）党总支的人对“董渭川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有错误言行”的诡辩是“谁都有错误言行”。难道有错误言行就必须被扣上政治帽子,并接受长达 22 年的折磨并株连家属吗？中共又凭什么给党外群众的错误言行定罪呢？更何况我父亲在 1957 年所说的话,至今都找不出半点有错误的地方!师大校园里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初期，毛泽东请师大教授吃饭，罗志甫、李长之、董渭川几个人借故不去，所以 1957 年就都打成右派。”是不是没去吃毛泽东的饭就打成右派我不敢说，但这几位确实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陆定一概括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反右运动已过去 53 年，我父亲被“改正”也已 31 年，人们提出，中共应对在反右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错误，并予这批知识分子以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赔偿，同时开放所有有关反右运动的言论禁区，以提供反思历史的空间。这些正当、合理的要求迄今无法实现，但我深信这句广泛流传且屡试不爽的民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1979 年 10 月 18 日,北师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我父亲补开了追悼会，父亲遗像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他的眼镜和一方印章。虽然父亲沉冤得雪，但“三反”时帮他“搓澡”者，“反右”时批判他最厉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他最狠者，当时在学校里都还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有权者仍然视我父亲为“右派”，视我为“右派狗崽子”，视我妻子为“右派儿媳”，在那些卑视、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杀我们的眼光中，我们一家子过得并不轻松。我们在校内的工作极其困难，特别是要办成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例如职称问题，更是难于上青天。我的职称，不但让我从图书资料系列的最低一级起算，还整整被压了 6 年未得晋升。我妻子的职称，更是因为领导间的互相推诿，不知该进入哪个系列，弄到最后只拿了个行政正科级。

为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我家的“右派”形象，更为让老母和年幼孩子此后不再遭周围人们的白眼和闲话而感自卑，我和妻子咬紧牙、

忍着泪超负荷地默默工作。

我在历史系资料室默默而有成绩的工作，为心怀嫉妒的龚系主任所不容，逼我离开历史系到图书馆。虽然同是从事图书资料工作，但还得从最低层工作做起。我妻子在正常上班和回家照看孩子做家务之外，挤时间到北医三院进修运动医学，并参加光明中医大学的函授，连回家做饭手执锅铲时都在背英文和拉丁文单词。多年后，在人们的白眼和闲话中，我们的艰韧努力得到回报。我在北京市取得了图书资料系列的最高职称，并在学校图书馆建立了图书馆学硕士点，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13种工具书和4本专著，其中有半数获得过各种奖励或再版，成了有权评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国家级专家，还被国外几个学术团体聘为顾问。我妻子不但成了学校体育代表队的随队医，而且能融经络学说与西方体操为一体，创编出独特的经络健身操，成书后一版再版。校园里注视我们的目光从卑视不屑变成了尊重，对我们的背后指点变成了羡慕。我们不仅做到了没让孩子在心灵最脆弱的年纪背上“爷爷是右派”的包袱受到歧视，影响成长，而且出版了历30年搜集整理完成的父亲遗著，向世人展现了董渭川一代教育名家的风彩。

一次诉苦会　　王法尧

我们村的支书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儿爷。全村开诉苦会，都说要让支书老三他爹六儿爷先诉苦。六儿爷就走上台去，说：“别看俺从小穷，俺穷得有志气，没偷过没摸过，没坑过没骗过。俺上蒙古地面去，带一包针去，换他一群羊回来！别看俺儿女多，俺都养大了！”

“这不对啊！”那个教导员说：“要你诉苦，你这是说的什么呀？

要不你就说现在吧，别说过去了。”六儿爷叹了口气说：“唉，你别提了，我这辈子村里一个仇人都没有，现在老三当了干部，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教导员赶忙说：“不对，不对！下来，别说了！换别人！”

换上来的是老毛。老毛是外县人，原先给地主赶大车，做长工。地主去世后，老毛把地主的第四个姨太太拐跑了。当时他赶着三套大骡子车，拉着现大洋，拐着这个四姨太太，跑到我们村来了。老毛一上台就讲当年赶大车怎么美，“三套大骡子车，我这鞭子啪啪啪一甩，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

教导员赶紧提醒：“你说生活上怎么样，吃饭怎么样，不要说赶车了。”老毛又得意地说：“俺们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们才能吃饭呢！”教导员只好说：“别说过去了，你说现在。”老毛不满地“哼”了一声说：“现在全村就欺负俺是外乡人。村干部专欺负俺，打谷场都归自己有，就把俺的打谷场没收了，就欺负俺是外乡人呗！”教导员急了：“换人换人，不让他说了！”

海乐被换了上来。海乐是小学教员，小时家真穷，他妈领着他讨饭。海乐一上台就哭，讲从小怎么讨饭，怎么难，有的人家不但不给，还说不好听的，说他没出息。他哭着说着，他是真诉苦，又有文化，很会说。

海乐正哭诉村里人待他如何不好，六儿爷突然站起来了，问他：“你娘怎么死的？你娘怎么死的？”教导员傻眼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海乐很不孝顺他妈，当了教员挣了钱，可他妈却冻饿而死。他妈冻死了，他不知道，村里人看他妈好几天没出门，进门一看，早冻死在炕席上了。村里人连炕席带他妈拉到街上来，村里人都说，他妈这么苦，把他拉扯大，他当了教员，不孝顺，把他妈给冻死了。

教导员一看这个诉苦会全乱套了，就说：“算了！不开了！散会！”

补白：1959 年之后，中国进入三年大饥荒，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干土方工程的治淮总队下属的几十个劳改支队粒米皆无。我所在的

大队共有劳改劳教人员 2500 多人，派遣一个由安徽土著劳改人员组成的中队 200 余人，每天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根茎， 供全大队食用。每到一处新工程工地，不论挖河或建坝，第一步就是“清皮”，将表面腐土、杂物去除。清皮无论从湖面开始还是从农田开始，劳改犯们都欣喜若狂，如过节一般，因为可以趁此机会饱餐一顿或多顿。湖水一抽干，稀泥中有鱼虾，捕到后用杯子盛装，冲入开水就可生吞大嚼。挖掘干土农田，虽无鱼虾，每每挖到一尺深时，却会有冬眠的青蛙、癞蛤蟆。掘到以后，剥去外皮，用开水浸泡，连内脏屎尿都不舍得丢弃，全部吞下肚中。夏春秋无青蛙，也可挖到很多野生植物块茎，边挖边吃，大快朵颐。有一次我吃下不明有毒根块，喉管胀痛异常，数天不能出声说话。又有一次挖到一只贮藏丰富的老鼠窝，老鼠逃之夭夭，遗下一窝浸胖了的黄豆、花生，足足装了一大搪瓷杯，我大嚼了好几餐。1960 年的冬天，我生食的青蛙、癞蛤蟆有几十只之多。

———————————————————————————————————

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　　李子军

1972 年夏，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二团八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团的大事。知青朱德贵将一把南通地区流行那种的坐便木椅的楔子全拔掉，致使坐上去的人立即仰面朝天掉进圆形大粪坑里。

朱德贵的母亲病逝，向党支部书记张勤帮请假，张借口农忙，不批准，朱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朱发现张经常到南通式坐便木椅上大便，就产生了让张掉下去的念头。趁无人时，朱德贵悄悄拔掉那把坐便椅的所有楔子，并把它椅推到圆形粪坑的边缘，然后悄悄躲在窗户后面，静等张勤帮掉下去。当天中午，张去了厕所但没有大便，朱激动万分之后又懊丧万分。他又跑去检查一次，然后又回到窗户后面。没多久，一个南通知青走进厕所，没过一分钟，传了“救命！救

命！”的呼声。大家跑去一看，南通知青正在厕所里拼命挣扎，身上脸上全是粪便。

厕所里发生了事故，党支部书记张勤帮想破解这个问题。他发现坐便木椅的楔子全被拔起过，显然，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阶级敌人搞破坏！阶级斗争新动向！张勤帮在全连进行排查。没多久，线索发现了：朱德贵最近很不寻常，平时他根本不去南通式厕所，这两天却频繁进出，有重大嫌疑！一审，朱德贵就全盘交代了。他说，这样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张勤帮掉下去！张勤帮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全连召开批判大会，张在会上讲：有人采用卑鄙手段，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于是，我们立即“义愤填膺”，“上纲上线”，痛批朱德贵的狼子野心。但回到宿舍，我们的肚子都笑疼了，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了。假如掉下去的是 180 斤的张勤帮，我们都可能像程咬金那样笑死。

将军的女儿　　董婉如

冯天明 60 年代中期出生在越南。父亲冯国栋，原名冯中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母亲陶英是记者，曾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提供越南情报。天明的爷爷是一个乡绅，在其子冯国栋面前与妻子一起被共产党杀害。后来冯国栋参加了国民军，大陆易手时携家随蒋介石去台湾，后又被蒋派往越南。中共一直在追杀冯国栋将军，最终在 1971 年将其毒杀。孤儿寡母一家人陷入困境，曾经的人脉不复存在，34 岁的母亲靠帮人翻译和做生意赚钱养家。为了保存将军血脉，天明的妈妈委托外婆带着 12 岁的二儿子和两岁的小儿子先逃，结果辗转困在柬埔寨，与家里失去联系。后来才知道，将军的二儿子 14 岁时，在越共逼迫下排除战时留下来的地雷，被炸身亡。

天明的大哥，16 岁时就因对越共不顺服，被抓入狱。不管天明如何尝试给哥哥送饭，大哥还是因折磨和饥饿而死。妈妈对天明这唯一

的女儿说：如果你想逃离，现在就逃命去吧！1978 年，12 岁的冯天明辞别母亲，独自一人登上逃难船。衣领里缝藏一条钻石项链，还有相当于二百美元的金钱。很多人死于海上，最后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荒岛停泊下来，这一停就是两年。

那个荒岛好像叫巴拉比东（Bolo Bidong），岛上生活很苦，都是难民，12 岁的天明成了一名等待某个国家发善心来接收的国际难民。她用相当 150 美元的价格买了一把斧头和一块塑料布，给自己搭了一个帐篷挡风遮雨。在那里，天明经历月经初潮，没有人指导，一切都是无师自通。她剪下两个裤脚，做成几个月经带，脏了的就去海边洗洗，晒干再用。天明说，那时她哪个国家也不想去，只想回自己家，可是她失去了与所有亲人的联络。很多次往家写信，可是从未收到回音。

岛上的难民一个个陆续被一些国家接走了，天明属于剩下来没人要的一群人中的一个，最后美国将剩下没人要的难民都接来美国。此时天明 14 岁，随身携带的只剩下那条缝在衣领里的项链。天明说，美国在当时被称为“垃圾收集站”，因为美国当时的政策是“没人要的难民我都要”。天明到美国后，被加州一个天主教徒家庭收养。这个家庭已经有 10 个孩子。养父是个建筑工人，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富裕，孩子们也没得到很好的教养。离开越南时，天明已有相当于五年级的中文教育，小小年纪嗜书如命，无论妈妈带回什么书，她都能看。在美国的最初几年，无论家庭影响还是学校教育，天明都受到了不好的影响，但收养她的家庭是好人。来美国的第二年，由于经济萧条，养父失业，家庭面临破产而搬家。天明拿出仅剩的那条钻石项链，估价 5000 美元，欲支持家用，可是养父坚拒不收，让她保存了下来。

17 岁的天明高中毕业了，想与母亲团聚的心更强烈了。由于没有经济担保能力，18 岁那年她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北卡的军营里渡过 4 年艰苦岁月。在教官的魔鬼训练下，实在受不了时，她会偷偷跑到教堂里哭。 1985 年，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天明邀请母亲、小弟弟和母亲后来收养的两个流浪儿，来到美国定居。

——

补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判有期徒刑。安徽省高院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邀功请赏，通过刑讯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

——

我亲历的杀人　　王法尧

1950 年 3 月 25 日共产党在北京杀第一批人，我亲眼目睹。共产党与历朝历代杀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开会杀人，要杀人了先开会，然后游街，开着大卡车。这一批共杀 53 人，都是粮店老板，剃了光头，一辆卡车装 6 个，一面站 3 个，脸朝外。军人一手拿着大片刀，一手摁着这些人的脖子，他们的罪名是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当时叫“打老虎”。

1951 年镇反，跟国民党沾边的人，道会门（包括老和尚），头疼脑热时给灶王爷烧个香、磕个头的山里人，都算反革命，在可杀之列。你们那里杀那么多反革命，我们这里杀得这么少，这不落后吗！杀人也要攀比。这样一来，烧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河北易县抓出一个 30 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说是一贯道，但是没有杀他们。每逢庙会，共产党就让他们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监的衣服，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反动思想——“我要当皇帝”，“我要当娘娘”，让他们充当反动活教材。后来胡耀邦掌权，给他们落实了，说他们不是一贯道，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

是一贯道，都是公安局给他们编的，一套一套怎么说。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给的，让他们去这样做。

我其实没有给共产党提过意见，一次发言也没有，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从 1958 年 4 月到 1979 年 10 月，劳改 21 年半，这里的故事太多了。跟我一块劳改的有个李健，是共产党县级法院审判员。河北农村，五天一个大集，三天一个小集，在镇反高潮时，共产党规定，大集杀五人，小集杀三人。县有大县，也有小县，小县也不甘落后啊，人家杀得多，你杀得少，那哪成啊。镇反时李健审了一个犯人，姓王，判了死刑。一般杀人布告上最后一句话都是“验明证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其实此犯根本就没有验明证身。监狱里有两个姓王的犯人，狱警提人，一叫名，其中一王，也没听清楚叫谁，就答应了，站起来往外走，也不知要干什么。狱警不问三四，上去把他脖子、嘴拿绳子勒上，怕喊冤啊，绑到了刑场上。

李健走到集上，一看，人错了，不是他审的那个人。这怎么办啊？赶紧告诉法院院长。院长一听，就骂他，怎么搞的！李健问现在怎么办？布告都已经贴出去了。院长说：“杀错了就杀错了，下个集再杀那个人不就得了嘛！”

这件事如果就李健、院长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别人说：“哎呀，杀错人了！杀错人了！”这一来，院长发怒了，把责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给他一个处分。李健内部做了检查，档案里也装上了。李健觉得冤枉，人是我审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发现了错误，也及时告诉你了，这处分，我不服。越不服越处分，越处分越不服，最后被送进劳改队。劳改队里要认罪，他说：“我怎么认罪啊，是院长记了我这个仇了！”

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个李省悟，河北河间人，原来是国民党宪兵营长。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对外许诺，凡投降的，官升一级。李省悟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和另外两个营长一起胁迫团长，想起义投降共产党。团长和另两个营长最后放弃了起义，觉得这样做有辱人格。李省悟一意孤行，自己带着两把手枪投降了共产党。李的岳父是国民

党的县长，曾告诫他："你不能投降！共产党对待投降俘虏，当场不杀，以后杀；在前方不杀，在后方杀；现在不杀，将来杀。"李省悟不听，他认为投降共产党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一开始还优待他，让他写信劝宪兵团投降。宪兵团没有投降，李省悟功没立上，共产党也就没有给他升官一级。李见没给自己升官，就去问，主动要升官，他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当个师级。共产党就说，你这人是假起义，真李省悟逃跑的时候已经被宪兵团长枪毙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还想当师长？

李省悟找来各种材料，证明自己是真的，但没人理他，军队也不留他，给他转业了。他后悔没听岳父的话，看来共产党明不杀暗杀、今天不杀明天杀，是真的啊。李省悟老是跟人这样说，他老婆一看这个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离了婚。这一来，他更不服气了，起义了官没升上，连家也没了。他不服气，越闹越闹，最后被送进了劳改队。

劳改队批判他的反革命思想，说他怀念国民党，想复仇，就斗他。其实劳改队不让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已经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劳改干部里有些以整人为乐的坏人，好人也不敢管他们。

有一个王队长，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们"帮助"他，一"帮助"就是打，我看见脊背被打得肉都离开骨头了。打他的时候，他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声。有一次晚上斗他，罚他站，王队长叫人架住他的两只胳膊，下面点着原油。原油烟特别大，就用烟熏他。两边的人都得轮班换人，谁都受不了那个烟熏火燎。那晚我值班，风很大，风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脸上，头发、眉毛一下子就烧着了，脸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声。

我一看，不好，这要出人命，赶紧报告王队长。王队长就骂我："你这个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头多硬啊！"接着烧，李省悟脸上的肉皮慢慢烧熟了，他挣扎着，一下子挣脱架他的人的手，往自己的脸上一抹，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黑的黑、红的红，这时他才喊出来："苍天啊——苍天啊——苍天啊——"连喊了三声。王队长一摆手，

说："散会！"于是会就这样散了。从那以后，王队长就不再斗他了。

到了新年，我们劳改农场的场长说，要让大家过个好年，保证吃好，不斗争了。过年要交心，谈怎么把年过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时说："过年这四天，我保证不杀人。"

李省悟的监管人叫蒋少先，外号大土匪。李上茅房、打饭，他都跟着，监管他。蒋听到李省悟说"保证不杀人"这话，站起来就对他拳打脚踢又打又骂："你什么玩意儿啊，还想杀人！" 本来场长都说了，不让打人，他又打开了。李省悟冷笑，对蒋少先说："嘿嘿，我不跟你动手，我跟你动手，三个五个你也不行。"李省悟以前是宪兵，会一套武术。

李省悟去打饭，蒋少先后面跟着。打饭回来，李省悟先进门，门自动关上，把后面迈脚进来的蒋少先的菜打翻了。蒋不干了，说怎么办？李省悟说，又不是我给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这事报告给队长。队长说，多卖给他两份菜，这件事当时平息了。

晚上李省悟下手了，先杀别人，再自杀。他偷了一把剃头刀，连割了三个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鳌，挨着李省悟睡，脖子上挨了两刀，切断了动脉，血打到天花板上，溅得到处都是，接着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没割到动脉。当时屋里 12 人，谁都没敢出声，全都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也动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久经战场的国民党营长，负伤三十多次，到这时候也说不出话来。

蒋少先手脚并用逃出去，爬到院子里，喊了一声"杀人啦！"声音很小，都变了声了。我值班听见了，一脚揣进门，一看也吓傻了。徐占鳌的血还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儿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经软了，割不到动脉，没一会儿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层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来都觉得粘粘的。我强站着没摔倒，赶紧去找队长。"李省悟杀人了！"我拍门。队长没出声。我就砸他的门，喊："李省悟杀人了！"队长不敢出门，在屋里说："知道了。"

因偷窃进劳改队的徐占鳌死了，24 岁，那一天是他结婚的第十天，李省悟和其他两位被他割脖子的犯人都被救活了。至于李省悟最

后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王震川队长让我去整别人，我不愿意，他就认为我对毛泽东不忠，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罚我站，在劳改队院子里立了个毛泽东纸像，大概一米宽，一米三、四高，天天让我冲着毛泽东像罚站，吃饭也得冲着毛泽东像站着。别的队长去了让我下来，他回去了还让我接着站，就这么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又点着了原油。以前点火烤李省悟，现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还要点火，造那个气焰，在院子里放火放烟，唱歌，喊口号，又开会又喊，一百度的大灯泡有好几个。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铺天盖地的屎壳郎冲着这个光亮飞过来，把院子里那个毛泽东纸像撞了个稀烂，没碰倒，把纸都给碰烂了。屎壳郎碰到墙上掉下来，有死的，有半死的，我们扫了扫，一共装了九大麻袋屎壳郎。屎壳郎救了我，王队长不罚我站了。没过几天，这个王队长遭了报应，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补白：1961 年冬天某日，我们劳改中队派遣四十多人，抬了二十多只大屎桶，去几十里外的荒山上积肥。途经一处已被当地农民挖掘一清的红薯地时，和我合抬屎桶的伙伴小朱，无意间在松土中踢到一只农民遗留的红薯。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前面有带队的蓝衣干部，后面跟随有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而且还有四十多个饥肠辘辘眼中冒火的劳改犯同伙的八十多颗乌珠盯着。可是机警的小朱不慌不忙停下脚步，放下屎桶，弯腰拾起地上的红薯，迅速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担弯腰拾取的瞬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们，继而见拾取物被投进屎桶，众都释然。卸屎时，我们蓄意落在最后，等别人倒完才走近坑边倒屎。稀屎倒尽前，我伸手从屎液中取出红薯，迅速在泥土上擦一下，一掰两半，我俩各得一半。回程抬着空桶，踏着轻松愉快的步子，在裤子上抹去红薯上的余屎，塞入口中大嚼起来。

富农郭玉德　　俞加深

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劳改人员往地里放夜班水可不容易。这是一项争分夺秒的艰巨任务。水从大渠分流向各地块，立马冻成白花花的薄冰，稍一怠慢或迟疑，地块就瞎了，低处积水成冰，高处水再也上不去。土壤的水分状况直接影响开春的播种，地搞砸了，算责任事故，劳改犯就会挨处分。

队长分派上海人小许值夜班放水。小许视力差，看不出地块高低，害怕因此惹祸，就向队长请求调换工作。队长不耐烦地说："什么叫脱胎换骨？！去，我叫郭玉德带着你，慢慢就学会了。"

当天晚上郭玉德耐心教小许如何打坝，如何闸口，小许一一照办。两人忙碌到下班夜，大约凌晨三四点，任务完成了。两大排几十亩地，一片白花花的薄冰，十分匀称，没有花斑漏放的。二人披着破羊皮大衣，蹲在地边吸烟，小许突然好奇地问郭玉德："我冒昧地问一声，你啥出身？什么样的农活你干得都很出色。"

郭并不隐瞒，答道："富农。"小许趁热打铁："当个富农就会判无期徒刑？"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咬了咬牙道："全是这狗日的……"他嗑了一下烟袋又装了点烟丝："那时我村还处在国统区，我家对面有个叫吴光的坏虫，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这狗日的还对我家那口子不怀好意，趁我出门做生意，闯入我家，试图不规矩，事后被我狠狠揍了一顿，打掉他两颗门牙。"

郭狠狠吐了口痰又道："不久我村解放了，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县城。土改了，吴光这小子划个贫农，还在农会里当了个小干部，而我家成了富农，我就出去跑生意暂避风头。过了几天，那狗日的趁农会主席出去开会，私自召开村里批斗会，把几个妇女拉上台批斗，其中有我老婆和我老娘。他命一个民兵上前强行剥我老婆的衣裤，剥得一丝不

挂，站在台中央，群众都说太过分了！有一个民兵小声提醒吴光，这样不妥吧？吴光瞪着贼眼斥道：‘怕啥？！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富农不杀他们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老婆又怕又羞，双手一直捂着下身。晚上回家，她与我娘痛哭一场之后双双上吊自杀了。”郭玉德流出硬汉难得的眼泪。

“消息传来，我仇恨满腔，为了复仇，我就去县城投了还乡团。正好解放军围攻县城，国民党军寡不敌众，团长想出一个办法，抽一个班，带上还乡团，去我那个村‘打援救赵’。 我为报私仇，就自告奋勇杀回村里，亲手抓了狗日的吴光两口子，吊在村口，先示众后枪毙。”郭玉德终于大吸一口气说：“咱两条命换了他家两条命。解放后我被抓，在判刑时据说我犯的是死罪，但因事出有因，故而判了个无期。”小许感叹道：“是啊，你这也是逼上梁山。”此后，小许与郭玉德成了知根知底的好难友。

队里的邵姓中队长很信任郭玉德，为了上山找羊板粪的粪源，邵队长挑选郭玉德跟他一起赶马车上山。说起羊板粪，外人不明白。老藏民的家，随季节流动，夏天逐水草放牧，冬季就在朝阳背风的山沟里安家。他们的羊圈因而也有冬圈夏圈之分，冬圈是祖辈相传的老窝，圈里的羊粪蛋层层积累，有的竟有一两米厚，是一色发过酵的好肥料，这就叫羊板粪。

当晚队长和郭玉德就在一处山岙里歇宿。夜深了，二人准备就寝。郭玉德出帐篷给马再添一点草料，突听邵队长在帐篷里大喊：“快来呀，有狗熊！”郭听到叫声，立即抓起一把铁锹冲进帐篷往黑熊背上猛砸，咔嚓一声锹把断了，黑熊龇着牙，用肥厚的熊掌狠狠地拍郭一掌，又一爪将郭肩上连衣服带皮肉撕下一块，鲜血顿时淌下。此时邵队长迅速从枕下掏出手枪，由于人熊抱成一团，队长怕误伤人，先朝天开一枪，黑熊一愣，反身逃出帐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邵队长立刻用枕巾替郭包扎一下，套上马车，出山送医院紧急救治。郭见义勇为营救国家干部，队里为他上报减刑材料，上级批准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邓星杞一家之死　　林启山

邓星杞，湖南省邵阳县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人，1958 年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在本县任语文教师，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70 年秋，邓被调到县师训班教语文。师训班学员积极要求参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学校领导也大力支持，并具文上报。县有关领导批示，每期学员可去韶山参观学习一次，但必须选择时间，服从安排。前两期学员都如愿以偿，可是第三期等了几个月，多次请示未果。

1971 年 5 月，邓星杞在语文课上讲解《颗颗红心飞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课，把外国友人无限热爱毛主席家乡一草一木的动人情景讲得有声有色，更加激起了学员们去韶山参观的强烈愿望。有人提问：外国朋友都可以去韶山参观，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儿女，想去参观为什么这么难？邓老师答复:你们想去韶山参观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不过上两次去是经过县领导批准的，这次要去，还得靠你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向县里请示。于是学员们选出 9 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教育组请示。教育组负责人带他们找主管财经的县革委副主任 Z 批钱，Z 说现在财政困难。学员们继续强烈要求，新任县委书记 C 则严词批评学员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们这是第一次围攻冲击新县委，性质极其严重。”他还批评教育组领导不该支持学员闹事，并当即指示政工组、教育组，联合组成工作组,去师训班追查幕后操纵指挥者，宣布师训班停课办学习班。

首先是 9 个学员代表遭到轮番审讯，大会揭小会批，围攻的大字报、小字报、横幅、标语铺天盖地，声势搞得特别吓人。后来查到语文教师邓星杞头上，C 书记在全县区社干部整风会上说:“师训班有个邓星杞，什么知识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讲台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煽动学员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星杞立即被停职反省，组织学员批斗围攻，到处贴满“邓

星杞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罪该万死!”“邓星杞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报。整风学习、批斗围攻整整搞了 7 天，工作组请示是否继续搞？C 书记答：继续搞。又斗了 7 天。邓一边挨批斗，一边写检讨，越检讨越想不通，明明是政治迫害，还要自己无休止地写检讨。6 月 7 日下午 3 时，邓星杞以死抗争，悬梁自缢。C 书记说他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埋几块楼板还便宜了他”。邓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三次自杀身死，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邓的父母也被活活气死。

——————————————————————————————————————

补白：2010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日到来之前的那个夜晚，国家信访局对面的地下通道里，74 岁的贵州访民刘耀明在上访 40 年之后悄然离开人世。刘耀明文革时期被打成反革命，要求平反，解决冤案，陆陆续续来北京上访 40 年。最后一次，2010 年 11 月底，老人听说案子已被最高法院受理了，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北京。多年上访，极度贫困，老人舍不得住小旅馆，就住在国家信访局南边的地下桥洞里。12 月 4 日法制宣传日和 12 月 10 日人权日前夕，他（们）居住的桥洞多次被警察和城管清理，破烂的被褥和塑料窝棚被强行拆除拖走。死亡前两三天，刘耀明已经水米不进。同一桥洞照顾他的访民老杨为他做饭端饭，他拒绝饮食。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给远在贵州老家的孩子们打电话，希望他们来接他回家。孩子由于家庭困难，和父亲说先给汇点钱过来看病，然后他们安排好就过来，没想到这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后的通话。9 号夜里他已近离开人世，10 号早晨，同洞的访民去看他的时候，身体已经冰凉，兜里还剩 20 余元。许志永

——————————————————————————————————————

故人王文焕　　段华庭

文焕王公，砀山县城北关黄烟厂人，身材修长，体质文弱，原为砀山中学语文教员。其为人也，书生气足，言辞犀利，自以为风趣，人目为异类。1956 年我毕业分配至砀中语文组，与公同事。

一次，学生在礼堂举行入团仪式，公说："快去看，那些孩子在赌咒发誓呢!"赌咒发誓本为封建时代缔约结盟或者道会门秘密结社所必行仪式，民主社会，信仰自由，一般不兴这一套。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发起成立同盟会，要求大家举手宣誓，就曾遭到与会同仁的抵制。解放多年，公尚未见过这种仪式，觉得有趣，随口之言，日后竟成为"荣膺"右派的主要罪证。

公有肺疾。当上右派后，令其在校看图书。有人说："不行，会传播肺结核病。"遂逐出校门，送城北某生产队监督劳动。生产队待其颇宽容，让公记记账，去城里搞些采购。我当时尚自由，曾在城里遇见他两次，肩挎草帽，卷着裤腿，风尘仆仆，笑嘻嘻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白胖了许多。

四清时期，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飞机农场监督改造。吃的不行，劳动强度又大，孱弱的他怎堪承受？据说某监管人员，转业军人，突击刨了十分钟荒地，然后拉皮尺一量，算出面积，扩展为劳教人员一班四个小时的工作量，作为基本定额。一日两班，完不成就是"不老实"，就要开展斗争，并克扣伙食（就是不扣也不够吃）。以公之耿介、羸弱，所受际遇，可想而知，批斗，毒打，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监管负责人令几个右派用担架把他送到县公安局，因其拒不接受改造。将息几日，略有恢复，有关方面就说："回去吧，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难友们对他十分同情。某日起床后，有人说："他昨晚很长时间没入睡，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等开饭再喊他。"然而，他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着几个右派拖到大堤上，挖个坑，草草掩埋。几个有气无力的右派，坑挖不了太深，据说不久就被野狗拖出来，啃了。如公尚在，今止八十来岁耳。

其妻李静，小学教师，年轻无子嗣，另嫁他人。公为独子，早孤。老母孤身一人，生活无着，又顶着地主分子帽子，凭着给人家拆洗缝

补挣钱度日。挨到文革，城镇居民下放，老人竟被遣放到陈庄公社梅屯大队去当“候补社员”，北关城里原有的房产易主。梅屯大队并无梅花可看，如何能接收这七十多岁的莲足老妪？便告之曰：“城里落实政策了，让你回去。”于是派一名社员，拉上板车，将老人连人带行李一起撂到了县城西关桥头。万幸，被公幼年同学刘树丹发现，接到家中。拨乱反正后，公得平反，老人家由县民政部门和砀山中学负担，安度晚年。寿高九十余，后事由砀中操办。

劫后余生，我怀念故人，曾拟前往询访刘树丹，然刘已中风失语多年。半个多世纪之后，有公之学生李从昕者，往访母校，问及当年所钦敬之王文焕老师，遍询砀中师生，物换星移，众皆茫然。当年曾经风度翩翩、谈吐幽默的王文焕公，自从被野狗啃食之后，连同他的名字，早已消失于茫茫尘寰。

补白：一九七〇年三月，湖南长沙召开两次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某日，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长沙的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十五年徒刑。

——————————————————————————————

在神的帐幕隐秘处　　袁相忱

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盛行的逻辑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没有中间路线的。由于我们不参加这个运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就被

官方质问：这个运动是个爱国运动，是政府支持的，你为什么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场有问题，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王明道先生是1955年被捕的，我是1958年，我俩都被认为是“首恶”，因此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1959年法院宣判我为无期徒刑时，问我上诉不上诉，我想，上诉也没有用，一切由神安排吧！所以没上诉，当年夏天就被押解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服刑。我被捕那年才44岁，有6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6岁，还有老母亲，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我内人的身上。我是反革命，他们便成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8口人要吃要穿，还得让6个孩子继续求学，把他们培养成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许多不可言状的痛苦与磨练，但由于神的保守，靠主胜过来了，她现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地服事主。

我被捕遭监禁，从表面上看是极大的不幸，但全能的主不会做错事，他所许可的都是美好的，我一点也没有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廿年的劳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与锻炼，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倘若我没被监禁，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斗整死，是神奇妙地保护了我；第二，我的身体绝不会被磨练得这样健康。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改犯吃的经常是高粱米和土豆；夏天穿一套单衣，冬天穿一套棉衣；每天要干9个小时的农田体力活。冬季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30多度，在零下20多度时仍要坚持出工，人们常说的“滴水成冰”我已深有体会，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脸水，回来时盆底盆边都有结冰。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这样艰苦的生活中，我却没有生过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这就是神迹。我被捕时身体很瘦弱，还戴着近视眼镜，人们都背后议论，说我不会活着回来了。在北大荒的劳改犯会出现下面三种结果：一种是投江或上吊自杀；另一种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种是通过劳改磨练，体质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我就是属于最后一种。我见到一些劳改犯死在那里，也曾想过自己是无期犯而且在劳动上又很差，不能立功减刑，做一个殉道者死在东北就算了，但我定意顺从主的安排，也是出于主，

我每天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平安度过那漫长艰苦的岁月，而且能够平安、健康的回来，这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奇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还要使用我。

我在劳改的这些年里没有遇过基督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因拒绝参加天主教爱国会而入狱的，有两位已死在劳改农场，另两位被释后还是不参加那个三自爱国会，他们说：我们要听从罗马教皇。我虽然没有遇过基督徒，更没有圣经阅读，但有两首诗歌成为我的力量，激励我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 27 篇，另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劳动中的休息时间，别人回到屋里去喝水吸烟，我就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愈唱愈有味道并重新获得力量。我深信主的保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特别是当我唱到"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我就更甘心顺服，等候听他说"忠心仆人"。神所要的是忠心，我愿做个忠心仆人，忠于主所托负。

在我被劳改的时候，其他犯人都说我是个好人，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追问，我只引领了刘浩、赵晓岩两名犯人清楚得救归向主，现在我们还常通信和寄给他们圣经与福音小册子等等。坐了多年的监牢，即使能拯救一个灵魂不死也是可贵的。我被释回家以后，由于精神上愉快、生活环境好，心中也满有主恩，因此身体恢复较快，目前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也没白，可是在灵性方面确实需要下功夫很好地充实。廿多年没有读圣经，记忆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紧读经求得启示和能力。当时自己有个强烈的感觉，已近 67 岁的我还能再活几年呢！不知哪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该怎样儆醒等候，又该怎样利用这短暂的晚年余生呢？要爱惜光阴，要竭尽全力去赎回已经白白浪费掉的廿多年光阴！要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单单为主而活，将来不但要去见主，还要交账。我们不过是主的管家，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要继续靠主忠心到底，迎着各种困难和阻力献出我的余生，使我将来向主交账时无愧，欢欢喜喜站在主的荣耀

里。

海外的肢体常常问我，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教会？我的回答是“祈祷”。请大家为三件事祈祷：第一，为那些将亡的灵魂祷告，因为全国信徒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第二，为那些新悔改的肢体祷告，解放后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们须栽培，要建立起众多在恩典中长进、在逼迫中为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们缺乏圣书，特别是工具书和培灵书籍，同时传道人又很少，他们怎能得到牧养呢？请切切为弟兄姊妹们生命成长、灵命造就祷告。第三，请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祷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祈祷神能使福音的门在中国大大敞开。请为这三件事祷告，神一定垂听你们的祈祷，在中国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深信世界最大的复兴是在中国，十二亿人口这么大的禾场正待你们来收割！

我和太太虽已年迈，但我们坚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主来。因每个人都要见主面而且要交账。愿你们不忘为大陆代祷，一直看到大的复兴在中国。阿们。

袁相忱被捕　　李迪雅

天热了，袁相忱牧师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妻子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

齐了，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被捕时就把棉衣一起带着。又过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袁相忱平时登台讲道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节俭，衣服鞋子除非穿破，才让梁惠珍去买。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袁相忱沉吟了一下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楞了一下，继而明白，丈夫已经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在眼框里打转。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当时从表面上看，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三自爱国教会；二是坚持到底不参加三自，听由他们逮捕。

除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似乎觉得信神与政府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四月十九日（一九五八年）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已经买好了。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着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就是穿着这双新布

鞋，带着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

四月十九日夜，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门，说“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着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到底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着，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赶忙跪下祷告。

袁相忱跟着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于什么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袁相忱就站起来，接着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晃，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着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紧接着，

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警察又接着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说完话，一摆手，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都进了屋。每人手里都拿着工具，二话不说，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做礼拜的房间）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着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着哭了起来。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着警察在那里搜寻。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洗礼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梁惠珍看也没看，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着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补白：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穿过兰州街头，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着死刑犯的一辆辆卡车。死刑犯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手里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脸色黑紫，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屏声静气，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此次行刑共有二十多个囚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其他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跑马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杜映华。

北京三自会　　李　克

1950 年 5 月，周恩来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的 19 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向他们摊牌。周说，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教会。随后，先后逮捕了最有影响的传道人倪柝声、王明道等人，皆以其不参加三自会打成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

1951 年 4 月 16 日至 21 日，政务院（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决定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王明道带领的教会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所以王拒绝参加这个会议。会上，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徒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大会期间还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的控诉活动。控诉至

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该杀!"从此全国开始基督教控诉运动。

1952 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全国各地未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时期的三朝元老）为会长，委派实权人物萧静（女）为总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地下中共党员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为骨干，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内容包括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等等。

1951 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替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

1952 年 8 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以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人士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人数总计 346 人。

1953 年 6 月 12 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

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学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7 月 22 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的主要矛盾。政府希望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对他采取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选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均被王拒绝。

1955 年 8 月 7 日，王明道牧师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牧师夫妇与 18 名信徒一同被捕。10 月 29 日，当局宣布三自以外的一切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的大会，凡支持同情王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逮捕。

王自己在狱中经受 14 个月的折磨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于 1956 年 9 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获得释放。出狱后，他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王明道这对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王明道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其妻被判 18 年。

1979 年，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其拖拉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

1979 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中共释放王明道，邓答应年底之前解决。警方告诉王，只要表示一下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

出去。”1980 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因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

王明道先生于 1991 年安然归主。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至 2002 年还继续写文章攻击王明道，将其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的罪名。

1957 年 12 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 200 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次年 7 月 15 日结束，时间长达 7 个月之久。学习期间，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工具，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揪出以三自会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 45 人（由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

社教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如右派分子）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 年大跃进，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教会公房，属于剥削阶级，而今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要按规定缴纳房租。教会的房产也被没收。

1958 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 70 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教会大批房产被移交房管局，无偿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房产皆如此，佛教的房产最多。许多宗教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私人占用、拆除、转让。三自干部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政府出于外交需要，1958 年之后，北京保留了东西南北四个教堂。

东城保留了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转让给学校。米市大街原圣经会的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西城被保留的教堂是原中华基督教会的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南堂即原卫理公会的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负责。北堂是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

此四堂负责人，皆由政府选派。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四人，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其他人则是在教会中有影响，且政治上可靠。

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北京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系统已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教会不同宗派的名称皆被取消，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 100 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 1966 年 8 月文化大革命。文革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对三自干部来说那是求之不得，他们觉得三自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基督教的历史终于要在中国结束了。一个三自领导说：“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基督教在他们手里死了，他们是有功之臣，一定能捞点政治实惠。他们向红卫兵极力献策，成为红卫兵的参谋。几个三自干部甚至组成基督教造反小组，在东单散发反基督教传单。一位姓王的“三自专家”撰写《消灭基督教三自运动声明》传单，然后叫大家在声明上签名，然后叫红卫兵将此声明传单借串连向全国各地散发。王说：“三自运动是给帝国主义保教的保护伞，若没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灭了。”王某在教会负责掌管教牧人员的档案资料，她按教牧人员的姓氏笔画编号，然后把编序的名单交给红卫兵，供其按号批斗。

在米市大街五号，红卫兵私设公堂，将反动教牧人员和信徒押到三自会进行批斗，毒打致死，甚至批斗尸体。在红卫兵进驻期间，教

牧人员除了接受批斗，还要参加手工劳动，三自和教会皆既被取消，停发工资，每人只按 12 元的标准发给生活费。

1967 年 11 月，政府和三自突然下令，将所有人员赶到郊区西北旺基督教公墓劳动改造。政府在此开辟了天、基、佛、伊四教劳动生产基地，由三自干部要士璟、林祥增、吴廷萱负责管理。传统的家庭生活被打乱，有的家庭妻离子散，老幼无人照管，工资停发，贫困交加。初期不许回家，没有休息日，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继续进行批斗。劳动首先是削平坟头，推到石碑，砸碑盖房，养猪种菜，建食堂，挖坟掘墓，栽种果树，开水稻田。

1973 年至 1979 年，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一、首先是补发工资，将“四教生产队”并入民政局西北旺果树队，纳入农场正式编制，由果树队发工资。二、民政局在佛教广化寺成立宗教人员管理所，将老弱的神父、修女、比丘尼、牧师、传道人等组织起来，参加手工劳动，由政府统一管理。三、在原米市堂恢复对外宗教活动接待点，只供外国人参加，由三自干部陈文润、王毓华、阚学卿和教牧人员殷继增、刘仲和、石泽生、王耀清等政治可靠的人物负责外事活动。

当时基督教尚未正式恢复活动，我（李克）因病不能继续在西北旺劳动，就调到广化寺宗教人员管理所参加手工劳动，1977 年调到天主教南堂工作，参与外事活动。政府认为，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天主教工作，政治影响不利，又将我和其他教牧人员调到佛教雍和宫参加管理工作。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对宗教也进行拨乱反正，因反三自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判无期的都将无罪释放。

1980 年 7 月 13 日，缸瓦市教会正式复堂。1958 年之后，我一直是缸瓦市教会的正式工作人员。文革期间因对政府宗教政策表示异议，在教会恢复之初又发出反三自的言论，引起政府不满，遂将我排除在教会之外。我向政府干部据理力争，称理当恢复我在缸瓦市教会的工作。将一个基督徒安置在佛教雍和宫工作，显然有悖当下的宗教政策，

政府干部自觉理亏，终于让我回到缸瓦市教会。

1981 年 4 月 12 日，三自会在缸瓦市教会举行封牧圣典，会上宣布:“按立已经在教会传道多年，但在剧变的历史年代里未获按立机会的传道人，特按立石泽生和李克为北京教会牧师。”这是 1949 年以后北京首次封立圣典。

遥祭六姑妈　　陈仁德

今天下午 4：26 分，我正在报社值班，堂弟渝德从西彭打来电话说，他刚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妈在 20 分钟前去世了，享年 81 岁。刚放下电话，琳姐的电话又来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最后一个同胞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至此，父辈七个兄弟姐妹已经全部谢世。

这是我们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还在电话上约定，春节一定要去乡下给六姑妈拜年。没想到，就在春节还有最后几天就到来的时候，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思之曷胜悲痛。

六姑妈叫陈懋蘅，是我爷爷的幺女，可谓出生名门。很小的时候，六姑妈就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红技艺十分精巧，剪裁缝纫挑花绣朵无一不精，那时没有听说过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几个姑妈自己手工缝制，所有的枕套帐檐都是她们自己手工刺绣，那真是美丽，现在看来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了。六姑妈的手艺非

常好，我还记得，小时家里吃面，不管是面条还是馄饨（我们那里叫包面），都是六姑妈用擀面棒擀成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面皮，再叠在一起切成的面条或者馄饨皮，面条又细又软，馄饨皮又匀又薄，比起后来那些机器压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个人吧，六姑妈从合面到下锅，好象并没有要多少时间就全做好了。

有谁愿意相信，像六姑妈这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竟是在悲剧中度过的。那个荒唐的时代，强加给了她过多的苦难。

在六姑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爷爷就将她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回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对这样的门第，我爷爷当然是满意的。陶家也为能和我们家联姻而高兴。

1949 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开始成为阶下囚，我的幺叔从重庆写信给我爷爷，说六姑妈的婚约应该作废，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则要受罪。我爷爷却听不进，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 1950 年正月十二那天将六姑妈嫁给了陶家。那年六姑妈 23 岁，从此，六姑妈就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62 年，我爷爷在临终前流着泪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

六姑妈嫁到陶家的当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极的运动便杀气腾腾的开展起来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民兵们拥到他们家去分胜利果实，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六姑妈结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被搬走，他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剥下来，就连泡咸菜的坛子都不放过，最后连尿罐都拿走了。陶华轩老大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和一座很气派的生茔，也都成了民兵们的胜利果实。

这还不算，接下来就是极其残酷的斗争。

民兵们把陶华轩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

个拇指夹住，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我六姑妈和全家人被强行押在旁边看，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六姑爷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有旧情。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六姑爷就这样被撤消校长职务开除回家了。民兵们硬要六姑爷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六姑爷是知书识礼之人，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六姑爷和六姑妈偷偷地相对痛哭。

陶华轩老大人，还有叔公陶馥轩和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六姑妈和姑爷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三人，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陶华轩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长叹：“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随即父子叔侄同时罹难。六姑妈和姑爷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看着父亲、叔叔和哥哥无端横尸江头，六姑妈和姑爷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年春节，六姑妈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

去要饭。六姑爷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六姑妈也是大家闺秀，过年的时候双双去走村要饭，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六姑妈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死去。

1961 年，六姑爷在特大饥荒中饿死，丢下六姑妈和只有几岁的儿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时我六姑妈才 34 岁，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坚决的拒绝了，她就带着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我爷爷在日记中对六姑妈有这样的记述："蘅女过河来，谈及该区队伙食团已经停止吃红苕，每人每顿只供应荞子二两。此子鸠形鹄面，枯瘦如柴，情实可悯。""蘅女每日抱病劳作，又出夜工，没有休息时间，情实可怜，此子将死于是乡矣，一叹！"

我爷爷是 1962 年 7 月逝世的，也是死于饥饿。5 月 1 日那天，他已经不行了，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战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 年 5 月 1 日写。"我每次读到爷爷的这段血泪所成的《补抄》，无不为之感伤。

生活上的艰辛已经难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妈是 1950 年结婚到陶家的，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以 1949 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成分，六姑妈是无论如何也划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们硬是把六姑妈定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么训话呀斗争呀苦役呀，一样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姑妈就冤枉当了几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当然从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视中长大，成了文盲一个，除了种田什么也不会。

我伯父还在我爷爷之前就饿死了，爷爷死后，我父亲和我幺叔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嘱，尽量照顾六姑妈，但是，在漫长的恐怖与饥寒交织的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又能救六姑妈出水火呢，父亲和幺叔也只能尽力而为。2003 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刚刚好转后，

坚持要到乡下六姑妈家里去度过自己的 87 岁生日。到六姑妈那里有很长一段山路不能通车，我们是请人将父亲背过去的。父亲和六姑妈一见面，两人都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我们劝了好久才劝住了。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把酒席摆到屋外的院坝里，大家一起向父亲和六姑妈敬酒，真是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想到，历尽无数苦难后，父亲和六姑妈都是如此高寿。

2005 年冬天，父亲去世了，我们在电话上将噩耗告诉六姑妈后，六姑妈当即失声痛哭，要下山渡江来奔丧。那时六姑妈已经很衰弱了，我们害怕她到灵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没让她进城来，结果她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现在想起，还是应该让她来呀。

去年回家过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储兄瑜妹一起，过江登山，去给六姑妈拜年。她看到我们高兴极了，忙着和新明一起去做饭款待我们。新明 50 出头，满手硬茧，头发花白，还好，他儿子熙忠再没当"地主崽"，从商校毕业后已经在复兴镇工作多年。我们去了一会，他就骑着摩托赶回来了。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对奶奶很孝顺。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姑妈，临别时，她老人家坚持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了很远来送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些内侄儿好啊。"

本来说定了 2006 年农历六月初五我们一起去给六姑妈拜寿，那天是她八十大寿，结果到了那天，我却远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给她拜寿的机会。

六姑妈永远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六姑爷，和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相聚在地下了。

———————————————————————————————

补白：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因反右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

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枪毙。

———————————————————————————————

两个坏分子　　崔光宇

我们的村子很小，文革来了，凑齐四类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坏分子”的头衔加给谁，当时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最后是把村上两个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定为坏分子。

这两个人，一个在天津银行当过职员，一个在天津布店当过学徒。两人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见过大世面，人缘也都挺好，自被打为坏分子，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几岁，腰也变得弯曲起来，见谁都是一脸卑微，有人从身边走过，会马上停下来，谦卑地打过招呼，身子侧转，将路让于别人，待人走过后才迈着细碎的步子小心走过，一脸凄惶。

银行职员还写得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无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但那时却成了加深自身罪状的证明。家中收藏的字画书籍被全部烧掉，毛笔砚台被砸烂，虽然后来经常被大队叫去写各种大字报，笔下的字迹仍是铁钩银画、苍劲有力，但他那诚慌诚恐的样子，看了让人揪心。

那时冬天特别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已是大雪封门，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扫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们必须早早起来，将雪扫净，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见不到积雪。

他们的任何一点不慎，都可能为自己招来屈辱。任凭他们怎么小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不测之祸、不测之辱随时会降临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时，生产队的马车拉高粱，中途遗落了几穗，正好被布店学徒发现，便随手捡起，放在自己的背筐，进村时被人看到，立即遭

到民兵一顿暴打，并将高粱穗串成串，挂在脖子上游斗，自己敲着锣，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盗分子”，那种对人格的侮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976 年毛去世时，银行职员晚上喝了两盅酒，被人举报到大队。这个时候竟敢喝酒，当然是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这不是一般的酒，是庆贺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干部立即组织民兵抓人，连夜召开批斗大会，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强迫彻底交待自己妄图变天复辟的险恶用心，并不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一个月后被放出来时，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这两人都有几个儿子，而且个个聪明帅气，但因受家庭影响，都找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文革结束摘帽时，儿子们早已错过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前年，银行职员的最后一个儿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断了根。布店学徒只有小儿子娶了媳妇，还脑子有毛病，生了个傻儿子。两个家庭，就这样轻易地毁掉了。

——————————————————————————————

补白：张师亮，河北涞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抗战期间与范文澜、嵇文甫在河南大学并称进步三教授，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抗战胜利后，张到北平负责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受到共产党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因批评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被造反派指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被枪决。

刑事罪名种种　小　闲

去外地出差，与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说笑话解闷。一位老法官说，他 1975 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 1950 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尤其对罪名的认定，随意性很大。为了争取政治正确，那时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有一次，某村发生奸尸案，搁现在，当然定侮辱尸体罪，可是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曰反革命不讲卫生罪。大家哄笑。

另一位法官接着讲了另一个罪名故事。“90 年代我们搞案件复查，发现一个案子。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那女工耳朵里，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法院，怎么定罪呢？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有人反对，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硬说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判刑 10 年。”

一位女法官嫌这些案例恶俗，便讲个带点浪漫色彩的故事。有个村子，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提议定为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

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大家聊得热烈，笑得声大，一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同志开口道：“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昆明，80 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 LV 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有一天无聊，跟朋友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朋友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吃完了，漱了口，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那家伙反悔了，赖账不给。朋友火了，要打他。那人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了，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不同的是，朋友吃的是新拉的屎，没事儿，那人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答应，把吃屎没事的那位扭到公安机关。怎么定罪呢？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贪婪罪？都不妥，最后定为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判刑 15 年。”

——————————————————————————————————

补白：兰州农校教师，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回来的毛应斗先生的小妹毛应星，因口诛笔伐林彪等人，在甘肃省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被枪决。甘肃省人民医院技术副院长、外科主任，著名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李树华，给甘肃省皋兰县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最终病人不治而亡，造反派诬陷他搞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以反革命杀人犯的罪名判其死刑，执行枪决。枪毙李树华那天，由于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东岗坡下的五里埔大桥，甘肃省卫生学校的造反派将全体牛鬼蛇神集中在桥头，列队观看，接受教育。熊如岩、李志桥、王继光等回到牛棚后，吓得精神错乱，其后一个个自杀失踪，后来只有熊如岩的尸体找到了。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　　黄　芩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上初中，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任课老师是一位北大毕业生，说话细声慢语，不慌不忙，动作优雅，穿着得体，课讲的也很生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因此她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有一天，讲人体骨骼结构，那位老师推着一个挂着一副骨骼的架子进了教室。到了教室，那骨骼在架子上晃呀晃的，好长时间没停下来。当时我认为是骨骼模型，不是真人骨骼，因而看上去虽感不舒服，心里倒也不太害怕。上课了，老师细声慢语告诉我们，这是一副真的骨架。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感到浑身不舒服。可能不止一个人像我这样流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位老师就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的，一个 50 多岁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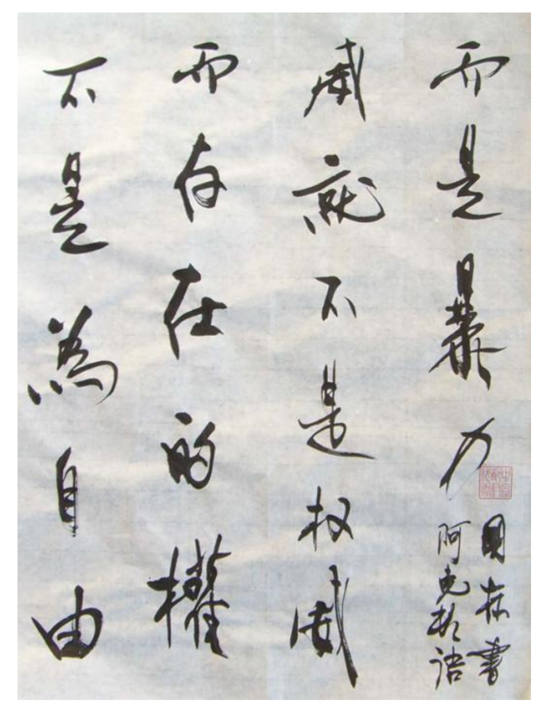
仿佛是一服镇静剂，老师的话让我们安静下来，我顿时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不再害怕，认真地上完那堂课。下课时，那副骨架又随着老师的身影晃呀晃呀的去了。

几十年之后，我常常回想，多么可怕的逻辑啊，多么麻木的人群啊，多么成功的洗脑运动啊，以至于一个半大的孩子，当听到那人是反革命时，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骼，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课，可以紧盯着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体的结构，可以觉得他就应该挂在那里晃呀晃的给人看。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人的肉体，也同时杀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的灵魂。

我的祖辈　　张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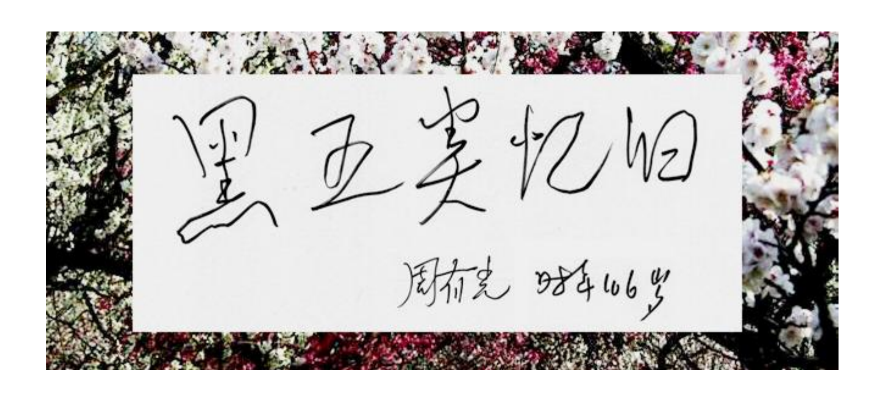
我妈的爷爷是北京通县最大的大地主，叫金玉山，有一万多亩地，但是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弯黄瓜”。为什么叫“弯黄瓜”呢？因为他家种的黄瓜，直的好的拿去卖了，自己吃的都是弯的坏的。他跟长工一起做工，跟长工一起吃饭。他最初是富农，后来到张家口外卖柿子，挣些钱，土地越积越多，成为大地主。

我妈妈的父亲叫金志望，是右派。中共刚建国不久，办个什么党校，他作为干部参加培训，当时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刘少奇、朱德等人经常去党校讲话，有一次我外公请刘少奇在他笔记本里签字，后来这个签字就成为他上了刘少奇黑船的证据。外公家庭出身大地主，再加上有刘少奇给他签过名，霉倒得大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看见外公到我们家这边来掏大粪。他是北京大学农业系毕业呀，但是最后被打倒了，到农村各家掏大粪。我看见他，他也不跟我说话，我问我妈：“为什么外公不跟我说话呀？”我妈说：“他不行，他成分不好，他跟你说话，别人就去汇报了。”我当时很小，不懂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外公被打得很惨，浑身是伤，身上被人倒了很多氨水，一个农民把他拽到一边，给他泼上点水，说：“没有事了。”



我爷爷呢，是地富反坏右里的坏分子。为什么是坏分子呢？过去我家在北京城前门有两家茶叶店，一个叫“大富记”，一个叫“小富记”，我爷爷既是品茶员，又是老板。我爷爷结交三教九流，不讲国民党、共产党、土匪、汉奸，都是好朋友。1949 年共产党打进北平了，我爷爷也举着旗去欢迎去，然后就成为欢迎解放大军招待所的所长。在那里，他做事有过去封建社会老板的习惯，被刷了下来，于是就毅然会回通县老家农村，参与土改分地。我爷爷分得十六亩地，不久就把这些地全卖了，吃了喝了玩了。很快就是合作社，许多人苦干了几年，挣得家大业大，买了大骡子大马，此时合作社一来，全被合进去了，我爷爷却以纯无产阶级入社。他多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早知道那毛泽东不会白给我地的，所以我就把分得的地全卖了，然后我光杆儿入社，一点亏没吃。我走毛泽东前边。”

阿克顿语　　焦国标书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第 11 期

卷首文——

神农架野人的第三个品种　　焦国标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太久太多了，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都形成了自己关于神农架野人的观念。在我大脑里形成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印象里，神农架野人有两种：一种属于某种迄今未明的生物，另一种属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鬼怪。拜读了本期彭小明先生的大作《神农架日记节选》，我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分类知识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即神农架野人还有第三种——因社会政治原因逃进神农架从此与人世隔绝的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普通人。

彭小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78 级的学生，现居德国。三年级（1981

年）暑假期间，他曾去神农架进行民歌采风。此行固然采集到许多“淳朴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更听到了一些流传于当地而不为外人所不知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外间传说的神农架野人，其实并非野人，而是从人间逃入深山的地主富农。日记中冯静美（化名）的故事，就是林区一个妇女干部讲给小明听的。“冯静美的家庭故事梗概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给我的震撼是难以磨灭的。”小明兄在日前发给我的 Email 中写道。当时那里的干部们特别叮嘱小明，这种消息“过去一直不让泄”，因而告诫小明不要对外讲。

汉语里无主（语）句很多——过去谁不让外泄？这里省略了主语，当然是当地政府。小明向他们承诺，保证守口如瓶。“但是我心里十分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决不会永远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里总不能平静。”

小明在另一篇写给我的 Email 中说：“我一直觉得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共产党的样板戏《白毛女》是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但是并不排除它的历史真实性。我听到的这一传闻，也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存在。”白毛仙姑的故事，事实已经证明确有其原型。我坚信，让彭小明先生 30 年来一直内心不安的冯家故事，也一定是神农架地区确曾发生的真实的历史。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比地主富农的历史长久得多。换言之，在共产党制造地主富农之前，神农架早已有野人。不用说，那时的第三种野人不是被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逼进神农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而是因其他社会政治原因不得不逃进深山、远离尘世的弃民。我在给小明兄的回信中写道：“如此说来，当今传说的神农架野人有一个另外的来源，即政治贱民；那么历史上神农架的野人也完全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社会政治原因变成的野人。公开冯家的故事，意义非同寻常。谢谢你！”

2011-2-28　北京

目　录

父亲未享的临终关怀　　陈士濂

我的老家在浙江浦江县。小叔陈肇英，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结拜兄弟，1926 年中山舰事件时任虎门要塞司令，受蒋之命，带领亲信抓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因此被中共定格为反共的国民党右翼人物。

1949 年，小叔携婶娘去了台湾，一直在老家管理家务的大叔只身仓皇出逃。我的父亲 1947 年致仕，归里后始终固守家园。他虽然供职国民政府多年，曾担任市县税务局局长等职，但自信并无血债，在乡民中口碑尚好，故抱有侥幸念头，希望能获得新政权的宽大，想在与家人的团聚中了此残生。

1950 年秋末，父亲被拘捕入狱。51 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村里传出消息，第二天乡上要召开公审大会，有一批人犯要从县上押送过来。那时正是镇反高潮，公审大会常在较大的村镇举行，随后就地枪决被公审者。村里有关系较近的人偷偷来我家，说明日犯人中很可能有我父亲，让我们做些准备。

大人们除了商议后事，觉得家中最好有个人去参加大会，以见我父亲最后一面。谁能进得这森严的会场呢？村里的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有组织的队伍，我家的大人没一个挨得上边，唯一可能进会场的只有我。那时我 12 岁，正在村旁的中山中学上初中，于是法场探父的重任就落在我肩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学校去乡政府的路旁。每逢乡里有大型集会，学校的军乐队都要参加。果然，这天也不例外。当敲着铜鼓吹着军号的队伍来到跟前时，我突然从路边闯了进去，向带队的老师说明了原委，希望他们能带我进入会场。老师很通情达理，答应让我随军乐队同去，但一再嘱咐我：“你可不能在里面哭喊。”

大会在一个晒谷用的大明堂里举行，原来空旷的场地上站满了人，

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坐着几个军政干部。宣布开会后，先是奏乐，我的那些同学们急忙吹打起来。接着是一声威严的吆喝："把犯人押上来！"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人押一个，从场外将犯人带进会场。

他们就在军乐队前经过，一个，又一个，突然，我看见了犯人队伍中的父亲。入狱不到一百天，父亲的变化太大了：本已苍老的脸，现在又瘦削又憔悴，加上满头的白发，满脸的乱须，真是惨不忍睹。他被推搡着踉踉跄跄一闪而过，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混在军乐队中的我。

受公审的犯人被押在主席台的一侧，离军乐队不远，我能清楚地看见父亲。他一直低着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只是他那一头白发。

主席台上有人在宣读一个个犯人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判决，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在这难得的瞬间抬起头来张望一下，这样他就可以见到我，他的目光就能和我的目光相接。我是他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能见到我对他将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没有抬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始终只是那一头白发。我想走过去，轻轻地喊他一声，但我没敢举步。我想起了临来时老师的嘱咐，我知道一个佩带红领巾的少年，要在会场上喊叫那犯人父亲，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寄微弱的希望于判决。

我注意到，前面的几次判决都是引用法律的某一条款，随之传来的就是无情的枪声。当宣布父亲的罪状并引用法律条款时，我希望不再是那一条。确实，条款的引用与我所希望的那样与前边有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父亲与那些有血债的土匪有所区别，因而判决也会不一样？我正暗自这么思忖，父亲已从主席台边被拎出去了。动作是那样的快捷，我都来不及最后看他一眼，就听见了一记沉重的枪声……

作为县内知名的官僚地主，作为反动阵营中的成员，父亲的被处决，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时尚年幼的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我在老师的动员下，上台揭发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令我遗憾至今的是，父亲临刑前我竟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没能让他听我最后叫一声爸爸！儿子对父亲的这一特殊临终关怀，再也无法兑现！

父亲的尸体，是由我哥和村里的亲友抬回的。母亲哭泣着抚摸尸体时，发现他穿的水獭皮袍子领口处被枪弹打坏一小片。第二天出殡，预定抬棺材的几位亲友却受到驻村土改工作队董姓队员的告诫，不许他们为反革命效力。看来只有得到董的同意，父亲的灵柩才能抬入墓地。我母亲从他人口中得知，董非常属意我父亲那件皮袍，就连忙赶去找他，答应以一担谷子的价钱将皮袍子拱手相让。那一担谷子后来也并没有抬进我家，因为我家还欠着政府称为“余粮”的数额庞大的剥削账款，那谷子就作为欠款的一部分被扣除了。父亲的皮袍被从身上剥了下来，但遗体总算被恩准由那些亲友送进了坟茔。

我的父辈解放后或逃或死或关，我的同辈兄嫂广受株连。我的二嫂于雪兰，三岁时由我的大婶抱养来做我二哥陈述的童养媳。二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 年欲回家完婚，被我小叔陈肇英止住，参加了东征，在淡水战役中阵亡。蒋介石曾为此致陈肇英唁函：“若侄即吾侄，为国捐躯，深表凄楚。”作为未亡人的二嫂，从十七岁开始在我家守寡，其职责就是伺候公婆，抚育侄儿侄女，并无恶行，土改时亦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且因婆婆年老体弱，由她顶替婆婆接受批斗，挨骂被打。婆婆去世后，虽然名义上给她过继了子女，但都不在身边。2007 年 90 岁时，二嫂孤苦伶仃地在老屋去世。后来我在 1998 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里查知，二哥陈述在 1924 年军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火星剧社活动”。可是这位革命烈士的未亡人，竟然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低头弯腰地当了 30 年的“地主婆”!

我的同父异母兄长陈士琨，毕业于福建师专，曾任教于连江县中，1947 年回中山中学执教，小叔去台湾后由他接任校董事长。土改时，他被接管后的校方解聘，驱回乡村定为地主分子受管制，从 30 岁后就一直在家务农。1987 年，浦江县法院以错定成分撤销其地主分子帽子，但其时的他已近古稀之年，这份迟到的改判书已无实际意义。

2009 年，中山中学举行 70 周年校庆，他以学校老董事长身份受邀，却被冷落在末席。但他已有一种苦涩的满足：整整一个甲子了，

还能在有生之年重回这所他服务多年的学校，是多么的难得啊！更可怜的是，因受他牵连，其子女无一人参军招干，没一个有初中以上的学历，全都务农或打工。有一次回家，在村头杂货店里我遇见正在打牌的他的儿子。只是玩的五毛、一块的小麻将，竟让我这位侄子在输钱后发出慨叹："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穷人!"闻听此言我一阵凄然，我最多只能偶尔接济哥哥，对于他贫困的下一代，实在是无能为力!

——

补白：共产党对待日军战犯相当宽容和人道，抚顺战犯管理所伙食丰富，所关押的日本军人都是直接负有战争罪责或亲手虐杀残害抗日志士和人民的侵略者、法西斯三光政策的罪犯和凶手，但是没有酷刑和虐待，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刑罚为二十年，而且都没有服满刑期，大多在十年左右获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不少人是抗日勇士，忽然成为内战败将和劳改犯。他们的刑期动辄十年十五年，上诉被认为是对党和政府不满，给予加刑。这样的冤屈至今没有全面系统的伸张。还有大量默默而死的囚徒，无人为他们申诉，连名义上的平反都没有得到。　　　　　彭小明

——

范中奎的锹把　　俞加深

范中奎是我在青海省刚察县青海湖劳改农场时的难友，又是江苏启东同乡。老范比我早到这个农场，在农场赶上了那场大饥荒。老范是一个赶牛车的把式，大饥荒那一阵，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早晨套车把饿死的三五个劳改犯尸体拉走，埋掉。每埋掉一个死人，老范就在他的锹把上刻一道痕。埋掉的人，没有墓地，也不立墓碑，只是在

东山脚下挖个坑，扔下尸体，盖上几锹沙土，别让野狼扒走吃了，就算万事大吉。

老范常常给我讲，那时人人浮肿，很少有人出工，经常有人拉肚子，一拉稀就离呜呼哀哉不远了。活着的人，白天晒太阳，天黑后强打精神，在监房墙角架三块土胚，用破锅炒青稞，然后整夜不睡，慢慢嚼着半生不熟的青稞粒。有的人嚼起来无法停止，吃撑了就喝凉水，第二天早晨胀死了。

这些人白天不出工，夜里监房里哪来的青稞？老范说，是出工的犯人与不出工的犯人私下交易而来的。出工到打麦场上扬场的，赶马车拉粮食的，打扫麦场的，都有机会接触粮食。比如打扫麦场的，把打扫起来的马粪放在水渠里淘洗，像淘金那样，可以淘出许多青稞粒，晒干后就装进由劳改服裤脚缝制成的黑色布袋里。

劳改队禁止犯人将任何食物带进大墙内。出工的犯人天黑整队回监时，为了查禁青稞，狱方在大门口挂上马灯。每个犯人报数后，他们还要用手电逐一照其双手和裤腿，看手里是否拿有东西，裤腿是否被扎起来。

那么他们用什么高招将青稞带进大墙呢？老范告诉我，玩魔术。预先在黑布袋上栓一根线，等队长用手电照着报数时，就将手里的黑布袋扔在身后。队长照过，说“进”，犯人就拉紧黑线，将黑布袋收入腋下或怀里，列队进院。出工的犯人就拿这些挖空心思带进来的青稞，换不出工犯人平时省下来的新劳改服、鞋袜等物。

文革期间，我被卷入狱内一桩冤案，没日没夜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说是批斗，其实比酷刑还厉害，二十天下来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真是生不如死。批斗期间，范中奎从未动我一手指头。粉碎四人帮后，我提前获释，后来托人打听范中奎的下落，说两年前因病故世了。我不善罢干休，亲自去东山乱坟岗探望。但见一个个风沙吹成的小丘，没有木牌和石碑，这就是劳改犯们的最后归宿。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脑海里始终忘不掉范中奎的锹把，上面的刻痕足有数百道之多，那是经他手埋葬的尸体数。

——————————————————————————————————————

补白：那些年，每到岁末，劳累一天之后，不仅要参加单位对我的评审会，还要参加居委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我。1971 年 12 月下旬某晚，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致开场白之后，一帮街道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其强词夺理、无事生非、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接着告诫我今后要积极主动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不积极主动改造，就不会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官僚！”指责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我一听这两个字，就明白了自己平日在这帮人心目中的印象。这是无意间为我提供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了平日的自己。我参加过无数次此类评审会，几乎每次都令我愤慨，唯独这回令我欣慰，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看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

上海大抄家　　刘文忠

1966 年红八月，大上海变成腥风血雨的大海洋。过去整洁的南京路，如今成为一批批红卫兵横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前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过路人的小裤脚管也在被剪之列，烫发的妇女更被残暴地剪成光头。十里长街，处处慌乱，处处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妇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处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

贴出大字报："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有的餐馆甚至贴出所谓革命通知书，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专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脚踏踹。

我家也遭劫难，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连续到我家抄家。他们拿着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冲锋一般打上门来。一进来就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反革命人家，过去是地主资本家，一定私藏金银财宝，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抽打我父亲。

有一次，他们抄到我母亲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几只手镯、翡翠、玉片，如获至宝，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红卫兵在地上抢夺碎片。几个红卫兵在我母亲的箱橱里抄到几幅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画。他们不知其贵，只是好奇地传观。一个红卫兵上来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一把夺过，撕碎掷出窗外，跳着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的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的父亲刘宗汉曾经当过国民党专员，红卫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辩解说："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呵斥他狡赖、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冲着用皮带抽他。一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从一本旧书中搜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激动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父亲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西装，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还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的合影。

红卫兵指着照片，点戳着我父亲的脸，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

老实交代，这是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面对他们的吼叫乱骂，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和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的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么代表人民？还在放毒！”“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红卫兵小将！”

往昔的荣耀使老人勇气倍增，他伸手拣出张照片，说道：“喏，这一张，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同志。”又指着另一张说：“这个美国人，是抗日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那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又从另一本书中找到一张大照片，惊叫道：“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那是一张父亲当年做京剧票友，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几个红卫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按背，弯腰 90 度，双肩后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辉堆放在床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被他们一本本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他们认为好看的，就扔进一只大纸箱，准备带走。三个爱书如命，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撕书声犹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释，阻止他们的恶行。四五个红卫兵冲上来，对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骂道：“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籍，不是外国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烧掉，看他今后怎么看！”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已出门，又返回来，强行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阻：“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帐，当心你们的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里的不和，随时都会变成暗箭和诬告，再由此造成被斗争、抄家。有一天，一个邻

居到派出所密告，说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在屋后花园里藏东西。一批红卫兵很快冲进来，在我家花园内乱掘猛挖，花木全被毁。

与我们同住的 4 个外甥，大的 16 岁，小的 8 岁，吓得哇哇大叫，围在老外婆身边痛哭发抖，有的甚至钻到床下。

我家对面住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姓高，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背后都夸她漂亮，有气质。那天红卫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的阿姨妈妈们看到后，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荡妇才会穿。有的学生指着被批斗的高教师骂："不要脸，淫妇！"围观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叫喊起哄："给她剪了，剪了，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骂道："骚货，看上去那么漂亮，想不到思想这么肮脏！"有人叫着出主意："狠狠批斗！把肮东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红卫兵们听到起哄人群的恶作剧创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高老师头颈上，推搡着、作践着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后面跟着一长串看热闹的人。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说北京大兴县杀害 300 多名四类分子，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38 天，有 22 家被杀绝。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墙上贴的毛像说："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债，否则天理不容！"

———————————————————————————

补白：1966 年 9 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急响，接着听见积极分子邱某高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然后激动地宣布："刚

才，刘书记发现了一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宰）世界，已经派小丁去报案了。”这帮人把“主宰”读作“主牢”。小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平时我就抽开封生产的铁塔牌香烟，便宜，一毛几分钱一盒。当晚回家，我把那烟盒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不抽铁塔烟了。次日一早，我刚踏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本地生产的廉价烟“大公鸡”，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看去来有点失望。此后他们没再提这次阶级斗争新动向。

————————————————————————————————————

整人专家衣竹林　　聂步腾

1966 年，四清工作团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 1436 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衣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四清期间，以他为首的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当时是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 414 人，涉及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团专审我 15 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用的酷刑有 10 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搞假案遭撤职，调到公安部当副科长，后来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那几年，他在尖扎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在化隆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去循化县又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四清时他来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 1958 年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就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 14 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罪，衣竹林却说我在 1958 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没有这样的事。”我对他说：“58 年你带我们公安厅工作组，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眼镜，扶了扶眼镜说：“哦！1958 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 58 年叛乱的帽子扣我头上，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叫我说什么好。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 80 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 3 头牛，半个帐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 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 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

噫！就这么给我定了 14 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

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我妻子有个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图案，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那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来的，放在多伦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后来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几个人见了这个小木箱，张 XX 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们审问我："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 个人看守我。白天开批斗会，晚上睡下后，半夜整起来再审问。

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么我对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被打得无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写的："他（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这些是谁说的？""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别人啊。"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感叹词）！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啊。" 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啊？"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十二三个，死掉的群众还不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音），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的，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工作开会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我们曾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硬编造出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豹子崖会议。豹子崖会议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是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那些会议本来都是安排生产、传达文件的会议。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什么反革命叛乱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家安排了（分给）1 只羊，共 25 只，后来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团要撤掉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他们不答应。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后，州委书记王风（音）发火了：“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州委是干啥的？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

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 10 个县的县长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呢？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做临时工，在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直到 1979 年落实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国最惨，1958 年被捕，后来又释放，恢复了县长的职务。67 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 14 年的牢。

那个时候，县武装部一个干事到山里去打野牲，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来祁连调查，说这人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头上，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凭空捏造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祁连县全县 7 个公社的 28 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978 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案平反了，郭被释放，安排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出来就死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走到阿日开，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都来了。查了以后，没有叛乱这回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会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啊！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衣竹林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门口。我说："厅长好着啥！"他说："你好着啥！"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给我）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吧。"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杨毓东牧师　　刘凤钢

北京西单缸瓦市教堂牧师杨毓东，生于 1920 年，辽宁辽阳人，三代蒙主恩。祖父杨凤翔，19 世纪 80 年代领洗归主。1948 年，28 岁的杨毓东，东北神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实习。1949 年初，共军兵临城下，长老、牧师都吓跑了，教会礼拜自动停止。共产党接管政权初，党政军都想占教会的房子，教会无人伸头。杨毓东认为教会是属于主的，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于是就主动出来应酬交涉。共产政权渐稳，聚会开始恢复，长老、牧师看这个年轻人能扛事，还能讲道，就请求区会，批准他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

1957 年夏，反右突起。为配合运动，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 12 月 26 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会议期间，45 名基督徒被打成右派，杨第一个被揪出来，判劳动教养。

1962 年，劳教期满，不得获释，被押往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不久又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北大荒。在那里，杨受尽折磨，生活艰难，甚至连吃盐都须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每人只有一个蚊帐，睡

在帐蓬里的草地上，与蛤蟆、昆虫同眠。环境恶劣，超强劳动，严重营养不良，杨毓东终于病倒。杨师母向政府请求丈夫回家养病，不被批准。后来，杨师母因病住院做手术，需要照顾，官方经过核实，才允许杨毓东回家看顾病妻和 3 个月的幼子，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是 1962 年圣诞节的早晨。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杨毓东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凡与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走狗、特务，批倒批臭。杨毓东被赶至乡下，直到 1978 年才重返北京。

回北京后，三自会不想让他讲道，把他分到佛教的广化寺干手工活，一个月 20 几块钱，实际上还是被看管。杨毓东没有去，后来按退休处理，每月领退休金 40 几块。这一年杨毓东 58 岁。为了养家，他什么活都干，给建工部刻蜡板。这事并不轻松，每次来活，都是急的，有时连续几天黑天白日刻。也到过建筑工地，开混凝土搅拌机。

1980 年胡耀邦当政，政治环境宽松了，北京市宗教处为让杨毓东参加教会工作，重新给他发放平反书面决定，去掉了思想不好等内容。杨牧师回教会工作似乎指日可待，可是北京三自会比他的主子还左，坚决反对杨毓东重返教会。他们说，杨毓东不顺服，难以驾驭。

1986 年，政府决定请杨毓东出任牧师，原因是，教堂开放了而教牧人才奇缺，杨毓东则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且工作能力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海外关系。杨毓东提出条件：我只做宗教工作，不搞政治。我讲道不按人的意思讲，只按圣经神的意思讲。你们要是接受，我就这么讲；要不同意，现在就罢，免得日后麻烦。他们同意了。

主内一些弟兄姊妹反对他去三自工作，认为不能与三自同流。杨认为，去三自教会不等于为三自工作，耶稣和使徒都曾利用犹太会堂传道。于是他开始了三自教堂事奉。首先建立堂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从而改变了以往政府通过控制主任牧师实现控制整个教会的局面。杨毓东宣布，堂委会是本堂最高权力组织，代表广大信徒对教会实施民主管理。第二，恢复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由年轻信徒自

己管理。这是北京各教堂最早恢复的青年团契。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爱护、培养和建造。第三，组织家庭聚会，把那些离教会远、年老体弱的信徒组织起来，形成聚会点，定期派义工到那里领会，培养他们的信仰和灵性。这是其他教会所没有的。政府多次找杨牧师谈话，表示不许这样做，并要求交出家庭聚会的地点和信徒名单。杨牧师断然拒绝："给了你们，不等于出卖信徒吗？你们若要，找派出所交涉去，我无可奉告。"

杨牧师还大张旗鼓办圣诞节，认为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他说："人们看见这里有个礼拜堂，正过圣诞节，就会对基督教产生一个初步印象。"1986 年圣诞节，堂内、院内、大门外都张灯结彩，同时播放圣诞歌曲，一片喜气洋洋，来参加庆祝圣诞节活动的人达到 12000 人次。此后，年年都不少于 1 万人次。这在其他各堂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杨牧师还增加主日礼拜的次数，政府对此也很不满意。

1988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有代表提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引导中国教徒爱国爱教，自传自养自治，功劳和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教会被洗净后，水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教会不是运动，到一定时间，三自运动就应该结束。这个会议精神传到北京，杨毓东很受鼓舞，以为三自不会存在多久了，于是采取措施，查三自的账目，清查教会房地产。李克牧师担任查账小组组长，杨毓东牧师负责查房地产。查了若干年，查不下去，桩桩件件都与政府有关。通过查帐和清理教产，那些老牧师和信徒终于明白，三自会拿教会房产送礼讨好政府，实际上就是出卖教会与世界联合。

查账查房之举引起政府极大不满，加上 1989 年六四事件中缸瓦市教会的年轻人是宗教界第一个打着横幅，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声缓绝食学生的，于是三自和宗教局多次找杨牧师，催逼他辞职。他不得不同意。

1991 年 9 月 5 日青年聚会，杨牧师讲道，突然接到三自负责人的

通知，说有外国记者到堂里采访，不让杨牧师辞职了。当时，有几个国家的 9 名记者在教堂门前等待杨牧师，宗教局的郭处长在街上拦住杨牧师，要他不要见记者，并派人“护送”他到教会，会后又用小车送他回家，外国记者始终没有机会访问杨牧师。

10 月 15 日至 17 日，市宗教处在西城区政府召开学习会，播放东欧政变等内容的录像。讨论时，政府干部和三自骨干认为，东欧剧变就是由牧师引起的，中国牧师也可能引发中国剧变。鉴于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政府认定，缸瓦市教会是不安定因素，杨毓东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牧师。

他们多次寻找理由逼杨牧师退休，理由之一是主任牧师 70 岁必须退下来。杨牧师对政府代表阚学卿说：“你们这样决定，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还不合法。所谓不合情，是一般工作调动之前，要跟本人谈，我们还有堂管会，应找信徒代表谈一谈，但你们没有任何表示，突然命令撤职，这在任何世俗组织中都是少见的，是为不合情。做重要工作的人，是否年满 70 岁都要撤下来？比我大的是不是要撤？我们的主席殷继增，比我大 10 岁，是不是要撤？全国两会那些干部，大多比我年纪大，是不是要撤？北京宗教界，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佛教界，是否也推行这个 70 岁线？是为不合理。中国教会的任何章程，均无满 70 岁不能做主任牧师、领导教会的规定，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是为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此我不能执行。”

杨牧师回绝了三自会的决定。与此同时，缸瓦市教堂堂管会也于 1993 年 8 月 29 日向有关部门正式递交《致基督教北京市两会书》，内容如下：近来北京两会针对缸瓦市堂制造了一个决议，近日又急于强制执行此决议，我们缸瓦市堂堂务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受圣灵感动，本着对基督教北京缸瓦市堂全体信徒负责的原则，经过郑重讨论，将我们的意见提交北京市两会。根据《圣经》和基督教原则，根据基督教全国两会最新制定的组织章程，根据我们缸瓦市堂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有关宗教管理政策，我们认为：1、基督教会的主权属于教会全体信徒，北京缸瓦市教会全体信徒的代表是本堂堂务管理

委员会。2、北京市两会背着本堂信徒和本堂堂务管理委员会，擅自决定本堂事务和人事安排等重大堂务管理问题，是违背基督教会组织原则的，甚至是非法的。3、本堂信徒承认杨毓东牧师的灵性修养和他对主的忠诚，承认他的组织才干和他几年来对本堂的贡献。事实证明，上帝祝福杨牧师，他完全能够继续承担本堂主任牧师的工作。4、北京两会越过本堂堂务委员会和本堂信徒所做的针对本堂的决定和决议是无效的。如果北京两会强行对本堂采取侵犯本堂权利的行动，北京两会将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广大信徒的支持下，杨牧师顶住了三自会、宗教处撤换牧师的决定。

1994 年 1 月 31 日政府颁布 145 号国务院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4 月 13 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力图将宗教事务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北京市宗教处和两会认为，撤换杨毓东牧师的最好时机到来了。他们首先认定缸瓦市堂堂务委员会是没有登记的非法组织，应予取缔。随后，9 月 4 日（礼拜日）上午，北京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携妻子儿女，以两会郊区工作办公室的名义，抢占缸瓦市教会准备扩充为小礼拜堂用的一间空房，引起很多信徒的强烈抗议。堂委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堂委会委员李德全弟兄，带刘凤钢弟兄、高峰弟兄、于立为弟兄等，制止刘学军的强占行为，并立即着手完成该小礼拜堂的扩建工作。下午，刘凤钢、高锋、于立为等弟兄搬出了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的家具，封闭房门，并打通了原小礼拜堂与该房之间的隔墙。整个过程都被刘学军用相机拍了照，并及时报告给政府。次日，市宗教处和两会，以北京基督教两会的名义，炮制一个要求公安机关严惩教会李德全、刘凤钢、高峰等有关人员的呼吁书。

9 月 9 日夜，市宗教处、市公安局和市两会，联合出动百余人和数辆警车，携带施工人员，连夜强行破坏了刚刚扩建好的小礼拜堂，重新隔出那间房屋并予以强占。11 日至 13 日，市公安局又以传唤为名，连续三天拘禁李德全弟兄。该弟兄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因此受

到极大损害，一度因体力不支而昏倒，获释后被送进中日友好医院。

10 月 13 日，北京基督教两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解除杨牧师的职务，任命于新粒接任。当天，于新粒正式向缸瓦市教会下达最后通谍，声称：为了落实缸瓦市教会的法人代表人选问题，他将于近期全面接管缸瓦市教会，并要求杨毓东牧师必须自动向其移交主任牧师职权。“否则，注意后果!”24 日，于新粒自己来堂上任。27 日，于新粒、邵文、吴巍三人工作小组来教会，向杨牧师发出最后通谍，限 3 日交权。28 日，市宗教处处长季文渊，区宗教、民委办公室主任杨广宏，找杨牧师谈话，逼其按期交权。

30 日（礼拜日）上午，杨毓东在他侍奉 8 年的缸瓦市教堂做最后一场布道。他根据路加福音第七章，告诫信徒，教会必须把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此虽经风吹雨打，房子却不会倒塌；反之，若建立在沙土上，就会被水冲塌。如今我们的教会，正遭受风吹雨打和水冲。风吹雨打就是上面来的压力，水冲就是下面的颠覆。这场讲道刺痛了政府和三自会，礼拜一结束，两会工作人员即向会众大量散发两会五届会议专集，以此表示他们的权威。不少信徒将其当场撕碎，弄得满院子都是。

9 点 30 分，杨毓东牧师做完第一堂礼拜，与宗教干部司永成说话，华慧奇弟兄拿照像机给杨牧师拍照留念。这时，司永成突然扑向华弟兄，声称华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随即又上来十几个便衣围打华弟兄，并抢走照机。在场的信徒纷纷抗议，华弟兄得以脱险。

次日，即 31 日，两会在缸瓦市堂布告栏里张贴三张布告，一是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撤换主任牧师的决定，二是于新粒的委任书，三是废除公章，接管权力。

11 月 4 日，根据宗教处的通知，杨牧师上午 10 点到两会办公室。除了宗教处和区政府的干部外，还有三自的部分人员，如于新粒、邵文、冯应生等人在场，宗教处的华副处长代表政府向杨毓东宣布：1、宗教必须接受政府领导；2、主任牧师不是选举产生，教会内部两会有权处理；3、教堂不是教会，要在当地教会领导下开展活动；4、盖有

公章的传单外地散发，要追究责任；7、宗教局与有关部门要对外国记者不属实的报道予以警告，中国教会不受外国干涉。

堂委会就此事向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全国基督教两会提出申诉，未得任何答复。之后，刘凤钢、许永海、高峰、华慧奇等弟兄向国际媒体发出呼吁，请求全世界主内弟兄姊妹为他们代祷。

6 日，于新粒以两会的名义，在缸瓦市堂院贴出布告，说现在缸瓦市教堂信徒已陷入政治泥潭，予以警告。当天上午，有外国记者架着摄像机在院内采访，教堂外边的厅道上有警车和警察，教堂院内有市、区干部、便衣警察，还有两会的追随者，人数众多，形势紧张，宗教局和三自两会还动用警方对缸瓦市堂义工进行跟踪。

19 日晚 9 点半左右，刘凤钢、徐永海、华慧奇、高峰、汤伟等弟兄，从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慧家聚完会，分头回家时发现被跟踪。刘、徐同路，身后有十几个身穿皮夹克的骑车人尾随。起初他们以为是下中班的工人，后来发现那些人身上的步话机在响，并且他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刘、徐用电话寻呼高峰、华慧奇弟兄，得知他们也正被跟踪。

第二天是礼拜日，刘凤钢弟兄准备骑车到教会，发现自行车胎被扎。他把自行车放到修车铺，改坐公共汽车到教会。这期间，便衣一直跟踪。中午，刘凤钢弟兄礼拜完回到修车铺，把修好的自行车放到他家楼门口，下午骑车时发现自行车又被扎了。到修车铺查看，前后车胎共扎 8 刀，气门嘴也不见了。

23 日下午，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北，七八个跟踪便衣中的一个故意用肩膀撞正在步行的刘凤钢弟兄一下，并说：“你为什么撞我？”刘弟兄说：“不是我撞你，而是你撞我。”话音未落，身后的便衣们一拥而上，把刘打倒在路旁一排自行车上。刘爬起来，他们又把他从便道上打躺在马路上。刘再一次爬起，他们又将他打躺在路旁的电线杆底下。刘又一次站起，一名便衣揪住他的衣领喝道：“回家去！不许出来！告诉你们那帮傻 B，老实点儿！！！”

刘弟兄质问对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打人？他们再次一拥而上，

把他打倒在便道旁一个副食店的柜台前。其中一位跟踪刘凤钢多日的便衣跑过来，飞起一脚，重重踢在刘的眼眶上。随后，他们手握步话机，驱散围观的人群。过了 10 分钟左右，刘弟兄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自己到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跟踪华慧奇弟兄的便衣，在其从公共厕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他的脖子。华母上前质问便衣："华慧奇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跟踪打骂他？"便衣说："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流氓，华慧奇拿了我们大哥的东西。"华母问："拿了你们大哥什么东西？"便衣们回答不上来。第二天，华慧奇弟兄陪同路透社记者到刘凤钢弟兄家探望，警方将这位女记者带走。

12 月 3 日，市宗教局通知杨毓东到市宗教局，民委主任沙之源与杨牧师谈话，态度傲慢，说："你虽然被撤，但还是两会的常委，还是缸瓦市二线的牧师，你的工资待遇还是照常的。"又说："反对三自，不听政府的话，在别的地方都行，南方沿海都可以，但北京是首都，这里不行。天主教他们在河北省反对三自行，在北京不行。我知道你的身体很好，再干 10 年没问题。我也知道你有学问，我还知道你受广大信徒的尊敬和拥护……"杨牧师问道："你找我就是谈这些吗？"沙继续说道："当然不是，你明天正式退下来。尽管如此，你孩子、房子的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府，找我我会给你解决。即使我退休了，我也告诉接班的人，继续帮助你。"杨牧师回绝说："我告诉你沙主任，我不会找你的。"沙接着说："对，从你的个性来看，你不会来找我的。"

4 日（礼拜日），是缸瓦市教堂信徒永远难忘的日子。当局动用了近 200 名便衣警察，身带步话机，混在信徒当中，分工明确，谁负责哪里，管哪个入口，布置周密。附近一个工厂中还安排 500 名防暴警察，以防信徒反抗，上街游行。他们还预备很多警车，只要有上街游行的，出来一个抓一个。他们甚至命令急救中心，若缸瓦市教堂呼叫急救车，一概不许来。

这一天，杨牧师凌晨 4 点起床，向师母告别说："今天很可能被捕

入狱。”师母含泪说：“穿上羽绒服，监狱里冷。”然后他带上讲稿《耶稣的路》离开家，骑上车，直奔缸瓦市教堂。到了教堂，杨牧师藏进锅炉房。

礼拜还没有开始，杨牧师提前6分钟穿上礼服，与王美真姊妹从北门提前上了讲台。不一会儿，三自的殷继增、石泽生、邵文也穿着礼服登上讲台，坐在临时摆的坐椅上。堂内气氛十分紧张，一位老姊妹突然从会众中起来，大声哭着做起祷告。这下气氛更紧张了。三自的人叫来杜凤英，要她上台与堂里安排的王美真姊妹争夺麦克风。信徒几乎全都从坐椅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让三自的人下台。于新粒上了两级台阶，不敢再往上走，政府的人对他说：“我们为你夺权，你怎么后退？”于新粒最终上了讲台。

三自两会主席殷继增以主席身份来到讲台前，拿起麦克风向信徒喊话，让大家安静，可是台下喊他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杨牧师来到讲台前，堂内马上安静下来。他刚要讲道，市宗教局副局长季文渊从侧门进来，在台下对杨毓东牧师说：“快下来，形势非常紧张，你应该考虑信徒的安全。作为政府官员，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可以干别的，但是你作为牧师，应该保护信徒的安全。”杨毓东牧师迟疑一下，走下讲台。紧接着，台下上来几个三自的人，把王美真姊妹也拉下讲台。

杨牧师从台上下来，季文渊副局长在办公室和杨毓东谈话，众多信徒围在外面。他们怕杨牧师被抓走，举手祷告。季拿着自己的名片，对众人说：“我叫季文渊，是宗教局的副局长，我保证杨毓东牧师的安全，你们不信可以到我家找我。”可是信徒还是在办公室外面举手祷告。这时殷继增终于可以发言了，他没有讲道，拿着麦克风冲着信徒喊：“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可以上袁相忱那里去嘛！”这话引起信徒更大的反感。殷继增从台上下来后，受到信徒当面谴责，说他破坏教会，抵挡基督，离弃信徒。之后，很多信徒打电话或写信给殷，对他的讲话表示不满。

就这样，杨毓东牧师离开了他侍奉8年零8个月的缸瓦市教堂。

此后，杨牧师3个月没出家门，每天有几十位信徒来看望他。通

过此次夺权事件，广大信徒彻底认清了三自的本来面目，纷纷退出教堂，自己成立家庭教会。以前一些信徒对三自认识不清，连杨毓东牧师都认为，教堂只是传播主道的载体，利用政府批准的合法场所为主做工，既安全又能挡避风雨，何乐而不为。事实告诉他们，三自不是教会，而是跟共青团、妇联、工会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外围组织。

从 1958 年到 1980 年，杨牧师整整被压制 22 年。他不像袁相忱牧师那样与三自不相往来，而是尽量与三自合作。1986 年复出，服侍缸瓦市教堂 8 年余，最终被政府和三自的人驱逐下台。临归主前，杨牧师对我说："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与三自合作），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不可能向众人逐一解释。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22 的压制并没有使我放弃信仰，在缸瓦市教堂 8 年多的服侍也没有将我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现在我仍然是个爱主的信徒，我愿服侍我的主，直到他接我走的那一刻。"如今他被主接走了，正如经上所说："一粒麦子死掉了，会结出子粒来。"

————————————————————————————————

补白：1963 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反革命，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轮流当反革命，反革命贬值了。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反革命，他的妻子顶着单位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没有与他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反革命家属。四人帮倒台后，于妻总算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张鹤慈

————————————————————————————————

母亲的人民证　　士　濂

还在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唯有不断要求进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对我前程的负面影响。1953 年，我考入杭州师范摘下红领巾后，就一遍一遍递交入团申请，一次一次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活动，竭尽所能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当时虽然还没有“学雷锋”，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个切入口：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会，同室同学起床时，我已替他们每人的脸盆里打好了洗脸水。如此持之以恒，终于感动上帝，团支部将我列为发展对象。经过庄严的支部大会极为认真的讨论，我和其他几位写了申请的同学都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一阵，我很注意学校的布告栏。终于有一天，校团委的新团员名单公布了，我满怀兴奋地挤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扫过一个个名字，没有，没有我的名字。与我同时被支部大会批准的另几位同学都榜上有名，只单单将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觉得周围的人都或怜悯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狈万分，钻出人圈。

那时师范生普遍都有一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愿望，希望被保送上师范学院，以改变毕业后充当小学教师的必然命运。要获得保送，身为青年团员是首要条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终究是个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学生的前进动力，我也一样。

我闷闷不乐之，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来了。他素来就像个兄长，爱护我，帮助我，这次也不例外，还是一番热情鼓励：“别灰心，继续努力嘛！对家庭要加强认识，用行动来划清界限。”我内心又充满了热力，决心按他的话做。

加强认识还好办，多从理论书籍中摘抄有关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动来表现，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么呢？保尔与资产阶级娇小姐女

友冬尼娅绝交，牛虻书写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传单，女红军战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颗”致命的子弹，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斗争极为激烈时的行为，今天的我，实在无法照搬。

带着无计实施“好表现”的怅惘，1954 年暑期我回到家乡。母亲那两年常去上海帮佣，以挣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后因身体不好，数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乡。母亲见我放假回来，很高兴，病情也减轻许多。谈话中，她忽然压低声音，显出很神秘的模样：“我也有那个证啦!”“什么证？”“人，人民证。”“人民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种证。母亲看我对这事有怀疑，就拿来板凳，颤颤巍巍地踩上去，从碗柜的最高一格里摸索了一阵，取了张小纸片，庄重地递给我。我打开那纸片，原来是一张选民证，盖着红色的政府印章，还写有妈的名字。

“妈，你从哪儿弄来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里。他们说，保姆是劳动人民，就给了我这个。”妈妈欣喜地说。她将那张选民证拿回去，仍然颤颤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碗柜的最高层，又遗憾地补充道：“本来还要我去参加选举，听说很热闹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来了。”

这张选民证其实并没有履行其选举权利，妈妈为什么把它看得这么重呢？

“这几回去上海，老生病，钱没挣多少，不过拿了这张证也值得。人民证，人民证，我也当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妈妈为何这么宝贵这张薄薄的纸片。多年来，作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里只有低头认罪挨批受训的份，何曾被人视为同类？虽然妈妈是被村农会特别恩准去上海帮佣，并因此偶然得到了这张选民证，虽然这张选民证从未使用，以后也绝没有机会再使用，虽然这张选民证并没有带给妈妈政治生命任何实质性变化，但妈妈已感到非常满足了。一字不识的妈妈把选民证误说为人民证，其实是她内心愿望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为一个和其他人同样的人民啊。

妈妈内心小小的满足却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负担。我知道，这张选民证不应该属于妈妈，她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于对方不明情况稀里糊涂得到的。这是对人民选举的亵渎，是事关原则问题的失误。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团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划清界限，要有实际行动表现。现在，不正是考验的时候、表现的时机吗？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对慈爱的母亲，我能像那些大义凛然的英雄一样，指着她的脸如此斥责吗？——“你隐瞒了罪恶的身份，你窃取了人民的权利！”

不，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思虑再三，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决定偷偷把这张选民证拿走，反正它对妈已经没什么用了，她会误以为是自己不慎丢失，而我将这不应得的选民证交给团支部，由他们退还发放单位。这样，妈妈不会因此而难过，原则性的失误又因我的检举而得到了纠正，我岂不有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实际行动吗！

做出此决定后，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时机。妈妈是很愿意和在外地求学的儿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体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里怀着鬼胎，竟顾不上妈妈这份挚爱之情，反而内心怨怼她怎么总不出门。好容易有一回她离开了家，我急急搬来板凳趴到碗柜的最高处在里边翻个不停。那里乱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时没找到那纸片。正在此时，房门被推开，妈妈回了家。她见我又着急又慌乱的模样，不禁发问：“你要找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不找什么，随便翻翻。”妈妈的眼里闪过一丝疑问，但随即以一句凄凉的话语岔开：“那里就是一些破烂，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仿佛觉得妈妈已识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视妈妈的眼睛。我于心有愧，因为我并非真正在捍卫什么原则，而是受一种卑屑的利益愿望所驱使。

那次行动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现”的热度大为降低，妈妈疑问的眼神，凄凉的语句，总萦绕着我。直到暑期终了，我再没去动那碗柜的最高层，甚至连看都没勇气往那里看。自然，在家庭出身这个关

键问题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并无突出的划清界线的表现。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又一次通过后，仍然被团委——据说，这回是报到了市团委——否决了。

母亲是在那件事过去后十多年去世的。其时，我刚步出牛棚，没回去参加葬礼，故不清楚那张选民证有没有让她带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划过一场极可能伤害母亲的举动。

——————————————————————————————————————

补白：现代诗人、现代汉语典范语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42 年作为英文专业的大学生，毅然从军抗战，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抗战胜利后，穆旦赴美留学，1952 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告别李政道等学友，辗转回国。因曾经是国军军官，后来穆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其军旅诗篇被诬指为“历史罪行的自供与罪证”。1977 年，穆旦含冤去世。空军英雄王延周，曾击落日军飞机立功。某次因气候原因迷航，误入解放区迫降，受到八路军接纳。恰逢国共分裂，内战爆发，不能归队，王被接纳为解放军飞行教官，是解放军空军早期将领的启蒙之师。抗美援朝中，他入朝参战，击落美军飞机再立新功。1958 年肃反中，王延周成为反革命，判刑入狱，后遣送原籍，1984 年获平反。抗战时期，上海银行界高级职员池步洲，比英美情报机构更早地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他只是协助重庆的电讯机构完成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并未加入过军统组织。1952 年镇反运动中，池步洲仍然因此项业绩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　彭小明

我目睹的政治迫害　　李大立

1952 年我 7 岁。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家门口站着民兵，身穿蓝制服，斜挎帆布子弹带，肩背步枪。他们来干什么？原来是乡下老家来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斗。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 40 年，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那里的田产，并未亲身参与“剥削”。

我的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国民党时期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站长。1949 年后，父亲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无端被撤职降薪。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批斗，父亲被罚跪和殴打。每当想起无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余痛。在每个民主、正义的国家，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 年至 1952 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1956 年肃反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分，以致影响到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 年至 1963 年，伯父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的儿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赶去办理后事，哭昏在儿子的坟前。因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伯不但没有拿到分毫抚恤金，还备受军队干部野蛮无礼的对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机构做事，因误信马列，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 年曾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舅父领导了九龙海关起义，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管广州海关。只因他是地方地下党，又是知识分子，不获北方信任，备受歧视。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学校食堂让学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饼”，甚至吃用尿培养出来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要带一大铝锅红烧肉。

1967 年夏天，我的中学母校，著名的广州广雅中学，发生一起血

案。那天，参加学校造反派组织“四一〇”的学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广雅河边被主要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从背后开枪射杀，尸体跌落河里，年仅 17 岁。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写的，大约就是广雅中学的丘成昆。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四年级学生。清队期间，同济大学 40 多人自杀，我亲见的就有五六个，如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数学教授孙国楹等。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西北一楼后面的小路上，我亲眼看见一个二年级高个子学生跳楼而死，脑浆流入水泥地砖缝。我班班长周文德，是 1962 年江西省高考状元，阶级斗争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 年清队时，周文德因说了几句对毛不敬的话，最后被逼得跳楼自杀，半途身体翻个身，落地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我们 28 个人的小班，揪出 4 个反动学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张洁华，23 岁，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未遂，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区。当地人告诉我，不久前，广西“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将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过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尸体腐烂发臭，整个城市的自来水都带腐尸味。有一次，我随车路经宾阳县，司机告诉我，不久前这里是一个杀人屠场。当时宾阳县被杀的五类分子达 5000 多人，很多地主富农家庭被灭门，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都不得幸免，许多人被石头活活砸死，尸体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

文革期间，香港不但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大陆偷渡来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还安葬了数以万计沿珠江漂流下来的浮尸。当年在宾阳县指挥大屠杀的一个解放军副师长，后来升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虽经宾阳县政府代表全县人民数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责任，却仍然在广州逍

遥法外。据说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莘庄公社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个人独铡十六条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后自己瘫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孙子两人时，凶手扬起第一锹土，黄发稚孙不知死之将至，哭着说："奶奶，瞇眼睛。"白发老人凄怆无力地哄他："好乖乖，一会儿就不瞇了。"

——————————————————————————————

补白：1968 年 3 月 23 日晚九时，广西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指挥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委支书隆秀佳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爱玉、韦倍家俩人绑架到龙厚山剖腹取肝煮食，为了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 400 多人到南宁市围剿"四.二二"。武斗中，上林"联指"4 人阵亡。此后上林"联指"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打死"四.二二"四类分子 103 人。16 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的墓地枪毙陪祭。乔贤大队的豪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 4 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还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 500 斤，黄豆 5 斤，火油 5 斤，并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烧边哭，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

钦州剖腹食肝风　　佚　名

文革期间广西滥杀无辜，数字惊人，手段残忍。钦州地区最先流行剖腹食肝风，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发生 22 起，合浦县石康公社

18 起，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 19 起，钦州县小董茶场 3 起。武宣县、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 100 多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有个凶手藏两个人肝，直到 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1968 年 1 月 26 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 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 8 人，“四二二”被俘 300 多人，其中 87 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县委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4 月 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又对其未满 14 岁的女儿实施轮奸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定更大队分 4 批杀了 24 人，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剩下的寡妇、女儿被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然后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9 月 7 日至 17 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 12 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包括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 4 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此来“共同专政”。

杀人者辱尸毁尸。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将尸体裸陈路旁。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

当局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因而不少人以杀人邀功。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安排工作，为立新功，杀了 3 人，然后得意洋

洋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合浦县某大队文革组长，怕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有 1153 人，杀人后提干的有 458 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 637 人（不含北海市），还有不少杀人凶手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

补白：美国南北战争历时四年，南军失败。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南军将士获得了北军司令官格兰特将军颁令印制并亲手签署的证明书，然后平静地重归田园，从事和平劳动。北军和政府信守诺言，对南军官兵没有任何后续惩治，人民安居乐业，迅速弥合了战争创伤，繁荣了国家经济。中共建政后则违背诺言，滥杀滥捕前军政人员，政治运动不断，人民长期不得安宁，戕害大量经营人才，贻误了整个民族经济文化重新繁荣发展的时间。执政党和领导人是否诚信，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幸福。言而无信，食言自肥，崇尚厚黑，爱耍阳谋，文过饰非，到头来，不仅贻害民族整体，而且自身的命运也不配有比苏共领导集团垮台、齐奥塞斯库毙命更好的下场。

————————————————————————————————————

一句话右派　　华　中

我 1949 年“参加革命工作”，51 年入团，56 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师范学院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过硬的。斯大林去世时，心情非常沉重，两天茶饭不思。当时我在 XX 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

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一年之后，因在班上调侃一句，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次课间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顺口插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我自鸣得意，以为这句话很俏皮。反右时，这句话被揭露，指控我对现实不满，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就因为这句话，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说我狡辩，嚣张，态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气焰，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抛出来遭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我班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到那里一看，我暗暗吃惊，因为此前全校还没弄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条凳，会标是“XX 反动言行辩论会”。“XX”是我的名字。

那时的批判会还比较文明，让我坐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检查”。不是辩论会吗？怎么未辩论就先给我的言行定性为反动呢？但是我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既然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因此，尽管对这个大会有意见，我还是挥泪泣血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 年 6 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也很“关照”我，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监看我。最后，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时，我未满 22 周岁，1979 年拿到母校华师那张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书》时，已经 44 岁了，两鬓斑白，22 年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

———————————————————————————————

补白：刘章新，1923 年加入国民党，27 年任国民党县党改组委员会常委，28 年任嵊县教育局长，53 年任浙江嵊县中学副校长。喻元周

是刘章新的老同学、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时，揭批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喻原本希望作为校领导的刘能伸出援手，不料刘也上台揭发批判，宣布与他划清界线。喻元周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街道监督劳动。那时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师，时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刘章新，视我如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安排我双倍的工作量（每周 24 节课），不发参考书，不发备课笔记本，故意刁难我，也不许我到外校听课交流。我与刘共事整整 22 年，他没有喊过我一声"顾老师"，即使狭路相逢也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右派分子，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格尊严的人。四十多年后，嵊中退休教师郑祖杰于《嵊州日报》发文怀念刘章新，称 刘从 1957 年到 1961 年，前后 4 年，每月从自己 105 元工资中匀出 15 元，无偿资助一位新来的右派大学生。后来刘章新的女儿刘紫薇也以此为据，撰文纪念其父。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嵊中见证者，必须指出，郑祖杰提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刘章新绝不可能帮助嵊中的任何右派。 顾海龄

————————————————————————————————————

吴天石的儿子　　李大立

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夫人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是文革中全国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师院学生冲进吴李家，把他们拉到学校批斗。有人动手打他们，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扣在李敬仪的头上，拉到大街游街示众。开始时李和吴被人架着走，不久李昏迷过去，被人拖了一里路，气绝身亡。吴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双臂被扭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于八月五日死亡。两人的年龄分别是五十三和五十六岁。

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其子吴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偶然听到两个同学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人，不料死者竟是自己的父母。十五岁的吴晴立刻进城回家。他的姐姐也是中学生，教他这样回应此事：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姐弟两人都不要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一些被打死的人（包括吴天石）得到平反，吴晴得以参军离开农村。后来，吴晴在军中入党，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父母就是在这所学校被人打死，吴晴常常与当年殴打父母的凶手擦肩而过。

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几次托人与吴晴联络，希望了解其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请他至少把王已写好放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中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可是几年过去了，王的请求没有得到吴的任何回应。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就此感慨道："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

自古以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杰为报父仇，卧薪尝胆矢志不忘，最后得以伸张正义。我真为吴晴感到难过。我不是鼓励吴去报私仇，而是希望他尽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把父母惨死的经过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灾难重临。在父母之死上如此沉默、回避，连批判一声都不敢，实在枉为人子！

正是由于像吴晴这样的中国人怯懦地选择沉默和回避，任凭当局篡改历史、教育洗脑，才导致他们的子女晚辈认贼作父，将迫害自己父辈、祖辈的人当作历史伟人来崇拜，甚至肆意谩骂敢于披露历史真相的勇敢者。中国现实的荒谬真是莫此为甚！

————————————————————————————————

补白之一：在中华民国的 38 年间，湖南常宁县先后有 65 人担任县长。他们中间，除了解放前去世的和去了台湾、香港的 10 人之外，几乎全部被中共杀掉或关管后死去。这 65 位县长，早期的有科举功名，后来的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还有 8 位留学生。从 1949 年中共建国到 1998 年的 49 年间，该县共有县长 19 人，只有建国初的一位县长是高中生，此后就一直是农民和当兵的当县长，直到 1984 年中共建政 35 年，才开始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当县长。彭小明

补白之二：陈思和论土改文学，是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张炜的小说，说穿了仅是为了脱出俗套而已。既能吸引市场，又不至于完全得罪官方口径。还乡团的报复行为正是暴力土改的血腥反应。如果没有斗地主的残虐，还乡团怎么可能施用酷刑！还乡团的行为是局部的，暴力土改却是遍布全国的。如此评说，不分前因后果，不看比例多少，如何对得起天下屈死的冤魂！　　彭小明

——————————————————————————————————————

我跟苏东坡不一伙　　汉　男

大学毕业时，作为右派学生，我选择了自谋职业，并很快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小厂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居委会书记兼主任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管段户籍（片警）则是厂里的最高权威。

我被分配在铸造车间，月薪 18 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就把我要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受到工人师傅的普遍好评。一年后，厂里和辖区派出所打算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要我填写一份摘帽申请表。表中最主要的一栏是汇报思想。在填这一栏时，我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写道："每有人问我每月拿多

少工资，我都不说两个 9 块（那时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 6 个 3 块，因为六比两多嘛！”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生产小组长通知我到食堂开大会。我以为是摘帽会，便把散放的工具归置一下，立即赶往食堂。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瞥一眼标语，傻眼了。“XX，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XX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大门外面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 XX 大会”。 “XX”是我的名字。

不过我一点也没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一会儿，管段户籍来了，厂里的书记也走上前，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一下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 XX 带上来！”两个积极分子立即闪出来，把我架到方桌前，命我低头弯腰。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怒目金刚似的，带着那么一股狠劲儿上台发言，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

第一轮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跳了出来，大声质问我：“XX，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交代过了。”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没有？”我肯定地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姓苏的。”她这时面向群众大声喊道：“XX 老实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斗！”立马上来两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往下按。接着邱某说：“好，既然你不老实，我给你点一下：苏东坡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复一遍，确认之后，我说“苏东坡是古人”。这时，一位会计手拿一张纸讥讽地问我：“XX，你说他是古人，那你们混在一起写反动歪诗，说现在不是在人间，污蔑新社会，你从哪里谋得的这样一个古人？只怕你也是个古人吧？啊？”我再次说苏东坡确实与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学家。

这时我已完全明白了这场误会的由来，我也同样明白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邱某又站起来，正准备喊口号，说时迟，那时快，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冲来两个小青年儿，一下子坐到方桌上，其中一个的两腿还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两下。然后，俩小伙子大叫一声："回家吃饭啰!"说着飞奔而去，一拐弯，很快消失在小巷中。

此时，会场变得闹哄哄的，众人都散了神，会开不下去了。书记到底是书记，处变不惊，站到方桌后面，拍两下巴掌："安静点，都安静点！今天的会暂时告一段落。XX 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回去以后要把你与苏坡东……啊苏东坡的关系写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给我。听见没有？"我诺诺应了。接着他宣布散会，众人一哄而散。

次日上班前，我遵命向书记交出了连夜写的深刻检查，无非是自我痛骂一顿。对于勒令我老实交代的与苏东坡的关系，我交给书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并告诉他苏东坡就在书中折叠的那一页。此后，组织未再追查此事。

半年后，年底了，一天傍晚，我到辖区派出所办事，遇到管段户籍。他对我说："你来得蛮好，你等我一下。"说着走进后面一间办公室。我听见一大串钥匙开了几次柜子锁的声音。户籍拿着一张纸出来，我立马认出是我默写苏词的那张纸，也就是斗争大会上我厂会计手里拿的那张纸。户籍的态度很平和，让我给他讲了苏轼这首词的基本内容，然后又收回了那张纸。

这张纸的来历是这样的。那天在公事房等客户的电话，办公桌上有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我便拉过来，将我喜爱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写一遍。接完客户电话后，我忘了带走或撕掉那张纸。公事房的什么人捡到了，报了案。

————————————————————————————

补白：40 年代后期，解放区地方政府以极端过激的做法进行土地改革。斗争波及到地主的家庭或亲戚，穷途末路的地主为了逃避打击，

把女儿嫁给共产党的干部或农民。与地主结亲的共产党干部中，也有在土改中庇护地主的，甚至以武力反对土改。为了扫除这些土改中的障碍，太岳区共产党委员会在 1947 年 8 月 11 日发表了《为堵塞地主阶级防空洞的四项决定》，其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党员干部与地主的女人、女儿结婚，已结婚者应严格审查其有无政治问题，如有，可强制离婚。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也发布决定，干部一律不准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的女儿或离婚媳妇及伪属女人结婚。在土改政策下，婚姻成了政治问题，而非私人的事情。土地革命的浪潮波及革命组织内部，地主出身的人或被清除出党，或被迫写自我反省材料。林鲜明

————————————————————————————————————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劳布藏

1953 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我父亲当了区长。我带 20 多户人家，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一年后，我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我当社长。

1958 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扣留下来。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劳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我那当社长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那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我们赶着牛马和羊走，有马也不许骑，抱

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干部们很凶，很牛 B，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一句话，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家乡“嗷尔嗷尔”叫，眼里淌着泪。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地哭，没人敢大声哭啊。

到了托莱，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咋办？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 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干部们天天宣传：“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帐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赶过来赶过去折腾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儿寡女。

1960 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然后用车拉走。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沉到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鞋。

1958 到 1960 年死了多少人啊！冈察、祁连、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 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 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1980 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用绳子捆住打。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然后又吊在帐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灌辣椒、姜粉，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 年 11 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却不见人。我们找了好多天，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到第二年开春，冰层化掉，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1980 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补白之一：草台乡斗争伪乡长张麻子和便衣队长谢八。斗争大会结束，民兵把张麻子绑在街心的大柳树上示众。张麻子浑身上下被冷水浇透，一宿冻成个冰坨子，后来用铁镐才把尸体从柳树上刨下来。谢八是被石头砸死的。民兵把他推下土坑，他还在破口大骂："奶奶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一会儿，他就被石头砸成一堆肉泥。碧薇萍

补白之二：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一幅领袖像。　　　　　　　　张　晓

——————————————————————————————

武宣吃人肉事件　　剑　客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 90 公里。1968 年 5 月 13 日，武宣县"联指"攻打"四二二"，原因是 5 月 4 日"四二二"抓获桐岭公社的"联指"成员梁达坚，并搜走 120 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四二二"释放了梁达坚，未退钱物。"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 600 人，并请贵县"联指"300 多人支援，共 900 多人，武装包围北楼、北街武宣小学的"四二二"据点，打死 97 人，毁掉房屋 67 间，37 户被抄家。

"联指"派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四二二"派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1968 年 6 月 15 日，武宣县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四二二"的刘业龙、陈天掌等 4 人拉到三里圩游斗，于车缝社门口将刘、陈等 4 人打死。李坤寿等拔出尖刀挖肝割肉，拿回大队部会餐品尝。自是日起，至 8 月底止，该县"四二二"一派

共有 75 人的心肝和肌肉被吃掉。吃人的人，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国家干部中共党员全有。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中共建政后担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因同情“四二二”，黄于 7 月 1 日晚被校革委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次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将他的肝挖去，肉割去，在学校宿舍区用瓦片点火烘烤。

7 月 17 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四二二”的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 4 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 4 人杀死，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拳喝酒会餐，陈达财等 23 人参加了这次人肉会餐。

当时在武宣县被管制劳改的南下干部王祖贤，亲眼目睹了“联指”当街打死人就地割肉取肝的暴行，于是几经周折写信给周恩来，报告武宣吃人事件。周恩来电令广西军区司令员区致富，派部队进驻武宣，吃人肉事件得以制止。但是区致富本人就支持“联指”派，对揭露武宣吃人事件真相的王祖贤进行打击报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积极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自治区党委却继续坚持派性，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事件。中央几次追查过问，自治区党委韦国清、刘重桂等回应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一直被捂着。1983 年，广西自治区党委被改组，武宣等县吃人肉的事件才得到一定处理。

————————————————————————————————

补白：土改时期，地主被扫地出门后，各村镇又掀起斗争地主的浪潮。大会控诉地主的罪行，小会追逼地主埋藏的金银财宝，牵着地主游街示众更成了各个村镇的一道景观。地主们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子，穿着包括寿衣在内的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男人被涂画了鬼怪或马戏小丑的脸谱，女人则被弄得披头散发。他们或是一个人，或

是几个人排成一串，或被绑着让人牵着走，或被人赶着走。一群贫农团员监押着他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也让地主们喊口号：“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是地主婆！”“我剥削穷人我有罪！”谁不喊或喊得不响亮，就要挨上几拳几脚或几个大耳光。男女老少像正月看秧歌一样围追着看。看到这些昔日威风体面的人物变得如此狼狈丑陋，他们有的叹息，有的觉得解恨，有的开心，有的落泪，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合掌念佛。半大孩子嬉笑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的钻过人群，对狗地主打上两拳或踢上几脚，然后又嘻嘻哈哈地从人群里钻出来。

———————————————————————————————

送瘟神　　武　昌

1963 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辆板车，三轮车由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蹬，我只拉板车。某日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要我把一个毛泽东半身像送还区法院。那像的体积比毛的真身小许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还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家”抱到板车上，却发现它太富态，板车中间盛不下，只能放在接近板车把手处。可是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一旦栽了，轻则撞破脑袋，重则粉身碎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老工人走过来，我问她这像是怎么运来的。她告诉我，昨晚厂里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表彰劳模大会，由余某用三轮车从法院拖来的。我说板车太小，装不下，怎么办？她说，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不就行了？她是个老党员，说话底气十足。“党给我智慧给我胆”，我用板车配备的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往毛像脖子上绕两圈，又在前胸后背交叉缠绕，再在中间走一道，最后将两个绳头固定在板车两边的挂钩上。一番料理之后，老像近似五花大绑，被稳稳捆在板车上。

一切停当，我推车上路，为了安全，我不敢背对它拉车前进。路面坑坑洼洼，加上推着走，平常不需半小时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很毒，行至半途，我在路边树荫下歇了歇。再上路时，我担心把“老人家”晒坏了，就把自己戴的一顶破草帽扣在它头上。它脑袋大，我的草帽小，戴上去摇摇晃晃的。一路不时有人朝这边看，也只是一瞥而已。那时是文革前，毛还不像后来那般神化。在脱胎换骨的 21 年里，我的主要活计就是拉板车。我拉过无数东西，别的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唯有这次拉毛像令我终生难忘。

小阁楼男女混居记　　何　为

1969 年 1 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造反派头头突然把我叫去，说是有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到那里一看，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我。厂里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若 X 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争取立功。”说完向来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问了。

来人中一戴眼镜者单刀直入，问我：“你和若 X 以及你们那一伙人平时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平时聊天也就是些闲话，见面也不多。”我答。眼镜紧接着问：“你们那年的抱冰堂会议也是闲话吗？”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不知他在说什么。一会儿，我明白了，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我是去过一次抱冰堂，几十年也就那一次，是 1966 年春节期间，若 X 带着老婆，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宫 XX、艾 XX 和王 XX，一道去的。那天我们去晚了，不到一小时茶馆就收场了。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会议呢？”

眼镜质问道：“你能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对我今天说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负责。”“那好，我们走。”两个外调人员悻悻起身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王 XX 身上。他是若 X 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年龄和学识上与我们这些人有代沟。不过，他在单位对若 X 不错，有空还到若家坐坐，于是与我们这几个右派朋友都混熟了。

王 XX 一度是单位保守派的头头，掌过一点权。武汉 7•20 事件后，造反派掌权，就寻机报复他。一天，人家把他弄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顿好打，逼问他与若某的来往。他一通胡编乱说，把 1966 年春节那次抱冰堂茶馆喝茶说成“抱冰堂会议”。当天打完，王 XX 被放，他的交代也未被当回事。到 1969 年清队时，派性斗争更错综复杂，3 年前的那次喝茶又被提出来调查。除王 XX 和妇女、孩子外，我们几个右派都被各自的单位关起来了，追问我们在一起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某日下午临下班时，我刚卸完板车上的材料，一个小组长就对我说：“XX，你今天不要回家了。”这时，忽听又传来一声断喝：“把 XX 看起来！”是我厂造反派总头头、社会游民出身的刘某。当晚我就未能回家。一个街道小厂里的一个社会游民的一句无法无天的话，竟限制我人身自由长达 3 个月。

在此期间，无数次开我的斗争会。有一次，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 XX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XX 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一上来就把我的头狠狠按了几下，同时怒吼一声“低头！”接着直截了当地质问我：“XX，你是不是说过‘现在 8 亿人看 8 个戏’？”我承认道：“说过。”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声声。

被关期间，我白天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不能回家睡觉，而且有两三个人看守。厂外有一间堆放铁板和杂物的板房，上面有个小阁楼，他们就把我安顿在那里。小阁楼约有 10 平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坡顶处就不能直立了。在一边的坡顶下安放一张单人

床，是我睡的；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可 3 人横卧），是看守我的人睡的。两床中间放一张方桌，既供我晚上写交代材料，也是我与看守之间的汉界楚河，因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厂男人很少）。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男女混居一室，很是尴尬。也没有卫生间，上下阁楼靠一个活动的木单梯，半夜方便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总是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一只小木桶，面向我的床小解。至于水声哗哗，我就实在没有法子了。“嫂子”们要起夜，总是轻手轻脚，一般不开灯，至于“泉水叮咚”，也只好横心由它“叮咚”了。每天夜里，她们几人次“叮咚”，我就几次梦回。

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不便之处更多。夜间既不用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也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终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道，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可是“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晚饭后，我亲耳听见一个“嫂子”小声对头头讲：“你与若 X 单位联系一下，问他们单位几时放人。你就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单位可要放了，我们小厂条件有限，不能与你们国营大单位比。”两天后，厂里放我回家了，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若 X 单位大，条件好，比我多关了大半年。

————————————————————————————————————

补白：中共建政初，广东省委书记叶剑英，调来陈泊、陈坤主持广东公安工作。陈泊在延安时期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称。陈坤负责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当时广州治安形势异常混乱，为恢复社会秩序，二陈报请省委批准，录用一批国民党特工和数百名旧警察参加治安工作。由于领导得法，加之国民党人员熟悉情况，广州治安迅速得到改善。不久镇反，公安部长罗瑞卿认定二陈是混进党内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亲自到广州逮捕他们，二陈案成为公安部门的反革命大案。广州市公

安局被逮捕了 300 多人，广东省公安部门被逮捕 700 多人。1952 年，陈坤被迫害致死。1953 年，陈泊被判刑 10 年，1961 年刑满释放，未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1972 年，陈泊死于劳改农场。

————————————————————————————————

智对红卫兵　　汉　阳

1966 年 5•16 通知和 6 月 1 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武汉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大会，声讨武汉大学以校长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我所在的街道小厂也召开几次声讨大会。

在政治运动中历练了 10 多年的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早上出门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因此我将几件替换衣服和一小袋人丹，放在枕头下面，准备随时被带走。9 月 3 日，预料中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下午一上班，厂里的几个红卫兵就逼问我：“XX，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的‘勒令’，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戴‘牛鬼蛇神’的黑符号？”我回答说：“5•16 通知中没有这一条。”

我话音刚落，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箍的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头上。他们一松手，我就飞快将高帽摘下撕毁。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我扣上，我又撕毁。邱某面红耳赤，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我头上。3 个男工紧紧抓住我，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 6 点。

当晚，这批“毛主席的红卫兵”明火执仗地抄了我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他们又发现了我新的罪行：我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他们愤怒地质问我，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我回答说，怕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他们抓不住把柄了。

阿爸、叔叔和我　　秋什江

1958 年，海晏县（青海省）全县被打成反革命县，我的阿爸被抓走，三叔叔也被抓走。那年 10 月，上级命令将海晏县一带的蒙、藏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湟源县等地。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八九岁了，就一个人放牧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

过了几年，听人说一部分劳改的人要释放了，我就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回来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我急忙回到帐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还是没有看见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帐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几个娃娃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

运的娃娃吧。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把羊赶到帐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看见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我的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帐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帐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他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又爬到水里。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 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我才十七八岁嘛！那时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假，让我去放羊。就这样，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后来成了残废。

恶捧刘户籍　　晴　川

1971 年 12 月某日，居委会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恰好那天我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代我去居委会请假。过了两三天，12 月 30 日，我在上班路上遇见管我的片警刘某。刘某叫住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说明。接着，他说："你没有参加这次年终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对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

我原本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片警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给厂里的那份材料，怎么办？再写一份最好，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好回报的？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不禁大喜，决定就写刘片警对我的"教导"。我紧紧抓住 12 月 30 日他在街上对我的那番"教导"——"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反复敷衍成文，为刘片警"立言"，并把他的"教导"上升到"刘片警的哲学"的高度。每周呈送的那份思想汇报，主标题不同，副标题则有定式——"学习刘片警'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每周汇报的起句和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文字也使用得相当考究，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的人民日报出版社文革前出版的一本《难字表》上的字。

此后，我与刘户籍相安无事近两个月。一天，我又在路上与刘户籍相遇，他叫住我，未等我开口问他有何指示，他就先开口了："你的思想汇报材料不要写了，算了！"

无档案右派马叔叔　　乔海燕

马叔叔家与我家是同住一院的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马叔叔的爱人马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像周恩来，她说是拿作业本养成的习惯。他们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也不是骨干分子，属于牵着走的那种人。报社头头看中了，认为可树为典型，百般动员他发言。可他总是不吭，逼急了，就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又过去了好几天。

马叔叔在报社肩负宣传大政方针的重任。单位的头头属于抓业务不行、抓运动在行的那种，一有运动，积极而又创意迭出，总是设法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划右派这事，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超标了。完成任务叫“工作”，超标才叫“成绩”。可是这个超标的名额从哪里搞来？实在没有可选之人，头头带领几个下属，坐在办公室抽闷烟。正在这时，马叔叔进来送稿件，指点两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儿，看见领导都在，随口就说，那边正有讨论，发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实告诉领导，希望领导去指导讨论。

等马叔叔出门，头头长舒一口气，其他几个人眼中也放出异彩。老马这句话很重要，不发言就是抵触，就是对运动不满，老马一向不发言，正符合右派条件啊!

马叔叔当右派了，开始没有下乡，在报社干些粗活，喂猪、帮厨、做煤饼、烧锅炉、帮木匠拉大锯。六零年经济困难，马叔叔就从单位离开了，听说全家发配乡下。

以后又有几次听到马叔叔的消息，说他在一个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又到县文化馆，马阿姨从此操持家务，三个儿子逐渐长大。

1978 年下半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文件下达到当地，全省一片哭

声。79 年初，马叔叔携带全家从农村来到报社，满怀喜悦，笑逐颜开，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报社对马叔叔、马阿姨们关怀备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费，早上稀饭、油条随便吃，不许拿；中午一家一桌，四凉四热八个碟，主食有花卷、窝头、包子，窝头可以随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面条，不限量，每人再发一个花卷。我去看马叔叔、马阿姨，恭恭敬敬叫“马叔叔”，叫马阿姨“老师”。马叔叔夸奖我，说我赶上了好时机，嘱咐我为四化贡献青春。

每到星期天，报社派大轿车，拉右派们出去游玩，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三门峡水电站，洛阳八大厂，燕庄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巩县地主庄园。每到一地，马叔叔都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在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马叔叔积极发言，每每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报社领导找马叔叔谈话，百般道歉、解释，称他是好干部、好记者，写过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报道，人民没有忘记你，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你。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开始。所谓平反，那时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要改正。运动时光荣且正确，现在改正，仍要体现光荣和正确。

改正进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许多表格，单位的、公安的(右派属五类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范围)、民政的、原单位的、农村单位的、现单位的，还有各种谈话。右派们提出各种条件，报社也要讨价还价，补贴多少钱（从 57 年到 79 年，凡 22 年，最高补贴 540 块，平均每年 24 块 5 毛多一点），工作安排，职务，还有子女安排，上学，就业，等等，等等。

一切办完，所有条件谈妥，单位、个人基本满意，档案材料从省委组织部提回。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报社将右派的档案材料与个人见面，将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签字画押，写上意见，这 22 年的历史，就算了结。至于后人如何评说，管他呢，反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

口了，吃商品粮，单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块，有自来水，星期六洗热水澡，出门有公共汽车，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领工资，单位门口就是邮局、商店、粮店、电影院……还有什么比现实更叫人满意！

报社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抽出马叔叔的档案，一页、两页、三页……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沧桑岁月，白马过隙。“啊——”主任倒抽一口凉气，浑身的冷汗刷的冒出来——马叔叔的档案袋里，根本没有划右派的材料！

马叔叔也紧张了，连连翻动档案，嘴里喃喃：“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办公室主任急得几乎哭出声，用剪刀把档案袋剪成条条，也没有发现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证据，甚至连一张简单的纸片都没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问题，不在此次改正范围。办公室主任急忙抓电话，向上级“改办”请示。电话里一阵哄堂大笑，回答是无情的：“没有办法。”办公室主任只好找领导汇报。报社倒是很认真，马上组织人员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员，办事的人都说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见他参加到右派队伍里劳动改造，喂猪，烧锅炉。最后找到当年划右派时报社的头头。头头因儿子车祸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气儿的工夫，一句话都说不成了。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告诉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下几滴泪，死活不说一句话。情急之中，办公室主任又问马叔叔：“你记得办理过右派手续吗？”马叔叔想了半天，嗫嚅说：“不知道，就谈过一次话，说我是右派。”

情况基本清楚了，当年，根本就没有给马叔叔定性为右派，既没有报社头头签字、运动办评语、单位盖章，也没有个人签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给马叔叔办了开除公职、迁移户口的手续呢？真是一盆糊涂浆了。

在报社大门外等候喜讯的马阿姨和三个儿子，依然在低声商量今后的生活，憧憬着那无限美好的明天。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步履踉跄的马叔叔。马阿姨急切迎上去询问，马叔叔只喃喃说：

“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马阿姨忙问跟随的办公室主任。当她听说马叔叔没有右派档案，又听说马叔叔不在这次改正范围之内，呆住了！马叔叔的大儿子张张嘴，眼泪就涌出来，悲愤地喊叫着：“你们不能这样啊！”

马阿姨和三个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围拢来看，不住地打听。马阿姨和三个儿子哭得声嘶力竭，浑身抽搐。他们此时想的什么？哭的什么？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灯，苦熬的岁月，青春年华，漏断人稀的长夜苦苦等待天明，对父亲的经历心存的最后一丝丝希望，如今，全破灭了。

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几个老相识搀扶，几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着眼泪，颤颤地伸出两个手指，说：“22 年啊，22 年啊！”

————————————————————————————————————

补白：每天早上我们劳改人员去工地，都要经过凤阳县城门口，再取道向北，直至临淮关。为了适应长途跋涉，不再采取箩筐摞叠、锹杠捆扎由专人扛抬的方法，改为每人自带箩、锹、杠各一件行军。一次走到凤阳城外一处人跡罕至的山间曲径处，我看到一只一尺上下发出阵阵微臭的死小猪。一连三天，死小猪都在，无人处理。第四天，我实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猪脚，将猪尸丢入背上背的箩筐中。不料后面押送的军人竟大声吆喝起来。不得已，在恶骂声之下，我只好把猪尸扔掉。那时饿呀！

————————————————————————————————————

把交代写到极致　　马　南

一天，单位里来两个外调人员，颇有点来者不善。其中那个戴眼

镜的，先泛泛地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比如你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呀，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老不老实呀，等等，接着追问："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吗？还隐瞒了哪些问题？"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我单位有人举报你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究竟有没有？"我一听，觉得好笑。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定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银行有两千一，是不是还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确答复他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当天的外调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仔细考虑这个空穴来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一点头绪也想不起来。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不知从何写起，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一件可能沾边的事。当时是文革初期，报纸报道云南边境某县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抢走两千块钱。我和几位朋友似乎谈论过这个热点新闻，可能如今被演绎成我打算抢银行了。我说明原委，他们不信，说我狡辩，逼我写交代材料。无奈之下，我决定编一个包含有"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两个元素的故事。

他们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后，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当晚，我又以"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为元素，发挥想象力，编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

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了几份材料，但都"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渐渐琢磨透了，他们是想逼我编出与他们炮制的材料对口的材料。这怎么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时，他们仍说"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斗胆索性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如果您继续要，我还可以开。"听我这番话，他们若有所悟，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

虑”，没有说“重新交待”。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再写材料，他们也“心有灵犀”，居然没再追究。

——————————————————————————————————

补白：1958 年 9 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刚到两天，公安局就来抓人。一起抓 61 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叛乱分子，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 15 年，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我 26 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 13 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1980 年我被平反，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过去人的数字里没有我，现在我好歹算是个人了。”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平反了。蓝　白

——————————————————————————————————

蒙古牧民阿拉坦　　巴雅古特

阿拉坦•呼亚戈，1909 年生，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人。20 世纪 30 年代满洲国建立，阿拉坦被招为警察，在当地服役，主要负责侦查和查禁鸦片的吸嗜贩卖活动。1945 年 8 月，苏蒙联军向日本宣战，满洲国随之灭亡。阿拉坦等 500 名蒙古青年，在蒙古人民

共和国人民军的劝导下，决定去蒙古国。

一入蒙古境，这批蒙古青年就受到非人道待遇，黑布带蒙眼，押到乌兰巴托。阿拉坦因曾在满洲国当警察，被指控为日本特务，重判有期徒刑 25 年。1954 年，阿拉坦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呼和浩特监狱继续服刑，接受劳动改造。1956 年，先后在蒙、中两国被关押近 10 年之久的阿拉坦，被“宽大释放”，但必须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最后，他被安排到阿鲁科尔沁旗的巴彦花公社希巴尔泰生产队，作为五类分子接受改造。

1967 年 7 月，阿拉坦的家乡来了两名造反派人员，在希巴尔泰生产队的队务室斗争阿拉坦一天一夜。次日早晨，阿拉坦当场死去。当天中午，同为五类分子的难友阿尔比吉呼、达瓦林琴等人，把阿拉坦的尸体裹在生产队的炕席内，用牛车拉到离生产队队部稍远的哈布塔盖小岗下，挖坑下葬。阿拉坦死后，他的女儿拉姆，以及拉姆的儿子莫尔根，在文革前后都受到牵连。

1975 年，阿鲁科尔沁旗民政部门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和被斗致残人员进行一次统计，阿拉坦被统计为“伪满警察、特务”，在“死亡经过”一栏中填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巴彦塔拉公社前来两人斗五类分子阿拉坦•呼亚戈，他在当晚自毙”等语，在“公社意见”一栏中写着“畏罪服毒自杀”。

从杭州到青海　　陈士濂

也许是我的运气还不错，1956 年我从杭师毕业时，正遇上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特许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和应届师范毕业生报考高等师范院校。就这样，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这说明那时的高考政审相对还算宽松，除军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较强的专业外，普通高校还能接纳地富子女。记得当时与我同一个小班的，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

资本家沈世礼同学。

因入团要求屡屡被否，当时我在政治上已不思进取，只想低眉顺眼做个不生事的顺民。即使在似乎最自由的 1957 年春天，不少同学热衷于集会演讲贴大字报，我仍然埋头在心爱的文学书籍中，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活动隔着一条鸿沟。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像鸵鸟般将头深深地埋进故纸堆里，从书籍的阅读中取得愉悦的同时，也期望“书中自有黄金屋”，能以“学问”为自己筑个安身立命的小巢。也正因如此，后来反右时，我这样不左不右的边缘人物得以侥幸躲过那顶帽子。

然而到 1958 年，形势不同了。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校园的革命也在往纵深发展，连大人物康生都到我们学校来视察过。整风、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教学革命……一环扣一环，一浪接一浪。课程基本停止，无论师生员工不管你愿意与否，在上边统一布置下，全都得投入运动。在这种革命形势感召下，我再次萌发了要求进步之心。我想给自己以彻底的清算，摆脱地主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加于我的羁绊，否定旧我，生出个新我。恰逢此时整风运动进入向党交心阶段，我向团支部提出了引火烧身自我检查的要求。

起初支部没有答复，大概是怜我年幼，并非他们认为的问题学生。禁不住我再三请求，由团支部主持，1958 年早春的一天，我向全班同学作了思想检查《暮气之根在哪里》，将我的官僚地主家庭情况，我对反动亲属的依恋之情，我在反右中对右派言论在思想上的附和与同情，以及自己的个人主义等等和盘托出。听完我的检查，同学们几乎愣住了：这小家伙，怎么那么复杂啊？但他们还是纷纷表了态，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我的进步。那一阵，我确实觉得轻松了许多。我想，我这么赤诚地交了心，组织上肯定会信任我，我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期望的那样。我并未获得新生，反而从原来的边缘人坠落为异类。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接踵而来的排斥歧视。在当时要求的全民健身二级劳卫制测试时，我被剥夺了打靶的权利——尽管只是一般的小口径步枪，我也得到了不许持枪的通知。

政治上的歧视，我可以俯身承受，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却是

我无法解决的。从 1958 年开始，我就读的浙江师院改为杭州大学。作为普通高校，收费在所难免，如果想继续享受原来的免交学杂费、膳宿费优待，就得另外申请。这种申请并不困难，一般学生都会被批准。但家境特别困难的我却成了例外，学校拒绝给我发放困难补助。我只能硬着头皮不交膳费，每日里腼颜捧着饭碗进餐厅，吃着“嗟来之食”。

这么熬了几个月，我终于产生了离校的念头。除经济的窘迫外，潜藏在深层次的是内心的恐惧。我比以前更害怕了。因为在此期间，我又目睹了几个同学的被迫遣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邻班的“青年作家”叶宗轼，据说老家有农民来信，揭发他解放前曾参与家里的收租，应是地主分子。于是作为阶级异己分子，他被开除回家。走的那天，我见他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旁堆着行李书籍，没有任何人相送，踽踽而去。他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不禁猜想，下一个被赶回农村的可能就是我。明知头顶悬着达克摩利剑，却不知这利剑何时掉下来，这种战战兢兢等待宰割的滋味实在难受。

我决心摆脱它，就向校方打了休学一年的报告，表示要自己出去挣学费。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准，也许它正符合校方清退异类的需要。与我谈话的是学生科一位姓赵的科长，以前从未接触过。他神色严峻，沉着脸告诫我：“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原籍去接受农民监督改造。”在办理例行休学手续时，他在我填就的表格上挥笔写下了一行类似判决的文字：“该生出身反动家庭，本人表现不好。”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判词我是很难接受的。出身反动是事实，这“表现不好”实属莫须有。大学期间，我并未犯过任何错误，还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歌散文，属于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赵科长的权力话语钳制下，我只有默默忍受。

拿着这张镌有罪孽“红字”的表格，去校内各部门办理离校手续时，我多次遭到白眼。在医务室，一位年轻护士以奚落的口气念出了那行字，我听后哼了一声，她立即责问道：“怎么？还不服气！”我没敢再出声，只盼望她快快把章子给我盖了。其时我恐惧已极，生怕他们真的把我押解回乡，我只求速速离开这所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

我害怕再次见到那位赵科长，又担心给我的正式文本上会附有我的“罪状”，于是连休学证明都没有领取，只带着一枚校徽匆匆登上西去青海的列车。这时，1959 年新年的钟声正敲响，我刚满 20 岁。我的大学生涯，从此戛然而止。

在青海，先我一年退学的姜君夫妇，已为我联系好去省卫生学校教课。学校人事科长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后，竟立即将我拒之门外，只撂给我几句冷冷的训诫：“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能自己出来工作，应该回农村接受监督改造。”两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政工干部，话语竟是如此相似，我不禁为自己的命运打了个冷战。失望之余，倒也生出另一种逆反心理：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能发配回原籍改造，我却偏要拼一拼，宁死也不回去！

有了这般破釜沉舟的勇气，我就穿街走巷，遍叩西宁地区各学校大门，到处推销自己，想凭借那枚单薄的校徽去另闯个天地。在最无望之时，我曾混迹农场招工处，准备出卖体力，当个农工，也遐想过像有些盲流那样，弄个镐头背篼，到山上挖石膏谋生。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惶惶然四处奔走觅食时，经同学请求，省卫生厅的领导居然直接干预了我的工作之事，逼得卫生学校做出承诺，留下我充当语文代课老师，只是月薪仅给 36 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刚毕业大学生半个月的工资。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所勉强收留我的学校，到一所小学找了个同样是代课老师的职位。从中专下降至小学任职，月薪反而提高到 42 元。

青海地处偏远，古来就是囚犯发配之地，1957 年后各单位接收了全国各地为数不少的右派和所谓有历史污点的人员。相比之下，像我这样仅仅是家庭问题的大学生，竟可算是清白之身。于是在 1959 年夏，凭着自己在杭州师范求学时向名师顾西林先生习得的二胡薄艺，被青海广播文工团录用为二胡演奏员，后又并入省民族歌舞剧团，成为该团的乐手。这期间，因为自己常有文学作品见诸报刊，遂被剧团领导赏识，调入创研室担任编剧。位置的渐行稳固，使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仅脱籍盲流，还已摆脱家庭出身的羁绊，俨然真成了与他

人同样的“革命文艺战士”。

让我重新意识到自己原罪在身，是在 1964 年四清时。我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剧本《达尔龙山下》，在省内现代剧会演一度走红，然而很快随着全国性的批判文艺黑线被定为毒草。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随之而来的处理就是遣返回家。剧团领导在与我谈话时，一再强调这与剧本之事无关，因为我属于盲流，按政策不得不如此办理。其实，这时困难时期已过，对待盲流已比较宽松。以盲流撵我回去，无非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时清除成分不好者的一种借口。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双重不光彩来历带给我的沉重负担。但我依然劣性不改，不愿俯首帖耳地接受这样的组织安排，就使出了一个盲流可用的种种求生手段，四处奔走，腆颜求人。那时我心理上已做了准备，大不了再次去寻个代课教师职位，在偌大的青海总不至于冻馁而死。

这番奋斗，果然有了效果。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带领我夜闯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的住所。该部长在剧团排演《达尔龙山下》时，曾经来团视察并捎带问起过剧本作者，对我有所了解。他认同了我的声诉，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得以化解这次大难，留在剧团。由此我想到，即使在共产党内，由于个人的素质涵养之不同，在执行同样的阶级政策时也宽严有别，有时也不乏颇浓的人性化处理。午人后来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离休，我曾去西安探望过他。如今斯人已逝，但援手之恩从不敢忘。

虽然逃过了“遣返盲流”之劫，名义上仍留在剧团担任编剧，但我自己心知肚明，已再次沦落为三等公民。外地来演出内部话剧《叶尔绍夫兄弟》，没给我发观摩票，原来联系密切的几个报刊，停发我的作品，后来干脆将我编入团内临时组成的劳动队，去农村与社员“四同”。这时团内已有一些干部作为四清工作团成员下乡。同为下乡，两者性质却是迥异。他们是去领导、整顿基层组织，也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而我们则是纯粹的干活和向贫下中农学习，亦即改造主观世界。

劳动队的组成人员，或历史有污点，或出身反动阶级，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作风算是其中较轻的。有位党员副领队，就是犯

了生活作风错误的舞蹈演员。也许是在劳动中“惺惺相惜”吧，待这期劳动结束，我竟与已离婚的她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但这段感情还不到一年就被她单方面地停止了，告吹的缘起竟是我殷勤地请她看了一场电影。

那是老片子《白毛女》。她是跳舞的，我认为请她看舞剧是最合适的表达情意方式。去影院的时候，我用自行车载她。车轮疾转，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还真有点鸳鸯双飞的感觉。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到影片结束时，她的情绪突然不对了，坚决不肯与我同车而归，两人默默无语地返回团内。

我知道事情有变，但不明白这么短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几天后，她终于道出了拒绝我的理由。原来是她在看《白毛女》时受了刺激，想起自己将有一个像黄世仁母亲一样的婆婆，实在无法忍受。听完她的表白，我黯然无语。革命文艺的力量实在强大，我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苦涩的自豪。

1966 年五一前夕发生的一件事，也是令我终身难忘的。那时候每逢五一、十一，全国各大城市都要组织游行。节日前夕，剧团创研室的负责人向我打了个看似很不在意的招呼：“明天的游行，你不用去了!”我听后，心里一阵冰冷。当我回到房内时，发现与我同室的孟犁野也在发呆。他是在《中国电影》编辑任上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到青海人民出版社摘帽后调来我团，与我均为编剧。我见他的神情异样，猜到他也与我接到了同样的指令。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敢多说什么。

第二天，他早早地躲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儿独自发呆，而我则蜷缩在屋内，聆听着外面热闹的人声锣鼓声，没有踏出房门。我害怕遇见别人，游行都不去，这算是怎么回事？难怪我的母亲将那份偶然得到的“人民证”珍藏起来。我这个“国家干部”，不是也同样享受不到劳动者的节日权利吗？这一年的国际劳动节，是我过的最黯淡的一个节日。本世纪初，在犁野君已调回北京并担任了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后，我俩相聚时还曾提及那次“非我族类”之辱。就是事到今日，我

们也没搞明白，像那样一个无丝毫保密意义的群众集会游行，有什么必要禁止我们参加？除了人为地制造冷漠歧视仇恨分裂，它于社会又有什么好处？

进入文革后，我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西宁人民剧院召开批斗大会，我混迹其内想一看究竟，只听主席台上一声大喝：“黑五类子女滚出去！”尽管并无人指名道姓地指证我，我自己却仿佛已被公示于众，连忙装作上厕所匆匆逃离会场。从此我对于那些革命造反派总是敬而远之，从不敢觊觎光彩夺目的红色袖章。就这样小心翼翼，还是未能免除派仗之累。在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发起“二.二三”事件，枪杀“八.一八”战士三百余人，开创了全国以武装镇压反对派的首例后，我受命参与了妖魔化对立面的派性戏《二月风暴》的创作，在半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该戏的排演稿。虽然这是违心之举，我绝非赵副司令支持的“捍卫队”一派的信徒，但主观上确有谄媚手持武器的掌权者以避祸自保的成分。

正当这个派戏紧锣密鼓地排练当中，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党中央、中央文革等最高权威部门于 3 月 22 日发布了为“八.一八”平反的公告。 “二.二三”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副司令固然成了阶下囚，底下的“捍卫队”大小头目也难逃程度不同的惩罚。按理说，我并非“捍卫队”成员，《二月风暴》这个派戏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从北影调来青海的演员张亮夫妇。张亮曾出演过电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社会上有些影响。他们夫妇虽在“八.一八”平反初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出身没问题，已转化为“革命群众”；我则因为原罪在身，就成为主要的清算对象。1968 年 4 月 30 日，《红宣兵战报》发出配有我漫画头像的战斗檄文《揪出<二月风暴>的黑笔杆陈士濂》，署名《红宣兵》编辑部。

在彻底击溃“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省话剧团革命委员会率

领八.一八红宣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揪出了反革命黑戏《二月风暴》的黑主笔、周扬黑线、黑网上的小爬虫——陈士濂。

揪得准！揪得好！

陈士濂何许人也？乃一贯利用小说及文艺作品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陈士濂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地主家庭，狗父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伪官僚，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1951 年被我镇压；其母地主分子，被管制；一个狗叔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另一个狗叔陈肇英是伪国民党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潜逃台湾；一个狗表兄是国民党伪县长，解放后被捕入狱（已死）；另一个也是地主分子，被管制。陈士濂就是被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家庭之犬。

接着列举了“陈贼用手中的黑笔，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书特书其反革命父兄的遗嘱，大干反革命罪恶勾当”的种种罪行。

那一阵，我不仅要参加团内的批斗会，还得像如今的大明星赶场

子一样，“出席”外单位组织的批判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省市文艺系统批斗会，“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担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要职的马集文亲临指导，作了长篇讲话。那天发言的人很多，其中京剧团的红宣兵头头张学文，开得口来就是一连串的谩骂，什么“狗崽子、狼崽子、蛇崽子、王八崽子”，一口气骂了十几个“X 崽子”。这说明，在他们的眼中，我罪恶中最“昭彰”者，还是出身异类，乃某种最可恶动物的崽子！

批斗会后，我被编入剧团的牛鬼蛇神组，组长就是后来蜚声影视两坛的李丁。我们将近二十人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门上大书“牛棚”两字，让过往行人更有力地监督并可从敞开的窗户像参观动物园般观赏这些丑陋的“人体动物”。在群众雪亮眼睛的注视下，我在靠床头供自己面壁思过的那一小方墙壁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自撰自书对联：“一定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 其时犹如罪人归位，我已定下心来，等待最后的处理。我知道，两位政工干部早先的预言这回要实现了，我肯定得乖乖地滚出文艺队伍，回去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于是，我未雨绸缪，先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托人卖了，准备没薪水领时可以顶两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趁跟随团里木工汪师傅做道具的机会，努力学习手艺，以便将来被赶回农村后能挣得一碗饭吃。

想不到百日之后，1968 年的 8 月 31 日，我意外地等来了青海话剧团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联合颁发的《公告》。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亿万革命人民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中，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革命群众揪出的陈士濂反复的交代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指明

出路，进行教育。现陈士濂对其自己的反动家庭、本人罪行、大毒草“二月风暴”等问题，都有较好的认识，交待的较为彻底，与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反复调查研究核实的材料基本相符合。

根据这一情况，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认为，陈士濂确有彻底低头认罪、悔改自新的诚意，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我们将此情况上报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专政小组，要求将陈士濂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群众专政。现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批复，同意我们的意见。

现出公告，正式宣布解除对陈的群众专政。我们热烈地欢迎陈士濂同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院墙上发布此公告的同时，已从歌舞剧团分离出来的话剧团革委会还在大会上，宣读了对我解除专政决定的有关材料。这份材料写得非常详细，还很有点辩证意味：既指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很复杂，

又说明我并无隐瞒；虽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但还不是坚持反动立场；既指出我在大学时思想落后右倾，又说明材料来源于“向党交心”，不能作为罪证；既指出我在《达尔龙山下》、《二月风暴》等剧中的问题，又说明其炮制的责任主要不在我，而我自己的文章只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份材料及其结论是心服口服的。我甚至觉得，在我所在的这个小单位里，那些从无执政经验的演职员，其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水平较之于我前边遇见的两位政工科科长要高过一筹。而且，我对为解决我的问题千里迢迢外出的调查者和那些被调查的同学、乡亲都心怀感激。只要他们其中任何一人加我以某项似是而非之罪状，以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我的遭遇就会很惨。当然，我当时更为感激的还是领袖，是政策。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极其真诚地写道：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革中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家属的打击，此时达到了高峰。从我切身体验看，自“清理阶级队伍”以后，由于执政者的矛盾指向所谓的走资派，对黑五类的压力反而有所减弱。待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普遍地给地富分子摘帽后，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一个人不被歧视、不再受压是何等的舒畅。也就在那时候，素来令我心生畏惧的政工干部居然主动来找我，动员我写入党申请并主动做我的介绍人。其时我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举措心悦诚服，觉得党大有希望，故而写了申请并很快地得到批准。1983 年，正值重用知识分子、提拔年轻干部之际，省委一纸调令，将我从话剧团的普通编剧，一下子提升为青海省文联副主席，任职至 1998 年提前退休。

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狗崽子”，能在阶级政策如此严酷的情境下，从夹缝里求生，从盲流转入体制内还获得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步入晚年后，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觉得除了机缘巧遇，以及自己有些微弱的抗争意识，在那个听任组织安排的年代敢于自谋职业越级上诉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总体上服从了阶级政策的需要，已经从“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演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里有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认罪自保到自觉配合的过程。

从上初中开始，我就不断地被灌输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其后又是与此相关的一连串运动。经过多次打压不断地自辱、自贬后，我已磨尽了曾经有过的不平，认可了原罪，接受了不公正待遇，将其视为合法合理的差别对待。记得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像遇罗克那样的热血青年正奋起反击，而作为受害者的我，却将登载在小报上宣扬血统谬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路线万岁”抄录在日记本上，承认该文的立论“老子反动儿混蛋”适合于自己。既然自我矮化到极致，对于组织上偶尔恩赐的“赏识”、“重用”与后来“牛棚中的解放”自然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我的这种渗透于血液中的“脱胎换骨”改造，更明显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其实，我的处女作、发表在 1957 年 6 月号《东海》杂志上的散文《孩提之爱》，顾名思义还是写童真童趣属于人性范畴。但后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参与的剧作，则完全是为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杜撰出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像《达尔龙山下》，就编造了一个妄图复辟的牧主头人和贫苦牧民斗争的故事，它与现实的牧区，除生活细节有所相似，其他都是克里空的产物。《二月风暴》更是从“八.一八”是反革命这概念出发，按“捍卫队”一方所提供的点滴材料，加以无限的生发虚构，编造出一场血淋淋的阶级报复夺权斗争。

这说明，经过多年自觉或不自觉的磨练，我已做到自觉听命于当权者的政治指挥，完成了从一名纯真的文学爱好者到为权势者秉笔的蜕变。这种内伤是致命的，有时甚至不可逆转。即使在“四人帮”粉碎后我重新握笔时，也始终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像我重续儿童文学前缘编写的童话《白唇鹿青青》，明明写的动物，也要硬塞进个千户和管家，有意妖魔化我并不了解的藏族上层人士，生硬地将阶级斗争搬进天真无邪的孩子生活中去。

上个世纪末，思想解放之大潮汹涌澎湃。在屡获启蒙，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渐次浸淫于脑际之后，我对自己已凝固于脑中的“阶级观点”

产生了怀疑。首先是我到底有什么罪？出身不好，能成为受歧视、遭打压的缘由吗？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之一。那种将黑五类的子女长期置于被压制地位，让他们始终诚惶诚恐地生活，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既然我本无罪，那么就不应该被作为非类、打入所谓的“牛鬼蛇神”，不应该接受超乎法律之外的“群众专政”，更没必要为这样的“解放”而感激涕零。

父子株连，兄弟反目　　文　忠

我的父亲刘宗汉是历史反革命,第一个被株连的是我大哥刘文德。大哥非父母亲生，但与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视同己出。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之际，善后救济总署搬迁台湾，同事劝我父同往，父亲断然拒绝。有好心人劝父亲，自己不去台湾，可把大儿子送去，父亲还是谢绝了。父子俩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失望，绝了去台湾的念头。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决定派军赴朝参战。位于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大批有经验的人员为军队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到上海招聘，在父亲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在安东鸭绿江桥头，大哥亲切送别二弟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负伤的弟弟回国。

1956 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57 年反右开始，远在安东的大哥随即被揪出来审查。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了解到当年浙江实业银行支持蒋介石发动 4•12 政变，而刘文德的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该行当过高级职员；还有大右派章乃器，当年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汉宗关系密切； 更要害的是，当年

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杨彭年恰好是刘文德的岳父，于是认定大哥刘文德毋庸置疑就是这条藤上的黑瓜。父亲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动资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刘文德本人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历史反革命，绝不冤枉。

王书记与潘科长如此顺藤摸瓜，挖出一个隐藏极深的历史反革命，兴奋无比，于是立即组织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台，连续作战斗了六个下午。大哥坚定站立，横眉冷对，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反革命活动，也绝无任何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硬的不行，就用软的，潘科长出面与大哥个别谈话，诱骗他："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给你加工资。"大哥回答说："提拔我、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与他有什么关系？"

王、潘又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径直找到此时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亲，逼令他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老父知道抗拒无用处，于是违心胡乱写了几句显而易见破绽百出的东西应付他们。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借着这份牛头不对马嘴的材料，对大哥狠批恶斗，逼令他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可奉告，结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岗位变了，每天打扫卫生，档案里注上"内控改造"。

1961 年发生大饥荒，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名单的人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和平时向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单上。大哥拿着发给他的 400 元安家费，从东北安东市回到江苏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房无一间不漏雨的，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拿到的所谓安家费，不够大哥一家 6 口几个月的口粮。

二哥刘文兵，1949 年秘密离家出走，参军入党，赴朝作战，负伤立功，回国时已是少尉军官。凭他的功绩与才华，原本可以升级

重用，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二哥成了无前途的军校教官，最后退役复员，到苏州地方基层工厂当领导干部，文革中惨遭造反派批斗，差一点被扔进太湖淹死。三哥刘文辉，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杀害。

我这个父母最小的儿子，父亲出事戴帽时仅仅 12 岁，亲见父亲日夜被监督管制，含泪扫垃圾、掏阴沟，兄长接连出事遭难。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我屡遭侮辱、欺凌。我当时怨恨父亲，何不当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亲历文革之后，对父亲，我由怨恨转为同情，既深为父亲的遭遇感到不平，更为自己曾怨恨父亲而深感内疚。

我家是阶级斗争的重灾区。三哥文辉是右派分子，二哥文兵是共产党员，饱经朝鲜战争烽火的锤炼，是毛的好战士，目光敏锐觉悟高，能于自己家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二哥、三哥之间的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苏州，三哥在舟山嵊泗岛，很少见面，但每逢春节合家团圆，二哥、三哥便唇枪舌战，搅得家中不得安宁。

1963 年寒假，三哥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家体验生活。大哥家住房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屋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半岛看夜。白天，14 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但是大哥档案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的对象，不属于政策补助对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将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地农民贫困、饥饿、潦倒的生活境况，不少人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怨骂共产党。二哥得悉此事后，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一顿，说我小小年纪，中三哥的毒太深，并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况，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

面的政策存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来留给大哥，寒冬里穿着单薄的夹衫赶回上海。在拥挤的车厢里，他主动将座位让给一个孕妇，自己站着全神贯注地读英语书，四个多小时站到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我写报告的事。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相聚在内室，各泡一杯茶，关上房门，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二哥说："三弟，你叫小弟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做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抹得一团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国家大好形势，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兄弟在家看看还可以，一旦传出去，必定会闯大祸！"

三哥听了，平心静气地回答说："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而最正确的观点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到老家，亲眼目睹那里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这怎么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呢？家乡群众生活那么苦，那么穷，怎能昧着良心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写调查报告，让组织知道实情，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气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吗？岂不是犯了政治立场错误？"

三哥不以为然，讥笑道："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家的情况吗？没有。你根本不了解

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果说是阴暗面，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的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和我的脸，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三哥急起打断他，大声驳道：“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正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不还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本人，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实际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声，眼看着我成为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的话，是全然的愚昧、盲从、奴隶相！”

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大弟，家中发生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辩论。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最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吗？小时候你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心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谁，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的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

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担忧，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哐啷一声，吓得我目瞪口呆，连忙打圆场：“二哥、三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我那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二哥说的那样严重。”二哥转向我，教训道：“小弟，你还年轻，十六七岁中学生，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铁板着脸孔，三哥激愤得双眼通红，我吞吞吐吐辩白道：“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你三哥的阶级立场十分危险，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三哥嘭嘭连拍两下桌子，愤怒地跳立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调皮捣蛋，但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长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学生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不需要你去教训。究竟是你驯服工具好，还是我独立思考对，他们会在事实面前辨别清楚！”说完，三哥独自狠狠拉开房门冲了出去。二哥气得连连摇头。

二哥与三哥，见面就争，一谈时事就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人都称他俩是冤家对头。二哥一再表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不同路线观念的争论，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做哥哥的，有责任向弟弟妹妹们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三哥则公开鄙视二哥的愚昧、盲从、奴才相，认为他早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俘虏过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独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三哥就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反问二哥：“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长年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

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觉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做。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给我家带来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在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边。

二哥是共产党、解放军部队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不理解经历苦难的弟弟文辉的切身感受，不认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许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后，二哥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三哥惨遭杀害，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刚正不屈、忠烈献身的义士，二哥也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愚忠错误，误解了这位为国为民而“桀骜不训”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颤抖地拿起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了三哥墓碑上的遗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他一笔一划地描着，神情肃然，内心沉痛，他被自己的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

补白：我的父亲叫热桑，刚解放时，我阿爸打土匪中了弹，自己用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开会还给他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 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到我们的夏牧场的帐篷，然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 8 岁，妹妹 6 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 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了。　　　尕玉巴

————————————————————————————————————

嚣张的右派　　马　赫

1964 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组来了，厂里准备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职工评审大会上，一开始气氛不错，工作组长态度平和。一个积极分子上台发言："XX，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去五金公司送货，五金的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带队的干部，你指着板车说：'我是车前工。'你会车钳工吗？你是车钳工吗？你这不是在外面骗人吗？今天你说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说的不是车钳工，是车前工，拽着绳子走在板车前面的工人。"这一下炸锅了，纷纷怒斥我抗拒改造，对政府不满。

另一积极分子站起来说："我来揭发一点！前几天 XX 理发，说是理了一个泰山头。大家看看，分明是风凉头，他偏说泰山头。他这是想说我们工人阶级头上还压着三座大山，污蔑我们党，污蔑新社会，挑拨革命群众和党的关系。"于是，会场气氛陡变，群情激愤，高呼"打倒 XX！"

我当场拒绝了这一指控。我说："从一种发型做出这样牵强附会的分析，我不能接受。"各种指控纷纷嚷嚷，义愤填膺，聒噪了好一阵，工作组长开口了："今天，我很受教育。看来，我们厂的工人同志们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也是敢于斗争的。XX，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我们工人文化低，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你是斗不赢我们的。听说你平时话不多，但放的毒不少，把风凉头说成泰山头，话不在多，一句话就挑拨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很恶毒。"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不等他说完就顶了过去："照这样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往反革命上靠。"

四清工作组长是何等身份，连厂里的书记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个五类分子竟敢在群众大会上顶撞他，这还了得！他把桌子

一拍："嚣张！"我也豁出去了，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我始终坚守一点：即泰山头推导不出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我和工作组长吵起来，会议不欢而散。一连几天，我等他们出招，准备承担后果，奇怪的是，四清工作组和组长再也没有露面。此事虽没恶化，摘帽的事泡汤了。14 年后，即到 1978 年，我的右派帽子才摘下来。

——————————————————————————————————

补白：共产党接管东北，地主崽林枫成为东北 2 号人物。他衣锦还乡，乘专机去会双亲。故乡望奎县不敢怠慢，派出县大队长护送其双亲，到有机场的绥化县同林枫见面。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左右陪同，一个连的士兵前呼后拥，乡间地主风光一时。归途中，国民党残兵袭击了林枫父母一行。东北千岁爷的双亲，连同护送的一百多号武装人员，全部死于非命。林枫闻讯大怒，要求东北军司令林彪为他的地主双亲报仇。同是地主崽的林彪，派出整整一个师，却没逮着肇事的国军残余部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林彪的部队来了个大搜捕，方圆几十里鸡犬不宁，二千多人被杀，其中大多数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小革命家、普通革命者的神气就没有这么大，他们的地主父母只有被斗杀的下场。赵紫阳的父亲，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遭到杀害。赵当时是地委书记，地位没有林枫高。毛泽东、刘少奇家也是地主，他们的父母谁敢动一根毫毛？土改中，地主崽身份的革命干部，在无情斗杀地主的同时也常常背着人流泪，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正在遭难。当时为避免心慈手软，他们的党让他们只能在外乡搞土改，叫"回避政策"。毛王朝的建立，千百万穷人"翻身做主"，组织领导这场巨变的地主崽们成就了事业，但他们的事业是用自己父母的鲜血、泪水和生命铸成的。他们的极端残忍自私，天底下罕见。地主被定为有罪阶级，乃千古奇冤，万古荒唐。

——————————————————————————————————

学习班往事　　江　城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接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为配合运动，高头公社革委会先后办了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在 7 月，为期 25 天，地点是高头市场南边的天后宫。第二期自 1970 年 2 月中旬至次年 1 月下旬，为期 11 个多月，地点在高北村圆土楼（绍明楼）。第三期在 1971 年 4 月，为期 1 个月，地点在高东村永源楼（崩蓬楼）。三期学习班我都参加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时间长，斗得狠。

那年头，人们谈学习班色变。学习班不是什么学习场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狱。借学习班的名义，革委会凭一纸通知，把被疑为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关押起来，集中整治。人一旦进学习班，便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期学习班很具规模，参加学员 70 余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员主管，下设专案组，由 6 位干部成员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厅下放的，专事内查外调，整理学员的材料，另有 10 多位社会上雇来的壮汉担任执勤，日夜轮流严把门户，并察看班上动静，稍有异常即迅速处理。学员的来源，部分由公社革委会圈定，部分由群众密告“推荐”。他们必须按公社通知上规定的时间，携带铺盖、米菜、日常生活用品，准时到绍明楼“入学”。

绍明楼是一座大圆土楼，绝大部分楼房还是空架子，没有装修，仅住四五家人，空荡荡的。楼内没有厕所，临时在底层一角摆几口大陶缸，胡乱搭上木架，围上竹席，便成临时厕所。报到学员在四楼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卧，除了吃饭、大小便，绝不许走动，更不准交头接耳，否则“恶果自负”。

学员有这几类人。一类是“不务正业，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一位果农，向人传授嫁接技术，“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节气）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检举，说是与最高指示“以粮

为纲”唱反调，煽动社员走歪门邪道，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位社员，携带烟刀，串门走户替人切烟丝赚些家庭零用钱，被说成是开地下工厂。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经常背上一二十斤烤烟步行到漳州去做小买卖，被指为投机倒把分子。有许多社员未经生产队长许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赚取家庭日用使费，被打成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类是“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属于斗争和打击的重点对象。一位社员，写春联磨墨时，不慎将一点墨汁溅在旁边毛泽东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惧万分，赶忙用小刀把那点墨汁轻轻刮掉，不料刮出一个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农，于是有人指控其“怀着刻骨阶级仇恨挖取伟大领袖的眼睛”。一位社员，其子跟别家孩子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于是被指控咒骂毛泽东。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在墙上，后来“疆”字被风吹掉，被人举报“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一位中学职员，无意间把双脚架在办公桌上，桌上刚好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于是被告密胆大包天。有一位会看相的，说林彪鹰鼻，相书说，这种人居心叵测，靠不住，被诬为“诋毁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还有一类，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错队”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他们也是重点斗争和打击的对象。

我之所以被通知到学习班学习，原因有二：一是春节家门口贴了“犯上”春联，二是写了有政治问题的新诗。春联是“山花烂漫时可待；悬崖百丈冰易消”，他们认为我这号人不配集毛泽东词语作对联，还任意加减字，属于犯上。当时我三天两头遭抄家，古字画、珍贵书籍、文稿、笔记，凡有字的，悉被抄没，连一张纸片也不放过。一个小笔记本里有我写的 60 多首小诗，被认定全是抒发资产阶级感情，尤以《骆驼》和《柳笛》最为反动，含沙射影，不满现实。《骆驼》诗曰：“无边无际的戈壁，宽不过骆驼的四只蹄；不断移动的沙丘，移不动驼群的意志。任狂风呼啸怒卷，飞沙走石铺地遮天；骆驼，沙漠的船，自有它坚定的航线！”《柳笛》诗曰：“黄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弹指间已

林荫一抹。一根根嫩绿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伙伴，可记得当日的心愿——我今折一个柳笛，谁来和一曲《江南》？”他们指控，“戈壁”是诬蔑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狂风”映射轰轰烈烈的历次运动，“驼群”即反动组织，“航线”即路线，“伙伴”即死党，“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文革后，我给《骆驼》加一个副标题“写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在 1979 年 11 月号《福建文艺》上发表了。

“开学典礼”那天一早，全体学员被集中到土楼大厅，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聆听公社首长训话。末了，一位神气十足的巡视员，板着铁青脸孔，声色俱厉地给学员们交代政策:“这一次学习班非同寻常，你们必须彻底交代罪行，对于敢于藐视政府、负隅顽抗者，一打到底，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判的判，”然后再提高嗓门:“该杀的——杀!!!”凶恶的声音在土楼震荡，恐怖气氛笼罩全楼。

巡视员训话结束时，又大声问一句：“你们在坐的有谁没有罪被叫到这里来？”“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学员冲着应道。巡视员一时尴尬，瞟一眼旁边的社长。社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犯激怒了，厉声斥道：“你开地下工厂，还不认罪!”江学员也不示弱，立即反驳说：“既然我开地下工厂，请问，我的厂址在哪里？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资金？我只带一把烟刀，农闲时出去替人切些烟丝，赚个零花钱罢了，这叫开地下工厂？”社长一时语塞，寻思一会儿，改口说：“你种三千株烤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年头种那么多烤烟实为罕见，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天经地义。江学员语塞了。

学习班第一阶段的“学习”是相互揭发罪行，写检举材料。检举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学员间失去理智，产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经过敏症，警惕着，只怕稍有不慎，被当作邀功求赏进而“赎罪”的材料。人们有如刺猬，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离。有一个学员，是第一次进学习班，才来二三天就撑不住了，暗暗叫苦:“哟，这样子下去，会被‘卤’死，会被‘卤’死!”一位“老运动员”不屑地抢白他:“哼，早着呢，你‘卤’了什么？才下盐缸的鱼，还新鲜着呢。像我，早成咸鱼了，才真正算‘卤’着!”

那位江学员，与社长家同住一楼。一天，他突然举报社长犯有反革命罪行，并带领公安特派员来到社长家的窗底下。那里有一张从小学课本里撕下来的毛泽东彩色像，上面不仅满布针孔，还有擦屁股的便迹。江学员指着毛像，大声说道："这不是反革命罪证是什么？"特派员将这一"罪证"用报纸包裹起来，带回去侦查。社长闻讯着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带着小儿子到特派员跟前说明情况。他是，像上的针孔是无知的妇道人家平时做针线别针时留下的，便迹是不懂事的小儿晚上摸黑应急留下的，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没有恶意。事情发生在社长家里，自然跟一般群众有别，不必认真，最终不了了之。

半个月后，学习班进入了第二阶段——批斗。既然进了学习班，按当时的逻辑，不是罪也是过。每个学员必须反反复复、老老实实写检查材料，深刻反省并彻底批判自己。为了争取早日得到较为宽松的处理，离开这是非之地，一些学员寝食不安、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行"。为了扩大"战果"，革委会还精心安排几场群众斗争大会，在高头市场等处揪斗重点对象，一方面借此教化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嗅觉"，永葆旺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杀鸡给猴看，对全体学员和社会上的危险分子收杀一儆百之效。

那时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旦被揪斗，往往是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双膝跪地，低着头但前额又必须稍仰，如此尊严丧尽地恭听辱骂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个钟头。有个学员，是医生，入学习班以前就被斗了好几次，已摸索出一些挨斗的经验。他探索出一种比较"舒服"的跪法：双膝跪定，额头抵在地上，类似佛教徒五体投地。这种跪法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实认罪，态度至诚，说不定能侥幸感动"上帝"，提前获得宽恕，另一方面由于加上额头支撑，可以分散身躯重心，减轻两个膝盖和脚大指的负荷，会"轻松"一些。

在学习班里，前两次挨斗，他都用此法蒙蔽过关，第三次挨斗欲故伎重演，被一位执勤的壮汉看穿。那壮汉快步向前，提起他颈背的绑绳，接着又狠狠把他手脚朝天掼翻在地，骂道："嘜，还想舒服，用

头做脚!”医生登时休克，好一会才苏醒过来。现场的群众看客个个咋舌，学员们则无不惶恐万状。

经过 50 多天批斗，学员们大都被狠狠“卤”了一阵，一些被认为问题较轻，所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现的，如小商小贩、私自外出赚钱的木工泥工等，能积极退赔“非法所得”，便陆续获得“结业”，离开绍明土楼。

学员减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现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错队”的学员，共约 30 余人，进入学习班的第三段——劳动改造。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带一盒饭和些许咸菜，就地风餐。活是干不完的。公社要修医院、修养猪场了，我们便去清基、抬石头、砌石基、夯墙、挑砖、运木板、盖瓦。公社没柴烧了，我们便到深山砍树、劈柴、挑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我们轮流到劳力短缺的生产队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饥饿是难以忍受的，那时高头公社各生产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少，多的 120 斤，少的低于 60 斤，还是原粮。我们多么希望有个好心的生产队长，中午能管上一顿粗茶便饭，缓解一下辘辘饥肠。无偿劳动，连饭也自带，干活时又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认真踏实，有些群众便戏称我们是一群不用喂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众称我们是全能义务专业队，人才齐全，什么活都能干。这样我们又熬了 9 个月。

年关逼近，专案组早在几个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几个雇用的壮汉每天监督我们劳动。大家盼归心切，特别像我家，5 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到头赚不到工分，口粮被扣，此时已处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绝境。终于，放我们回家的这一天到来了。公安特派员召开会议，对现有每个学员的罪行逐个作了简要总结，然后历时 11 个多月的学习班宣告暂停。这不是“结业”，以后“随传随到”。

七年之后的 1979 年 4 月，我已在金丰中学执教两个月，古竹公社（高头公社已并入古竹公社）竟给我送来 50 元人民币，说是对我在文革中受左倾思潮冲击、屡遭抄家和入学习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补偿，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

补白：共产党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土改彻底，把斗争对象扩大到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找对象也要看阶级》，称要不讲究点阶级，就要吃大亏，娶了成分不好的女人麻烦大。第一，要当心地主捣鬼！你要想想，在旧社会，哪个地主女人愿意随便嫁给穷人？穷人看上了地主闺女，她还要骂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难道现在她忽然相中了咱穷人吗？当心了！恐怕他是要利用你逃避斗争哩，或者是他还有些包袱，想找你当防空洞哩！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第二，要当心脱离群众！咱穷人一伙子闹斗争，现在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上民兵，起码也是农会会员，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随便搞上个地主女人，大家叫你开会，老婆子叫你在家里；大家叫你斗争，老婆子叫你别得罪人；要商量点啥事，不敢在你家里谈，怕你老婆子走了风声；一肚子高兴，不敢对老婆子讲，两口子扯不在一搭！人总不要脱离了群众，大家认为他是斗争对象，你倒扯进怀里当老婆，不脱离群众吗？第三，要当心地主女人思想转变不好。本来你该知道，地主的思想就是不好转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地主的本性就是他的剥削思想，瞧不起农民的敌对思想，你要改造他这个思想，是不容易的。第四，要当心地主女人没劳动习惯，不会过时光。　　　　　　申顺芬

——————————————————————————————————————

林云涛复仇记　　南　周

1970 年，林云涛出生在莆田秀屿的溪边村。母亲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父亲林建阳在国企莆田罐头厂当文书。1977 年秋的一天，溪边村后厝大队的坝子里聚满了人。林云涛钻进人群，看见爸爸直挺挺躺

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周围的人告诉他："你爸爸给人害死了。"父亲的样子让他浑身发抖，上下牙咯咯相撞。从前的父亲是大学生、共产党员、援越军人、国企罐头厂的文书，前途无量，如今的父亲却是一具死尸，荣光灰飞烟灭。

林建阳是硬骨头复员军人，几天前厂里有人经不住批斗自杀了，他还感慨别人太傻。罐头厂说是畏罪自杀，村里人都不接受。林家招集几十个亲戚，差点抬尸到县里闹。赤脚医生做了尸检，认定是他杀，最终却不了了之。

1981 年，林云涛小学二年级没毕业，还是个傻里傻气的农村娃，就补员进罐头厂当了工人。这是家人上访四年的结果。他们每天写信伸冤，有的信还寄给中央领导，总数超过 500 封，得到的是：抚养费 606 元、安葬费 90 元和一个罐头厂的补员名额。罐头厂人数逾千，11 岁的林云涛比所有的人都小出一大截。厂里开了后门，在户籍年龄上加了 5 岁。进厂后，林云涛试图拨开父亲自杀的迷雾。听说父亲是因为得罪了红派的人，被勒死后丢进井里，林云涛去看了那口黑洞洞的机井。厂里还有人偷偷告诉林云涛，杀父的仇人是红派活跃分子黄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鏁。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翁元鏁的名字。

1966 年文革初起，罐头厂也分为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林建阳是逍遥派。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罐头厂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1977 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被红派一锅端，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林建阳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实际是由车间、澡堂改造成的隔离审查室，跟集中营无异。那一届学习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人说得清楚。只是人们至今还记得的是，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试图自杀，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连一贯的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井里。

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把仇家锁定在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鏁。许多人提起翁元鏁就恨，说他那时上蹿下跳，整人的事没少干，属于典型的投机分子。林云涛还了解到，父亲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

鑅，说他底子臭，因此得罪了翁元鑅，而那时候翁是得罪不起的。还有人告诉林云涛，翁元鑅的前妻曾威胁他说:“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搂出去。”翁的前妻曾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说是林建阳冤魂不死。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尸体被发现时，草帽绳勒在脖子上，人们传言，这是林建阳在复仇。

当初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出口的枇杷罐头远销西欧。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越发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多数年轻人觉得呆在厂里没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 25 岁的林云涛。不久，林云涛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身边的人陆续发了大财，林云涛还是普通工人，一月挣三四千块钱。

林云涛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每天上班、加班、带孩子，从不向妻子提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永远放着父亲年轻时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林云涛总爱和上年纪的人，尤其是罐头厂的师傅闲聊，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的往事，一个上午慢悠悠地就过去了。妻子不解，林云涛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每碰见翁元鑅，林云涛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翁，他觉得翁总躲闪他的目光，眼睛往外，从不看他。30 年来，他和翁没有说过一句话。

林云涛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偶尔喝醉酒给妹妹打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林云涛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2005 年，因为风水，林云涛迁葬父亲。林家人看到林建阳腐骨发黑，使劲一捏成灰。在林云涛看来，这是父亲死不瞑目。林云涛记起在罐头厂图书馆里读到的伍子胥复仇的故事。父兄被楚王杀害后，伍子胥出逃吴国，后借吴国之力回国复仇，“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

三百，然后已”。这个故事激励了林云涛。

2010 年 11 月 13 日凌晨，福建莆田涵江区，牌局散去，71 岁的翁元鏷晃晃悠悠回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借着月光，看见他仰面躺着，满脸是血，已经气绝。

起初人们推测是贼娃子干的，又有人怀疑是翁的亲生儿子干的。翁是二婚，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断绝往来。最终谜底揭晓，杀人者是罐头厂下岗职工林云涛。

——

补白：镇反期间，云南发生一起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党员 1300 多人，包括 80 多名中共干部，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扯进去。实际上这是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以刑讯逼供制造的一起假案。当时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明确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你们给我好好去查。”省公安厅调查后，发现是假案，起于一名小学教师在刑讯逼供下的供词。宋任穷为了保官，不对该案及时纠正，只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致使该案 126 人被枪决，37 人被判死缓，669 人被判坐牢，133 人被管制，168 人被关押和审查。此案 1981 年平反。

——

神农架日记节选　　彭小明

这是我大学三年级时的日记节选。我到神农架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民歌，那些淳朴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偏偏我又有了如此的巧遇。我承诺过守口如瓶，但是我心里十分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决不会永远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里总不能平静。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　晴

午饭时间，左苏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湖北省委的老爷子喜欢打猎过瘾，就让交际处的小干部们物色一两个真会打猎的枪手，一起到深山老林里去尝尝野味。郭健是省委机关职工的孩子，当兵的时候枪法好，就被借调来省直机关工作，隔三差五陪着老爷子上神农架打猎。神农架那边的农民，老人们穿的仍是古式的衣服，男女老少依旧保持传统的风俗，隔山对话不方便，唱一首民歌，表一份情。这样的地方如今只怕不多了，或许我应该去一趟。既然我选择了民间文学专业，怎能没有一次田野作业的经验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考察队，郭健是队员之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　晴

今天到了板仓，遇到司法处的年轻人谭邦道。他回木鱼坪探亲时，听见几位老人在谈野人的事，原以为是讲古代的事，一问原来是上个月的事。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　晴

晚上，我正准备洗澡，一位女青年来敲门。她自我介绍，是林区会计科的职员。她说她的妈妈听到我中午在唱民歌，很想见见我。她的母亲是林区妇联的干部，有病在家休养。她低声说，母亲可能患的是癌，盼我能尽量满足她。我跟着这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进机关宿舍。

她的母亲叫冯静美，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一口当地方言，肤色却明显比一般妇女白净。她问我为什么收集民歌，我说了民间文学的价值。她听了，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她说，她有一本旧时的赞本。当地人把他们的民歌手抄本叫做赞本。她告诉我，这是她父亲留下的。她打开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毛边纸的抄本，抄的都是本地的民歌。工整的繁体毛笔字，几首民歌都是五句子，旁边还写着工尺谱。第一首是《戒指》：“远望姐儿穿身黄，十指戒箍摆成行。一不是娘家陪嫁的礼，二不是婆家攒私房，一个戒箍子一个郎。”看来老人当年也是个

行家，可惜内容并不多，我已搜集到的民歌比他的更多、更详细。

冯静美起先说“我父亲不在了”，后来又说“或许还活着”。我听了一惊：“他在哪儿呢？”她迟疑了片刻说：“这话我多年都不敢说啊。当年野人的事，不许人说的。土改的时候，有的地主受不了斗争、挨打，就跑进了深山老林。我父亲他也走了，从此没有回来。我父亲当年在邻县教书，解放时我才十五岁。父亲是长子，爷爷死了，他三十岁出头，地主帽子就戴到他头上。他发现太可怕，逃出村子。过了十多天，我妈妈也上了山。民兵上山打土匪，开了枪，母亲被抬回来，已经咽了气。我当时很害怕，土改工作队的崔政委把我接去。我识字，能给工作队写文书，一年以后，我就跟他结了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崔是林区公路局长。两派武斗双方扔石头，他去劝架，不知谁扔的石头不巧刚好打中他的脑袋，当场遍地是鲜血，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他死以后，我翻出他的一些遗物，意外地发现他收藏了一本赞本，我认得出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我听说你是上海的大学生，专门来收民歌，就想给你看看。”

我很快抄下了我没有收集到的几首，以及乐谱。她的女儿跟许多时髦年轻人一样，对农民的土语民歌不屑一顾，早已转身出去了。

我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去找父亲，她叹息一声，说：“是啊，我哪里没有想过。可是他是地主，我嫁给了老崔，老崔不让。他说了，就是他愿意找，找回来也没有好结果啊。我好容易入了共青团，一直要靠拢组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没人时已经斗得死去活来，真找出个大活人来，不是找死吗？或许他在山林里住着，虽然衣食不周，倒还悠闲着点儿。文革那一阵，各生产队的地主富农被打得那么惨，我反而多少觉得他还是走了干净。”

她的眼泪不住地流，我对她说：“事情都过去了，你不要太伤心，我给你唱一首民歌吧。”我翻开她的赞本，有一首《青山》，我唱到：“每日开门见青山，山上青色不改换。我问青山何日老，青山问我几时闲？人学青山难上难。”听我轻轻地唱，她又忍不住老泪纵横，说她依稀记得当年乡亲们和父亲也唱过这首歌，仿佛今天才真正明白了其

中的含义。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晴

昨天晚上听了冯静美的故事，联想起神农架野人的信息，我心头烦乱，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既入睡，我做了一个梦。这里离谭邦道说的老人们发现野人的地方不远。梦中，我背上背囊，信步朝山里走去。离开公路，走进深山，天气很好，草地也松软。据说当年薛丁山在这里养马屯兵，果然是一片好草场。

穿过草场，又是丛林和山坡。忽然，我看见林中好象有一个人影。是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背影。红棕的毛，没有衣服。野人？我惊呆了。是的，没有错。可是太远，看不清楚。我想去接近他，可是踩着杂草，脚下发出哗哗的响声，那背影立刻向山里奔去。我想去追，可是我明白，奔跑登山，穿越荆棘林莽，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几秒钟后他就会无影无踪，解开背囊拿照相机也根本来不及。

我该怎么办？有了。远离人间的人会眷恋人间的歌，我深深喘了一口气，放开歌喉，唱起了五句子《戒指》。我唱的是地道的本地方言，旋律也模仿得尽可能准确。那个背影忽然停住了。我一面唱歌，一面向他接近，《戒指》唱完了，接着唱《青山》，唱《花鞋花伞》："姐儿住在花树坪，看倒（着）看倒长成人。脚穿花鞋花树下走，手拿花伞花树上行，花上加花爱煞人。"我还唱出了"穿声号子"的穿插技巧。

他似乎已经转过身来，躲在一丛灌木的背后。我跟他只相距十米左右了，他又开始退却。为了不让他害怕，我停住不动，唱完所有我能背得下歌词的十来首民歌。他静静地听，没有任何回应。我开始讲话，我说我是来收集民歌的学生，我喜爱民歌，我看过你抄写的民歌，冯静美想念你。我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冷场了几秒钟。我听到一种苍老浓重的声音，因为是方言，我很难立刻明白。忽然，我觉得我懂了，他说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我相信我是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我答应他。忽然那身影向后一跃，钻入了丛林。我走上前，穿过灌木丛，眼前是一片林海。

梦醒来，梦中林间的松涛还在耳畔回响。我不禁陷入思索：冯静美的父亲今天是否可能真的还活着，以我梦中的这位野人的方式活着？或者，他就是冯静美的父亲？我希望他是。昔日的语言他已经不再使用，几十年孤独的光阴里，或许他只是在反复吟咏他少年时读过和青年时教过的古文和他挚爱过的民歌。土地、房屋都已被分去，妻子被枪杀，女儿跟人而去，人间万物他已无心眷恋，竟把山林当作了他的桃花源。

自此以后，除了民歌，我怕谈神农架，更绝口不谈野人。我希望今后的考察队里也绝对不要再有郭健那样的神枪手。

父亲的一九四九　　曾慧燕

父亲曾匡南，生于 1919 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1948 年 2 月，经吴川县县长欧钟岳极力推荐下，28 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1949 年，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因向往“新中国”，更加上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遂从香港回广州，从此开始长达 40 年的苦难人生。

二叔曾嘉南读中学时，班主任叫全班学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团，后来中共指三青团是国民党反共的工具。肃反运动时期，有人劝嘉南叔外出避风头，但他自恃没有任何反共行为，最后突然在他任教的学校被抓走。我的奶奶托人求情，对方回说他没事，过两天便会放人回家。那天，我爷爷正在自家诊所给人看病，突然门外马路上有人挣扎突围而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爷爷定睛一看，心胆俱裂，原来是他

最心爱的儿子被人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奶奶当场昏死过去。念高中的小姑姑正在学校上课，有同学告知看见她的二哥被处决，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后来竟因此被批“立场不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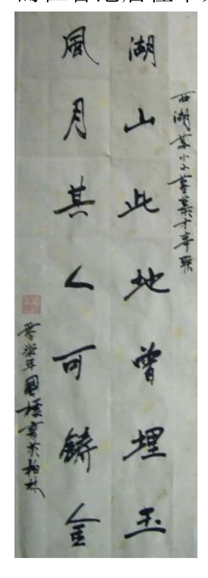
嘉南叔惨死七年后，我才出世。从小我就纳闷，为何我家的日历总是少一页？到了那一天，爷爷就禁食，粒米不进，独自垂泪。我曾好奇地询问，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则大人将大祸临头。这个谜团，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我才从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来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在那个黑暗年代，悼念“反革命”即是“阶级立场有问题”，“阴谋阶级报复”，只能偷偷纪念。嘉南叔临刑前在家门前向爷爷下跪，文革期间成了爷爷被批斗的一条罪状，“反革命孝子贤孙，死到临头还要下跪，可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因嘉南叔是被枪决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幅用毛笔隶书抄录的岳飞《满江红》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落款是“弟嘉南乱涂于民国卅五年六月”。文革红卫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线装书中无意间翻看到这一幅字，好奇地问奶奶嘉南是谁？奶奶大惊失色，叫我以后千万不要提这个名字。我实在太喜欢这幅书法了，偷偷珍藏起来，使之得以逃过红卫兵抄家之厄，留存于世，后被我带到香港，再带到美国珍藏至今。父亲不止一次自责，假如当时他留在香港办学，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于被当成反革命遭枪决。

父亲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本来已与一李姓女同学订婚，并准备在 1952 年底举行婚礼。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去了香港，不会再回“新中国”，故把父亲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传讯审查我父亲。父亲的未婚妻当时已有身孕，父亲成了“特嫌”，她以为父亲性命不保，绝望之余，做了人工流产，随后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别抱。

父亲获释后，到广东台山县斗山任远中学任教。周末假日，经常

到广州图书馆翻查资料，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她是澳洲华侨，在 1954 年的回归热潮中返国，与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父亲，婚后一年生下我。不久，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往人迹罕至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他所在学校共去了三名教师右派，另两人都未能活着回来。母亲因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决定离开伤心地，遂要求离婚。由于当初父母家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此时她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便不再回澳洲，而在香港居住下来。



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文革爆发，我家落入苦难深渊。历次政治运动，爷爷、父亲都是“运动员”，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关押……无日无之，真的生不如死。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一次试图在江水中溺毙自己，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将，虽然强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试图用吃饭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脑袋，尽管头破血流，最终及时获救。那时我们经常要填写履历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被杀、被关、被管制”等，我就神经紧张，害怕得不得了。

晚年的父亲，先是创办明德书屋，后又兴办梅山中学。父亲在历次政治浩劫中都大难不死，没想到 1996 年却死于医疗事故。我尽其所能，在父亲生前奉献的梅山中学，捐款成立曾匡南奖教、奖学金和匡南图书馆，希望藉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